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green background with a light green diamond-shaped grid pattern. In the center, the title '艾思奇文集'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sans-serif characters. Below the title, the publisher's name '人民出版社' is printed in smaller, light-colored characters. The cover is decorated with several golden symbols: a star at the top center, a crescent moon on the left, a solid circle on the right, and four stylized flowers (two at the top corners and two at the bottom corners) and a four-pointed star at the bottom center. A vertical golden band is visible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cover.

艾思奇文集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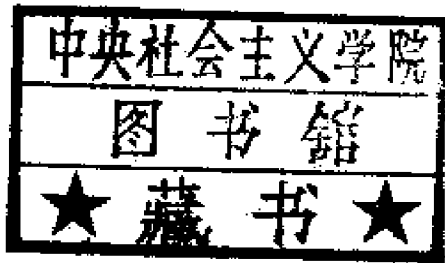
B26
2

51516

DG25/21

艾 思 奇 文 集

第 二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宁成春

艾 恩 奇 文 集

第 二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8.75印张 638,000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7,500

书号 17001·106 定价 4.10元

目 录

| | |
|----------------------------|-----|
| 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世界 | 1 |
| 第一题 劳动创造人 | 1 |
| 第二题 劳动创造人类社会 | 8 |
| 第三题 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 17 |
| 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 | 29 |
| 从头学起 | 34 |
| ——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 | |
| 再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 | 41 |
| 学习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 | 51 |
| 反驳唯心论 | 60 |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对天津干部的讲演 | |
| 前进一步 | 74 |
| 论思想改造问题 | 85 |
|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 | 107 |
| 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 | 125 |
| ——在一个学习座谈会上的发言 | |
| 为什么要批判和克服“功臣”思想 | 143 |
| ——关于“为什么必须克服‘功臣’思想”问题的讨论总结 | |
| 《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 154 |
| 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 183 |

| | |
|--|-----|
| 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 | 201 |
| 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 | 214 |
| 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职能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 238 |
| 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 | 251 |
| 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下前进 | 271 |
| 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 | 281 |
| ——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 |
| 对杨献珍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 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的意见 | 291 |
| 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 | 306 |
| 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 | 316 |
| ——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 | |
| 一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 316 |
|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 340 |
| 三 阶级和阶级斗争 | 369 |
| 四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 393 |
|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 | 417 |
| 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 | 422 |
| 前 言 | 422 |
| 第一章 哲学是什么？哲学的根本问题。为什么要研究哲学？ | 426 |
| 第二章 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萌芽、发生 和发展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 战的历史 | 444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的变革。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 | 461 |

| | | |
|-----|--------------------------|-----|
| 第四章 | 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存在形式及其规律性····· | 477 |
| 一 | 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 | 477 |
| 二 | 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的根本属性····· | 482 |
| 三 | 时间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 486 |
| 四 | 物质的运动有它自己本身的规律性····· | 489 |
| 第五章 | 物质和意识····· | 491 |
| 一 | 物质是意识的根源····· | 491 |
| 二 |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 495 |
| 三 | 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 | 502 |
| 第六章 | 认识过程的辩证规律性····· | 509 |
| 一 | 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 | 509 |
| 二 |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 515 |
| 三 | 理论和实践····· | 528 |
| 四 | 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 534 |
| 第七章 |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 544 |
| 一 | 唯物辩证法的总的特征及其研究对象····· | 544 |
| 二 |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 | 548 |
| 三 | 辩证法要求对于具体问题给予具体分析····· | 556 |
| 第八章 | 辩证法的普遍规律····· | 561 |
| | (甲) 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 | 561 |
| | 一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 561 |
| | 二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 567 |
| | 三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579 |
| | 四 对立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 585 |
| | 五 斗争的对抗与非对抗的形式····· | 605 |
| | (乙) 量和质的互相转化的规律····· | 610 |
| | 一 事物的质和量, 质和量的统一····· | 610 |

| | |
|---------------------------|-----|
| 二 由量到质和由质到量的互相转化····· | 615 |
| 三 量变和质变过程的具体分析····· | 621 |
| (丙) 否定之否定规律····· | 630 |
| 一 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 630 |
| 二 辩证法的否定和形而上学的否定····· | 632 |
| 三 否定之否定····· | 636 |
| 第九章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 | 647 |
| 一 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反映····· | 647 |
| 二 本质和现象····· | 651 |
| 三 形式和内容····· | 658 |
| 四 必然性和偶然性····· | 664 |
| 五 必然和自由····· | 669 |
| 六 因果性和目的性····· | 673 |
| 七 可能性和现实性····· | 679 |
| 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 | 689 |
| 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 | 694 |
| 学习列宁，保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 698 |
| ——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而作 | |
| 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 727 |
| 进一步学习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 747 |
| ——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笔记 | |
| 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 787 |
| 曲折前进是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 | 814 |
| 关于哲学教科书的一些问题····· | 823 |
|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 836 |
|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和他的哲学思想····· | 869 |

| | |
|--------------------------|-----|
| 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 | 885 |
| 人类认识的总规律 | 889 |
| 附录：艾思奇年谱 | 901 |
| 编后记 | 912 |

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世界*

第一题 劳动创造人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开始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第一章，这一章的题目是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在这一章下面，我们又分做三个小题目来解释：第一，劳动创造人；第二，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第三，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现在让我们先讲第一个题目，劳动创造人。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要说明一下，人类是怎样出现在世界上的？

人的来源的问题，是在一百多年来才弄清楚了的。大约一百多年前，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用了很多的真凭实据，证明世界上的一切生物，一切高等的动物植物，都是由很低级的生物经过长久的年月逐渐发展、变化而成的。这一个科学思想，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进化论学说。进化论学说也初步说明了人类的来源，指明人类并不是自从开天辟地就出现在世界上的，也不是由上帝创造的，人类和其他动植物一样，是别的比较低级的生物进化而成的，人的祖先就

* 本文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中的第一章。全书共五章近十五万字。一九五〇年曾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一年改由三联书店出版。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作过两次较大的修改。文末时间按现存手稿标出。

是一种高等的猿类。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仅仅指明了人的祖先是一种高等猿类，至于猿类变为人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并没有得到解答，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正确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种猿类，怎样会变成人类呢？为什么别的动物不会变成人类，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存在的猿猴都不会变成人类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要了解人和一切动物不同的地方在那里，人类的最根本的特点在那里？

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和动物一样，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必须不断的从周围世界取得生活所必需的各种东西，例如吃的东西、住的地方等。这些东西叫做生活资料。如果不能经常取得生活资料，那么，不管是人类或动物，都要活不下去，都要从世界上消灭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人类是怎样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人和动物在这一点上就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动物是怎样取得生活资料呢？动物是完全依靠它们身体上生来的各种自然器官来取得生活资料的，例如老虎是依靠它的爪和牙去捕吃弱小动物，蜜蜂是依靠它们身上的酿蜜器官。动物除了它们自己身上的器官之外，它们不可能创造任何其他的方法，来取得生活资料。人类就不同，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不是依靠自己生来的器官，而是依靠人工制造出来的工具。没有犁头、锄头、镰刀等等工具，农民能不能从田地里取得粮食呢？当然是不能的。工人用铁锤打铁，用织机织布，也都是用人工制造的工具来取得生活资料。总之，人类的生活和一切动物生活的不同，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当然除此而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特点，我们在这里只是讲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人类在谋取生活资料的时候，

是利用人工制造出来的工具,而动物则不能制造工具。

了解了人类和动物的这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那么,也就容易懂得,猿是怎样才会变为人的了。这就是说,要由猿变为人,虽然需要有许多条件,但其中有一个决不可少的根本的条件:就是要由不会制造工具,变为能够制造工具。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猿类,虽然是动物中很高等的,但因它们不会制造工具,所以仍然是兽类。

人类的祖先,为什么能够由不会制造工具变为能够制造工具,并因此由兽类变为人类呢?是什么条件引起了这个转变?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先要简单的回顾一下那些转变的事实经过。

科学的研究已经告诉了我们,猿变为人的这件事,是发生在大约五六十万年到一百万年以前的时候^①,在这一个时期以前,动物的进化,已经产生了一种高等的猿类,生物学上把它们叫做“类人猿”。它们最初是在树上生活,它们攀援树枝和摘取果实的动作,使它们的前后肢的作用开始发生分化,而前肢就初步有了手的作用。在进化过程中,它们中间一部分逐渐离开树上生活,到平地上来寻找食物。这时就开始学习用后肢走路,而逐渐用手专门使用工具。这是因为它们没有老虎那样锐利的爪牙,它们生来的器官都比野兽软弱,而它们唯一的长处就只是有了适于使用工具的手,因此它们就经常把石头或树枝之类的东西拿在手上,来帮助寻找生活资料,和抵抗别的野兽的攻击。就这样,类人猿就逐渐经常的使用起工具来,开始和别的动物有些不同了。但是,类人猿在最初却只能使用天然的石头或树枝,并不能制造工具,在这种时候,还

^① 最近考古发现的“东非人”,距今已三百万年。——编者注

不能算做人类。只有经过一定时期，类人猿的手脚的分工愈加巩固了，手指也变得更灵巧了，同时脑子也跟着发达起来，最后，才学会把石头打成刀或做出其他人工的工具，这样，才开始了人的生活。

以上就是地球上猿类转变为人的很简单的事实经过情形。根据这些情形，大家就可以答复为什么猿类会转变为人的问题了。猿类变为人，是由不会制造工具到学会制造工具，而能学会制造工具，主要的条件就是劳动的锻炼。类人猿起初是由于要适应在平地上的生活，为了寻找食物和保护自己，不能不经常使用天然的工具，来进行劳动，来寻求生活资料和抵抗其他野兽的攻击。这样经过长期的锻炼，终于学会了制造工具，才变为人类。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说：劳动创造了人类。

了解了什么叫劳动创造人，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其他动物都不会变成人类的原因了。由猿变为人，是长期使用天然工具的结果。经常的、长期的使用工具，是类人猿所以能够变为人的决定条件，其他的动物，包括现在的猿猴类的高等动物在内，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是不会变为人类的。

也许有人要说，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来说，似乎不是劳动创造人类，而是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创造人类。因为，如果不是猿类由树上到平地来生活，那永远不会有人类出现。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这种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正确的。不错，由树上到平地生活，对于从猿到人的转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这一个条件，并不是直接使猿转变为人的决定的原因。这个条件仅只决定了一点，就是使那最高等的猿类拿起了天然工具，但是能拿起天然工具，还不是人类。由拿起工具到制造工具，才转变为

人，而制造工具的能力，并不是平地的条件直接造成的，而是由于长期使用工具的劳动锻炼成的。

也许又有人要说，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似乎不是劳动创造人，而是思想创造了人，智慧创造了人。类人猿之所以能够变为人，似乎是因为它比别的动物聪明，能够想到要把天然的石块加以制造，把它变为人用的工具。这种说法是不是对呢？这种说法，是唯心论的错误的说法。我们讲历史唯物论，就要反对这种唯心论的说法。不错，人类在制造工具的时候，必须要运用思想，要制造工具，需要在制造之前，先在头脑里多多少少有些预定的计划。人类的各种行动，都要通过一定的思想、计划，这是人的特点，是人和动物的区别的特征之一。但是我们首先要问，人的思想聪明是那里来的？为什么类人猿忽然会想到要制造工具？如果仅仅是由于智慧比较高，为什么在树上生活的类人猿不会想到，而一定要到了平地上以后才会想到？而且一定要经过长期使用天然工具之后才会想到？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时才会这样聪明起来？这就很明显，类人猿的聪明、智慧，并不是天生的，它也是劳动锻炼成的。类人猿所以能够在它的脑子里发生了制造工具的思想，这是由于长时期使用天然工具的结果。在长期的使用天然工具的过程中，类人猿的手，不断地变得更灵巧，脑子发展得更复杂，手和脑进步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产生聪明、智慧，能够想到石块可以经过制造变为人用的工具。同时，制造工具的思想的产生，还要依赖劳动经验。例如说，类人猿在和野兽斗争的时候，常常要把石块投出去打击野兽，如果这块石头投出去的时候摔碎了，那么，当它把那石头的碎片再拾起来的时候，它就往往可能发见，有些破片的破口，是象刀一样的锋利，可以用作更好的工具，这样，类人猿在和

野兽斗争的劳动中,就不知不觉地得到了一个经验,就是把石块打破了,可以变成更好使用的工具。像这样的劳动经验,在类人猿的生活中重复了很多次,当它们的脑和手也跟着这些劳动的多次锻炼而进步了以后,才会把这些经验集中起来,发生制造工具的思想,才会想到打制一块普通石块,使它变成适合自己需要的工具。这一些情形就足够证明,猿变为人所需要的思想、聪明、智慧,也是劳动中锻炼出来的,是劳动经验积累的结果。

劳动创造人的道理,说明人类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劳动者的历史,人类所以能够脱离动物界,就是由制造工具的劳动开始的。人类脱离动物界,就是表示人类劳动的胜利。这一个科学的道理,证明了劳动是人类的光荣,因此,也就推翻了一切旧社会轻视劳动的错误思想。轻视劳动的思想,是过去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社会里产生的。在这种时期,剥削的寄生阶级,在社会上占据了较高的地位,而劳动人民却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因而穷困破产的境地,因此,就形成了一种重视剥削阶级和轻视劳动人民的错误思想,以为不劳而食是很荣耀的事,而劳动是受罪,是可耻的,是不足重视的。这种思想表现在宗教迷信里,就把劳动生活看做是前世作了坏事的处罚,是因果报应的恶果。旧社会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思想,在社会上有着很普遍的坏影响,不但使得知识分子把劳动看做可耻的事,甚至于工人农民也往往误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下贱的生活。

但是,现在时代已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剥削阶级统治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世界各国劳动人民都纷纷觉悟起来积极的进行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这个斗争在今天已经一步一步得到了辉煌的胜利;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建立了劳动人民的统治;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胜利,使自己上升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体的地

位；中苏两国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更加巩固了世界劳动人民的胜利。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就不能不对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看法来一个根本的改变，把剥削阶级统治时代的错误思想纠正过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有不少的人改变了轻视劳动和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但直到现在，这种坏思想在社会上遗留着的影响还很不小。例如高小和中学毕业的学生，有许多人还不懂得参加工业和农业的劳动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还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反对这些错误的旧思想，还要向人民指出：在目前的时代，任何一个有觉悟的人和不愿意落伍的人，如果自己的脑子里还有旧社会的轻视劳动和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残余，就应该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思想，来把它彻底清算一下，应该树立起热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

过去剥削阶级的历史家，常常把剥削阶级的统治当作天经地义，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做永久不变的教条。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道理证明了这种教条是荒谬的。劳动创造人的道理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劳动者的历史，而一直到现在，也主要是劳动者的历史。如果说，人类历史到现在是有五十万年到一百万年左右，那么其中只有不到一万年的时间才不是属于原始公社时代。在原始公社制社会的长久时期里，人人都是劳动者，不知道有什么剥削者寄生者的，只在以后的这几千年中间，人类里面，才出现了少数统治的剥削阶级和脱离劳动的人们。但是，现在又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世界劳动人民的斗争，已一步一步得到胜利，现在的历史发展趋势，是“条条道路都可以通向共产主义”。这就是说，阶级剥削制度是正在一步一步的从人类世界的舞台上退场了，我们的世界终归又要完全变为

一个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美满的劳动人民的世界了。我们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正在为着这样的一个将来的美妙前途而进行斗争，我们中国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过渡时期，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前途。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就是要清楚地了解为什么人类历史一定会走向这个前途；就是要了解人类历史走向这前途的基本发展规律是什么；就是为要用这些规律知识作为方法，来研究我们工作和斗争中遇到的问题，来解决这些问题，来正确的指导我们进行斗争。

关于劳动创造人的问题，就讲到这里为止。

第二题 劳动创造人类社会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讲第一章的第二个题目：劳动创造人类社会。要了解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意义，首先要进一步说明一下人类劳动的特点。

前次我们已经讲过，从猿到人的转变，是由制造工具开始的。因此，要分别什么是人类的劳动和什么是动物的活动，只要看能不能制造工具。动物不能制造工具，动物仅只能利用自己身上生出来的器官，去从自然界取得生活资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除此而外，就没有别的方法来取得生活资料。例如蜜蜂，只能依靠自己身上的酿蜜器官到花里采蜜，来维持生存；老虎，只能依靠自己身上的爪牙，去捕捉弱小的动物，作为自己的食料。这就是说，动物谋生存的器官是自然生就的，任何一种动物都不能在自己生就的器官之外，另外创造出生产工具。至多，也只能偶然地象类人猿那

样利用一些自然界现成的工具，如现成的石块、现成的树枝之类，而不能加以制造、改变，使之更适合自己的一定的需要。即使能够，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不能多种多样的制造。这样，动物的生活也就受着自然条件的限制，每一种动物，只在一定的自然环境里才有可能生活，这就是说，只在它们的身体条件能够适应的自然环境里，它们才有可能从自然界里取得生活资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蜜蜂身上的酿蜜器官，是只适合于从花里酿蜜的，因此，只在有很多开花的植物的自然环境里，蜜蜂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在没有开花植物的环境里，就免不了要死亡。老虎的爪牙，是只适合捕捉弱小兽类的，所以也只有弱小兽类能繁殖的地方，老虎才容易生存，在弱小的兽类绝迹的地方，任何凶猛的老虎，也只能自然而然归于消灭。所以，某一种动物或其他生物，都只能按照它的身体上天然生就的器官的条件，在一定自然环境里生存，而不能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生存，因为它们不能超出自己身体条件的限制，另外创造出适合各种环境的劳动工具。如果环境变了，它们的身体条件不能适合于它，那么，它们就只有死亡；或者是按照进化的规律，在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它们的某些器官，在它们的后代生物的身上也发生了变化，变成能适应新环境的器官，这样一来，就使它们自己本身变成了另外的生物种类，它们也只有变成了这新的生物种类，才能在新的自然环境里生存下去。例如水里的鱼类，只有进化为两栖类（如青蛙类）或爬虫类（如蛇类），才有可能到陆地上和到空气中来生活。如果环境变得很急，它们的后代来不及改变，来不及适应，那么它就只有归于灭亡的前途。

总之，人类以外的各种生物，只是用自己的器官去适应自然界，而不能超出自己的器官条件限制之外，去改造自然界。它们虽

然也能使周围自然环境发生变化，而这环境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引起它们自己的身体器官的变化，以至于使它们变成另外的种类。但是，某种类的生物，一般的只能在它的身体器官能够适应的某种自然环境里才能生存，它们不能在自己的身体器官没有改变的情形下面，有目的有计划的为自己创造各种各样新的物质生活条件，使自己能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里生存下去。这样一种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是只在制造工具的人类身上才能够具有的。

各位听众！你们想想看，人类的生活和动物的生活是多么不同啊！人类能够生存的自然环境是如何的多种多样！现在在地球上从最热的南洋、非洲到最冷的北极地方，从很低的大平原如河北，到很高的高原如西藏，从很大的大陆到很小的岛屿，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人类在生活着。人类并没有变成鱼类，并没有在身上生着在水中呼吸的器官，却可以学鱼的样子，坐着潜水艇游到海底里去；人类也没有变成鸟类，并没有在自己身上长了翅膀，却可以像鸟一样，坐着飞机飞到天空里。在寒冷的地方，没有毛的兽类，如大象之类，是一定要冻死的；人类能用丝、麻、棉花、毛皮等等，制成衣服，因此就可以在寒冷的地方，甚至在最冷的北极地方生活下去。在没有足够弱小动物的地方，食肉的野兽是要饿死或者减少繁殖的，人类却可以用畜牧的方法，把自己所需要的肉食生产出来，维持广大人口的健康。人类可以盖各式各样的房子来躲避狂风暴雨，至于动物，则除了生来能够筑巢的少数动物以外，是不知道制造自己的住处的。很明显，人类的生活，不像动物以及其他生物那样，受着一定的自然条件的限制，人不是只用自己的器官去适应自然，不是只能在一定的自然环境里取得生活资料，相反的，人类能够利用自然界里的各种东西，有目的地为自己创造出多种多

样的物质生活资料，使自己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里都能够生存下去。人类的生活，为什么能够有这样一些优越的特点？原因就在于：人类的劳动和动物求取生存的活动有根本的性质上的不同。人的劳动是使用了自己制造的工具，而不是依赖身体上自然生就的器官。人类能够制造各种各样的工具，因此就能够不受自然的器官的限制，就不仅仅在一定的自然环境里才能生活，而是能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都能够取得生活资料和维持生活。人类的劳动，是有创造性质的，而不仅只是自然的。在人类和人类的劳动没有出现以前，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当然更不是上帝创造的；动物也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的生活不能够脱离自然条件的限制。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就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利用各种自然条件，来开始创造的活动，由创造工具和创造各种物质财富起，一直到创造一个人类世界。这个人类世界，是自然界从来没有过的，这就是人类的社会。

要想更深刻的了解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意义，仅只上面所说的一些还不够，还要研究一下关于生产的问题。

什么是生产？刚才我们说过的，人类用自己的劳动来改变自然界，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这就叫做生产。人类以外的动物的活动，是说不上生产的，因为动物用来维持自己生活的物质资料，是自然的，不是经过创造的。动物是简单的消耗着，甚至于掠夺着自然界的物质资料，而不能创造物质生活资料；而人类一方面则是消耗——或更正确些说消费——物质资料，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创造和生产出物质资料。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人类的生产，首先我们就会注意到，人类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或简单的叫做生产力，是有大有小，而且大小的相差，常常是很远的。大家知道，

农村妇女在家庭里用手摇纺纱机纺棉线，一个人每天只能纺四、五两，但城市的机器纺纱工厂中的工人，一个人每天就可以纺四十多斤到一百斤。一种动物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永远受着自己的生理器官的限制，永远受着自然条件的限制。如蜜蜂采蜜，每天所得的数量，不能超过它的酿蜜器官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各种蜜蜂的采蜜能力，虽然也有不同，但作为蜜蜂总有一定的最高水平。人类劳动的生产力，却不受生理器官的限制，不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而是可以无限发展，可以有相差非常遥远的不同水平的。为什么人类劳动的生产力能够发展？是什么东西决定着生产力的各种不同的发展水平呢？最主要的是两个因素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第一是劳动的工具。人类劳动的工具是能够不断改进的，不像动物的器官是生就在身上，除非由于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变使自己进化为另外的生物种类，否则，自己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器官的。由于劳动工具可以改进，因此，劳动的工具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种类，有进步的与落后的，简单的与复杂的，不同的工具的使用，就决定了高低相差得很远的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农村妇女使用简单而落后的工具来进行生产，因此，她们劳动的生产力是很低的，纺纱工厂的工人是使用着复杂的进步的生产工具，生产力就远远高过农村妇女。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第二个主要因素，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者自己。工具本身是死的东西，它自己不能发挥它的生产力的作用，只有通过劳动者的使用，工具才能够活动起来，才能实现生产力的作用。并且生产工具本身也是劳动者生产的。使用工具需要有一定的生产经验，需要能够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生产经验较多、劳动技能较高的熟练劳动者，他的生产力就会很高，否则生产力就会很低。因此，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

就是决定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样，由于人类的劳动能够不断改进工具提高劳动技能，所以生产力就能不断的进步，而不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这是人类生产的一方面的特点。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注意到，在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相互间必然发生一定的关系，人类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在生产中的人和人的关系，就叫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构成人类社会经济基础的原素，它直接规定着社会面貌和性质。人类的生产关系，也是变化、发展、进步的，例如封建的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就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就必然要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这些生产关系的变化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呢？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每一种生产关系，都要在生产力发展的某种水平的基础上才能够产生出来。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然引起旧的生产关系的破坏，就需要产生与这种新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合的新的生产关系，例如由使用手工工具的小生产的水平，发展到大机器生产的生产力水平，那么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不由封建的变为资本主义的，最后变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变化了，整个社会制度也就会跟着改变。

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和整个社会的变化？这个问题，我们要放在以后慢慢讲，才讲得清楚。今天，我们只要指出，人类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结果就使得整个社会发生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深刻的认识到，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道理是有着多么大的意义了。我们由此就可以知道，要建立新的社会，就必须有一定高度水平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例如要使中国在经济上由落后的国家变为进步的国家，要在中国

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仅仅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就够了，还要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把农业的中国变为工业的中国，要用主要力量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迅速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并保证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实现。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我们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积极劳动，努力发展生产。这一个道理，对于参加革命工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这个道理，才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要革命和如何来进行革命工作。有许多人虽然参加革命工作，但对于革命的目的却了解得很不清楚，他们以为只要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只要把土地改革完成，革命就算到顶了，好像从此就可以享福、睡觉，而不必组织广大工人农民积极劳动，不必再准备艰苦的斗争了。他们不知道，打垮反动派统治，仅仅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开了门而已，也就是仅仅打破了发展中国生产力的障碍。他们不了解毛主席的名言，说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胜利，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其中尤其要着重的工作，就是发展生产、经济建设的工作。有些人虽然口头上也不反对发展生产的重要，但如果真的要他们去担任生产劳动的任务，他们就能够在生产劳动中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不知道，如果不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积极劳动，努力发展生产，就不可能使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的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如果不能胜利通过这样的过程，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新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彻底的完成革命的任务。

各位听众！我们在上面已经把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意思大体上说明白了，现在再解答一个可能会被许多人提出的问题。

有人说：劳动创造人类社会，似乎只是指的物质生活资料一方

面的事情,至于精神的东西,例如语言、文化、艺术、科学之类,似乎不是劳动创造的,而只能说是知识分子创造的,或知识分子的智慧创造的。这种说法,也是从唯心论的观点产生的,如果懂得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就不难把它驳倒。

语言由劳动产生,是完全容易了解的。我们讲过:人类能制造工具,并能善于使用工具来进行生产,这些都不是生来的、自然的本领,这些本领却是后天的,需要学才会的,要学会这些本领,需要在长期劳动锻炼中积累起很多经验,需要互相学习经验和互相传达经验。人类在进行生产的时候,相互间又不能不发生一定的关系。为着要传达劳动经验和互相学习经验,为着要维持相互间的一定的关系,人类就需要创造一种相互间交际的工具,这样的工具,就是语言。所以,语言产生的基础是劳动,这是很明白的。

艺术、科学以及一切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上,主要的在阶级社会里,似乎是完全由知识分子头脑创造的,而不是劳动者创造的,但是,首先我们要研究一下,知识分子从何而来?在人类社会里,为什么有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劳动,专门从事思想文化的活动?这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阶段,劳动者每日生产所得,除了供自己的生活需用之外,还可以拿出一部分的生产物来,养活少数脱离体力劳动的人。这就是说,社会上能有知识分子这一种人,也是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结果。动物界自然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在人类社会里,在最初的原始公社制时代,人类劳动的生产力还很低,不能提供任何剩余生产物的时候,那时候也就没有这种现象,那时候的原始的艺术文化,就不是任何特殊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只在人类劳动的生产力比原始公社时代更高的时候,才可能有这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化。才有可能出现特殊的专门

从事脑力活动的知识分子阶层，而与那些终日劳动没有机会从事科学艺术文化活动的劳动人民对立起来。这样的分化，只能证明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是以广大工人农民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离开生产者的体力劳动，就不可能有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存在。同时，我们今天还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预见到将来的一种新的美妙的前途：在劳动生产力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将来的共产主义世界里，那时由于每个人只要很少时间的劳动，就足够满足一切生活需要，因此，人人都会要把从事劳动当做自己生活的必需，而同时又都有相当的时间来从事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动。到那个时候，就不会有那种和劳动人民互相对立的或在本质上有不同的、仅只从事脑力活动的特殊的知识分子这一种社会阶层了。那时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同时也有机会来从事脑力劳动，来从事在艺术科学上的创造活动了。

其次，如果有人又说：知识分子虽是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结果，而由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来专门担负文化、艺术、科学创造的事情，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现象，但无论如何，艺术、科学本身的内容，仍然是在人的头脑活动中，或智慧中直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劳动创造的。如果有人这样主张，那么，我们先要问他：难道能说科学、艺术是由某些人的脑子里凭空想出来的？是由他们某一天睡了一觉之后突然想到的？或是还有其他更深的来源呢？当然，它不是凭空被人想出来的而是有更深的来源的。这来源，归根结蒂说来，仍然是以劳动为基础的。一切有价值的科学发明和艺术创作，不管它是由劳动者出身的人所作的也好，或者是由脱离劳动的甚至于剥削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作的也好，它的内容，归根结蒂，必定是概括了人类历史上一定时期相当广泛的劳动人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第三题 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藏

171

民的各种斗争经验——包括对自然斗争的经验和阶级斗争经验。自然科学是劳动人民对自然斗争的广大经验——也就是生产经验的总结，自然科学家并不是凭空创造出科学知识来，他们的功劳只是把这些经验加以综合、提高，使它变为精确的、系统的自然规律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艺术在阶级社会里也是阶级斗争的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家的工作，只不外是把这些斗争用集中的、典型的生动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历史上有许多艺术作品是仅仅反映剥削阶级的生活和要求的，但最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它的内容必定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要求，并且它所采用的那些生动的形式，也主要是在劳动群众中首先作为萌芽形式创造出来的。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就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觉悟较低的农村劳动人民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其中有许多生动的语言形式，也是劳动人民中间来的。总之，艺术、科学以及一切文化现象，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由劳动者创造出来，但它的产生的最后根源，仍然是存在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中和生活中。

既然一切社会历史现象产生和发展的最后根源，都是在于生产的发展、劳动的发展，所以我们就说，劳动创造人类社会。

第三题 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讲第一章第三个题目：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劳动的发展，生产的发展，是一切社

会历史事变的最后根源，由此自然就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的主体，是劳动群众。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劳动人民的历史。

中国从来就有一句话，叫做“英雄造时势”。这就是说，历史是英雄伟人创造的，而不是劳动群众创造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唯心论的说法，这是把英雄伟人个人的作用过分夸大的错误的说法。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按照正确的科学的观点，应该说是人民创造时势，应该说是劳动群众的活动创造历史，而不能说是英雄造时势。在原始公社制社会里面，人人都是生产者、劳动者，因此原始公社制社会的历史，当然就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是用不着什么解释，谁也能够明白的。在阶级社会里面，生产者、劳动者虽然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但仍然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是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唯一的创造者，仍然是创造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劳动群众的活动，仍然是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力量。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来改朝换代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民群众的斗争活动所创造的历史。中国的旧历史书，曾经用尽一切方法来隐瞒这个历史真相，想把中国历史描写成帝王将相个人活动的历史，描写成仅仅是少数英雄豪杰伟大人物活动的历史，对于改朝换代的现象，想单单用皇帝个人的聪明才能、个人的思想活动来作为说明的根据，例如，把皇帝个人的昏庸当做一个朝代垮台的原因，把一个英明的皇帝的出现当做某一朝代兴起的原因等等。这些历史书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下写成的，因此它要用唯心论的观点来夸大帝王将相个人的作用，抹煞农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些历史书为着要服从剥削阶级的统治的需要，就把历史曲解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历

史书里，也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隐瞒农民群众的活动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过去每一个朝代垮台之前，几乎毫无例外的，总可以看见一些规模很大的农民暴动，这些农民暴动的事实，在旧的历史书里虽然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曲解和污蔑，但是由于它的作用十分重大，即使是反动的历史写作者，也不能完全把它抹煞掉。因此，只要我们具有正确的科学观点，那么，就是从这些旧的统治阶级所写的历史书里，也可能找出许多证据，来说明中国农民群众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来证明过去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广大农民群众的暴动，而不是由于皇帝个人的聪明才能的不同。也就是说，每一个旧的朝代的垮台，是由于受到了农民暴动的致命的打击，每一个新的朝代的建立，是由于利用了农民暴动的胜利的果实。秦汉两代中间，有陈胜、吴广，西汉和东汉中间，有新市、平林、赤眉、铜马等等，东汉末年有黄巾，隋唐两代中间有李密、窦建德，唐朝有黄巢，北宋末年有宋江、方腊，元朝末年有朱元璋，明朝末年有李自成、张献忠，这些都是历史上最主要的农民暴动的领袖。他们所领导的暴动，在中国历史上作用很大，就是旧的统治阶级的历史书上也不能不记载下来，这些农民暴动就是过去中国历史上推动旧朝代灭亡和新朝代兴起的真正力量，也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的推动力量。这些暴动虽然在当时条件下，还不能够根本推翻封建制度，还没有引起过社会的革命的改变，但每一次暴动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多少有了一些发展，因此，也多少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我们只要用正确的科学观点，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可以知道，一个新的朝代能够建立起来，一般的说，都是由于它和农民

群众的对立是比较缓和的，新的朝代的最初的皇帝，有时被称为“真龙天子”，被称为英明的真主。他们所以受到这样的歌颂，主要的原因，自然是由于统治阶级有意要这样自己吹嘘，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地主阶级在旧朝代受到了农民暴动的打击的时候，不能不对农民让步，新的朝代的统治者，代表着这些被迫对农民让步了的地主阶级，因此他们就暂时不像旧朝代那样残酷的压迫农民和剥削农民，就要暂时采取一些比较缓和的政策，多少减轻了这些压迫和剥削，也就由此暂时缓和了与农民群众的对立。这样，新的朝代的统治者利用了农民暴动胜利的果实，就能够把统治的地位巩固起来。但是，一个朝代的最初的皇帝统治，虽然一般都能够对农民采取比较缓和的统治政策，以后一代一代传下去，皇帝以及和他一起的统治者的家族扩大起来，统治机构逐渐庞大起来，寄生的剥削集团逐渐加大起来，再加上一般地主阶级剥削和商业高利贷剥削的加强等等，不可避免的要使得统治阶级一代比一代更厉害的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最后就终于使农民无法忍受这种压迫和剥削，不能不起来反对这个朝代的统治。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封建皇帝朝代的统治，一般的最多不过传到十几代，时间不过延长到两百多年，就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尖锐的对立起来，就成为势不两立的仇敌，就要展开生死的阶级斗争，这个封建皇朝的统治到了这样的时候，就走到了它的末日了。在这种时候，任何聪明而有才能的帝王将相的个人努力，都是不中用的，都不能挽回这个朝代的垮台的命运。例如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就曾经作过相当大的个人努力，来企图挽救他的朝代的灭亡，但是他所代表的整个统治阶级已经成了农民群众的死敌，他个人的行动也只是和人民敌对的行动，因此，他的个人努力，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也

仅只是更进一步地激起农民群众的愤怒，使农民群众对于他的统治更加不能容忍，广大农民群众已不容许他再坐稳皇帝位子，那么，不管他个人怎样积极努力，来避免使自己成为亡国的昏君，但最后还是从皇帝位子上跌下来了。

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历史，归根结蒂就是中国农民群众斗争的历史，这就证明了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也就是说，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活动，而不是英雄伟人个人的愿望和努力。当然，我们说的是劳动群众创造历史，不是说个别劳动者就能创造历史，个别劳动者的行动当然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趋向。但是，如果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都在同一目标下面行动起来，那就会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而任何人也不可能抗拒这种力量。朝鲜是个很小的国家，但它的人民群众全都起来争取自己民族的独立自由，又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实际援助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世界广大人民的正义支持，所以即使在庞大的美帝国主义者面前，它还是得到了胜利。

劳动群众是生产者，因此，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他们在生产中的情况来决定的。要了解劳动群众的斗争，在某种时期只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不提出那样的要求，只产生这样的结果，而不产生那样的结果，那就要研究当时的生产情况，才能得到说明。中国两千多年来多次的农民斗争，只造成了封建统治改朝换代的历史，没有把封建社会根本推翻，用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它。虽然也多少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并没有引起革命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过去一般的生产基础，始终没有超出农民的小生产的水平，而小生产者农民的生产力是和封建

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互相适合的，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比封建生产关系更高的社会制度。因此，过去中国农民群众的生产情况，就决定了中国过去历史的发展始终采取改朝换代的形式，每一个旧朝代的末期，农民群众起来暴动，而暴动的果实总是被那些建立新朝代的地主阶级所利用，农民暴动的本身，在它给了旧统治者致命的打击之后，自己跟着也就低落或失败了，而暴动的果实就落在新的统治者的手里，或者暴动虽然胜利了，但在胜利以后，它的领袖人物不久又变成地主阶级的代表者，变成新的封建皇朝的统治者。朱元璋建立明朝，就是这样的。但是，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历史，到了现代的中国，就结束了。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已经逐渐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已经不只是农民群众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而且有了代表更进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的阶级走上了斗争的历史舞台，主要是有了工人阶级走上历史的舞台。人民群众斗争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打击封建统治，不仅仅是要改朝换代，而是要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统治，由人民来做国家的统治者，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根本的革命变化。中国人民群众斗争的这个任务，在最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终于实现了。中国人民，主要是中国工人、农民，现在已经不再是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而是成了国家的主人了。所以，现代中国人民群众斗争的历史，和过去农民群众暴动引起改朝换代的历史是根本不同的。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劳动群众始终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中国人民今天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广大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千

千万万工农群众二十多年来的流血牺牲，要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不是可能呢？当然是不可能的。

各位听众！我们在上面讲了很多，已经把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道理说清楚了。但是，现在就可能有人要提出下面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说历史是劳动群众创造的，那么，英雄豪杰、领袖人物，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是还有一点作用呢？是不是就要否认伟大人物的任何作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答复是：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伟大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我们指出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并不就等于要否认伟大人物在历史发展上的一定的作用，问题是在于怎样来了解伟大人物的作用。如果用“英雄造时势”的观点来了解伟大人物的作用，把英雄豪杰的个人活动看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那我们当然要说，这种了解是错误的，是和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矛盾的。这种作用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伟大的英雄人物也不能凭着个人的聪明才能任意的创造时势；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才是创造时势的决定力量。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情况，以及由于他们这种地位、情况，所规定的群众的行动和要求，就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趋向，就成为创造时势的最后决定的因素。英雄豪杰、伟大人物的个人活动，决不能任意改变这种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向，因此，“英雄造时势”是唯心论的观点，是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的。那么，究竟伟大人物在人类历史中能起什么作用呢？伟大人物在历史上所能起的作用是这样的：他们能够比较敏锐的看出一定历史时期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规定的行动要求和任务，能够比较正确比较迅速的估计到当前历史事变的根本趋向，能够理解到如何使历史事变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途径，因此他们就能够在历史上发生积极的作用，能够组织

群众进行斗争,促进历史事变的发展。这就是说,伟大人物能够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所规定的范围内,通过群众的力量去推动时势的发展,但不能凭个人的聪明才力任意的改变时势,他们必须要首先按照历史本身的发展方向去行动,必须首先按照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规定的方向去行动,然后才能够反过来对历史的发展起一定的推进作用。这种情形,在历史上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如刘邦、朱元璋、彼得大帝等。但是一个人的行动如果违背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违背着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规定的方向,如果是站在违反历史发展方向的反动派的地位上,不但脱离人民群众,并且成了人民群众的敌人,那么,不管他个人有多大的聪明才能,不管他们暂时在社会上有着多大的权威和地位,不管他个人怎样努力,他不但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相反的,历史的前进潮流一定要把他们冲倒,人民群众的力量一定会把他打得一败涂地,结果也就证明他绝不是什么英雄豪杰,而只是一个可耻的小丑。这种情形,在历史上的例子也是非常多的,只要举出过去中国历史上被农民群众打倒的皇帝,如明末的崇祯之流,只要举出最近十年来被世界人民打倒的法西斯统治者,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就足够了。

革命的劳动群众,要使自己的斗争活动能够得到胜利,是需要有自己的领袖的。劳动群众所需要的领袖,首先是强有力的集体的领袖,这个集体的领袖,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着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过去历史上劳动群众始终不曾有过这样的集体领袖,所以始终没有得到过巩固的胜利。在劳动群众的这样强有力的集体领袖中,包含着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劳动群众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领袖,是

因为群众自己的领袖，能够指导劳动人民正确的看出自己斗争的方向，能够使他们在斗争中，目标一致，步调一致，在困难危急的情形下，也不致于发生迷惑、混乱，能够掌握正确的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能够跟着客观情况的变化，灵活的进攻或灵活的退守，能够比较顺利的克服困难，能够恰当的掌握一切有利的时机来取得胜利；在劳动人民的斗争行动中，杰出的领袖人物的存在，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時候，在一定的情形下面，领袖人物的指导，对于斗争的胜败（不是对于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向）能起决定的作用。例如：中国人民有了毛主席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一件事实，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就有着决定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使中国人民掌握了明确的革命斗争方向和正确的策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可能推迟许多年。但是，能够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起着这样重大作用的领袖人物，他们本身也是从群众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他们经常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长期的和群众在一起进行战斗，在这样的战斗中锻炼出自己的领导能力，并且考验了自己的领导能力，他们的领导是依靠了群众中的骨干人物的集体力量去进行的，通过这样的集体，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情况，才能集中群众的意见，才能正确制定指导群众斗争的政策、方针、办法等等。他们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的集中表现，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正因为这样，他们的领导才是正确的，才能够得到群众的热诚拥护，才能成为群众自己的真正的领导者。这就是说，群众的领袖，也是群众在自己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在群众之外能够强加到群众头上去的。脱离群众的人，无论个人有多大的聪明才能，无论他怎样狂妄的想以群众的领袖自居，在实际上终归不能成为真正革命群众的领袖，个

人主义的野心家利用投机取巧的手腕有时也会暂时窃取到领袖的地位,但迟早终归是要垮台的。

不论是讲一般的英雄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好,或者是讲革命的领袖人物在革命群众斗争中的作用也好,归根结蒂,总是不能违背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也就是说,夸大个人英雄作用、盲目崇拜英雄人物的“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论观点是错误的。这一个原理,不仅只是对于英雄伟人、领袖人物可以适用,就是对于任何革命工作者、任何工作干部、任何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也是同样适用的。任何一个革命工作者或工作干部,总是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担负着一些责任,他和他周围的人们中间总有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例如军队里做一个班长,学校里做一个学习小组长,机关里做一个科长、股长,对于班里的士兵,小组里的组员,科里、股里的工作人员,就有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例如农村工作中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和农民群众中间,农村党员和非党农民中间,工厂中的党员、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和非党的一般的工人中间,也发生着一定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些关系中间,如果要想把关系处理得好,就用得着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论观点,就要反对“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观点。这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干部,以及任何一个革命工作者和先进分子,要想真正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首先就要认识到,要把工作做好,必须依靠集体组织的力量,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脱离了集体,脱离了群众,就会一事无成,不管自己个人有多大的能力。因此就必须注意不要使自己骄傲起来,把自己当做唯一的创造时势的英雄,不要把工作的成绩,看做是单凭自己个人的聪明才能完成的,看做是个人的功劳,而忘记了这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要认为凡事都可以任凭自己的意思,想怎样办就怎样办,

而不把集体组织放在眼里，不把周围群众放在自己的眼睛里，不去注意集体领导的原则，不去考虑群众的实际生活情况和群众的意见与批评。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在处理自己与周围群众的关系和处理工作的时候，只凭自己的主观想法独断独行，想怎样办就怎样办，不注意收集周围群众的意见，有了错误缺点也不接受人们的批评。那么，你就是在实际行动中坚持了“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论观点，你就是在工作作风上犯了顶坏顶坏的毛病，你就要脱离群众，就要在群众中丧失任何领导的作用和先进的作用，就不可能把工作作好。许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所犯的种种毛病，如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违反组织纪律原则以及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毛病等等，其思想根源之一，就是缺乏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论观点，就是在思想上忽视了集体，忽视了群众的力量和作用，而把干部、先进分子个人的力量 and 个人的想法看做决定一切的东西，就是在实际行动中表现了夸大个人作用的“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论观点。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要在思想上反对这种错误的认识，就要把群众创造历史的正确观点应用在实际工作中，这就是说，在工作中一定要坚决遵守集体组织的原则，而不要个人自以为是地独断独行，一定要紧密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为着这个目的，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一定要首先考虑周围群众的实际生活情况，要在决定工作计划和步骤的时候，使它适合群众生活的实际情况，使它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并容易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来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任务。为着这个目的，就要善于和群众商量，要尽量听取群众的各种意见，要听取群众对于各种工作的批评。群众的意见，自然有时也会是错误的，但在群众中间可以听到个人所不知道的种种的实际情况和材料，可以听到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并且

常常可以听到比个人所能想到的更正确的意见，可以听见真正能揭发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只有虚心听取群众的各种意见和批评，然后才有可能把这些意见和批评加以比较、分析，集中正确的意见和批评，来帮助改进工作。而为着要能够全面地集中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正确地分析这些意见和批评，并根据这些分析正确地决定工作方针、计划、办法等等，就必须依靠领导机关的集体的力量，这个领导的集体的成员是和各方面的群众有广泛的密切联系的，通过这样的集体的讨论研究，通过集体领导的方法才能达到正确集中和分析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的目的。这就是说，首先要善于向群众学习，然后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办法，并用它来教育群众，说服群众，提高群众斗争的自觉性，才能使群众在正确思想指导下进行斗争。有了群众的自觉的斗争，就有了无比强大的力量，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很好的完成工作任务。如果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做工作，那就叫做符合了群众路线，就叫做有了群众观点和群众作风。这是正确的工作路线和正确的工作作风。学习历史唯物论，学习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的一个主要任务，也就是要学会把这种观点变成我们的正确的工作路线和工作作风，就是要克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英雄崇拜、骄傲自满，把工作的成绩单单纯看做个人的功劳等等的错误思想，以及与这些思想联系着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轻视集体、轻视群众、脱离群众等等的坏作风。

关于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这一章，到这里就讲完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 若干非历史观点

《北平解放报》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的“学习讨论”栏里，登载了一篇蓝莎的《劳动创造了人》的文章，据编者的按语，说这个问题的讨论，就以那篇文章做结束，似乎是把那篇文章当做结论来发表的。如果这样，那我认为很不妥当。蓝莎的文章，引用了恩格斯的文字，说明劳动如何创造了人的过程，那一部分倒没有什么问题，但他自己所引伸出来的一些论点，却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蓝莎引了恩格斯的大段文章之后，这样说：“由此可见，人是实实在在由猿人转变而来的，‘天’、‘神’、‘日月精华’创造了人的说法，只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出来的谎言谎言。这些谎言的目的是在愚弄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相信，剥削者生来就应当剥削人的……”学习劳动创造了人的真理，可以打破宗教迷信中关于人类起源的荒谬的神话，这是没有问题的，宗教迷信受到剥削阶级的支持利用，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能就得出结论，说宗教迷信和各种神话，仅仅是剥削阶级捏造出来的欺骗被剥削阶级的东西，宗教神话的最早的起源，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那时的人类社会还没有阶级出现。如果认为先有了剥削阶级，然后又才由这个阶级捏造出宗教神话，那就无从解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始宗

教——例如万物有灵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宗教是怎样发生的呢？它是反映了原始社会人类生产发展的状况。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一书里说：“在全盛时代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是以极未发达的生产状态，从而在广大地域上仅有稀薄的人口散布着为前提，人类差不多是由与他们无缘的，为他们所不了解的自然所支配，他的简单的宗教观念，就是显然反映这个的。”所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了解，宗教神话的出现，象一切其他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一样，是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这样的阶段上，人类只能以那种对于世界的解释，恐惧和想望来反映自己的某些生活内容，象劳动创造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更高发展的情形之下才能为人类所认识。所以，把宗教神话的出现仅仅看做是剥削阶级为掩蔽真理而“故意”造出来的现象，这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

由上可见，宗教神话首先是出现于人类处在物质生产极低级的阶段。这在人类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乃是不可避免的。在阶级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就大规模地利用了宗教神话，使它有着适合于自己阶级统治需要的内容，把宗教变成为统治人民的精神上的武器，成为麻醉人民的精神上的鸦片。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和蓝莎的简单说法相反，某种宗教在一定时候，又曾经表现为被压迫人民的叹息和梦想，他们反抗旧的统治阶级，采取了宗教的反抗形式。欧洲的原始基督教和印度最初的佛教，是奴隶劳动者反对压迫的宗教，中国的一部分道教，和迷信神话，在历代农民暴动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曾采用了原始基督教，作为反抗满清政府，反抗旧封建制度的旗帜。这些情

形，自然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劳动群众的经济文化都处于低度发展水平时才会产生。在今天的革命群众中，如果也有人想用宗教神话的形式来作动员组织工作，那就是荒谬绝伦的反动的行为了。

蓝莎的文章中对于阶级的剥削制度的看法，也缺少历史主义的以至于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把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样事实的话简单的称做“反动的邪说”，“有毒的思想”，而没有认识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定阶段上，劳心和劳力的分裂和对立也是必然的现象。他说：“我们学了劳动创造人，这些有毒思想，就是被扫清了。也就是再不相信，劳动只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责任，（按：这些句子中的文法混乱反映作者的思想混乱。）而会了解，人类在最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劳动的，只有在阶级社会发生以后，才出现了不劳动而享乐的剥削者。因此，劳动人民应该起来用革命的办法去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制度。”照蓝莎这样说来，似乎人类社会之所以发生阶级剥削，只是由于人类思想上犯了错误，“相信”了一种荒谬的邪说，以为劳动只是属于劳动者的责任，而剥削者则有权脱离这个责任。所以，只要一天早上，学了劳动创造人，打破了这荒谬的邪说，就懂得剥削者也“应该”分有劳动的责任，就可以动员劳动人民起来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制度，而不必问社会物质生活与政治条件的发展情况。

学习了劳动创造人的思想，使我们懂得，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首先是劳动者、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生产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劳动群众的活动，是任何历史时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由此加强我们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这对于我们的革命工作指导是很重要

的,同时对于唤起劳动人民的觉醒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劳动者、生产者之被剥削,在任何历史时代都完全是偶然的荒谬现象,是仅仅由于劳动人民受了错误思想蒙蔽的结果。各种剥削阶级都把自己的剥削看做永久不变的制度,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看做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就是革了这类剥削阶级教条的命。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一定剥削制度的出现,劳心和劳力的分裂和对立,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一定条件之下,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乃是必然的,合规律的,并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关于奴隶剥削制度,斯大林这样说道:“奴隶制度,就现在条件看来,是很荒谬的现象,反乎自然的蠢事情。而奴隶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条件下,却是完全可以了解并且合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和原始公社比较起来,是一个进步。”这样的看法,斯大林称之为“历史观点”,并且说:“如果没有这些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那么,历史科学也就没有可能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科学不致变成一笔偶然现象的糊涂帐,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由此可知,阶级剥削的产生和它的消灭,都依赖着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历史上存在过各种的剥削制度,奴隶占有制度比原始公社的制度前进一步,封建的剥削制度比奴隶剥削制度又前进一步,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又比封建的剥削制度更前进一步,而到了这最后一种剥削制度的出现,才造成了消灭人类剥削的社会条件。对于剥削制度的抽象的笼统的说法,而没有历史的分析,无疑是很错误的。每一个具体的剥削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消灭,而并不是剥削制度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被消灭。当一种剥

削制度在社会生产发展中还起着一定进步作用的时候，它就不是“应该”被消灭而恰恰是“应该”存在和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在今天中国的生产发展过程中还具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就没有提出立刻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任务，而只提出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的任务。历史给予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最后消灭一切阶级。但这个任务之所以能够被提出来，并不仅仅是由于在思想上觉悟到剥削制度的不合理，觉悟到阶级之“应该”完全被消灭，而主要的是由于今天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正发展着消灭一切阶级的条件，同时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也有可能用自己的努力来促进和创设这些条件。思想上的觉悟，其本身也不外是这些物质条件与政治斗争的发展的反映。所以，我们学习劳动创造人，学习社会发展史，其目的并不是为要笼统地“骂倒”一切剥削制度，“骂倒”一切旧思想，一概称之为不合理的、骗人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认识劳动者、生产者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活动的规律，要了解劳动者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条件之下由原始公社不受剥削的生产者变为被剥削者，了解劳动群众在各种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发展起来的生产条件如何使一种剥削制度必然为另一种剥削制度所代替，而最后终于创造和发展了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的高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由此我们也才能了解：今天中国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应该创设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才可能达到获得自己最后解放的这一个最高目的，并且用这种科学的认识来指导我们的斗争，使我们正确地有步骤地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的社会。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从头学起

——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

马列主义的学习，在各地，特别是在新解放了的大城市，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运动。各种暑期学习会及短期政治学校里，各大中学、各机关、部队、工厂里，到处掀起了学习理论的热潮。这样一个学习运动的蓬勃开展，不仅是由于领导方面的鼓励推动，也是由于广大干部、工人、学生、教职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群众自觉到学习理论的迫切需要。这种自觉是符合着中国当前情况的要求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中共中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指导下，就要达到全国范围的完全胜利了。但在全国人民面前，还有更多的复杂艰难的任务要我们完成，“譬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要完成这些任务，不但需要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而且需要广大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觉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愈更普遍地成为群众的思想武器，我们的革命事业的完成就会愈更顺利。

应该承认，过去我们一般的干部和群众的马列主义知识水平是很低的。一方面，广大地区和主要城市是处在国民党黑暗反动统治之下，学习马列主义就是死罪，解放之后，马列主义思想对于

人民群众还是陌生的，许多人甚至对此毫无所知。而旧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反动派的宣传却还保留着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解放区是长期处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马列主义的学习受着相当大的客观上的限制，许多干部虽然在斗争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因为并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理论，就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发展是那样迅速，而我们的理论知识是如此缺乏。很多人对于国际国内的现状不很了解，甚至于保留着错误的或反动的看法。对于中国革命的各种纲领政策不善于领会，甚至在各种问题上抱怀疑的态度，对于个人的生活、前途方面也往往有许多问题想不通。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目前我们一般的学习运动还应该是一个从头学起的时期。

目前许多地方的学习运动所采取的步骤，正是符合于这种情况的。例如一般都是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作为第一步学习的主要内容。在短短的一个月到三个月里，集中力量对这一门课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不求读太多的书本，不一定要听很多的讲授报告，不急于马上获得马列主义的理论、政策的一切方面的知识，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学习，较有系统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一、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二、阶级斗争的思想；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掌握了这些基本的观点，许多不了解和想不通的问题就往往能够迎刃而解。由此前进一步，不论是参加工作，或继续更深入的学习，都有很大的便利。经验证明，这种集中力量，少而求精的学习步骤，对于从头学起的人是有很大效果的。而那种排列许多复杂课程，每天接连不断地听讲授报告，把讨论、消化的时间挤得几乎没有了的学习步骤，则是效果非常微小的。

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步骤是适当的呢？

因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着要掌握马列主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我们解决各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钥匙，不是为着简单的在我们的头脑里装满各种知识。读书很多，听讲授很多，不见得就能真正学会马列主义。毛主席说得好：“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说明一个二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整顿党的作风》）有一种错误的教育思想，把学习马列主义的主要目的放在满足学员的求知欲上面，这种思想正适合着某些学员们好高骛远、不重实际的坏习惯，于是就不承认有从头学起的必要，看不起初步的读物，以读大堆的书籍和停止在字面上的了解为荣耀，不能领会每一本书（那怕是最初步的书）的立场、观点、方法，当然更不知道应用这些立场、观点、方法去说明、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就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是必须要反对的。有了这种教条主义学习态度的人，那怕他真的已经读过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他仍然需要跟那些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一样地从头学起，好好的把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再读一遍，认真弄清楚什么是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的思想以及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再来领会他所读过的其他书籍，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益处。当然，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并不等于反对认真读书。如果有人保留着经验主义的坏习惯，自己懒于认真读书，懒于研究讨论，想专门依靠听很多的报告讲授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不正确的。

再重复一遍：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学习态度。为读书而读书，为简单“满足求知欲”，或为夸耀知识而学习，不联系实际，不解决问题，这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为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

点、方法来读书，着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这是真正马列主义的学习态度。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坚持真正马列主义的学习态度。

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最基本的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方法。在读书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了这个方法。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或其他知识分子们读书的时候是如此，就是做过一些实际工作的干部，也是如此。长期埋头在实际工作中，经验一大堆，不能总结提高，一旦拿起书本来，又陷在书本知识的坑里，忘记了联系自己的经验。“做梦也没有想到学习社会发展史还要联系实际和联系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有些干部在听了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方法的报告后所作的自我反省。

如何联系实际？也就是说，如何在学习当中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说明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这是需要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去深刻体会的。好比要精通游泳的方法，必须不断的在水中游泳，要熟悉学习方法，也要在学习过程中去锻炼。但是，在初学游泳时，首先了解一些初步的游泳方法，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从头学起的时候，掌握一些初步的联系实际的方法，也是做得到而且有好处的。

学习联系实际，第一步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就是应用所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来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在学习理论的时候，应该不断地对自己的思想、工作加以反省，并把自己的思想，拿来和自己所学到的理论加以比较，这样就会发现，自己的各种思想与马列主义常常是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发现矛盾，就是发现问题，我们的思想既然与马列主义的理论有了矛盾，这就说明我们的思想里有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学习当

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把我们的思想搞通了，使之与马列主义的理论一致，那就算是掌握了联系实际的初步方法。举例来说，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知道了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知道历史首先是劳动者的历史，而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因此在做工作的时候就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这个思想作为基础，来反省一下自己的原来的思想，一定容易发见，自己的思想与这马列主义的思想是如何矛盾：原来自己所有的，是“英雄造时势”的思想，把历史看做帝王将相的历史，而不懂得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就不重视，个人英雄、自以为是、命令主义，成为自己主要工作方式，不懂得做工作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样，就发现了我们思想上应解决的问题。又例如，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知道了阶级斗争的思想，知道阶级社会里任何人都一定的阶级立场上与其他的阶级进行斗争。知道在工作中决定政策必须作阶级分析。把这思想和自己原来的思想比较一下，一定又会发现很多矛盾，原来自己的思想，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斗争观念，或者以为某些人还可以有超阶级的立场，或者相信在中国社会根本说不上阶级对立，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或者在工作中不懂得如何划分阶级，不懂得对不同的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工作中的许多偏差和错误就由此产生。这样，由于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经过一些自己反省，就会发现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着许多矛盾，也就是发现了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就必须发现和解决这一类的思想问题。

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反对自己原有的非马列主义的观点，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这就是学习马列主义联系实际的初步方

法。这也就是说，学习马列主义的第一步是要改造思想。学习马列主义的人，如果以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什么问题，不肯定思想改造的必要，不准备好好来克服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相矛盾的自己一切旧的思想，建立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相一致的思想，这样的人，即使读上一万本马列主义的书籍，每本读上一千遍，也不可能真正入马列主义之门。真正的马列主义是要求言行一致，要求把学习贯彻到行动中，一个人，旧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变，思想不改造，就不可能把马列主义的思想变为行动，也即是变为自己真正的思想。这样的人嘴里可以讲劳动创造世界，并且也可以讲得很漂亮，实际上却会鄙视劳动，脱离群众，眼睛向上，自称为创造时势的英雄。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永远不会有马列主义的真正思想。

改造思想，必须经过思想斗争。每一个愿意认真学习的人，要走进马列主义的门的时候，都必须准备一番新旧思想的激烈战斗。世界上一切旧的事物都不会自动死亡，而都是在新事物的斗争打击之下才倒下去的。要克服旧的思想，也决不能在风平浪静的状态之下来达到目的。一个在劳动群众面前摆惯架子的旧知识分子，现在要他来和工人农民做朋友，是一定要有一个不愉快的时期的。如果没有周围人们的批评和推动，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番自我思想斗争，就很难完成这样一个转变。所以，学习马列主义，是要当做一件思想上的革命工作，当做一个思想上的战斗任务来做。要完成这革命的工作和战斗的任务，必须善于使用一个最主要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凡是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和个人，学习一定能够迅速前进，一定有好的成绩，否则学习一

定是表面的,在实际上是停顿的,一定没有好的成绩。经验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学习前进的动力。

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是不断的增长,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前进,也要向全国范围扩大,虽然现在还是要从头学起,但我们相信在一个高潮的推动之下,马列主义的知识水平,在中国人民中间必然要迅速的大大的提高一步。而重要的一环是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

(一九四九年九月,《学习》杂志
第一卷第一期)

再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 若干非历史观点

《北平解放报》发表了《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之后，不久就接到报馆转来叶逸民写的一篇替蓝莎打抱不平的、完全拥护非历史观点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出现，证明在目前学习社会发展史的过程中，像蓝莎那样的谬误思想的确不是一个个别问题，而我们对这种思想加以批评，是切合实际需要的。

根据叶逸民的文章看来，有些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批评。

首先要谈一下学习的“主题”的问题。学习“从猿到人”，主要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要获得一些生物进化的知识，而是要了解“劳动怎样创造了人”，是要树立“劳动创造世界的劳动观点”，及揭穿一切过去轻视劳动与轻视工农的剥削阶级观点。也就是说，要“打破旧观点，建立新的劳动观点”。这样规定我们学习的“主题”，自然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问题是在于，如何来建立“新的劳动观点”，如何解答这个主题？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着两种正相反对的方法：一种是把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作为基础，来建立的劳动观点，来解答这个主题；另一种是不去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而以笼统抽象的讲述一大堆关于“劳动观点”的名词为满足，以简单的对一切旧观念骂一声“不合理”为满足。在这个如何解答“主题”的问题上，蓝莎、

叶逸民就与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我们是主张前一种解答方法，蓝莎、叶逸民却采用了后一种解答方法。

叶逸民说：“如果我们不注意到这些客观条件和我们的读者对象，而奢谈学术，或欲引导读者走到比较专门的社会发展史(特别是上古史)的讨论和研究，相反，倒是脱离实际的。”要建立劳动观点，为什么就一定不能谈“学术”呢？学术也有两种：如果那是指的一般资产阶级大学校里的书本教条，我们自然要坚决反对，因为这种“学术”决不能帮助我们建立“劳动观点”，而相反的只会引导我们远离“劳动观点”，并巩固“剥削观点”。但是，如果那是指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那就是另外一种“学术”，那就是我们一定要谈的“学术”。因为这种“学术”正是“建立新的劳动观点”的基础，不认真谈一谈这种“学术”，我们就无从真正了解，为什么一定是“劳动创造世界”，而一定不是上帝鬼神、帝王将相、剥削阶级等等创造世界，不认真谈一谈这种学术，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总是保持着统治者的地位，只有到了今天，劳动人民才有可能推翻这种统治，并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者，以便进一步去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不认真谈一谈这种学术，所谓“打破旧的观点，建立新的劳动观点”，就只是一些空话而已！

旧的观点，是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长期影响的结果，它有它特殊的关于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歪曲的看法作基础，和反马列主义的、为剥削者的利益辩护的“学术”作基础。要“打破旧的观点”，必须掌握马列主义的“学术”，有系统地来推翻这种旧的“学术”，单凭讲一些口号和名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目前许多人的头脑里之所以充满着各种剥削思想和糊涂思想，就是由于对马列主义的“学术”讲求得太少或完全没有讲求，不能回答旧的观点所提出来的各

种问题。如果不是英雄创造时势,为什么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能够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呢?像这样一个起码的问题,就必须多少讲一些“学术”,了解一些马列主义的历史观点,才能够给以有力的回答。因此,我们现在就必须欢迎多谈马列主义的“学术”,决不能相反地把它当做“奢谈”而加以拒绝。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从猿到人”,并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而只是为要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学术”水平——或理论知识水平,使我们有能力来回答由旧的观点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

不错,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切合实际”,或更正确的说,必须联系实际。但是,所谓联系实际,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要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这就首先要领会了理论,然后才可以谈到联系,说学习从猿到人的目的是要打破许多人的旧的剥削观点,建立新的劳动观点,这仅仅是提出了当前的一个实际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掌握马列主义关于劳动群众如何创造历史的理论知识,必须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为着解决当前的这种实际问题而来努力掌握理论知识,这叫做“脱离实际”吗?如果这也叫做“脱离实际”,如叶逸民所说的那样,那么,岂不是说,仅仅满足于提出问题,而不去掌握理论来解决问题,这就算是“切合实际”了?这样一种对待理论和对待实际的轻率态度,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要知道,要解决实际问题,必须认真与这问题有关的各种规律,也就是必须掌握理论,才有可能对问题作深入的了解,并给以解决。当然,叶逸民会替自己辩护说:“我并不反对学习理论,我只是反对在讨论从猿到人的时候,涉及整个社会发展史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就叫做“要求太高,范围过大,要解决的问题过多”。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们“要求太高,

范围太大,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呢?这就要看我们学习的目的如何。如果我们学习的目的仅仅是在于求得一些“猿如何变人”的生物进化知识,那自然就不需要也不应该涉及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倘若我们不以此为满足,而要由此“打破旧的观点,建立新的劳动观点”,那么,如果你一点也不允许人在讨论中接触到整个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那就等于你要求人走进屋子里去,却又紧紧的关闭着门一样的荒唐。叶逸民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十分荒唐的主张的人。他和蓝莎同样,承认学习的目的,“重要的不是学习生物进化史,而是要学习劳动观点,了解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类财富和文化,结合着自己的思想,批判自己轻视劳动的剥削意识的观点,结合着今天的现实需要,去高度发扬劳动热情,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他承认了学习的要求是这样高,范围是这样大,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多,但却不允许人超出“猿怎样变为人”的知识范围之外去找理论的武器!如果有人不服从他的这一条禁令,多少超出了一点“猿怎样变为人”的范围,他就要给加上一大串的罪名,说:“这是不看问题,不看对象,不看主观客观的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的结果!”

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

当然,在学习“从猿到人”的时候,不可能详细讨论全部社会发展史的规律问题。但是,既然我们所指向的目标,是由“建立劳动观点”一直牵涉到“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为什么就不应该在讨论当中按照必要的程度适当地把马列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历史观点提示出来,以便有可能解决问题,并启发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学习呢?我们认为完全应该这样做。而且也正是这样做过了。《解放报》也并没有反对这样做,《解放报》发表了那篇批评蓝

莎的文章,就是一个明证。叶逸民说这不是《解放报》“所欲”和“所能”做的事,那只是一种主观设想出来的强辩的理由,并不是真的注意到了他自己所谓的“客观条件”。说“读者对象”的“理论水平、时间精力”不允许这样做,也不是事实。读者的理论水平即使很低,时间精力即使很少,还不至于成为那样了不起的一个障碍,使得他们就不可能接受比“猿怎样变为人”更多的理论知识。象叶逸民那样的说法,是未免把我们的读者对象的头脑估计得太低了。

其实,叶逸民虽然十二分体贴入微地替蓝莎辩护,而蓝莎自己却丝毫也没有尊重叶逸民所宣布的那条禁令,在谈到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和反对“上帝、天、神、日月精华创造人的说法”的时候,蓝莎早已跳出了“猿怎样变为人”的圈子,讨论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到宗教的起源和宗教与剥削阶级的关系的问题了。奇怪,为什么叶逸民竟看不出蓝莎也犯了“不看问题,不看对象,不看主观客观的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呢?

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叶逸民的唯一目的,只在于盲目地替蓝莎的非历史观点作辩护,所以就顾不了自己说出来的话在道理上是否讲得通,在逻辑上有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了,例如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宗教神话“不是剥削阶级的捏造。艾思奇这个说法本身是对的。”而转了两三道弯之后,他又居然敢于打自己一个耳光,说:“如此,说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的谎言,也没有什么‘违背历史唯物观点’之处。”在这里,叶逸民的逻辑是:宗教神话固然“不是剥削阶级捏造的”,但世界上却有一个名叫蓝莎的人,他有一种特权,可以随便说宗教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的谎言”,而不能算做错误,不能算做“违背历史唯物观点”!为什么蓝莎竟能取得这样的特权呢?按照叶逸民的奇妙的理由就是:“蓝莎这篇文章不是讨

论宗教神话的出现或起源问题。”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只要一篇文章的主题不在于讨论宗教的出现或起源，那么，即使里面有一些涉及宗教的出现或起源的话是说错了，也仍然不能把它算做错误！

这当然是强词夺理！这种拙劣的辩护，当然掩盖不了蓝莎的过失。不管怎样解释，既然已经说到宗教神话是由剥削阶级故意的捏造产生的，这就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历史观点和唯物观点。宗教神话在阶级社会里常常被剥削阶级大规模地、有系统地利用作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这是事实。但这事实只能证明宗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与剥削阶级的利益相结合，而不能证明宗教本身就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出来的东西。因为除了这一事实之外，还有其他的事实：即使是剥削阶级，当它在历史上起着进步的革命的作用的时候，它就往往不仅不要求利用宗教，而相反地，却成为反宗教的无神论者。例如希腊早期的奴隶主阶级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资产阶级，都曾传播过唯物论的思想，中国古代也有同类性质的唯物论思想。为什么这些剥削阶级又不要捏造宗教迷信了呢？不但如此，同一种宗教在一定条件下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在另外的条件下，又可以成为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形式，如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就采取过道教、佛教（如元末）、原始基督教（如太平天国）等等的形式。如果是剥削阶级捏造了宗教迷信，为什么它要捏造这些来反对自己呢？举出了这些事实，那么蓝莎、叶逸民所拥护的非历史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就立刻垮台了！

叶逸民为蓝莎辩护的理由之一，是说蓝莎的文章“仅是指出在今天尚有人相信上帝、神、天、日月精华创造人这些思想，是错误的。”意思是说，虽然宗教神话并不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出来的，但

在“今天”的特殊情形下，却不必认真坚持这个真理。是的，不仅“今天”人们相信这些思想，是错误的，我们还要说，就是昨天、前天一直到原始社会的人，相信这些思想，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宗教始终是人民的精神上的叹息、梦呓，是“人的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空幻的反映”。但错误尽管错误，人们曾长期相信它，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且不但今天“尚有人相信”，就是明天、后天、以至于相当长时期的将来，还免不了要有人相信，这恰恰因为宗教迷信并不是什么人主观捏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人民生活发展的一定条件的产物，在人民经济生活水平没有发展到必要的高度的时候，要想完全消灭宗教迷信思想，是不可能的。所以，对待宗教迷信问题，和任何其他问题一样，不管是昨天、今天或明天，我们都必须首先有正确的历史观点，根据正确的观点，采取各种适当的正确的宗教政策，在正确政策的施行之下，才能使宗教迷信逐步归于消灭。

要打倒剥削阶级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教条，这是必要的，在前次批评蓝莎的文章中，我们就曾经说明过这一点。我们反对蓝莎、叶逸民，只是由于他们抛开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满足于简单的“骂倒”的方法，以为只要咒几声“这是反动的邪说！”“这是有毒的思想！”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要真正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教条从根本上打倒，还必须多少讲一点“学术”，按照唯物论的历史观点，来证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象，如何会必然被消灭。

劳心与劳力的分裂和对立，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现象。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的确是“合规律的、并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实。剥削阶级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

于人”的教条，就是由于抓着了这种事实，并把它夸大、歪曲，看做绝对不变的东西。所以，要打倒这剥削阶级的教条，真正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指出这种事实的相对性，指出它仅仅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存在，而在另外的条件之下，就必然要归于消灭。让读者知道劳心与劳力的分裂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和合理性的真理，就会有什么危险，就会妨碍他们起来反对那剥削阶级的教条吗？恰恰相反，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头脑清醒地、用正确的社会发展规律知识去回答剥削阶级曲解历史的诡辩。如果剥削者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永久不变的天经地义”，而我们的读者就能有把握地反驳说：“不对，那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过渡的现象。”这样的反驳，不是比简单的讲一些咒骂的形容词更为切实和有力吗？叶逸民在这里又表示了他对于读者的头脑的不信任态度，害怕读者“现有水平”太低，接受不了这些科学真理。这当然是完全不对的。象这一类的初步真理，只要经过相当的虚心学习，即使是一个最普通的读者，其接受的能力至少也不会比蓝莎、叶逸民更差。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时代是过去了。但是，劳心与劳力的分裂现象仍然存在着，而且在相当长时期的将来还需要继续存在下去。虽然是“今天这样伟大革命的历史时代”，还不是要立刻来消灭这一个分裂，这也是必须用历史观点来加以正视和承认的事实，并不是可以笼统一概“骂倒”的！

我们并不反对“骂倒”那些该被“倒骂”的剥削阶级，只反对不看历史条件，笼统地骂倒“一切”剥削阶级。我们可以指出一切剥削制度都不是永久的，将来一定要被消灭，党和国家也一样不是永久的，一样要被消灭（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指出的

一样)。但这决不等于说在今天的中国就要笼统地主张“动员劳动人民起来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制度”，笼统的说：“剥削制度有什么不可以骂倒？”笼统地“指出剥削制度不好”，“指出剥削制度不合理”。正如我们今天必须肯定主张进步的党派和人民的国家是好的、合理的、不能被“骂倒”的，因为它们今天还有存在的必要，同样，我们也要肯定地指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今天好的、合理的、不能被“骂倒”的，因为今天的中国还需要利用它的积极性，还要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它，使之能够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得到相当的发展。当然，重要的是在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必须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在政治上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为主体，而不应当让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但这仍然不等于可以笼统地“骂倒”一切剥削制度，一概简单的称之为“不合理”的，“不好”的。蓝莎因为不懂得这一个历史主义的真理，所以他虽然在自己的文章里很勉强的提到“在今天的中国，就首先要消灭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封建势力对于中国人民的奴役与剥削制度”，但对于为什么今天我们只主张消灭这三个敌人，而不主张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仍然是莫明其妙，说不出半点道理来。不但如此，因为他的主要思想是在于笼统地“指出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剥削阶级应当被消灭”，而一点也没有谈到要用历史观点来具体了解某种剥削制度要在某种条件之下才能被消灭，所以他全篇文章的精神在实际上是和这些勉强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的片段词句完全矛盾的。这正是蓝莎自己来负责。叶逸民“这个读者”虽然装出义愤填胸的样子大叫、大喊，说对于艾思奇的批评“不能心服口服”，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看，“这个问题的讨论”，对叶逸民的“帮助”，并不是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很大”：他没有把自己“过去一些思

想”很好的检讨一下，没有虚心地想一想什么叫做马列主义的历史观点，所以才会糊里糊涂地帮着蓝莎作了这样一场错误百出的强辩！

（一九四九年十月，《学习》杂志
第一卷第二期）

学习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

学习人民政协文件，应该同时研究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大家知道，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这是实现了毛主席著作中关于国家建设的学说，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及《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阐明的国家学说。这一个学说的实现，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这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胜利，也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把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变为建国的纲领，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是经过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艰苦摸索和英勇斗争的结果。在这历史的过程中，不但封建时代的反动的国家学说被人民唾弃了，就是资产阶级的错误的国家学说也在人民眼中暴露了它的无力，然后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才为人民所接受。毛主席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

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毛主席就这样说明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如何在中国人民中间得到胜利的过程。

马列主义国家学说与其他一切错误的国家学说之不同，首先就在于它是依据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明确指出了国家的阶级性质：国家并不是开天辟地以来永久存在，而是在社会上产生了阶级之后，由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运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以及许多反动的国家思想，都要用种种方法隐瞒这一个真理，把国家形容成超于社会阶级之上的，代表全体“国民”的，建立在“神意”、“天命”、“正统”、“法治”、“自由平等的理想”等类神秘的和唯心论的原则之上的权力。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反动阶级都是剥削者，他们要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建立少数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人民前面隐瞒国家的阶级性，有利于少数剥削阶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科学学说，它不需要隐瞒国家的阶级性，“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新民主主义论》）相反的，它需要反覆不断地揭露这种隐瞒，“清楚的指明”国家的阶级性，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觉悟，团结起来，积极努力，推翻少数剥削阶级的压迫人民的国家，建立人民自己统治的国家。

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国家学说指导之下中国人民自己的建国纲领，因此它就“清楚的指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这样中国人民就可以从原则上分别清楚世界上两种根本不同

的国家：一种是旧的，自有阶级和国家以来几千年间存在过的，少数剥削阶级压迫广大人民的国家，其中包括已经从人类历史上消灭了的奴隶主国家和现在还残存着的某些封建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像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另一种是新的，仅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工人阶级的革命胜利之后，才第一次在苏联出现的人民掌握国家政权来压迫少数反动剥削阶级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接着又在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之下，在东欧、北朝鲜现在又在中国、德国出现了这样的国家。作为人民统治的新式国家，中国与苏联、东欧新民主国家、北朝鲜以及新近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兄弟国，而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英美“民主”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动阶级统治的国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种类。这是学习人民政协文件时，必须依据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来加以深刻领会的。

在旧式的国家里，“国民”的主体，“国民”的大多数，即人民，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民主权利的，即使是号称实行“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享受民主权利的，仍只是资产阶级。在新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国民”的主体，“国民”的绝大多数能够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国民”的极少数，即被推翻了的反动剥削阶级，则是没有民主权利的，是被统治、被压迫的。——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正是有着这样清楚的规定。世界上的反动派要是不满意这样的规定，说这是“极权”，说“你们独裁！”那么好！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对这些不满意的胡言乱语已经给了有力的回击：“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两方

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

列宁在《论国家》一文里，说国家的问题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和根本问题”。因此，对于国家的认识是否正确，就成为评判人民有无政治觉悟的主要标准。革命斗争中的人民如果不了解国家的阶级性质，不能完全脱离剥削阶级的国家学说的欺骗影响，因此在旧的国家里就没有为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权而努力斗争的勇气，在新的国家里就没有保卫和加强人民的政权而积极工作的热情，这样的人，就不能算是有真正的政治觉悟。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如果只知道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而不能把斗争的目标指向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工人阶级统治的政权，这就叫做经济主义，这就是不懂得或不深刻懂得自己是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就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不够的表现。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像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如果有工人这样说：“在旧政权下我是成天守着机器，在新政权下我同样是成天守着机器。”并因此而缺少积极工作、发展生产、建设新国家、爱护新国家的热情，这就是分不清楚自己在旧政权下是被压迫者，而在新政权下则不但是国家的主人，并且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这就是在思想上没有脱离错误的国家学说的影响，因此也就缺乏政治上的阶级觉悟的缘故。

在新的国家里，如果有工程师这样说：“在旧政权下我是一样工作，在新政权下也同样工作，有了技术就能为人民服务。”分不清楚在旧政权下只能为剥削阶级服务，而在新政权下才真正能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作为一个人民的工程师还缺少人民应有的政治觉

悟。

在新的国家里，如果有人把“自由”“民主”当做教条，认为不需要对被推翻了的反动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压迫，认为禁止帝国主义者新闻活动，封闭反动派的报馆及出版机关，是缺乏言论自由，这就是不懂得人民必须坚决实行专政，才有可能保卫自己的革命成果和人民自己内部真正的民主自由，这就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国家”的虚伪学说所欺骗，这就是表示政治认识的糊涂。

在新的国家政权机关、法庭、公安机关以及军队里做工作的人，如果工作不积极、不安心，或者想“改行”，想“退伍”，严格些说，这就是政治上的动摇，因为这是要想放松或放弃自己直接担负着的坚持人民国家政权的严重任务。“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论人民民主专政》）对这些工作缺乏积极坚持和努力加强的思想，这也是缺乏使人民做国家主人和由人民来统治、压迫反动剥削阶级的思想，这种情形，是作为国家机器的工作者中间绝对不应该存在的。如果在人民公安机关工作的人以做警察为可耻，那就是政治认识上很大的错误，那就是不认识新的国家机器和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上的区别，忘记了《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十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其任务为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作为人民的武力，人民警察是光荣的，只有旧的国家政权下的警察，作为反人民的武力，才是可耻的。

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如果有人以为可以把苏联和英美国家同等看待，这是严重缺乏人民应有的政治觉悟。这是不认识人民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这样的人应该仔细学习领

会《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北朝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同样都是人民民主和人民统治的兄弟国。中国与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不同，是在于后者已经实行了工人阶级专政，也就是实行了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而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则是实行着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也就是要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只采取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方针。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之所以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国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要实现经济上的真正的独立，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独立。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是很小的。现在还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现代工业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论人民民主专政》）因此，“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序言)这就与工农联盟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国家政权有所不同。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屡次教导的,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要停止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而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苏联昨天所走的路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今天在走的路,也正是明天中国所要到达的路。“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论人民民主专政》)一切新的人民国家共同的而又与一切旧的剥削阶级国家完全不同的特点之一,就是旧的国家是要努力维持阶级剥削和维持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而新的人民国家则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剥削而最后使国家衰亡下去。例如在中国,则是第一步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来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进一步就要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剥削完全消灭了,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很自然地归于消灭”,这样,就达到世界大同。

为着将来消灭一切阶级和消灭国家,现在就要加强人民的国家权力,就要坚持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国家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只有加强工人阶级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国家的权力,才能逐步走向彻底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并予以消灭,现在加强人民的国家权力,就是为将来消灭国家到达世界大同创设条件,这是一切人民国家的共同点。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

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保护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为着将来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下面，就必须对于一切国民，包括各阶级人民，进行各种改造和教育。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反动的剥削阶级是压迫的机关，但在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政权被推翻了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们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也要教育农民，以便引导他们由分散的农业经济走向农业的社会化。在农民的小生产占主要成分的中国，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

如果有人以为新民主主义既要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此就必须简单的让他们按照自己的阶级特点存在和发展下去，而不应该教育和改造；如果以为只要他们承认跟着工人阶级走就行了，不需要任何思想的改造；如果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既算是四个朋友之一，就不必学无产阶级思想，如果有人甚至于说实行思想改

造是等于反对新民主主义，那么，请仔细读一读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的这一段话：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

正是因为实行新民主主义，就必须对于人民进行教育和改造，如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忘记了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教育和改造，它就有离开新民主主义而堕落到旧民主主义的危险。实行思想改造并不等于反对新民主主义的实施，而恰恰只是要反对旧民主主义的抬头。不对各阶级人民进行教育和改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要使自己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并实现世界大同，是不能想像的。

学习人民政协文件，必须同时研究马列主义的科学的国家学说，才能对以上的一切道理获得深刻的理解，因此也才能使自己具有主人翁的充分自觉性，把自己提高成为参加实现新国家的远大任务的积极工作者。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学习》杂志
第一卷第三期）

反 驳 唯 心 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对天津干部的讲演

同志们：

天津市委要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中间提出的问题，我把许多问题研究了一下，觉得可以归结为一点，归结为用唯物论来反驳唯心论的问题。

我准备先从一般的唯物论讲起，再讲到历史唯物论。

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是：物质决定精神；或者说：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思想；或者说：物质是第一位的东西，精神是第二位的東西。关于这个原则，旧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有不同的了解，旧唯物论、形而上学的或机械的唯物论也承认物质决定精神，但对于精神的作用却不能给以正确的答覆。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第一，精神第二，首先是物质决定精神，反过来，精神又对物质发生一定的重要作用。精神对物质，人的思想对客观存在，能起什么作用呢？要说明这一点，先要了解精神是甚么？精神、思想，按辩证唯物论的了解，就是物质的反映，就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有正确的思想，也有错误的思想。正确的思想便是能够比较正确的把客观物质存在的发展情况反映出来的思想，就是符合事实发展规律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就是不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物质存在的发展情况的思想，

就是与事实发展规律不相符合的思想，相反的如果不符合或离开了事实的发展情况，便成为不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对于物质存在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甚至于是相反的：正确的思想对物质存在的发展能够起推动的作用，能够起变革世界的作用。错误的思想就不能推动物质存在的发展，就不能起变革世界的作用。譬如我在这儿讲课，我讲的是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问题。我讲的内容，我的思想，是要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我所讲的思想内容是正确的，是正确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那么我就能正确地回答大家的问题，就会使大家也得到了正确的思想。这样上千的干部都有了正确的思想，就有可能应用这些正确的思想，来正确处理某些工作问题。这样，正确的思想就能够帮助大家，去推动工作向前进步，这就是正确思想对于物质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相反的，如果我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你们听了讲以后，也得不到正确的社会发展规律知识，那么你们用这些不正确的知识去处理工作问题，一定要把工作做坏，不但不能推动工作前进，而且要妨害工作，这就是说，不正确的思想，是不能推动物质的发展，甚至对于事物的发展会起妨害的作用。所以，精神、思想是能对物质起重大作用的。唯物辩证法一点也不轻视这作用，并且很重视这作用，认为正确反映物质发展规律的思想，可以促进物质的发展，使之迅速向前进步，使它发生变革，而旧唯物论就不能正确了解精神的这一些作用。再重复说一遍，精神、思想对于物质能发生很重大的作用，但这作用是有一定条件的：不是任何一种精神、思想都能起积极的作用，只有正确反映客观物质的发展情况和规律的精神、思想，才能起这种积极的作用，否则便只能起消极的、阻碍的、甚至破坏的作用。辩证唯物论

是这样来看精神、思想的作用，按照这种看法，所以我们就很重视学习，就要搞思想改造，使人的精神、思想由不正确走向正确，由错误变为不错误，以便能发挥精神、思想的积极作用。物质是第一位的，精神是第二位的，物质决定精神，或者说，首先是精神要符合物质发展的情况和要求，然后，这样的精神才能反过来又推动物质的发展。革命要靠革命思想的正确领导，而革命思想又是从实际的革命运动中总结出来的，是反映社会革命发展规律的，如果思想不能正确反映革命运动发展的规律，就根本不会起指导革命的作用；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想彼此间的关系好象是循环的，但是有一个最后决定者，就是物质。有些人以为讲唯物论的人只知道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承认精神对于物质的作用，这样的误解，是由于没有真正懂得辩证法唯物论的缘故。辩证法唯物论和这种误解相反，它承认物质对于精神的重要作用，而且十分重视这种作用。问题是在于，辩证法唯物论认为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起积极的推动客观物质世界发展的作用，而正确的思想首先必须是物质和客观存在的正确反映。按照这个道理来解释，很多想不通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例如，有人用唯心论观点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说工程师比工人重要，如果工程师不设计，工人怎么能工作呢？”工程师不好好设计，工人的工作自然做不好，工程师的思想是重要的。劳动者的物质劳动要受工程师设计的指导，这一点辩证唯物论并不否认。但是我们要问：工程师要怎样才能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呢？首先要工程师的计划是正确地根据具体的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来决定的。工程师想造房子，先得把造房子的许多物质条件搞清楚，例如他要正确估计地基的支持力量，如果想在沙滩上来设计盖大楼，那就一定

会垮台。又例如他还要了解工人的情况，技术熟练不熟练等，根据这些工人的物质情况来设计造房子，所以在工程师的计划中起最后决定作用的仍是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他的计划一定要服从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否则便是空想，而空想是一定要垮台的。和这个问题类似，又有人说：“创作要靠灵感，没有灵感便不行。”不错，创作是要文学家有某种想要创作的兴趣，才写得出来，肚子里没有东西，便甚么也写不出来。但问题在“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笑声）一个文学家是在社会上生活了很久，体会了很多东西，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锻炼和了解，看这个看那个，看了不少的社会物质生活情况，集中在他的脑子里，然后在某一个时期，发生了创作的兴趣，才组织成为文章。所以创作也是客观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而不是什么空洞的“灵感”产生的。又有人说：“科学家的发明是靠思想上的钻研。”不错，爱迪生发明电灯发明留声机都是苦思了好几个晚上没睡觉的结果，可是如果没有物质，能不能钻研？到那儿钻、往那儿研呢？如果世界上没有声波震动的现象，爱迪生能不能发明留声机？科学家所钻研的首先是物质，自然界的物质经过科学家的钻研，反映为正确的科学思想，然后才能制作发明计划，把自然改变成人工的器物。医生治病治的好不好，要看他对病人身体的物质情况了解得对不对，医生的思想如果正确反映了病人身体的物质情况，医生治病便治得好，否则，他的思想不能正确反映病人身体物质情况的话，就要造成庸医杀人的罪恶。不首先使思想严格服从物质，便不能对物质起积极的作用，便要碰到物质的钉子。思想只有首先服从物质，才能反过来积极地作用于物质。承认正确反映物质的正确思想的积极作用，这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在旧的大学里受过唯心

论教育的人，总以为任何思想都可以对物质起决定作用，这是错误的。不能正确反映物质条件的思想，不但不能对物质起积极的作用，相反的，它的本身一定经不起物质的考验，而终于要遭到破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首先要把这点原则了解清楚。这原则可以应用于其他任何社会现象上。例如有人提出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究竟谁重要的问题，学生出身的人，总以为知识分子更重要。究竟哪一个重要呢？这也要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来解决，我们并不否认知识分子的重要，但知识分子要在今天成为重要的社会成份，只有当他把自己的知识加以改造，使之能够反映社会物质发展的需要、使之适合于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时候，才是重要的，因此他的重要不重要，最后仍决定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劳动人民的存在条件。与这相关联的，还有一个理论的重要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承认理论是很重要的。“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所以能起翻天覆地的作用，并不因为这种理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因为这种理论是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正确反映。又有人问：“劳动创造人，还是思想创造人？”许多人总以为人是思想创造的。理由是：“类人猿运用自己的思想制造了工具，然后才有了人。”不错，制造工具是要用思想的，但问题是：制造工具的思想又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牛和马就没有这种思想？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能回答这个问题：牛和马没有具备使用工具的物质条件，更制造不了工具。树上的猴子，两只手用来爬树，没有机会经常使用工具，所以也就没有学会制造工具的条件；只有从树林生活脱离了的类人猿，长期经常使用自然物，手一天天的灵活了，脑子也一天天的发达了，在这种条件之下才会有一天发生制造工具的

思想。制造工具的思想也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劳动经验积累得来的。为什么类人猿竟有一天能制成一把石刀呢？第一：猿猴在没有学会制石刀以前，已经在自己的长期历史中积累了很多的关于石头有可能变成刀的零碎分散的劳动经验，譬如随便抛一块石头打野兽，石头裂成许多碎片，发见有些破片很锋利，可以拿来做刀用。这种经验反覆千百次，并且手和脑经过长期锻炼相当发展了，最后类人猿才会想起有意识的把石头打破，制成最初的粗糙的石刀。我们现在把一块石头磨尖，是很容易的事，但类人猿要学会这本领，却要经过多少万年的劳动锻炼，才能够学会有意识的来做这样一件事。所以，究竟是思想创造人，还是劳动创造人呢？在有意识地打制石刀时，的确是思想的创造，但在学会制刀以前，却要有长期的劳动，要有长期的劳动锻炼和多次劳动经验的积累才能产生一定思想，思想虽是制造工具不可少的一个因素，但思想仍是由劳动所产生，而最后还是劳动创造人。总之，人的思想不论怎样高明，最后一定要受到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的限制，决不能超乎劳动之外，超乎物质之外，凭空的产生出来。中国有一句俗话：“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梅兰芳先生演《宇宙锋》，靠着两只长袖子才舞得美妙好看，如果要他脱了衣服来舞就不好看了（笑声），这自然只是讲中国古装舞，西洋舞自然不一定要长袖子，但另外的物质基础，如健康而匀称的体格，仍然是决定美丑的条件。聪明的商人可以把生意做的很好，但是先要受钱的限制。所以大商人可以吃小商人，大资本家可以吃小资本家，“是商人的聪明决定生意做的好不好，还是商人的钱决定生意做的好不好？”商人的聪明有很大的作用，但起最后决定作用的东西，还是钱。无论多聪明的人，其思想最后总要受一定物质条件的限制。人们所以不说：“只要聪明人

便能善舞，只要聪明人便能做好生意。”就是因为多少知道了一些唯物论的道理。

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劳动创造人类世界。这观点又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创造人；第二，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第三，劳动群众的活动创造历史。关于劳动创造人这一方面，不需要多的解释，总之，人是猿类经过几十万年的长期劳动锻炼后，学会了制造工具，才开始形成的。人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而不是从使用工具开始。别的动物也有会使用现成的工具的，那是动物的求生活动，要学会了制造工具，才开始有人的劳动，能制造工具的类人猿，自然是要比旁的动物聪明一些，但首先一个问题是：这聪明从哪儿来的？在树上时，人的祖先和别的猿类是一样的兽类，为什么离开了树林生活就聪明起来了？这是因为离开树林生活以后，他长期的使用工具，手的动作一天比一天变得灵巧，脑子的组织也逐渐复杂起来，才可能有人的聪明智慧，所以聪明也是劳动创造的。深刻地认识劳动创造人的思想，使我们可能建立起一个正确的重视劳动的人生观，使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最初的人类，就是以劳动者的资格出现的，人的始祖便是劳动者，没有祖先辛辛苦苦的劳动，便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知识分子坐在这儿听课，也许大家还都在树上呢！（笑声）基督教的《圣经》上说人的祖先是亚当、夏娃，他们是不劳动的，整天在乐园里闲游闲吃，最多也不过做些看守果树的工作。后来劳动了，是因为犯了罪。因为他们偷吃了上帝禁止吃的果子，上帝才罚他们到地下来劳动，并且临放逐他们的时候还诅咒他们说：“从此以后你要从早到晚，满面流汗，才能把东西吃到嘴里。”按照宗教的观点，劳动是对罪人的处罚，是前世作孽的报应，无罪的人，是应该不劳动的，是应该到那不劳动的天国

里去过寄生生活的。这些迷信命运的宗教观点，我们是不相信了。中国又有句老话：“人之本性，好逸恶劳。”这句话我们也要反对。好逸恶劳是一种社会性，而不是什么“天性”。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认为不劳动的人是光荣的，如果有人脸上黑了一点，手上粗糙一点，带点劳动的象征，剥削阶级便认为不漂亮，不光荣。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几千年来如此，使许多人养成了一种不好劳动的习惯，人们便以为那是“天性”。人是社会的动物，阶级社会里，人的性质是由阶级决定的，社会关系的特点，决定人的特点，不同的阶级地位规定着人的不同的阶级的本性。旧社会受剥削阶级影响的人好逸恶劳，但革命工作者却相反，正是好劳恶逸的，每天总要做一定的工作，不然便会感觉不舒服，甚至觉得是耻辱。革命工作者就有着好劳恶逸的性质，新社会的劳动英雄也是如此。将来世界发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劳动更要成为一个人每天生活所必需，那时好逸恶劳的所谓“本性”，就要完全消灭了。这样，我们学习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观点，首先就是要在思想上深刻认识劳动的光荣，要建立坚强的重视劳动人民和重视劳动的人生观。

现在再就第二方面来谈谈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思想：人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劳动创造的，精神文化也是劳动创造的，或者说归根结蒂是劳动创造的。有人认为文化好像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例如他们说：“社会发展史就是知识分子写的。”不错，现在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社会发展史这本书就写不出来，这是事实。但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一、知识分子是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他们要靠劳动者生活，被劳动者所养活，没有劳动者来养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便不可能存在。二、知识的内容从哪儿来的呢？社会发展史是知识分子写的，可是历史本身是谁写的呢？首先是劳动

者用自己的血汗写的。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中，我们懂得决定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是生产，而其中最活泼的力量首先是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才有整个社会的发展，才能由原始公社制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甚么是生产力呢？生产力是劳动者从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工具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者。而劳动者则是使死的工具成为活的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工具的进步或落后，使用工具的劳动者的劳动机能和生产经验，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劳动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在现阶段只能到达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因为旧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当低，百分之九十的生产是使用简单手工工具的小生产，机器生产太少了，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把农业的中国变为工业的中国，必须使大量的小生产劳动者转变为机器工业的大生产者。从原始公社制社会变到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的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这是“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思想的基础，也就是我们为甚么要说劳动者用自己的血汗写了真实历史的根据。知识分子写的社会发展史，不过是把劳动者用血汗写的真实历史翻译成文字的历史罢了。了解了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这一个基本思想，就同时可以更深刻的了解许多实际问题，例如我们的革命政策问题，为什么在我们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中，一定要推翻某些阶级，如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家？为什么有些阶级，如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不要推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要发展劳动人民的生产力。要建立一个新中国，需要发展中国劳动人民的生产力，为着这个目的，就要

打倒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势力，这是决定革命政策的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凡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势力，就应该被打倒，凡是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一定积极作用的阶级，便可以保留。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中国没法发展工业农业生产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同样起着阻碍的作用，因此就一定要把他们推翻。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优点，从最根本的地方来说，就在于能够解放劳动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自由发展。有些人说：“地主的生活，有些还不如资本家，为什么要没收他们的土地？为什么不没收民族资本家的财产？”是的，资本家有的比某些地主富有，为什么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呢？不了解这个问题，就是由于不懂得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意义。我们让民族资本家开工厂，做生意，就是因为它在一定条件下（在不危害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还可以起相当的推动作用。地主阶级虽然有些生活较资产阶级低，但因为它的土地所有权完全阻碍着农民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的革命就要对它采取消灭的方针。消灭地主阶级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阻碍。

再就第三方面来说：我们要承认劳动群众创造历史。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个观点最难领会，因为旧社会长期用来教育知识分子的，是各种英雄创造时势的思想，这种思想妨碍着我们去了解社会科学的真理。英雄伟大在历史上是能起作用的，但这个作用有一定的限制。英雄伟人能够做出一点促进历史进步的事业，必须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才行：即他们的行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多多少少符合着劳动群众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在行动上违背了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发展需要因而遭到千万群众坚决反

对的人，那怕他已经处于帝王将相的地位，掌握了压倒一切的权势，他终于要成为一个失败者。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证明这一个真理。中国历史上各个皇帝朝代的垮台，都是由于首先受了农民暴动严重的打击，这是历史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事实。英雄造时势这句话是夸大的，英雄只有通过劳动群众才能创造时势，实际上直接创造时势的首先是千万劳动群众，历史上英雄伟人的进步作用不过是由于他们多少注意到了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把它作为规定行动方针的基础，并由此动员和组织起劳动群众的力量，来创造时势。中国共产党在现在能成为人民的领袖，在今天历史上起这么伟大的作用，首先便因为它正确认识了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决定了正确的政策方针，把工人农民的力量及其他各进步阶级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才能指导革命得到胜利。要问究竟谁创造历史？我们说首先还是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发展需要决定了如何创造历史，其次才是了解这种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英雄伟人的思想指导劳动群众去创造历史，英雄伟人对于历史是起推动作用的，但是首先要看他的思想行动是不是正确反映了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发展需要。我们学习了劳动创造人类世界，学习了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这一个观点，就可以知道今天的知识分子要想做点象样的事业，要想不至于成为一个历史上的落伍者、失败者，就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行动跟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发展需要一致，就要跟劳动群众结合，和群众站在一起，自己变为劳动群众的一部分。共产党里面很多人出身是知识分子，有的甚至是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可是他们扔开了本阶级的立场，把自己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使之变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这样才能在劳动群众中间起重大的作用，

有人只看表面现象，说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有些是知识分子，因此就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说是工人阶级领导革命。这就是因为不懂得，在共产党内领导革命而出身知识分子的人，在实际上已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知识分子要学会掌握指导革命的思想，他首先就要使自己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而决不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思考一切问题。马列主义的思想就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的理论就是工人阶级的思想，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使自己的思想成为马列主义的，也就是使自己的思想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革命，就是说明工人阶级在领导革命。唯心论者把知识分子的作用抽象化和绝对化了，以为知识分子的知识能决定一切。而事实是：知识分子的知识的作用如何，最后要由它所反映的内容如何来决定。能够正确反映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思想，才能起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否则就一点也不起作用。知识分子如果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可以任意自封为领袖，以为工人农民会随随便便盲目地跟着自己走，那便完全想错了。特别到了今天这个社会里，劳动人民都广泛觉悟起来了，有些知识分子拖在后面还怕跟不上，更不用说要任意把劳动群众带着走。中国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之所以有资格领导革命，是因为工人阶级有最彻底的革命性，他们要求的是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除了工人阶级之外，没有那一个阶级能有这样彻底的要求，普通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小私有者，对自己的小小财产和小小家庭生活总是很重视的，可是，觉悟的工人阶级是没有这种限制的。从前，在没有解放北京、天津以前，人民政权所掌握的城市很少，有一个时期，甚至于已经夺取了的城市也没有绝对把握能够长久守住，因

此就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加以放弃。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问一个工人说：“我们要把工厂搬到山上去行不行？”工人说：“有什么不行，工人只有两只手，到那儿去都是干活，有什么怕的？”又问一个学生：“我们要把学校搬到山上去，你愿意跟去吗？”学生就说：“等我考虑考虑。”（笑声）问资产阶级更不行了。干革命应该跟着谁走呢？自然应该跟着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没有顾虑而又目标远大的人走。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它在革命行动上是一个最彻底的阶级，共产党是站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上来领导革命的，毛主席的思想领导，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如果有人要说：“毛主席的领导我佩服，可是工人阶级来领导我就不佩服。”那是不懂得什么叫做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懂得毛主席的领导和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懂得工人阶级是通过共产党来发挥它的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要成为彻底的革命者，便得决心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方面。如果坚持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便不可能成为彻底的革命者。知识分子有许多思想不对，便是因为那些思想是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影响的，甚至于也有受帝国主义影响的。有了不对的思想，就要好好地改造一下，把思想由剥削阶级的方向转变到工人阶级的方向。

现在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要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工人阶级，无论学那一门学问或做那一部门工作的人都应该如此。有些学理工科的人，有一种单纯的技术观点，说：“有了技术，那儿都可以吃饭，那儿都可以工作。”这话只有一点儿对，可是基本上不对。只靠技术，总可以吃上饭，总可以多多少少做一点工作，这自然有一点道理。但是，如果说把工作做好，那么，只有技术，没有进步的政治思想，那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人如果思想上还保存着剥削阶

级意识,在工作中要考虑很多私人利益的问题,而对于工农劳动群众,在思想情感上又常常是对立的,那就不可能集中全力来努力钻研业务,就不可能认真考虑如何使自己的业务正确地充分地发挥它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因此,就不可能有高度工作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这也仍然是说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如何,并不是决定于知识本身,而是决定于他自己对劳动群众所抱的态度如何。

我们所要解答的问题就讲到这里为止。(鼓掌)

(原载一九五〇年二月《学习》杂志第一卷第六期,后经作者略加修改)

前 进 一 步

一年以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新的国家领导下，开始进行了有史以来空前广大的改造和建设事业，全中国人民生活的各方面，都展开了新的面貌，不但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起了全国范围的根本改变，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面，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工作。人民思想上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工作，一年来所采取的主要的形式，除了中国共产党在其三中全会以来所发起和领导的、全国党员和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整风运动以外，就是各地政治训练班、各大中学校以及各机关干部的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运动，就是各党派各团体的学习座谈会以及其他自发兴起的各种学习研究的组织。这些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作，是不是必要的呢？应该肯定地、毫不怀疑地答复说，这是完全必要的。要完成建设新国家的伟大任务，没有新的思想意识武装了头脑的新人民是不行的。新的人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从旧社会旧中国里生长出来，因此不可免地要在身上带着或多或少的旧社会旧国家的坏影响，即使是一些相当长期地参加过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也不能例外。如果不经常注意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不能脱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思想坏习惯以至于反动派所给与的恶劣影响，就不可能充分明确地自觉到自己作为新国家主人的地位，就不可能发挥高度的积极精神来爱护自己的国

家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以，如果有人对于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抱着怀疑态度，甚或骄傲自满，对于学习和整风采取抗拒的态度，那他们的认识就是不正确的，就是不符合新国家的发展需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当然，另一方面，如果不认识以下的事实，也是一种错误：就是说，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人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对敌人的事情，因此，必须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进行，必须经过思想上的启发和自觉，经过自己的个人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而不是采取粗暴的、急躁的带强迫性的方法来进行。

人民的自我教育和改造，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一年来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过程，同时随伴着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高涨的过程。我们现在需要估计一下，到现在为止，就一般的情况来看，理论学习究竟有了多少成绩，要怎样才能前进一步，使我们学习得更好？

就一般的情形来说，我们的理论学习现在是走出了最初的一步，但是，也仅仅是走了最初的一步，以后还需要走更远的路，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许多解放较早的地区，大致都学完了或差不多学完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新民主主义论的课程，经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所得到的成绩是：在学习者的头脑中，多少有系统的树立起了一些新的观点，初步认识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批判了一些旧的观点以及与旧观点相联系的某些糊涂思想；在新解放地区的人民中间以及新参加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对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思想开始有了许多了解，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统治者以往政治上的反动宣传的影响。在参加过若干年革命工作的、有些斗争经验的干

部中间,经过理论学习,对于中国革命的各种政策获得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有些人也开始能够对于自己的经验加以反省和检讨,能够分辨什么是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以及为什么是正确的和为什么是错误的。

总之,理论学习的初步成绩是:解决了许多人的新旧思想的矛盾,加深了某些人对革命政策的认识,帮助一些干部开始懂得检讨自己的经验。这就是解放较早的、学完或差不多学完了几门课程的地方的成绩。

为什么说这些成绩只是走了第一步,为什么走了这一步以后,还要用更大的努力来走更远的路呢?因为,这些虽然不能不说是学习的成绩,虽然作为初步的成绩,这也是不坏的。但是,仅仅这一些,还不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最主要的目标。

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就是说,必须针对着一定的问题来学习,必须在解决一定实际问题的活动中来学习,而不应脱离一切实际问题,作孤立的静止的“纯理论”的学习。什么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须联系的实际问题?如何去找到这一个实际问题?这是需要依据当时当地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来决定的,我们不能用一个死的公式来规定一切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之下都能通用的问题,也不能任意地胡乱拉扯上各种不相干的问题。一定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之下实际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学习理论必须提出的问题。就新解放地区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要他们把检讨工作经验、或者解决某种具体工作问题作为学习理论中间联系的问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问题在他们中间是根本提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把批评旧思想旧观点,反对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影响等作为他们学习中应联系的问题,那么,

这就是很适当的，因为这些问题是他们中间实际存在的。同样，在有多少工作经验干部中间，要他们在初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时候求得进一步了解各种革命政策，要他们开始来检讨一下过去的经验，这也是很适当的，因为这些问题也是他们中间实际存在的。一年来的理论学习之所以算做有了成绩，就因为它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是初步联系了一些实际和解决了一些问题，这些初步联系实际的经验，是其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地区值得拿来参考和应用的，就是已经学习过相当时期而且有了成绩的地区，今后也还可能常常用得着这些经验。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经验，都只是初步的，是很不够的，如果停止在这一点，就是错误的。

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记熟许多革命的原理原则，并不在于仅仅用一些新的原理原则知识来代替旧的思想观点。学习马列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善于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问题，来解决实际工作中和研究工作中的问题，这就是说，要善于科学地分析周围环境的情况以及各种事物的关系，找出它们中间的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工作。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从各种客观事物中找出来的正确的规律知识，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意义，就是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实际的客观事物中抽出理论，又反过来用理论来指导实际行动。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记熟一些书本上的现成理论，而是要从书本的理论学习中领会立场、观点、方法，以便自己有可能独立地掌握这种与实际事物和实际工作密切而不可分地联系着的理论。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讲到马列主义的学习态度时，这样说：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要使它与

中国革命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从它找到方法的。”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用这样的标准，来检查一下我们一年来的理论学习成绩，那我们要怎样看呢？仅仅学习过马列主义的那些初步理论课程的人，能不能领会了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问题呢？能不能够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规律，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导呢？显然还不能够这样做，还完全没有或差不多完全没有获得这样的能力，显然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来进行学习才行，而在目前，我们还离开这目标相当的远。虽然也应该说，我们已向着这个目标走出了第一步，但如果不继续前进，努力达到目标，那么，这第一步也是白走了的！

在这里要顺便谈一谈整风运动。大家知道，目前的整风运动，主要的目的是要反对一般党员和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坏作风。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上的实质，就是反马列主义的，就是没有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就是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就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研究实际工作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不是从实际工作和群众生活的客观情况中引出它固有的规律来作为行动的向导，而是用完全主观的、粗暴的方法去对待工作、对待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是要使一般党员和干部经过阅读文件和检讨工作，具体分析自己周围的实际工作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正确认识其中的内部联系或规律，以

便用这些规律知识来指导工作。因此，整风的结果，不但是要改造工作，而且是要提高一般党员和干部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水平，使他们有可能领会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我们一般干部理论水平原来是很低的，因此，当整风获得了成绩以后，就必须要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才能够巩固它的成绩，这也是没有疑义的。

* * *

为着更进一步学好马列主义理论，应该从何着手呢？

经过了初步的学习，学完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以后，应该按照干部学习能力以及工作条件，从干部必读十二本书中，再选择几种作为进一步学习的课程，例如《列宁主义基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又例如在从事经济建设工作的干部中，不妨选读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以便更容易联系自己工作的实际。学习能力相当高的干部，应该有计划地坚持地定期把十二本书全部学完，必须结合着毛泽东思想，结合着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问题，结合着新中国的纲领、政策，结合着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来进行学习。这些就是首先要着手的事情。

自然，这并不是说，随随便便读完十二本书，就可以把马列主义理论学好了。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没有正确的学习态度，不要说读十二本，就是再读几个十二本，也是没有用处的。关于这一个问题，有两点值得首先提出来说一下：

第一，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在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的时候，必须注意领会它的精神与实质，也就是领会它用以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便自己也有可能应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在自己的周围事变中找出它的规律，来解决自己工作中

的具体问题。要坚决反对用下面的一种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的理论的学习，就是说希望从马列主义的书籍中为自己的工作找出一些现成的公式，以便自己丝毫也不动用自己的脑筋，就可以解决工作中的一切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用这种糊涂的教条主义的要求来对待马列主义理论呢？不但有，而且相当多。例如我们就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

“十二本书和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十二本书对于我有什么用处呢？”

“十二本书能帮助我完成收税工作吗？”

十二本书和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善于从精神实质上来领会马列主义理论，那是没有这个问题的，那一定是可以找出它的密切的关系，一定会发现很大的用处的。但是，如果用教条主义的要求、用思想上的懒汉的要求来对待马列主义理论，那么，这的确就有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一定只能得到否定的答覆的。发出这种问题的人，有许多是本来就对于理论的学习，对于研究马列主义书籍采取拒绝的态度，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本来就预期着要得到一个否定的答覆，以便给他们的拒绝态度找到辩护的根据。但是，如果他们不是有心要拒绝学习，如果他们也竟来认真的参加理论学习了，那么，那种教条主义的、懒汉的要求也将要把他们引到失望的前途上去！因为在马列主义的书籍里是不可能对任何一个具体工作问题都找得到现成的答案的。

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曾经转述过一个瑞典的革命工团主义者所讲的故事，可以作为一切用懒汉态度来学理论的人们的警戒，我们在这里也不妨引用一下：

“事情是发生在克里姆，在海陆军起义时。海军和步兵的代表去见社会民主党党员们并向他们说：近年来你们是号召我们举行起义反对沙皇制度，我们确信你们的号召是对的。我们海军和陆军士兵已经讲好了起义，现在请你们给我们指示。社会民主党党员们呆了一会回答道：他们非召集专门的会议不能解决起义问题。海军士兵说明：不能再迟延了，事情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得不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直接回答，而社会民主党人不来领导起义，那么事情是会失败的。海陆军士兵走了出来，等候训令，而社会民主党人就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拿来了《资本论》第一卷，拿来了第二卷，最后连第三卷也拿来了。大家都来找马克思关于克里姆，关于西凡斯托堡，关于在克里姆起义的指示。但是在三卷《资本论》中，不论关于西凡斯托堡，关于克里姆，关于海陆军士兵起义都没有找得一条指示（笑声）。再翻遍马克思和恩格斯底其他著作找寻指示——仍然没有任何指示（笑声）。怎样办呢？而海军士兵们已经又来了，等候回答。怎么了呢？社会民主党人迫得承认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能给海军士兵们以任何指示。‘海陆军兵士的起义就这样没有成功。’——瑞典同志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故事（笑声）。”

在我们学习理论的过程中，象类似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荒谬的行为，是可能在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程度上，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许多人中间重复出现的。对于初步学习马列主义的人，只求首先了解马列主义理论的初步的一般原理原则，而还谈不到要求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理论的人，这还不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对于需要深入一步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人，对于不仅仅要求

记忆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而主要地是要学会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人，那么，这种喜欢从书本上找现成药方的坏倾向，就会成为学习的严重障碍，如果不是经常警觉地来压制住这种坏倾向和克服这种坏倾向，那就不可能前进一步。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

第二，应该特别强调自学的精神，应该主要通过各人自学的努力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而不是主要依靠开会、漫谈、听讲等等的方式来学习理论。马列主义的精神和实质，不是浮在表面词句上的东西，不是从道听途说中可以掌握得到的东西，必须认真读书，在阅读中间经过个人的深思熟虑、结合实际来悉心领会，才有可能逐渐了解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所用以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是如何应用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我们如何来学习应用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来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主要靠个人自学获得成绩，而不是主要依靠开会、讨论、听讲来获得成绩的。强调自学，自然并不等于不过问实际问题和群众生活的问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态度来进行学习，也是不对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是要把向书本的学习和向实际生活、群众生活的学习密切结合起来。但正是因为要学会善于在学习中结合书本上的理论与实际生活和群众生活，所以就需要个人的独立思考，需要认真的自学。会议、谈话、听讲，当然也是不可少的，它可以启发我们的思想，帮助个人的学习和研究，适当地应用这些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是主要经过了自已个人的认真阅读和努力思考，就一定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变成自己的真正思想，就一定只能成为表面词句的背诵者，所以，如果有人把主要

的学习时间消耗在开会、漫谈、听讲上面，而很少时间或甚至于没有时间用来进行自学，要想获得成绩，是不可能的。

自然，学习的方法，也不能有死的公式，必须按照参加学习的人的能力和条件，来具体规定不同的办法。前面强调自学的方法，是对于阅读和学习能力较高的人来说的，特别是对于有能力学完十二本书的人来说的。对于文化程度、政治认识以及其他学习条件都相当低的人，自然就不完全适用。对于初学马列主义理论的人，选择几种较浅的课程，并主要采取讲授的形式来组织学习，是完全必要的。在各种政治训练班里，以初步改造思想作为学习的主要任务，采取较多的会议形式，应用较多的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这也是有益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下，也仍然要以启发学习者的自学精神和独立思考为主要目标，并且应该给与足够自己阅读和思考的时间。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是，象有些地方，把演讲和会议的日程排满在学习表上，有些机关，每天一小时半或二小时的时间，差不多天天都消耗在讨论、漫谈甚至于胡扯上面，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学习者的读书时间几乎等于完全没有了，试问这样还象个理论学习的样子吗？试问用这样的学习方法（如果也算方法的话），能够希望得到什么结果呢？

虽说强调自学，也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领导、推动和帮助，全国各地、各学校和各机关的领导方面，应该按照以上的原则，来做一些必要的组织工作，对于有能力进一步学完十二本书的人，应该给与必要的帮助，使他们能获得充分自学所必要的条件，如时间条件以及其他条件等等，应该帮助他们克服应该克服和可能克服的困难，有效地进行自己的学习。对于其他参加初步学习的人，仍然可以利用以往的经验来指导学习，同时斟酌情形的必要，在可能的条

件下设立讲授班。改正以前某些地方存在着的，差不多完全用开会和听讲来代替了自己学习的坏毛病。

(一九五〇年十月,《学习》杂志
第三卷第一期)

论思想改造问题

只要不是对于现实完全闭着眼睛的人，就能看到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来，中国人民的认识的迅速进步；就能看到各阶级人民的自我教育和改造，在人民的国家政权下面，不但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而且实际上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当然还很不够，还需要不断的前进，但对于在学习运动中对思想改造抱怀疑的人，已经有足够的事实来破除他的怀疑了。有些人用“存在决定意识”作为理由，想证明只要小资产阶级还在社会上存在一天，就谈不上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改造，如我们在王鼎臣的思想改造问题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说法，既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同时又是误解了辩证法唯物论的真理，把它看做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以至于宿命论了。因此，在理论上加以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 王鼎臣是某机关的干部，在关于思想改造问题上有许多糊涂认识。《学习》杂志从一九五〇年第三卷第一期至第七期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文是这次讨论的总结。原文发表于《学习》杂志第三卷第七期上，这里选用的是作者的修改稿。

“存在决定意识”和“思想改造” 并不是互相矛盾的

这首先是由于一切存在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阶级的存在也是活的存在，是经常在发展、变化中的存在。每一个阶级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生长出来，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没落或衰亡。同一个阶级，在它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就表现出若干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处在不同的条件下就会有若干不同的特性；有的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分化或转变为另外的阶级。自由竞争时代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有许多差别，同是农民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和在资产阶级统治中，其发展情况就不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又有差别。小资产阶级有上中下各层。上层小资产阶级接近资产阶级，也有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下层小资产阶级接近劳动人民，也有可能转入无产者的队伍，不能把它们看成完全一样的小资产阶级。存在既然是这样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东西，因此，“存在决定意识”这一个真理，就恰恰能够说明，为什么人的思想意识也是不断变化的，为什么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可以改造的。一个阶级或阶级中的个别人，如果转变到另一个阶级队伍里去，那么，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就有可能跟着发生根本的变化。同一个阶级，如果它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变化了，或者它在自己的发展阶段上有了变化了，那么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尽管这个阶级基本上仍然是这个阶级，尽管它的思想意识也并不超出这一个阶级的思想意识的范畴，例如说尽管小资产阶级始终是小资

产阶级,而并没有消灭,尽管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始终总有着它的基本特点,但是,既然它有上、中、下各层,那么,要说各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完全一样的东西,这是谁也知道不对的;同样,要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会完全一样,也是不对的;认为在人民民主政权下面小资产阶级不可能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改造,更是完全错误的说法。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的国家里,各阶级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由以往被压迫的地位变为统治者,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站立起来,对着全世界扬眉吐气。这是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根本的变化,也是中国各阶级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根本的变化。这样一个根本的变化,就不能不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中引起各种各样的、与各阶级人民的阶级本质相适应的许多变化,而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发挥的日益深刻而普遍的领导作用,也规定着这些变化的特点。就工人阶级来说,由于它已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因此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就空前迅速地普遍地提高起来,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列主义就日益深刻而系统地发挥出它的领导作用,这也就规定着各阶级人民思想意识的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两年来遍及全国范围的学习运动的高涨,和它所收到的显著的成果,就足以说明在这一个存在方面的变化的基础之上引起了各阶级人民的思想意识上的多么巨大的变化。

有的人又从另一方面提出疑问,说:既然存在决定意识,那么,人的思想意识是会自然而然地随着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的,用不着再提倡思想改造了。这仍然是用机械决定论的观点来看存在和

意识的关系，不了解意识对于存在又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不了解意识固然归根结底是由存在所决定，但在某种条件之下，它也会和存在互相矛盾。这矛盾是怎样发生的呢？这是由于，人的思想意识虽然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但是，当着某种思想意识在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起来以后，它本身就会有相当的坚持性、成见性，而在物质生活已经继续向前发展了的时候，人的思想意识仍然有可能照旧不变。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的思想意识就会落后于现实条件的发展。客观存在已经出现了新的面貌，而思想意识仍然不能超出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规定的内容。这就产生了意识与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表现，就在人的行动上：人的行动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意识的，人们如果有了落后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就会支配着他们恋恋地不肯舍弃旧的社会存在和旧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行动趋向难于适合新的社会生活条件，甚至于会和新的物质生活条件形成完全对立的状态，因而使他们成为阻碍新社会进步的反对力量。旧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受到反动统治者亲美的宣传教育的影响，不认识美帝国主义者侵略的本质，不觉得美帝国主义应该受到仇视。这种思想一直遗留到新的人民中国成立以后，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间，如不改变，就会和客观存在发生矛盾，阻碍着他们的进步，使他们不能够积极地参加这个运动，甚至于要阻碍这个前进的运动。如果中国各阶级人民的思想始终保持着旧中国时代的面目，如果采取自流的态度，任随这种旧的思想状态与新中国的客观存在互相矛盾而不加以解决，那么，我们就很难，甚至于不可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来推动中国广大人民自觉地保卫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那么，新中国的保卫事业和建设事业就要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就要无限推迟或甚至有可能归于

失败。如何解决这一个意识与存在的矛盾？那就是要提倡各阶级人民的自我教育和改造，就是不要简单地等待思想意识的自然而然的发展，而是要经过学习运动，经过改造思想的主观努力，来自觉的促进和推广这种发展，使各阶级人民的思想意识在工人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能够适应新中国的改变了的客观存在，解决其互相间的矛盾，使意识与存在接近于一致。

改造思想，领导各阶级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和在全体规模上来进行自我改造和教育工作，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人民民主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国家区别的标帜之一。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国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在旧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是依靠工、农劳动人民的力量打败封建地主阶级，而在反封建的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但当他们一旦获得了政权之后，就立即踢开了战友，用一切方法把工人农民以至于小资产阶级置于被压迫者的地位上，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常常要和原来的敌人——封建势力互相妥协，共同来压迫劳动人民，排挤小资产阶级。这样就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这样的国家决不会领导人民来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也就是决不会领导人民来抛开自己的旧的落后思想，来认识新的客观现实。居于专政地位的资产阶级决不愿意这样做，相反的，为要巩固它自己的阶级的统治和维持剥削的利益，它就要尽量维持和利用人民思想中的落后成份，甚至于要在人民中间制造愚昧，以便欺骗人民，使人民易于服从统治者的驱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旧德国的帝国主义者以至于英帝国主义者，都曾利用人民中间的封建时代思想的影响，来建立金融寡头的反动统治，美帝国主义者以满足各种卑劣的欲望作为钓饵来欺骗士兵走上屠杀朝鲜人民的

战场，这是今天世界人民有目共见的事实。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形，和这些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情形完全相反。人民民主国家不是一个剥削阶级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它的任务绝对不是要维持一个阶级的剥削利益和巩固这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它是代表广大人民来对少数反对剥削阶级实行统治，它的任务是要逐步解放广大人民，最后消灭阶级剥削制度和消灭人对人的国家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人民民主国家的这种性质和任务，就规定它必须领导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使人民脱离在旧社会所受反动统治者的思想上的毒害，脱离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习惯坏思想，使人民在思想意识上面目一新，能够与自己的新国家主人的地位相称，使人民懂得如何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挥自己的力量，如何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和保卫自己的国家，如何在现阶段的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并准备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国家，必须完成领导人民改造思想的这一个任务，必须使各阶级人民的思想按照其自己的阶级特点改造到与客观物质条件的发展需要互相一致，而不是互相矛盾，才能使他们在建设和保卫自己的国家的行动中发挥其与各阶级相适应的自觉性、积极性。中国人民在现阶段的思想改造，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作为基础的，共同纲领规定了目前中国各阶级人民应如何团结起来实行国家统治，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准备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各方面工作的正确方向，现阶段的各阶级人民改造思想的问题，就是要按照共同纲领所指示的方向，按照各个阶级在共同纲领所处的不同的地位，来分别进行具体的解决，以便各阶级能依自己的特点来改造自己，使自己在今天的新

国家中贡献最大的力量。

如何具体解决思想改造的问题？

这必须对各阶级人民的具体特点作正确的分析。改造思想的任务之一，是要使人民脱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这一类敌人的反动的思想，必须加以坚决、彻底、全部的肃清。这是没有问题的。成为问题的是：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成为朋友的一些阶级的思想，是不是也要改造呢？小资产阶级是朋友之一，他们的思想是不是也应该改造呢？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从旧社会里来的各阶级人民，除了无产阶级，由于它的思想就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人阶级中间的思想教育问题只是排除其他阶级思想影响和提高觉悟的问题，此外，就其他各阶级人民说来，他们不仅仅会从旧社会带来若干反动派影响的残余，而且自己的阶级本身，除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能够表现一些前进的、积极的作用之外，也还有自己的许多落后的、消极的因素。因此，为要使这些阶级人民的思想都能适合于新的社会存在，适合于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方向，就必须有所改造。改造这些阶级人民的思想，和对待反动派思想当然不同：对于反动派思想，我们是要求把它整个的阶级思想加以坚决、彻底、全部的肃清，至于人民、朋友间的自我教育和改造，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就一般情形来说，还不是要求某些阶级整个地把他们自己的思想完全加以消灭，而是要首先反对这些阶级思想中某些落后的和消极的因素，使它能够通过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所以，我们提倡各阶级人民的

思想改造，并不是要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思想完全看做反动的、非法的东西，不是要把他们的思想当作敌人一样，采取完全势不两立态度来对待它们。这样的做法，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里作为朋友的阶级的自我教育和改造来说，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自然，如果是就共产党的党内教育和工人阶级的教育来说，那么，全部排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又是完全必需的。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努力和自己头脑中所保留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而不应该认为保留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任何残余是合法的事情。至于工人阶级以外的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自我教育和改造，却不能使用共产党党内教育和工人阶级教育的原则，其目标并不是一定要他们把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完全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要首先就他们原来自己阶级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批判其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相矛盾的、落后的、消极的，或叫做反动的因素，而力求使其与新社会的发展需要相一致。当然，这决不是说，在这些阶级人民的思想改造中不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也不是说，在思想改造中不应该使各阶级人民逐步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恰恰相反，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不可能对各阶级人民的思想特点进行正确的阶级分析，就不可能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坏思想，以及一切违背新社会需要的、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坏东西给予有力的批判，就不可能教育和改造这些阶级，使他们的思想适合于客观的需要，就不可能通过思想改造推动这些阶级人民自觉地来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而斗争，并准备将来进一步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顺利地转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要想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正确地

进行教育和思想改造,就一定要保证坚定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保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应该力求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个别的或成批的非工人阶级的个人放弃自己原来的阶级立场,转入工人阶级队伍以至于参加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也是必要的,完全合理的。下面我们就来对各阶级人民的特点作一些简略的分析,仅供读者一般的参考。

(一)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受到排挤和压迫,而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面,由于旧中国工业发展的落后,却还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余地,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以及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中,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表现一定的积极性的。但是,发展不足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它本身是软弱的,而且由于长期在反动统治下生活的结果,受到后者的某些恶劣的影响,对于后者往往保持着某些联系和依赖性,这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要表现出动摇性、两面性。这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和行动。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者常自以为可以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中间站在不偏不倚的地位上,在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道路同世界革命人民的道路中间可以有第三条道路。他们在很长时间中都不能够了解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而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特别恶化了的投机性、盲目性,如不加以改造,对于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也会发生有害的破坏作用。这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般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就是要发挥其对于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

设能起积极作用的方面，就是要批判其对于革命的两面性、动摇性，以及经济活动中盲目投机的有害思想，使其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工作中能保证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资产阶级，它是要剥削工人阶级和牟取利润，否则就不成其为资产阶级。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自我教育和改造，其一般的目标并不在于要他们根本消灭其资本主义的剥削思想和牟利思想，而在于把他们的这种思想正确地安置在《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轨道上，使之脱离反动派所指引的道路，并为将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时准备进一步改造的基础。简单地用“一切剥削都不合理”的公式，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一概看做罪恶行为，是犯了非历史观点的错误。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和牟利思想在现阶段自然有其不合理的因素，如果他们对帝国主义表示崇拜、畏惧，在帝国主义侵略前面妥协、屈服，如果他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如果他们企图使自己的工商业活动长久依赖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来牟取利润，或企图盲目投机获得暴利，这样的剥削思想、牟利思想，当然是不合理的，甚至于是罪恶的，反动的，是应该反对的。资产阶级如果能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努力建立民族自己的工商业，把工商业活动的方向为着农民、工人及其他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避免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活动和盲目投机活动，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领导下和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求得合法利润，那么，他们的思想虽然也是从剥削和牟利的要求出发，但在现阶段这样的资本主义剥削思想和牟利思想，在资产阶级中间却是可以容许的（自然，为着保证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我们又必须同时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资产阶级以

外的人民中间扩大影响)。这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所应遵循的一般的方针。

(二)小资产阶级。包括小手工作坊老板、小商人、小店主、小员司、一般学校教员、大中学生(学生有许多是出身资产阶级地主以至于官僚资产阶级的,也有一小部分参加了工人阶级先锋队,但就其主要成份和一般的思想情况来说,可以算做小资产阶级)等等复杂的成份。在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按其经济情况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层,生活略有富裕的,属于上层,仅能维持生活的属于中层,经济感到有些窘迫的属于下层。上层小资产阶级一般都剥削少数雇员的劳动,其地位比较接近资产阶级,往往有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的,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还个别地会走进反动统治者的圈子里去。但是,一般说来,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重重压迫下,总是大量地、急速地走向穷困、破产,经济上升的希望是绝少绝少,而相反的是大批地、不断地走入了无产者的队伍。因此,除了少数上层分子之外,小资产阶级对于反动派的统治都非常痛恨,有着相当强烈的革命要求,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进行坚决的斗争。“五四”以来历次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都有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参加,成为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而青年学生运动,由于对政治的反映比较敏感,在历次革命时期中还起着先锋的作用。大批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转向工人阶级的立场,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参加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所受的压迫、痛苦,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新中国的人民政权下面,就完全的解除了,因此在新的国家政权下面,他们的思想意识中的这些积极的前进因素,将能够,而且也必须进一步发挥起来,成为建设新中国保卫

新中国的重要的力量。他们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逐步受到改造，由个体小生产转入集体的大生产，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为着要尽量发挥他们思想中的积极的积极的因素，就必须克服其消极的和保守的方面，就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消极的、保守的方面，是决定于它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一些特点。它是小私有主，它的经济生活建立在规模狭小的生产基础之上。一般都亲身参加某些个体劳动。个体的、狭小的物质生活条件养成小资产阶级重视自己狭小的生活和财产的习惯，容易把个人的名誉、地位和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小资产阶级之参加革命，首先是由于个人的生活、财产、名誉、地位和利益等等在反动统治下受到损害，它对于革命的希望也首先是在于求得所谓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解放，而不是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自由和解放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小资产阶级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潮流中经过一个时期的体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然后才会逐渐知道同情、重视和关心工农劳动人民的斗争，才会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与个人解放的密切联系，才有可能进一步把自己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或者把个人的要求从属于人民解放的要求，甚至于转变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参加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伍。脱离群众斗争，长久把自己关在小家庭或书斋范围内的小资产阶级，对于群众的力量和群众斗争的意义，一定不会了解、不感兴趣、漠不关心，甚至于会以为是多余之举。他们习惯于用所谓“超阶级的”个人的观点来看问题，也就是把社会和革命的问题仅仅看做、或主要看做是个人的问题。他们痛恨反动派，主要是因为看到反动派都是一些贪污腐化卖国残民的个人的集合，而不能进一步认识到反动派的阶级

基础，他们佩服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新的人民政权，主要是因为后者的成员廉洁、勤劳、办事认真，而不知道后者的主要特点及其取得胜利的基础是在于有一个最坚定的革命阶级立场，在于时常不忘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而又能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缘故。小资产阶级分子喜欢把一切事业看做仅仅是或主要是个人的事业，而很少或完全没有注意到一切有价值的事业首先是革命阶级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说：“我是靠我的本领吃饭的”，“这是我所完成的工作”，“只要我有了技术，到哪里都一样工作”，以为只要个人有了本领和技术，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很少知道或完全不知道，个人的本领固然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个人的本领的使用没有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作为基础，是必然要一事无成的，个人的技术的发挥，是会受到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环境的限制的，并不是“到哪里都一样”的。小资产阶级的这些思想的特点，如果用一个名辞来加以概括，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私有财产制度是采取保守态度的。在这一点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同属于资本主义思想的范畴之内，并因此很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建立在规模狭小的个体经济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上，因此它就有它自己的特点，这特点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现在我们只讲其中最主要的几点。

第一，轻视群众、轻视劳动。一般小资产阶级除了少部分上层的以外，还不至于象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那样把劳动群众看做下贱的、生来应该受欺侮和剥削的人物，相反的，他们对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受侮辱损害者的不平现象的存在，是抱反对态度的。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己常是多少从事一些劳动的，并且是受排挤和压迫的。小资产阶级轻视群众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不能

认识或不能重视劳动群众的力量，把革命事业看做居于“负责地位”的人物的个人的事业，看做英雄豪杰“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的恩赐行为，以为只要个人本领加强了，或者个人上升到负责地位了，就可以立刻做出救国救民的大事业来。如果他一旦居于负责地位了，那他就会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成了那样的英雄，就要凭着他的个人意志来独断独行，而不去考虑、或不重视群众的意见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坏作风，其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还有其他的来源，如封建的官僚思想、军阀思想等）。轻视劳动，把劳动看作可耻的事情，在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中，以及接近资产阶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中，比较普遍存在，一般小资产阶级也有认为劳动是“受苦”、“受罪”的错误思想，这是剥削阶级以至于反动阶级思想在小资产阶级中的恶劣影响之一，它能引导小资产阶级对于那些反动派的寄生生活发生羡慕的心理，并进而走上反动派所指引的道路。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这些缺点的方法，是要引导他们接触工农劳动群众的斗争和参加这些斗争，脱离“离群索居”“闭门造车”的生活，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组织经济的合作互助，以及其他适当的集体活动（如学生中的群众活动）。学习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使其从思想上认清劳动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也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散漫性、无政府无组织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个人兴趣、个人利益以及小生产、小集团的存在，采取保守的态度。这种保守的态度，就会阻碍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认识的进步，使他们不可能了解，政治上的集中领导以及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为什么是革命人民战胜敌人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也不可能了解，在经济上必须由个体的小生产发展为集体的大生产，然后社会才能走

上更高的阶段。不了解集中领导的重要，就可能产生极端民主思想、工作上闹独立性、喜欢独断专行而不尊重领导指示的思想。不了解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的重要，把个人以及个人周围的小集团、小生产、小单位的利益放在一切考虑的第一位，这是组织关系上的本位主义、宗派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之一。同样的原因也产生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即过份的强调个人自由，害怕参加集体行动，害怕受纪律的约束，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害怕克服自己的缺点，也不热心帮助别人改正缺点，懒懒散散，得过且过，“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对于私人的细小得失重视得有如生命，对于集体的人民的共同利害则不甚关心或完全漠不关心等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是许多小生产的自由联合，而不是以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体生产作为经济基础；“打平伙”、“吃大锅饭”、平均主义思想等等，都是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对于小生产的保守的观点。小资产阶级的以上这些散漫性和无政府无组织的思想，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或在将来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中，都会发生消极阻碍的作用，必须耐心地正确地领导他们参加适当的组织行动，使他们能够亲身体会到集体行动的利益，并用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和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来提高他们的认识，才能逐渐克服。

第三，超阶级的空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人的行为误认为只是个人的行为，而不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要和一定的阶级的活动相联系，不是和这一阶级相联系就是和那一阶级相联系，而不可能真正居于超阶级的地位。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超阶级的空想本身，也正是它的不稳定性阶级立场的反映。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过渡的、不断分化的、可以向资产

阶级上升也可以向无产阶级下降的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超阶级的空想,使他们经常模糊了敌友的界限,不能把革命敌人看作是敌对的阶级来看待,而以为敌人的行为只是某个人一时的思想错误,因此对于敌人就必然发生种种的幻想。例如以为只要敌对营垒里换了某个领袖人物,或者某个领袖人物的思想改变了,那种反革命者的敌对行为也就可以终止了。必须指出,这种思想在别的阶级中间也会有的,但主要是广泛地存在于小资产阶级中间。这种幻想使小资产阶级分子容易受到敌人甜言蜜语的欺骗,而招致革命力量的损失。小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人员中特别容易产生对于科学和技术的超阶级的看法,以为有技术的人员不论在谁的统治下面都是一样地靠自己的本领吃饭,而在新民主主义人民政权下学习政治和改造思想就是多余的负担。他们不知道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术本身虽然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但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人,自然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却不可避免地要有着他们自己的一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因此,他们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理解和技术的应用,也必然要多多少少有着自己阶级意识的烙印,必然要多多少少受到阶级立场的限制。不学习政治,不改造思想,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面虽然也可以消极被动地做一些工作,也可以照样吃饭,但决不可能发挥高度的积极性、自觉性,不可能使他们的工作和研究获得最大的效率。学习政治和改造思想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决不是多余的负担,而是提高研究和工作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有着小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空想的人所不能了解的。对于有着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空想的人需要逐步地推动他们参加各种革命政治斗争的群众活动,同时学习历史唯物论的阶级斗争观点,使他们把自己的若干亲身的体验和理

论的了解相结合,才能逐渐认识到超阶级的空想为什么是错误的。

第四,片面性、主观性。小资产阶级容易把个人的、小集团和小生产单位的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在思想方法上就免不了要犯片面性、主观性的毛病。这就是说,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周密地依据各方面的事实情况来作为推测和判断的根据,而只喜欢依据于自己生产活动的狭小圈子里便于找到的材料来作为根据,不是依据客观事物发展的具体规律来决定自己的工作和行动的方针、办法,而是喜欢依据个人主观的愿望、感想以至于感情上的爱好和憎恶来轻率的决定工作和行动的方针、办法。例如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工作者,容易把自己所读过的书本上的词句简单的引用来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根据,而不顾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否完全符合于这些词句,这就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方法的来源。长期作一定地区的或农村工作的干部,常常把一个地区的经验材料,当做处理一切工作的万应药膏,不管遇到什么新的不同的地区和环境,总是死板的照样应用,这就是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方法的来源。不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主观性的表现。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使人们在认识上、政治上和工作上常常发生各种偏差和摇摆,而不能认识事变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掌握坚定的明确的行动方针。“左”倾冒险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急性病与迟疑不定,盲目乐观与悲观失望,这些思想上的偏差,从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来说,都是由于仅仅根据片面的情况、材料或主观的想法来判断问题的结果。今天抓着了情况的一些有利方面,就发生盲目乐观、急于求功和冒险乱冲的想法,明天忽然发见了情况的一些不利的方面,于是又产生悲观失望、迟疑不定和退却保守的想法,这就是由于思想上

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所引起的认识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摇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这种片面性和主观性的方法，就是要使有教条主义毛病的知识分子接触实际、研究实际，多向实际方面学习，也要使有经验主义毛病的实际工作者认真读书、认真研究革命的政策，多多的向理论方面学习，同时都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便较有系统地研究和了解什么是正确的思想方法。

(三)农民。农民中有富农，中农和贫农三个阶层，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旧富农还带有封建性。我们讲到农民的问题时，都是把中农和贫农作为主要的对象。中农相当于农村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贫农则处于半无产阶级的地位，农村的无产阶级则是雇农。农民在封建社会下面受到地主阶级最直接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又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的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是非常之大，和工人阶级在一起构成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也仍然要受到压迫、剥削，而大量走上破产的道路，但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下面，农民可以经过合作社的道路，跟着工人阶级走入社会主义社会，避免再受压迫和剥削，而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所以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它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在新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地使自己受到教育和改造，由个体的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但是，这并不是说农民的教育改造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农民经济的分散性，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使他们对于个体的经济容易采取保守的立场，所以农民的教育，如毛主席所说的，仍是“严重的问题”，“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6页）

(四)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领导阶级，这个领导作用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掌握这个工人阶级的思想并用来指导革命斗争。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工人和共产党员天生就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因此也不能说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就用不着受到教育和改造了。相反的，只有在不断的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才有可能获得本阶级的思想，并因此发挥其领导作用。这是由于：第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队伍的成员，大部不是直接出身工人阶级的，而是由别的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同时旧中国工人阶级是生活在反动统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影响下，是生活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社会环境的包围中，这些客观条件使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的思想经常受到非工人阶级的影响，必须对这些影响经常的进行斗争，才有可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第二，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思想不是在工人阶级自发的运动中产生，而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和用科学方法总结了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争经验的结果。必须正确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工人阶级才能成为最有觉悟的、能够担当得起革命领导任务的阶级。由此可知，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必须一方面经常地反对自己思想中的非工人阶级成份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才有可能真正发挥本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为什么也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的原因。

以上，我们把各阶级人民如何具体解决思想改造问题的方针一般地说过了。下面，还要谈一谈另外一个问题。

关于思想改造的某些方式的问题

前面已说过，各阶级人民的自我教育和改造，根本不同于对敌人的思想斗争，其性质不同，方针不同，因而方式也有所不同。对于明显的反动派的破坏思想的散布，应该采取专政的方式，给以坚决的镇压、打击和揭露。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对反动思想进行镇压、打击和揭露的工作，应该随时自觉地来参加这个斗争。至于对人民中间的思想错误以及由于人民觉悟不够而受到的反动思想的影响，就要采取民主的方式来克服，也就是说，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和耐心说服的方式。人民中的思想改造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细致和长期的工作，不能希望在几天或几星期之内把各阶级人民的思想中的一切落后的消极的方面完全肃清，甚至于对反动派思想在人民中的影响，也要进行长期的不断的改造，而不是几天或几星期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页）所以，在思想改造工作中采取急性的、粗暴的、强迫命令的态度，而不注意启发学习者的自觉自愿，是错误的，是徒劳无益的。这个原则，不仅仅对于正规的大学适用，对于短期政治训练学校，对于共产党的党校以及整风学习运动，也是基本上适用的。但是，这个原则，并不妨害我们规定在一定的短时期的学习中间（长短看情形而定），要求改造思想

达到一定的目的,解决某些可能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克服某些可能和必须克服的思想缺点。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人民很快就学到了对美国仇视、轻视、蔑视的思想,而克服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只要我们的计划符合实际情况,那么,要求在一定的短时期内获得一定的显著的成绩,又是应该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这也是多次的经验证明了的事实。如果因为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工作,需要耐心的说服,于是就听任其自流,容忍其拖延,把一定时期内规定一定任务的办法看做不必要的事,那又是另一个偏向和另一个错误了。自然,在不同的学习环境里,由于学习的要求、领导的经验、群众的基础以及其他条件等等的差别,这些任务的规定以及时间的长短,是应该有差别的,把教育共产党员的党校和党的整风学习中所要求的任务简单的用到非党的学校里,是不对的,把短期政治学校的学习的任务简单地拿来要求正规的大学的政治课的学习,也是不对的。这一切,都需要学习的领导方面能依据情况给与具体的掌握。

这里附带还要说明两个问题:

(一)关于“思想总结”的问题。“思想总结”(或叫做“学习总结”也可以),是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所创造的学习方式之一。在多年来的学习运动中经常采用,全国各地解放以后,又在短期政治学校以及正规大学的政治课中采用,一般都证明能收到很大的成效。但是,个别大学里采用“思想总结”的方法,却发生了偏差。这决不是“思想总结”的方式在原则上不对,而是以不正确的态度来处理“思想总结”的缘故,所谓不正确的方法,就是:第一,方针上的敌友不分。在“思想总结”中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当做反动思想一样,企图整个加以打倒。第二,急性病。企图一次将一切小资产阶

级及其他阶级的错误思想全部肃清，企图一下子把个人一生的历史的总账都算个一干二净，而不是按照可能和必要的情形作适当的检查。第三，命令主义。不是经过自觉的认识和真正学习的心得来作自我批评，而是在小组里或周围环境里多少带逼迫性的空气压力之下，勉强写出些不成熟的意见。这些就是使得“思想总结”得不到应有的成绩的主要原因，如果能够避免这些偏差，那么，“思想总结”的方式仍然不是不可以采用的。而且，由于学习必须在一定时期里达到一定的目的，所以，在学习告一段落的时候，把各人的心得作一总结，对自己的思想作适当的检讨，仍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二）“整风”的方法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在一般政治学习里呢？把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整风”的一套方法，简单地用到非党人士的政治学习和正规大学里，那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整风”方法的某些原则，也不能适用。不是的，整风方法所包含的某些原则，如以改造思想和工作作风为目的、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是可以作为一般的政治学习方法的原则来采用的，只要能够灵活的结合具体情况，那么，这些原则在非党人士和正规大学的政治学习中间，也是可以的。

（一九五一年一月，《学习》杂志
第三卷第七期）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

(一)真理的问题是关于革命成败攸关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反复地论述到关于真理的问题。他依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原理，为我们正确地指明了真理的性质，判定真理的标准，以及如何解决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他“深刻地说明了和发展了著名的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关于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的一致性的原理”（《真理报》编辑部）。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是把这些真理的学说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并且用很大的力量来加以发挥的。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在理论上这样重视真理的问题，归根结底，又由于它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实践中，始终是一个成败攸关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用艰苦努力来解决的困难问题。

在一九四一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里，毛泽东同志曾把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这样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

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鸦片战争失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十年左右的斗争，由于没有找到最好的真理，革命运动始终没有获得胜利。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才不过二十八年，毛泽东同志就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宣布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就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历史来说，革命领导之能否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也是与革命的胜败密切联系着的。在有些时期，特别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以及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国内战争时期，由于革命的部分领导者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由于他们把错误——政治路线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误认为真理，就使革命和人民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一些革命领导者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对这些错误的倾向进行不断的坚决的斗争，那么，今天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不能想象的。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适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真理的认识对于革命和人民是如何重要，直到现在在我们的工作干部中间，还有很多人不能深刻了解，甚至于完全不能了解。有些人不肯用刻苦努力的精神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其借口是不学习理论似乎也可以照样工作，而不知道不学习理论决不能把领导工作做好，决不能

在领导工作中避免错误或减少错误。有些人在工作和学习中不能够积极地坚持真理，对于真理和错误的界限划分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不能勇敢地来揭发错误和对错误进行斗争。对于真理缺乏积极的和严肃的态度的这一切情形，是不符合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的，是和毛泽东同志重视理论学习，重视真理的精神相违背的。

要善于坚持真理，就必须了解什么是真理，必须学会判别真理和错误，必须懂得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经常保持客观的真理性。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认真研究《实践论》中所发挥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学说，并把它应用到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当中。

(二) 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

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符合于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正确认识。人的思想如果不符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这就不是真理的认识，而是错误的认识。如何判别真理和错误？如何证明我们的思想和认识是否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毛泽东同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通过实践。”“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

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之真理性，即真实性和威力，现实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真实还是不真实的争论，乃是一个纯粹烦琐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所规定的的基本原理，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里，都有更详细的阐明，而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里，是更进一步地具体地发挥了。

否认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曾经是很多反动哲学者引人陷入唯心论和不可知论的泥沼里去的诡计，列宁对这种诡计曾在他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给了深刻的揭露。旧社会的许多学校教师和知识分子之容易沉溺于烦琐哲学的空论，其根本的原因正是由于中了这种唯心论的毒害。忽视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或对于这原理完全无知，曾使许多人在革命工作中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们闭着眼睛不肯对群众的实践经验作任何的调查研究，把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和自己主观上的“想当然”当做真理，用来任意决定政策，指导工作。凡是与他们的“想当然”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的东西，即使是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的成功经验，也要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给与无情的打击，凡是在他们的“想当然”指导之下的行动，即使在群众的实践当中遭到失败，碰得头破血流，仍然要找理由把它渲染成伟大的胜利，并继续向失败的墙壁

上碰去，而决不肯承认失败，更不能“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中国的革命人民曾因为这些主观主义的领导者遭受过很大的损失。在今天的工作干部当中，也还存在着一些这样的主观主义倾向，他们虽然不是居于那样重要的领导地位，但如果不去注意克服自己的主观主义，那末，他在一定的地方对于工作和人民，仍然会给与相当的损失。

坚持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来和这一类的唯心论者、主观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务必使他们放弃那种“自封为‘天下第一’”的“虚伪与骄傲”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到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去学习，这对于革命、对于人民都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同志自己就作了杰出的模范。他不但在理论上发挥了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在一切实际的革命斗争的指导上，始终坚持着这原理。和那些闭眼不看社会实践的主观主义者相反，毛泽东同志任何时候都不忘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广大人民的实践斗争中进行调查研究，抽引出符合于客观事物规律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来反对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来对工作提出正确的指导。要了解毛泽东同志如何坚持这些原理，只要回想一下在一九二七年间，他如何从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中得出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相反对的结论，或者回想一下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期间，他如何依据当时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经验，提出指导革命的正确路线，来反对教条主义者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只要回想一下这些例子，就很足够了。

这里必须提起注意，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里，被当做认识发展之基础和真理标准的实践，与旧哲学中有时论到的以及受旧哲

学影响的一般人思想中所了解的“实践”，是根本不同的，是一定要明确地加以区别的。旧哲学的唯心论在提到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的时候，其所理解的“行”或实践是抽象的、表面的、片面的，甚至是神秘的、反动的，其所指的内容，或者仅仅是儒家的进退洒扫式的修身行为，或者是对于某些伦理原则的所谓践履笃行，或者是黑格尔的“用沉思来制定的改造直接的东西”，或者是庸俗的人情世故，或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行为，或者是某些腐朽的反动哲学中胡说乱道的什么内心体验。这些唯心论哲学所规定的“实践”和“行”的概念，与辩证唯物论的科学的实践概念，或马克思说的人类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根本不同。五四运动中间为胡适贩到中国来的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哲学——实验主义，其所谓的“实效考验”，也是一种用科学名词伪装了的唯心论的概念。要想根据这些谬误的概念来正确解决实践和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可能的。旧唯物论也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实践行动，如象费尔巴哈，他就把实践看做低级的生理的情欲活动，“把实践只在它的污秽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上加以理解和确定”（《费尔巴哈论纲》），把“实践的观点，饮食的观点”（费尔巴哈）看做一个东西。“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之意义”（马克思）。旧唯物论既然从这样低级的意义上来了解实践，因此也就不可能在认识论里把实践放在真理标准的优越地位上。

学习《实践论》，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实践概念，和旧哲学里的那些浅薄的、混乱的、庸俗的、甚至于神秘反动的概念加以严格的区别。否则，要想正确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其中所包含的真理学说，是绝对达不到目的的。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把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概念的具体内

容作了系统周密的发挥，他依据精密规定的意义，有时特别称之为“社会的实践”，或“变革现实的实践”，这就有别于旧哲学中和一般人心目中的那种意义模糊的概念，有别于那种反对变革现实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要求的“实效”。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的具体内容，最主要的，是生产活动的实践和阶级社会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其中生产活动的实践，又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同时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又“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对于真理的认识的程度，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首先是随着生产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同时，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发展，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决定条件。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中，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限制了人民的眼界，特别是各时代反对社会变革的反动剥削阶级，要蒙蔽历史发展的真相，这些条件使得人类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识长久缺乏全面的科学的真理性，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但是，历史上每一次进步的变革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总使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前进一步。到了伴随着巨大生产力的工业而出现了无产阶级的时候，人们终于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这样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因此，只有“社会的实践”，“变革现实的实践”——变革自然界的生产活动和变革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才是人类认识发展的真实基础，任何人如果希望使自己对于外界的认识不断地接近客观的真理性，就只有参加在变革现实的实践当中。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必须让自己的实验室的研究以及头脑中的推理计算与工农业的社会生产活动适当地、直接地或间接地保持某种联系，才能够在发明发见方面不断地获得新的启发和不断的进步。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自然科学研究者，纵然也可以获得一些现成的知识，但要想超出现成的知识水平而向新的真理不断接近，是困难的。旧中国的自然科学界一般的停滞不进或进步迟缓的状态，基本上是可以反动统治下自然科学研究与生产活动的条件相隔绝来说明的。研究社会历史的人，或希望对于社会、历史以及革命的问题获得正确认识的人，必须使自己的研究与变革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相结合，必须参加在变革现实社会的而不是保守旧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才能够真正领会社会科学的真理。脱离了进步的阶级斗争的人，就今天来说，脱离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以美英帝国主义为首的一切反动势力的阶级斗争的人，以不问政治而自鸣清高的人，以少数上层人物的所谓修身践履行为而自满自足的人，留恋旧社会甚至于站在保守旧社会的反动立场上的人，要想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发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

（三）接近客观真理的辩证法道路

人们如何在实践中使自己的主观认识接近客观真理？毛泽东

同志指出，这是一个依循着辩证法规律的能动的发展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对于客观真理的接近，最初只能达到“感性认识的阶段”，“感觉与印象的阶段”，我们在工作中获得的初步经验，都是属于这一个阶段的认识。在这个阶段里人们的认识是比较低级的，即只能认识外界“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只有再经过“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与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产生了概念。”这时人们的认识“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这就是达到了“理性认识的阶段”。理性认识“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因为只有理性认识，才能使人们“了确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确它的规律性，了确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我们在工作一个时期之后，要把各方面的工作经验作一个总结，这就是为着要使认识达到理性阶段。但是，仅仅达到了理性认识阶段，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思想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的问题。“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如果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那就证明理性的认识已符合于客观的真理性。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或不完全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证明它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客观的真理性，就必须加以全部的或部分的修正。这就是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是认识的“更重要”的阶段。我们在工作中把经验的总结制定成新的方针、计划，再用来指导工作，就是使认识进入这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当然我们也还不可以把已

定的方针、计划看做绝对不可改变的东西，而常常要依据工作中所产生的结果来加以必要的修正。“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因为只有经过这一个“飞跃”，才能完全解决我们对于外界认识之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的问题。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这样写道：“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法道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把列宁所指出的这一条认识真理的“辩证法道路”作了详尽的阐述，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于真理论，对于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所给与的重要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发展，是与中国革命历史上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密切地结合着的。他总结了这些斗争经验，从认识论的基础上揭发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基本错误倾向之所以失足的原因。真理的认识必须是在实践中经过有规律的努力过程才能获得，不懂得这些必然的规律和过程，不承认对于真理的认识必须按照这些规律和过程采取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而以为可以采取任何轻便偷巧的态度，以为仅凭乍然一看或灵机一动，而不必准备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苦心就可以猝然获得，这种无知和侥幸的态度，这种思想方法上的机会主义态度，正是各种错误认识发生的根源。教条主义之所以脱离客观真理性，就是由于脱离了实践；就是由于脱离了实践基础上的感性知识；就是由于不懂得“认识开始于经验”这一个“认识论的唯物论”原理；由于不懂得理论都是从许多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个道理；由于不懂得必须“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

概念及理论的系统”，才能“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由于不懂得为了要取得丰富的感觉材料，就必须对于所要认识的对象及其周围环境作周密的调查研究，必须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从广大群众的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中去获取大量的各方面的间接经验，以补个人实践的经验之不足。这样才有可能对经验作出全面的总结。总之，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感性认识是接近客观真理的一个必要阶段，因此他们也就不知道应该从实践经验中去抽出反映客观现实的生动理论，而把“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或书本上支离破碎地抄引下来的现成条文当做公式到处乱套。这样就离开了接近客观真理的道路而走上悬空的主观主义的道路。

经验主义者又是从另一方面遮断了人们接近客观真理的道路，这就是不了解“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一个“认识论的辩证法”原理。他们以个人所有的一点点直接实践经验自骄自满，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轻视各方面的间接经验，不会有系统有组织地从事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学习各方面的经验，不知道把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改造提高使之成为理性认识的必要，不懂得总结经验的需要。他们把总结经验看做不能忍受的苦事，把阅读书籍学习理论误认为多余之举，把学习新的知识和应用头脑思考问题当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经验主义者的知识就停顿在狭小的低级的感性阶段，不可能认识事物的全体，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内部规律性，不可能在实践中“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掌握明确方针，看出远大前途，对于事物发展的客观真理是处在盲人的状况中。

这样，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离开了认识真理的辩证法道路。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

说,详细指明这条正确的道路,就给我们指出了避免重犯这些历史错误的明确方针。

(四)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毛泽东同志严格依据辩证唯物论的原理,指出认识真理的过程决不是一次完结的,而是永不停息地向前推移和发展的过程。这是因为真理的认识只能是客观事物过程的正确反映,而客观事物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与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与发展”的缘故。因此,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某一过程和某一发展阶段获得正确的认识之后,即便是在实践中受到了检验,证明其为完全符合于客观规律性的真理,仍然不能把它看做无条件的绝对真理。一旦客观事物的过程中间发生了新的推移和转变,就必须使自己的主观认识也跟着推移和转变,使之符合于新的客观过程的规律,因此,人们如果要使自己的认识经常保持客观的真理性,那就决不能在任何一个时候使自己学习的努力停顿下来,就要不断地跟着实践的发展前进,而使自己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也发展前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特别依据了革命历史实践的经验,来证明真理认识之不断发展的必要。他说:“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

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及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同志对于革命历史经验的这些总结，具体地发挥和发展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这一个原理：“真理和错误，象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着的逻辑上的范畴一样，只在极端被限定的领域内，才有绝对的妥当性。”这就是说，人们的主观认识，只有当它在实践中被证明经常符合于客观的情况的时候，只有它能够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客观情况的推移转变而推移转变的时候，才能经常保持它的客观真理性。这叫做“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们的认识如果一旦停滞不动，满足于已有的知识，把某一过程某一阶段的正确认识变成僵死的成见，不能跟着社会实践和客观过程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那么，原来适合于客观情况的正确认识就要变成脱离实际的主观空想，真理就要变成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由主观与客观的分裂，理论与实践分裂所产生的错误，就是革命的实践当中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右倾机会主义者是“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至于“左”的冒险主义，其特点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

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

毛泽东同志充分论证了真理认识之不断发展的必要，因此也就“深刻地说明了和发展了著名的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真理报》编辑部）。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

我们能够认识绝对真理吗？马克思主义者的答复是肯定的。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因此，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之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就是我们认识绝对真理的过程，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学习，只要我们经常不懈地从实践过程中，从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抽引出新的真理，来充实和发展旧的真理，我们就已经是亲身游泳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我们就能通过无数的相对真理来接近绝对真理。自然，这一个游泳的过程，是永远没有完结的，那是因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而“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那是因为绝对真理的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完结的、人类认识日益向更高程度发展的活生生的过程。因此，没有形而上学者所幻想的那种最后完结了的绝对真理。如果一定要勉强去设想和勉强去追求这种最后完结了的绝对真理，不愿意使真理认识的发展脉搏永不停息地跳动下去，不愿意把绝对真理当做“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来看待，不愿意承认绝对真理中同时包括着这个相对的方面，那就势必要把一切相对真理都夸大成绝对真理，把一些有限的活的知识变

成永远凝固的僵尸，然而客观过程和人类实践却决不是永远凝固的僵尸，而是永久向前发展的有生命的东西，这样一来，势必就要使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分裂，使理论和实践分裂，这就不但得不到真正的绝对真理的认识，甚至连相对真理也掌握不住，而所能掌握住的，就仅仅是主观的、经不起事实考验的、形而上学的愚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想要创造永久完成的绝对体系的哲学家，都是为着这个原因而在历史发展的前面无例外地宣告破产了的。就革命工作中的问题来说，教条主义者把某些抽象的公式当做最后完成了的真理，不顾一切条件、地点、时间任意拿来乱用。有些经验主义者把局部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坚持这些局部经验，不肯学习新的经验。这些错误思想，都是片面地坚持真理的绝对性质，而否认相对真理的存在，在各种实际工作中，是都要遭到严重的失败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这决不能得到另外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的结论，说一切真理归根结底都只是相对的，而没有任何绝对的性质。有一种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者，以为世界上的真理是没有任何绝对的客观标准的，只要人们主观上觉得是真理，就可以算做真理，因此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是非作为是非，而不必承认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是非，这就成为一种怀疑主义和极端的主观主义。列宁所批评的那些“经验批判论”者们，在实际上都有这种相对主义的看法。美国的实验主义是与经验批判论同类的哲学流派，它的所谓“实效考验”的真理标准，实际上也是一种主观的标准。例如对于美国的反动资产阶级，如果宗教迷信也能产生帮助他们维持统治和赚取利润的实效，他们就可以硬把宗教迷信看做和科学

同样有价值的真理。如果科学对于他们所要求的利益不能表现什么实效，那么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真理也要被他们当做谬误甚至于罪恶看待。这些相对主义的哲学流派自然是荒谬绝伦的。就革命工作来说，有些人以感想代政策，凭着主观上的临时的想法来解决问题，出尔反尔，前后矛盾，反正都自认为真理。有些经验主义者在各种零星的感性经验之间游移来游移去，无可无不可。这些错误都是在实际上把真理看做仅仅相对的，主观的东西，而否认了绝对真理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所承认的相对真理，决不是与绝对真理完全隔绝的。第一，它是“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因此它的真理性就有着客观的——绝对的标准，而不能由人的“主观上觉得如何”来随便颠倒是非的标准。第二，它的总和构成了绝对真理，因此它本身就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第三，它反映着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的一定具体过程，因此它在绝对真理的无限延长的链锁中是不可少的环节，我们不能象相对主义者那样割断真理的认识发展中的这一种历史联系，他们把真理误认为只是主观的、暂时的、偶然地孤立出现的，与它的过去和将来的人类认识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反映每一具体过程的相对真理，都是以前人类认识发展的结果，而同时又是以后进到“高一级的程度”的基础。要使我们的认识不断地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向前游泳，就必须善于取得在每一历史时期人类认识发展所达到的一切积极成果，作为更进一步跳跃的立脚点。教条主义者把过去已经获得的某些书本上的真理变成死的公式，来束缚着自己的手脚，以致失去了在生动的实践经验中向前跳跃的能力。经验主义者局限在当前的狭小的感性知识圈子里，不重视

学习理论，不认真读书，不能把人类认识已达到的真理的高峰作为自己跳跃的立脚点。两种主观主义的错误都使认识不能前进，障碍着人们向“高一级的程度”跳跃。

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里，曾经用“对症下药”的良医态度，告诉我们如何来反对这两种主观主义。这就是要使“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向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到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所给与的一个极重要的发展，是在于总结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这些历史经验，而创造了著名的“马、恩、列、斯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原理，作为我们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真理的基本方针，作为纠正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种偏向的一个思想方法的重心。懂得了这个原理，犯过教条主义毛病的人就知道不应该再去死记书本上的个别文句，并把它当做抽象的绝对的公式来限制认识的前进，而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学取那些普遍真理，也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应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所提出的各种新的实际问题。“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整顿党的作风》），以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另一方面，犯经验主义的人也就知道应该认真读书，以便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高自己的低级的感性认识，使之上升为有条理性，综合性的理论知识。

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马、恩、列、斯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号召了整风运动以来，在较短的时期里，就在基本上克服了许多革命领导干部中间的教条主义的毛病，也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经验主义的毛病，使革命斗争迅速获得伟大的胜利。《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将推动我们进一步去克服教条主义，尤其是克服经验主义，使一切参加革命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干部更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的长河中游泳，更善于担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使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术界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更光辉更伟大的胜利。

（文内凡未说明出处的引文都是引自毛泽东同志的
《实践论》——作者注）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

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

——在一个学习座谈会上的发言

各位同志！今天这个座谈会规定要我就《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问题提点意见。我本来想先听一听大家的意见，也就是先向大家学习一下，再来提自己的意见。但会议的程序已规定要我先讲，所以我只能凭自己所想到的、与我们学习的关系较多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谈谈。

我想讲以下的四个问题：（一）如何了解实践；（二）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三）在实践中来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问题；（四）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

现在先讲如何了解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把实践看做真理的标准，看做人类认识发展的基础。我们对周围世界一切事变过程的认识，都是通过实践获得的，脱离实践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专门读书，不问窗外一切世事的人，是不会有正确的知识的。所以《实践论》里批判了所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空话；这些道理，我现在不想再加解释，因为目前我们已有许多生动的实际例子，可以作为更有力的证明。

最近报上登载的许多大学教授和民主人士们参加土地改革后所写的很好的文章，都说明了土地改革的实践如何使他们获得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正确的认识。他们中间有些人过去也曾经是专门研究农民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的。但在没有参加土地改革以前，他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想法，是与中国农民的斗争情况并不一致的。而参加了土地改革回来以后，他们的认识就和从前大不一样了。从前他们都相信所谓“和平土改”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他们不能理解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到什么样一种程度。他们以为土地改革既然已成了人民的国家的法令，只要依法行事，地主阶级决没有不服从的道理。这些看法，如果只是关在房子里想一想，那似乎也好象是对的。可是，一旦走进实际斗争的场面上去，就很快看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了。参加了土地改革的先生们都看见了地主阶级并不是那么轻易地肯服从法令，并不是那么轻易地肯放弃几千年来传统的阶级特权。相反地，他们是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抵抗、阻止土地法令的实现，来保护自己的传统的特权。如果不发动群众，不经过群众的斗争，要想真正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这样，接触了实践，就改正了他们的“和平土改”的错误思想，使他们认清楚了土地改革的的确确是一系列的激烈的斗争。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在考察人类的认识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了解到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毛主席的《实践论》的开头第一段话，就指明了这个真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就不了解这一个真理，那些唯物论的哲学家，总以为人类的认识主体，好象是一面不动的镜子一样，只是消极的接受外界的影象，外界有什么东西，它就反映什么东西，而它对于外界则决不会起什么

能动的作用。这一种唯物论的观点，和人类认识的真实情形是不一致的。事实上人的认识决不是象旧唯物论所了解的那样的一种固定在什么地方，对于外界没有什么能动作用的镜子。人类是在自己的行动当中，在自己的社会实践当中去获得认识的。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能动地改变周围世界，也就在改变周围世界的活动当中来认识周围世界。只有依据实践行动，我们才能够证明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才能逐步地使我们不正确的认识改变为正确的认识。由“和平土改”的不正确的认识改变为土地改革必须经过斗争的正确认识，这是通过实践所获得的认识上的进步，不参加土地改革的实践行动，是很难获得这样的认识上的进步的。这就证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要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道理。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也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首先就是要联系实际。联系实际，就是说不能脱离实践活动。我们学习的目的，本来就是为着要使自己有能力来认识和解决实践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所以在学习中间就不能忘记经常注意各方面斗争发展的一切具体情况，以及斗争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们学习理论的方法，应该是要从学习中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帮助自己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以能否正确解决这些问题作为我们学习是否有成绩的标准。如果不是这样做，如果不注重领会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只是把书本上的某些条文当做公式死记在心，对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和具体情况不认真去注意研究，不作任何分析，就把自己的公式套在上面，那就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

列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我以为很值得我们学

习。按照列宁自己的说法，他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时候，是在跟马克思、恩格斯“商量”问题。这就是说，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首先要把一些实际工作里面的问题放在前面，然后去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是如何分析和解决的？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什么条件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所处的情况和条件跟马克思、恩格斯的时候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之下如何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了这类问题？我们在自己当前的情况下又应该如何应用同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正确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商量的方法，就是时刻不忘记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的学习方法。

就我们这个学习座谈会的一些经验来说，也可以看出什么是正确的学习方法。我们在一个时期曾觉得学习得不大好，但在有一个时期又觉得学习得比较好，觉得大家有了些收获。把这些情形拿来仔细研究一下，就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在我们觉得学习不好的时候，正是由于我们在学习中间忘记了联系实际，把抽象原则和名词上的争论当做了我们研究、讨论的主要内容。而在我们觉得学习得比较好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我们的学习能够联系了某些实践的问题。例如在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的时候，正值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开始发生不久，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对于这次战争的认识是很混乱的。我们座谈会里的许多人，对于这次战争的意义、它的发展规律以及发展前途的认识，也是很模糊的。这时我们就选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的部分章节作为学习唯物辩证法的主要参考材料，大家从毛主席的著作里来领会他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当时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条件，如何依据

这些条件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由此也就使自己能够尝试着来分析当前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所引起的战争的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所规定的战争发展的规律。这样就使大家对于这次战争认识得比较清楚了。象这样结合着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书本中找到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来加以分析研究，就是正确的学习方法。

这里必须提起注意的，就是我们必须正确地来了解实践。决不能说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作为正确认识的实践基础。我们要注意《实践论》中特别强调的是“变革的实践”。人类认识的发展、进步，是和变革现实的实践分不开的，也就是和改变自然的生产的实践以及改变社会的革命的实践分不开的。这里就有了认识的立场问题。我们能否坚决站在变革现实或改造世界的革命立场上，这对于我们之能否充分获得正确的认识，是有决定作用的。社会上的反动派、顽固分子，他们不能站在变革现实的实践立场上来看事物，因此他们对于世界的发展规律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立场问题的解决，在学习方法里面是一个不可少的要素。要想在学习中不断使自己的认识提高，就必须经常注意端正自己的立场，要经常注意使自己站稳改造世界的立场，要对一切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东西采取坚决反对、坚决斗争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任何同情、调和的态度。这也就是说，要在革命的与反动的、发展的与腐朽的、新生的与没落的对立势力之间，采取坚决的一边倒的态度。例如说要坚决站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一边，而对于革命的敌人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对态度。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一点动摇、含糊，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自己的认识上、思想上引起混乱。如果因为某个地主是我的亲戚朋友，他在土地改革中成了斗争对

象，我就对他发生了多少的同情心。那么，那怕只是一点点同情心，也就足以使我在这一点上失去了变革现实的实践立场，就会混乱我们对于土地改革的正确认识，就会对“和平土改”发生若干幻想。对一切反动派的被推翻，不能有任何怜悯的心情。这种心情对于客观事实来说是不公平的。对反动派的被推翻表示怜悯，就是对几千年来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残酷无情。有了这种心情，就是在精神上站在反对变革现实的一边，而不是站在变革现实的一边，在这样的立场上要想对于事物获得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们再谈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

我们在实践中对于世界获得正确的认识，是必须经过一定过程和遵循一定的规律的。并不是有了些经验，或读了些理论书，马上就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如果能遵循着认识所必经的过程和规律，来规定我们的学习方法，那么这种学习方法就是正确的，就会使学习顺利前进，获得积极的结果。如果违背了认识的必经过程和认识规律，那么我们的学习就会失败，就会得不到结果。

认识的必经的过程是：在实践中，第一步获得感性的认识，第二步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有了理性的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才比较深入，比较全面。这样的步骤，是不能乱，也不能少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步骤乱，就是指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人们的思想可以跳过感性认识的阶段，一下子就能够获得理性认识。《实践论》中所提到的那种哲学史上的“唯理论”者就是这样想的。教条主义者也是犯了这一种性质的错误，他们以为人的认识可以采取一种“一步登天”的偷巧办法，以为只要随便读一两本书，死记

住几段文字，就算是完成了学习的任务，就可以应用无穷，而不必首先接受许多感性知识，不必搜集材料，调查研究。这样的学习方法就是乱了认识的步骤，就是违背了认识的必经过程和规律，它只能把人的认识引到空洞错误的道路上去。

有了感性知识，还必须提高到理性认识，少了这个理性认识的步骤，以为只要有了一些经验，有了一些感性知识就可以满足了，那也是不对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认识停止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不知道进一步把许多感性经验总结起来，去求得较深刻较全面的理性认识，以致于使自己眼光受到狭小的经验的限制，不能够估计事态发展的前途，不能够看出行动的方针，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就只能盲目地应付眼前的事务，而不能有计划有条理地来指导工作。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有什么区别呢？感性认识就是对于一个个事件的表面的认识，有些人的脑子里有不少这种认识。你如果要他讲故事，他可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一段一段地讲个不完。可是如果你要求他把这些故事加以概括、联系，说出一套关于这些事件之所以发展变化的道理来，那他就会感到十分为难。一个个事件的表面的知识的堆积，是感性认识的一般的特点。这种认识是局部的、片面的，仅仅涉及到事物的现象，而不能够深入的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关系或发展规律。有些个别的感性知识，往往还会给我们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印象，我们根据这些印象来判断事情，就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因为个别的表面的事件，和事物的全体、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的发展规律常常显得并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如果只看到一个个局部的事件，就会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得不到正确的认识。人们为什么要错误地说武训也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因为他们只孤立地来看武训个人表面的苦行，而不注意他的行为的本质，不注意他的苦行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联系。因此就不懂得在实质上，在内部的联系上，这种苦行仅仅只是死心蹋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表现，而决没有任何为人民服务的意义。

我们还可以再拿朝鲜人民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的事情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在朝鲜的战事发生的最初一个时期，朝鲜人民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当时曾有一些人根据这一个时期的事实，作出了一种速胜的结论，估计这次战争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结。大家知道，客观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后来美帝国主义军队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遭到暂时的失利。当时有一些人又根据这一时的事件，作出了悲观的结论，说美帝国主义者似乎并不是纸老虎，而应该算是铁老虎了。（当然，他们所以作出这种结论来，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恐美病的主观想法。）大家知道，后来事实的发展又证明了，这种悲观的想法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想法，都是由于只看一时的一个个的事件，而没有进一步认识到事情发展的规律，因此就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就发生了思想上的混乱。这就是只有感性认识而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缘故。经验主义的认识错误，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引起来的。

这里可以附带说明为什么我们的思想上会常常左右摇摆的问题。在朝鲜战争初期，许多人的思想的确是左右摇摆不定。其原因之一就是只凭一个个事件的表面的感性认识来对事情下判断：今天看见一个顺利的事件，就作出了速胜的结论，于是就引起了盲目乐观的想法，明天又看见一个困难的事件，就作出了失败主义的

结论，于是就有了右倾悲观的想法。这样就没有任何把握来确定事情的本身究竟终于会向着什么方向发展了。有了这种认识上的毛病的人，在思想上行动上就只能跟着事情现象变化而随波逐流、游移不定，而不可能主动地掌握确定的方向。经验主义者的思想摇摆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停止在感性的认识阶段，而必须提高到理性认识的原因。只有把我们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阶段，我们才能避免为一个个事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够看出贯串事物全体的事物的各方面的内部关系，看出事变发展的规律。才能够依据事变发展的规律知识来确定行动的方向，才不会因为一时的事情的变化而动摇我们的认识。

理性的认识，是对于事物的全体，对于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认识。是要在瞬息万变的，表面上似乎十分混乱，十分动摇不定的一个个事件的现象堆积中，看出它的各方面的必然联系，必然的发展规律。一切事物，不管在表面上是如何千变万化，它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必然贯彻着一定的内部关系，一定的规律。正确的理性认识能够使我们具有预见事变发展前途的能力，使我们具有规定行动方针的能力，就是因为它认识了事物的这种必然的内部联系和必然规律的缘故。朝鲜战场上的情形，每日每时都包含着无限复杂的曲折和变化，仅凭感性认识来判断事物的人是免不了要常常迷惑、动摇的，但如果我们把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阶段，依据事情发展的基本规律来作判断，那么我们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朝鲜战争就可以得到许多确定的认识，例如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它一定会被我们打倒，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这个胜利的到来必须经过许多曲折，必须克服许多困难，必

须经历相当长的时间,等等。象这样的一些认识,就和前面所讲到的摇摆不定的对一个个表面事件的认识不同,它是概括了这个战争的全体的,掌握了它的必然的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如象今天我们很多人对抗美援朝已经有了的认识一样,就能够对于事变发展的前途作出明确的预见,就能够对于自己的行动有了坚定的方针。

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毛主席说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4页)感性认识只是一个个事件的表面的认识,而理性认识能掌握贯串事物全体的必然规律,这就是性质上的差别。要获得正确的理性认识,必须经过感性认识,必须有丰富的感性认识作基础,必须占有大量的事实材料,必须总结各方面的经验。必须把这许多感性知识、事实材料、实践经验加以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同上书,第260页),这样地进行一番思想上的改造制作的工作,然后才能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才能撇开那似乎是捉摸不定的一个个事件的表面现象的堆积,而抽出事变发展的必然规律。没有丰富的感性经验材料作基础,不可能抽出能概括事物全体的规律知识。我们中国的革命领导者能够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发展的初期,就指出上面所提到的这个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决不能证明理性认识可以不经过感性认识而凭空得来。相反地,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民在过去已经有了长期的十分丰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经验,因为我们的领导者一方面总结过了这些经验,另一方面又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各方面事实材料作过了周密研究,才能获得这样正确的理性认识。要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没有什么神秘的方

法或简便的捷径,唯一的方法就是占有十分丰富的感性知识材料,然后运用自己的头脑,开动自己的思想的机器,认真地、刻苦地来进行分析研究,就能够逐渐学会撇开表面上似乎十分混乱的现象,而抽出贯串在一切现象中间的,关于事物的内部联系和事物发展规律的知识。所谓“概念”,就其内容来说,就是能够概括现象全体的关于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知识。应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把这些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有条有理地集中地加以说明,就是理论。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篇文章,把中国革命由鸦片战争到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至于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前途等等作了概括的说明,并由此规定了我们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应采取的政策。如果仅只凭感性认识来叙述一个个事件,那么要讲完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以及将来的前途,恐怕写几百万字也讲不出个头绪来,但是《论人民民主专政》只写了八九千字,就能把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将来的前途以及今天中国人民斗争的政策方针作出了明确的概括的指示。这就是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优越的地方。学习理论,就是要学会这样来认识事物。就是要学会能够概括大量的感性认识,分析材料、总结经验,使自己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论的学习,自然不能不借助于理论书籍的研读,但这并不是说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着要死记书本的文句。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是我们的前人从他们的感性经验材料总结出来的事物发展规律的知识。我们读书的主要目的,乃是为着要参考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参考前人总结感性经验材料以达到理性认识的成果,来帮助自己学会把自己的感性经验材料提高到理性认识。如果没有书本、文件、指示的帮助,如果要直接凭个人的感性认识来了解问题,那么,例如对于朝鲜的战事,

我们就免不了要在很长的期间在思想上处于混乱摇摆的状态，而很难在较短的时期里认清楚它的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有书本、文件、指示的理论上的帮助，所以我们中国广大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觉悟就能够迅速提高，而在认识上比较顺利地由感性的阶段逐步上升到理性阶段。所以，我们研读理论书本的好处，只在于凭借前人的理性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较顺利地把自己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我们不能要求比这更多的东西。这样，我们学习理论的正确方法，就应该是经常把当前实践的各方面问题放在前面，把丰富的事实材料放在前面，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性认识放在前面，而在研读书本的过程中，随时努力尝试着参考书中所学到的理论，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来解决当前实践中所提出的各种有关的问题。应用这样的方法，来不断训练自己的思想能力，就可以使自己逐步地学习善于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善于分析事实材料，从其中抽出关于事物的内部联系和事物发展规律的知识。

现在再谈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的问题。

认识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的任务也正是为了指导实践，而决不是为认识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不能满足于感性认识，而必须使之提高到理性认识，只是因为唯有达到了理性的认识，才有可能使我们对于自己的实践规定出坚定的方针，正确的计划、方案，避免思想上工作上的混乱和摇摆，使实践的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而决不是因为有理性的认识使我们善于在嘴上讲一套好听的理论。所以毛主席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

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281页）对事物有了理性认识，就必须再应用它来规定工作的计划、方案，使之变为行动，才能够真正完成认识的任务。在学校里有些以专门教书为职业的人，往往只重视理论原则的说明，而轻视实行，这样就会把理论变为空谈，这样一来，那么，就是再好的理论也要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理论著作，没有不同时包含着一定的实践行动的方针、计划或方案的。只有资产阶级的学者的著作，才会要把理论限制在空谈抽象原则的范围之内，而不涉及任何行动的方针、计划和方案。所以我们学习理论，就不仅仅要学习借助于书本的理论，来把我们自己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而且还要借助于书本的理论，来学会如何应用自己所获得的理性认识，使之变为行动的方针，变为各种工作的计划、方案，使之能够发生指导实践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理论，如果只满足于理论原则的抽象空谈，那么，那怕我们所讲的是正确的理论原则，而在事实上还是用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方法毁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

只有把我们的理论知识变为行动，变为行动的方针、计划、方案，才有可能使理论知识获得检验的机会，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思想中的错误的地方得到改造，不足的地方得到补充，才有可能使我们思想符合于外界事物的规律性，符合于客观真理性。前面所举过的对于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事的认识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个道理。有些人读了几本书，记住了几个理论原则，或者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出了几条原则，就以为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拒绝进一步加以检验，拒绝把自己的认识加以必要的改正和补充。这是完全违背辩

证唯物论的认识原理的。我们的理论学习，不仅要借助于书本的理论把我们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而且要经常注意依据实践的结果，来考察我们的理性认识是否符合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以便能够改正和补充我们的认识，在学习方法里如果缺少了这一个环节，也是不行的。

不但如此，我们不仅仅要学会在实践中来检验我们的认识，而且还要学会在实践中来发展我们的认识，因为客观世界的事物是不断地发展的，不断地要由一个阶段一个过程向另一个阶段另一个过程推移，因此也就要在实践中不断要求提出新的问题和解决新的问题。所以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这就是说，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是永远向前，没有停止的，我们的实践也是永远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因此，我们的认识也应该是永远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不能停止在任何一点上。因此，我们的学习也应该是不断前进，不断地努力去发见新的事物和新的规律。如果我们满足于一定事物发展阶段的认识，而停止了学习新的事物的努力，那么，即使我们对于某一阶段的事物的认识曾经是正确的，一旦客观过程和实践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我们的认识就要变成错误的了。

这里附带再解答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认识会发生左右偏向的问题。前面提到的那种思想的左右摇摆，是经验主义性质的，那是由

于认识停止在感性阶段,因而被事物的片面现象所迷惑的结果。但即使我们已经获得了若干理性认识,如果把它绝对化,不跟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使之推移转变,不经常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去学习新的规律知识,那也就会在思想上和工作指导上发生或左或右的偏向,这就是教条主义性质的偏向。这就是说,如果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就会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如果戊戌政变时候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候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现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留有若干残余的影响,就会产生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另一方面,如果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幻想看作真理”或“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就会成为“左”翼空谈和冒险主义。如果有人希望中国今天就立刻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而不必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那就是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

这里联带再说明一下如何了解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喜欢在名词的表面意义上兜圈子,而不重视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的实质和精神。辩证唯物论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学说,其主要的精神,正是在于人对于真理的认识是永远不断地跟着客观事物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我们对于新事物的学习努力也永远不能停止。绝对的客观宇宙发展过程是无穷无尽的,反映这个客观宇宙的人的认识也就不会有最后完成的一天,因此绝对真理就是人类的科学知识的永远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过程,而我们对于事物的每一过程每一阶段的认识,都是相对的,都是绝对真理的无穷无尽的长河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如果我

们不愿意落伍或在思想上行动上犯错误，那就任何时候也不能满足于已经有的知识，而要不断地努力学习。这不仅我们一般人是如此，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一直到死学习不倦的。

最后再谈一谈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关系问题。

有些人问：“究竟应该先改造自己呢？还是应该先改造世界呢？”我们的答复是：要在改造世界的行动当中来改造自己。其理由，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实践论》，就可以明白。所谓改造世界，就是指变革现实的实践而言。所谓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是如《实践论》所说的，“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自从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制造了第一件工具起，人类就对自然界实行了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在阶级社会里，人类一方面进行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另一方面进行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行动。在这一切改造世界的行动中，人类开始对于客观外界只有感性认识，而不能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在这种情形下，人的认识能力是处于低级阶段，不能够正确地指导行动，因此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关系基本上说来是盲目的，被动的，没有正确的预见，没有可靠的方针和计划，在思想上行动上摇摆不定，毫无把握，因此也就不可能确实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当人们在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并加以总结，用思想上的改造制作方法从经验材料中抽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知识，把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阶段，这样就改造了自己的认识能力，能够深入地认识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本质。这样也就能够进一步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因为人们既然能够认识到事物内部联系和必然的发展规律，就能够依赖自己的认识来

指导行动,能够对事变前途提出正确的预见,规定出可靠的行动方针和计划,就能够避免行动上的盲目性、被动性,而能够比较自觉地、能动地来改造客观世界,能够比较确实地、有把握地完成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一般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的。

这样,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乃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行动的一个不可少的因素,是一切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人们必不可少的一个任务。凡是自觉地来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也应该经常自觉地注意来改造自己,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完成改造世界的工作任务。只有脱离革命实践的人,或者反对变革现实的人,才会拒绝改造自己。例如世界上的反动派,他们是坚决站在反对改造客观世界的立场的,因此他们也同样地坚决反对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有个别的人总认为改造思想是对被打倒了的反动派的事情,以为自己既是进步分子,就不需要再谈什么改造。而一谈到思想改造,就以为是耻辱的事情。这是完全错误的。对被打倒的反动派分子,我们是用专政的方法,用强迫劳动的方法逼使他们进行改造。而在进步的人民中间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是为着实现改变客观世界的任务而进行一种自我教育行动。前者和后者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情。人民中间的自我改造,是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用学习、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的。这种改造既然是人民自己为了改造世界所不可少的一个任务,因此应该而且可能成为自觉的运动。但是,当一个人还没有认识到改造自己的必要,当他有了错误而又不能勇于改正的时候,那就不可能实行自觉的思想改造,那就必须经过严正的批判来推动他进行改造。这就是要首先通过多少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使之进入自觉的阶段。学习理论,就是一种思想

改造的工作,所以,在学习当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是决不可少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学习》杂志
第四卷第四期)

为什么要批判和克服“功臣”思想

——关于“为什么必须克服‘功臣’
思想”问题的讨论总结

一

关于“功臣”思想的讨论，已继续了八、九期了，各地读者们热烈地参加了这个讨论，并且寄来了很多的文章，证明这个问题是比较受到普遍注意、需要认真解决的实际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周围正开展着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以及各方面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对反革命的斗争仍然是尖锐的，革命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在这些斗争中，中国人民继续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而且毫无疑问的还会要获得更多的胜利。能够获得这些胜利的原因，当然要归功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其中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许多老干部的骨干作用以及大

记了这一点，对于问题就难于获得正确的了解。

但是，在某些较老的干部中间，情形却不一样。他们失去了革命者和共产党员应有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他们似乎已看不见眼前还有着激烈的革命斗争，更不知道准备将来继续进行长期的战斗。他们开始忙着来盘算私人的利益，把革命的胜利，看做是个人的“功成名就”。“在山沟沟里转了十年，总算是熬出头来了”。现在似乎已到了个人“出头”的时候，对革命有“功劳”或者“苦劳”的人，似乎应该获得高人一等的特殊权利，因此就要把个人的地位、“等级”、待遇、享受等等的问题作为考虑一切的出发点，而把人民的利益、革命的需要、工作的要求放在一个不重要的地位上了。有着这种思想的人，他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的事实情况是不一致的，因此就要和周围的环境发生种种矛盾，就要在工作上，生活上遇到许多“不顺利”或不满意的事情。他们就不能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就不能对周围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对新的工作干部建立团结友爱的关系，而相反地要闹种种不团结的纠纷。他们就要对抗组织、独断独行，情形严重的，甚至会走上腐化、堕落，以至完全离开革命队伍的道路。这就是某些干部中“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的情绪”的表现，就是“功臣”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的存在，在我们革命的老干部中间不是主要的事实，但也并不是个别的事实，是在各个地区和各种工作岗位上，都多多少少存在的事实，是不利于人民，不利于革命，不利于工作的事实。

这次大家所讨论到的李龙同志的思想，是不是属于这一类思想呢？所有参加讨论的来信，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否定的答复，而只有肯定的答复，这是正确的。虽然也如《学习》三卷七期《编者按》所说，这“还不能说是一个典型”，或者更正确一些说，这还不是表

现得最严重的情形。但它之属于这类对革命有害的思想，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是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应该“加以克服”的。参加这次讨论的来信，绝大部分对于这一点都提出了肯定的意见，这也是对的。

对于李龙同志的来信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一类“功臣”思想，我们应该怎样来加以批判呢？在这个问题上，参加讨论的读者们已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我没有更多的新的意见，只能把这些正确的意见综合起来，作一些概括的说明。

二

我以为首先值得批判的，是这种思想中所包含的一系列对于革命的错误看法：

“功臣”思想中所表现的对于革命的看法，是非马列主义的、非工人阶级的。它的第一个特点，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看做就是革命的“完成”。有这种思想的人，似乎觉得今后革命的时期已告结束，而开始到了享受革命果实的时期了，他们以为过去参加革命的人“熬”到了今天，已经算是功成名就，因此在精神上就不再准备继续学习，继续求进步，继续认真地向前战斗了。这种错误的观点的存在，可以拿李龙同志对新干部的那种特殊的看法作为证明。他似乎以为新干部参加进队伍里来，并没有什么革命的工作可做，而只是“把咱们用血肉换来的胜利果实，让他们不劳而获地享受”。这就是说，不管“功劳”也好，“苦劳”也好，都由“咱们”在过去付尽了，今后“咱们”就不必再准备为革命付出更多的辛劳，当然就

更用不着再“劳”新干部了。这种思想是如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只要想一想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按照工人阶级的立场来说，革命的最后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只有等到实现了这个目的，才可以说是革命的完成。在这中间，我们还要肃清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残余，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消灭国家。这仍是需要长久斗争的革命过程。现在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使我们能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政权，这只是我们创设条件来争取完成全部革命过程的开始；不但就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意义来说革命并没有完成，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也还没有彻底完成。我们的胜利成果和我们的远大目标之间，还有着很远很远的距离，还需要通过很多的斗争。斯大林同志也曾说过：“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愿意辱没自己的光荣称号，不愿意离开工人阶级的立场，那就必须时刻记住自己肩上所分担着的无限远大的任务，就必须坚决反对让那种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来腐蚀自己的革命精力，就必须准备继续不断地向前战斗，就必须唾弃那种希图坐下来享受的堕落思想，就必须认真团结新的干部来扩大人民中间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归根结底，就必须批判和克服“功臣”思想。

“功臣”思想中所表现的对于革命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非工人阶级的看法，其又一个特点，是在于把革命看做少数英雄豪杰“打天下”的事业，而忘记了那是广大人民自己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他们的思想违背了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

忘记了革命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广大人民的斗争和人民领袖的正确领导，而一个干部的个人努力比起人民的伟大事业来只能算尽了大海中的一滴水的作用。他们过分地重视了个人的“功劳”或“苦劳”的意义，把少数干部十几年的斗争历史看做革命胜利的主要决定力量。他们不知道个人的“功劳”或“苦劳”虽然有它一滴的作用，但就是这一滴的作用也只是因为寄托在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大海中才能够发挥出来，而离开了这个大海，个人就会一事无成。一切“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的干部的错误思想根源，都是由于不能够用这种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革命事业，而是以“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论观点来看革命事业，并且他们在实际上就把自己看作是造时势的英雄。这就使他们念念不忘自己的过去的历史而不能耐心地学习今天的新的工作；这就使他们轻视联系群众，轻视团结周围的工作干部，尤其不屑于团结新参加的知识分子干部；这就使他们经常希望凭着个人的兴趣、个人的意志来行动，而以工作中受到一定的组织领导的限制为苦事；他们经常会觉得组织所分配的工作都不符合于自己的兴趣和愿望，而到处感觉到“不顺心”；他们对学习则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不屑于和新的干部以及比自己工作地位低的干部一同学习，而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学习看做是奇耻大辱。总之，他们是把自己沉溺在个人的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光辉中，以致于在新的人民革命事业前面就失去了进取的能力。有着这种思想毛病的人，如果不认真地加以批判和克服，那么，不管他们在过去有什么功劳，有什么光荣的历史，都将有变成历史的落伍者，变成新的革命事业中的废物的危险！

“功臣”思想所表现的第三个对于革命的非马列主义、非工人阶级的看法的特征，就在于用封建的等级观点来看革命秩序，用封

封建的特权观点来看干部的工作地位。他们既然把革命事业看做是少数干部“打天下”的行为，而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是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从事工作，因此，其逻辑的结论就是一切“打天下”有功的干部，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应该按照旧封建时代的历史传统习惯获得高人一等的地位，都应该享受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权利，因此就不能忍受与一般干部和人民处于平等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比某些新干部较低的职位。他们带着一种身分的优越感、带着一种要求“封爵赏赐”的情绪（如有些参加讨论的同志所指出的）来看自己周围的工作关系和干部关系。如果自己的工作职位不能满足这种优越感，他们就要大发牢骚，说工作分配不适当，上级不肯照顾和不给以信任，等等。这种封建的等级思想和特权思想，是“功臣”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资格”的问题又占有着第一等重要位置。所谓资格，按照封建传统的看法，又是主要地或甚至单纯地强调着时间的因素，而把其他因素放在次要的或不重要的位置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山沟沟里转了十年，总算熬出头来了”。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只要有“苦劳”，只要“熬”十年，这就是主要的事情，至于“十年”的“苦劳”，对于人民有没有贡献，或有多少贡献，都是次要的问题，能够“熬”到一定年限，“资格”就“熬”出来了。有了“资格”，就有理由要求在工作地位、生活待遇等方面首先受到特殊的照顾。例如选择干部，是应该依据“才”和“德”的标准呢？还是应该依据“资”的标准呢？按照有“功臣”思想的人的看法，如果遇到“德、才”和资的标准有矛盾的时候，就不能不牺牲一些“德”和“才”的标准，来迁就资的标准。这就是说，在形式上是三个标准，而在实质上是要求首先照顾“资”的标准，这就是认为革命工作的负责职位只是有“资格”的人们的独占品，而对

干部分配工作就首先应该是为着满足这些人的特权利益，而不是为着革命工作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思想对于革命工作的危害，是很显然的。又例如学习问题，是应该按照个人的文化、理论水平的条件来组织，或者是按照“资格”来组织呢？有“功臣”思想的人不屑于与职位比自己低的干部一起学习，因此就不同意只按照文化、理论水平的条件来组织，而坚持也要照顾资格。这样，如果遇到文化、理论水平的条件和资格的条件有了矛盾的时候，那就不能不牺牲文化、理论水平的条件而来迁就“资格”的条件；某些干部文化理论水平较低，仍然要按其资格把他们组织在较高的学习组里去，这样，在实际上仍然是等于按“资格”的条件来组织学习。如果照这样办了，不用说就会使一些学习组织成为有“资格”的人们装门面的形式，而不能发挥其提高干部的文化、理论、政治水平的作用。这对于干部的进步以及工作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以上就是“功臣”思想中所包含着的一系列对于革命的错误看法，这些看法与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完全相反，而只是混合地表现着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剥削思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干部，如果有了这一类错误思想，就应该坚决地对自己进行思想的改造，把这些错误思想彻底肃清，而不应该容忍它保留在自己的头脑中。但是，有“功臣”思想的人，又常常以为思想改造只是非党员和新干部的事情，而对自己则以曾经经过长期锻炼和整风运动为理由，认为不至于再有什么错误思想需要加以改造，因此就拒绝对自己作任何的检讨。这当然是错误的，这不是真理，而只是一个阻碍进步的包袱。中国的革命干部，大部分是从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非工人阶级出身

的，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各人都带着许多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愿望，就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也还是免不了要受到其他阶级的思想影响。加入共产党，又经过若干时期的斗争锻炼和整风运动的教育，一般地在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方面无疑地会有很大提高，但这决不等于说就能够把非工人阶级思想彻底肃清了。由于过去紧张的斗争环境不容许干部们有充分学习的机会，整风运动的深入程度在各个地方也极不一致，因此，象李龙同志这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而在自己头脑中保留着许多非工人阶级的错误思想，是并不奇怪的。他们之需要从头来学习中国革命基本知识以及作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的知识，也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在革命获得全国胜利之后，通过复杂的城市生活关系，通过旧的亲戚朋友的关系，更多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以至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还会在无形中进一步来包围革命工作的干部，如果不加以注意和警惕，就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它的影响，就会在它的影响之下使我们原有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由此可知，思想改造的工作决不仅是非共产党员和新干部的事情，也是共产党员和老干部应该经常对自己进行的工作。而有“功臣”思想的人，尤其应该认识到这个真理，并认真地来实行这个真理。

三

某些参加讨论的同志，认为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干部应该受到尊重和必要的照顾，并且指出干部中间应该建立新老干部亲密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正确关系，这当然是很对的。但

是,对于有着“功臣”思想的干部,不可能依靠尊重和照顾来克服他们的错误,而主要只能依靠他们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改造。一部分强调要照顾“资格”的同志,就是由于还不能够明确地认识这个真理。尊重和照顾,是不可少的,但必须在一定的原则范围之内。尊重干部,决不是说对于他们的错误的思想可以作任何的迁就,照顾干部,决不是说可以做到牺牲革命工作和人民的利益来满足某些人的不合理的要求。错误的思想和正确的革命原则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干部如果不能放弃自己的“功臣”思想,那么,即使从周围受到了必要的尊重和恰当的照顾,这种尊重和照顾对于他仍然是不能理解、不能满足的。因此,除了批评和克服他自己的功臣思想之外,决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矛盾。为着更具体地来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再把讨论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提出来谈一谈。

第一,关于工作分配的问题。按照有“功臣”思想的人们的希望,分配工作必须首先照顾历史,必须依照“资格”的标准来选择干部。这就是说,一切革命工作历史较长的人都必须摆在较负责的地位上。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因为要考虑到“德”和“才”的条件而不这样办,那就不可能使他们满意,而他们就要认为没有受到必要的照顾和信任,就要发出“老干部不如新干部”,“工农干部吃不开”等等的牢骚。如果为着使他们满意,而这样办了,那又要使许多工作岗位占据着一些不称职的人,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失。对于干部的“照顾”,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牺牲了革命和人民的利益,来满足少数干部的不合理的希求吗?当然是不能的!有些人以为这样“照顾”也不会有什么妨害,理由是一切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干部,他们的“德”和“才”也一定经过了考验,因此他们就

不会不称职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正如范若愚同志的文章所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在一般的情形下是适合的，但是，对于有些个别人来说，它就只是不符合事实的空话。特别是在革命胜利的情形下面，许多内容复杂、规模庞大的新的工作任务提到了革命的日程上，在这些任务的前面能够不大胆提拔一些的确忠实积极而又对于这些工作有着必要的经验和能力的新干部吗？当然要提拔的。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就只能够以“德”和“才”作为唯一的选择干部的标准，而对于“资”的条件，就用不着给与任何的照顾。这样，在分配工作的问题上，除了让有“功臣”思想的干部放弃他们的那种关于“资格”的特权思想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使他们满意呢？

第二，关于生活待遇问题。如果说在分配工作的问题上不可能把“资格”作为选择干部的一个标准，那么在生活待遇的问题上，却可以适当地照顾干部的历史条件，而且随着国家财政经济向前发展，逐渐给以更多的照顾，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是，这里也仍然要首先考虑到革命和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按照干部们的一切需要来决定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仍然还是处在恢复的过程中，还要要求许多干部再忍受一个困难的时期，即使逐渐有所照顾，也仍然要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出发，而不能从有“功臣”思想的人们的愿望出发。这样，如果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那种特权思想，不能够觉悟到应该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那么，目前所能给与他们的任何照顾，都将不可能是使他们满意的。

第三，关于学习问题。对于工农干部的学习上的照顾，目前我们的政府是用了教育方面的最大的力量来举行的。正如有些同志所指出，两年多来新成立的许多工农干部学校和学习组织，如人民大学，工农中学，工农夜校等等，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各种工作机

关中的业余学习组织,也对于工农老干部有必要的照顾。有了这些学校和工农学习组织,今后的工农干部将大批地在文化、理论、政治水平方面迅速得到提高,他们将学会各方面的国家建设的新的业务技术知识,并因此逐渐有能力担负许多更为重要的工作。这些情形,在旧社会里的工农人民是做梦也难想得到的。这是工农干部得到重视、照顾和信任的事实表现,这说明工农干部在新的社会里不是“吃不开”而是十分“吃得开”。但是,如果有“功臣”思想的人不克服自己的许多错误想法,那他们对于国家的这种重视、照顾和信任也仍是不能领会的。他们不相信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的各种基本理论对于自己是十分必要的事情,是能够为自己的将来的工作开辟远大前途的好事情。相反地,他们倒以为学习会伤害自己的优越感,把它看做是辱没自己的干部身分的可耻的事情。这些荒谬的想法如果不坚决地加以批判克服,他们就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国家的这种照顾的好处,永远也不可能向前进步,这是谁也容易明白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学习》杂志
第四卷第五期)

《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在今年一月里，中国新哲学会曾就《实践论》开了两次座谈会，对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历史上的某些认识论学说作了一些批判的研究，并由北大哲学系和清华哲学系分别写了两篇文章（清华由冯友兰先生执笔），登载在《新建设》三卷六期和四卷一期。这两篇文章，检讨了认识论上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中国哲学史上的知与行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认识与实践的问题；二，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问题，也就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的问题。这两篇文章是吸收了座谈会上的一部分意见修改后发表的，其中分析了过去各派哲学对于以上认识论基本问题的解决的片面性，也检讨了过去学校里哲学教学的某些缺点。这里面有许多很好的意见，是值得我们来作为学习实践论的参考的，但也有某些论点，还值得从新考虑。哲学史的问题非常复杂，要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它所包含的一切丰富内容作出正确的结论，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以及从事其他方面科学理论研究的人共同作一个长期的努力，才能完全达到目的。我现在也只能就这两篇文章所接触到的一部分问题，提出一些个人学习中所想到的意见，作为大家进一步研究讨论的资料。

《实践论》解决了什么问题？

首先值得提出来谈一谈的问题是：《实践论》作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呢？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中外哲学史上所不曾解决或不能完全解决而在《实践论》里充分解决了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次座谈会中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北大哲学系的文章第二节也提到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世界本身的发展是一致的，是客观世界的真实的反映，所以一定能够解决问题。而一切旧哲学由于它是唯心论或形而上学，所以一定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究竟辩证唯物论和《实践论》所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在北大哲学系的文章里却还没有明确的说明。所以在这里就需要说明一下。我想，《实践论》所充分解决了的，就是如何在我们的变革实践的行动起来克服主观盲目性的问题，如果引用《实践论》上的话，那就是从思想方法上来解决今天无产阶级历史地所担当的“正确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任务”的问题。指明这一点，我以为是很必要的。这对于我们学习《实践论》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和研究工作中来应用《实践论》，都有很大好处。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写作，是为着从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来反对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而不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共同的危害性都是在于使革命运动的指导者对于周围事变的客观规律丧失了正确的认识能力，因而就把实际斗争引向盲目乱撞的绝境，使革命和人民遭受很大损失以至于遭受失

败。革命历史上的许多错误，右倾机会主义与“左”的冒险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都是认识的盲目性的不同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斗争历史中，不断地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也就是不断地和各种认识上的盲目倾向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正确地揭发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各方面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具体规律，使中国革命获得了自觉的、清醒的指导，终于走向胜利。因此，《实践论》，作为科学的思想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一般地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结合的认识论的总结，特殊地说，就是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克服各种盲目倾向的斗争经验的哲学总结。这个总结全面地揭示了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发展的普遍的规律：人类通过自己的变革实践，如何由不认识到认识？如何由事物的片面的、表面的认识进到全面的、本质的认识？如何克服错误而达到正确的认识？《实践论》就是由于揭示了这些规律而在理论上彻底解决了如何克服实践行动中的盲目性的问题，并因此为各方面的革命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端正思想方法和提高工作的锐利武器，如果我们通晓了这些规律，掌握了这个武器，就可以应用它来正确解决我们的各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使之能够获得自觉的、清醒的指导，而收到最大的成效。这正是一切工作岗位上的人们必须从《实践论》学习的中心课题。目前我们的各种革命工作中有没有盲目性存在呢？应该肯定地说是有的。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各个时期各个工作部门的重要政策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具体工作的内容是十分复杂，新的事物是层出不穷，因此，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人，由于不能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而在认识

上行动上陷于盲目，这又是常常可以看见的事实。工厂管理中不注意经济核算，基本建设事业中的盲目施工，对工人农民宣传教育中脱离政治的庸俗的资产阶级倾向，思想改造工作中敌友不分的“左”的倾向以及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的右的错误态度，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在眼前可以看到的各种工作中的盲目性的一部分例子。学习《实践论》，必须把它应用于当前的实际，来克服各种工作中的这种盲目状态。我们从报上读到一些同志的文章，他们应用《实践论》的理论来检讨了自己的工作部门的问题，这些部门涉及到农业、工业、医学、工程建设、政法、经济、历史、文艺、以及其他理论的和实际的方面，这些文章虽然还只是表示一种初步的努力，但在企图应用《实践论》的理论来克服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中的盲目性这一点上，方向都是正确的，并且是有收获的，是值得进一步加以发展的。就哲学研究工作来说，即使是作历史的检讨，也应该使我们的研究服从于一般学习《实践论》的这一个中心课题，即是一方面要借《实践论》的学习来克服我们哲学研究工作本身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所造成的盲目性，另一方面又要使我们的研究有助于各部门的革命工作者来掌握这克服盲目性的科学武器，我想这应该是哲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对于过去哲学学说如何估计？

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哲学学说，我们应该怎样来加以估计呢？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曾经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但

是现在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既然过去的哲学学说仅只是说明世界,那就可以了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问题,如何克服人类的变革实践行动中的盲目性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上都没有得到解决,甚至于没有把它当做问题提出来。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哲学学说都仅仅是错误,而对于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呢?我想是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的,对于历史上的唯物论哲学,尤其不能采取这样的看法。说过去的哲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并不等于说过去哲学在历史的发展上没有向着这个问题的解决接近。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同时又是人类思想发展史的最高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出现,并不是和过去哲学的发展没有历史联系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毛泽东:《论新阶段》)我们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一切过去哲学的根本区别,我们强调唯有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才能成为科学的思想方法,但决不能因此就对于过去哲学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就这一点来说,北大哲学系的文章里有些论点的提法,是还值得商榷的。例如在这篇文章里,有这样的一些话:“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认识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错误的认识论”;“在旧哲学史中的一切改变,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式的”。在这些话里面所包含的问题是,第一:没有注意到过去哲学历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原则的不同,而把“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笼统看作同一个东西;第二: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许多哲学学说里,特别是唯物论哲学里的某些合理的因素,而把一切过去哲学的认识论看做仅仅是不同程度的错误学说,这样单纯消极的提法,无疑是片面的,是违背历史观点的。

为着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顺便把人类历史的特点作一些简单的回顾。

人类脱离动物状态，是开始于以自己的劳动进行生产的时候。人类的生产劳动与动物的求生存的活动是根本不同的，那就是人类的生产劳动中间，就包含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特点。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完全以自己本身的状态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以自己之改变自然界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来统治自然界。这便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主要区别，而引起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这里说的“以自己之改变自然界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来统治自然界”，就有着“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意义，这个特点，是从人类最初学会制造工具从事生产的时候就开始具有了的。制造工具这件事情，就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基本的行动，那怕是最粗糙最简单的一把石刀，要能够制造出来，就必须对于外界事物（石头）的性质有若干的正确认识。动物不能制造工具，就是证明动物还不曾具有人类的这种认识世界的能力，就是证明动物的求生存活动是完全处于自发的盲目状态。这样，就认识方面来说，人类是由于与动物的盲目性斗争获得一定胜利才开始了自己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人类改造世界的最基本的行动是生产，在生产行动的基础上，人类一方面不断地改造着自然界，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改造着自己周围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即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人类同时又不断地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实践论》）。这就是说，提高自

己对周围世界的认识能力，使自己愈更全面愈更深刻地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因此在实践行动中就愈更减少其盲目性，愈更能够准确地“改造自然界来服从自己的目的，来统治自然界”（对于社会的事物也是如此）。

这样，人类的历史，单就认识世界的一方面来说，也就是为克服盲目性而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是经过长久的年月才对于自然界方面逐步获得较大的胜利，而对于社会方面的认识的盲目性的克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恩格斯说：“如果我们需要几千年的劳动才学会我们的生产行动底较远的自然的结果，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较远的社会的结果就更要困难得多了。”（同前）所以，直到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对于竞争、经济危机、战争等等社会现象，还是处在盲目的动物状态。对于社会的认识为什么“更要困难得多”呢？这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里就可以得到明白的解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哲学，即关于宇宙观及认识法则的学问，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出现的呢？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人类最初对于宇宙全体和自己的精神、认识能力的了解，是带着宗教迷信的形式的。当人类的生产发展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特别是手工业和农业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分工的时候，当人类的生产力已发展到能够提供相当的剩余生活资料，足以使一部分人有可能脱离劳动的负担，而从事比较有系统的研究活动的时候，也就是在阶级社会发生之后，人类的进步的阶级就能够获得较为完整的许多关于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以及若干社会历

史的知识，而使人类自己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斗争中进入一个较高的阶段。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就有可能对于已获得的这些知识加以概括和总结，而达到关于世界的全体以及人类认识本身的较为合理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唯物论的世界观会冲破原始的宗教迷信而崛起起来的道理。

所以，唯物论的世界观（以及实质上具有唯物论性质的辩证法的世界观）的产生，是人类为着认识世界而和自己的盲目无知进行斗争的胜利成果。什么是唯物论？恩格斯说得好：“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份。”唯物论的发展，表示着人类愈更全面和愈更深入地认识了世界的本来面目。自然科学的每一种新的伟大发见，都使唯物论获得新的面貌，社会革命的一定的前进阶段，也会把唯物论推进一步。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上可以看到，唯物论并不是一开始出现就能够获得完全胜利的。由于过去长时期间人类生产活动的规模始终是很有限的，从而对于自然的科学认识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对于社会更是如此），又由于过去长时期里主要的掌握科学和哲学知识的人始终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范围，因此，过去的唯物论，不论古代的唯物论以及近代资产阶级的唯物论，都有着片面性的缺点，因而它就没有能力彻底摧毁宗教迷信的世界观，以及在实质上与宗教迷信相通，而只是在精巧的合理的外装之下表现出来的唯心论的世界观。我们从哲学史上看见过去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唯心论，这些唯心论代表着各种各样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代表着人类中的反动腐朽的成份以及对反动腐朽势力妥协投降成份，代表着这些人们的崇拜盲目性、拥护宗教迷信或在盲目性前面表示低头屈服

而没有勇气对它进行斗争的倾向(例如不可知论)。这些唯心论在哲学史上与唯物论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由于过去的唯物论本身的弱点以及剥削阶级始终居于统治地位的客观条件,使得唯心论有时还战败了唯物论。

这样,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哲学的历史,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党派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集中地表现了人类对于周围世界的愈益前进的科学认识和愚昧无知的斗争,表现了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行动中愈益提高的自觉性与盲目性的斗争。而最后由于大工业的无产阶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出现,人类才掌握到了足以彻底克服主观盲目性的最完善的科学武器,使唯心论世界观不能不遭到完全的破产和最后的失败。目前人类的思想发展,就是到达了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彻底战胜唯心论世界观的阶段,正如目前人类的历史发展,是到达了无产阶级推翻一切剥削制度或“整个儿地推翻世界与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面”(《实践论》)的阶段一样。还在六十年前,恩格斯就说: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正确理解自然规律,并认识我们的干涉在自然行程中的较近或较远的效果。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发展以来,我们就愈益能够预见至少是我们最普遍生产行为底较远的自然效果,因而也学会来统治它们。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就愈会不仅感觉到而且还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从希腊古典时代崩溃以后,在欧洲所发生并在基督教中最高度形成的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自然辩证法》)

这自然并不是说，唯心论的思想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完全消灭，而没有任何影响了，恰恰相反，世界上还有反动势力存在，因此他们就要继续用各种方式来坚持唯心论和迷信愚昧的说教，美国实用主义者（主观唯心论的一种）杜威等人所吹嘘的什么“世界主义”，就是近年来代表帝国主义反动方向的唯心论思想的一个具体表现。同时，人民中间还包含着非工人阶级，因此在实践中还要不断地产生各种自发的盲目倾向，这样就仍然要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在中国，随着人民的胜利和蒋介石的反动王朝的被打倒，辩证法唯物论已成了国家的领导思想，而以歌颂愚昧盲从作为唯一内容的极端唯心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法西斯“哲学”，就没有合法存在的余地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神秘思想和唯心论哲学，片面性和盲目性，还在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工作中起着不小的危害作用，用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用《实践论》的科学武器来批判这些唯心论和盲目倾向，也是今后长时期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可以相信，这些斗争是一定能够得到完全胜利的。

由此可知，在估计过去哲学历史的时候，如果不把唯物论和唯心论加以区别，而简单地一律称之为错误的哲学思想，是不符合历史的实际的。如果再加上这样的前提，说：“错误的认识论终归要引起错误的实践”（北大哲学系文），那么，过去的唯物论哲学以及实质上有唯物论性质的辩证法思想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都将无法说明了。诚然，过去的唯物论都有它的缺点和错误的方面，但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存在，并不是由于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有任何不对的地方，而是由于唯物论的原理得不到全面的贯彻，——例如古代自然发生的辩证唯物论，由于科学研究还很幼稚，仅仅能

对自然界的总的轮廓作一个唯物论的概观，而不能对自然界的各个部分贯彻唯物论的认识；近代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唯物论，仅仅对自然现象能够给以唯物论的理解（这种理解也是机械的），而不能把唯物论扩张到社会现象的认识上。——至于就唯物论原理本身来说，那么，它的发展的每一步，都表示着人类认识世界前进了一步和对于盲目无知的斗争得到了一个新的胜利。过去的唯物论，诚然都没有在认识论上解决了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但唯物论的发展，是一步步向着这个问题的解决接近，这却又是不能忽视的。

北大哲学系的文章是从自我批评的态度出发，说：“我们旧大学中一向主要讲授着错误的认识论思想”，这样的态度，无疑问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能够指出，这里所说的错误的认识论思想，主要的是一些唯心论、不可知论的或神秘主义的认识论思想，那么，这个自我批评就会令人觉得很圆满了。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与 旧唯物论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的缺点，除了没有把它的根本原理彻底贯彻到人类世界认识的各方面之外，还由于它在认识论方面是片面的。这个片面性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如果把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拿来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认识论作一比较,就更容易明白后者的内容是多么片面的了。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最全面、最彻底地概括了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如在《实践论》里可以看到的,它应该是包含着以下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承认认识的客观物质性;主观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物质首先通过感觉为人所认识,正确的认识必须是有“客观真理性”,必须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份”;(二)承认认识的社会实践性,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三)承认认识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开始于在实践中获得感性的认识,但感性认识只是认识的低级阶段,人的认识还要由低级阶段的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高级阶段的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的实践;(四)承认认识在实践中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由这些特点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如何丰富地全面地概括了人类认识的内容。这样丰富的全面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任何一种哲学认识论——各种唯物论的认识论在内,所远远赶不上的。如果研究一下哲学史,就可以看到,任何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都是仅只能够抓着辩证法唯物论所概括了的那些人类认识特点的一部分或一方面,也就是说,这些哲学学说,都只能片面地了解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而从来没有对它获得全面的了解。至于唯心论哲学的认识论,则主要地是把认识的能动性这方面孤立地过分夸张起来,由此来抹煞、

歪曲或颠倒了其他的特点——特别是抹煞了认识的客观物质性这个特点；而一切唯心论认识论的共同本质，就在于否认了认识的客观物质性。

如何区别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唯心论的认识论？这是在检讨一切旧哲学的时候必须首先正确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认识论，虽然和唯心论的认识论同样有其片面性，但两者在人类认识史和哲学发展史上是居于互相对敌的地位，而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这在本文的前节里我们已经讲过了。辩证唯物论和唯心论相区别的最根本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以为，不论就哲学一般来说，或单就认识论来说，这个根本的标准，就是恩格斯早已指出过的：如何看待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承认客观、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东西，而主观、精神、思维是第二性的东西，这就是唯物论哲学，相反地，把主观、精神、思维放在第一位，而把客观、物质、存在放在第二位，这就是颠倒了事物关系的唯心论哲学。同样，就认识论来说，承认客观、物质、存在是认识的基础，而主观、精神、思维是前者的反映，并且相信人的认识主观有正确反映客观物质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凡是这样来解决问题的，就是唯物论的认识论。相反地，如果不能这样来解决问题，而认为认识不必以客观、物质存在为基础，知识是由人的主观、精神、思维的本性里直接产生出来的东西，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前者的反映，这些就是唯心论的特征。我以为，要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认识论，首先必须依据这一个标准，而不是首先依据其他的标准。所以，承认认识的客观物质性，是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的第一个特点。也是一切唯物论的认识论所必须具有的共同的根本特点。哲学的认识论如果缺少了这个特点，就缺少了唯物论认识论的最基

本的性质，那不管它在于其他方面的见解如何，它就不能成为唯物论的认识论，而只是——至少在实质上是——唯心论的认识论。反之，承认了认识的客观物质性，那么，在其他的各点上虽然不符合于以上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标准，仍然可以说在基本上是属于唯物论范畴的认识论。

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清华冯友兰先生的了解是不明确的。他把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标准弄混淆了。他没有提到是否承认认识的客观物质性这个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根本标准，而把是否承认认识的实践性认作第一个标准了。在他的文章里，他写道：

“在认识论这一方面，肯定认识为第一性的是唯心论，肯定实践为第一性的是唯物论。前者是统治阶级底哲学底认识论，后者是被统治阶级底哲学底认识论。”

这段话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就整个哲学史来看，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不都是肯定实践为第一性的。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错误，就指出了这一点。反过来说，肯定实践或“行”为第一性的，虽然可以属于唯物论的认识论，却不一定是唯物论的认识论，而有的也可以仍然是唯心论的认识论。大部分的唯心论哲学，在认识论上固然是否定实践为第一性的。但有些唯心论哲学，例如西洋哲学史上的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中国过去的某些宗教哲学，是曾经把实践、“行”的意义放在较高的地位上来看待的。近代法西斯哲学也是标榜“行”的哲学的。如果不加分析，把哲学史上一切重视实践或“行”的学说一律都归入认识论的唯物论党派之内，那一定会发生错误，一定会难免把一些唯心论的认识论误认为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而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唯物论者不了解

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因此又会把一些唯物论的认识论误认为唯心论的认识论。

当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实践论》）不承认认识的社会实践性或实践高于认识的原则，就不能成为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但很显然，这只是就辩证法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的区别而言，而不是就一般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而言。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认识论有许多不同的主要点，如承认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和认识客观真理的无限发展可能性。而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也是不同的主要点之一。至于一般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认识论的不同，则主要的是在于把客观物质性的观点作为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以上两种区别标准是不应该加以混淆的。

因此，冯先生对于认识论方面的辩证法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所作的这样的区别，我以为是值得考虑的：“以为实践既然是第一性的，认识既然是依赖于实践的，因此认识就只是实践的工具，不能反过来影响实践，这就是机械唯物论，以为实践虽是第一性的，认识虽然依赖于实践，但是认识也反过来影响实践，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这里，冯先生以为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同样地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这是不符合于哲学历史的实际情形的，也是不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开头一段的内容的。机械唯物论之为机械唯物论——或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正是由于“它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之意义”。（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缺点，并不在于它不承认认识能反过来影响实践，而是在于因为它不了解认识依赖于实践，不了解客观

物质之反映于人的主观、精神是要通过“变革的实践”这个媒介或环节,因此它就只能抽象地、直观地来了解主观反映客观、精神反映物质的唯物论基本原则,而在说明认识如何获得,以及认识如何能反过来影响实践的时候,就不能贯彻唯物论的科学原理,反而给唯心论留下了空隙。这就是说,他们把合理的、正确的认识看做是要由特殊的天才或偶然地掌握了正确思想方法的个人来完成的,而不是从人民的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这样在说明认识如何发生和如何影响实践的时候,就不免要产生“意见支配世界”以及只有偶然掌握了合理思想的英雄伟大才能创造新世界的唯心论结论。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唯物论哲学中就有这种缺点。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具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唯物论的认识论因素,他承认“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但由于他也不了解认识通过变革的实践而发生与发展的道理,因此终归陷入了唯心论的圈子,以为正确的知识只有少数“先知先觉”的人物能够获得,而广大人民则永远是不知不觉的“阿斗”,甚至于有“心为万事之源”这样十足唯心论的说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所以,我们虽不能否认,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认识论,由于不了解认识依据实践的原理,就不能贯彻唯物论,并在某一方面陷入唯心论。但不能单独把认识依据实践的原理作为标准,来判断这些认识论整个来说就是唯心论的。因为这个判决所应依据的第一个标准,是关于认识的客观物质性问题。也许因为冯先生的文章是专讨论“知”和“行”的问题,就没有注意到这第一个标准。但即使仅仅是没有注意到,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不应该不注意到的。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某些哲学的认识论中,能够看到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作用的,就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具有了接近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的因素。所以,哲学史上即使是属于唯心论的派别,但在认识论上有着重视实践的思想的某些学说,有时就值得我们给与较高的估价。例如列宁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这类思想,就是给与了相当高的评价的。在他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他写道:“实践在黑格尔那里,是作为分析认识过程中的环节,并且正是作为到客观的(绝对的——按黑格尔哲学的说法)真理的推移”。列宁指出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是“接近了人以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自己的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这一点了”。并且还说:“马克思是直接邻接着黑格尔,将实践这标准放在认识论中”。列宁的看法,无疑是对的。黑格尔的哲学中重视实践的思想,是接近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但列宁之所以对,就在于他是有分寸地恰当指出黑格尔的思想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只是“接近”了,而没有把黑格尔关于实践的思想直接看做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思想。他说马克思在这一点上“邻接着黑格尔”,却没有说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就等于黑格尔。在这里,列宁对于唯心论者黑格尔和唯物论者马克思中间的原则区别,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我们研究哲学史上的问题,应该向列宁学习。例如对于中国哲学史上许多重视实践的认识论学说,我们必须对于它的历史价值、对于它的接近辩证唯物论的意义作足够的估计。但如果那是唯心论学说,那就一点也不能忘记它和唯物论中间的严格界线。所以,当我们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就必须首先注意:第一,这种哲学思想是否承认认识的客观物质性?如若它不承认正确认识的来源是客观物质发展规律的反映,而以为这来源是某种精神的本性,例如或者

是来源于主观的“良知”，或者是来源于客观的、超物质的形而上学的“天理”（“天理”的了解有时也可以有唯物论的性质，如果它是指自然界的规律的话）。那么，即使它在知行问题上认为行先于知或行重于知，它仍然是唯心论的认识论；第二，必须注意一切旧哲学对实践的了解，与辩证法唯物论都有所不同。马克思曾说过，唯心论者所了解的实践，是抽象的、是失去了现实的感性血肉的概念，是为着实现某种思想、理想或“理念”的（资产阶级的）人的行动。唯心论者决不会从生产活动、阶级斗争这样具体的内容上来把握实践的概念。中国旧哲学中所讲的“行”，大部分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某一部分人的理想作为它的内容的，在形式上它是表示为一般道德伦理的践履行为，而在实质上则是一种梦想在矛盾百出的封建社会中追求不矛盾的调和秩序的行为。这种空想的性质使它能够对封建制度的某些坏现象采取修正的以至于若干批判的态度，甚至于反映出农民的某些反对封建秩序的要求，但这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变革的实践”的意义仍是有原则区别的。第三，我们还要注意，当我们说到唯心论哲学中重视实践的认识论学说是接近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时候，只能是就某些象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来说，而不是就一切唯心论的哲学家来说。这样的哲学家，主张必须通过实践才可以使我们的认识获得客观的真理性，虽然他们对于客观真理性的理解是唯心论的，但正因为承认认识必须有客观真理性这一点才接近了唯物论。就中国哲学来说，我以为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向来加以了解。但是，并不是说一切唯心论哲学中的实践或行的思想都有这种进步的意义。某些宗教性的、神秘主义的唯心论，妄说实践是达到某种超越的神秘知识的手段。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例如蒋介石国民党的什么“力行哲学”，

把愚民主义的盲从思想和盲目行动作为它的说教的中心内容，这些荒谬胡说似乎也似乎在宣扬“实践”或“行”的重要，但和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论是丝毫不相干的。

我们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不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是不是等于说这些唯物论的认识学说里一点也不涉及实践的概念呢？当然不是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认识学说里也曾涉及实践的概念，特别是中国旧哲学中，由于常常把“知”和“行”的问题作为讨论的主题，因此有些属于唯物论派别的哲学家，也就不能不在自己的认识学说里接触这个主题，并且作出某些向辩证唯物论接近的贡献。问题是在于，虽然这些唯物论接触了认识与实践的问题，并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也作出一些贡献，而在这个问题上主张行先于知和行重于知的，就成为认识论上的唯物论派别的一个标帜。然而我们仍然应该说，这些哲学的认识论之所以是唯物论的，首先一个标帜还是在于它承认了认识的客观物质性，其次，我们还要注意，这些哲学对于知和行的了解都是片面的，因此它们即使有所贡献也是极片面的，归根结底，它们就不能真正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例如对于“行”的了解，费尔巴哈的看法是庸俗的，他“把实践只在它的污秽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上加以理解和确定”（马克思），他自称“实践的观点——饮食的观点”。中国旧哲学的唯物论思想的“行”的概念，实质上也不能超出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秩序的范围，仅到了谭嗣同、孙中山的时候才新添了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内容。一切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都看不见实践的概念包含着生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丰富的内容，这就使得它们不可能正确理解“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因此它们也就不能不“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

发展”，而只依据人的某些自然性质（即不是依据人的本质，而只是依据某些动物的本质）来观察认识问题。中国哲学中“性善”“性恶”的争论，以及“天理”“人欲”的争论，都是属于这个范畴内的。这样，由于它们对于人的实践、对于行的了解是片面的，因而对于人的认识、对于知的了解也不能不是片面的。首先，它们不能够正确了解到人的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即不能正确了解在实践发展过程中人的认识由感性的知到理性的知的飞跃，以及由理性的知再回到实践的飞跃，它们或者是简直就不知道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分，只笼统地概称为“知”（如中国旧哲学中、特别是宋明以后的哲学中所常见的情形），或者只看见感性的知（如西洋哲学史上经验论的情形），或者只看见理性的知（如西洋哲学史上唯理论的情形）。或者虽然也看见了感性的知和理性的知的区别，但却不能理解由前者向后者的飞跃的规律，而只看作是互相区别的两种认识能力（在中国旧哲学中以及西洋哲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飞跃这一方面的能动性来说，由于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都不能够理解到认识的实践的、社会的、历史的根源，把合理的认识多多少少都当做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来看待，因此它们对于认识能动性的这一方面的理解就常常落入唯心论的圈子，以为偶然出现的聪明人或所谓“先知先觉”就是决定时势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由于“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也不能了解认识发展的可能性。形而上学假定世界在本质上是不会变化发展的，中国的旧哲学差不多一般地都默认有着某种不变的“天道”（实质上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封建社会秩序）的存在，为自己设立了这样的前提的唯物论者，

在认识论上自然也就要把世界的认识看做是有穷尽的，以为只要有人一旦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把事物的一切真理或一切“天道”的内容一次汲尽。在这一点上也就有着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的片面性。

因此，当我们估计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在认识论上有什么贡献的时候，对于它们和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之间的区别，也必须认真地加以注意。如果对于这些贡献不适当地加以夸大，以致使人看起来觉得似乎这已经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了，那是不免会犯错误的。

附带有有一个问题要简单地提一下，在前面所引的一段冯先生的文章中，说到唯心论的认识论“是统治阶级底哲学底认识论”，而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被统治阶级底哲学底认识论”，这样的提法我以为也值得商榷。因为这和哲学史的实际情形是不符合的。过去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都是剥削阶级，由于这些剥削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在思想上也会发生矛盾和分裂，因此从其中产生出哲学上的和认识论上的唯物论派别，也是常有的事。而就今天来说，已有了苏联、中国以及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统治阶级已经是劳动人民或主要是劳动人民，而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哲学和唯物论认识论，已经成了合法的统治阶级的哲学和认识论，这就和冯先生所说的情形完全相反了。我以为，比较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唯物论哲学及其认识论，是一般地代表着进步阶级的思想方面，而唯心论哲学及其认识论，则一般地代表着反动阶级的思想方面。这才是符合着历史事实的。

知行难易的问题与《实践论》

冯先生的文章还提到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谈一谈。他说：“关于我们所举的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知行问题的各种讨论中，只有知行难易的问题，在《实践论》中找不到与它有关的讨论。这是因为难易是主观的范畴。在道德教训中，可以应用这种范畴。因此，在中国古代的一个道德教训中，有‘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这句话。上面已经说过，中国以前的哲学家讨论知行问题，是从道德的活动出发的。因此也就接受了这句话而对它加以讨论”，“可是在我们对于事物作客观分析底时候，我们是不涉及主观范畴的，在客观地分析事物底时候，我们不讨论这一类的问题，因为没有这一类的问题。”

这两段话的意思表现得不十分明确，但大体上是说：第一，《实践论》和中国旧哲学的一个不同点是在于后者在自己前面提出了道德活动的任务，而前者——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却不提出这样的任务，而仅只是要解决如何对事物作客观分析的问题。第二，知行难易的问题只是人的主观范畴内的问题，而不是客观事实里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主观范畴是独立自生的，而不是客观事实的反映；第三，道德活动是一种主观的活动，因此从道德活动出发的中国旧哲学就提出了知行难易的问题，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既然不提出道德活动的任务，而只是重视对事物的纯客观的研究，所以就不涉及知行难易问题。在这里，冯先生对于道德活动显然仍是采取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看法，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又采取了客观主义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不把道德活动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呢？自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也不会把中国旧哲学中所提出的那种道德活动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因为那种道德活动一般地都只是想就封建社会范围内来追求一种调和稳定的秩序的活动，而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这一切保守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以至于反动的活动的。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没有任何主观的活动目标。相反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自己提起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任务，从马克思起，就在这一点上把自己的哲学和从来的哲学加以区别：“哲学家们曾经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但是现在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从来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甚至于不能梦想为自己提起过这样伟大的任务，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所提起的：“整个儿地推翻世界与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我们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主观目标就不能用道德活动这个名词来表示吗？应该说，完全能用这个名词来表示，并且还应该用特别大的字体来表示，以便使人明了这是比过去一切哲学中所设想的更高尚到不知千万倍的道德活动。把根本改造世界的任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且把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作为认识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北京解放后不久，冯先生曾在进步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主张哲学家的特殊任务是在于经过解释世界来改造世界，把解释世界当做了出发点。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任务是：首先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来认识世界、或解释世界，其次才是依据正确的认识来促进改造世界任务的完成。所以冯先生那种说法也是可以再考虑的。

说“知行难易”是主观的范畴，而只有道德活动才是能于应用这种主观范畴的活动，这也值得考虑。不论哲学范畴或道德活动，都

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也都是社会的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所以,在哲学范畴和道德活动中存在的东西,必然也可以在社会的客观物质条件中找到它的基础。中国旧哲学中关于知行难易问题的思想,不外是反映着封建社会的各种物质矛盾。封建社会的一些哲学家们努力设想许多道德原则,企图以此作为调节统治者内部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中间利害冲突的标准,并图借此来长久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他们称之为“天经地义”。把这些原则设想出来,他们叫做“知”,把这原则实现在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中,他们叫做“行”。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行为是由他们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封建统治者互相间与封建统治者和人民间在物质利益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在封建社会的人和人的关系中间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虽然有许多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为着求得封建社会秩序的永久调和和稳固而设想出这样那样的“天经地义”或道德原则,然而当着要求把这些原则实现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动的时候,就迟早一定要遭遇到物质利益中间所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障碍,而使这种企图归于失败。事实上例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一类的道德原则,从来就很难说是在作为阶级的封建统治者中间真正实现过。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想使封建制度永久化、合理化的主观企图,另一方是封建制度本身充满着矛盾性、变动性、不合理性的客观事实,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在封建社会存在的情形下是永远不能解决的,这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反映在哲学家的头脑里,就产生了“知之匪艰、行之维艰”那样带悲观性质的结论。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虽然有时也有人感觉到,就是设想合理的道德原则,也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如像程伊川等人就有“匪特行难、知亦难也”的说法,但在长久的时期中,一般都认为“知

易行难”才是真理。这种情形，一方面是前述的矛盾的反映，而另一方面也是封建统治阶级要在理论上为自己的言行不一致抓着一个原谅和辩解的根据。这又可以看作是过去哲学家只能说明世界而不知道改造世界的一种表现。辛亥革命前后，代表资产阶级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又利用了“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的成语，来为自己对反动派妥协而不能坚持革命的软弱行为找开脱的理由。孙中山先生不了解这个成语在这时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软弱性，而以为是成语本身妨碍了革命事业，因此煞费苦心做了一篇翻案文章，创立“知难行易学说”来和中国的旧成语对立起来。很明白，仅凭这个“知难行易学说”，是不能改变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软弱性的，因此要依靠在资产阶级中间宣传这个“学说”来挽救失败了的中国革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仍然又遭受了几次的失败。“知难行易”的思想仅有这样一点积极作用，即在孙中山先生本人，由于明白了知之难，明白了中国革命理论的认识之艰难，因此就能够继续学习，研究摸索，终于找到了“以俄为师”这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又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历史特点。

所以，知行难易的范畴，决不是主观的范畴，而也是客观物质存在的一种思想上的反映。这个范畴也决不是只能应用于封建时代哲学家的“道德活动”（如前所述，中国旧哲学的出发点，在实质上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活动，而是封建秩序的合理化、永久化）中，而且也曾应用于孙中山先生所从事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中。在无产阶级“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斗争中，自然也有着这个范畴。《实践论》中没有在形式上直接提出这个问题，这并不是说它在实际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如冯先生所举的知行先后或知行轻

重等问题,《实践论》里也并没有在形式上直接提出来,而在实际上却已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如果不是仅仅以《实践论》一篇文章来限制自己,而能够参考马克思主义的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理论著作,就更容易明白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如何正确地解决了知行难易的问题。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之所以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就理论本身的原因来说,是由于对问题采取了和中国旧哲学不同的观察方法。过去哲学家多多少少总在难和易这两个范畴中间划了一条形而上学的死鸿沟。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把“难”的概念看做是似乎包含着绝对不可克服的障碍的意义,而谈到“易”的概念时,又似乎认为这是和“难”的概念绝对没有任何联系的东西。这样,当人们使用“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的成语时,那意思就是说,由于行动中的许多困难无法克服,因此,某些人在道德问题上的言行不一致或者在革命斗争中对反动派采取妥协投降态度,都是无可奈何的,甚至于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当人们又反过来说到“知难行易”时,那意思又是说:认识真理是一件绝对困难的事,所以除了世界上偶然出现的天生的圣贤才智或“先知先觉”之外,是没有能力克服这困难的。“平庸愚劣”的一般人民群众,就只能永久居于不知不觉的地位,从事盲目的活动。而由于“行易”的缘故,就是盲目活动或盲从的行动也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中的消极的反动的因素,这些因素曾被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法西斯主义者所利用,是大家所知道的。

这样,不论“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易”的思想,都把“难”和“易”的范畴作了形而上学的分裂,都不能正确解决知行难易的问题。这在客观上是前后反映着封建统治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主观上就表现了这些剥削阶级的偏见。工人阶级的哲

学——辩证法唯物论，把“难”和“易”看做是能够辩证地互相转化的范畴。“难”不是绝对的，不是与“易”完全隔绝的。任何革命事业都有困难的方面，但也一定包含着某些有利条件；因为革命是进步事业，而中国革命又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因此，任何困难，经过斗争，都有可能加以克服，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发展有利的条件，这样就可以把“难”转化为“易”。“易”也不是绝对的，不管担当任何容易的任务，其中都会包含若干困难条件，如果我们有了骄傲轻忽的态度，不去认真对付，困难条件就要发展起来，就要使我们碰钉子，使我们失败，这样，“易”就会转变为“难”。所以，“知”和“行”的难易问题，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里也会存在、也要被提起的。因为在客观上，工人阶级的“知”和“行”中间，也就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斗争中间，都在事实上要遇到这样的问题。但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不是要形而上学地来提这个问题，不是要问何者为“难”、何者为“易”，并由此来找一条避难趋易的道路。如像中国旧哲学中以及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中所表现的那种情形。工人阶级所要提起和解决问题是：“知”和“行”，认识和实践，“正确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任务”中间，存在着些什么困难，又存在着什么有利条件？如何发展有利条件来把困难加以克服？不论对于“知”或“行”，都要采取正视困难和克服困难的 attitude。而不是采取回避困难和在困难面前低头屈服的态度。采取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知难而进”的态度，而不是旧中国剥削阶级的“知难而退”的态度。“行”是困难的，只要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就很容易看见中国革命之能得到今天的胜利，是经过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曲折和困难。因为轻视了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中的这各种曲折困难，有些人才会要犯“左”的冒险主义的错误。但

“行”的困难在利用和发展有利条件来进行斗争的主观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在革命的困难面前表示低头屈服，就是使有些人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的的一个原因。至于“知”的困难，马克思自己就曾指出：“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怕险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辉的顶点。”如果没有“知”的困难，那么，为什么革命斗争过程中有些人要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而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和各种错误、各种盲目倾向进行斗争，就不可以理解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嘲笑了那轻视认识之难的、对科学开玩笑的“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而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一种对知识采取轻率态度的人。但知的困难也同样可以克服，只要肯开动脑筋，多想、苦想，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努力学习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经验，认真调查研究，就可以获得提高认识的成效。经验主义者的错误之一，是在于对认识的困难表示屈服，不肯用力思索，不肯“认真读书”。而决不是由于天生就是只能做一个“庸俗的事务主义者”。所以，不论就知或行来说，都是有困难的，而困难都是可以转化，可以克服的。知和行是互相联系着，知和行的困难的克服也是互相联系着。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我们克服“行”的困难，把实践中克服困难的感性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使之成为理性的认识，这样就克服了“知”的困难。有了理性的认识，又把它应用于实践，使行动获得自觉性，避免盲目性，于是反过来又进一步克服“行”的困难，并经过实践的检验也进一步克服了“知”的困难。这样，由“行”到“知”，又由“知”到“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地发现困难，不断地克服困难，不断地使“难”转化为易，“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

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可以说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实践论》解决“知行难易”问题的基本形式。

(一九五一年九月《新建设》杂志
第四卷第六期)

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一

毛泽东同志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是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期里指导革命势力使之重新发展起来的一篇重要文件。在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毛泽东同志曾写了一系列的对于中国革命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文，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便是这些论文之一。这些论文正确地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给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革命斗争的经验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总结，使当时革命运动中所提出来的许多困难而复杂的问题获得了明确的回答。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些科学的分析和总结，证明了在中国社会里引起革命的各种尖锐矛盾仍然存在，因此革命运动仍然要向前发展，革命高潮必然要迅速到来；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批评了某些带右倾性质的对于革命的悲观情绪以及“左”的“冒进”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这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作为当时坚持革命的最正确的形式；指出了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作为正确工作

方法的基本原则。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当时革命的具体实践问题给与了这样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决，就使当时在形式上虽然很微弱的革命势力获得了强有力的指导，而能够在敌人四面包围的险恶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这些科学的著作之一。这个文件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它在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解决了如何使军队成为革命的人民军队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领导革命斗争使之走向胜利前途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的问题。

在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下面，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人民反对武装反革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0—601页）。这一个由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肯定了的真理，现在已经得到了长期的实践的证明，不容人再怀疑了。但是在二十多年前要使这个真理为革命的人民所认识，并且变为行动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经历许多斗争过程的“拿血换来的经验”（同上书，第601页）。首先，要使这个真理变为行动，需要使它得到革命的领导机关——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承认。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虽然有斯大林的指示及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当时已有一些同志开始认识了武装斗争的重要，并且共产党也直接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发挥了当时说来是空前伟大的革命力量，然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对于这个真理是不承认的。这个机会主义的领导招致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经过八一南昌起义以及以后的许多次武装起义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起来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克服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

错误。但是，进行武装斗争，并不是简单地拿起武器来的问题，要使斗争能够坚持下去，并且还要能迅速发展，那就需要寻找适合情况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否则也难免要遭受失败或损失的。从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又经过了若干困难和挫折，终于由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和“游击战术”的思想，这样才把中国人民武装斗争所需要的正确形式和正确方法寻找到了。

然而，就是这样，也还有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并不是随便任何一种军队，只要会打仗的，都能够担当“工农武装割据”的任务，都能够成为人民手中用来反对反革命势力的工具。革命的人民不能简单地利用反动统治者的军队来达到革命的目的，而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斗争工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早已指明了的普遍真理。孙中山历次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失败，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可以说是给这个真理作了反面的证明。斯大林同志根据这个真理，在一九二六年就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这样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不这样作，军队就会陷于极困难的境地。”（《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页）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没有圆满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这个真理。只有在一九二七年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中，主要是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中，这个问题才终于得到解决。毛泽东同志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人民革命武装的经验总结。这个文件不仅肯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中所指出的那些普遍真理，并且由于它奠定了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

的基本原则，因此就在如何建立人民自己的革命武装这问题上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得到了新的充实和发展。

二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要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底真正的和模范的代表者”，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这就是说，为着建立与旧军队完全不同的人民革命军队，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把军队放在共产党的坚强的政治领导之下，放在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之下。三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事实，已清楚地指明了，正是由于有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才在中国破天荒地出现了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民解放军这样威震世界所向无敌的钢铁似的人民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0页）没有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决不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农民战争中锻炼出如此坚强的革命战斗队伍。毛泽东同志看到了这些真理，他和斯大林同志不约而同地对军队中的党的政治工作予以很大的重视，坚决地主张经过这个工作而使军队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个文件里，首先就反对那种错误的“单纯军事观点”，那种观点“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7页）这种错误的观点不重视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不重视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使得“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

意和讨论”。(同上书,第89页)这种错误观点甚至于使得有些人的脑子里产生了“军事领导政治”的思想,以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7—88页)还有人“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8页)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些错误给与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其中所包含的严重危险性,说:“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这里,毛泽东同志就指明了军队发展的两条道路: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坚强政治领导,这就要走军阀主义的道路。国民党军队走了这条道路,结果是和过去一切反动军阀的军队一样,彻底地归于失败和灭亡。另一方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这样就是真正人民的革命军队所走的道路。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走了这条道路,结果是百战百胜,成为世界上最光荣最伟大的军队。

为着建立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革命意志的新式军队,除了需要有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外,还必须有一个与此不可分的重要条件,那就是应该使军队与人民群众密切地互相结合,而切不要使之脱离群众。“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人民军队之为人民军队,就是要能够随时随地,以自己的斗争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的政策,组织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让人民由自己的亲身经验相信它是自

己的军队，并由此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从人民中间吸取无尽的力量，而使自己成为天下无敌的军队。人民军队之所以需要有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最先进的阶级和政党领导之下，才能在军队中间实现这个伟大的“宗旨”。而共产党也就有责任在军队中加强政治工作，来贯彻这个宗旨。毛泽东同志对于军队的领导，在贯彻这个宗旨上就是最光辉的模范。人们可以看见，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武装斗争中间，毛泽东同志是如何不顾一切艰苦地亲自领导红军做了许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毛泽东同志为红军规定的有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守则，就是这些“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的辉煌结晶之一例。这些守则巩固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也巩固了红军本身，使它能在最艰难的环境里存在发展，并战胜敌人。这些守则同样也成了以后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基本守则，成了人民军队战胜一切的力量源泉。

为此，毛泽东同志就坚决反对那种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那种观点“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毛泽东同志坚持要把人民的革命军队和反动的军阀军队划清界限，要使红军成为真正人民的军队，而不至于在人民眼中和反动的白军混淆不分。为此红军或人民的军队就不能仅仅把打仗作为自己唯一的任务，它除了打仗之外，还须担任筹款和群众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同志使军队担负了为自己筹款的任务，这样就减轻了人民对于军队的负担，巩固了人民和军队的联系。毛泽东同志规定了军队必须担任群众工作的任务，这样就使军队不仅只是一个打仗的集团，而且也成了“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为此红军就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

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8页）毛泽东同志强调这些群众工作的任务是红军的根本任务，他反复再三地说明红军之所以要打仗，其目的也就是为着实现这些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同上）

这样，由于毛泽东同志为红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和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就使红军成为与旧的军阀军队完全不同的人民军队，就使它在具体实践中实现为武装人民反对武装反革命的无敌的斗争工具。随着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红军的工作任务的三个方面在具体内容上是有变化的。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里面，原来红军的筹款任务，就改变为军队生产的任务；军队的生产，起了为自己筹款和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使当时的敌后军民能够在敌人的疯狂扫荡和封锁破坏的严重环境里坚持抗战。直到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以至于现在，人民解放军仍然始终担负着一定的生产任务。这样，打仗、生产、群众工作这三个方面的任务，就成了人民军队的长久的基本任务，也是使人民军队能够一方面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而另一方面能够战胜一切敌人的主要基础。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曾这样说过：“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1页）

事实上，由于我们的人民军队有了这样三套本领，由于我们的军队不仅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反动势力的时候，这是不能有丝毫动摇和怀疑的），而且经常是一个强大的工作队（政治的、生产的），我们就能够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而且有充分的信心能够打垮今后的一切敌人。正是由于我们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同时执行了战斗队和工作队的任务，所以才能够在日本投降后几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迅速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并在一切解放了的地方迅速建立起人民的统治权——中国历史上空前巩固、空前统一、而最有效率的人民民主政权。今后抗美援朝的胜利，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完成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等等伟大的任务，仍然还要依赖我们这支有全面本领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来保证的。

三

三十年来中国的革命史说明：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是经过共产党来实现的。共产党本身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能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对于革命任务的能否贯彻，有着决定的意义。就军队的领导来说，也是如此。没有思想上、政治上以及组织上都很健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要想把革命、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武装斗争领导好，特别是领导象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那种困难环境下的“工农武装割据”，是不可能的。“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

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7页）这样，毛泽东同志在解决红军的政治领导问题的时候，就把党的建设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的环节。而由于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因此在解决了军队中的党的建设问题的时候，也就同时奠定了一般的党的建设的主要原则。

中国的共产党，自始就是在列宁创建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之下，并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模范创立起来的。我们知道，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之伟大，由于它是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思想作为基础的。所以要在我国建设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就必须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变为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是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过程”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按照这样的精神来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强调在思想上、政治上使党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必须把党内的各种思想倾向加以具体的精密的分析解剖，划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界限，而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由此启发党员们自觉地来掌握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以求达到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有了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致做基础，这样来在组织上、纪律上进行党的建设，可以保证党在组织上、纪律上的真正的一致。

不断地和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不断地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加强党的组织和纪律，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路线。我们可以看到：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就是按照这个基本路线写成的。这个决议奠定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使党能够领导红军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对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势力坚持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克服了党内“左”的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胜利地完成了人类军事史上空前未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也按照这个路线，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等的著作，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不但能够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人民渡过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转到胜利的时期，而且为日本投降后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打下了基础。这些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在实践中的辉煌表现。

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是由于受到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而来。要对于错误思想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揭发这些思想的阶级根源。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文件里详细分析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阶级性质，其中包括有如雇佣军队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影响等等，同时指出一切错误思想之所以会在党内发生影响，其最主要的基础，乃是我党所处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环境条件。“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7页）“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

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4页）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与片面性，是由于小生产经济的组织散漫，眼界狭小，以及它在反动统治下的悲惨境况的特点产生的。这种狂热性与片面性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坚韧的战斗性具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克服这种错误的倾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就曾经指出这个真理，说：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关于这一点，国外知道得还远远不够。这种革命狂热有些象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剽窃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有产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是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的），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可是，革命党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犯旧的错误，这种错误往往会在特殊的或多少特殊一些的环境里，由于什么意外的原因而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14页）

和列宁的想法一样，毛泽东同志决不仅只是限于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条件产生它的狂热性和片面性这个真理，也就是说，决不是以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机械唯物论的观点

来仅仅指出这真理，而是以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态度，在承认和指出这些真理的基础上，提出和小资产阶级斗争以便“加以节制”和“加以改造”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7页）所以，问题决不是如某些机械决定论者的想法：以为既然“存在决定意识”，小资产阶级改造就是无望的了；问题是在于领导者是否能够对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和列宁所想到的一样，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是可以、而且应该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不断的斗争，并由此来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保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发展前途的。

列宁的话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片面性，是会在各种特殊的环境里采取各种新的形式、甚至于从来未见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在理论上抽象地来了解真理，而是要能有效地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改造”，那就必须善于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仔细分析小资产阶级思想所表现的种种形式，揭露它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无产阶级党的组织不能相容的本质。要知道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是常常会采取某种民主的、进步的、甚至于采取伪装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如果不善于加以辨别，我们就会被这种种外形所蒙蔽而看不见它的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因此

就不知道和它斗争，反而让它自由的发展起来，让它破坏了党的思想和组织的基础，使革命和人民的事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这种情形，在不论外国或中国的共产党过去的革命历史上都不难找到证明。中国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是以伪装的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一个最大和最坏的例子。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对于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在当时环境里侵入红四军党内来的各种表现形式作了详尽的分析，并针锋相对地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来对每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给予正确的批评，而指明克服这些错误的各种具体方法。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表现小生产的自由散漫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坚持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性质的“非组织观点”，坚持了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观点；批评了小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坚持了无产阶级的、按照革命斗争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正确合理的分配思想；批评了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批评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批评了“流寇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思想，坚持了切切实实联系群众建立工农武装根据地来有步骤地发展革命势力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这样详尽细密的科学分析和针锋相对的批评，能够帮助全党明确地认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面貌和本质，使它没有任何隐瞒和逃避的余地，使我们易于对它进行有效的斗争。这样就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思想纯洁性，而对于当时的革命武装斗争发挥了它充分的领导作用。

四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所作的分析是全面地揭露了各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基本思想。以后的许多党内错误思想，常常就是这些基本思想在新的环境与新的形式下的再现。例如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以来的农村中间，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曾采取“农业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又例如在有一个时期的地方和中央关系中间，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的观点曾采取地方主义，不报告不请示，无政府无组织的形式出现。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切新的表现形式都及时地给以揭露和批评，而始终保持了党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在各种环境里变化发展的，毛泽东同志反对党内错误思想的理论也是发展的。应该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方面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作的一个最光辉的贡献，就是在一九四一——四二年间为领导整风运动所写的一些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等。在这些著作里，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把危害党和危害革命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集中地概括为三个范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以上两者的表现形式——党八股，这样就为我们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指出了最明确、最集中的目标，奠定了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的长久的方针。

主观主义，这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违背辩证唯

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错误思想方法，是使理论与实际相脱离而不是相联系的非科学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就已明确地指出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页）由此可见，在这一篇早期的著作里，毛泽东同志就已确切地指明，主观主义乃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也是宗派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基础，并指出为了克服主观主义，必须把党的思想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必须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来“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同时“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这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实际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作为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初期的基本思想，在他的整风运动时期的著作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更多的党内斗争的经验，更尖锐地指出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他坚决的宣告：“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也更进一步分析了由于理论与实践分离而从两个极端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的两种基本形式——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际经验的教条主义，和只有某些局部的革命

经验而没有理论知识的经验主义，他指出这两种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为主而互相补充，曾对于党对于革命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毛泽东同志指出需要从两方面来针锋相对的克服这两种主观主义：“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宗派主义——这是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战斗性绝不相容的反动思想和作风，是把个人和局部的私利放在第一位，而与共产主义的精神——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完全相反的坏思想坏作风。无产阶级的革命党，需要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同上书，第827页）宗派主义则妨碍着党的“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而有害于战斗。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思想，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些错误思想，在党内存着“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能够“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必然造成革命的失败”。在整风时期的著作里，毛泽东同志对宗派主义的内容作了更全面的概括，指出宗派主义在党内和党外两方面都有它的危害作用：在党内，它破坏各方面的——局部与全体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新干部与老干部之间，军队与军队，地方与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团结关系，在党外，它破坏党与群众的联系，有使党与群众脱离而陷自己

于孤立的危险。针对着这些危险，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提高共产主义的精神”，来防止党内的宗派主义，同时应该在党内进行很大的教育，使干部到党员都真正懂得联系群众的必要，“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8页）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九二七年后，毛泽东同志依照他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所规定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路线，领导着党从最困难的环境里发展起来，到一九四二——四四年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使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获得全党范围内的胜利，这样就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同志团结起来，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因此党就能够进一步来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党内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个胜利，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中国是小生产的农业的国家，工业的发展很薄弱，无产阶级的人数，就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说很少。中国共产党员的成份，大多数又是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尽管如此，由于有了毛泽东同志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的正确方法，加上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的训练，就把党锻炼成一个光荣、伟大而又正确的、能够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革命达到胜利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伍。胜利了的中国人民，面临着更复杂、困难而光荣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正在进行着的革命和建设的工作，并准备将来走上美妙而远大的共产主义前途。由于目前党内有着大批胜利前后参加的新成份，又

由于过去战争时期许多老党员的学习不够，因此许多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仍然有种种表现，如不加以肃清，也会妨害党与人民革命事业的前进。为着领导人民担当今后的更复杂更伟大的任务，需要更加提高党员的思想 and 政治水平，提高党员对革命前途、党的任务和做党员的标准的认识，肃清在目前环境里用新的形式再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以及资产阶级的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并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整顿党的组织。党现在已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并且已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执行这样的任务。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来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类的文件，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一九五一年九月《学习》杂志
第四卷第 11 期）

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

一

继去年的《实践论》之后，毛泽东同志今年又公开发表了他的《矛盾论》。

这两篇著作，都是结合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唯物论。

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页）又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辉煌地实现了列宁的这个遗示。它具体而详尽地指出我们应如何来正确认识事物的矛盾的各部分，它抓着了辩证法的这个核心问题给与了充分的解释和发挥。诚如毛泽东同志自己说的：“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长期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

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达到的理论总结。它把十分复杂的中国革命经验中所表现的一切现实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内容作了哲学上的概括。学习《矛盾论》不能忘记联系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就是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作为基础的。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转变关节上，毛泽东同志都抓着了国内外各方面的阶级矛盾和现实矛盾的具体变化，给与深刻的分析，并由此作出理论上和策略上的正确结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的矛盾是那么复杂，长期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变化过程是那么曲折，如果不是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科学分析，要想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各种复杂的规律，并对革命运动给与正确的指导，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积累了无比丰富的正确应用唯物辩证法的经验，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就是他的宝贵经验的总结。

与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着的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中所经历过的思想斗争，也必然要作出哲学的结论。和《实践论》同样，《矛盾论》在指明什么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的时候，同时就揭露了一切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思想的哲学根源，并由此指出克服错误思想的根本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内一切错误思想都根源于两种思想方法上的偏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论《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把批判的主要锋芒针对着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在革命工作中常常（特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成为产生错误思想的主要因素。但同时毛泽东同志也不放松于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告诉我们：依据唯物论的原理，我们的认识必须从实践中丰富的感性认识出发，再把它提高到有综

合性条理性的理性认识，然后又把这理性认识拿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和发展，才有可能获得符合于客观真理的正确认识。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承认从感性认识出发的必要，也不承认理性认识有拿到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的必要。经验主义的错误在于虽然有着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但不善于或者拒绝使它提高到理性认识。两种错误的思想都是违背了唯物论的认识原理。要纠正这些错误，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方法正确地依循着《实践论》所阐述的唯物论的认识规律，就是要通过实践使我们的认识循环往复地不断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实践论》的回答是：“……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如何来正确地发挥我们的思考作用？如何才善于进行对感觉材料的改造制作工夫？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给与了详细回答的问题。《矛盾论》告诉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其根本方法，就是要从丰富的感性的事实材料中，详细揭发客观事物的各方面的矛盾。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不但是由于违背了唯物论的原理，同时也由于违背了辩证法的原理，不“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研究《矛盾论》，在《实践论》所指示的唯物论认识原理的基础上来应用辩证法的方法，那“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同上书，第325页）

二

为什么学会了用唯物辩证法来具体分析事物各方面的矛盾，就使我们有可能善于把感性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认识呢？因为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帮助我们揭发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并由此获得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知识；而理性认识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认识。列宁曾指出只有把发展看作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运动观，“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2页）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也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290页）在《矛盾的普遍性》一章里，他又指出矛盾不但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而且普遍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因此，分析事物的矛盾，并根据这种分析来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就应该是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是应该贯彻在一切科学研究部门，应该贯彻在任何一个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同志自己的全部著作，就是在各方面应用这个方法的范例。他不但在革命运动的各方面，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的问題中正确地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

矛盾的方法，而且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全过程的研究中，在革命形势变化的各个阶段和一切关节上，自始至终，都紧紧地掌握着分析各方面的阶级矛盾和现实矛盾的变化这一个基本的科学方法。

既然承认分析事物各方面的矛盾是普遍的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那么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同时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来分析事物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给与的回答，和教条主义的回答是不同的。教条主义一般地也承认矛盾，但它用公式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事物的矛盾法则，即随便抓着几个抽象的矛盾原则来套在一切事物上头，而不问时间、地点等等的具体条件。他们把唯物辩证法简单化、庸俗化，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革命问题和指导革命运动，就常常把革命当成儿戏，这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身上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真正的唯物辩证法方法与此相反，它要求对于每一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加以具体的分析研究。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4页）又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全集》第7卷，第363页）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列宁上述的遗示，他的《矛盾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论述事物的矛盾法则中间，充分发展了列宁的这个遗示。他用最多的篇幅详尽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并在这个问题上，特出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特殊性的研究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条件，因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

究的领域。”(同上)

毛泽东同志根据唯物论的认识论原理，指出必须联系着对矛盾的普遍性的认识，着重地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符合于人类认识的自然规律，才不至于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同上书，第298页)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人类认识的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的相互联结的思想，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中不论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都有着重大贡献的发展。这个思想告诉我们：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都是具体实际的研究的成果，都是工人阶级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当我们应用这些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必须再一次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必须特别注意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的特殊问题，研究许多在普遍真理中尚未涉及过的或未完全涉及过的新的事物，这样才不至于象教条主义者那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变成枯槁的僵死的东西，才能够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为我们指出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就事物的矛盾法则来说，也是同样，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的矛盾的普遍性以及作为科学研究的普遍的根本方法的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物的各种特殊矛盾的研究中概括出来的关于矛盾的一些共同本质的认识。当我们把这矛盾的普遍法则作为方法，拿来研究一定的具体事物对象，例如说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我们又必须对于这具体事物对象的矛盾的特殊性，例如说对于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特殊性着重加以研究，才不至于象教条主义者那样“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8页），才能够对于所研究的事物对象，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获得正确的科学的认识。

强调要着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并不是要排除普遍性的研究。问题是“……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同上书，第292页），因此，着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为着要从其中概括出一定的普遍真理，以使用它来指导我们进一步研究新的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去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有不同的特殊的矛盾，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是不相同的。同一物质运动形式的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有不同的特殊矛盾。同是近代人类的革命运动，俄国革命的过程不同于中国革命的过程，因为沙俄原来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而中国则原来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俄国革命中的阶级矛盾和中国革命中的阶级矛盾各有其不同的特殊性（当然也不能忽视两者中间也有其共同性、普遍性）。同一运动形式的发展过程，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也

会表现出不同的矛盾特殊性，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已经过了四个阶段，在四个阶段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都曾经发生过许多变化（虽然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某些没有变的基本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要求我们具体研究这些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变化，不能希望设想一个永久不变的原理来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只有教条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者才会这样胡作乱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不仅是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这也就是说，科学是要指导实践，要解决客观存在的现实矛盾。要解决矛盾，就不能不依据矛盾的特殊性质来规定与此相适合的解决方法，就不能不重视矛盾的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同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在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这个根本矛盾的基础上，各阶段之间的矛盾关系有着许多具体的变化，因此用以解决矛盾的指导策略上也有许多具体的差异。“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同上）

要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其最主要的关键在哪里？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于研究那互相矛盾的各对立方面的具体特点。只有认清了各对立方面的具体特点，才能认清事物矛盾的总的特点。例如象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中那样一方面

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许多特点，另一方面又认清了中国抗日人民自己的许多特点，总合起来才确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个特点。毛泽东同志说：“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同上书，第300页）矛盾的各个方面的这些特点，是常常在变化中的，即使是同一类的矛盾，其各个对立方面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之下都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中两阶级在矛盾内各自所处的地位以及两者相互的关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个样子（在这里资产阶级居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是一个样子（在这里工人阶级居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一个样子（这里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表现着革命与妥协的两面性），在帝国主义国家又是一个样子（这里资产阶级完全是反革命的、反动的）。这些对立的各方面的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特点，就构成同类矛盾的总体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的特点。所以，分析事物的矛盾，决不是只就矛盾总体笼统地作一个估计就能完成任务的。不能暴露事物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就不可能暴露矛盾的总的特点，就不能理解发展过程的特殊本质。毛泽东同志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更把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特点作了一个简单明了而又十分深刻的概括。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要避免“主观性、片

面性和表面性”，反过来说，就是要对于事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研究。要避免片面性的错误，就必须研究矛盾的各个方面或各个部分的特点而不是只去研究它的一方面或一部分。要避免表面性的错误，就必须承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而不是“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同上）。“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同上），因此，能够避免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错误，也就可以保证避免主观性的错误了。“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同上）。所以，必须在应用矛盾的普遍性作为方法去研究具体事物的时候又着重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必须深入到客观事物里面去精细地研究其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以便进一步就其总体上和互相联结上来把握具体矛盾的具体特点，这样才能够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才能把我们对事物的研究和认识提高到科学的水平。

三

为要使我们对于《矛盾论》中所包含的最主要、最精深的思想获得一个扼要的理解，最好是温习一下毛泽东同志自己在一九四二年《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论到如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段话：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

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0页）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就是正确地应用他所论到的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方法，来在中国革命的各方面斗争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样他就创造了一系列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使中国革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三十年来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整风运动以来的十多年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干部，跟随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学到了他所指示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些方法，在广大的国土上有力地担当了各个方面的工作，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获得今天的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方法的指导，要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得到这

样伟大的革命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上划时期的整风运动前夜写成的，它为我们党的一切伟大胜利事业奠定了理论的基础，正如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给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理论基础一样。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与我们实践方面的伟大胜利相适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辩证法唯物论的伟大胜利。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还只是开始，前面还有无数艰巨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与我国的国土的广大和革命任务的繁重要求比较起来，我们现有的具备着足够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的干部还是太少了。广大的革命工作干部必须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同志用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才有可能更好地担负起我们应做的工作。

特别是在一般的理论研究工作方面，更显得落后于现实的需要。虽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代表着我们党的最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就，并解决了中国革命运动的主要问题。但我们一般的理论研究者很少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实事求是地从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中去研究它的具体矛盾，很少能够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来精密地分析和解决各种矛盾，因此直到现在，我们学术界的一般的理论工作还仍然停顿在一种十分空疏的状态上面。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对于这种空疏的状态发出警告，并向全党提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

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的任务，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的任务。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完成了这些任务没有呢？没有人敢作完全肯定的答复！这就足以说明问题是如何严重。这种情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全党、对于全国革命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辩证唯物论的学习，是一个伟大的推动力。我们应该借此学习的机会，进一步努力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进一步锻炼我们应用唯物辩证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在今后的革命的实际工作中和理论工作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 理解和运用

一 学习《矛盾论》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理，作了全面的具体分析，并在许多方面给与了新的发挥。列宁说：“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对这句话的无限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从《矛盾论》里获得深刻的领会。《矛盾论》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如何系统周密地去把握事物的联系及其内在矛盾的运动。它使我们了解：为什么建立在这个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在理论上具有最高度的客观真理性，而在实践上能够启发劳动人民的无穷无尽的革命的创造力量；为什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能够准确地解决像中国革命这样非常复杂、非常曲折的问题，并引导中国人民通过险恶万端的航道，达到胜利的境地。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指出苏联哲学界在一九三一年以后数年间批判德波林学派的重大意义。德波林的哲学是孟什维克派的唯心论哲学，这个哲学由于在表面上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伪装

旗帜，曾经在一个时期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特别对于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与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精神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这派哲学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它故意抹煞列宁对于唯物辩证法哲学所作出的新的贡献，否认列宁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说，它从哲学上，从理论基础上来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第二，它仅仅在词句上，在抽象的理论形式上表示拥护唯物论，拥护辩证法，它散布着一种为学术而研究学术，使理论脱离实际的坏风气。它从来不曾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认真地研究和解决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以及苏联工人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划时代斗争中所提出的任何具体问题；它采用黑格尔的唯心论方式，从单纯的概念上，从名词的穿凿上来研究辩证法，把辩证法曲解成一些片面的、悬在云雾中的、与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漠不相关的死的公式结构，使它失去了任何能够把握事物发展和革命发展规律的生动力量。德波林学派的这种错误思想，正适合着那些曾受过资产阶级教育而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技术人员等等的趣味，它吸引着他们，使他们拒绝和工人农民群众结合，拒绝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这样，德波林学派就成为苏联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如果不加以粉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就要受到极大的损害。这就是苏联哲学界所以要批判德波林派唯心论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指出德波林的唯心论曾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中期，在我们党内占据了领导的地位的一些教条主义者，就是原来既没有革命实际经验而又受了德波林派坏作风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轻视中国工人农民的

实际革命斗争经验，从不肯认真研究一下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仅凭书本上引用的片断词句和自以为是的主观臆想，就对革命运动发号施令。这个时期革命人民所遭受的极大的挫折，就是这些教条主义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所造成的恶果。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联系着对这些教条主义者的政治斗争而进一步给与哲学批判的革命文献，它充分地应用了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派的斗争的积极成果，而在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系统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它特别着重地论证了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唯物论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许多思想，而把批判的主要锋芒针对着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同时也批评经验主义），揭露了它的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反辩证法的、片面性和形式主义的错误，揭露了它与德波林派的假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这一个十多年以前的指示，在今天仍然是有实际意义的。这是由于：一方面我们党内一部分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们中间，还没有把教条主义思想残余完全肃清，还没有在工作上认真建立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作风，还不善于在研究中运用全面分析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法方法，还往往要发出许多夸夸其谈抽象空洞的调头，这样就不可能很好地推动党内外干部正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中国革命胜利的需要及时地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以来许多在旧社会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技术人员等等，大批地参加到国家的政权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建设工作中来，他们的脱离实际的旧教条主义的坏习惯，他们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

和形式主义,使他们在各方面工作中不能够发挥足够的积极力量。这是在最近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学习《矛盾论》,就是要学会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针对着中国目前的这些具体情况,来扫除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思想。

二 辩证法的核心是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着重地发展了列宁的“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这一个天才思想,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如果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而能够做到这样善于运用它,我们就是掌握了正确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之所以成为正确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因为这方法的本身与客观事物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根本原理即矛盾法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的反映,是因为“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实践论》),是因为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泉源。《矛盾论》里的《矛盾的普遍性》一章,证明不但“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因此,如果我们能运用辩证法的原理,善于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例如说善于观察和分析社会的阶级矛盾运动,我们就

能够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就能够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不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甚至于拒绝或不承认应该如此做，那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就必然要犯错误。就为着这样的原因，所以，自始至终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的毛泽东思想能够时时刻刻都保持着最高度的科学性，能够在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上都比别人看得更高更远，而我们党内那些不善于或不肯认真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的矛盾的教条主义者，在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作中总是失足，总是要犯“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就为着这样的原因，所以那些硬要否认中国有阶级存在或否认中国有阶级斗争，并企图以此来反对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潮流的人终于遭到了失败，那些反对严格地划清敌我的阶级界限而主张阶级调和和点滴改良的思想，那些反对“一边倒”的道路而主张走“第三条路线”的思想，那些否认主观努力和思想斗争的“客观主义”的思想，那些认为科学技术人员到处都可以一样吃饭而用不着阶级立场的“超阶级”的思想等等，都不能不接二连三地宣告了破产。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辩证法把事物的发展看做事物本身内部矛盾的运动，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将眼光局限于事物内部，只孤立地去看事物本身发展的原因，而丝毫也不必注意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必注意事物发展的外部的原因，唯物辩证法的主张决不如此，“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列宁论辩证法的诸要素时，把“这一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诸倾向”和“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同时列举出来。毛泽东同志

的《矛盾论》，正是发挥了列宁的这些思想。毛泽东同志并进一步规定了内部矛盾和外部原因在事物发展中的正确关系，指出“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所以，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事物的发展，并不要排除外部的原因，相反地一定要估计到外部的原因，但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研究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时期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发展，决不能撇开俄国十月革命对于全世界各国给与的巨大影响，然而俄国革命的影响不在英美帝国主义国家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却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引起了这样的结果，这就说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决定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是通过中国社会内部各阶级的矛盾运动发生作用。所以，不认真分析中国社会内各阶级的矛盾运动，而单凭俄国十月革命一方面的原因是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不是输入的，而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意思。只有那些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者和世界各国反动派，当他们破坏各国人民自由幸福的可耻的企图遭受失败时，才穷极无聊地污蔑人民的革命斗争，说那完全是依靠外力支持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妄想单纯依靠暴力从外部来压杀革命，这些狂妄行为到处遭到破产的结局，也可以作为上述真理的一个反证。

三 运用唯物辩证法 的一些基本原则

列宁“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但事物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具体的事物，都具有着相当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各个矛盾在发展过程中，在互相联系中，其地位、性质、作用是互有差别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的与次要的，互相交错而构成有机联系的总体。因此，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对立的统一的学说，是为我们指出了科学方法的一个总的方向；这就是：要想获得与客观真理一致的正确认识，必须善于去分析和解决各种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而由于事物的矛盾运动都是复杂的，因此在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必须进行全面的具体的观察和分析，任何片面的公式主义的方法，在事物的真理面前都是要宣告破产的。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充分发挥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许多基本思想。从《矛盾论》的学习中间，我们可以领会到如何运用辩证法去全面地、具体地观察和分析事物矛盾运动的一些主要原则。这些原则，据我个人的认识，可以分为如下几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 在普遍真理的指导之下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毛泽东同志论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时，指出“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

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根据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个原理，首先我们就可以掌握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这样一个原则，即在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既已确定的一些有关的普遍性的矛盾原理，作为我们研究的指导方针，来研究这些矛盾在这一事物中所表现的特殊性。例如论到现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时，列宁在他的著作里已确定了这样一个普遍性的原理，即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斗争，夺取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以便准备条件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用列宁规定的这些普遍真理作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现阶段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时我们就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着重把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矛盾原理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特殊表现加以揭发。就这矛盾的普遍性方面来说，中国无产阶级在现阶段革命运动中必须依照列宁指出的方向，和资产阶级斗争，把革命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创设条件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向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根据中国的特殊条件，认清这个普遍性的矛盾原理在中国有其特殊的表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新民主主义论》）。这样，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革命现阶段所表现的矛盾运动，就具有和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不同的特殊性。“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我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同上）。而在中国却不同，中国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和资产阶级斗争，以便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并便于创设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必须与资产阶级联合，共同反对革命的敌人。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也不是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打倒资产阶级，使革命向社会主义的性质转变，而是要继续与资产阶级联合（同时也要斗争），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再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正确认识中国革命运动的客观发展规律，必须在上述列宁规定的阶级矛盾的普遍真理指导之下来研究中国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如果忽视了列宁的普遍真理，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不知道无产阶级应该为着争取领导权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而与资产阶级斗争，那就要陷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或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把列宁的普遍真理曲解成死的公式教条硬套到中国革命上来，而不同时注意到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特殊性，不注意到两个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联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那就会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就是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联结而必须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 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不断地循环往复地进行观察研究。

毛泽东同志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

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科学研究的过程，是要按照这个人类认识的规律性，把个别特殊的事物的研究作为最初的出发点，把矛盾的特殊性的观察分析作为最初的出发点。我们经常把已被认识的普遍真理作为我们研究特殊事物的向导，但却不能把它当做客观事物认识的最初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仅仅从书本上记诵了一些矛盾运动的普遍原则，而从来也没有研究过一下与这些原则有关的客观存在的具体的矛盾运动，那么，我们脑子里所有的只是一些抽象的主观的公式，并没有真正开始认识了关于这些矛盾运动的客观真理；因为普遍原则本身也只是诸种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共同的本质。没有研究过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也就不可能真正领会有关的普遍的原理。因此，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事物的人，是要遵守着这样的秩序：首先着重地注意观察和分析当前事物的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在已被认识的有关的普遍原理的指导之下），再通过这些特殊性的研究过程，就能够概括出一些新的矛盾运动的普遍原则，或把已被认识的普遍原则更加深化，然后再以这些普遍原则（以及其他已被认识的普遍原则）为指导，进一步去研究矛盾运动中的新冒出来的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特殊性。这样就把两个研究的过程结合起来，“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由于事物的矛盾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决不可能一次就把事物矛盾运动的全部内容揭发净尽，而相反地必须不断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循环往复地进行研究，使我们对矛盾运动的认识一步步更加提高，一步步更加深入，并能够跟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这是运用辩证法研究事物矛盾的又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最早期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

依据历史唯物论的阶级斗争的普遍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所确定的关于帝国主义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阶级矛盾运动的普遍原理，首先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的特殊性。他把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各个不同的特点，按照他们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各自所表现的情形，具体地逐一描绘出来，由此概括出一些适用于中国革命现阶段阶级矛盾运动的一般原理，即：“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些从矛盾特殊性的分析中概括出来的普遍的原理，反过来又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矛盾的总的研究指导。它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中，是自始至终起着贯串作用的普遍原理。然而这些最初规定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普遍原理，并不是作为死的公式原封不动地简单地用来说明各个革命阶段的阶级矛盾，而是通过各个阶段的阶级矛盾的特殊性的分析，使这些普遍原理不断获得新的内容，而愈更深入地，愈更具体地丰富。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就对于敌人的认识来说，把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等等作为革命的敌人这一个普遍原理并没有改变，然而毛泽东同志研究了当时处于困难条件下的革命的特殊情况以及各阶级矛盾在这时期的特殊表现，揭发了敌人内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指出“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

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分析,一方面认清了当时敌我矛盾的特殊性,指出敌人虽然暂时强大,而由于其自身矛盾的发展,必然要逐渐削弱;而革命人民虽然遭受困难,却可以在敌人的矛盾中找到向前发展和争取胜利的一个条件。而另一方面,由于揭示了敌人内部矛盾的必然发展和革命人民可以利用这个矛盾的原理,也就是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普遍原理,来充实以前认识了的那些普遍原理,使我们在往后研究中国革命的阶级矛盾的特殊性时,有了更为丰富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同志后来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敌我矛盾的分析,以及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敌我矛盾的分析,都是依循着这些关于阶级矛盾的普遍原理进行研究而使之一步步更加深入更加发展的。这只要仔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可以得到更具体的了解。

第三 事物矛盾的各个侧面的不断揭露和展开,部分和总体,分析和综合的联结。

根据《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特殊性》一章中所论到的一些原理,当我们运用普遍原理作为指导来研究一定事物的矛盾运动时,为了不致把普遍原理变成僵死的公式来曲解事物,而要正确抓着这一事物的矛盾运动的特殊性,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于把这一事物的矛盾的各个侧面的特殊性加以揭露,然后把各个矛盾侧面的特殊性综合起来,才可以把握矛盾总体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即中国社会矛盾的各个侧面——的特点逐一加以揭露,然后在末了就给我们一

个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矛盾运动的总体的特殊性的结论：这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一切半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并联合中产阶级的左翼（同时要加以提防），共同反对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等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由于革命失败不久，工人农民的斗争都遭受极大困难，一部分同志甚至于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来时，毛泽东同志揭露敌人方面内部矛盾的特点，也分析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拼命压榨”，农民对地主更加仇恨，“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反革命军队的“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中”，“学生有失学之忧”，“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等等。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阶级矛盾的各个侧面的这些特点之后，就把这些特点加以综合，指出这些矛盾的总体，是具有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特殊性，犹如“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一般，革命的高潮是不可避免地就要到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东北全部及华北一部分，威胁了全国，中国国内矛盾运动就起了新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又把这些矛盾变化的各个侧面作了详细的分析，首先指出在敌人这一个侧面的特点是：“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叫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此外，毛泽东同志更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的动摇和改变，指出革命营垒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在西

北莫立了一个巩固的推动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南方红军的继续存在，工人的经济政治斗争以及反日反卖国贼斗争的开展，农民的斗争及包括东北冀东的各地农民游击战争的开展，学生运动的极大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的动摇以至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等等，根据这些矛盾的各个侧面的特殊性变化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再加以综合，指出那时中国阶级矛盾运动的总体的特殊性，说：“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列宁在论到“辩证法的诸要素”时，举出了以下各条：“事物作为对立的总和与统一”；“这些对立的斗争及展开”；“新的诸方面、诸关系等等的揭露之无限过程”。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所展开的唯物辩证法的许多原理，以及上举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所作出的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天才范例，都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些基本思想。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发展过程中，事物的矛盾的各个侧面的特点不断发生变化，而矛盾的总体也就因此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就使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要正确把握客观事物的这些辩证法运动，就必须使我们的主观的思想方法也形成相应的辩证法运动。这就是说，要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断地去揭露其中矛盾的各个侧面的变化，并据此以确定其矛盾的总体的变化以便掌握这些变化的特点来正确规定我们实践行动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

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所以,必须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去揭发矛盾的各个侧面的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矛盾总体在各个阶段上的变化,必须不断地就各个部分加以详尽的具体分析,又把部分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总体来认识,只有在思想方法上也通过这样的矛盾运动,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思想随着过程的发展正确的反映客观的矛盾运动,如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所辉煌地显示着的那样。这样才不至于使我们的认识凝固僵化而落后于或不符合于客观真理的实际,才可能避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

第四 密切注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之交错和推移。

当我们分析了事物矛盾的各个侧面各个部分,而要在这分析的基础上来综合地认识那些矛盾在其总体上的特殊性时,在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上就又有重要的原则必须注意,否则就会在复杂的事物矛盾的前面弄得茫无头绪,不知道从哪里综合起。这个原则就是:“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找出了主要矛盾,就找出

了各个的矛盾的相互联系的主要关键，就容易掌握全部矛盾联系的总的特点，因为主要矛盾是具有这样的性质：即“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使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形成了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并由此出发，指明其他的阶级矛盾如何在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之下产生了新的特点，这样也就把握住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运动即革命形势的总的特点，也即是使党有可能“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一个特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不能够捉住那主要的矛盾，因此也就不能够认识到革命形势的这些新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说：“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这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之下，主要矛盾会要发生变化，由一种主要矛盾推移到另一种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经历过的复杂的推移变化归纳为三类情形：由于帝国主义直接向我们进行侵略战争而使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是第一类的情形；帝国主义不采用直接行动而用间接的方式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这时就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这是第二种情形；“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这是第三种情形。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是由第二种情形推移到第一种情形，由抗日战

争到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是由第一种情形推移到第三种情形——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政府公然站在一边来反对广大人民。密切注意这些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之推移变化，以便及时地认清革命运动的总的形势变化并据此来适当地改变我们指导革命运动的各项政策，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和分析像中国这样复杂和曲折的矛盾运动时所必须注意的原则。

然而中国的阶级矛盾运动是如此复杂，其主要矛盾不仅是会推移变化的，而且往往是同时交错存在的。人民解放战争获得胜利，打垮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统治，美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它在国内共同压迫人民的工具，于是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就起了主要的规定作用，但同时在国内各阶级的矛盾运动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又具有了主要的性质。正如毛泽东同志很早就预见到的那样，工人阶级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必须和资产阶级斗争，以便保持国家政权始终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并始终保持其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以便继续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便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原则上来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新民主主义。

就多数矛盾同时存在的情形下来研究其总体的特点，必须着重找出其主要的矛盾，就一种矛盾来研究其矛盾的特点，就必须在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中着重去认清那一方面是主要的方面。因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而“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就是引起事物的性质变化的内在原因，就是事物的“新陈代谢”，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

的内在原因。事物矛盾的新的方面代替旧的方面取得了支配地位，这事物就由旧的性质变为新的性质。所以，密切注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推移，研究如何创造条件以便争取使原来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矛盾的新生的方面转到支配的、主导的地位，而把原来起主导作用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旧的腐朽的方面打到被支配的地位去，这是运用革命的辩证法来研究事物时所必须遵守的原则。

复杂如中国社会的矛盾，其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常常是交错地联结着的。这个特点在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现实矛盾的全部著作中，是非常巧妙地被掌握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广大人民与蒋介石反动政权之间的矛盾，其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的方面几乎完全在于后者，革命的困难情形甚至于使一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然而毛泽东同志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肯定地指出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中，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可以发生、发展起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反动政权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形之下，在某些小块地区却交错地存在着工农人民的支配权。在战争的指导上，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交错特点的掌握，更可以说是准确到臻于神妙的境地。在敌人军力强大的情形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适应着敌人在战略上的相对优势和主动地位而采取了战略的内线作战的防御的方针，另一方面却又利用和创造各种于我有利的条件争取我方在战役和战斗上的优势和主动地位，争取在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和进攻作战的方针。这样巧妙地把敌我矛盾的主要方面交错地加以安排——不是依据主观愿望来安排，而是依据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来安排——的战争领导，就使革命人民的武装力量能够在战役和战斗中一步步地消灭和削弱反革命

的武装,使后者由最初强大的优势力量渐渐向劣势方面转化,而革命人民的军队就终于会发展为强大的优势力量,在战略上也向着外线和进攻作战的方面转化,最后就能够完全打败敌人。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样交错地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辩证法:他们或者只看见敌人的强大和优势的一方面,因此就不管是在战略上,或是在战役、战斗上,都采取单纯防御的挨打方针;或者他们又只注意到革命人民的军队在某些战役、战斗上获得了歼灭敌人的胜利,就不顾整个自己的军力还居于劣势,就以为在战略上也应该采取外线的进攻方针了,这种对于辩证法的无知,就使他们终于把自己陷于被动和失败的境地。所以,细心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何交错地联结着,是研究复杂矛盾时不可不注意的原则。

以上就是我们从《矛盾论》的学习中所看到的一些运用辩证法的主要原则,要善于运用辩证法来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和解决矛盾,就必须学会活用这些原则。

四 正确掌握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 是解决矛盾的主要关键

事物的内在矛盾使事物分裂为两个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对立方面,这些对立方面又互相联结而不可分,也就是又具有着同一性、统一性或一致性。研究事物的矛盾运动,就是一方面要研究矛盾基础上的那对立方面具有着什么样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而又要研究那对立方面互相间如何进行斗争,以及斗争性和同一性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具体地认识清了矛盾的对立方面的这些特点,就

能正确掌握矛盾的运动和解决矛盾。

就对立的同一性来说,毛泽东同志依据列宁的思想,把同一性分为两种情形,即:“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列宁指出对立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因此,要认识事物的对立一方面的同一性,就必须研究这种同一性所依据的

地掌握对立的同一性,是不可能正确解决事物的矛盾的。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解释和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斗争的绝对性的思想,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对立的同一性,是在对立的斗争的基础上存在着。不论是对立双方互为条件地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情况也好,或是对立的一方向他方转化的情形也好,都是通过对立的斗争的。“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统一体中共处的关系,存在于工人阶级为坚持共同纲领的原则而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也不可免地要经过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定的斗争。事物的矛盾通过斗争而得到暴露,又通过斗争而得到解决。“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斗争是事物运动的绝对的规律,所以,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要面对斗争,正确地贯彻斗争,而决不回避斗争。

说对立的斗争在事物的运动中具有绝对性,这并不是说斗争的形式可以任意造作而不必依事物的性质和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对立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单就社会的矛盾运动来说,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思想斗争、军事斗争等等的形式。对武装的反革命敌人,革命人民采取武装斗争或军事斗争的形式,对于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

人民国家采取经济斗争的形式，情节严重的采取法律惩办的形式，情节轻微的也可以采用思想斗争的形式，即教育改造的形式。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一律采取思想斗争的形式。在反动统治下革命的斗争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形式，有合法的与非合法的形式。事物是多种多样的，其矛盾运动的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决不是一说到斗争，就全包含着杀人流血或暴力冲突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要依据客观的条件掌握适当的斗争形式，才不至于犯错误，才不至于造成混乱。

在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中，毛泽东同志依据列宁的一些基本思想，把对抗形式的斗争和非对抗形式的斗争加以区别，指出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斗争的一切形式。只有当某种矛盾发展到必须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矛盾时，才成为对抗性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革命人民与反动统治者的矛盾，是具有对抗性质的，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没有革命和革命战争，就不能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但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所表现的矛盾，一般的就没有这种对抗性。因此，我们必须依据矛盾本身之是否具有对抗性，来掌握适当的——对抗或非对抗的斗争形式，掌握适当的解决矛盾的方法。然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也应该看做是具有同一性而可以互相转化的。“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学习了这些辩证法的原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掌握斗争形式来解决矛盾的时候，应该如何注意到高度

的灵活性。这些创造性的原理，是毛泽东同志依据丰富的革命经验作出来的哲学的结论，反过来，又能够对革命起着指导的作用。

五 结 论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唯物辩证法——对事物矛盾运动给与正确的观察、分析和解决的科学方法——的全部丰富内容。很明白，如果我们的确学会对于这个科学方法的理解并运用它来研究一定的事物，就有可能正确地认识这些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就有能力预见有关事变发展的趋势，并依据这样的预见来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行动，正确指导我们的科学实验、生产运动或革命斗争。然而，科学的研究，必须以充分的大量事实材料为基础，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事物矛盾的全面的分析，而研究才不会落空，才不会带片面性的错误。如果以为只要记熟了《矛盾论》所阐述的那许多原理，不必首先就研究范围内的事实材料进行辛勤搜集的工作，就可以从事真正科学的研究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是错误的。这样做的人要不成为教条主义者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要想学会真正理解《矛盾论》所阐述的那些原理，要想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正确地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必须首先创设这样的条件：对于必要的事实材料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工作，密切地注意有关的一切实践经验——群众的和个人的，生产方面的或阶级斗争方面的。有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基础，也就是有了充分的感性知识做基础，才可能就这上面来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才可能运

用唯物辩证法来从事科学的分析研究，才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才能避免教条主义的空洞抽象的毛病。这是学习《矛盾论》不可不注意的一个根本点。

（注）文中的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都是引自《矛盾论》。

（一九五二年六月《新建设》
杂志第六期）

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职能 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一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了五周年了。五年来每届国庆节，都是检阅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中获得的成就的喜庆日子。这次国庆节也不能例外。迎接这次国庆节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和根据宪法所组织的新的国家领导机关的成立。

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我们就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就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道路。五年以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完成了规模浩大的各项民主改革工作和经济恢复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目前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国家领导机关的成立，说明我们人民民主政权又进一步地发展，更加完善和更加巩固了。它对于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胜利完成，将给予有力的保

证。

“一切革命底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页）不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就谈不到社会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变革，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中国先进人物在百多年间为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奴役地位而斗争，牺牲了不知多少头颅和鲜血，直到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中国社会的面貌才根本改变过来。新中国几年来的许多重大成就，都是在人民政权的领导下实现的，没有人民政权，任何一种成就都是不可设想的事，没有人民政权，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道理都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对于人民政权的意义，都有了足够的理解了。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政权究竟有些什么作用，它的职能是些什么？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弄得很清楚的，相反地，有些人的认识甚至于是错误的。例如有的人把政权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机械地加以分割，以为政权工作似乎和经济与文化建设工作没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虽然承认人民政权做了许多巨大的工作，但他们却没有注意最重要的一点，即人民政权的重要职能，正是在于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对于人民政权的意义认识不足，就不能以充分积极的态度来关心政权的建设和应用政权的力量以保证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贯彻实现。因此，应该改正这种认识不足的情形，应该对于人民政权的作用和职能加以认真的研究。

二

国家、政权和宪法，是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随着它所适合的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后者的产生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一九四九年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这个新政权的成立，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经济方面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和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革命的胜利剥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使之变为人民国家的即全民所有的财产，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使之归农民所有，这样就消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时期。在这里面，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或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已开始形成中，并且作为各种经济成分中的决定的领导的因素而存在。新中国人民政权的成立，正是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出现，正是适合向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的这种经济发展趋向的。

但是，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又不只是反映经济基础，它反过来又要积极地为经济基础服务。斯大林说：“基础之所以创立上层建筑，也就是为了要使上层建筑替它服务，要使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起来和巩固起来，要使上层建筑积极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

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摧毁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3 页)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新中国人民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是体现着这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它不仅只消极地反映着新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出现和成长,而且还要积极地用一切办法来帮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实现,帮助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中国逐步形成起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起,我们的人民政权就开始在全国许多重要的经济命脉部门组织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用主要的力量来帮助它发展,极力使它在各种经济成分中发挥领导的作用。人民政权帮助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发展生产,鼓励和帮助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人民政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限制其危害人民的消极方面,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它们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政权的一切政策措施所遵循的指导方针,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这些思想规定为自己的主要内容之一部分。它的《序言》一开始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问,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宪法,将要在过渡时期有力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和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消

灭，保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作为保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决定力量，有着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旧社会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根本不可能产生，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必须“在空地上”把社会主义经济从头建立起来，所以，人民政权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有根本的区别；资本主义的经济，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成熟了，资产阶级通常只要从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就能保证已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就算完成了革命的任务。而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取得政权的时候，才只是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候，也就是说，才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人民政权必须担当从开始到完成的全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没有人民的政权，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经济。

第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它必须直接领导和管理经济的工作，这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也是根本不同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生产资料分别掌握在各个资本家手中，资本家为了各自牟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而进行生产和经营，资产阶级的政权是有可能来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领导和管理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组织经济只是资产阶级私人的事情。资产阶级政权只能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保护资产阶级利益、镇压劳动人民的职能，而不可能有组织经济的职能。而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制度下，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的领导，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既然生产

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其中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又是最具有决定作用的，因为没有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没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也就不会有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那末组织经济就不再是任何私人的事情，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事情了。这就决定了代表整个社会的人民政权必然要成为国民经济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在我国，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依据经济发展法则来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通过我国人民民主政权来实现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进一步扩大，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组织经济的职能将占居更重要的地位。

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个方面——作为基础的，我国人民政权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逐步地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确立起来，使之成为我国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一切国营经济，包括国营工业、国营贸易以及国家银行等等，都是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以国家作为代表并直接由人民政权掌握的经济。宪法规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第六条）但人民政权不仅只直接掌握着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并且还要依靠着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来指导和帮助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组织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使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逐步走上集体化的道路，把他们的个体所有制的小商品经济逐步改造为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人

民政权的这个职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是这样规定着：“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且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第七条）

上层建筑不但要帮助自己的基础形成和巩固起来，而且要帮助自己的基础来逐步消灭过了时的旧基础。过渡时期包含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也包含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经济虽然还有着它积极的一方面，但随着时间的进展，就愈益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新中国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合的种种矛盾。作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过渡时期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因素。人民政权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同时担负这两方面的职责；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同时要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大家知道，我们的国家已采取了适合于我国情况的正确的政策来贯彻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职责，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人民政权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进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以便逐步消灭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并用全民所有制来代替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政权的这个职能，说：“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第十条）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各种形式的限制和改造政策的过程中，不能不遭到资产阶级的种种的反抗。因此，在过渡时期，工人阶

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必然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斗争，工人阶级如果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反抗，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民政权为着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实现，就要用力制止资产阶级的各种反抗行为。过去一个时期，资产阶级曾大施其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猖狂地向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权进攻，工人阶级和人民政权通过“三反”“五反”斗争，才把这个进攻打败了。在最近国家积极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又以经营怠工、抽逃资金、破坏机器设备、变生产资料为消费资料、收买和腐蚀工人职员等等的非法行为来进行反抗，人民政权也注意到了这些反抗行为，要用力加以制止。宪法规定“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第十条）这就为克服资产阶级的各种反抗行为树立了法律的根据。

但是，在人民掌握着政权的情形之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并不需要采取爆发的形式。在这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从上而下的领导，并取得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基本群众从下而上的直接支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成分，和逐步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来实现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第四条）这就体现着上述原理。这就是说，由于有了人民的政权，就可以保证通过和平的道路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来完成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就这一点来说，人民政权的意义也是极

其重大的。

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依据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以及社会主义的其他重要经济法则如象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这就是说，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那种无政府生产的混乱状态，把全部国民经济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逐步纳入计划的轨道，而这计划又必须安排得适合于如下的原则：即使得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保持一定的恰当的比例，以便保证社会的生产能够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来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很容易明白，这样规模宏大的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把全部国民经济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逐步纳入一定的计划轨道的庞大无比的组织工作，除了人民的国家，除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之外，任何其他的势力都不可能担当起领导的任务。只有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而不是鼠目寸光、只照顾少数人眼前利益的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的政权，才可能抱定伟大的决心来从事象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样艰巨的事业，才有足够的威信来领导人民自觉地从各方面厉行节约，以便积累巨量的建设资金，并把主要的资金力量集中到重工业建设方面，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只有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唯一职责的人民政权，而不是那些在资本巨头面前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政权，才有能力来制订并实施一定的国民经济计划，才能够通过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业、农业、交通、财政等等部门，按照计划来领导并管理经济，才有能力保证在首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相应地促进轻工业、农业以及交通运输事业等等的发展，以便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得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逐步有所改进。只有工人阶级领

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才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来采取粮食、油料、棉布等重要物资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样重大的措施，来对资本主义的投机破坏活动给予致命的打击，来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因而既有利于农村的生产，也有利于城市的工业建设。关于人民政权的这些职能，宪法概括地作了这样的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第十五条）

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在实现其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职能时，必须充分发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通过增产节约运动、技术革新运动、劳动竞赛运动等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正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宪法这样规定着：“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十六条）

根据以上所说的一切，就可以完全明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我们的宪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有着多么巨大的积极作用。在这过渡时期，它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它积极地帮助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成长和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它帮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发展成统治的经济形式，也就是说，积极地帮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

三

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是工人阶级的政权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职能，也是与资产阶级政权或其他剥削阶级的政权根本不同的一个特殊的国家职能。除此而外，人民政权还有着两个一般的国家职能，即对外保卫国家的职能和对内镇压反动阶级和维持革命秩序的职能。很容易了解，这两个职能，虽然没有直接组织经济生活的作用，但仍然是与经济建设密切攸关的。首先，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巩固的国防力量，不能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不能粉碎侵略者的挑拨和进攻，就不可能保证国内人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如果美帝国主义者军队打到了我们的东北边境或甚至于侵入了我们的边境，那末，我们东北的工业建设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一些成就，这是很清楚的。其次，如果我们的国家不注意警惕反动派的各种可能的破坏活动和暗害阴谋，并及时把它镇压下去，如果对于资产阶级的投机捣乱以及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种种坏事不加以及时制止，如果对于违犯革命的法律秩序，违犯劳动纪律和工作纪律的行为不有所制裁，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如果我们过去不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给潜伏的反革命势力一个严重的打击，如果我们不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猖狂进攻和制裁了国家工作人员中的某些违法行为，我们就不能象今天这样比较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

改造工作，这也是很清楚的。

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所具有着的决定意义，要求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来把人民政权建设得更加完善和更加巩固。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宪法的通过和新的国家领导机关的成立，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完善和进一步巩固的标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使人民政权的民主性更加扩大了，它使我们的国家便于发动和组织更广大的群众来积极参加各方面的经济建设事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我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以高度的警惕性来注视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破坏阴谋，共同努力来加强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

为着进一步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全国人民必须自觉地遵守我们国家的宪法和一切法律。宪法和法律规定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工作所必须依循的一定的原则、纪律和秩序，它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的集中的表现，不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破坏人民自己的共同意志和共同的利益，就要使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步骤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难于完成。不能设想，一个工厂的工人不遵守全厂共同的劳动纪律，只凭着个人的高兴要怎样工作就怎样工作，也可以保证完成共同的生产计划。同样不能设想，一个国家的人民不遵守共同的法律和秩序，让每个人各行其是，却可以完成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必须强调守法的思想，作为每一个公民真正拥护和支持自己的政权，拥护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要反对各种轻视遵守法律，认为法律、纪律和秩序好象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的错误思想，更要反

对那种把法律看做只是为普通的“老实人”制订的东西，而自己则好象有着可以超出任何法律、纪律和秩序之上的特权的坏思想。宪法这样规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第一百条）凡是愿意使自己作为人民民主政权下面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光荣公民的人，应该经常记住这一条宪法的规定。

（一九五四年十月《学习》杂志
第十期）

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 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

实用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最反动最腐朽的唯心论哲学。这种哲学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新东西，而只是被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驳斥得体无完肤的马赫主义的一种流派。胡适这个美国的文化买办，在五四运动前后把实用主义拿到中国来贩卖。当着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开始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胡适立刻就用实用主义来帮着反动派坚决反对这科学的革命的思想。

帝国主义各国的反动哲学思潮在五四运动以后先后都输入到中国来，并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中间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影响，但其中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实用主义。这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这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日愈积极，日愈凌驾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趋向；第二，实用主义比其他的反动哲学流派更为狡猾地用“科学”的“最新”哲学的伪装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一部分旧文化的批评活动和一些考据工作加强了这种伪装作用，使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中相当多的人受到了它的迷惑。实用主义所使用的科学的假面具是：“实验室的态度”，“生物进化学说”。实用主义的反科学反革命的真面目是：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庸俗进化论。我们现在来批判实用主义，

就必须认清它的真面目，揭破它的假面具。

一、实用主义就是主观唯心论

一切有真正科学头脑的人，都要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先有物质世界，后有精神现象，承认精神、意识、感觉、思维等等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要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这一个哲学上最根本问题的唯物论的原理。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恰恰和科学所要求的这一个唯物论观点完全相反，它和欧洲的马赫主义一样，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把周围世界看做仅只是人的感觉或感觉的综合。实用主义者詹姆士说：“我们所谓‘实在’含有三大部分：(A) 感觉，(B) 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也可译作“观念”——艾）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C) 旧有的真理。”（《实验主义》）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实用主义者不承认“实在”是物质的客观实在，相反地却把实在看做仅仅是人们的主观领域以内的东西：感觉，感觉（或意象）之间的关系，“旧有的真理”等等主观的要素的复合（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实验主义》），所以“旧有的真理”也是一种主观的要素），就成为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实在”！这不是很明白的主观唯心论吗？

胡适曾跟着他的老师杜威假装说实用主义不谈唯物唯心的问题。他曾把杜威关于“经验”的“见解”作为例子，想来证明杜威对于唯物唯心的问题是采了“以不了了之”的态度，并且还因此把杜威大捧一顿，说他“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可惜得很，这样的

“大革命家”在马赫主义者阿万那留斯的信徒中间早已出现过了。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这样写着：“我们只能怜惜那些相信阿万那留斯及其一伙的人，他们以为经过‘经验’这个字眼就可以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底‘陈旧的’差别”（《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6页）。杜威也能“超越”这个差别吗？我们且举两条来研究一下。杜威说：“经验确是一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环境所起的一切交涉”。又说：“经验只是一个物观（应译作“客观”——艾）的世界，走进人类的行为遭遇里面，受了人类的反动发生种种变迁”。“经验乃我对付物，物对付我的法子”（《实验主义》）。在这里，杜威把人和自然与社会的环境，人类的主观行为和客观世界，“我”和“物”等对立的两方面包括在他的“经验”概念之内，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掩盖了哲学上的唯物论的路线和唯心论的路线”（《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第175页）。然而，实际上怎么能掩盖得了呢？既然涉及到了主观和客观、我和物、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回避那划分哲学上唯物论路线和唯心论路线的根本问题：“两者之间那一方面是第一性的？那一方面是第二性的？”如果杜威在他的“经验”的概念里面，把人的主观，我，看做第一性的，而客观环境和物都要依赖着我的主观为转移，那么，他仍然只是在唯心论的路线上来解释经验，而并没有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而事实上恰恰就是这样。为要证明这一点，不妨让我们先来看看杜威如何了解“环境”这个概念？杜威说：“环境，换句话说，就是与个人的需要、欲望、目的和能力相互作用着以构成现有经验的任何的条件。一个人即使建筑一座空中楼阁，他也是与其在想象中所构成的对象相互作用着。”（《杜威的哲学》，拉特纳尔编，1939年纽约版）这些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杜威

没有把“环境”看做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在外界独立存在的客观条件，而仅只是在与人们主观的需要、欲望、目的和能力等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存在的条件，并且它的存在是与我们主观想象中所构成的“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原则区别的。这还不够明显吗？这不是主张客观环境依赖人的主观为转移吗？这不是把我和主观当做第一性的东西而把客观的物、环境当做第二性的东西吗？这不正是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站到了唯心论方面来了吗？杜威何尝真的能够“以不了了之”的态度来对待唯物唯心的问题？何尝能超越哲学的这两条根本路线？杜威对“经验”的故作玄虚的“见解”，不过是想掩盖他的主观唯心论路线吧了。

承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了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也就要承认这样的事实：物质世界的变化发展，是遵循着它自己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依赖着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认识这些规律，并且利用这些规律来为社会谋福利，但决不能违背这些规律，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意志任意改变、创造或消灭物质的变化发展规律。实用主义的观点却与这唯物论的原则完全相反，它既然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把“实在”看做感觉等主观要素的复合，它就不能不由此做出荒谬绝伦的结论，认为“实在”是完全依赖着人的意志而变化的。胡适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验主义》）杜威也引用詹姆士的话说：“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样。”在这里，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的面目已十分露骨地表现出来，它的荒谬可笑，也是非常明白了。诚然，实用主义者胡适之流在他们的言论文字里是经常做着无耻的涂抹现

实，颠倒是非的勾当的，但实际生活到处都在粉碎这种胡说。首先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胡适就没有“百依百顺”，胡适的一切替反动派“涂抹”脂粉的卑劣行为始终没有能够阻止住中国革命的胜利。胡适的一切反动言论和行为违背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因此它就被历史前进的车轮压得粉碎。

二、主观唯心论的——不可知论的认识论

如上所说，物质世界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是能够为人们所认识的，是可知的，人的主观认识就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根本观点，也叫做反映论的观点。这也是真正的科学所要遵循的认识论观点。科学的理论知识，就是自然界或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我们所以对科学予以高度的重视，就是因为科学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使我们有可能指导自己的实践行动——生产建设，阶级斗争，等等——获得胜利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向导，认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就能够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斗争，既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正在逐步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实用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和以上所说的完全相反。它是一种不可知论的，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实用主义者既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也就否认了任何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变化发展

规律的知识。杜威反对“把人人的知识看作一面镜的样子、把‘实在’照下来便是”的反映论观点，而主张“知识并不是镜子、是用的东西、各方都用得着。感觉理性、都是帮助有机体的生存能力”（《杜威五大演讲》下册，第70页）。实用主义者认为人的认识不能反映感觉以外的任何客观事物及其内部规律性（因为后者的存在是他们所不承认的，至少是他们认为值得“存疑”的）。即使是科学规律的知识，也被实用主义者看做主观的虚构，而不是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反映。胡适说：“（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实验主义》）。口头上经常挂着科学两个字的实用主义者，却这样无耻地来诬蔑科学。真正爱护科学的人，要打这些用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来“鱼目混珠”的文化奸商的耳光！科学是什么？列宁说：“科学的宗旨就是提供宇宙底真正的……写真”。科学就是研究客观世界一切事物发展规律的学问。自然科学，就是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学问，“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与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5页）科学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能够为人所认识这一个唯物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在真正科学的领域里，没有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立足的余地。斯大林说：

“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能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规律的那些已由经验和实践考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而只有现在尚未认识，但将来却会由科学和实践力量揭示和认识之物。”（《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中文版，第714页）

所以,科学知识决不是“人造的”和“假定的”,决不是主观的虚构,而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科学知识之所以成为这种确实的知识,是因为它经过了或者经得起人类社会实践的考验。自然的和社会的科学知识在我们的实践——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等——的基础上产生,并且又指导我们的实践获得胜利,这就能证明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恩格斯说:“既然我们能够用亲自制造出自然界某一现象、依这现象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事实,来证明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理解的正确,那么康德所说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54年版,第22页)所以,自然科学的知识,由于通过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检验,就证明了它是反映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具有客观真理性的知识。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之能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被压迫与被剥削群众的革命斗争的规律,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规律,这是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苏联,中国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of 长期实践斗争中已经反复被证明过了的。

三、抹煞真伪标准的“真理”观

唯物论的认识论指明认识是客观事物在人类主观意识里的反映,认识的正确与否,决定于它的内容是否如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现实事物,是否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所以,是与非之间,真理与谬误之间,是有着严格的客观标准的。人的认识能够

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这就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否则就是谬误。这也是一切真正有科学头脑的人所要承认的原则。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恰恰又和这一个唯物论的原则完全相反，把真理看做纯粹主观的东西，实用主义者否认了任何能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把人的认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看做仅仅是人们主观地虚构出来的“应付环境的工具”，因此，在他们的眼中，一种知识是否具有“真理”意义，就不是决定于它是否能够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所以也就完全谈不到反映客观现实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种知识、思想能否帮助他们达到按照他们的主观要求来“应付环境”的目的。这就是说，他们不承认是与非之间，真理与谬误之间有任何客观的标准。他们把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完全看做主观的，胡适说：“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对付，便是真理”（《实验主义》）。科学的真理，在实用主义者看起来，也并没有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只是人们在主观的应用上认为最方便的一时公认的假设。“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实验主义》），所以，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一种思想是否科学真理，是决定于它是否被人们“现在公认”为“最方便的假设”这一个主观的标准。按照实用主义的这些荒谬观点说来，那么，科学知识和神话迷信以至于谣言诽谤之间，就没有甚么本质的区别，并且甚至可以互相同一起来了。神话迷信如果一旦被人们“现在公认”为“最方便的假设”，实用主义者就一定要把它当作“真理”看待。反之，即使是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如果对于实用主义者的种种卑鄙无耻的反动行为有所不便时，

他们就要厚着脸皮来否认它的真理性。所以，实用主义者詹姆士可以把上帝的信仰叫做“真理”，胡适可以强词夺理地否认帝国主义侵略和否认旧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却采取了疯狂的反对态度。实用主义者捏造这种抹煞客观真伪标准的“真理”观，原来也正是为着要使它成为反动派用来抹煞革命真理，任意“涂抹”现实，任意捏造谎言这样一种“应付环境的工具”！

这样，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的“真理”观，同时也是完全相对主义的。实用主义者既然把他们的“真理”看做只是人们一时公认的“应付环境”最方便的假设，因此就不承认“真理”的任何绝对的性质，而认为它是可以随着实用主义者以及实用主义者所拥护的反动派的主观的“公认”与否而随意改变的。胡适说：“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实验主义》），这就是说，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真理”，是依赖着实用主义者的主观——“我”为转移的，“我”认为方便的才是真理，我认为不方便的，那怕是科学上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客观法则，“我”仍可以抹煞它的真理性。“我”可以依着我认为方便与否这一个主观标准来随意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相对主义“真理”观所必然要得到的逻辑上的结论。

人类对于真理的认识有着相对性，这决不等于说认识内容的真伪可以随着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愿望为转移。真理的相对性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的相对性，是由于客观事物是依着条件地点时间为转移的不断变化发展的事物。客观事物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具体过程都是相对的，因此，“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毛

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但是,第一,一定具体过程的认识的真理性虽然是相对的,但它之所以具有真理性,首先是由于它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而并不是由于它是“我”认为方便的假设。真理与谬误决不是依“我”的主观为转移,而要看它是否反映了客观现实。是非真伪的标准永远是在客观方面,这一点却是绝对的,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的,任何时候也不是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的实用主义者所能随便颠倒的。第二,真理的相对性既然是来源于它所反映的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的相对性,因此,这里的相对性的意义,只是说我们的认识应该跟着事物的发展而发展,不应该停顿在固定的一点上,如果满足于现有的知识成就,不知道跟着新鲜事物的出现而努力求取新的知识,或者把对于旧事物的认识当做死公式来硬套到新事物方面,我们的认识就不免一定要发生错误。真理的相对性,决不能解释成为我们可以在自己主观上认为不方便的时候就随便抹煞一种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一种科学知识只要是正确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某一具体过程,它之符合于这一过程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性是任何时候也不容抹煞的。就这一点来说,它的真理性就具有绝对的性质。我们只能说当具体过程已发生变化时,这种科学知识对于新的过程就不能适用了,或者说应该把它补充、发展,就这一点来说,它的真理性才是相对的。因此,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决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因为它在已经改变了的条件之下不适用,就能否认它之作为正确反映一定具体过程的客观真理,就能把已被实践证明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知识,又叫做谬误的东西。“真理变成谬误”(《反杜林论》,转引自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1953年版,第162页)这话的意思,只是说当我们错误地对待这些知识的时候,当我们把它当做死的

公式乱套到不相适应的过程上的时候，就会在我们主观上造成自己的认识的错误，这里也不容许实用主义者来颠倒是非。第三，一定阶段上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虽然是相对的，但作为无数具体过程的总和的整个宇宙，却是绝对存在。人的认识发展也反映了这种客观情况：反映了一定具体过程的认识虽然只有相对的真理性，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反映总的宇宙的绝对真理。所以，与实用主义者的纯粹相对主义的谬论相反，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相对真理，绝对真理也是存在的。相对真理中就具有着绝对的性质。反映一定具体过程的每一种相对真理，作为客观真理来说，它已经就是绝对的。并且它本身又是总的绝对真理的一个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也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

四、不是科学的进化论， 是庸俗的进化论

实用主义者用生物进化学说的名义作为自己的反科学思想的假面具。它把主观唯心论装扮成好象是符合于进化论学说的科学观点。它标榜着用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生活。谁都知道人类社会生活有自己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决不能简单地归结到生物界的进化规律之内，实用主义者这样做，是既曲解了人类生活，也曲解了生物进化学说。

实用主义者把人的经验、知识、真理等等看做仅仅是“应付环境的工具”，硬说这就是应用了生物界适应环境的科学原理。这是对于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的一个极大的诬蔑！前面已经说过，人

类的认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科学知识反映着客观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性，人类掌握了正确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科学真理，就能预见周围事变发展的前途，就能使自己的实践行动成为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的行动，就能使自己的斗争——生产斗争，革命运动等等——战无不胜。决不能说人类的行动都是动物式的没有理性头脑的清醒指导的“应付环境”的活动，决不能说人类的认识、科学真理等只是这种盲目地“应付环境的工具”。实用主义者把人类的认识看做“应付环境的工具”，这仅只是反映了实用主义者自己本身的生活和思想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如果就胡适一流的实用主义者及其所拥护的反动派的生活和思想来看，那倒可以说是有些方面和动物类似的。历史发展规律注定了一切反动派要走向灭亡，他们不敢正面认识，因此也就不敢承认周围事变的客观规律，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盲目的垂死的挣扎。因此他们需要寻求任何可以帮助他们苟延残喘的“应付环境的工具”，而实用主义者就替他们谋算起来，说可以把“经验”，“知识”等等也当成这样的工具，于是他们就在这样的目的之下捏造了一套不可知论的——主观唯心论的谬论。就其“应付”的盲目性这一点来说，反动派的生活情形和实用主义者的说教，确实具有着动物式的特点，但这与广大进步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是完全不相干的。并且，动物适应环境的生存运动，是要改变自己的有机体的性质来适应自然界的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也就是自发地依循着一定的客观发展规律的。生物的适应环境的行为，并没有包含着实用主义者的那种主观唯心论的妄想，并没有丝毫想要把“实在”当做可以任意“涂抹”和“装扮”的“很服从的女孩子”的企图。但实用主义者谈到“应付环境”的时候，却是抱着极端狂妄的主观唯心论幻想的。杜威说：“生活的进

行全在能管理环境。生活的活动必须把周围的变迁一一变换过；必须使有害的势力变成无害的势力；必须使无害的势力变成帮助我们的势力”（《实验主义》），反动派已经日愈走向垮台，但它还要用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办法和“工具”，来进行盲目的疯狂挣扎，妄想按照自己的主观目的来任意把“周围的变迁一一变换过”，以图苟延它的“管理环境”的统治地位，这就是实用主义者所谓“应付环境”的真正意义！实用主义者把生物进化论里“适应环境”的概念偷来作为自己的招牌，实际上生物适应环境的进化规律和实用主义者“应付环境”的主观幻想，是根本不相干的。

胡适散布“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的谬论，否认“根本的解决”（《新思潮的意义》），并把这也假装作科学的进化论的思想，人们知道，胡适的这种臭名昭著的谬论，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中国的先进人物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运动高涨起来的时候散布出来的。历史早已证明，在旧中国那种极端残暴腐朽的反动派统治下面，不进行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使历史前进，在那样的情形下面，口头上讲一点一滴的进化，反对根本的解决，就是在实际上一点一滴也不要解决，就是实际上根本不要进步。胡适自己的全部行动，都足以证明这种庸俗进化论思想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人类社会历史包含着阶级斗争和革命变革的运动，生物界的进化过程里则不存在这些运动形式，所以决不能把生物进化的规律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运动。并且，生物的种类变化也是一种飞跃性质的根本变化，虽然这种飞跃是采取逐渐过渡的形式，但究竟不能仅仅归结为“一点一滴的进化”。所以实用主义者在这里也曲解了生物进化规律，它所宣传的并不是真正科学的进化论思想，而

只是一种庸俗进化论的谬误观点。

胡适所散布的庸俗进化论思想和真正的科学的进化论还有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就是科学的进化论证明了生物界的运动发展有着一定的必然的客观规律，而胡适的庸俗进化论则把发展看成一大堆没有任何秩序的事件的偶然凑合。胡适曾把个人的偶然行为的作用加以极度的夸大，想借此来淹没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一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善亦不朽，恶亦不朽；功盖万世固然不朽，种一担谷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很容易明白，这种偶然性崇拜的反科学观点，也是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唯心论否认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就不能不把一切事物及其变化过程都看做偶然的東西。这种唯心论的狂妄胡说是经不起一点认真的驳斥的。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虽然不断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支配发展过程的东西究竟是必然的规律，偶然因素所引起的任何偏差终归要被必然的大潮流所淹没。不要说吐一口痰和喝一杯酒不会有任何“不朽”的作用，就是象胡适那样以个人毕生的力量来帮助反动派欺骗人民反对革命的活动，因为违反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规律，结果还是要被革命人民所粉碎，就是现在还遗留的一些思想上的有毒影响，也终归要被人民清除得一干二净的。实用主义者的这种崇拜偶然性的荒谬观点在事实前面根本站不住脚。实用主义者散布这种胡说的作用，无非是妄想借此来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规律的存在，否认阶级矛盾、新旧事物矛盾及其诸方面的斗争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容和源

泉,也就是妄想借此来反对科学规律知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这又不过是反映着接近灭亡的反动派希图依赖什么偶然奇迹来侥幸得救的这种盲目挣扎的绝望心理罢了。

五、不是科学方法,是主观唯心论者 “应付环境”的方法

实用主义对于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的迷惑作用特别在于方法方面。实用主义者以“实验室的态度”作为标榜,而把自己的方法伪装得最象科学的。许多受迷惑的人把这种伪装误认为就是它的实质。其实,实用主义的方法根本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真正科学的方法,它实际上是主观唯心论的虚构事实的方法,是帮助反动派“应付环境”进行垂死挣扎的方法。

实用主义的方法仅仅在形式方面好象是科学的。胡适把这个形式概括为三个部分或三个步骤:“(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杜威先生与中国》),有时他把这形式写得更简单一点,那就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我的歧路》)这样的形式很容易和真正科学的方法相混同,如果我们单只注意到它的形式,就难免要受到迷惑。要揭露实用主义的方法的反科学性,必须把它的形式和它的主观唯心论的内容联系起来进行批

判,才能达到目的。

先说实用主义方法的所谓第一步,即“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或“细心搜求事实”。这里的反科学性在什么地方呢?这就在于实用主义者所标榜要搜集的“事实”,并不是真正科学研究开始时所要求的事实。科学的研究首先需要有正确的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向导,不容许没头没脑地向“事实”里乱钻。这里所说的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这个科学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下,科学的研究首先要求我们“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要求在开始研究以前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800页)。这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严格地遵守着唯物论的原则,要着眼在“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和“详细地占有材料”上面,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掺杂在中间,这与实用主义者泛泛地讲到的所谓“从具体事实与境地下手”与“细心搜求事实”有原则的不同。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决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而是互相有机地联系着的,实际事物中间有主要与次要之别,有根本的东西与非根本的东西的区别,科学的研究就必须依据着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方面要详细占有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又一定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一些根本事实方面,以此作为分析和贯串一切事实材料的核心。例如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实际事物是生产和阶级斗争,因此在着手研究人类社会的问题时,就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生产和阶级斗争这些根本事实上面,必须把阶级矛盾的分析研究作为研究的中心环节。例如研究历史,就必须以历史上的生产发展情况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作为研究的中心环节,而不应该把地理、人口以及思想文化条件作为中心环节(虽然这些也是应该研究的),研究

古典文学（例如红楼梦），必须把重点放在作品的阶级背景和阶级内容的分析上，而不应该象胡适那样放在作者、本子上等次要的事实上（虽然这些事实的研究也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来着手研究，才可以希望完成科学的研究所要求的任务。只有把出发点布置得正确了，然后向前面去才不至于走错路。

说到实用主义者所谓的“事实”和“境地”时，我们不要忘记实用主义者把“实在”看做人的感觉，感觉之间的关系等主观要素的复合，看做“百依百顺”任人“涂抹”“装扮”的“很服从的女孩子”，看做一大堆没有秩序的偶然事件的凑合。这些唯心论观点在科学前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但实用主义者的研究方法的思想基础，却正是这些主观唯心论的谬误观点。当实用主义者说到“细心搜求事实”的时候，他们不是严格按照“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来“详细地占有材料”，而是依照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选择的目标”，依照偶然的“疑难的境地”（《实验主义》），来提出问题和着手研究的。他们决不肯依照“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本身的秩序，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某些根本事实上，相反地却凭着自己的主观的“兴趣和意志”把一些次要的事实和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所以，胡适把古典文学的作者、本事的考据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而把作品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内容根本撇开不谈。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也凭着主观的偶然兴趣在怡红院的姑娘们排座次等类枝节的问题上花费了极大的力量。这样的研究结果最多只能在材料校勘性质的工作上——例如一个字的意义或一本书的作者上做出一点成绩，而对于事物的本身则越闹越糊涂，不能够认清它的本质和规律。至于胡适把中国社会混乱的原因归之于自己闹“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我们走哪条路》及《附录一》），而抹煞了帝

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存在这些根本原因，这更足以暴露实用主义者“搜求事实”的方法并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而只是依据着支持反动派这个主观的目的来任意罗织事实吧了。

现在再说第二步——假设的问题。科学的研究常常要经过假设的阶段；当对事实材料已经作了某种程度的分析研究，从这里初步归结出一些理论原理原则来，但还没有能够最后确定它是否完全符合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时，我们就把这些原理原则看作待证的假设。要等到再进一步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它确是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时，才把它肯定作具有完全的客观真理性的科学规律。科学的假设经过实践的检验而被修改或补充，甚至于根本改造过来，这种情形也是常有的。但是，科学的假设虽然还不是最后确定的客观真理，但它是人们通过科学的研究来认识客观真理的一个步骤，所以，科学家就必须力求使自己的研究所作出的假设尽可能地与客观真理相一致，力求尽可能地使它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因此在制定假设的时候，第一，就必须以丰富的事实材料作基础，特别是要能够掌握最主要最根本的事实。没有丰富的事实材料或没有抓着根本的事实，而只依靠一些枝节的事实，就不能按照尽可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这个目标来做出假设。没有阶级斗争的事实材料，就不可能在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作出尽可能与客观真理相一致的假设。第二，在作假设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实事求是，极力避免主观主义的因素。必须在科学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之下，细心地分析事实材料中所显示着的事物各方面的具体矛盾运动，如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必须细心地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的矛盾运动等等。所以，

制定科学的假设，必须以谨严为原则，而不应该以“大胆”为原则。实用主义者胡适标榜“大胆的假设”，这不是科学的方法，而只是主观唯心论的方法。主观唯心论者——实用主义者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在于要依着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的“选择的目标”，来找到某种“应付环境的工具”，他们本来不敢面对客观真理，所以就不得不做出种种“大胆的假设”，也不怕这些“大胆的假设”终归要成为骗人的“大胆”的虚构或“大胆”的武断。胡适为了帮助反动派满足“应付”人民革命运动的目的，不惜武断说帝国主义者也希望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并没有侵略中国。他武断到如此不要脸的程度，以至于连当时拥护他的主张的梁漱溟也替他担心，并写信给他表示恐怕这些胡说连“三尺童子”也骗不了。（《我们走哪条路》及《附录一》）在这里，“大胆的假设”与科学研究的方法根本没有关系，它只是帮助反动派虚构了一些无耻的谎言。

认清了实用主义者的“大胆的假设”是怎么一回事，也就可以明白他们是怎样“求证”的了。科学的假设必须经得起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的检验。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所做出来的“假设”除了某些个别的事实材料考据之外，常常是一些主观的虚构或主观的武断，这样的假设，当然是经不起实践——首先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的检验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实用主义者口口声声所谓的“细心求证实”，当然并不是表示敢于依照科学的要求，把自己的言论拿到实践的前面来求证明，而只是说要“细心”地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拉扯一些表面现象，来掩饰自己的谎言。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谎言，如果需要掩饰，多少都可以找到一些足以用来掩饰的表面事实的。胡适可以拉一篇帝国主义者的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宣言，来“证实”帝国主义者也希望

中国和平与统一，可以把美国在中国办的利用来作欺骗和侵略工具的教会、学校、医院等等，作为帝国主义不要侵略中国的“证据”。这里，实用主义者的主观唯心论又起了方法的作用：这种反动哲学观点要我们相信“实在”就是感觉，相信一个一个的表面现象就是一切，要我们只看见表面现象而忘记了或不要看见最根本的事实或事情的本质。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细心求证实”，原来又可以解释为用表面现象来掩盖事情的本质的意思！很显然，真正科学方法对于认识的客观真理性所要求的实践的检验，决不是这种骗人的东西！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 旗帜下前进

在纪念列宁八十五周年诞辰的时候，我们很光荣地感觉到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在引导着我们前进。为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正在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求我们认真地向列宁学习，认真地领会列宁有关战斗唯物主义的一切指示。

列宁在他一生的革命事业中自始至终都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的早期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曾彻底揭露了民粹派那些“主观哲学家”或“主观社会学家”的反动面貌。一九〇八年他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一本划时代的巨著，把流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反动最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马赫主义驳斥得体无完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曾用很大的力量钻研哲学，写出了有名的《哲学笔记》，其中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给我们作出了批判地钻研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哲学的榜样。《哲学笔记》中《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从认识论方面揭露了唯心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给了我们一个批

判和克服唯心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一九二二年他给《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指示信，号召这杂志举起战斗唯物主义的旗帜，来坚决揭露并攻击所有“一切现代‘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列宁选集》第4卷，第604页）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后战斗唯物主义的最辉煌的范例之一。它是这样深刻、这样彻底地揭露和击破了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胡说，使得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都可以从这部著作里发掘出无尽的力量源泉。

我们应该深刻地领会列宁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阶级意义的指示。列宁指出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党派性的斗争，它是社会上互相敌对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社会思想领域内的集中反映。现代唯心主义是为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如果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不予以坚决的打击，它就要极力扩大它的影响，以反科学的信仰主义的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队伍，把各种工作和斗争引向主观盲目性的方向，使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失去指导作用，并由此导致革命力量的瓦解。列宁关于经验批判主义的下述论断，对于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都是适用的。

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一斗争归根结底是表现着现代社会中互相敌对的阶级底倾向与观念形态。经验批判主义底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可以归结为：替信仰主义者在其一般地反对唯物主义，特别地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中忠实服务。

列宁之所以要下决心彻底粉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由于资产

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当时俄国已经表现了这种为反动统治者服务的恶毒作用。当俄国沙皇政府利用着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革命失败的局面，对工人阶级和它的革命政党加紧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攻击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马赫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竟然侵入到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来。一些立场不稳的党内分子竟成了马赫主义者，他们配合着反动派对革命的迫害，开始着手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和“修正”。而这种企图又采取了最狡猾和最危险的方式，那就是，他们在表面上仍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在暗中却力图摧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极端危险的企图如果不加以彻底的揭露和粉碎，而任其扩大影响，那末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将会不知不觉地在思想上根本变质，以至于成为效忠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集团，就象各国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克服了当时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对俄国党的危害。

列宁的这部著作还有这样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它把科学，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造成的危机之下解放出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上的新发现，使自然科学上关于物质构造的旧的看法遭受到动摇，由于自然科学家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来正确地总结这些成就，有些人竟作出了这样荒谬的结论，说“物质消灭了”。这样，自然科学家因为不能用正确的世界观来理解世界，就在思想上成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俘虏。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也就利用了科学家的这个弱点，把“科学”的招牌骗取到自己手里，把十八世纪英国大主教贝克莱的反科

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改头换面地假装成“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1版序言及第5章第2节）这样，列宁在批判《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就面临着要驳斥主观唯心主义对科学成就的曲解的任务。列宁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他“用唯物主义观点综合了从恩格斯逝世起，至列宁所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问世这整个时期内在科学方面，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所获得的最重大最实在的成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一节）指出这些成果只是说明我们对于物质构造的认识比旧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而不是证明唯心主义的“物质消灭了”的谬论。这些成果证明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证明我们对于物质的认识是无穷尽的，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就一步比一步更深入地认识了事物的本质。

由于列宁正确地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及帝国主义时期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二

自从中国的先进人士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中间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党派斗争。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如孙中山，虽然继续探求革命的道路，并且终于找到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但另一部分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资产阶级，却走上了坚决反对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反动的道路。

代表这些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者”们，接二连三地从帝国主义国家的哲学教授们那里搬来了各色各样反对唯物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差不多现代所有的一切最腐朽最反动的哲学流派，在五四运动前后都泛滥到中国来，主观唯心主义好象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开世界博览会。这自然是由于旧中国的半殖民地条件所产生的特殊情况：每个主要的帝国主义者不但在旧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有它的代理人，也在哲学思想上找到它的代理人。在这中间，以胡适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竟占居第一位。这又是和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凌驾到其他帝国主义之上这一种趋势相适应的。胡适并不掩饰他在哲学上和政治上一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公开地把实用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立起来，把他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对立起来。胡适的活动迷惑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吸引他们离开人民，离开革命运动，这样来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利益服务。实用主义的恶影响一直遗留到新中国来，它严重地阻碍着知识界和学术文艺界的许多人士走向人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就必须用很大力量来展开对它的批判斗争。

实用主义把自己假装作“最新的”哲学思想，但在实际上它是和马赫主义同样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流派。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早已指出过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反动的血缘关系。列宁说：“从唯物主义底观点看来，马赫主义与实用主义底差异，是象经验批判主义与经验一元论底差异一样地极琐细和极不重要的”。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一样，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企图用“‘经验’掩盖了哲学上唯物主义的路线与唯心主

义的路线，并且把两者之混淆不清奉为神圣”，但实质上却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经验，否认经验中包含着不依赖人的主观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内容。实用主义也在经验的名义之下来否认理性，也就是否认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知识，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它把真理看做主观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不承认有客观真理，不承认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的联系。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同样地把现代科学的成果加以曲解，使它变成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表面装璜，不同的只是马赫假借了现代新物理学的名义，而实用主义则利用了进化论的招牌。它和马赫主义同样狡猾地在“科学”的假面具之下偷偷地来破坏科学。

和实用主义同时，资产阶级的学者们还把其他马赫主义的流派也搬到中国来，例如英国的罗素的哲学——以数理逻辑的科学招牌为标榜的主观唯心主义——也曾流行一时而影响仅次于实用主义。与马赫主义稍有不同但同样信奉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康德主义哲学思想，五四运动前后也在中国找到了一定的市场。

还有更露骨地表现着反动面目的唯心主义思想，公开主张抛弃科学，标榜“精神文明”，叫喊着要回到古代的东方，宣扬盲目的“自由意志”，宣扬蔑视理性的柏格森式的“生命力的突进”，甚至于要求回到动物的本能生活等等，这些带有封建主义以至于法西斯因素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它的代表者包括梁漱溟和张君勱——，也在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

这就是五四运动以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蜂涌出现的一幅简略的图景。应该提到的是：这些唯心主义的流派的传播者，常常是以“自由主义”的，“超政治”和“超党派”的“纯学术”面貌出现的，然而，不论人们口头上是怎样讲

得好听，或者主观上自以为好象是多么不偏不倚，真正的“超党派”、“超政治”的哲学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些自命“超政治”、“超党派”唯心主义哲学在实际上是为反动的政治党派服务的。自然，在旧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同帝国主义紧紧勾结着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如此卑劣狭隘，如此残暴腐朽，以至于连抱有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人有时也感觉到不能完全依赖它，因而部分地也有人在政治上走到同它对立的地位，并且在全国解放后还有逐渐放弃了唯心主义思想的。但是，当着这些“学者”们在热中地散播他们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时候，他们的“纯学术”的反对锋芒不正是或明或暗地针对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针对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因此就在实际上配合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革命人民的“围剿”吗？他们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不是一致地以反理性反科学的信仰主义的热狂来迷乱人的头脑，并因此就直接间接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人的思想引导到反动统治者的法西斯哲学——所谓“力行哲学”“唯生论”等等——的方向去吗？这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最顽固最主要的代表，如胡适、张君勱之流，不是已经死心蹋地投靠了蒋介石匪帮了吗！

列宁批判马赫主义时候的俄国思想界中的情形，在中国也是有的，那就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混到革命的思想队伍里来，要来“修正”和“批评”马克思主义。

三

正如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派性原则所指示的那样，目前正在我

国展开着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外国帝国主义和一切已被消灭以及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动分子千方百计企图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影响和腐蚀人民，腐蚀革命工作干部和我们的党。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散布，就是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必须对目前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和其他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予以高度的重视。

如果有人把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看做仅仅是哲学界内部的事情，或仅仅是学术文艺界的事情，而认为同实际工作无关，那就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曾发生过种种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主观主义就是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散布，必然会促进主观盲目性的滋长。列宁指出唯心主义的危险就在于它用“信仰主义”来为资产阶级服务。信仰主义的实质也就是主观盲目性。如果任随资产阶级用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来造成我们工作中的主观盲目性，这就会严重地阻碍和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就会在无形中帮助一切反动势力所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阴谋活动。

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集中在胡适的实用主义等等方面，就以为问题只涉及胡适等人的活动领域，如历史，哲学，考据，文艺等领域。我们要注意到，五四以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散布的方面是比这更为广泛的，例如自然科学，工农业技术方面，由于许多科学家是在资产阶级学校里受过教育的，所以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这些方面也绝不会没有影响。问题是这种影响常常是不自觉的，因此，有些科学家虽然

自以为是单纯的科学工作者，同任何哲学思想没有关系，虽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自然科学家科学本身研究方面决不是没有一定的成就，甚至应该承认有些人还有很重要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资产阶级唯心论世界观的影响，有些人在讲授科学上带理论性质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就使用了马赫主义一类的词句。有些工农业技术家在处理技术问题的时候，往往凭着自己主观的教条公式或主观的爱好来决定一切，而不顾是否适合客观的实际，还自以为是在做“真正”“科学”的工作。最近揭露的关于建筑方面和医药方面的错误倾向，正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什么自信是崇奉科学的科学家和技术家们和在这些方面工作中负领导责任的干部竟会受到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为甚么他们竟会陷入这种不自觉的矛盾？那就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哲学问题不是仅仅限于哲学家才要考虑的问题，任何一种工作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运用思想和钻研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某种哲学观点（唯物的或唯心的）发生一定的联系，而真正的科学思考，必然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为基础的。科学家在自己的工作中一般地是有着自发的唯物论倾向的，但当他们不注意研究哲学问题，不注意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够自觉地在工作中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而如果一个科学工作者不能自觉地在工作中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难免在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上成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俘虏。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曾说过下面一段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自然科学和工农业技术工作的人员认真加以学习和领会：

“……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

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608—609页）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党派性的斗争，是同一切学术部门和一切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斗争，我们要从这个斗争中来学会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线，学会在工作中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武器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避免主观盲目性的滋长。这样，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之下，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就会一天天做得更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原载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后经作者略加修改）

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

——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在恩格斯逝世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推荐他的未完成的伟大著作《自然辩证法》。这对于我们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第一，这本著作综合了恩格斯逝世以前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切重要成就，特别是十九世纪的三大发现——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互相转化的规律，从这一方面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科学基础。实用主义者胡适在诽谤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硬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进化论出现以前的旧思想。《自然辩证法》证明：这个在口头上标榜“尊重事实”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所使用的武器，恰恰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可耻的谎言。第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里，反复而详尽地论证了：自然科学在自己发展过程中，是如何愈来愈迫切地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思想的武器，如何需要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的影响。目前的中国自然科学界，一般地说，对于这一点，还是没有明确的理解的，应该从《自然辩证法》里来多多学习一下。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里，把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历

史作了总结，指出近代自然科学是在与宗教神学的权威进行残酷斗争的过程中，是在突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重重障碍的过程中，才开辟了自己进步发展的道路的。近代自然科学在它发展的初期（十六世纪），“它本身便是彻底革命的”，（《自然辩证法》第6页）它必须在封建社会的精神压迫下，“争取自己存在的权利”。为着“向教会在自然事物方面的权威挑战”，“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异端裁判所的牢狱”。（同上）经过这样的残酷斗争，然后它才“大踏步地前进，并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同上）

但是，对于自然科学的神学牢笼，并不是靠一次突击就能轻易粉碎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才踏出它的第一步，就进入了形而上学的时期。由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限制，自然科学界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又陷入了神学观念的圈套。恩格斯谈到那时的自然科学界的思想状况时说：

“科学界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从外面寻找和觅得从自然界本身所不能说明的推动力来做最后的原因。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力被当作物质的根本性质，那末首先造成行星轨道的未被说明的切线力量是从那里来的呢？植物和动物的类别是如何产生的呢？而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着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常常以万物创造主对此负责来回答。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绝交书；而牛顿却以神的第一推动力的假定结束了这个时期。”（同上书第9页）

近代自然科学在它的十六世纪的初期曾冲决了教会权力的网罗，才为自己开辟了迅速发展的道路。到了十八世纪牛顿时代，又

必须冲决形而上学、神学的网罗，否则就很难前进。

如果有人不相信当时自然科学冲决形而上学和神学网罗是多么重要，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这些错误的思想方法和错误观念对于科学的前进是多么大的障碍，那就应该仔细想一想恩格斯所指出来的这些事实。在一七五五年，哲学家康德已经写了《一般自然历史和天体理论》，以相当于“星云说”的理论说明了太阳系的形成过程。不管这个理论的具体内容在后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上证明有多少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管康德后来自己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总的来说是错误的二元论和唯心主义，但他的这部早期著作的基本思想却是包含着天才的、正确的因素，他打破了牛顿的把太阳系看作是自从接受了神的第一推动力之后，就永远不变地照样运动下去的形而上学观念，用辩证法的发展思想来代替这个“僵硬的自然观”。（同上）但是，虽然一个哲学家已把形而上学观念打破了一个缺口，而当时的自然科学家却还不能通过这个缺口把自己的思想解放出来，这就使自然科学的进步推迟了许多年。因为，如果自然科学在当时就能循着康德的著作里初步展开了的思想线索认真地贯彻下去，那末，象进化论这样的伟大科学发见就不必等到十九世纪中叶才能完成了，其他许多类似的新的科学发现也可以更提早一些了。

二

为什么自然科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与教会权力、神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斗争，才能顺利地向前进步？为什么自

然科学如果掌握了哲学上的正确方向，就可以避免因为在无穷的歧途中摸索而浪费无限的时间和劳动？这是因为，一切科学的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在内，不仅主要依靠经验，并从经验开始，而且更需要理论，需要用理论来综合所有的经验；不仅仅需要搜集、校正和整理大量的实证的材料，而且更需要从这些知识材料中找出它的内部联系和内部规律性。科学的主要任务，正是要通过经验知识的研究过程，以达到在理论的形式上来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要完成科学研究的这个重要任务，要对于所研究的事物对象作出正确的理论说明即认识它的客观规律性，就必须有正确的哲学观点作为思想上的向导。恩格斯说：

“经验的自然科学收集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把它们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但是自然科学因之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能求助于理论的思维。但理论的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这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自然辩证法》，第23页）

理论思维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于它能够综合既有的经验和实证知识材料，而且在于它能够依据由当前的经验和知识材料所作出的结论，来对事物进行进一步的逻辑推断。正确的理论思维的逻辑推断，有可能提出目前的经验知识虽然还未充分证明，但却可以预期在将来一定能够获得充分证明的新原理。因而这样的推断就成为科学上的进一步研究的引导，并由此推动科学继续前进。许多科学上的假说，都有着这样的作用，这是一般自然科学家都能了解

的。但是，自然科学家所常常不能了解到的是，哲学上的这种逻辑推断，往往比自然科学上的假说具有着更为广泛和更值得注意的意义。康德关于太阳系形成的学说就是一个例子。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里还举了另一个重要的例子：还在十七世纪末年，德国的哲学家笛卡儿就已经指出“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同上，第11页）而在自然科学上，能量守恒定律是直到十九世纪才得到最后的证明。所以，恩格斯说：“几百年前在哲学中已经确定了的命题，在哲学中早已被废弃了的命题，却常常在理论的自然科学中出现为全新的智慧，并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自然辩证法》，第24页）恩格斯指示我们必须重视理论思维对于自然科学的这种推动和指导的作用，说：“在理论的自然科学中，我们往往不得不去计算不完全知道的数量，而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帮助还不充分的知识继续前进。现在，近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取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便不能继续存在。”（同上，第18页）

正确的理论思维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自然科学家在思想上需要从哲学的学习中取得的武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部伟大著作，从头到尾就只是要证明一件事：全部自然科学的成就表明自然中的一切都是辩证地运行着的，因此，认识自然界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自然科学家如果能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可以大大地增进研究的成效，就可以推动科学加快地向前进步。

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常常有这样的偏见：科学工作者无须乎关心哲学；不学哲学，固然不懂辩证唯物主义，但也不至于有唯心主义。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任何科学工作者，不管他自己愿

意不愿意，只要一旦从事科学研究，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理论的思维活动，而一旦进行理论的思维活动时，就必然要——那怕是不自觉地应用这一种或那一种哲学的思维方法。不是唯物论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就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如果我们不能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一定要受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并且，就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自然科学家来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世界观对于他们的影响，总是比较强烈得多，而要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总是更困难得多，这是因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武器，在旧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有着长期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势力。由于科学家平常只注意自己专门业务的研究，不能够通过哲学研究来辨认这些统治思想的毒害，他们必然要在思想上受到这些剥削阶级的思想和世界观的侵蚀。特别是在现代，日益走向灭亡的资产阶级及其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地在各方面思想领域中散布最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影响，把这作为它们拚命挣扎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在这样的时候，进步的人们，包含自然科学界在内，就必须更加提高警惕，努力在哲学的学习中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清除这些腐朽思想的毒害。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地吟味。他说：

“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

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608—609页)

“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就阻止不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这是思想战线上铁的规律。这是警告我们，不能减弱思想斗争和放松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这个原则，愈到现代，就愈加重要。自然科学家因为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不能综合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因而滚落到唯心主义的陷阱中。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曾批判某些科学家由于电子的发现而作出“物质消灭了”的结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列宁在四十多年前已经驳倒了这种谬论，但资本主义国家的物理学界还有人重复着它，而且对于中国的科学界也还有着影响，我们在最近还听到个别科学家有这类的错误看法。这就说明中国的自然科学界很需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采取了这样一种狡猾的步骤：首先用经验主义的观点来曲解自然科学，力图使人相信科学研究仅仅是依靠经验方法，使科学工作者因此放松了理论思维的锻炼，削弱了思想斗争的能力，这样就可以轻轻巧巧地把他们引导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以致于神秘主义的歧途上去。从十九世纪以来，以所谓“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经验批判论”、“实用主义”等等名目为标榜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都是采用了这同一个骗人的手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举了一些最突出的例子，说明了经验主义对于科学的破坏性，他指出：在“那种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实际上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的科学家中间，可以找到“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自然辩证法》，第29页)经验主义者培根曾经渴望应用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来首先达到延年益寿，某种程度上

的返老还童，改容换貌，脱胎换骨，创造新种，呼风唤雨。”牛顿在晚年也埋头于解释“约翰启示录”。“和达尔文同时用自然选择建立物种进化论”（同上）的华莱士，竟轻易盲从一个“平庸的江湖术士”霍尔的骗术。应该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所散布的经验主义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而这种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在我们中国自然科学界也不缺乏受它影响的人。唯心主义者说：“人除了经验之外并没有什么东西，人是达到他仅仅透过经验而达到的一切”；（《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我们的自然科学家中，却有与这类似的不可知论的论调：“自然科学只研究经验，经验以外的东西则不能加以肯定”。实用主义者杜威把太阳、山河、大地都仅仅看作是经验的要素，否认物质是经验以外的客观存在。我们的自然科学家也有人用类似的唯心主义观点来看物质，说：“物质就是我看见的，我摸到的和我拿来实验的东西。这就是说，离开我的感觉，我的科学研究经验，就不成其为物质了。”所以，反对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这对于我们中国的知识界，包括自然科学界，是非常必要的。

三

中国现在已进入了自己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最近又通过了五年计划，这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科学计划。在改造自然即发展工业和农业方面，我们迫切需要自然科学界贡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我国的自然科学界现在人数还很少，他们是国家的珍贵的财宝。我

们的自然科学家在旧社会曾经历过“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痛苦，现在逢到了这一个能够尽量施展自己的能力时代，自然是非常兴奋鼓舞的。然而，要发挥自然科学界的最大力量，就必须造成能使之发挥出来的种种条件，就要除去科学发展上的各种障碍。单靠热情和愿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正确思想，是帮助自然科学界发挥最大力量的重要条件之一，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必须除去的障碍。

我们的自然科学界中可能还有人认为自然科学和哲学无关，认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于自然科学不会有什么危害作用。那末，现在就请让我们把危害作用再一次明确地指出来：第一、恩格斯曾指出过去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曾经因为错误的世界观的障碍而推迟了多少年。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以过去时代不能比拟的加快的速度前进的，因此也要求为它服务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能适应于这样的速度，如果自然科学由于思想条件的障碍而迟迟不进，那就会使社会主义事业招致不能容忍的巨大损失。第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科学技术的具体实践中会发生很大的破坏作用。在基本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过程中，由于工程技术人员的主观主义和不负责任，曾经给国家造成许多惊人的浪费。对待中西医关系的错误的思想，在医药卫生工作上的危害性，不是也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吗？第三，身为自然科学家，由于不能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武器，往往不自觉地（例如在讲堂上）作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的义务宣传者，这难道也是无关重要的错误吗？此外，在我们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就很难完成学习任务，这不是很多人都亲身体会过的吗？

有些人以为，自然科学不会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因为

自然科学只研究自然，研究技术，和阶级与阶级斗争无关，和政治无关。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固然，自然科学的规律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指导着科学研究的理论思维，在方法上推动科学前进的哲学世界观，是有阶级性的；科学技术的运用，改造自然的实际活动，是往往要通过阶级斗争的；科学的发展范围和运用方向，是决定于一定的阶级的需要的。目前中国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的过程，就必然是为着建设社会主义而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阴谋及资产阶级的反抗行为进行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力图否认这些真理，也就是力图抹杀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其作用就是要阻碍自然科学界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要阻碍科学的前进。

为着澄清上述种种不正确的观点，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向我们的自然科学界推荐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它能帮助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来武装自然科学，粉碎极端有害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使自然科学界能按照祖国的殷切期望为社会主义事业发挥它最大的力量。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

对杨献珍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的说明〕下面的文章，是一九五五年八月写的。写成这篇文章的经过，需要说明一下。

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公布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现在的高级党校的前称）的教学干部在学习总路线的过程中，在如何理解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以杨献珍同志为代表的一方，主张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个综合的基础；反对杨献珍同志的一方，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包含着资本主义基础和社会主义基础，这两种对立的基础互相间进行着“谁战胜谁”的斗争。杨献珍同志的“综合基础论”，实际上是抹煞了这个“谁战胜谁”的斗争，表现为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

杨献珍同志把他的意见写成文章，交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向一些研究理论工作的人征求对于他的文章的意见，我就

* 1964年11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用的标题是《驳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现恢复1955年8月的原题，并在《一九六四的说明》中删去了“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语。

写了下面这篇文章。这个争论当时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已经公开开展了。但杨献珍同志拒绝把他的文章提出来公开讨论，因此我这篇批评文章也就没有发表。

杨献珍同志把反对他的人的意见叫做“单一基础论”，这是一种歪曲；因为反对他的人并没有说过渡时期只有社会主义一种基础。当时讨论中所说的过渡时期，是专指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点也必须向读者声明。

——作者

我对于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在某些主要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供研究参考。

新中国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不是象杨献珍同志所谓的“综合经济基础”。应该承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指出的五种经济成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四种所有制，都包含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之内。但是，过渡时期的经济所包含着的五种成分或四种所有制决不能拼成一个综合的基础。在四种所有制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是日愈发展，日愈获得广大地盘的新生的东西，而其他两种——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和资本家的私有制，是日愈走向消灭境地的衰亡着的東西。前两种所有制日愈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逐步形成、逐步建立起来的过程，后两种所有制日愈走向消灭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衰亡的过程。过渡时期的经济之所以为过渡的，就是

因为它还没有一种已经完成了的经济基础；它还并不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只是在形成中。在它中间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存在着，不过是在日愈消灭过程中，所以，应该说，在过渡时期，实际上是存在着两种互相对抗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这两种经济基础都不是已经完成了的，它们相互间进行着生死的斗争（或“谁战胜谁”的斗争），它们不是和谐地共同综合成为一个定型的经济基础，而是相互处在尖锐矛盾和生死斗争的过程中，就在这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归于消灭。

我认为，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对于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的过渡性缺乏上述明确的观念。他笼统地把五种成分或四种所有制看做是构成一个统一的基础的各部分，而不很强调或者就没有强调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新生的，有一些是衰亡的，两者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和生死的斗争，它把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说成是一个统一的基础，因而模糊了事情的最重要的实质，即：过渡时期实际上是两种互相对抗的基础的矛盾运动和尖锐斗争的过程。由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观念，因此就发生其他若干带有原则性的错误。

举一个例说：该文谈到苏联过渡时期的问题时，有这样一句话：“苏联国家当时还是把个体农民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我认为这就是在原则上错误的。如果个体农民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了，那么，为什么还用得着改造小农经济呢？这句话与该文前面所引的列宁的话完全矛盾。列宁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坚固的经济基础。”（《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8页。）列宁曾说过小农经济每日每时不断地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

级。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里谈到个体农民经济时，是用这样的提法：即，“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个体小农经济。”（《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58页。）自然，斯大林也曾指出，个体农民经济是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的经济。这是说，作为劳动者的个体农民，可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作为个体私有者的农民，按其生产关系的自发的趋势来说是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无论如何，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把个体农民经济看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意思。不仅一般地没有这样“看做”，就是在“当时”，即在苏联的过渡时期，我认为也没有这样“看做”。如果当时已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那么，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无需乎开展农业合作化或集体化的运动了。

二

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以什么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呢？是同时以四种所有制为基础呢？还是只能以正在建立中的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呢？杨献珍同志根据他所理解的“综合经济基础”的看法，认为我们的国家政权是同时以四种所有制为自己的基础的，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反对后一种说法，即我们国家政权只能以正在建立中的全民所有制及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他的文章批评这种看法，说它是反对党的路线政策的。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只看见事情的形式，不符合事情的实质。既然四种所有制应该归结为互相敌对并进行着生死斗争的两种经济基础，所以我们的国家政权就不是同时以四种所

有制作为自己的统一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政权所依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正在建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它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我们不能同时以互相敌对的两种经济制度作为自己的基础,这是不难了解的。我以为这样看不但不违反党的路线政策,而且只有这样看才能真正说明党的路线和政策;而杨献珍同志的“综合基础论”则正是违反了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过渡时期的政策。

首先要问,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什么性质的国家政权?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工人阶级专政的意义是什么呢?工人阶级专政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任务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不是以此为自己的任务呢?当然是的。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什么路线呢?这个总路线难道不是我国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党和国家政权来领导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消灭资本主义的路线吗?当然是的。毛主席说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什么生产关系呢?当然是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改变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个体经济,使社会主义的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构成统治一切的经济基础。要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政权的路线和政策的实质。这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政权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只能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虽然现在还正在建立中)为自己的基础,而不能以资本主义的和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自己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首先,我们只要把这样一个问题拿来考虑一下,就可以得到了解:目前我们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我们的

国家政权是相当巩固的，可是我们是依靠了什么经济成分才能有这样的巩固呢？是依靠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还是依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呢？当然是依靠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才能有这样的巩固；首先是依靠我们有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其次是依靠广大农民愿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如果这些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不能发展，而资本主义的成分倒大大发展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还能不能保持这样巩固呢？肯定是不能的。能不能说我们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地依靠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得到这样巩固的呢？我认为不是。不错，我们在当前的过渡时期也利用了资本主义，这对于我们有好处。但利用是不是就等于依靠呢？当然不是。如果我们不首先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激烈的斗争，反对它的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如果我们不依靠着强大的国营经济，依靠农民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支持；如果大多数农民不是愿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合作化的道路，而是一定要坚持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方向，能够设想我们可以战胜资本主义和利用资本主义吗？当然是不能这样设想的。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不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并和资本主义成分进行斗争，就不可能利用资本主义，更不能对它进行限制和改造。因此，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不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地依靠了资本主义制度和个体经济而得到巩固，而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实现而日愈巩固的。既然我们的政权的巩固不是依靠资本主义经济，怎么能说资本主义和个体农民经济是我们国家政权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呢？

其次，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作用也能说明我们的问题：上

层建筑是要为自己的基础服务的；斯大林说：“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如果我们的政权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和个体农民经济为自己的基础，按照斯大林指出的这个原理，它就应该帮助后者的巩固和形成。但是，我们的政权的出现，难道是为着帮助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巩固的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它是要“采取一切办法”帮助社会主义制度来根除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私有制度。我们的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采取“一视同仁”的立场，而是采取“有所不同”的立场；它决不是要为资本主义服务，而只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它决不是要使资本主义基础巩固和形成起来，而只是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形成起来。这个特点愈到最近就愈加明显，将来还要更加明显。这样的国家政权怎能设想它是同时把四种所有制都看做自己的经济基础呢？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在一个地方也提到我们的政权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但他竟没有根据这一点认识做出他应有的结论来，反而说我们的国家把四种所有制同时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并且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到“上层建筑不是为某一单一的经济基础服务，而是为整个经济基础服务的”。这是明显的逻辑混乱；并且就他的全文精神来看，他在实际上是不赞成他在前一个地方的提法的。这样的看法，是等于抹煞了我们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专政的实质，也忽视了如象农业合作化运动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具体政策日益胜利的明显的事实。

杨献珍同志认为按照党的路线政策来说，应该把四种所有制同时看作我们国家政权的综合的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从形式上

来谈问题，而不是看到了我们的路线和政策的实质。当然杨献珍同志也知道并且提到党的总路线是要“逐步地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为着要证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我们政权的基础这种说法，他就把他的立论的着重点放在当前时期我们的政权对于这些经济成分的照顾和安排方面，而没有强调我们的路线政策的任务主要是在于改造和消灭这些经济成分。他说：“党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所依据的原则，就是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要求各经济部门（如工业、农业、交通）之间，各地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需要和可能之间，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党批评了那种思想观点，就是只顾本部门、本地区，而不顾其他部门、其他地区，只顾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顾其他经济成分，或者只顾需要，不顾可能；党认为，在这种思想观点支配下，必然会使计划发生彼此脱节，互不衔接或互相抵触的盲目混乱现象。党指示，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应该是一个全面计划，既要包括经济的和文化的各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文教等），又要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如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个体的经济），既要包括大型的、集中的、现代化的经济，也包括小型的、分散的、落后的经济。”

我们的五年计划是不是照这些原则做呢？当然是的。但是，仅仅根据具体计划工作中的这些安排、照顾的原则，是不是就足够说明我们的政策、计划的主要实质了呢？我们的五年计划的主要实质是不是就在于“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呢？我认为五年计划的主要实质，并不在于简单地“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和加以一定的安排和照顾。我认为五年计划的主要实质，是包含在它的几项基本任

务中，即：集中主要力量建设各项工业以“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我们的五年计划是我们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具体化，而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要经过一些过渡的办法来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包括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它根本不是简单地“包括各种经济成分”。

杨献珍同志为要证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还提出了一点理由，说我们的政权要“管”而且也能够“管”各种经济成分，好象说凡是我们要“管”和能“管”的经济成分，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这个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自然，我们要“管”和能“管”各种经济成分，但我们对各种经济成分是如何“管”法呢？是一视同仁地“管”还是“有所不同”地管呢？当然首先是“有所不同”地管。我们的“管”也有“一视同仁”的地方，这只是侧重在生产力方面，而不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还没有消灭以前，我们一方面要“采取一切办法”来改造它们的生产关系，使之逐步走向消灭；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地利用它们的生产力。这个“一视同仁”，并不是第一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有所不同”。杨献珍同志的文章也提到我们的“有所不同”的政策，但它没有认真接触到这个“有所不同”的政策实质。我们是怎样“有所不同”地“管”各种经济成分呢？我们是这样管的：我们“管”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要使它日益巩固日益形成起来；我们管资本主义，主要是要使它的生产关系日趋消灭，管个体

经济也是这样。杨献珍同志不是不知道这一点，问题是在于他认为凡是我们要“管”和能管的都是我们的经济基础。我认为，不能说凡是我们要“管”和能“管”的都是我们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只有我们要加以巩固和形成的才是自己的经济基础。如果说要“管”和能“管”的都是自己的经济基础，那末，在新中国政权成立后最初三年间，我们曾在土地改革中“管”过封建经济，难道能说封建经济也是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最初三年间的经济基础吗？

杨献珍同志引用了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和列宁的《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中的话，企图证明个体农民经济是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斯大林是这样说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22页）。

斯大林的这段话，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把个体农民经济当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呢？我认为是不能这样解释的，斯大林的意思只是说，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不是可以希望它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而必须在改造个体农民经济的过程中建立起来。斯大林的着重点是在于：一、“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二、“调整城乡关系”；三、“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四、“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由一到四是一系列的改造个体农民经济的过程，也即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过程。这并没有简单地把现成的个体农民经济看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意思。

列宁的话是这样说的：“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列宁在这里说到“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应该怎样理解呢？是不是能说，依靠不经改造的个体农民经济，就能实现这个任务呢？当然是不能的，如果只有个体经济，那末，既不能在农村中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所生产的农业生产资料（如农业机械等）和生活资料开辟使用和交换的地盘，也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也就是不能实现列宁所说的任务。不改造农民，逐步消灭个体经济，怎能建立起列宁所说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基础”呢？列宁说过“在我国条件下合作制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8页。），但决没有说过个体经济也会和社会主义一致。

根据以上各点，也就可以知道，当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个对立的基础上，建立在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上和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个体小农经济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58页。）时，决不是意味着他已经把“个体小农经济”当做了（哪怕是不长久地）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这个政权所因以产生并反过来又要对它服务，帮助它巩固和形成的基础。不错，我们的政权并没有等到个体农民经济已经完全改造成集体经济之后才成立起来，相反地，我们是在个体经济还大量存在的时候就成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了。既成立了政权，就要生活，就要吃饭，而吃饭的来源，在最初一个时期内主要的就要靠个体农民的支持，而要取得个体农民的支持，就要鼓励个体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给他们种种帮助,如贷款之类。苏联曾经是这样做的,我们也是这样做的。这一切,是不是等于把个体经济当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这完全是两回事情。我们帮助个体农民,主要目的是为着暂时从他们的生产_力方面取得物质上的供给,而不是要对他们的生产_{关系}加以巩固和发展。经济基础是指生产关系而言。我们没有把巩固和发展个体经济这种生产关系作为帮助个体农民的方针,相反地,我们对于个体农民的种种帮助,只是为着使工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盟,以便使个体农民易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上集体化的道路。改造个体农民的生产关系使它走向集体化,这才是我们帮助个体农民的方针。这样的方针,决不是要把个体经济当做我们的政权自己的经济基础,这是很明显的。由此可见,我们在一个时期必须从个体农民方面取得物质上的支持,并为此目的而要设法鼓励个体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并不等于要把它的生产关系当做自己的基础。

类似的情形在资本主义经济方面也存在着。我们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取得一批工业产品和一笔税收,苏联在过渡时期,一个时候曾从富农方面取得粮食。我们“利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这只是利用它的生产_力所提供的物质供给,虽然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_力,必须在政策上对它的生产_{关系}加以适当的安排照顾;但如果认为这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_{关系}当做自己的经济基础,那就是根本的错误。

总之,我们的国家政权,对于资本主义和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个体经济,是要“采取一切办法”来加以根除和消灭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农业的合作化政策,就是我们所采取的适合于我们国家情况的根除和消灭这些经济成分的

办法,所以这些经济成分决不是我们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

三

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过去曾有一种错误的混乱的意见,认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步方面,应该算做是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的指导思想的一部分;虽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部分,然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面的不可少的部分。这种错误的思想,经过讨论后被否定了。我现在同意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我们国家政权的唯一的指导思想,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相适应的,而不是与资产阶级的观点相适应的。我们的政权中虽有资产阶级代表参加,但它的一切政策路线以及各种制度都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决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构成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也是正在建立中的)上层建筑。过去,在我们的学习讨论会中,在这一点上获得了一致的意见。但是那次讨论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上层建筑问题,也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后来又有了这样一种偏向,即认为在过渡时期,似乎已经是只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素则根本不存在了。我觉得杨献珍同志的意见就是这样,而这样的意见我认为也是片面的。领导权是不能分割的,说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步方面可以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中分担一部分指导思想的责任是完全不对的,哪怕说的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不对的。因为第一,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步方面和反动方面并不能机械地割裂开来;第二,

我们的人民政权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说资产阶级思想可以在我们国家政权中分担指导责任，就等于说资产阶级思想也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这是很不合理的。所以，当时的讨论会上否定了这种意见是完全对的。但是否定了这种意见，并不能同时把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素的存在也完全否定了。因为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虽然是不完全的）既然存在，也就存在着它的上层建筑（哪怕只是一些因素，一些并未完全形成的上层建筑的现象），这不仅仅是逻辑问题，也是事实问题。资产阶级思想，决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的任何构成部分，但作为与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着的思想体系，它是明明白白地存在着，并且非常广泛地每日每时不断地在活动着的。我们既然与资产阶级还有联盟的关系，各种政权机关和政治组织中既然还容许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就时时刻刻努力想使我们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适应于他们的思想观点，也就是努力想使我们的这些制度根本变质，使它们由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变为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在我们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松懈的地方，这种变质的情形难道不是在事实上存在着吗？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那末，我们的“三反”“五反”运动，司法改革运动，以及其他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激烈斗争又有什么必要呢？所以，在过渡时期，一方面有着正在建立中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也还有着广泛的活动力量，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单独存在，并不是风平浪静地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因素进行着生死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正是过渡时期正在生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正在衰亡的资本主义经济

基础的生死斗争的反映。我认为否认过渡时期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现象的存在,是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事实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不是单一的,而是两种互相敌对的基础的对立的统一;上层建筑也不是单一的,是占着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与它相敌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的对立的统一。如果说过渡时期只存在着单一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而没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素,那末,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岂不是都成为多余的事情了呢?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

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

现代一切最反动最腐朽的唯心主义者，不管是“西方”的和“东方”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失去了他们先辈的勇气和自信，总是非常卑怯地采用种种方法来掩盖唯心主义的真面目，而不敢公开地承认自己是站在唯心主义的阵地上来与唯物主义作战的。梁漱溟自然也不是例外。他曾反省说：“我从不相信我是唯心论者”（《两年来我有那些转变》，见一九五五年十月五日《光明日报》）。他标榜他的思想是隶属于“生命派的哲学”范围。并且认为“生命派哲学”的出现，就是人类要走中国孔子的道路的标帜。照他的说法，好象孔子的哲学思想“本来就是讲‘宇宙之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七八页），他说：“我心目中代表儒家道理的是‘生’”（同上，一七九页）。所谓“生命派的哲学”，就是利用“生命”、“生活”之类的名词上的极端烦琐的概念游戏，来掩盖唯心主义和反对唯物主义。这种手法在现代各国反动派的哲学教授们中间是相当流行的，不必说柏格森之流的明显标榜着的“生命派哲学”，就是形式上似乎与柏格森哲学有所不同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如马赫主义、实用主义之类，也同样喜欢在“生命”“生物”之类的名词上

* 本文是《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一书中的第二节。该书共分五节，其他各节的标题是：五四文化运动中的封建主义逆流；由不可知论的诡辩引到虚无主义；科学和理性的仇敌——“形而上学”；开倒车的历史观。

玩弄种种的花招。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第六章里面，就批判过马赫主义者的“生物学的游戏”。如果我们想一想后来的蒋介石政府也要特别御制一套叫做“唯生论”的说教，就可以知道，“生命派的哲学”已成了现代各国反动派所爱好的哲学标签了。

尽管使用了“生命派的哲学”的遁辞作为掩饰，但梁漱溟的唯心主义思想仍是非常露骨的：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公开否认世界的物质的实在性，叫喊着要“把适才化为物质的宇宙复化为精神的宇宙”，他说：“盖本无所谓物质，只纳入理智的范畴而化为可计算的便是物质，在理智盛行之下，把一切所有都化为可计算的，于是就全为物质的。”（二六三页）梁漱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不是世界上先有物质的客观存在，而后才被人的主观的理智所认识，相反地，倒是先有了人的理智的范畴，先有了人的理智的“盛行”，然后原来没有任何物质世界的“一切”才被物质“化”了。这难道不是最露骨的唯心主义说教吗？

我们知道，唯心主义总是把真理颠倒了，当我们用批判的观点来研究一下梁漱溟上面所说的一段话时，我们就会看到，这里面恰恰透露了一些与他的说法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说，人类的科学理智、理性，的确是唯物主义的无可辩驳的见证人，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是用唯心主义曲解了这样一条真理：由于科学的理性使人能够对周围的一切做出精密的计算，并以高度的准确性来认识其中的必然联系或规律性，这些规律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获得了确凿的证明，因而人们也就不能不承认，不能不确信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二者必居其一”的命题：要么就必须承认唯物主义的真理，承认世界

的物质性,如果你是不反对科学,不反对人类的理性的话;否则,如果你要反对唯物主义,要坚持唯心主义,你就只能站到与科学、理性互相敌对的位置上去!

在这个“二者必居其一”的命题之前,人们应该肯定那一个方面,才是正确的选择呢?很明白,凡是拥护科学的人,凡是具有健全的理性头脑而不为剥削阶级的反动偏见所蒙蔽的人,一定要肯定前一个方面,一定要承认唯物主义的真理。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然而,以“肯用心思”作为自己的骄傲之点而反复多次地向人自诩的梁漱溟,却宁可选择坚持唯心主义的道路,并不惜由此公开地坚决地站到反科学、反理性的阵地上去!

前面说所谓“生命派的哲学”只是用“生命”“生活”之类名词上的概念游戏所掩盖的唯心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派“哲学”者并不是要确实地根据科学发展的成果,来阐明生命现象的本质、生物的发生和发展的条件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等等,他们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玩弄“生命”“生活”之类的字眼,把它们变成与科学概念毫不相干的空洞的形容词,用来粉饰他们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生命或生活现象是甚么?自然科学的研究早已证明,生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物质现象;恩格斯曾依据自然科学的成果给生命现象的本质作了一个十分正确的概括,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重要因素是在于与其周围的外部自然界不断的新陈代谢。”(《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二五六页。)作为自然现象的生命或生活现象,本质上就是如此。至于人类社会的生活,则是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决定的条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早已论证明白了的。然而,“生命派的哲学”者梁漱溟怎样来解释生命或生活现象呢?他说:“生活

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三四页)这是十足明显的唯心主义的武断，它在这样的两点上来玩弄概念：第一，它硬说生命是纯粹精神的现象——意欲，不惜为此抹煞当时已经成为常识的自然科学真理——即作为物质的一种形态的蛋白质的新陈代谢作用；第二，就是他所说的意欲，也只是空洞概念，人们在这个概念里看不出那“意欲”是甚么条件下产生的，它所要求满足的是甚么。这里就只有一个死的抽象——毫无任何内容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这样，在“生命”和“生活”等的名词上面行使了一番阉割的手法之后，梁漱溟就放手地把它们用来作为建筑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支柱，也就是要利用它们来把“物质的宇宙复化为精神的宇宙”了。于是梁漱溟说：“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以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七〇——七一页)前面说过，自然科学早已证明生命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存在形态，在生命现象没有出现之前，以及在生命现象之外，还有无机的自然界的存在。宇宙是包括生命和无机自然界在内的总体，而生命只是这总体的局部。唯心主义——所谓“生命派的哲学”在宇宙和生命之间，在全体和部分之间画了一个简单的等号，这是连初级数学规律也违背了的十分荒谬的手法，何况还要把生命加上唯心主义的曲解呢？

事情还不止此。梁漱溟的唯心主义还有更进一步的特点。它是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并且相当公开地作出了“唯我论”的论断。当梁漱溟说“尽宇宙是一生活”的时候，他又从佛教的“唯识论”里借来了“事的相续”这一个概念，来作为他的所谓“生活”的内容的

另一种注解。在前面他曾把生活解释作“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在这里他又说“生活即是在某种范围内的‘事的相续’”（同上，七一页）。甚么叫“事的相续”呢？他依照了“唯识家”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见解，说：“一问一答……是为一‘事’”。所谓“生活是‘事的相续’”，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内部精神的“一问一答”的表现。“一问即有一答——自己所为的答。问不已答不已，所以‘事’之涌出不已，因此生活就成了无已的‘相续’”（同上）。生活既是“事的相续”，既是对于自己的问的“自己所为的答”的不断的“涌出”，这样一来，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成为纯粹主观内省的东西，就成为仅仅是一个人的内心不断地自问自答的过程。这种疯人式的不断自言自语的“生活”，也就是构成梁漱溟的“宇宙”的唯一原素。“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而生活都是“一问一答”的“涌出”。于是，宇宙的全部内容也成为纯粹主观内省的东西，成为人的内心不断地自问自答的表现。这样一来，梁漱溟就不能不把他的宇宙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性质十分露骨地暴露出来，就不能不钻到唯我论的绝路上去，就不能不强词夺理地把全宇宙硬说成是包括在个人生活之中，而说甚么“生物或生活实不只以他的‘根身’……为范围，应包括他的‘根身’‘器用’……为一整个的宇宙……而限于范围的。这一个宇宙论且他

超过了我们的生活所涉及的范围之外,怎样能说宇宙就是“我的宇宙”或“他的宇宙”,怎样能说全部宇宙都包含在个人的生活之中呢?所谓“生物或生活应包括他的‘根身’、‘器界’……为一个整宇宙”,所谓“他与宇宙非二”明明是闭着眼睛胡说。由于这一类唯我论的胡说的荒谬性是过于显著了,因此,主观唯心主义者多半要设法避免直接把它暴露出来,或者当事实上不能不多少有所暴露时,就要生造出种种诡辩的遁辞,来迷惑人的头脑并掩饰它的无法解决的矛盾。然而,使用了诡辩的遁辞的结果,往往反倒会暴露更多的矛盾。

梁漱溟也意识到了这个矛盾,并力图加以掩饰。他使用了类似马赫主义的所谓“原则同格”(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章,第三节)的手法:把“我”分劈成两个,一个叫做“前此的我”,或叫做“已成的我”,用来指周围的“物质世界”,一个叫做“现在的我”,用来指实际生活着的这个我自己。所以,“我”和周围世界一切事物的关系,就被梁漱溟看做是“现在的我”和“前此的我”的关系。也就是被曲解为两个“我”的关系:“我”和我以外的物质世界都是同一的“我”的表现,两者在“原则”上是“同格”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就是想用这样的诡辩来掩饰它的“唯我论”的矛盾的,他们惯于用纯主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只要在名词上掉几下花枪,就可以改变世界的一切,就可以把宇宙“精神化”,使它巩固地成为“我的宇宙”了,看吧!我就是“现在的我”,物质世界也是“我”,而且是“已成的我”,在我未曾出世以前就有了那个“已成的我”,而现在不过是再加上了这个生活着的未成的我,一切既都有了“我”这个形容词,于是“我”就包括了一切,于是宇宙就成为“我的宇宙”了!你觉得有点不通吗?那只能怪你不

肯“用心思”，不能欣赏唯心主义哲学戏法的奥妙！

但是，诡辩究竟还是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尽管加上一千个“我”的形容词，宇宙仍然是独立于“我”之外并且不依赖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而决不是“我”的原则上的“同格”。这只要一接触到人的实践，立即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因为在实践中，“我”的“意欲”决不是可以任意得到满足的，人的主观愿望，常常由于和客观事物的发展趋势或规律性相违背的缘故，而不能得到实现。这个铁的事实，是任何一种唯心主义的烟幕都不能够完全遮蔽得了的，就是梁漱溟的唯心主义也不能例外。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著作里也透露了若干在他说来是无可奈何的关于世界的物质实在性的消息。梁漱溟也不能不感觉到：宇宙间的事情并不是真象主观唯心主义者所论断的那样，可以任人随心所欲地“一问即有一答”的。相反地，人们常常碰到许多客观的东西“为我当前的‘碍’”，使所“问”得不到所希望的“答”，换一句话说，就是使梁漱溟的“意欲”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应该指出：就是梁漱溟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这些“碍”并不是微不足道，而是十分巨大的。他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整个“已成的我”——“物质世界”就是一个最大的“碍”。在这个“已成的我”的前面，要使所答的能够满足所问的要求，就必须依靠“对于物质世界——已成的我——之奋斗”，而奋斗的成败关键又在于“知识力量”，“譬如当初的人要求上天，因为当时的知识力量不及所以不能满足，而自发明轻气球、飞行机之后也可以满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七六页）

第二，为“碍”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其他的有情”（同上，七四页）。也就是其他的人和动物。照梁漱溟的说法，“其他的

有情”，也不外仍然是“已成的我”，所不同的就是他们有一种所谓的“他心”，而对于我为碍的即是这“他心”；“他”不和我同意，我就没法满足自己的要求。在这里，我们应该举一个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最切近的例子，即广大中国人民对于想要恢复封建黄金时代来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梁漱溟都有了“他心”，所以他就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

第三，还有些“绝对不能满足者，此即必须遵循的因果必至之势。……譬如生活要求永远不老死，花开要求永远不凋谢，这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绝对不可的，所以这种要求当然不能满足”（同上，七七页）。这里又要举一个梁漱溟所没有举到的例子，即想要使历史开倒车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梁漱溟的要求当然不能满足。

这一切“为碍”的事实，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根本无法解释的。奇怪，为甚么本来是“我的宇宙”里的一切事情，竟在我的实践中不肯服服帖帖地顺从于“我”，却偏偏要到处跟“我”捣蛋，甚至弄到使我根本没有办法呢？为甚么不过是“已成的我”的一切“有情”，竟然会发生与我作对的“他心”？为甚么“我”不能随心所欲地从“已成的我”的“物质世界”里获得满足，而一定要依赖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力量”？为甚么“已成的我”里面竟会存在着许多“因果必至之势”而“我”对于它们竟绝对不能违抗？这一切问题，在梁漱溟的书里是没有解答的，因为他的“唯我论”的基本观点使得他没有办法可以解答。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这些事实的存在，而无法解决这些事实与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矛盾。因为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主观唯心主义全部抛到垃圾堆里，而承认唯物主义的真理：宇宙不是“我的宇宙”而是在“我”之外独立地存在着的物质的实在，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

着它们所固有的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因此，当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想要提出甚么问题或甚么要求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这些问题和要求在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是否有着可以提出的根据？它们的提出和解决是否为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所容许？“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七九六页），我们在生产中和阶级斗争中所发现必须要解决的客观事物的矛盾，——例如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个体农民经济自发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和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之间的矛盾等——就是我们正确地提出问题的根据。具体地分析这些矛盾，并根据分析的结果找出解决矛盾的斗争方法，在互相矛盾的对立两方面中确定哪一方是我们应该赞成的、哪一方是我们应该反对的东西，以及用什么方法来发展我们所赞成的和消灭我们所要反对的东西等等——，这些就是解决问题的正确的途径。如果我们能认真注意到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且使我们的问题和要求的提出和解决符合于这些原则，那末，这些问题就一定会得到所希望的解答，要求就一定会获得适当的满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按照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以实现改造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地注意这些原则，不研究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的矛盾，而只是任凭主观的随意性任意提出问题和要求，并强求得到解决，那就一定要遇到严重的“碍”，一定得不到问题的回答和要求的满足。用人们日常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碰钉子”。唯心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就是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时犯了这一条最根本的原则错误而总是“碰钉子”的。这一切道理不是非常明

白的吗？只要消灭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烟幕，那末，上面提到的矛盾就不成其为矛盾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哲学研究》
杂志第四期）

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

——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

一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文艺界的同志们！按照文联学习处的计划，我从今天开始，准备就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问题做一些解释。我所要讲的总题目是：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或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在这个总题目下共包括四个小题目：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三，阶级和阶级斗争；四，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文艺界的同志们的前面来讲这些问题，对于我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多少需要联系文艺方面的实际。但我长久没有研究文艺问题了，新出版的作品看得非常少，这个知识上的缺点，目前一下子也没有法子补救。因此，我讲的许多意见，只能算是供大家学习和讨论的参考，其中可能还会有错误，希望大家不客气地给与批评。

* 本文原是艾思奇同志一九五六年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哲学讲座的讲稿，现根据“三联书店”一九五六年八月版排印，删掉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等字样。

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总题目下包含三个小题: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2.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3. 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现在就先讲第一个问题。

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为什么要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问题列在第一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研究方面的最根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的解答,规定着社会历史研究的不同方向。正如在一般的哲学上,围绕着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的关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的争论把全部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围绕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的不同的观点,也使社会历史的研究区别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研究方面来,首先就在于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回答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问题,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来说是第一性的东西,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而社会意识则只是第二性的东西,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马克思说:“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列宁说:“意识一般地反映存在——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命题。我们不能看不到这个命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即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是有直接的和不可分离的联系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2页)这些就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根本观点是完全对立的。而这对立的根本点就在于一切种类的资产阶级社会学都有这个共同点：就是这样或那样地从唯心主义的观点上来回答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把社会意识说成是决定一切的力量，而社会存在只是社会意识的产物。

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一年多来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我们就不难看出，在我们所批判的这些反动思想的各种错误观点中间，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正是我们所要批判的一个根本焦点。特别是在文艺方面，事情更容易明白。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它和社会存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正是各种不同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美学思想的最根本的分歧点，因此一切不同的回答都逃不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对立的方向之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怎样回答这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者说：文艺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在文艺形式上的反映，文艺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所说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个回答规定了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美学思想的一条根本路线，根本方向，这条根本路线，根本方向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路线和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他们对于上面说的根本问题给与了完全相反的回答，他们

说：文艺是，至少主要地是各个作家的主观精神的产物，文艺作品的内容，是人的头脑里任意制造出来的“空中楼阁”，而不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美的泉源不是存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中，而是存在于人的主观、“直觉”之内；因此，是人的主观，作家个人的天才决定着文艺的发展，而不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最后决定着文艺的发展等等。这些回答规定了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美学思想的另一条根本路线——反唯物主义的路线。我们过去一年多来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美学思想方面来说，首先就是要在文艺这个社会意识部门里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路线，反对唯心主义路线。

就拿胡适来说吧，胡适写了许多关于文艺作品的考证以及其他方面的论文，从这些论文中，我们不难看出那里面贯串着一条总的路线，就是要从各方面把文艺作品解释成为作家的个人经验，个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极力抹煞它们反映社会存在，反映客观现实的重大意义。譬如象《水浒传》这样的作品，是反映封建时代农民战争的一部杰出的创作，里面所描写的许多人物都是当时人民中的真正英雄的典型，因此几百年来人民对于这部作品非常喜爱。我们看胡适是怎样评价《水浒传》的呢？他曲解了《水浒传》的意义，把它硬说成是人们发牢骚的产物，他说：“水浒传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意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回寇立大功后反为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菴——借他发挥他一肚皮的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水浒传考证》）胡适对于《水浒传》这种看法，一方面表明了他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反动文艺观点,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种反动文艺观点的阶级作用,这就是否认《水浒传》中的许多人物是人民中的真正的英雄典型,硬要象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一样地在这些人物身上加给强盗的恶名!

再就《红楼梦》的问题来看,也有同样的情形。我们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的内容,是反映了封建社会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矛盾的。胡适的看法却不是这样,他对于《红楼梦》的内容的来源,有两条似乎矛盾而实际上一致的解释。第一条是把《红楼梦》看做作者曹雪芹个人的“自叙”传,第二条是把《红楼梦》的内容看做作者主观地任意构想出来的东西,他引了钱静的话说:“红楼一书,空中楼阁,弟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这两条解释看起来是相反的,其实有一个一致的地方,就是把《红楼梦》看做个人的经验,个人的感情或“兴会”的产物,否认它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不难看出胡适的这种看法和他的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是怎样密切地联系着。我们对于胡适的文艺观点的批判,首先应该揭露他的这个唯心主义的实质,然后才能在其他问题上打中要害。

胡风所散布的那些文艺观点,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个根本问题上也正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完全相反的。如象许多同志已经揭露过的,胡风否认文艺创作的泉源是人们的社会存在,是人民的现实生活,而把这泉源归结为“主观战斗精神”,归结为作家的“自我扩张”。这个主观唯心主义者是怎样来曲解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呢?他把文艺创作的任务说成好象并不是要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相反地要用作家自己的主观精神去和现实对象“搏斗”,去征服这些对象,使它变成作家“自我扩张”的工具。他有时甚至于毫不掩饰地暴露出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主

张作家的主观意识就是创作的主要泉源,用不着什么生活经验。他说:“作者苦心孤诣地追求着和自己底身心感应融然无间的表现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追求着人生,这追求的结果是作者和人生的拥合,同时也就是人生和艺术的拥合。”(《密云期风习小记》)胡风在这里使用了一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所喜爱的含混名词“人生”,来玩弄他的诡辩。这个名词可以解释为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解释为人类社会的生活。利用这个双关的意义,他就把作家个人的“人生”或个人的所谓“身心感应”和全部社会的“人生”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好象一个作者只要表现了自己个人的“身心感应”,就已经和全部人类社会生活拥合到一起了。根据这些荒谬的理由,胡风就得出了他的荒谬结论:文艺用不着反映社会存在,作家的创作不需要什么“生活经验”,有了作者个人的“身心感应”就有了一切!这就是胡风所散布的反动文艺思想的最根本的要点!

总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根本原理,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要首先从这个问题研究起。什么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就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各种矛盾运动,其中最基本的是生产的矛盾运动,以及阶级社会里的阶级矛盾运动等。人们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政治、宗教、文艺以及哲学等等的思想形式,就其内容来说,都是反映社会物质生活的这些矛盾运动的。文艺是用典型的形象,集中地来反映这些矛盾运动。“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凡是真正有生命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没有不是不深刻地

反映了或是暴露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运动的。这个原则适用于中国和外国的全部文艺史，从诗经、楚辞、唐诗、元曲、水浒、红楼梦一直到鲁迅以及新中国的文艺作品如《保卫延安》、《龙须沟》、《三里湾》等等，从普式庚、果戈里、托尔斯泰、高尔基一直到苏联的许多新的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雕刻、绘画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艺术，都可以说是毫无例外。全部文艺史证明文艺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证明真正创作的泉源是存在于人民生活中，存在于他们物质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中。一个文艺作者如果一旦拒绝了这个反映社会存在，反映社会矛盾运动的任务，他的创作力量就要归于枯竭，他的作品内容就要变成空虚的和虚伪的。这些事实就驳斥了唯心主义者的文艺观点的荒谬，驳斥了他们把创作泉源归结为创作者个人的主观意识的完全无稽。全部文艺史证明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原理才能够为我们的文艺创作指出一条最广阔最深远的道路，而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则是为着要阻塞文艺创作的真正泉源，扼杀艺术的真正生命，障碍我们革命文艺的前进道路。

人们的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并不是采取纯粹“客观主义”的形式，而是站在一定的社会实践立场上，站在社会斗争的一定地位上来反映的。政治、法律思想不是纯客观地反映社会的阶级矛盾，而主要地是反映统治阶级或革命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意志。哲学思想不是纯客观的反映世界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本质，而主要的是它还表现为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世界观。文艺也不是纯客观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运动，它还同时反映着作家自己的阶级立场，作家自己的社会观点。作家不但描写社会生活中的某种典型化的矛盾运动，而且对于所描写的矛盾运动还表示着自己的态度和评价。同时他的这种阶级的政治态度，对于他的作品

内容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深度和真实程度也会有着很大影响。人们既不是直观地认识世界，而是通过自己实践过程——首先是生产和阶级斗争来认识世界，因此，人们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他们认识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就要受到他们的实践立场的限制，首先受到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阶级斗争的地位的限制。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对于文艺来说，是不是也能适用呢？应该说，文艺既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既然是一种认识现实的形式——通过典型的形象来认识现实的形式，它在基本上也要受到上述认识原理的约束的。这就是说，作家的阶级立场，作家的世界观，对于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矛盾真实程度和深刻程度，是有影响的。一般地说，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或对于腐朽制度采取反抗立场的作家，由于他们的立场、观点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一致，他们的作品是比较能够更深刻地，更真实地反映社会的矛盾运动的，反过来说，那些为反动腐朽势力服务的作者，由于他们的立场是违背着社会生活的前进发展的趋向，他们的作品就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运动，相反地还常常要掩盖这矛盾运动。这个原则，可以从文艺史上找到大量的事实作为证明。就中国过去的例子来说，只要举《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作为对比就够了，前一部书的作者曹雪芹由于采取了反对旧封建制度的立场，就能使他的作品成为一部极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矛盾的伟大的创作。后一部书的作者是以谄媚封建制度为自己的任务的，尽管他使用了很生动的语言，由于他的作品对封建社会的矛盾作

了许多人为的粉饰，我们读了以后很容易感到它的虚伪和空疏。俄国在十九世纪中间前后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从普式庚起到托尔斯泰为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不反对沙皇专制的。我很同意老舍先生在先进工作者会议上所说的话：高度政治热情对于文艺作者是推动创作活动的强大力量。特别是在今天的时代，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立场，进步的世界观，是帮助作家联系人民，和善于反映人民生活中的矛盾运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过去的历史时代曾有过这种特殊情形，一个作家在政治的倾向上是属于保守派的，而在他的作品里却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的矛盾运动，并在事实上否定了保守阶级和赞扬了先进的阶级。法国的巴尔扎克就是一个这种特殊的例子。这个特殊例子，能不能用来根本推翻上述的一般原理，说即使抱着反动世界观，站在反动立场上的作家，也可以写出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当然不能。因为，如果巴尔扎克真的把自己的创作事业完全用来为反动的贵族阶级服务，他决不可能获得那样大的成就的，他所以能获得创作上的巨大成就，正是由于他在创作活动中已在实际上突破了自己的保守立场和反动世界观的限制。巴尔扎克的特殊例子，正是上述一般原理的特殊的表现和例证，根本没有违反上述的原理。

文艺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优秀的文艺作品必定能在内容上真实而深刻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运动，同时又能反映着社会上的进步势力的要求和希望。而要达到这样的反映的目的，需要作家敢于站在一定时代的进步立场上，站到进步的世界观方面，从反面来说，就是要象巴尔扎克那样，敢于突破反动的立场和世界观。进步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革命浪漫主义的，这样的创作方法都和进步的世界观密切

地联系着,或者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基础,这就是我们的真理。

2.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前面我们已经讲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最基本的原理,现在再进一步研究,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社会的意识(例如文艺)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究竟是包含着一些什么内容?

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就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运动。具体地说,首先就是生产的矛盾运动,而阶级矛盾运动就是在生产发展一定阶段上出现的矛盾运动。文艺这种社会意识是怎样反映社会存在呢?一般来说,就是用典型的形象来反映一定社会人民的生产活动,生产中人与人的矛盾关系以及阶级矛盾关系,把人民自己的生活 and 斗争中的美集中地表现出来,使人民从文艺作品中能够深刻地强烈地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和斗争。

对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否只是指生产和生产的矛盾运动呢?是否还可以把其他的条件,例如地理人口条件也算在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内呢?答复是:地理人口条件之类都不是对于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条件,这样的条件只能是生产。自然,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也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并且是经常有着重要影响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它们都不是对社会意识,社会的性质和面貌,社会的变化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条件。

地理条件包括各种自然条件,如气候、物质资源等等,它对于

社会的发展进程或者是能提供某些顺利的条件，或者是能够给与阻碍，它也能对社会意识（包括文艺）的特点的形成给与一定的影响，但它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社会的发展和变更的根本趋势，以及社会意识的根本的本质。例如如果想要用地理条件的变化来说明文艺的变化发展，那一定是要失败的。变化迅速的社会制度及社会意识现象，不可能在变化十分缓慢的地理条件中找到它的决定的原因。相反地，地理条件的作用的性质和范围，倒要决定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并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的地大物博的条件，只有在人民的革命斗争获得胜利之后，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帮助社会进步的作用，而在旧社会就受到很大限制。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必须以一定数量的人口为前提。我国人口众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人口数量的多寡对于社会的性质和面貌，以及社会意识的根本实质也不能起决定作用。相反地，社会制度的性质倒决定着它内部的人口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有着大量的失业人口，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社会里所经常听见的所谓人口过剩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有一种认为社会的进步程度和人口的密度成正比例的反动思想，斯大林已透彻地反驳过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最流行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种人口论是为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侵略和帝国主义战争作辩护的学说，它硬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大量失业现象，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粮食的增长，因而造成所谓“人口过剩”。而要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似乎只有向外侵略的一个方法。

对于社会性质、社会面貌以及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为着要维持社会生活，要能够从事科学、艺术和政治等等的活动，首

先要有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要把这些物质资料生产出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决定意义就是包含在这里面的。

过去时代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往往也片面地接触到生产的决定意义的问题。如中国的《管子》书中有“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话，《孟子》书中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话。费尔巴哈也说过：“要是你因饥饿和贫困而在身体内没有营养，那么在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品了。”但是，过去的这些思想家，最多只是一般地意识到物质生活资料对于人类生活、人类意识的重要性，他们从来也没有认识到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仅仅是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泉源，而且，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还是对社会的性质、面貌、社会意识等等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为什么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因为旧中国的生产方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为什么新中国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因为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已成为主导的，并且逐渐在成为统治一切的生产方式。这就是说，生产方式怎样，社会的性质、面貌和社会意识等也就是怎样。要正确认识某一种社会的性质以及它的社会意识是怎样，必须首先弄清楚它的生产方式是什么。也就是要根据它的生产，生产方式的情况来下判断，而不是要根据它的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政治制度来下判断。

生产方式既然是决定一定社会性质的根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变革社会的革命运动的最根本的任务，就在于要改变生产方式。一种革命运动是否得到胜利以及胜利是否彻底，都取决于生产方式是否已被改变和改变得是否彻底。我们说中国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没有得到胜利，就是由于它没有使中国的旧的半封建半

殖民地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改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在于它彻底消灭了旧中国的上述生产方式。社会上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保守势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本质，都在于要用各种方法来反对社会的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就要我们弄清楚什么是生产？什么是生产方式？

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动物谋取生存的活动不同，动物谋取生存的活动，是完全依赖自然条件——动物自己本身的有机体构造和周围自然界的环境条件。动物的生活，是动物的有机体跟周围环境的纯自然的联系。人类社会的生产，也必须和自然界相联系，但在本质上不是依赖自然条件来进行的。人类只有在下述的条件之下才能进行生产：第一，必须使用某种人造的工具来进行一定的特殊的劳动活动，才能从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第二，为着进行生产，人和人之间必须发生一定的不依赖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人类进行生产所必须依赖的这两个条件，就构成生产，是生产方式的两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或两个有机地互相联系着的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社会的生产力，另一个方面，就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原素的统一体。生产、生产方式的这两个原素都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纯自然的产物，它们是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动物谋取生存的活动区别开来的根本的条件和标帜。

生产力就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各个不同社会的生产力，具有着不同的发展水平和不同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取决于两个要素：（1）劳动者使用来作用于自然界以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工具；（2）具有一定的生产经验

和劳动技能使用着劳动工具以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人——劳动者。任何社会时代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表现在劳动工具的改进和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术的提高上面。要使我们的新社会的生产力向前发展（除了必须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为前提之外），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在于要抓住这两个要素使之不断地变革和进步，也就是要改进工具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主要内容，或中心环节，就是在于改进工具，改造操作方法和劳动组织，这正是符合于上述基本原则的。

马克思指出劳动工具是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尺度。它是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的客观物质条件。所以劳动工具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另一方面，掌握工具的劳动者则是创造工具、赋予工具以活力并实现生产活动的原动力，没有劳动者，工具就是死的东西，并且也无从产生出来。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劳动者看做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新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就在于劳动者的自觉的劳动活动，就在于他们在生产中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轻视劳动者，不把它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的错误的传统观念，是旧社会里破坏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因素之一。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们有些同志眼睛里只看见富裕农民手中的一些较好的工具，以为只有依靠它才能发展农村生产力，而忽视了贫苦农民对于合作化运动和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忽视了具有自觉性的劳动者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决定作用，因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所以，新中国的文艺，应该反映从事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的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的典型。

生产关系，是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和社会关系。任

何时代的人都不可能孤立地进行生产，而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所以凡生产都是社会的生产。

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形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的。生产关系中的最根本的东西——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如果说生产力所回答的问题是用什么工具生产的问题，那么生产关系回答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料为谁所有的问题。

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以前者为基础的社会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3）完全以前两者为转移的产品的分配形式。如前面所说的，在这三个方面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中的最根本的东西。它对于生产关系的形式起着决定的作用，生产资料或者是归全社会所有，或者是由单个的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利用去剥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阶级。不同的所有制就规定了不同的生产关系，或者是不受剥削的人彼此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或者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或者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关系。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就说明为什么社会革命的根本任务——生产方式的变革或改变生产关系以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就是要把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转变为另一种所有制（或者是采取暴力的方式，或者是采取和平的方式，依旧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是否反抗这种改变而定）。同时也就说明，革命任务实现的彻底与否，就取决于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否实现完全的改变。在革命的斗争中，如果对于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改变不采取坚定积极的态度，就是对于革命的斗争不坚决或动摇的表现。在革命运动的各个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由于在这

方面的不坚决而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例子。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基础上来认识和纠正这方面的错误。这是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任务之一。

3. 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

前面已经说过，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指出和这相反的唯心主义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当我们坚持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时候，同时又应该注意不要把这个基本原则的理解加以简单化、庸俗化。这里所说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就是说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把生产、经济看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看做是产生各种各样社会意识现象(包括文艺在内)的唯一能动的因素，以为社会意识现象(例如文艺)所反映的唯一的内容就是生产、阶级斗争，而不反映任何其他东西，否认社会意识及其他社会现象有任何能动的作用(例如政治、哲学对于文艺的作用)，否认各种社会意识现象之间及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就是机械论的观点，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是要反对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是最全面、最深刻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本身是如此正确、完善和无懈可击，使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在思想上来进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只能采取一些卑劣的欺骗手法，他们不是堂堂正正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攻，而是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曲解，把它曲解成一种好象是没有什么稳固基础的东西，然后向它举行射击。他们曲解的方法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硬说成好象是一种机械论或庸

俗社会学,然后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机械论或庸俗社会学,以为这样就算驳倒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丑角幻想用《封神榜》上杀害赵公明的办法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没有能力来和他们所反对的英雄本人进行战斗,于是就自己扎一个草人来象征那英雄本人,再把箭射到这草人身上,以为这就可以把英雄本人也附带害死了。

人们都知道神话决不是事实,但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的行为却常常做到和神话一样。不论胡适、胡风都用这种神话的手法来进攻马克思主义。胡适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经济史观”,意思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把经济当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的原因。胡风把三十多年来党对文艺的正确领导诬蔑为“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支配。梁漱溟也曾用过同样的手法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他说:“那种唯物史观……都当人类只是被动的,人类的文化只是被动于环境的反射,全不认识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这些唯心主义者以为打击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片面性缺点,就算是打倒了一切的唯物主义,就可以使唯心主义永久站住了胜利的阵地。他们以为人们似乎是这样愚蠢,以至于连草人和真人的区别也分辨不出来。其实,这些阴谋者即使射中了机械论的片面性,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生气勃勃,毫无损害的。何况机械唯物论即使有片面性,但在承认存在决定意识这一点还有它的一面的正确性,唯心主义却完全颠倒了事物的次序,主张意识居于决定的地位,它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反对唯心主义,同时也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当做历史发展的最后决定的原因,但决不是把它当做唯一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肯定

社会意识现象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能动作用，虽然它们不能最后地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并不把它们看做完全被动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者，曾多次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论的区别。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里说：“依据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解，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过程中是最后地成为决定的因素。不论马克思和我，都没有主张过更多的东西。倘若有人作这样的曲解，说经济的因素是唯一决定的东西，那他就会把这个原理转变成没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恩格斯在给斯赫尔根堡的信里，又这样说：“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历史发展中最后的决定条件。……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都建立在经济上。但他们在自己之间互相影响着，并且对于经济基础又有着反作用。决不能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唯一能动的原因，而其他一切都只是被动的结果。应该说，在归根到底总是给自己开辟着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之上有着相互作用。”（同上，第104页）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如果有人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矛盾论》）

什么是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依照上面恩格斯所讲的话来看，意识的能动作用，包括以下的意义：第一，社会意识现象本身发展的历史继承性；第二，各种意识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第一，什么叫做社会意识现象的历史继承性？这就是说：社会存在的变更发展，虽然决定着社会意识的变更发展的根本方向，但社会意识的变更和发展，总是从历史上已经存在了的旧的社会意

识所提供的材料出发的。新的意识现象的出现，总是在旧的意识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结果。例如新中国社会生活变更了，使得艺术上需要“推陈出新”，但“推陈出新”正是指中国旧有民族艺术的改造和发展，不能完全离开民族遗产来凭空地谈“推陈出新”。所以艺术的发展虽然归根到底是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但艺术的形式本身却有着相对独立的前后继承的规律性。恩格斯在给史密特的信里论到哲学的问题时这样说：“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把一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这材料是它从它的先行者继承下来，而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经济在这儿并没有重新创造出什么东西，它只决定着现存思想材料的变更方式和更进一步发展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9—90页）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来源的分析，也说明了社会意识本身的历史继承性。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的社会物质根源，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在历史上起独立作用的阶级力量的成长，但是列宁指出，除了这些客观的社会物质根源之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还有着它的思想的来源，这些思想来源就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些先行的思想就有着这样的继承关系，它就是从这些思想出发并加以改造和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人类思想发展的最高的成果，就思想方面来说，如果没有过去全部人类的思想发展的历史，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

社会意识的继承性，说明我们对待社会意识的问题，决不能采取割断历史的态度。这就是说，在我们创造和发展任何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时候，不能对旧时代的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

态度，绝对的加以否定，否则就要犯错误，就要使新的东西的发展也受到阻碍。毛泽东同志说到五四以来文化界有一种错误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对于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也就是采取“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看法的。这种割断历史的看法在新中国也出现过许多例子。医药和卫生方面的王斌思想就是最突出的典型，由于在一个时期卫生部门的这些领导人把中医当做所谓“封建医”一概加以否定，对于中国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几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文艺上对民族形式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也是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新中国的文艺家们几年来对于旧艺术遗产加以整理、改造、提高，已创造了许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说是崭新的东西。自然，对旧的文化遗产一方面不能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采取一切皆好，不加分别、不加批判地无条件地接受的态度，必须“推陈”和“出新”。但如果没有任何旧的文化遗产作为出发点，那么，“陈”既无从“推”起，“新”也不能产生出来。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完全新形式的东西，也还是国际上的文化遗产和一部分民族文化遗产的综合地继承和发展了的结果。由此可以知道，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对我们采用民族形式的方针，在表面上好象是在拥护新的文艺运动，而在实际上正是要阻碍革命文艺的向前发展。他们口口声声反对庸俗社会学，实际上他们自己却正是在散布割断历史的庸俗化观点，用一种简单化的曲解方法来抹煞文艺发展的具体规律性。

第二，社会意识各部门的相互影响，也是社会意识本身的相对能动性的一种表现。这就是说，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不仅只决定于生产、经济、阶级斗争的发展，不仅对于某一种社会意识的过去

历史遗产有着继承性，而且还要从其他的社会意识部门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例如文艺的内容，不只要反映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的人和物的典型，而且也会反映当时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的斗争等等。把唯物主义原理庸俗化、简单化的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之一，就是认为一种社会意识的内容只反映生产、经济以及阶级斗争，至于这种社会意识的历史遗产以及其他意识部门的影响，对于它是毫不重要的。目前文艺界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对于克服文艺上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有着很大的意义。把某一种典型人物，简单地仅仅归结为经济发展的要求或某一阶级的普遍性的表现，仅仅归结为事物的本质的反映，这是一种庸俗化的观点。作为一个典型，自然要反映，而且归根到底一定要反映某种经济要求或某一阶级的本质，但典型究竟不是科学概念，不是用比较纯粹的一般的形态来把握事物的本质，而是通过具体的历史的形象来表现一般的本质，一个典型必然包含着许多具体的复杂的历史内容，否则就不成其为典型。贾宝玉不是简单地反映封建制度下面的反封建势力的一般要求，这个典型同时还受到它自小生长起来的家庭生活习惯以及旧社会的各种思想遗产的影响，例如佛、道思想的影响，不能说对于贾宝玉这个典型就是不重要的。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结果，在文艺批评上的流弊就是对于作品不给予深刻的具体分析，只根据一两个简单的经济公式和阶级公式，随便拉上一些与公式相符合的材料，就对作品和人物的价值作出论断和估价。这种错误方法在创作上就产生形式主义或公式主义的倾向，描写人物是从概念公式出发，而不是刻苦地在实际生活中寻找生动的材料，塑造真正活的典型，人物的对话好象是在课堂讲理论，而不是在实际生活和斗争中的对话。自然，典型是要在具体形象的特殊性中表

现一般,脱离了特殊性的一般性,就不能算做典型。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以为典型就只是特殊的,不必要在里面找出一般的意义,这又走到了另一个简单化的偏向。例如把李后主的作品价值归结为某些一般的公式,如爱国主义、人民性之类,自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以为他的作品之所以为人们所爱好,只是在于他的某些特殊的感伤情调和特殊的写作技巧,其中没有任何一点与人民共同的东西,这仍然是片面的。

因此,一般的理论原则的学习,正确的世界观的掌握,对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都是必要的。一个作家首先要在人民的斗争的烈火中去求得丰富的生活体验,同时又必须把握多方面的社会知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找到塑造生动典型的充分材料的来源。但是,一个作家如果再能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对于他的创作就会有更大的好处。因为如果他能这样做,他就更善于从他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知识中去集中那些最主要的东西来进行创作活动,也就是更善于通过具体的典型来表现一般的东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一致性,就表现在这里。胡风一方面反对作家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另一方面又反对人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把正确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联系起来。这就是一方面想使作家和他们塑造典型的无限丰富的泉源割断,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在创作上失去正确的思想指导,一句话,就要使作家陷于十足的主观盲目性。

第三,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的最后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它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恩格斯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如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学说,宗教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之进一步发展为信条系统等等,这些因素对于

历史斗争的过程也会发生影响，而且在许多场合对它的形式还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否认社会意识的这种反作用，只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机械论。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要反对机械论的。

但是，社会意识终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是有矛盾的，反映这个矛盾的社会意识，也是有矛盾的。因此它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同样是有矛盾性的，它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有着正相反对的两种情形。有进步的社会意识，它反映着社会存在中的革命的、进步的势力的需要，它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是积极的，它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有反动的社会意识，它反映着社会存在中的保守的、反动的势力的需要，它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是消极的，它迷惑人民，使人民在行动中失去正确的方向，阻碍他们积极地来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两种相反的社会意识和它们的两种相反的作用，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互相斗争着。而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的情形下，就要取决于进步的、革命的社会意识战胜保守的、反动的社会意识。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进步的社会意识反映着革命阶级的要求，进步的社会意识对代表反动阶级要求的反动社会意识的斗争，对于社会革命变革胜败，特别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旧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不但要用国家政权的暴力以及种种物质力量来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也要利用旧的社会思想来麻醉人民，使人民丧失要求进步和变革的自觉性，使人民在精神上失去反抗力量，借此来达到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变革的目的。如果不打破这种旧思想对于人民的麻醉影响，就不可能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进行革命的斗争，就不可能克服反动阶级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变革的障碍。因此，在革命变革的前

夜，首先总会出现一个文化革命的时期，它扩大新的社会思想影响，并克服旧的社会思想在人民中的麻醉作用，这样为革命的胜利准备思想的条件。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就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思想条件的一种文化革命。它的主要功绩就在于批判了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中国的旧思想，并散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种子，使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具备了思想的和干部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里，虽然社会存在中间已没有阶级的对立，但仍然有着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积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的矛盾，因而在社会意识领域里仍然有新的和旧的，积极的和消极的，进步的和保守的东西的斗争。例如在苏联的文艺界里，有一种无矛盾论的思想，它反映着社会生活中一些人们的保守自满的趋向，在文艺创作上形成了一种消极的趋向，并反过来对社会生活的进步发生了阻碍作用，因此就受到了批判。在新中国，为着克服和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障碍，也不断地有着新旧社会意识的斗争。例如一年多来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是最显著的例子。这个斗争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更深入更普遍起来，因而就积极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近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社会思想领域的斗争有可能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以便更进一步地发挥社会意识的积极作用。就文艺方面来说，新中国的革命文艺是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为改造旧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它对于社会存在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艺术的作用是在于“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胡风所散布

的文艺思想，极力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其目的就是要麻醉新文艺的积极作用，使文艺变为消极保守的东西，借此来阻碍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们对胡风这些错误思想，给与了彻底批判，我们对胡风文艺思想斗争的胜利，是革命文艺界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目前中国文艺界已经肃清了胡风派的思想影响，全体一致地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大批的作家走到工厂、农村和部队中去体验生活。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胜利已使革命文艺开始走向新的高涨，并开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前次我们已经讲过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原理，并且简单地解释过什么是社会存在。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存在首先就是指对于社会历史、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或生产方式。生产或生产方式包含着两个不可少的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包括文艺）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就是生产或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次我们就要进一步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具体内容。这个问题要分三个小题来讲：1. 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3. 生产矛盾运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

1. 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

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总的来说,都可以这样看,即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首先是生产不断地向前发展,生产的变化发展引起社会意识的各方面的变化,从而也就使社会的面貌、性质发生变化,因此,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

因此,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下人类社会的生产是怎样发展的。

人们为着维持社会生活,必须不断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取得各种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自己生活上和生产本身不断地提出的各种消费需要——生活上不断地要求供给生活资料,生产方面不断要求供给工具、原料等生产资料。人们进行生产决不是简单的象机械一样地永远重复旧的动作,生产的活动决不能长久地被原有的规模和性质所限制。劳动者使用一定的工具进行某一种类的劳动,在反复地再生产的过程中,劳动者掌握工具的能力,他们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日益积累和增长起来。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积累和增长,使他们能够对劳动工具加以改进,因此也就引起了劳动本身性质的改变,引起了生产力在发展水平和性质上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过程在过去时代绝大多数场合是完全由劳动人民自发地进行的,在这种场合下生产力的发展多半是比较缓慢的。但在许多场合,例如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场合,由于有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他们概括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即对自然斗争的经验),揭发自然界的规律,利用这些研究的成果来自觉地改变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技能,使生产力迅速地显著地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人员的研究工作和

工农劳动群众的生产活动日愈密切地接合起来，使生产力更加无比迅速地发展起来。

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发生了变化，那么生产过程中的人和人的关系——生产关系，也迟早要跟着发生变化，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的发展，最后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新中国几年来的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终于引导到农业、工商业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个高潮就是生产关系改变的高潮，即由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进到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高潮，和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变为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公私合营（最后将变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工商业）的高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综合起来，就叫做生产方式的变更。在生产方式的变更过程中，社会意识的各方面现象也先后地发生变化，从而也就使整个社会的面貌和性质发生根本变化。

直到现在人类的全部社会历史经历了五种基本的社会形式：一，原始公社制的；二，奴隶占有制的；三，封建制的；四，资本主义制的；五，社会主义制的。这五种基本的社会形式，是以五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作为基础的。五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表现着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五个不同的阶段，它们是按照由量变进到质变，由低级进到高级的规律而循序上升的五个生产发展阶段。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人们所处的社会的情况，是决定于人们的生产的情况，不是决定于任何人的“自由意志”。唯物主义指出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客观的物质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把这原理推广到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指出人们所处社会的情况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也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客观的物质生活发展过程，这个客观的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物

质条件，就是生产，所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这个真理，说明了唯心主义者的所谓“英雄造时势”的观点的谬误，指出造成一定时势的决定力量，决不是什么英雄伟人的个人，而是生产发展的一定的情况，人民生活的一定的情况。

“英雄造时势”的谬误观点的表现形式之一，叫做“暴力论”，这种观点把某种社会制度的形成看做是一些偶然出现的“侵略者”、“征服者”应用暴力强制施行的结果。例如德国杜林就有过这类谬论，他认为“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是“抢夺或暴力的结果”，恩格斯批判杜林的错误时，指出杜林完全把事情弄颠倒了。恩格斯说：“财产先应由劳动产生出来，然后才能被人掠夺。”（《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6页）事实上是先有生产的发展，才能有私有财产，有了私有财产，才会有暴力和掠夺。在原始公社社会的末期以前，由于没有任何私有财产，也不曾有掠夺。社会主义社会以财产的公共所有制为基础，由此也就消灭了人掠夺人的根据。

所以，一种“时势”的形成，最后是决定于生产的情况，而不是决定于“英雄”、“征服者”和“暴力”行为。同时，生产的主体是劳动群众，说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也就等于说在社会里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换一句话说，要真正了解一种社会的性质是怎样，要了解一定历史过程的发展情况怎样，首先应该研究在这一社会或这一历史过程中劳动群众从事生产的情况怎样。所以，从事情的实质上来说，“时势”的真正的创造者，首先是生产者，是从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我们说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这个原理又可以进一步引伸说社会历史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有人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

诬蔑人民群众,说他们身上充满着“精神奴役的创伤”,不能够在历史上起积极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证明劳动人民恰恰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唯心主义者的观点完全是荒谬的。

这里必须指出,说社会历史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这意思决不是说,劳动人民可以凭着个人的自由意志任意创造历史,任何一个个别的劳动者都可以成为创造时势的英雄。这样的看法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指的是千千万万在生产中的劳动人民群众,而不是任何劳动者个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群众是生产的主体,而生产是对于社会历史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劳动群众之所以能成为创造时势的决定力量,就因为他们共同执行着生产这一个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任务。所以,劳动群众是依靠着他们的生产实践这个客观的物质条件来创造历史,而不是依靠自己主观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历史。他们所从事的生产发展的情况不同,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就有所不同。在不同的生产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劳动群众。奴隶、农民和工人阶级这三种劳动群众,他们虽然同样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他们所从事的生产的发展情况不同,在他们的劳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形式也就有所不同,而他们本身对于历史所能起的作用也有所差异,例如奴隶和农民能够推翻压迫他们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但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工人阶级却不但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能够建立工人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原因在以后说明)。所以,要了解劳动人民为何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决不能只凭某几个劳动者主观上如何想法来作评判,而要根据广大劳动者的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况。不能把一切劳动人民笼统地看成完全

一样,看成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一样的。作为生产者的劳动人民,当然有其共同点,但更重要的是还要依据各种不同的生产发展情况,来分清楚各种不同的劳动人民的不同的特点,例如工人和农民,就各有不同的特点,而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然是农民的领导,但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必须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性,这里暂时不再进一步说明。

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并且首先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给我们指出了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观察和解决实际工作、实际斗争中的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说,要能够正确地评判社会历史上的问题,要能够正确地解决工作和斗争中的问题,必须从生产发展规律的研究着手,必须首先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况。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正确地领导劳动人民,使他们在工作中处处获得辉煌成就,在斗争中战无不胜,就是因为党的一切战略策略以及工作的方针、计划和办法等等,都是从社会生产发展的科学规律知识出发,从劳动人民的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况出发的。新中国五年计划之所以能获得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拥护,这个计划之所以有可能提早完成,就因为它不是由国家领导人的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于对当前国家各方面的情况,首先是当前国家生产发展的情况以及劳动人民生活情况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并依据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十分审慎地制订出来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的原理,在这里也起着作用;指导工作的政策、方针、计划、办法等(这些都是属于社会意识的),如果是能够正确地反映生产发展的情况及劳动人民生活情况,它就一定能够

获得劳动人民的拥护,就能够把劳动人民的斗争积极性发动起来,通过他们的努力而使政策、任务、方针、计划等变成现实。最近半年多来党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走向高潮的过程,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上面的原理怎样应用到文艺问题上来?应用到文艺问题上来,就必须注意到文艺的特点。文艺反映社会存在,也就是归根到底要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发展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但它的反映是经过曲折的,而并不是直接的道路。如果依据上面的原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归根到底只有描写生产和劳动人民的作品,才可能成为好作品;或者说只有在思想上世界观上了解了生产和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决定力量的作家,才可能写出很好的作品来;或者说只有在生产发展的时期,文艺才能发展,在生产落后的情形下,文艺也一定落后。如果这样看的话,那就会把上述原理弄得简单化、庸俗化了。这样的结论就不能概括文艺历史的复杂情形。过去历史上的文艺作品,除了民间文艺常常直接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活动之外,许多杰出的、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都不一定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大多数的作品所直接反映的是阶级矛盾中的各种典型人物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典型事物,并通过这些间接地曲折地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情况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在《红楼梦》里我们除了贾家和乌庄头的关系等次要情节上可以隐约地直接看见当时劳动人民的部分情况之外,其余我们只能通过贾家内部以及他们有关的各种社会势力的斗争间接地,而且要在一定社会科学思想的指导下,才能推测当时生产发展的情况。中国画里虫鱼翎毛花卉,当然不是直接反映生产及劳动人民生活的。但这类绘画常常通过歌颂人民生活中的这些普

通实物，间接地也就歌颂了人民的乐观主义，歌颂了人民生活。中国有的旧艺术作品是对生产及劳动人民的生活采取否定态度，表现某种厌世出俗的思想的。但是就是描写山林隐逸的中国画，也是对于腐朽社会制度的一种抗议，和对于自然的田园生活——一种歪曲了的人民生活——的歌颂。所以，如果简单地认为好的艺术品只能是直接反映生产及劳动人民生活的，那么在这一个公式主义的框子下面，就要有许多文艺上的历史遗产被粗暴地砍掉了。

至于文艺本身的发展情况，和社会上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以及社会意识发展的情况都有联系，不是简单地、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发展的情况的。如果简单地说文艺的发展决定于生产的发展，那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落后的俄国能产生许多伟大的作家，而生产发展的美国在文艺上反而落后了。

但这决不是说，文艺不能和不应该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活动。不是的，恰恰相反，文艺是能够而且应该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活动的。在过去历史时代，由于剥削阶级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歌颂统治阶级及其生活的作品占据压倒的地位，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文艺受到统治阶级的限制，不能发展成为主要倾向（虽然在民间文艺中不断地大量地产生着反映这方面的内容的东西），这也使过去的文艺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在今天，人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已成为国家的统治者，情形已和过去完全相反，文艺应该直接歌颂劳动人民，歌颂生产者群众，在这方面已不但不会再受到阻碍，而且还要得到国家的鼓励。我们的国家和党的文艺方针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文艺的内容应该以反映工农兵的生活、生产和战争活动为主体——但也不排除其他阶层的生活。在生产 and 战斗中忘我地活

动着的工农和士兵，应该成为文艺里的主要的英雄典型，与人民生活有联系的各种事物，应该作为各种文艺作品的主要内容，按照这个方针进行文艺运动，可以估计不久的将来文艺将有空前强大的高涨，而文艺的高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将起强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以工农兵为英雄典型和歌颂人民生活和他们周围的事物的作品，并且今后一定还要大量地创作这样的作品，虽然我们也同样需要描写其他社会阶层的典型人物和事物的作品。目前，我们的文艺家在塑造工农兵正面人物典型方面似乎还不够有充分把握，在这方面虽然比以前有很多进步，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立场、观点、方法方面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接近工农兵，努力体会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要求和情绪，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为了要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善于塑造劳动人民的生动典型和善于歌颂人民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所必须的条件。一个文艺工作者，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生产发展规律是否能够创作呢？当然也能创作的，特别在过去时代是如此。因为文艺不一定要直接写生产，并且它是要通过具体形象来反映社会存在的，它不需要直接用哲学原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作为创作方法。但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是有一定的统一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生产发展规律，可以使文艺作家掌握观察事物的基本方法，帮助作家了解在我们的生活中间那些是主要的东西，那些是次要的东西，从而也就能在创作过程中为自己规定正确地选择题材和主题的方向，对自己所塑造的各种典型形象赋予正确的理解。文艺是用感性的形象来反映社会存在

的,但如果我们有了科学的理论知识,就可能使我们所写的感性形象获得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这个认识论原理,也可以应用到文艺上来。旧现实主义,甚至于自然主义,都能把社会矛盾在许多具体感觉形象中表现出来,但作者自己对于这些矛盾,并不能正确地深刻地加以理解。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则要求作者努力对作品内容赋予正确的理解,这样就能使作品对社会存在,对劳动人民的创造活动发挥更大的积极推动作用。特别是在目前社会的变化发展极其迅速的时代,在劳动人民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时代,社会生产发展规律的理解,对于作家是更重要的。

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矛盾运动的规律性

前面说过,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因此,理解生产发展的历史,是认识社会、认识历史的根本关键。要怎样才能正确理解生产发展的历史,这就要研究生产本身的矛盾运动规律,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决定的原因。因此我们在这一节里就要研究一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

怎样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呢?要认识一种矛盾的总的特点,必须先把矛盾的各对立方面的特点研究清楚。要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总的特点,必须先把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各自的特点加以把握，然后依据两方面的特点综合起来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这样就能认识它们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

先说生产力。生产力的特点是在于：它在生产中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同时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所谓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就是说它是不断地在发展变革的过程中，不象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以后就在一定的时期之内相对地固定起来，基本上不发生变化。生产力的这种特点很容易理解：在每日每月和每年的生产活动中，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术都在不断地增长，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就使劳动者的工具获得或大或小的改变，在有专门的自然科学技术帮助的情形下，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使工具发生很大的变化，如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情形。劳动工具是规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性质的客观物质条件，它的每一次显著的改进，都要使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获得新的性质。因此，生产的变更发展总是从生产力开始，而一般地是从劳动工具的变更和发展开始的。

举例来说吧，在原始公社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情形下，原始人就在很长的时期里不断地发展和改变他们的生产力。在工具方面，由粗制的旧石器时代，到精制的新石器时代，最后又发明了金属工具，在这中间还发明了弓箭、陶器等等。随着工具的改变，在劳动技能方面，从最初的简单的采集到狩猎，再进到原始的畜牧和农业，而手工业也在有了陶器、精制的石器，特别是金属工具时开始萌芽了。在这中间所发生的变更，不但使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提高了，而且使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狩猎时代，生产

力的性质表现在以下的一些特征里：(1) 劳动的集体性质；(2) 社会分工的缺乏；(3) 劳动生产率极低，社会成员消耗最大的劳动却只能获得维持最贫困的生活的物质资料，没有任何剩余劳动的产品。但是，当人们已经有了精制的石器尤其是金属工具，并且有了畜牧业和农业的时候，生产力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的性质就表现为与上述各点恰恰相反的特征：(1) 劳动的集体性的规模逐渐缩小，由以氏族全体成员为单位的集体劳动进入到以家族为单位的劳动，而最后的发展方向是个体劳动的方向；(2) 开始有了农业和畜牧业的社会分工，以后又有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分工；(3) 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已开始能提供若干剩余劳动产品。这些就是在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已显著地发生了变更的情形。

再举一个例子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情形下面，生产力的发展就经历了以下的显著的变化过程：最初资本家所剥削的对象，是使用手工工具在自己家里进行个体劳动的家庭手工业者，以后资本家又建立了工场手工业，再进一步，在蒸汽机发明后，就发展成机器工业。在这一系列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水平不但空前迅速提高了，而且性质上起了根本的变化，最主要的性质的变化，就是生产过程由个体性质走向社会化的方向，走向社会公共性质的方向。以前可以由个人分散地在各自的家庭内进行生产的，后来却变为如果不把成千成万的劳动者按照严密的纪律组织在一个企业里，就不能进行生产了。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发生了根本改变的情形。

以上说明了生产力为什么是生产中最革命最活动的因素。现

在再说明，为什么生产力又是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就在于：生产关系总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首先是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变更，然后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新的性质而由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是决定于内容并且要适应于内容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也是决定于并且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怎样。生产力在生产中就是这样起决定作用的。

再用上面所说到的例子来作说明吧。原始公社最初的生产力发展情况——劳动的集体性，缺乏社会分工以及没有任何剩余劳动等，很自然地要求人和人之间在生产中建立起原始公社制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包含着三个方面：(1)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2) 氏族成员在生产过程中的同志互助关系；(3) 生产产品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等。在上述生产力的性质的基础上，只能有这种生产关系形式，并且也只有这种生产关系形式才适合于当时生产力的性质，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生产关系，那就是意味着生产力不能正常发展，社会生活不能正常维持下去。但是，当原始公社发展到了后期，生产力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劳动的集体性规模缩小了，劳动的社会分工出现了，劳动的剩余生产物也开始产生了，这时生产关系的形式也就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劳动集体性的缩小，特别是在有了农业时，生产已不再是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来进行，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来进行。于是土地就要分配给各家族来使用，其他生产资料也就不再是由氏族共同来占有，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来占有，财产的私有制就由此逐步产生出来。劳动的社会分工，引起了交换的必要，要进行交换就必须互相承认劳动产品

为对方所私有，这样交换的发展就巩固了私有制度，并推动着公有制的破坏。私有制的出现，就使社会逐渐发生贫富的区别，同时富裕的人就在经济上取得优势地位，就有可能利用自己的经济的优势地位，主要是利用自己手里所握有的生产资料，利用贫人失去生产资料的困难情况，来对贫人进行剥削。这种可能，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多少提供了劳动剩余生产物，就成为现实了。原始公社末期在农村公社内部的奴隶使用的发生，就是由这些原因决定的。这些就是在原始公社里因为生产力的性质的改变，而产生与这种生产力性质的变化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变更的情形。

再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例子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它把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个体的分散的农业手工业小生产变为逐渐集中起来的大生产，如资本主义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富农的较大块土地的经营等等，使生产力的性质逐步发生改变，使生产力的水平大大提高起来。在当时来说，只有在资本家的私有制形式下才能够对生产力引起这样的改变，所以它是完全适应于当时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生产关系，所以这种生产关系是适合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的。以后，在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工业生产。大工业生产使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起来，使生产变成从来未有过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集体生产，使生产过程普遍地获得了社会公共的性质。生产力的这种根本的改变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成为不适合的了。最后就引起了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消灭，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它的地位而出现。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适应于具有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力的内容而产生出来的社会形式。

为什么我国农民在去年秋天以来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普遍地卷入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里去呢？就其最根本的客观原因来说，仍然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引起了生产关系的改变。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里说得很明白：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摆脱了封建剥削以后，情形虽然比较好得多，但是仍有很大的困难。由于人口众多，已耕地不足，时有天灾以及经营方法落后，生产力仍然很低，一般农民生活仍然是贫困的或不富裕的。要克服这些困难条件，就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而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的性质仍然停止在个体经营的情况下，那是不可能的，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要克服人口多，已耕地不足，各种天灾以及经营方法落后的困难条件，非使生产力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不可，也就是非使个体经营的农业改变为集体经营不可。改变生产力的性质的这个要求决定了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也必须发生根本的变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就是适应着这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在党的正确的主观指导下实现了的。

苏联文艺家尼古拉耶娃所写的《收获》里，有一段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的生动描写。那里写一个以“五一”命名的集体农庄，在头一年的时候，是用马拉农具收获的。这时农地是分成一块一块分别由各个工作队担任耕作，每块地之间挖沟为界，到第二年收获的时候已使用拖拉机了。农场最初仍然把土地分成一块一块的用沟界隔开。但是，当拖拉机手弗洛西亚驾着联合收割机走上农地去工作时，她很快就发觉用这样大的机器在分成小块的土地上一块一块地收割是很不方便也很不经济的，来回转弯费时费力，机器不能痛快地开驶，汽油的消

耗也较多。在工作中敢于打破常规的弗罗斯亚，在机器向前行进的时候，毅然地跨过了界沟，把小块土地并成了一大片来进行收割，这就引起了许多有保守思想的人们的反对。但是，当农庄主席质问她为什么要打破大家原来规定的界限的时候，她回答说这样做可以在一个劳动日内做三四个劳动日的工作，这样就把反对的意见驳倒了。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在生产中由于工具的变化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中原来较小规模的互助合作关系就要变成大规模的，这也是说明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上面已讲明了生产力的特点——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在再研究生产关系的特点。已经说过，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作为一种形式，总是相对地固定的，所以，比起生产力来，生产关系就带有多少保守的性质。一种生产关系一经产生，它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会保持基本上不变性，而在这中间，生产力却不断地向前发展了。所以，生产关系虽然是适应于生产力的性质而产生的，可是它在发展过程上却落后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在发展上落后于生产力，这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的矛盾。这个矛盾产生这样的一种发展规律：一种生产关系的出现，最初是和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的，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关系愈来愈落在生产力的后面，以至于生产力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新的根本的变化，而生产关系仍然基本上保持旧的形式，这样，生产关系就由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形式变为不适合的形式了。这时，如果要想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除了使生产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革之外，就没有别的道路。同时，由于生产力究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关系

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状态也不能长久存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自然而然地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引起旧的生产关系的破坏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就是引起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生产关系由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形式变为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形式，又由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形式经过根本改变而成为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形式，这就是生产发展的辩证法，生产的矛盾运动规律的主要表现之一。

上面已经引过的例子完全可以说明这个矛盾运动的规律。当原始公社的生产力还在使用石器和狩猎的时代，生产关系是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然而在原始公社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情形下，生产力就向前发展了，工具继续改进，由狩猎进到了畜牧和农业的时代，这时生产力就具有新的性质，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对于这种新的生产力就成为不适合的了，随后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的变化，出现了财产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制度。在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是适合的，生产力向前发展，进入了机器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没有变化，而生产力已经具有了社会公共的性质，生产关系就变得与生产力的性质不适合了。这个矛盾终于推动起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消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建立起来，生产关系又变得与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了。

不能够因为生产关系在发展上落后于生产力，就把生产关系看做是生产中纯粹消极、被动的因素。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生产关系是被决定的因素，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虽然这是主要的一方面，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已经说过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

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们很容易了解，在文艺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中，内容虽然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但形式对于内容，决不是无关重要。相反地，形式是内容赖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一种艺术作品如果有了最适当的形式，它的内容——它所反映的事物的矛盾运动就会充分地得到表现，如果一部作品没有采取适当的形式，它的内容的表现就会受到限制、阻碍。所以，适合的形式，对于内容是至关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形式对于内容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也有着类似的重要的反作用。当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相互适合的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时候，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能发生强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还可以说它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的决定力量。当生产关系已经远远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并成了完全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陈旧的形式时，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发生阻碍的作用，生产力就要受到破坏。

新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有着显著的表现。苏联在革命前是洲欧的落后的农业国家，革命后只经过了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就成为欧洲第一位的先进工业国。中国在革命胜利前是比旧俄国更落后得多的、工业产值只有百分之十七的落后农业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才四五年间，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工业产值就增长到将近百分之三十。三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可以指望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从生产力的两个要素——工具和劳动者——的进步和增长上看出来。最近由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全国高潮，农民个体私有制普遍地改变为半社会主义的或全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已经推动着农村生产力开始高涨起

来,而这种高涨的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第一,新式农具的需要空前地增加了,以至于国家必须对制造农具的企业部门提出很大的计划任务,如在去年底就提出要在1956年内更加大量地制造双轮双铧犁等新式农具的任务等;第二,农村劳动者的力量能够充分发挥了,农村中出现了大批的能够创造先进经验,高度掌握劳动技能的农业劳动者,由于劳动被合理地组织起来,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的利用率都大大地提高起来,以前有许多劳动力在农村里无法利用,农村人口不断地流入城市,合作化运动高涨以后,这种趋向就停止了。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里面规定了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巨大任务。任务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附带地连苍蝇、蚊子、老鼠以及各种困难的疾病也要一起加以消除。由于有了农村新生产关系的强大推动力,这些巨大任务并不使中国农民觉得为难,相反地却获得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在工业里,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动下面,工人中间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使工业生产力迅速提高起来。在劳动竞赛中提高生产力的中心关键,就在于工人们自觉地改进工具设备,改进操作方法和劳动组织。

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旧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发生阻碍和破坏作用,这可以由资本主义的恐慌的例子明显地看出来。在资本主义恐慌时期,工场关门,商业停顿,大量的产品由于没有销路,资本家就白白地把它毁灭了。在这里,生产力的破坏主要地也表现在它的两个要素的浪费方面:例如象原子能这样无比强大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早已发明了,却始终还没有能正式应用到生产方面,而掌握原子能较迟的苏联反而首先建

立了原子能发电站。就劳动者方面来说,在美国,经常有千万以上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只这些例子已经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生产力是遭到了如何可惊的浪费,其他可以不必提了。

在旧中国,农民受到地主阶级和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弄得连生活也不能维持,因此也就无力来改进工具,更不用说采用新式工具。至于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在十分贫困的情形下也无法认真加以掌握和提高。土地改革为农民解除了封建剥削,农民的生活情况和生产情况就比较好多得多了。但是农民的个体私有制仍然限制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个体经营的农民没有力量充分采用进步的农具和科学的农作技术,特别对于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是如此,只有实行合作化以后,才解除了这些限制。

以上的例子说明,生产关系如果成为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陈旧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要起阻碍和破坏作用,而所谓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和破坏,在实际上主要地也就是对于生产者群众,对于主要生产力的劳动人民的正常生活的摧残和破坏。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陷入了尖锐的矛盾的时候,劳动群众就无法好好地进行生产,甚至于无法生活下去。这样的情况 and 条件,自然而然地就要把千万劳动人民推动起来进行摧毁旧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生产关系不能长久处于和生产力的性质不相适合的状态,为什么生产力会具有着一定要使生产关系适合于自己的性质的决定作用,为什么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后一定要迟早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使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合的新的生产关系?是什么力量使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一定会起这样的决定作用?一句话,就是千万劳动人民的力量,生产者群众的伟大力量。因为腐朽的生产关系总是要妨碍和破坏

广大劳动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是千万劳动人民都努力要求加以改变的。千万劳动人民共同起来要求和共同起来斗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个力量既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结果旧的生产关系就一定要被摧毁，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就一定要变为现实。例如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村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发生根本改变，就是由于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结果。由此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劳动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为什么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者群众的历史。

3. 生产矛盾运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史的过程。它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看做人们的主观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有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硬说只有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才是依循着某种规律性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完全决定于人们的偶然的“自由意志”，没有什么客观规律性。胡风在通讯里，说到有一个大的意志支配着中国，这就是利用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界历史虽有本质的不同，但决不是没有共同之点。两者的共同点是：不论自然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都是客观的物质运动的过程，它们的变化发展都是依循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的。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有什么本质上不同的地方呢？主要的不同点之一，就是：在自然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完全自发地、盲目地发生着作用，而在人类社会，人

们的自觉意识,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却有着重大的影响。

生产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更,最初总是按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规律自发地进行着的。这就是说,在旧的社会,旧的生产方式里,生产力的性质最初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新的生产力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随着新的生产力的出现,生产关系也就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这些发展过程,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着的。

我们知道生产是人的活动,是劳动者的创造活动,它的主体是劳动者。为什么又说它的发展过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人们进行生产活动不能不依靠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首先是工具,人们不能任意选择这些客观条件,他们只能依靠他们开始活动以前已经存在的条件。马克思给安能科夫的信说:“生产力是人类的实践能力的成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却决定于人类所处的情况:即由以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和在他们之前已经存在(不是他们所创造的,而是过去世代的生产物)的社会形式所形成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人们既然只能依靠既成的条件进行生产活动,所以他们的生产活动的发展趋向,他们所掌握的生产力的性质,他们的适应于生产力性质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就都不是他们的主观意志可以任意选择或任意改变的,也就是说,这些过程都不是依赖于他们的主观意识而是依一定的客观规律自发地进行的。第二,当人们努力改进工具,提高劳动技能的时候,他们的主观意识自然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在实际上他们的主观意识所考虑到的只是某些眼前的目的,他们决不会预想到生产力的这些改进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变化,他们不会预想到生产力会在性质

上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生产关系也会随着发生怎样的改变，而这对整个社会又会引起多大的变化。例如英国技工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决没有想到这个发明会引起“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普遍地社会化，并因此导致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说明生产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对于直接从事改进工具改进劳动技能的人的主观意志来说，是完全独立地、自然地进行的。因此，我们说历史归根到底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是生产者群众所创造的历史，这决不等于说劳动群众能够凭着他们的主观意志来任意创造历史的。他们的这种创造活动的趋向和性质，是由一定的现成的社会条件所规定，并遵循着为这些条件所规定的一定的规律性的。有些关于历史事实的文艺作品，由于作者缺乏这种历史观点，把过去的农民描写得就象今天的工人阶级一样，或者描写成凭个人的意志来创造历史的英雄，这就不能不歪曲了历史真面目，违背了文艺应该正确反映现实的原则。所以，研究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对于文艺工作者理解各种不同劳动人民的不同的基本特点，是会有帮助的。

但是，不能因为生产发展过程最初是自发地进行着，就得出一个片面的结论，说人的自觉意识没有任何的作用。生产发展过程虽然始终是依一定的客观规律进行的，但不能说这种规律性的活动是象自然界的情形一样，永远只是自发地盲目地起作用的。这是自发论的错误观点，是把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偶像化了的错误思想。应该说，即使是自然界现象的客观规律，也只是在没有人类社会时和这些规律没有被人认识的时候才是完全自发地盲目地起作用的。当自然规律被人们所认识，并把这认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时，自然规律也就成为被人们自觉地利用来改造自然的规律知

识了。至于说到社会发展的规律，生产发展的规律，那么，生产的发展，新的生产力的产生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只能在一定的时期之内是自发的。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情形下，如果仍然处于自发状态，就不能前进。这种情形，特别在阶级社会里最为明显。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体现为互相敌对的阶级势力——前进的势力与腐朽的势力。社会的腐朽势力的利益是和腐朽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因此，当生产力已发展到使旧生产关系成为完全不适合的形式时，当生产关系必须要发生根本的改变时，社会的腐朽势力仍然要用一切力量和办法来保存旧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使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形成，受到严重的阻碍。由于腐朽势力是处在国家统治者的地位上，他们能够利用强大的国家的物质力量来阻碍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也能利用统治者所垄断的文化教育工具来进行麻醉人民的宣传活动，从而在精神上阻碍人民起来和旧生产关系和旧社会制度进行斗争。因此，这样的阻碍，单凭自发的过程，是不能克服的。这时生产的发展就必须迟早要进入自觉的运动过程，也只有进入自觉的运动过程，才能克服旧势力的阻碍。所谓自觉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通过新的社会意识，新的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的积极作用来得到实现的过程。新的社会意识，新的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等，是反映着生产发展的新的需要，反映着生产力向前进步的要求以及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的。每一历史时代的先进的思想家观察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创造出与当时条件相适应的新的社会意识，再把这种新的社会意识向着社会的前进势力进行宣传，打破他们中间由于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不自觉状态。由于有了新的社会意识的指

导,社会的前进势力就能够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趋势,认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使他们在行动上有了明确的目标,并在这一个共同的明确目标之下组织和集中起来,形成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自觉地向社会腐朽势力的堡垒举行进攻,这样才有可能克服后者的阻碍,使生产关系发生根本的变革,为生产力的进一步的强大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地盘。例如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就是要通过工人阶级的自觉的行动,也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组织和发动起工农联盟的大军,才能够克服资产阶级和其他腐朽社会势力的阻碍,实现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任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用具体的典型形象来反映生产发展的这种自觉过程,也就是工农兵的自觉的斗争。

生产发展的自觉过程,决不能看做是否定了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全凭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随意性的过程。相反地,在这个过程中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仍然起着最后决定的作用,和自发的过程不同的,只在于生产的客观规律在自发的运动过程里,是没有被人们认识的,人们对于它是盲目的。因此它是离开人的主观意志而自发地起作用的,在这种情形下,人们的行动常常不能和历史规律性一致,常常要发生错误和偏差。但在自觉的过程里,生产的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或多或少地被社会的前进势力所认识,人们在这样的认识的指导下,就能自觉地按照历史规律的方向去行动,就能尽量避免错误和偏差,这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性通过人的意识而成为人们自觉的活动。所以,社会的先进势力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规律,然后才能够真正推动社会前进,如果他们只凭主观的意志任意行动,而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

规律，他们就要丧失真正的先进势力的资格。如果一个共产党员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不能在群众中起先锋队的作用。进步的文艺，由于它直接地或间接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规律性，对于人民的自觉活动是能起很大的推动作用的。十九世纪俄国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批评，就起了这样的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应该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变革过程中以及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启发工农群众以及其他进步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自觉性，因此它必须直接地或间接地正确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生产的矛盾运动和社会各方面的矛盾运动，必须反映工人农民为解决这些矛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以前，生产的发展总是由自发的过程发展到自觉的过程。而自觉的过程主要地是出现在社会变革的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以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自觉的发展过程就成为生产发展以至于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主导的特征。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以前，或者是如象原始公社那样，社会还处在野蛮时代，还没有具备能够反映生产发展规律的物质和文化条件，或者是如象阶级社会那样，社会的统治者都是以保存现有生产方式为自己的利益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偏见使他们不能认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而劳动群众一般地都是处在穷困愚昧的境地，也没有力量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生产的发展一般地只能是自发地进行。只有到了社会生产的矛盾发展到极尖锐的程度，旧的统治势力已经十分腐朽，自发的过程已遭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时，然后才会出现一些代表进步势力的先进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规律，反映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然后才在他们的思想影响

下,使社会生产的发展走上自觉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形有了根本的不同。因为在这里,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是保守的势力,而是最革命的工人阶级。代表工人阶级领导社会的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武装的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保证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经常能获得精确的关于生产发展规律知识的指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日益全面地为人所认识,日益充分地被人利用来为社会谋福利,所以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成为完全自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政党以及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机关等——的特点和任务,就在于要对生产发展过程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过程给与正确的自觉的指导,如果它们不能这样做,如果他们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各方面的工作陷于自发的状态,它就丧失了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的意义。反过来说,如果它能正确地执行它的上述的任务,充分发挥它的上述的特点,那么它对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各方面生活的发展,就会成为极强大的推动力量,最近一年来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的空前迅速高涨,就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国家对于生产的自觉运动的强大指导作用的很好的证明。

应该指出,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的发展过程和社会生活发展的过程完全是自觉的,这只是就它的总的方向和本质的方面来说,这决不是说,在具体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中,任何自发的状态也不存在了。不是的,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的生产力以及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也常常会是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自发地产生出来,而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和领导方面的自觉的指导,常

常也要在后来才能实现。社会存在先于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原理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是不可动摇的。要证明这种情形,例子可以找到很多。在苏联,例如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是这样,斯大林曾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自行开始的,几乎是自发开始的,由下层开始的,并没有受到我们各企业管理处方面的任何督促”,(《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5页)以后才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加以总结、推广,使之成为自觉的运动。

在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里,生产发展之所以仍然存在着自发的情形,可以由两种原因来说明:第一,领导机关虽然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使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在总的方面来说始终贯彻着自觉性,但作为领导机关,不可能对于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过程的具体细节都能处处注意得到,因此在具体的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过程中,新事物在人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的情形下常常自发地产生出来,这是很自然的。第二,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以至于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过程中,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过程中也仍然永远有着先进与落后、新事物与旧事物的矛盾,这个矛盾也不能不反映在领导机关中,因此,虽然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是最革命的势力,不会象旧社会的腐朽的统治者那样把保存旧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利益,但领导机关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员中间,也常常有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指导和陷于主观主义的错误道路的情形。他们或者是由于骄傲自满,麻痹了对新生事物的感觉,或者是由于受到了某些惰性势力以至于腐朽势力的思想影响,对于新生事物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不能对生产中和社会中的新事物的发展给与自觉的指导,相反地还要加以阻碍,某些生产

部门中领导者对于劳动者的先进经验的推广不加重视甚至加以阻碍,就是说明这种情形的明显的例子。

以上两种原因,就说明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发展的过程,仍然存在着自发的情形。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情形和旧社会有原则的不同。第一,这种自发的情形,不会象在旧社会那样长久停留,一定要到生产方式的矛盾达到很尖锐的程度才被迫地引到自觉的运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自发的运动是能够及时地转到自觉的指导方向的。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由自发走向自觉,不象在旧社会那样要受到腐朽势力的严重阻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暴露不至于成为对抗性的。对社会和生产发展的自觉的过程虽然经常地必须和惰性力量、保守思想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主要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劳动竞赛之类的和平形式,不至于发展到冲突的地步。以上两点告诉我们,虽然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过程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过程仍然存在着自发的情形,但自觉的指导,是居于主导地位,所以,总的来说,就其本质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自觉性的。

恩格斯指出由阶级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由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飞跃。”所谓“自由的王国”,就是指社会生活能够获得自觉的指导。而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其中的主要条件,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能够应用这个武器,来正确地认识生产发展的规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了这些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来指导工作,就可能及时地觉察到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自发地出现的新的东西,

就可以迅速地把它转变为自觉的运动，就可以迅速推动生产和各方面生活的进步，使社会获得它应有的高度的福利。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的任务，主要地也就在这一点。

三 阶级和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就指出，从来人类的历史，除原始公社以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纷杂迷乱毫无规律可循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阶级斗争的原理，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找出了它的有规律的发展线索来。马克思主义的党，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方面主要地就是应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革命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够规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来指导工人阶级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最有力的革命思想武器，就为着这样的原因，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和唯心主义者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没有不集中力量来反对它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胡适、胡风都是如此，梁漱溟先生也是显著的例子。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已经有一些人初步地认识到了。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梯埃利，明涅，基佐等曾经用“第三等级”反对贵族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前后的历史事变。但这些历史家只是片面地认识到一个历史阶段上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没有全

面地把握到阶级的本质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和这不同，它揭发了阶级的本质，阶级产生的原因和阶级斗争的全部历史规律。马克思曾概括地指出自己的学说的特点说：“我的新的东西，是在于指出：（1）阶级的存在，只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结合；（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向无产阶级专政；（3）这专政本身只是作为达到一切阶级的消灭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页）

下面我们就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最重要学说加以解释。我们的解释共分为三个小题：1.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2.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3. 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掌握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现在开始讲第一个小题。

1.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 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

一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者和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差不多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外表上极力否认社会上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在实际上却是想把某一种阶级剥削制度说成是万古不变的东西。例如梁漱溟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想把旧中国的封建阶级制度说成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这些唯心主义的虚伪观点，一方面肯定原始公社以来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另外一方面又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定时期之内

产生的现象，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所产生的现象。就全部人类历史来说，阶级社会所占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由原始社会末期到现在最多不过六七千年的时间，已经到了消灭一切阶级制度的时代了。

现在让我们先解释一下阶级这一个概念的意义，然后再说明它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规律。为什么要先解释阶级这个概念呢？原因之一是人们对这个概念常常有不正确的认识。最容易碰到的错误认识，就是把阶级和等级混淆起来。阶级决不是等级，等级的意义有两种，一种是在奴隶社会里或封建社会里出现过的那种人身从属关系的等级制度，如公、侯、伯、子、男的等级，贵族和平民的等级等等，这种等级制度的特点主要是在法权上道德上规定了上面的等级对下面的等级有在人格上加以支配的权利，而下面的等级对上面的等级有在人格上从属的义务，在这里面，同一阶级中间也可以划为不同的等级，如同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可以划分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等级。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甚至父、子、兄、弟之间也带有某种人身隶属的等级关系的特点，同时阶级的关系也具有等级的意义，如贵族和平民是不同的阶级，同时也是不同的等级。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从表面现象上看起来，等级和阶级是混淆难分的，在这里，等级的关系掩盖了阶级关系，这是使得当时研究社会历史的学术界不能够揭发社会阶级关系和创立阶级斗争学说的原因之一。等级的另一种意义，是职业上或工作上的，在同一工作中由于经验、资历和贡献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等级的待遇和报酬，这是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仍存在着的必要的制度，这当然不是阶级。以前曾有些反动分子，为了造谣破坏，利用一部分群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弱点，故意把这种必

要的等级制度混说成阶级制度，从中进行挑拨。所以在这一方面也应该区别清楚。

阶级关系不是人格上的从属关系，也不是职业上和工作上的不同地位。阶级是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上的地位的不同而形成的各种社会集团。所谓经济地位不同，就是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同。生产关系的性质，首先是由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所以，人们的经济地位，首先又决定于他们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中的地位。在阶级社会里，一部分人占有了全部或大部分主要的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人全部或部分地丧失了生产资料，因而前一部分人就在经济上居于支配的地位，就有可能利用自己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前一种人就成为剥削阶级集团，后一种人就成为被剥削阶级集团。

列宁说：“所谓各个阶级，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所谓各阶级，就是由于彼此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而有某一集团能占得另一集团劳动的各个集团。”（《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92页）

知道了什么是阶级，也就了解阶级是如何产生的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阶段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在这里面，人们分裂为在经济上（首先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居于不同地位的集团，分裂为经济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集团。这样的分裂，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水平和性质规定了的。恩格斯对于这样的生产力的

发展情况曾作了一个一般的概括，他说：“当社会劳动成果的总量用来供给社会全体所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之外所剩无几的时候，劳动差不多占据着社会极大多数人的全部或最大部分时间的时候，这时候，社会必然分成各个阶级。”（《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情况，相当于原始公社末期有了农业和畜牧业以后，一直到大机器工业开始出现的时期。这个时期，生产力比原始公社有所提高，即在生产中能多少提供剩余的劳动产品，但是这种剩余劳动产品数量很少，而要实现这样的生产，必须使社会极大多数人的全部或最大部分时间投入劳动过程，只有极少数人能脱离生产劳动，从事政治、文化、科学的工作。这是使得社会上少数人可能占据优越地位来统治和剥削大多数人的最根本的原因。此外，生产过程由集体的转为分散的以至于个体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生，使财产私有制度产生和巩固起来，使社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而阶级剥削制度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实现出来的。

最初的阶级剥削制度是原始公社末期所发生的奴隶的使用。开始时，奴隶是仅仅由战争的俘虏来充当的，以后由于贫富的分化加大才使得公社内部的成员也有一部分变为奴隶。奴隶在开始时只能由俘虏来充当的原因，是由于原始公社内部的同志互助关系的巩固传统不容易很快打破。最初的奴隶，是在农业公社内部作为各家族内的辅助劳动力来使用的。奴隶所有者也从事劳动，这叫做家内奴隶制度，这是原始公社末期即农业公社的奴隶使用制度。这是过渡性质的制度，奴隶还没有担当生产的主要任务，原始公社制还是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形成正式奴隶占有制社会。正式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形成，是在奴隶被大量使用，并担当了主要的生产任务，而奴隶占有者成为脱离生产劳动的奴隶主阶级，并专门依

靠剥削奴隶劳动产品来生活的时候。奴隶占有制度主要地是存在于古代世界，如中国的殷代，西洋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地方还有它的残余，如中国的四川（原属西康）的彝民地区，就有这种情形。

奴隶占有制下面的基本的对立阶级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在使用粗糙的工具来进行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情形下面，奴隶主强迫下面进行的奴隶的集体劳动，比起农业公社的族长支配下的劳动来，能够提供更高的生产率，这就使得奴隶主成为社会上据有最大财富的、在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级，并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奴隶的剩余劳动使一小部分人能够脱离苦重的体力劳动，专门来从事政治、文艺、科学等等的文化上的创造活动，使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这是奴隶占有制度在历史上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奴隶占有制度是一种最残酷的剥削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以至于奴隶本身，而奴隶则毫无所有。因此，奴隶在生产中毫无所得，生活上也没有任何指望，对于劳动感不到丝毫兴趣。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需要把粗糙的工具改为较精巧的工具，而为了掌握这样的工具又需要劳动者能够获得较高的劳动技能。对于劳动不感任何兴趣的奴隶劳动，既然是不能满足这样的需要，因此奴隶占有制度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消灭奴隶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才能进一步发展，而这新的生产关系，就是包含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的封建生产关系。

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下面，基本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地主阶级占有了主要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生产者是地主阶级在实际上仍然可以任意支配并加以剥削的农民，但他们已能够占有

自己劳动所必需的某些工具，并且可以有自己个人的经济。这样的阶级制度，是适合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情况的，因为这时生产力的水平已有提高，生产力性质也有一定的改变：工具是比较精巧的便于个人使用的手工具，而各种劳动技能也比较奴隶制时代更复杂更提高了。占有自己的工具并且又有自己的经济这个事实，使农民觉得在生产中和生活中多少有了能够富裕起来的指望，因此他们对劳动就发生了兴趣，不象奴隶那样缺乏自动性，这就使他们能够认真地来掌握较精巧的工具和较复杂的劳动技能，使生产经验积累起来，这样就使生产力进到更高的发展水平。

但是，在封建制度下面，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其残酷的程度在实际上和奴隶占有制度下面的剥削是差不多的。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民在这种剥削下面普遍地穷困破产，生产上和生活中都毫无指望，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仍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另一方面，封建制度下的生产都是个体的小生产，个体的小生产本身，对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天仙配》这个戏里描写董永的主人故意为难他的老婆，要她一夜织锦十匹，幸亏她是仙女下凡，靠了七个仙女姊妹的帮助，算是完成了任务。这个戏在神话的形式上反映了个体小生产的限制性——只有在幻想中的神仙帮助下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较大的生产任务。要在实际生活中而不是幻想中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较大的生产任务，只有在生产力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形下，只有个体的小生产改变为较大规模的集体性的生产时，才能够做到。要进行生产力的这种改变，依赖地主阶级是做不到的，因为地主阶级就是依靠剥削个体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生活的，这种剥削制度就是建立在小生产的条件上的。至于农民，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

仅仅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发生困难,更不用说把生产规模扩大。因此,在封建社会下,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任务,就不能不由另外的新的阶级来担任了。这个阶级,就是城市里的资产阶级。

城市是在封建社会里逐渐生长起商业和手工业的集中地区。在这里,资本家最初投资建立手工业工场,把手工劳动者集中起来进行生产,这就开始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特点,就在于它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作为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无产阶级则是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在法律上不是隶属于资产阶级的等级,形式上和资产阶级是平等的,然而他们在经济上除了向资产阶级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谋生的道路,因此在事实上就不能不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支配并受他们的剥削。资产阶级为自己追求利润的欲望所驱使,把封建时代的个体生产改变为集体生产,使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使用手工工具的工场手工业进到使用机器的大工业,使社会生产力空前迅速地提高起来,并使生产力的性质普遍地社会化。社会化的或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建立生产工具和生产品归社会所有的、没有私人占有和没有剥削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要求和资本家的私有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同时,在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集中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大军,形成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无比的力量。无产阶级担当着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是资本主义制度里所产生的资本主义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除了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的任务之外,同时还担任着实现新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的任务,即消灭一切阶

级剥削制度的任务。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实现这个任务，是由于生产发展的情况决定的。在大工业生产的情况下面，恩格斯所说的必然使社会分成各个阶级的根据已经没有了：社会劳动成果的总量中，用来供给社会全体所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之外不是所剩无几，而是剩余很多了；劳动已不再需要用去社会极大多数人的全部或大部分时间，而是所用的时间大大缩短了；由于机器的生产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劳动者来操纵，因此工业劳动者不再是象奴隶和农奴那样长久处于无文化状态，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任务已不再是极少数依靠剥削生活的人们的专门权利，劳动人民也逐渐地有机会向这方向发展了。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这里，剥削制度已被完全消灭，但还不能说已消灭阶级，因为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区别还存在着，其所以要作为两个阶级加以区别，是因为他们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方面还有所区别。工人阶级是属于全民所有制的，而农民则是属于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虽然总的来说同样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仍有具体的本质上的区别。只有当生产力更高地发展了，以至于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可以象工业一样进一步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时，也就是由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农民和工人的本质的区别才被消除，才可以说完全消灭了阶级。

2.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更，以至于全部

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通过阶级斗争或阶级矛盾运动来实现的。每一个阶级社会，都有着它所特有的两个主要的互相对立阶级，构成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奴隶占有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应该怎样来理解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呢？这必须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加以分析，才能够说明。

在阶级社会里（这里我们把工人阶级专政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暂不算在内），剥削阶级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每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都是建立在一个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使这种生产方式尽可能地巩固不变。因此，当这种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当生产发展过程中提出了消灭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生产关系，以便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地盘这个任务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就要用一切办法来维持旧的生产关系，阻碍新生产关系的建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如果被剥削阶级不起来进行斗争，社会的生产就不能向前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就要停顿下来。只有通过被剥削阶级与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使生产力发展，使整个社会前进。在这个斗争中，被剥削人民的胜利愈更彻底，社会的进步就愈更迅速，他们在斗争中失败了，社会的发展就要受到严重阻碍，但只要有了劳动人民的群众斗争，社会就会多少有些进步的。

例如旧中国的封建社会，首先就是由于经常有着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才能够逐渐进步的。毛泽东同志说在旧中国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

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在一种阶级社会出现的初期，剥削阶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使生产力向前发展。但他们仅只是在有利于自己的剥削需要时才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对于社会的最重要的生产力的轻视和压迫行为，却又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为着自己的私利组织奴隶劳动，发展了比原始公社更高的生产力，但他们对奴隶的残酷剥削使得奴隶对掌握工具和劳动技能毫无兴趣，并使奴隶肉体生命遭到无情的摧残和浪费，使社会的生产力不能继续发展。封建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关心农业生产的收成，有时也组织一些如象水利之类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设施。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更厉害地阻碍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同上书，第618—619页）

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组织大规模的生产事业，使社会的生产力在过去一个历史时期空前迅速地发展起来。但是在资本家的私有制基础上和各个资本集团盲目追求利润的条件下所发生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恐慌，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许多科学技

术的新发明由于不符合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要求而弃置不用，阻碍了生产力更大发展的可能性。并且资本家在企业里采取某些技术改革的措施，常常也是由于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当工人阶级为争取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而斗争，并取得一定胜利时，资本家就采取新的技术来加强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就相对地提高了剩余价值的剥削程度，而事实上就把工人阶级斗争所得的果实抵消了。马克思指出：1852年以后英国的“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仅只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战斗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就是指这种情形而言的。此外，资本主义社会里经常存在着的大批失业工人的现象，说明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这种最重要的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浪费。

不能一概否认：剥削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在一定时期有某种积极的作用（例如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没落的时期曾经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特别是这些阶级中有些人物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活动，对于历史进步也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否认这一点，就是缺乏历史观点，就不能正确说明在阶级社会里的许多历史现实。描写历史事实的文艺作品，必须掌握这个历史观点，才能不违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巴尔扎克的作品之所以算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也只是在于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进步这一个历史的现实。但是，虽然我们必须对剥削阶级的看法采取这种正确的历史的观点，但我们更要注意到，被剥削的生产者群众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始终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剥削阶级只能在历史的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起积极的作用，生产者群众则是生产——对社会历史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主

体,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本的创造者,社会历史的发展,永远是以他们的劳动和斗争为最根本的决定力量。当劳动群众为着反抗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积极地起来行动时,社会历史就会发生迅速的变革和发展,当他们的斗争行动沉寂下来的时候,社会的进步也就要延缓下来。

在不同的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有不同的情况,并且对于历史的发展所引起的结果也不相同,这也是必须加以注意到的。

在奴隶占有制的社会里,奴隶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是使奴隶占有制社会崩溃并使历史发展前进进一步的动力。但奴隶是对于生产的进步没有兴趣的阶级,它不是和更高的经济形式相结合的阶级。奴隶阶级在斗争中推翻了奴隶主阶级和破坏了奴隶占有制社会之后,奴隶阶级自己也随着同归于尽,他们并不能成为建立新社会推动生产发展的主人。代替奴隶占有制社会出现的,是以地主阶级为统治者的封建社会。在这里,农奴劳动者代替了奴隶的地位作为生产的主体。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能够严重地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以至于能够摧毁封建社会,使社会向前进步,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但是,农民阶级同样不能使自己成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主人。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的结果,从来不外乎以下的三种情形,如果社会生产仍然是个体分散的小生产,没有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出现,那么,农民暴动或者被地主阶级所镇压而归于失败,或者即使暂时得到了胜利,推翻了一个封建朝代,但归根到底另一个朝代的地主阶级又利用了农民斗争的果实而使自己掌握了统治。中国过去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结局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

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其次，如果社会上已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并且资产阶级也正在对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时，那么，农民革命斗争的胜利果实就要被资产阶级所利用。这就是说，当农民起义推翻了地主阶级统治之后，资产阶级就代替地主阶级成为统治者，并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如果社会上已经出现了无产阶级，那么，农民的斗争就有可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获得最彻底的胜利，并且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一直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不论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都能以他们的斗争来推动社会前进，但他们自己却不能成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这主要是由于前面说过的历史条件——生产条件决定的。过去反映农民斗争的文艺作品，结局一般都是悲剧的性质，甚至在神话幻想中也不能有喜剧的结果，这不是偶然的。《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的结局就是完全悲剧的。《西游记》用神话形式描写了孙悟空这样一个出色的反抗性格的典型，但结局是被统治者征服了。

奴隶和农民在他们所处的社会时期都不是和更高的经济形式相结合的阶级，因此不能在自己的手里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奴隶是使用较粗糙的工具并且是被迫地劳动的生产者。农民则是分散的小生产者，并且是私有者，它本身没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的要求，因此也就不能自己走向废除剥削制度的方向。在解除了封建剥削而又不废除个体私有制的情形下，农民只能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方向。也就是说他们中间会发生贫富的分化，少数人变为富农，即变为农村的资产阶级，大多数沦为贫农或雇农，即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和奴隶、农民都不同。工人阶级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近代的大生产相联系的阶级，而不是和落后的分散的小生产相联系的阶级，近代大生产使工人阶级具有最集中、最有组织和最有纪律的特性，也就是使它成为最强有力的劳动阶级。工人阶级不是私有者，而是一无所有的阶级，他们在阶级斗争中没有任何需要顾虑和需要保留的东西。他们的无产者的地位，加上他们所联系的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公共性质，在他们面前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的生产方式的任務。所以，工人阶级和过去的奴隶、农民不同，奴隶和农民的斗争只能推翻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为后来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阶级社会的出现扫清道路，工人阶级则不但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扫除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且应该和能够领导一切劳动人民，为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

工人阶级要领导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国家政权夺取在自己的手里，否则工人阶级的这个历史任务就无法实现。在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情形下面，即使工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也不能够适应于生产力的性质而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是根本相反的制度，以保护私有制度为自己的生死利益的资产阶级，他们在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时候，就要用一切力量和办法来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所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内部，是没有或几乎没有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旧社会里只能产生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只有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里的时候，才能够开始来建设社会主义和消灭剥削制度。没有工人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对剥削者进行坚决的阶级

斗争，没有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所创设起来的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要使人类历史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经过自发的阶段到达自觉的阶段，自发的斗争和自觉的斗争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有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自发阶段，就是指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的情形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工人阶级虽然在进行斗争，但斗争的目的只限于某些眼前的局部的问题的解决，不知道自己阶级的远大的历史任务——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知道自己的斗争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当然也不知道为完成这些远大任务所应采取的正确步骤、方针、战略和策略。不但如此，在自发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的运动既然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指导——也就是说，运动处在盲目的状态——因此，就很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并被资产阶级分化、利用，使工人阶级归于失败。所以，工人运动中的一种自发论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这种思想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否认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这种思想就是想要使工人运动永远停顿在自发状态，以便资产阶级可以依据自己的利益来任意加以支配。胡风在文艺上强调要写群众自发的行动，反对艺术作品反映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的指导，就是利用反动的资产阶级自发论思想来反对工人阶级、反对革命的一种阴谋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共产党，就是为着使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上升到自觉阶

段,就是为着使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明确地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划清界限,以便能够坚决、彻底地为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列宁在创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之前,就曾经坚决地和经济主义派的自发论思想进行过斗争。由此可见,反对自发论思想,坚持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使他们的斗争具有高度自觉性,这是保证工人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帮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斗争中提高自觉性。因此,和胡风的谬论相反,一定要描写人民群众的自觉的斗争,也就是要描写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当然在这里也要避免简单化和公式主义,即以为每一个作品都一定要有政治委员出现才算是有了共产党领导,一定要使作品中的人物口中说出一大篇抽象的理论才叫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应该注意,文艺是用具体的形象来反映客观存在的,文艺反映工人阶级的自觉的斗争,不需要这种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作法。

3. 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学说的中心任务在于掌 握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给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即阶级分析的方法。有了这个科学方法,才使我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无限错综复杂的现象找到了正确研究的线索,列宁说:“一个社会中某

一部分人的趋向与另一部分人的趋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各种矛盾；……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仿佛迷乱混沌的状态中找出一种规律性。这种线索就是阶级斗争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几个社会内全体组成员趋向的综合拿来研究，才能对这些趋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趋向，是因为每一社会所分成的各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条件，都是各不相同的。”（《卡尔·马克思》）

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里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这些都说明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在方法上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使社会历史的研究提高到真正科学的地位，使我们能够从无限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找到它的发展的规律性。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历史科学方面许多人运用这个方法专门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获得了不少的成就。这样就粉碎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的不可置信的胡说：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是完全决定于人的主观的自由意志，没有任何客观的规律，并根据这个错误的理由，硬说社会历史的研究不能成为科学。这种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由后来的反动派分子和战犯张君勱等人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中传布开来的。它在旧中国一直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一种反动观点，直到新中国开始成立的时候，在许多知识分子中还有相当的影响。随着中国人民的胜利，这种反动观点也逐渐被清算了。

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正确性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革命的实践。在中国革命这样异常艰苦和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能够指导人民找到正确的道路,并且能够领导人民在各方面的斗争中战无不胜。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工人和农民自己本身具有伟大的力量,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共产党能够予以自觉的指导。没有科学的正确的指导,尽管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具有伟大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终归只是一种自发的潜在力量,它的战无不胜的性质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并不能够直接成为现实。只有共产党给与了科学以指导之后,这种可能性才成为现实性。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与科学的指导,从方法方面来说,主要地就是善于应用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分析矛盾的方法,具体应用于阶级社会历史的表现),来正确地了解情况,分清敌友,决定战略和策略,然后以此为基础,来正确地规定斗争的步骤计划和方法,这样就能够给群众的斗争指出明确的目的和道路,就能够克服人民群众自发运动的盲目性,使他们得到头脑清醒的指导,使他们的力量能够最大限度和最有效地发挥出来,使他们的战斗获得胜利。

只要看看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很容易了解这里所说的道理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了一个对于革命的战略策略指导上和革命的胜败具有首要意义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然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解决了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正确的斗争道路的问题。

如何应用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在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不能离开生产情况，并且是要以生产发展情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情况作为依据的。阶级不是抽象的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活动着的各种社会集团。所以，对于任何阶级的分析研究，都不能凭着一个死的公式来下结论，而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决定一个阶级在某个历史阶段中的活动趋向的根本条件，就是生产条件，就是这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同一个阶级，它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一定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它的一定的活动趋向。但是，由于生产发展过程的时期不同，同一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因此它在历史过程上就有不同的活动趋向，就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不同的作用。例如，同一个农民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面以及在工人阶级专政下面，它的活动情况和它的作用各有不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即使是剥削阶级，由于它所联系的生产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情况，由于这种生产关系有上升的时期和没落的时期，因此这个阶级也有它的进步时期和它的反动时期，它在某些情形下具有进步性，某些情形下又具有反动性。有一种主观主义的非历史观点，他们在自己头脑里设想了一个主观的死的公式，用“剥削制度都是不合理的”一句简单的话，否认剥削阶级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有任何积极的作用。这种错误的观点在前几年我们曾经批判过。要正确地具体地认识一个阶级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活动趋向和作用，一定要首先研究这个阶级在当时所联系的生产和发展情况，以及它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阶级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一个阶级所联系生产

的具体条件，决定着它的具体要求和行动趋向。依据有关的具体生产条件来确定一个阶级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或某一革命运动中的行动趋向，是可以获得象自然科学一样准确的结果的。

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这样分析的，特别是其中分析当时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以及小资产阶级三个阶层对革命的不同的态度，可以作为学习阶级分析的很好的典范。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毛泽东同志就是依据当前中国农民在生产中所处的具体情况，正确指出新中国农民就其本质方面来说是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这个在一年来的轰轰烈烈的实践中充分证明了的科学的估计，是我们学习上述阶级分析方法的一个最近的范例。

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无限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科学方法，但这科学方法的意义，只在于提供研究的基本线索，而不能作为排斥一切的一致的公式。在应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一定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自然必须依据各阶级的活动趋向来理解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性，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到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外的其他实际存在着的重要因素的影响。例如毛泽东同志对于过去中国革命战争的研究，除了首先明确指出这个战争的阶级性质之外，同时也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个地理条件。有时在一定的具体历史事变中，某些重要的偶然因素，也会起相当大的作用。马克思写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对于拿破仑第三的个人特点的作用，也加以认真的具体分析。所以，应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如果把一切事变都简单地仅仅用阶级的原因来解释，而对于实际存在的其他的历史因素根本不加考虑，这就要犯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

如果在一般社会历史研究方面应用阶级分析方法必须避免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那么在文艺工作上,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上就更应该注意这一点。在文艺工作上,应不应该注意阶级分析的方法呢?掌握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文艺工作有没有好处呢?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上来说,对这个问题应该给与肯定的答复。当然,如果人们不准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从事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工作,如果人们在文艺创作上不准备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那是另外一回事。否则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很必要的。问题是在于要避免上述的偏向,即不善于把阶级分析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线索,而只简单地把它作为排斥一切唯一的解决问题的公式。

在我们的报纸杂志上我们看到许多讨论古典文艺作品的文章,它们都企图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进行文艺批评的。我认为这种努力的总的方向是对的,这些文章中有的的确犯了简单化的毛病,例如把作品的价值片面地仅仅归结到某些阶级观点上,如人民性、爱国主义之类,忽视了构成文艺作品艺术价值的其他条件,因而就把任何一种多少有价值的作品都生硬地贴上人民性的标签。对于这样的倾向有人提出批评,我觉得也是对的。当然,一种在历史上早已证明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它所描写的人物、事件或情感在某些方面一定具有着为人民所共有的某些特征,忽视了这一点,也可能是片面的。

在这里顺便讲一讲我对于现实主义的看法。

文艺是社会存在的双重的反映,既反映作家的社会地位、阶级立场、阶级观点,又反映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的客观存在和阶级矛盾运动。前者对于后者是有一定联系的。由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不

同，对社会存在、对阶级矛盾运动的反映也就有所不同，或者是正确地反映，或者是歪曲地反映，或者全面，或者片面，或者以纯粹的空想代替现实。文艺史上存在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也存在着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反动的空想虚构之间的斗争。现实主义的文艺是趋向于力求正确反映社会存在和阶级的矛盾运动的。而革命的浪漫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以间接的形式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反现实主义的以及反动的纯粹空想和虚构的文艺是力图歪曲和掩蔽社会存在和阶级的矛盾运动的。我们赞成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文艺，同时赞成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和联合。我以为文艺史上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与哲学世界观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相适应的。现实主义并不就是唯物主义，但它们之间有着某种一致性。文艺不是用概念来反映现实，不能用哲学理论形式来表现唯物主义观点、即力求使主观正确反映客观的观点，它用具体的形象来体现这个观点。所以，说现实主义只是一种创作方法，和一定的世界观没有一致性，我认为是片面的看法。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致性，就在于它是要力求正确反映社会存在的矛盾或阶级矛盾运动的。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自然在理论上并不理解社会的阶级矛盾，更不知道阶级矛盾的分析方法。甚至于也常有在政治立场上是保守的，然而他们通过具体形象的概括，或多或少地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运动，反映了社会的前进趋向，能够这样做的旧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创作活动和他们的政治立场，就表现了矛盾，这个矛盾我以为不仅仅是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的矛盾，同时也是世界观本身的矛盾。他们的创作方法体现了进步的世界观，突破了他们的政

治立场上所体现的保守的世界观。世界观的矛盾，在过去的哲学家中间也常常存在过的，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他的辩证法核心的矛盾，也就是世界观的矛盾。社会意识是很复杂的现象，哲学家有世界观的矛盾，艺术家的世界观的矛盾，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的哲学家和艺术家多半是出身于和生长于剥削阶级环境的，他们的这种地位使他们在反映社会前进运动的时候还常常保留着保守的方面。

说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有着不同的情形。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它是一种创作方法，但也不能仅仅只看作一种创作方法，而应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文艺创作方法上的具体体现。我们不能直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创作方法，创作方法只能是用具体形象来概括和反映现实的方法。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该作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家用来观察事物的基本方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因此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不应该是矛盾的，而应该是一致的。作家如果有意识地应用阶级分析方法，他就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现实，更好地在创作里反映现实。当然，这种可能要变为现实，还需要通过具体的创作过程，通过复杂的艺术劳动。仅仅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世界观，并不就能成为很好的艺术家。我们不反对作家们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的方法来进行创作，也不否认一个作家即使不懂得阶级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能写出相当好的作品。但我们要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自觉的结合，新中国的作家有很多就是在这条路线上努力前进着，并且已经有了不少的成绩。在这里，让我们

举一段毛泽东同志的话来作结束：——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艺术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有什么作用？这是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里区别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根本问题之一。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个颠倒的观点出发，从社会历史的表面现象出发，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决定于历史上偶然出现的极少数具有特殊天赋的人物的创造活动。例如主观唯心主义者梁漱溟就认为“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天才之创造”。历史唯

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理，指出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历史，这就把握了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上述根本问题的明确有力的回答。我们今天就要对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说明。我们的说明分为三个小题：（1）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3）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领袖的作用。

1. 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某些表面事实上看，特别是就过去阶级社会历史的某些表面现象来看，唯心主义关于人物作用的观点似乎好象是对的，例如在封建社会里，广大人民群众通常好象都是处在平静的或者消极的状态里，而在历史舞台上积极活动的主要地只是一些帝、王、将、相，——统治者和征服者一流的人物，好象这些人物的活动就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向，而历史也就是这些人物的历史似的。过去的历史家，绝大多数都是按照这样的观点来写历史，因此就把这种观点巩固起来。但如果我们只要稍稍深远地来应用一下我们的思考力，就不难了解这样的观点是不能说明历史现实的。首先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人物的活动无论有着如何复杂的具体特殊性，其中总可以找到某些一定不移的趋向，这些趋向单用人物偶然出现的原因是得不到说明的。为什么过去中国几千年来翻来复去总是帝王将相在统治人民，而不会出现别的统治形式？为什么以前的中国不会偶然地出现这样一个杰出人物，由于他的决定作用，使

得中国在一千年前就有了议会制的国家形式？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要经过多次的“改朝换代”，而且至多每隔二百年总有一次“改朝换代”？为什么不会偶然出现一个杰出人物，由于他的决定作用使一个帝国朝代建立长久一些？为什么象孔子这样杰出的人物所理想的稳定不变的封建社会终归是幻想？为什么秦始皇帝这样的英雄所梦想的万世帝国只到二世就灭亡了？只要随便提出几个这一类有关历史的全面性的问题来思考思考，就可以看出，表面上好象只是少数统治人物任意活动的历史舞台中，实际上却存在着不是用少数杰出人物的力量可以说明的一定不移的秩序和规律。

中国过去时代也曾有过一些思想家，企图比较深刻地去考察历史发展的动力的问题，在这些人的思想中，人民的力量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已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例如许多写历史的人都把人物的成败归之于“民心”的得失。他们已多少猜测到人民的力量比任何杰出的人物的力量都更大得多。但是，由于过去历史家仍然是抱着唯心主义的观点的，他们就不能从这些猜测的看法做出它应有的结论来，也就是仍然不能认识到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相反地，他们常常把“民心”的得失这一件事反过来又归之于人物的是否英明，所以他们最后的结论还是杰出人物的个人活动决定历史发展的趋势，还是“英雄造时势”。这当然是颠倒的看法，因为较英明的人物之所以能成功，并不在于他们英明本身，而在于他的眼光使他善于去争取到“民心”，这恰恰证明决定的力量在人民而不在个人。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所以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可以从以下几点

来说明：（1）任何时候，社会的存在都必须依靠着种种物质生活资料来维持，而任何物质生活资料都是劳动群众生产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劳动，那不要说一年，只要几个星期，就会因饥饿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页）没有劳动人民在生产中的创造活动，社会就不能存在。（2）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情况，即他们的生产方式，规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在人物活动的表面现象背后，千万劳动人民每日每时地在使用着和改进着劳动工具，积累着劳动经验，提高着劳动技能，使社会生产力发展起来，并适应于这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产生了某一种社会形式的基础。一切政治、文化以及人物的活动的基本趋向，都是决定于这个基础。千万劳动人民的手所创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变，一切政治、文化以及人物活动的根本性质也就不会改变。在小生产农业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任何激烈的政治风云变化和任何杰出人物的活动也不能跳出封建的政治形式和封建的社会形式范围以外。就是在封建社会形式和封建政治形式的范围之内，多少激烈的变化，如象改朝换代这样的变化，也还是劳动人民积极斗争的结果。旧的朝代是由于它的腐朽专横引起了农民的广泛起义，才会垮台的。新的朝代的统治者，不过是利用了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登上王座。但是在改朝换代的变化中，由于劳动人民没有把自己的生产情况——生产方式加以根本的改变，所以朝代虽然改换了，社会和政治的面貌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在社会的革命的变革过程中，劳动人民力量的决定作用更显示得明白。革命是由于旧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地破坏了劳动人民正常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状态，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劳

动人民暴动的结果。奴隶暴动打垮了奴隶占有制社会，农民暴动打垮了封建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是依靠农民暴动的力量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否能够胜利以及胜利彻底与否，决定于是否有农民暴动的配合以及农民暴动的深入广泛程度。没有广大农民从下而上的起义行动，是中国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工人阶级领导了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就获得了彻底的胜利。革命运动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突破腐朽生产关系的运动，而劳动人民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所以革命运动在实质上就是劳动人民自己亲手打破那束缚自己发展的腐朽生产关系的斗争行动。

在过去阶级社会里，劳动人民虽然归根到底是创造历史的唯一的推动力，但由于生产条件的限制以及种种社会的原因（小生产的停滞性局限性，与小生产相联系的劳动人民的分散、无文化状态，统治者的残酷剥削等），劳动人民在一般的情形下很少以积极的姿态把自己的创造历史的作用直接表现出来，在表面的历史舞台上积极活动的是少数帝王将相一流的人物。在那种时代，尽管政治上象走马灯似的有许多人物的频繁的活动，社会的进步终究是非常缓慢的（除了劳动人民起来暴动的时候有比较多的变化之外）。列宁说：“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极少几个贵族和小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工农群众则尚在沉寐不醒的状态中，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是缓慢得可怕的。”（《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0页）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的变化发展非常迅速，和过去的时代完全不能比拟，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现代是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在这个革命运动里，各国劳动人民以工人阶级为首，积极地、自觉地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

争,发挥了它的战胜一切的力量,任何坚强的腐朽势力遇到这个力量都要迅速被摧毁。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一个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前,由于资产阶级不能依靠广大农民群众来进行斗争,几十年间都没有使革命运动得到真正的,即使是部分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不过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就获得了全国性的彻底胜利,并且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代。

社会主义革命,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首先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然后由工人阶级应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领导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来消灭剥削,消灭贫困,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些伟大的任务,如果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地自觉地行动起来,那是一步也不能实现的。几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能够比较顺利地迅速地得到实现,这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它一贯奉行的群众路线,就是由于它善于发动、组织和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共产党坚决地反对有些革命工作干部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这种人往往把自己看做创造时势的英雄,以为工作的成绩就是自己个人的功劳,遇事独断独行,忽视周围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有这样的观点的人,如不改造思想,在工作中总是一定要碰钉子的。

现在,还需要就人民这个概念的意义做一些说明。

人民群众的组成成分,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发展变更的。首先应该注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构成人民群众主体的生产者群众也不同(如奴隶、农民、工人阶级等),他们对于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奴隶和农民的暴动曾摧毁了奴隶占有

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但并没有成为在旧社会废墟上建立新社会的领导者，他们的革命斗争的结果，是由一种新的剥削制度来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出现的工人阶级，才不但领导农民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进一步建设了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次，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剥削阶级也有站在进步运动方面来反对反动势力的。如资产阶级就参加过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并且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经还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就可以算为历史进步运动中的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任何时候，剥削阶级都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力。资产阶级在他们革命的时期只是依靠了和利用了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力量才走到统治地位上，当他们一得到了统治地位，就反过来压迫工人和农民，从而转变成与人民敌对的势力了。剥削者只能在一定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暂时走进人民的行列中，只有生产者群众永远是人民的主体。第三，在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界，即全体公民，他们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共同一致地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而斗争。

在阶级社会里，只有进步的知识界，即为劳动群众和革命阶级服务和反对腐朽势力的知识界，才能算入创造历史的人民的行列。为反动派服务的知识界是反人民的。知识界担任着脑力劳动的任务，在科学、文化艺术方面进行了创造的活动，因而对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对于人民有所贡献。然而，进步的科学、文艺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创造的泉源，归根到底仍是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人民在自己的生产和阶级斗争中积累了与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的经验，获得了初步的、零散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创

造了初级的艺术作品和其他文化财富。而知识界在科学、艺术和文化方面的创造，归根到底不外是劳动人民所已经创造出来的那些初步的自然和社会知识以及文化艺术财富的总结，加工和提高的结果。自然科学归根到底是生产——广大人民与自然界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文艺以及其他进步文化领域在最后的根源上来说也不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成果。自然科学家、文艺家，以及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知识界中的人物，在知识和文化的创造上不是没有作用的，甚至于还可以说是有很重大的作用，但他们不能凭空地把知识和文化创造出来，他们必须依据劳动人民早已创造出来的素材，然后对这些素材进行专门的加工，才能够创造出系统的科学知识、高级的艺术作品和其他文化财富。在没有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以前，从事农业的劳动人民为了量地的需要，已经创造了许多零碎的几何知识，欧几里德把这些分散零碎的知识加以加工整理，才使它提高为一门有系统的数学科学。文艺的发展史证明，每一种新的划时代文艺创作的出现，不但内容是反映当代人民生活的，而且形式也是人民生活中已创造出来的文艺形式加工整理的结果。所以，只有善于从广大人民生活中吸收创造的泉源，善于综合（直接地或间接地）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的知识界，才能够在科学文化方面作出重大的贡献。只有善于从劳动人民群众中去寻找创造的泉源，才能在科学文化方面进行最有价值的创造的活动。新中国文艺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发掘了各地民间文艺潜力，使人民文艺运动出现不断蓬勃高涨的趋势，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生活，与人民所创造的初级的知识和文化泉源完全隔绝的知识界的人，要想在科学上、文化上有真正很高价值的创造，一般地说来，特别是就现在说来，总是不可能的。

2.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民群众是唯一的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并不因此就否认杰出人物个人的作用。相反地，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不但不应该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而且应该重视他们的作用，肯定他们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加速和延缓有着一定重大的影响。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唯心主义的“英雄造时势”的观点是有根本区别的。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不等于把他们的个人活动当做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终归是人民。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趋向，即所谓“时势”，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决定的，任何杰出人物的作用不能根本改变这个方向，即不能根本改变人民已造成的“时势”。杰出人物的作用，只在于能够对人民所创造的时势的发展进程给与一定的有力的影响。杰出人物的作用，决不是在人民群众之外的另外一种创造历史的个人作用，他们只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总过程中间作为一个有力的因素而起作用。一定历史时代所需要的杰出人物的存在，能够对于历史的前进运动给与有力的推动作用，加速它的发展过程，使人民创造历史的力量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反之如果缺乏这样的人物，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就要受到较多阻碍，历史的进程就要或多或少地延缓下来。所以，一个杰出人物的生存和死亡，对于历史的发展的根本趋势虽然没有决定的作用，但也决不是无关重要的。南宋时中国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金人的侵略，决定了金人终归不能完全征服中国，岳飞的存在使这反抗力量得到很大的发挥，他的死亡使这反抗力量受到很大削弱，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证。

杰出人物的作用，相当于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有很大的作用，但不是最后决定的作用，具有决定作用的东西是社会存在本身，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只能给予一定的影响，而这影响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又决定于社会意识如何反映社会存在。能够正确反映社会存在的发展要求（或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前进运动就能发挥积极的有力的推动作用，否则，社会意识如果不能反映社会存在的前进发展的要求，而是反映了腐朽势力的立场，它对于社会存在就不能发生积极的推动前进的作用，而只能给与阻碍的作用。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决不是偶然出现的，纯粹由自由意志所产生的思想和行动，而是反映着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社会存在的。杰出人物的作用，就决定于他们的思想行动反映社会存在的能力或认识“时势”的能力。我们说的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指那在思想上最能够认识他们所处时代的周围事变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以自己的行动，努力通过宣传的和组织的活动联合起一定的社会力量来推动事变发展的人们。中国的老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有一定的正确性的。这样的人物，对于历史发展的前进运动，就能给与有力的积极的影响。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杰出人物和他们的思想行动，也不能越出这个原理之外。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是他的时代的一定的阶级的儿子。他的思想行动并不是纯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时势”，而是从他的阶级立场上来反映那时势的。杰出人物之为杰出人物，并不是说他有超于社会之上和超于阶级之上的天生的特殊能力，而只是由于他能够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集中地表现了

他所代表的阶级的观点和要求。因此，他的反映社会存在的能力，他的认识“时势”的深度、广度以至于正确程度，都受到他的阶级立场的限制。他反映他所代表阶级的积极方面，也会反映后者的消极方面，甚至于也会反映后者所受到的其他阶级的影响。例如农民战争中的英雄（如《水浒传》中的英雄，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的领袖，太平天国的领袖等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集中反映了过去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强烈的革命要求，也反映了农民的小生产的局限性和散漫性，有时也还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给与农民的某些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作用，也就决定于这种反映的情况。农民战争的英雄能率领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使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受到严重的打击，但任何杰出的农民领袖也不能把农民组织成国家的统治者。如果他们的斗争不是失败了，而是终于得到了胜利，那么结局也只有两个：或者是胜利的果实为其他的阶级所取得，或者是虽然由他们自己来组织政权，而这个政权迟早又转化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在没有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中国的封建时代，农民暴动的结局都不外是这样的情形。任何杰出的农民战争领袖对于历史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能超出农民阶级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

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并从而受到一定阶级的限制。每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都只能是从这个时代的劳动人民中或这个时代其他的还能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中产生的，并且作为两者的阶级代表而出现的。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以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多少正确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活动趋向，才能反映人民所造成的“时势”的发展趋向，从而也才能够对

时势的发展给与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任何时代的杰出人物都是和一定的阶级势力相联系，从他的阶级的斗争中生长、锻炼出来。他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奇迹，而是由于劳动人民或一定的阶级势力的需要。杰出人物之所以为自己的阶级所需要，是由于他们是自己阶级中间最有斗争锻炼最富有经验的人物，是由于他们的丰富经验使他们最能够集中本阶级的思想和要求，他们比自己的阶级中其他的人都看得更远一些，在斗争中更坚决更勇敢些，他们能够为自己的阶级指出行动的方针、办法，使整个阶级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来对敌对势力的堡垒进行斗争，使阶级斗争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每一个阶级都需要自己的有能力的领袖。当一个进步阶级中间锻炼出来自己的杰出的领袖来，就要受到本阶级和进步群众的热烈的爱戴。

杰出人物既然是一定阶级的斗争中生长起来和锻炼出来的，因此，只要这个阶级是进步的或具有某些积极性的，只要它由于斗争而需要产生自己的领袖，那么这种杰出的领袖一定能产生出来，一定能够从本阶级千万人的斗争过程中涌现出来。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说明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是人民的需要创造自己的英雄。人民需要各种各样的英雄，人民有了某种需要，适应于这种需要的英雄一定会产生出来，如果曾经产生出来的一个杰出人物已经失去了，一定会再出现第二个人来代替他。这个历史必然性和个人出现的偶然性是结合的。某一个人恰恰成为这时代的杰出人物，是有偶然性的，这样的人为历史所需要而且一定要出现，是必然的。恩格斯说：“一个这样的伟人，恰恰就是他在这一定的时间和所与的国土里出现，这事自然是纯粹的偶然。但假如我们撇开了他，那就需要有代替的人，而这

代替的人就会被找到，不管是否顺利，他迟早总会被找到。拿破仑，恰恰是这个科西加人，他成了军事的独裁者，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法兰西共和国需要着他，这是偶然；但如果缺少了一个拿破仑时，一定会有人来顶替他的角色，那也是可以证明的，即只要有需要的话，这样的人就随时可以找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106页）

一般地说，杰出人物对于历史的积极作用，决定于两个主要条件，第一，决定这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反映时势，反映人民的要求，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正确程度。这反映的正确程度，是有阶级限制的，只有代表进步的或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阶级势力的人物，只有当他们的思想、意志和行动能够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能够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们才能够对历史的前进运动起推动的作用。否则，如果他们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一旦违反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如果他们由进步的阶级立场上转到反动的阶级立场上，那么，他们也就会由推动历史进步的人物变为反对历史进步的人物，那时，他们最多只能暂时对于历史的前进运动发生若干阻碍作用，但终于还是要一败涂地。第二，杰出人物的作用还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行动在人民群众中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和他从人民中所得到的支持的多少程度。人民群众究竟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任何杰出人物的作用，都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斗争，才能表现出来。杰出人物决不能依靠个人单枪匹马创造历史，而一定要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才能有所成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力量作后盾，任何个人都会一事无成。在过去的历史时代，曾出过许多杰出人物，他们受到阶级立场的限制（如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中的人物），不能成为人民的领袖，甚至于还要采取反对人民的行动，因

此他们虽然能够对于历史的进步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这影响也还是要通过劳动人民的力量才能表现出来），但那影响是很有限的，同时他们的阶级立场的某些消极方面，对于历史的进步又起了阻碍作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但为着巩固自己阶级的统治，对于战国时代文化上“百家争鸣”的盛况开始采取压制的措施，这又使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作用。过去也有些人物，虽然是劳动群众的领袖（如奴隶暴动和农民暴动的领袖），但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到他们所领导的劳动群众本身历史的发展不足的限制，他们对于历史的进步虽然有相当的推动作用，——如打垮奴隶制度，打击封建制度，甚至于在过去来说可算是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究竟还是很有限的。只有近代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他们站在最革命的阶级立场，创立与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经常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从来的任何杰出人物都远不能比拟的伟大作用，领导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开辟了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

在反动阶级中间，是不可能产生出对于历史发展起积极作用的真正杰出人物的。反动阶级也需要自己的领袖，他们中间也会锻炼出为他们所需要的某种富有反动的经验和决心的人物来指挥他们的共同行为。这些人，如象墨索里尼、希特勒之流，往往具有高度的骗子流氓的个人才能，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不但不能够反映，而且完全违背着历史发展规律，违背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违背着广大人民的要求和趋向，一句话，他们是在根本上不认识时势的。因此，他们虽然可以利用反动阶级所据有的各种有利条件——统治地位，物质财富，统治者所垄断的种种文化、宣传教

育工具所发挥的欺骗作用等等——，来反抗人民的前进运动，来暂时巩固反动派的统治地位，使历史发展进程多少延缓下来，因此这些人物暂时也可能在表面上显得好象是“一世之雄”的样子。但这种局面决不能撑持得很久，这类人物的“英雄”面貌很快就会被人民的力量所戳破，他们迟早要一败涂地，变为一个最可耻的小丑。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的下场就是这样的。所以，反动阶级中间决不可能出现真正杰出的历史人物，即使是曾经站在进步立场上表现了某些特出才能的人，一旦走向反动阶级方面，也会变为庸碌无能的。

杰出人物对于历史过程的作用的基本原理，适用于各种工作中的干部——包括文化和文艺工作干部。一个工作干部，如果把自己看做创造时势的英雄，以一种“非我莫属”的态度来看待自己所担任的工作，认为离了自己个人，工作就要垮台，这是完全错误的。有经验的优秀干部是革命工作中锻炼出来的，不是先有优秀的干部才有工作，而是先有工作，在工作斗争中逐渐创造出优秀干部。少了一个优秀干部，工作和斗争中仍然会涌出另外一个新的优秀干部来补充他的位置。所以，世界上决没有那种为某一种工作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唯一的优秀干部。但是，这并不是说，干部的选拔，对于工作没有重要意义；并不是说，随便什么干部，对于工作所能发生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工作干部的成熟程度是有差别的，富有经验的优秀干部比缺乏经验的干部在工作中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对于工作任务的完成更为有利。所以，为了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是非常地需要优秀干部的。正如一个历史时期的杰出人物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变过程能起重大的积极推动作用一样，一个工作部门的优秀干部的存在，对于这部门的工作任务的胜利

完成,在一定条件下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苏联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曾经先后提出过两个口号,在“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实现之后,接着就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为着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任务,首先需要进行工业中技术改进,在技术改进已准备到相当的程度,掌握技术的干部的存在与否,对于技术力量的发挥,就具有决定意义了。文艺工作的任务必须有优秀的文艺工作干部,才能完成得很好,这是大家都了解的。

要成为一个在革命工作中能够起重大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干部,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呢?主要地(不是全部)需要具备以下的条件:第一,正如真正杰出的人物只能是从进步的阶级势力和劳动人民中间产生出来一样,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革命工作干部,必须严格地注意自己的思想修养,经常在思想上行动上站稳革命阶级的立场,站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反对一切落后的以至于反动的思想的影响。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代表革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才不会在工作中发生动摇,才能够坚决贯彻革命工作所提出的方针、任务;例如文艺工作干部如果不注意思想意识的锻炼,如果不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如果相反地在自己的身上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滋长起来,如果他失去了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热情,在生活上和工作上陷入到追逐个人名利,甚至于腐化堕落的境地,那他也就会失去了饱满的创作精力,就会在文艺工作上失去积极推动前进的能力。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第二,正如一个杰出的人物必须认识时势,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趋向一样,要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工作干部,必须力求精通工作,也就是要正确地认识工作发展的规律,认识与工作

有关的各方面实际事物的变化情况和规律。作为一个干部，对于工作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愈更正确和清楚，他在工作中就愈更能够发挥主动作用，愈更能够胜任愉快地担当工作任务并使它顺利地实现。但是为着要能够精通工作，认识工作的发展规律和与工作有关的各方面实际事物的变化情况和规律，就必须注意第三个条件，那就是要善于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去取得认识和力量的泉源。要认识工作的规律和有关的周围事物的情况，个人的学习研究努力是不可缺少的，但仅仅依靠个人的学习研究是非常不够的。个人的观察研究，无论如何总难免带有片面性，只有集中多数群众的各方面的知识经验，才能够对于工作和事物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同时，要圆满实现一个工作任务，必须发动有关的群众并依靠他们的积极性来进行。就整个社会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就一个工作部门来说，与这一工作有关的各方面的群众是实现工作任务的主力，只靠少数干部的努力，要希望能真正实现某一项重大的工作任务，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依据多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指出一个革命工作干部要能够领导群众去很好地完成任务，必须在工作中善于联系群众，或善于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就是一方面要善于向群众学习，了解群众情况，倾听群众对于工作的意见，把群众的分散的意见和经验加以整理集中，使之变为有系统的领导方针，然后把这种从群众中总结出来的领导方针再向群众宣传，使之成为群众自己的行动方针，这样就能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来把工作任务彻底完成。正如杰出人物只是作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有力推动因素而起作用一样，一种工作任务的完成是要通过有关的群众的手来完成的，干部的作用只在于对

群众的创造行动给与正确的指导而已，而要能掌握正确的指导以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力量，就必须在领导工作中采取上述群众路线的方法，也叫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或“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方法。

3. 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领袖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这种创造作用，由于出现了现代的工人阶级而开辟了完全新的局面。过去劳动人民每日每时为社会创造物质的和文化的财富，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发展生产力，并由此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和整个社会面貌的改变，在社会腐朽势力阻碍着新社会的诞生的时候，劳动人民起来斗争，为新社会的产生扫清道路。但是，过去的劳动人民——奴隶和农民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的限制，由于他们的分散和文化落后的状态，始终没有能够成为新社会的自觉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他们不能用自己的斗争，在他们的劳动的基础上，来建立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他们只能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制度起来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自从世界上有了大工业的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以后，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就有了根本的改变。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大工业条件，在工人阶级面前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为着实现这个任务，工人阶级就要领导全体广大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来和旧社会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如果说，过去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采取不自觉的，多少消极的姿态来进行

的，他们在社会革命时期的积极的斗争行动也被其他的阶级所领导或利用，而斗争的胜利果实就落到剥削阶级的手里，自己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得到真正的解放，那么，在现代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面，劳动人民就以日愈自觉的充分积极的姿态进入创造历史的舞台。他们的斗争不仅仅是为着给新社会扫清道路和粉碎旧社会反动腐朽势力的阻碍，而且要追随着工人阶级积极起来建立消灭剥削、贫困以至于消灭一切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工人阶级领导劳动人民使他们脱离剥削阶级的影响，不让他们的劳动和斗争的果实再被剥削者所利用，不让剥削者再有机会能在劳动人民流血流汗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残酷统治，并借此来巩固剥削制度。相反地，工人阶级在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支持之下推翻了剥削阶级的政权之后，就要接着建立自己的政权，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彻底实现消灭剥削、消灭贫困以至于消灭一切阶级的任务，也就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所以，工人阶级的出现，使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使他们的这种作用由不自觉的行动变为自觉地彻底解放自己的斗争。一切社会的腐朽势力都不能不害怕劳动人民的这种自觉的行动，不能不用一切方法阻碍这种自觉行动的开展。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反动统治者就是这样的，而在人民已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获得胜利的国家，如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被打倒了的反动残余势力也仍然企图干这类的阴谋活动。

工人阶级的这种创造历史的新任务，是空前地艰巨，空前地复杂，而又是空前地远大。只要回想一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很容易明白，由中国共产党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开始到获得全国的胜利，在二十八年间，是经过了多少困难、复杂、曲

折的惊天动地的斗争，而在斗争获得全国胜利时，对于工人阶级的全部历史任务来说，还只能算是万里长征开始走出了第一步。自工人阶级掌握了中国的国家领导权以来，又经过了七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又经过了多么激烈的变化，克服了多少困难，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的工业和农业又获得了多么惊人的进步！然而，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来说，我们还只是在进行着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还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我们今天的成就虽然很大，但离开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还差得很远！工人阶级就是要领导广大人民来完成这样空前地艰巨、空前地复杂和空前地远大的创造历史的任务的，而工人阶级对于这样的任务的实现，是拥有着充分的决心和信心的。

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事业既然是空前地艰巨、复杂和远大，为了完成这样的事业，工人阶级就需要有自己的杰出的领导人物，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工人阶级需要能够在思想上行动上正确反映工人阶级的这些历史任务并且能够指导他们和一切人民共同来彻底实现这些任务的领袖人物。这样的人物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而锻炼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中的伟大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创造历史的作用和过去劳动群众有根本的不同，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和过去历史时期的杰出人物和劳动群众的领袖也有根本的不同。过去的杰出人物只是具有比普通人民多少更正确地观察和认识当前的“时势”发展的趋向的能力，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能以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只能在一个时期和在某些重大事件上能推动历史前进，他们认识社会的能力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情况对于杰出人物的要求也是很有限制的。有些人物是剥削阶级的代表者，他们和劳动群众是脱离的，他们常常走到与劳动人民对立的反动方面，这对于他们的历史上的前进作用给予了更大的限制。工人阶级的领袖在指导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时候不是仅仅依靠对于一般“时势”的大体上正确的观察和估计，而是依据系统的关于社会发展和生产发展的规律的科学知识。马克思和列宁就是这一个系统的社会科学的创造者和发展者的最大代表，只有掌握了这种系统的社会科学，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才能指导工人阶级实现他们创造历史的任务，因为这样的任务不是仅仅要在一个时期和在某些重大事件上推动历史前进，而是要在极长远的时期不断地实现无数地重大任务。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的科学知识，就不能正确地全面地反映这样远大的历史任务，就不能指导人民实现这样的任务。所以，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必须同时是最坚强最勇敢的革命者和具有深刻的观察力和细密的分析能力的科学家。比起过去历史时代的任何杰出人物来，他们不仅具有更大得无可比拟的作用，而且他们的作用的性质，也是有根本的不同的。

过去的杰出人物常常自命为“先知先觉”，把自己放在人民群众的头上，甚至于脱离群众。工人阶级的领袖却不同，工人阶级的领袖和人民群众必须自觉地、经常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决定力量，充分知道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他们就能细心地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到群众中去学习各方面的斗争经验。他们又知道，群众的意见、要求和经验，是分散的，不集中的，必须应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分析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把它们改造成为系统的指导

行动的方针、方案、办法、计划等，才能有效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斗争。工人阶级的领袖的任务，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把群众的这些意见、要求和经验等正确地集中起来，反过来又拿去指导群众，他们是群众的指导者，同时又是群众的学生，他们最善于向群众学习，因此才最善于教导群众，使群众的革命觉悟不断地提高起来。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如果在任何时候忘记了上述的原则（如象斯大林在他领导苏联的后半时期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那么他们也会要犯错误，会使工人阶级事业的进步遭到很大的阻碍和损失。

如果说过去的杰出人物一般地都是以个人领袖的姿态活动的，那么，工人阶级的领袖始终是作为集体的成员活动的。工人阶级首先是在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进行斗争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伍，也是工人阶级的集体的领袖。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中的最有觉悟的人们，它把最有威信，在群众中最有影响，最有斗争经验的人，选拔出来组织领导的核心，来主持党的领导工作。这些人就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马克思、列宁就是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最伟大最杰出的领袖人物。工人阶级领袖在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集体领导的方法，反对个人独断。因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是这样的远大、复杂和困难，要仅仅依靠少数的个人来对这个事业的各方面情况加以正确的反映和指导，是不可能的。任何少数个人，那怕是最杰出的人，如果只靠个人的力量来指导这样的事业，也难免要犯主观性和片面性的毛病。只有通过集体，通过整个工人阶级的党，才能保证使领导工作联系各方面的广大群众，才能够全面地反映无限复杂的工作和

斗争情况,才能掌握各方面工作和斗争发展趋向和规律性,并给与正确的指导。

工人阶级非常需要自己的杰出的领袖人物,衷心地热烈地拥戴自己杰出的领袖人物。因为这样的人物通过党的集体能够充分了解他们的要求和趋向,对他们的工作和斗争给予有力的指导,把他们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尽量地发挥出来,使他们的工作和斗争得到胜利,使他们能够比较顺利地用自己的力量去解放自己,没有这样的杰出的领袖,他们在工作 and 斗争中所遇到的困难就要大得多,并且往往要遭受很多可以避免的损失。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杰出领袖人物的热爱和拥戴是完全应该的。热爱和拥戴自己的领袖人物,不同于个人英雄崇拜。个人英雄崇拜是用迷信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杰出人物的作用,把这样的个人看做是在人民群众之上的天生的唯一创造历史的力量,把人民事业的命运看做是完全地决定于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个人英雄崇拜的观点把某一个人的思想看做是天生地正确的,好象他不需要倾听群众和集体的意见,好象他的头脑是天生地能够完全代替一切别人的思想,好象群众和集体对于他只应该一切唯命是听,而不应该对他提供任何自己的意见。个人英雄崇拜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统治下和小生产基础上所产生的腐朽思想的残余,这种思想和工人阶级的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观点完全是对立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如果不加以克服,那就会使领导脱离群众,不论对群众和对领导来说,都会发生极其有害的作用。对群众来说,这种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会使得群众中间失去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会滋长起等待杰出人物来解放自己的消极观点。就领导集体来说,这种思想的影响会产生个人独断的作用,会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使领导

思想发生片面性和主观性的毛病,破坏正确的领导。所以,对于负担着最伟大的改造世界任务的工人阶级来说,这种思想是有着非常危险的破坏性的,为着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凡是有这种思想影响的地方,必须坚决地起来克服它。

(一九五六年八月)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的一些意见

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想通过百家争鸣、自由争辩的方式来解决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向问题。会上提出的具体问题是很多的，在我的短短发言中要把所有的具体问题都一一谈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想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发表些个人的意见。这问题就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总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会同意，研究中国哲学史，也必须象研究中国其他问题一样，应该遵照毛主席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能把丰富多采的我国哲学特点鲜明的表述出来，另一方面在表现我国哲学特点的同时又不能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在许多人的发言中都表示承认，至少在主观上都愿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去研究、整理中国哲学史。但在工作中如何正确的贯彻这一原则就不是那样容易的了。这里，往往发生两种偏向：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简单化，教条主义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演绎出中国哲学史，用抽象的公式硬套；二、过分的夸大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忘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前者的错误，其结果就是不能充分的表述出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后者的错误则是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我想就中国哲学史的继承性问题来谈谈我的意见。

怎样了解哲学史的继承性问题?我想大家可以把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说到文化遗产的继承性的观点作为参考。他指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过去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取其精华,除其糟粕。什么是精华?精华就是过去遗产中有民主性、科学性与大众性(人民性)的东西。什么是糟粕?糟粕是那些反民主的、反科学与反人民(贵族性)的东西。我们要建立的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性的文化,因此我们所要继承的就是旧文化中那些有民主性、科学性与大众性的东西,而要抛弃那些反民主、反科学、反人民的东西,这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所有文化遗产的一般态度。这是一个普遍原理,对待中国哲学史也需要注意这个原理。

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关于继承中国哲学遗产问题的意见是违背这个原理的。照他的看法我们要继承的是过去哲学的各项命题中的一般意义,抽象意义,好象只有命题的这一方面才是精华,而过去哲学命题中的特殊意义、具体意义则是糟粕,我们如把精华与糟粕作这样的规定是错误的。这错误就在于他把抽象的东西看做具有实在性的、永久性的东西,而具体的东西则是暂时的、不实在的东西。如果有人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意见,说真正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只是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东西,并且用这个意见和冯先生争论起来,那么这样的争论就恰恰和西欧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很相象,而冯先生的意见倒是和实在论的唯心主义观点一致的了。因此有人指出冯先生今天还没有完全摆脱他往日“新理学”时期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我看是有道理的。

所以,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问题,我们不能同意冯先生的主

张。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所说的那些原则，正确地分清精华与糟粕，分清什么应该肯定和继承，什么应该加以否定和抛弃。就一般的文化问题来说，我们要肯定的是有民主性、科学性与大众性的东西，而不是冯先生所说的具有一般性与抽象性的东西；我们要否定的是反民主、非科学、反大众化的东西，也不是冯先生所说的什么特殊的具体的东西。精华与糟粕之分有一个标准：就是毛主席提出的那个标准，而不是以抽象性和具体性的区别作为标准。

现在更具体地就对待哲学遗产的问题来说一说。我们继承哲学遗产是有自己的立场的，这就是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唯物主义指明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萌芽、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全部哲学发展的总的趋向，我们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来看待继承问题。不论是对过去的唯心论，还是唯物论都必须这样看待。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在过去全部哲学遗产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就是其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我们所要否定的就是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凡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不论他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只要在他的思想中有些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因素，那就和辩证唯物主义具有继承关系，而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面，就是我们要通过批判加以抛弃的。例如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而否定了他的唯心论。他从费尔巴哈那里吸取来的是唯物主义而抛弃了其形而上学与宗教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

如果象冯先生所说凡是哲学命题的一般的意义都可以继承了，这是不对的。并且，我们应该注意到，凡是哲学的命题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最一般的命题，都是对世界的一切具体事物的最高概括，如果从这方面来看，那么照冯先生的标准来说，任何哲

学命题都可以加以肯定和继承了，其结果就会完全抹煞和掩盖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为了说明我在上面所说的观点，我想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

就用冯先生所谈到过的“学而时习之”这句话来说吧，冯先生认为这句话有可以继承的东西，我也同意这句话有可以肯定的东西。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具有抽象意义，而是因为它具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因素。因为它指明人的认识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不是直接由人的头脑里凭空自生的，也不是由神的启示或对于宇宙精神的神秘的直觉产生的，这个命题的意义和孔子的另一个命题——“生而知之”的命题正相反对。很明显，我们应该肯定“学而时习之”的命题，否定“生而知之”的命题。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并不是由于前者的抽象意义和后者的具体意义，而是由于前者具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因素，后者是一个纯粹唯心主义的命题。

我们还应该注意：抽象和具体是不能够机械分开的，一个命题的抽象的一般的意义如果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它的具体应用或具体意义，以某一方面来说，也是值得肯定的。冯先生说孔子的“学而时习之”的命题的具体意义是要人学习封建道德，所以我们不能加以继承。当然，我们是反对封建道德的，因此也不会同意孔子所说的学习的内容，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对于“学而时习之”这个命题的具体意义要加以否定，但是，如果我们是从哲学上，从认识论方面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又应该肯定，即使是封建道德的知识，也要通过学习的过程才能够获得的。“生而知之”封建伦理学家是任何时代也不存在的。所以，由于“学习”这个认识论的范畴在一般的、“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所以它的具体应用任何时候也是正确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固然要通过学习，封建道德也同样要通过学习。冯先生的提法把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和具体意义机械地加以分割，这是违反辩证法原则的。

所以我们对于哲学遗产的肯定与继承的标准，并不在于命题的抽象与具体之分，而是要看它的内容是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待过去的哲学家，不论他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只要在他们的思想中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即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因素，我们都对他们的思想的这个方面采取肯定的态度，但对于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面则一定要坚决地加以否定。这就是批判地继承过去哲学遗产的基本原则。

不过这里应提到一点：我们对唯物主义者的批判继承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继承是有区别的，不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我们首先是继承了过去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的传统，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对于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某个认识的合理因素批判地加以肯定。我们认为过去唯物主义哲学，尽管有它的幼稚的（古代）或片面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毛病，它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唯心主义哲学，不管它的形式多么精巧，内容多么丰富（如黑格尔哲学），但它对于世界的理解，根本上是颠倒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任何时候也不能加以抹煞，对于唯心主义哲学的任何合理的内容，都必须首先对它的颠倒的理解加以批判之后，才能说得到继承、改造和发展。

（一九五七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

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

前 言

这个提纲，是在去年从事辩证唯物主义的讲课过程中陆续写成的。为着供给全国各地哲学教学工作急迫的参考需要，把这个不成熟的初稿付印了。它在事实上是一个提纲性质的简单讲稿，内容着重扼要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在必要的地方引用少数实例来帮助说明原理。哲学教学工作要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随时充实新的具体实际内容，在使用这个提纲的时候，应该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的政策，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斗争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国内国际的各项新的问题，科学界的重要成就，学习哲学的人们的思想和工作情况，等等，进行必要的研究，结合着这样的研究来讲述和领会辩证唯物主义的各项基本原理。因此，希望使用这个提纲的同志们只把这个提纲作为工作上和学习上的参考，创造性地应用自己的思

-
- * 艾思奇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56年写成，1957年1月付印，5月又重印。收入本书时，我们以这个版本为基础，并参照了1959年5月修改定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的版本。凡1959年改本中，在文字、观点和联系实际的材料上，修改、增补得较好的地方，已尽可能吸收进来。

想,不要使自己的思想受提纲的束缚。

学习哲学的目的不是要死记住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为着要解决世界观问题和认识方法、思想方法问题,是为着要做到真正领会辩证唯物主义的各项原理,善于应用这些原理来作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科学研究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武器,使我们对各种实际问题和科学问题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掌握正确的认识方法或思想方法既是学习哲学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可以说,认识的问题,就是哲学的中心问题。我们学习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地就是要在思想上明确地、深刻地解决这样的两个大问题:(1)什么是正确的认识?(2)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即要通过什么道路和采用什么方法,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辩证唯物主义在回答哲学的最基本问题——物质和精神或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精神、意识是物质、存在的反映;正确的认识,就是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客观存在的正确的反映。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努力使我们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情况求得一致。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的研究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前半部分,即通过什么道路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的问题:认识必须自始至终以实践为基础,通过实践,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这就是保证我们不断地能够获得对于事物的认识的正确道路。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的研究，回答了用什么方法获得正确的认识的问题。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它指明世界一切事物都是充满矛盾的运动过程，都在自己内部包含着互相对立的方面，并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和相互联系而向前发展。因此，对一切问题的正确的认识方法，把分散无系统的感性认识提高到有系统的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科学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分析矛盾的方法，这个方法的主要点，就是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

这些，就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认识方法问题。这个提纲的结构形式，也就是按照这些问题的提出的基本顺序安排的，请读者加以注意。

研究哲学的主要任务既然是在于解决认识方法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提纲里，我们有意识地在说明每一项原理的时候都特别着重地指出它在认识方法上的意义。通常我们讲哲学原理的时候，都要提到它的实际意义。应该说，所谓哲学原理的实际意义，就是它的作为认识方法的意义，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各项原理必须作为方法来加以掌握，然后它才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发挥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作用，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任务。希望使用这个提纲的同志，也特别注意到每一项原理的方法方面的意义，并着重从方法方面来联系实际，联系当前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联系党的政策、党的历史经验、个人的工作和思想，等等。这就是说，主要不是任意举些例子来说明原理，而是要把原理当做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我们工作中和思想中存在着的各种实际问题。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根本的原则。列

宁说唯物辩证法不是实例的总和,而是认识的方法,也正是指这样的意思。

已经说过,这个提纲是不成熟的初稿,其中有些原理和方法的阐述可能都是不深不透的,也可能还有许多错误,希望各地作哲学教学工作的同志以及研究哲学的同志们给予指正。

作者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

重 印 说 明

趁这次印刷的机会,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上作了一点补充,另在几处地方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这是应该声明的。还应该声明,这个提纲只是帮助教学之用的辅助参考读物,而不是研究哲学的主要教材。我们主张研究哲学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主要教材,如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等等(当然,经典著作的选择应该依学习者的文化程度而有所增减),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著作作为主要教材,其中至少要包括《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此外,《人民日报》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决议、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等,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实际应用和具体发挥的范例,也应该作为学习哲学的正式教材。望读者

注意。

作者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第一章 哲学是什么？哲学的根本问题。为什么要研究哲学？

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世界观对于人的认识又具有着方法论的作用。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对于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观点，就这样的意义来说，哲学又可以说是研究世界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道理的学问。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最根本的观点，明白了这个哲学上的最根本的道理，在观察任何问题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方法上的总的向导，就掌握了一种认识事物的最根本的方法原理。这就是它的方法论的作用。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的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方法论，不同的哲学思想。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一般地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正确的世界观，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则是错误的。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最正确的革命的世界观，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工人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他们的最锐利的思想方法的武器。我们研究哲学的任务，归根到底就在于要学会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在于要能在斗争中、工作中、生产中应用这个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最根本的方法原理，也就是在于要正确地解决思想方法的问题。工人、农民、共产党员以及一切愿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人

们，都应该研究哲学，都应该学习掌握正确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因为如果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就会使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以及科学研究工作中善于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使我们善于总结斗争经验，善于从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中找出原因和教训，使我们有可能避免犯重大的原则性的错误，或善于及时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从而也就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顺利前进。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在“学风”方面使全党广大干部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了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由此大大提高一步，因而就能够把以前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几次路线错误加以纠正，使以后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等革命事业顺利地迅速地获得胜利，这就是一个明证。

哲学既然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因此它所研究和所涉及到的问题，就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普遍的问题。举例来说，如象下面这些问题就是哲学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从来就是物质的世界或者在物质世界之前还有某种精神力量最先存在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不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是处在运动变化发展状态中，那末它们是怎样运动、怎样变化和发展的？人们的主观意识、精神生活和客观世界、和他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有什么关系？人的意识是人的主观精神世界里自己凭空自生出来的，或者它只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只是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人们的意识能否正确认识世界以及如何认识世界，要采

取怎样的立场和方法才能正确认识世界，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给予系统的回答，是哲学研究的任务。

人们的世界观是怎样产生的？世界观是人们对自然斗争和人们的社会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最高的总结，是人们在这些实践中所获得的各种事物知识的高度概括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因此，哲学所研究的那些最普遍的问题，并不是研究哲学的人凭空地任意提出来的，而是从人们的一切社会实践中，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中通过概括而提出来的。哲学中的那些普遍的问题，也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中存在着的最普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客观世界里实际存在着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具体的事物。一切具体的事物都各自有其自己独自的特点，同时又包含着某些与其他事物所共有普遍的本质。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接触到各种具体的事物，并认识到它们自己独自的特点，同时人们的认识又能够不断地从许多具体的事物中去概括出它们的某些普遍的意义，或者从某些具体的典型事物中概括出能够适用于一切同类事物的普遍的本质和规律性。这种概括的作用，就是人们对于自己在实践中和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知识的普遍化。如果我们从自己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中所概括出来的本质和规律性，是具有最普遍的东西，——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普遍化了的认识，就具有着世界观的意义，也就是具有了哲学观点的性质。而哲学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知识进行最普遍的概括时所提出来的问题。例如，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

有三大发现——能量转化定律，细胞学，进化论——使我们对于自然事物的三个方面获得了重要的具体的科学规律知识。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些知识中概括出其中的最普遍的意义；即这些发现证明，一切自然界事物都处在联系和发展的状态中。这样的概括就是哲学的概括，这里所概括出来的原理就有世界观的意义。又例如，中国人民百多年来不断地和各种敌人进行斗争：清皇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英、法、美帝国主义等等，从这些斗争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不同的敌人的不同特点，我们对他们的斗争方法，也各有不同的特点，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些斗争中，概括出一个普遍的原则：这全部的历史，主要就是中国人民和各种敌人斗争的历史，它自始至终，贯串着这些敌我之间的矛盾。同时我们又看到，人民中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问题上，也经常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经常需要把这些争论加以展开和解决，努力求得自己内部团结一致，才能够共同对敌，才能够取得胜利。这些不同的意见虽然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概括起来，不外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中间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是不断解决又不断出现的。这样，我们从自己的长期的历史斗争中，就可以概括出来这样一个最普遍的规律和本质的认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两种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方法来解决。这些原理带有最普遍的性质，因此就是哲学的原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第一次深刻地全面地概括了我们的历史实践和阐述了这些哲学原理的伟大著作。再例如，在某一地方做工作的人，他们在工作中凭着自己的主观要求，提出了客观情况所不容许的过高的计划，结果这样的计划不但不能实现，而且

造成了一些损失。当他们在最后来总结这一项实践经验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要具体地检查那计划在什么地方不符合于客观情况，也就是要对于错误和缺点的独自的特点取得一些具体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要把认识提得更高一些，他们就应该从这一个错误和缺点中间找出一些最普遍的意义来。他们就应该获得这样的认识：这些错误和缺点之所以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周围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不一致。他们应该了解到：我们周围存在的客观事物是不依赖我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所以凡事都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主观的要求和意志放在第一位，也就是不能够单凭自己的意志想怎样办就怎样办。单凭自己的意志去做工作，是一定会失败的。要想在工作中不至于失败，那么，在制定主观方面的工作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放在第一位，而不要把主观的要求和意志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要首先认清客观的情况，客观的条件，然后依据这些情况和条件来制定主观的计划，才有可能制定出不至于错误或错误很小的计划。这样一来，他们在工作的总结中就概括出来一条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原则：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东西，人的主观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哲学世界观原则，而且是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

前面说过，有各种不同的以至于互相对立的哲学观点或世界观，除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之外，还有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哲学观点，都可以归结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之内。全部人类的哲学思想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立和斗争的历史。为什么人们的世界观会有这种对立的情形呢？这主要地应该归于人们地位的不同。过去的

哲学历史主要是在阶级社会里发展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分裂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这些不同的阶级是站在不同的实践地位上来认识世界的。就是在消灭阶级以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在实践中，首先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永远有着先进者与落后者的区别，先进者和落后者在事物的认识上，就处于不同的地位。此外，生产发展的不同水平，生产规模的大小，也是影响人们的认识能力和产生不同的世界观的社会实践因素之一。总之，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所处的不同的实践地位，对于他们的认识是有决定的影响的。它限制着他们的认识的深度、广度以至于正确程度。它使他们从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角度上来概括他们对事物的认识，使他们获得不同的以至于相反的世界观。例如，原始公社的人，由于生产的极不发展、由于对事物的知识极端贫乏和公社生活的许多保守的性质，把世界的一切事物看做是受神灵的意志支配的，把人的肉体看做是由灵魂支配的，也就是，把神灵的意志和灵魂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把世界的其他一切事物看做第二性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带有唯心主义萌芽因素的原始的宗教世界观。在阶级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力求要使它所统治的社会制度长久巩固下去，这样的实践地位使它把自己的意志、希望，自己的社会理想和道德原则看做是支配一切事物的“天经地义”。这样，就产生了他们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即把某些主观的精神的原理原则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而把客观世界的事物看做第二性的东西。在一个新的社会里，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由于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常常要违背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向新社会制度拚命进行反抗。剥削阶级是企图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反对历史的客观规律，也就是把自己的主观意识摆在第一位，因

此他们的世界观也就有了唯心主义的性质。又如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来观察事物的人,由于他们的生产规模的狭小,又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不稳定,使他们的眼界也比较狭小,观察事物的时候容易犯表面性片面性的毛病,容易“左”右摇摆,也就是容易在行动中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主观主义就是把人的主观意识摆在第一的地位上,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在人们的实际行动中的表现。应该说,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就他们的世界观来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错误根源之一,就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思想方法的反映。一般地说,在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处于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地位上的人们,他们不能满足于现状,他们需要改变自然和改变社会。要改变自然,就首先要通过生产的实践,通过科学的研究,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要改变社会,就得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认识当前社会的客观情况。否则,不论改变自然或改变社会的斗争都不可能得到胜利。这样的地位使他们或迟或早不能不从他们的认识中概括出唯物主义的真理,肯定人们要获得正确的认识,要想在斗争中获得胜利,必须使自己的认识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这也就是要肯定:客观存在的事物是第一性的东西,而人的主观认识则是第二性的东西。

所以,哲学的世界观和人们对于世界的一切认识一样,不是从聪明人的头脑里凭空产生的,而是从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中产生的。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的世界观也就会有所不同。历史上存在着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两大哲学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反映着互相对立的人们的实践地位;在阶级的社会里,反映着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的利益的对立和斗

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社会实践过程中永远存在着进步与落后，新与旧的不同倾向的斗争，因此也还会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倾向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思想的根本方向，是决定于它所从属的阶级的根本政治利益，并且直接地或间接地为这个阶级的根本政治利益服务的。所以，哲学中的一定的派别倾向的贯彻，是它所属的阶级的政策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情形，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的哲学家来说，常常是不自觉的，或者是虽然多少自觉到了，但由于它的阶级利益的关系，力求要加以掩盖的。例如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需要唯心主义来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他们在思想政策上，就要极力散布唯心主义哲学，压制唯物主义的宣传。旧中国的统治者在大学里，是不允许唯物主义的课程正式讲授的，只有胡适一流的唯心主义者，才能在那些课堂上自由地讲授他们的哲学思想，因此不管这些唯心主义者自己是自觉到或不自觉到，他们在实践上正是执行了这个反动阶级的反动思想政策的代表。无产阶级在思想政策上走着和资产阶级根本相反的路线，他们要自觉地公开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和广大人民群众们的哲学武器，他们指出人民在自己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如果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有犯错误的危险，因此一定要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我们新中国目前在科学研究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方针是“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允许各派学术思想自由地争论和宣传。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因为只有通过学术上的自由辩论，才能使科学的客观真理得到充分的阐明，才能避免学术上的片面武断和教条主义。所以，这样的方针，正是有效地贯彻唯物主义和克服唯心主义的一个正确方针。

历史上有过多种多样的哲学思想,在这许多哲学思想中,要怎样才能辨别哪些是属于唯物主义,哪些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辨别的方法,就是要看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回答哲学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物质与精神(或存在与意识,客观与主观)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这一个问题哲学的根本问题呢?因为人们在实践的时候和认识世界的时候,首先是,而且任何时候始终都是以自己的精神、意识和主观来同整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相对立着的。这是在人们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存在着的最普遍、最根本的矛盾,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过程就是意识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不断地产生和不断地解决的过程。因此当人们依据自己的一切知识去作哲学上的总结的时候,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首先就不能不回答的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物质(存在、客观)和精神(意识、主观)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的问题。由于这里所涉及到的只是两个东西的关系问题,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也只能有两个互相反对的回答:或者是把物质(存在、客观)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或者是把精神(意识、主观)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这两个相反的回答,就决定了哲学思想上的两条根本相反的路线:或者是唯物主义的路线,或者是唯心主义的路线。一切唯物主义的哲学派别,不管它们的具体形态有何不同,在回答这个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观点,即是把物质(客观、存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把精神(主观、意识)看做第二性的东西,指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存在于精神之先,精神(主观、意识)只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只是某种物质的特殊的属性,这种属性的特点就在于,它本身只是物质(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作

用；而人的认识，就是客观外界世界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反映。和这些观点相反，一切唯心主义，不管它们的具体形态如何不同，在回答上述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时候，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思想方向，即是把精神（主观、意识）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把物质（客观、存在）看做第二性的东西，认为精神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根源，物质（自然界及社会的客观存在）只是精神的附属物，或精神发展过程的某种表现形态。世界在本质上是精神的，它或者是人们的各种感觉的综合，或者是人们的理性、意志、欲望等等的精神过程的表现。物质、自然，只是这一切精神原素所构成的幻想，或只是后者的表面的外壳。人的认识不是客观外界世界的反映，而只是人的精神、主观内部凭空自生的东西，或只是所谓世界理性、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等等。哲学史上的一切哲学派别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他们对于哲学上的这个最根本问题的回答只能有上述两个，所以一切哲学派别都可以从根本上划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营垒之内。虽然历史上也还有二元论的派别，企图把物质和精神看做两种互相平行的世界本质，不加以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区别。但二元论在实际上只是摇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倾向，并不是真正独立的第三种派别，因为在各项比较具体的问题上，二元论总是有时把物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有时又把精神看做第一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能够真正把物质和精神看做完全平行的两种世界的本质。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哲学？我们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正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各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的影响，使我们能够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服务，为在我国国内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

剥削和贫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服务,为争取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服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明确地肯定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公开地声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改造世界的哲学武器,公开地声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党性是在于对一切唯心主义倾向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能够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治目的服务,也就是要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不能做到或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就是在哲学上缺乏党性或党性不够。

要了解上述研究哲学的目的,必须对哲学的性质作进一步的研究。

前面说过,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同时,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思想,对于人们的认识又具有方法论或认识的根本方法的作用。这就是说,哲学不仅仅是人们从各种事物的知识中抽引出来的最普遍的概括和总结,同时它又能够反过来对于人们的一切认识活动发挥指导方向的作用。一个革命工作者在实践中间遭受了挫折以后,他如果能够把经验总结到哲学思想的高度,能够认识到他之所以遭受挫折是由于自己只凭着主观愿望来进行工作,而不首先看清楚周围事物的客观情况,是由于在认识上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也就是由于犯了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的毛病。如果他能够由此取得深刻的教训,真正体会到一切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东西,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真正体会到了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原理,那末以后他在实际工作中观察和解决任何问题的時候,就能够自觉地把这个世界观的原理作为总的思想

指导，就能够随时注意到，不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研究出发，而不要从自己的主观的愿望出发。也就是，在不论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细心谨慎地对周围的情况作一番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再决定自己主观的计划。这样他就在思想方法上掌握到了正确的方向，或者说掌握到了一个正确的根本方法，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就可以少犯错误，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受到了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人的主观意识或什么世界理性的表现，这样他在观察和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会以为只要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或者从某种现成的思想原则出发，就可以直接解决任何问题，不必首先对周围的客观事物进行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样一来，他就在根本上使用了一种错误的方法，即主观主义方法。所以，唯心主义世界观，就是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的理论基础，而主观主义则是唯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

根据上面所说，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学习哲学的目的，是在于要正确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克服唯心主义的影响，以便我们能够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来为我们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之所以有必要和必须抱着这样的目的来研究哲学，主要地就是由于哲学思想在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具有的上述方法论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引导我们走向科学的认识方法的道路，使我们注意到要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和认识我们周围实际存在着的客观事物的具体情况和规律性，使我们有可能依据这些认识来为我们的工作和斗争规定出适合于周围情况的正确方针、方案、计划、办法、战略、策略等，因而就能够帮助我们的事业容易获得胜利。唯心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助长人们走向主

观主义的反科学的方向，它用理论来支持那些只凭主观的意志或现成的思想公式来解决一切问题，而对于周围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熟视无睹的态度。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不坚决克服唯心主义的影响，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作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指导原理，我们在行动中就不能避免主观盲目性，就不能为我们的工作和斗争规定出适合于周围情况的正确的方针、方案、计划、办法、战略、策略等等，就使我们的工作容易遭受失败。所以，如果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让唯心主义扩大影响，对于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的人民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不利的。相反地，对于反对革命阻碍进步的反动势力却是有利的。一切空想、幻想、妄想，和各种迷信思想一样，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基础上的，都是危险的，都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根本不能相容的。毛泽东同志论到主观主义（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危险性时，曾经用非常尖锐而明确的语调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改造我们的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通过哲学的学习来正确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原因。

我们有许多同志对于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不能够理解，其中有的人认为哲学只是一些哲学专家所从事的纯理论的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是没有关系的。这种错误思想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了理论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还不懂得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长期历史经验，还没有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什么，还没有真正领会党的各种政策

决议的精神实质，还没有真正学懂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们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理论和策略，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如果不学习哲学，不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想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并善于把它应用于实际工作，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各种政策决议，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不管是理论方面的或者是实际政策方面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表现。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经验证明，在一个时期，由于党的领导者不能够正确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在思想方法方面走上了主观主义的道路（其中包括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五年以前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的实际工作中造成重大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的损失。党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批判了主观主义的领导以后，就不断地在干部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开展了整风运动，在党的干部中大规模地反对了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使干部们受到了一次最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革命就迅速地获得胜利。这个历史经验充分证明，那些把哲学看做是和实际工作没有关系的人，他们的看法是不对的。

还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承认哲学的重要性，承认哲学的研究和实际工作有关系，但认为这只是对于高级的领导者决策的时候才是必要的，至于一般的实际工作者，一般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工农群众就不一定有研究哲学的必要。他们以为在一般的实际工作中，在一般的掌握政策执行政策的干部中，在工农群众中，是不会

有在思想上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的问题的。他们只要简单地跟着党的指示去做工作就够了。他们不知道，事实本身的情况和他们所想的并不一样。在思想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不但对于高级领导者决策的时候是非常必要的，在一般的实际工作中，在一般的掌握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干部中，在工农群众中，也有必要在实际工作中，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贯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即主观主义）的斗争。

历史证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它的政策路线都力图严格地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制定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干部，只要努力遵循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遵循着党的政策路线去工作，就可以做出一定的成绩来。但是，如果我们的干部不学哲学，不了解辩证唯物主义，那末，一定不可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并且也不可能保证不犯重大的错误。因为，如果他不了解辩证唯物主义，他就不了解我们党所用以领导工作和制定政策的根本方法，也就不可能深刻领会党的指示和政策的意义。在一切具体工作岗位上，周围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要贯彻党的指示和政策，需要善于依据一定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步骤、办法和计划来进行工作，这也需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知道任何干部要做好工作，必须“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而“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这个原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能够遵守这个原则做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好，否则就不可能做好，或者反而要做坏。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干部都必须学习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理由。

有两种不同的工作干部，和两种相反的工作方法：一种是，他们在执行任何政策的时候，总是细心谨慎地首先对周围的客观存

在实际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力求对于各方面情况获得正确的全面的了解，然后依据这样的了解，规定出最适当的执行党的政策的步骤、办法和计划。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干部的工作方法是正确的，就其思想活动的根本实质来说，正是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路线的，因为他在实际工作中，在行动中是把周围的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当做第一性的东西来看待，而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对于周围情况的认识，执行政策的步骤、办法、计划等等——摆在第二性的地位上。他们的这种工作方法能够使他们的主观认识比较经常符合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真实情况，所以就能够正确地执行政策，能够保证工作的胜利。另一种干部的工作方法却和这相反。他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不是首先对周围的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以求得情况的正确了解，然后再依此规定执行政策的适当的方针、步骤、办法和计划。相反地，他们常常以为只要有了一般的政策方针，而不必去注意周围的实际情况，就可能解决一切具体工作问题，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种种主观的想法，自己的主观兴趣和意志，凭着书本上断章取义地引用的词句，或者个人的狭隘经验，或者只凭着一些根据周围事物中的片面的、表面的材料所作出的主观臆断，来任意规定工作的方针、步骤、办法和计划。我们知道，这样的干部的工作方法是不正确的，是会常常在实际工作中陷于错误，把好事办成坏事，并使党的政策遭受破坏的。然而，这样的工作方法，就其思想的根本实质来说，正是在实际工作中走上了唯心主义的路线，正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是错误地把自己的主观意识摆在第一性的地位上，而把周围的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看做第二性的东西。他们的这种方法使自己的主观意识不是正确地符合于客观存在，而是相反地使主观和

客观分裂。因此他们就不能够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就不能保证工作的胜利。

由此可见，在从事实际工作的一切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不管他们自己是否自觉到，都存在着世界观方面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问题，存在着必须在思想方法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和反对唯心主义路线——主观主义——的问题。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路线，赞成前一种干部的工作方法，因为循着这条路线，就能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周围事物的真实情况，保证我们在一切实际工作中不至于发生重大的错误。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转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九五三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一四一页）唯心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性，就在于它使我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引入许多凭空地附加的主观的“外来的成分”，来使我们的认识陷于盲目状态，使我们的行动由于认识的错误而遭受挫折，使反动势力由此得到利益。我们反对上面所说的后一种干部的工作方法，就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的实质是依循着这种危险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路线的，这种错误的工作方法既然在干部中存在着，因此学习哲学对于干部就成为一件很必要的事情。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国家已走上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等等还存在，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里还没有完全消灭。我们要努力争取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地消灭上述的差别，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残余和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思想，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后还需要对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斗争。就世界观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思想的世界观基础就是唯心主义，而唯心主义在旧社会里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有着广泛的影响的。并且，由于在当前社会制度下仍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存在，也由于在任何时代，哪怕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时代也好，人们中间永远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唯心主义、主观主义也永远还会有不断产生出来的可能性。所以，不能不注意到，唯心主义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我们干部的思想 and 工作中表现出来，例如它会以教条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会以经验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的干部不学习哲学，不学习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就不能认真克服唯心主义的这种影响。因此，我们要认真地学习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并且不单干部需要学习，而且工人农民，也有学习的必要和可能。只有使实际工作中以及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干部和群众逐步地通过哲学的学习，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克服了唯心主义的影响，经常端正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这样，他们才能够充分地领会党的路线和政策，才能够善于根据不同的具体工作条件规定出最适当的执行党的政策路线的步骤、办法和计划等等，使党的政策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充分的贯彻，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造成了广大群众能够直接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条件。而广大群众一旦直接掌握了自己的哲学武器，它又会反过来对生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发展给与更为强大无比的推动力。

第二章 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 世界观的萌芽、发生和发 展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历史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是全部人类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成果。

全部哲学的历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萌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营垒斗争的历史，在这两大营垒的斗争中还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就在这两大营垒的历史斗争过程中，唯物主义世界观一步步发展和完善起来，辩证唯物主义则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的形式。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人类的科学认识和宗教迷信之间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在哲学观点上的综合表现，也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阶级斗争在世界观方面的反映。唯物主义的形式随着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到完善的阶段，各个历史发展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一般地都是为这一时代的进步势力服务的。各个时代的进步阶级在对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在反对反动势力用来迷惑人民阻碍进步的各种宗教迷信和谎言武断的斗争中，锻炼出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哲学思想发展条件相适应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研究每一时代的唯物主义和它的实际作用时，必须注意当时的科学发展状况和阶级斗争的情形。

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一）古代的素朴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二）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同时，曾出现过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形式，它已走到辩证唯物主义，但由于俄国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它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停止了脚步。

古代的素朴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是在奴隶占有制社会或由奴隶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的情形可能属于后者）。它反映着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反映着当时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科学认识的初步成就。它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和当时服务于反动贵族阶级的原始的宗教迷信观点以及唯心主义思想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古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最初都假定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由某些原始的物质发展变化的结果，而一切事物又可以还原为这些原始的物质。例如在古代希腊，有的哲学家认为这原始物质是水（泰勒斯），有的认为是气（阿那克西米尼），有的认为是火（赫拉克利特）。在印度和稍后的希腊（恩倍多克勒），认为是土、水、火、气四种元素。在中国，很早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就有把气和金、木、水、火、土等所谓“五行”作为原始物质的思想因素。这种原始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二千多年中间一直是中国人民用来综合和说明各种自然知识（特别是中国的医学、天文学等）的理论基础——虽然其中日益附加了许多牵强附会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并且有时也受到唯心主义的曲解。希腊古代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德谟克利特所奠定以后又由伊壁鸠鲁所发展的原子论学说。他们设想一种在虚空中不断向下运动的、性质相同

的细微原子(不可分的意思),把这看做最原始的物质。不同形状和不同重量的原子构成不同的事物。德谟克利特是代表主张民主制度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他的原子论综合了当时的科学成就,说明了许多自然现象,严重打击了当时传统的宗教观念。他的哲学世界观一直到十六、十七世纪以前,都被欧洲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所崇奉,但却受到了反对民主制度的贵族奴隶主阶级及代表他们的反动利益的象柏拉图之流的唯心主义者的强烈憎恨。古代西洋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最主要的表现是德谟克利特路线和柏拉图路线的斗争。中国古代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最明显的代表者是儒家的孟子,他主张“万物皆备于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他当时所坚决反对的“杨朱”、“墨翟”的学说,以及后来和孟子对立的荀子学派,都是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的。

古代素朴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一)它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并且力图用物质本身的原因来说明世界的变化,否认宗教迷信中的神造世界的观点,否认唯心主义者把某些精神的东西(如孟子的“天命”、“诚”,柏拉图的“理念”)看做世界创造力量的观点。在古代中国,唯物主义主要是和那种把“天命”当做一切事物的决定力量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斗争,在宋朝以后主要是和朱熹学派的认为“理”在“气”之先存在的唯心主义,或者王阳明学派的认为“理”在人的心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作斗争。(二)古代唯物主义者已初步估计到事物发展是依循着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如赫拉克利特说世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的永恒的火”。老子的“道”这个概念中就具有着客观规律的意义,他说:“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东汉的王充把老子的这方面的思想发展成明确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三)古代的唯物主义是辩证法的，因为它承认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发展的观点常常陷于循环论的缺点。(四)它的辩证法的特点还在于它初步估计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估计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一切事物内部所包含的对立势力(冷和热，阴和阳，正和反等)的相互作用和斗争。中国古代哲学把阴和阳看做宇宙一切事物中普遍存在的对立的力量，赫拉克利特明确地指出“斗争是万物之父”，等等。

古代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带有原始的素朴的性质。它产生在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科学认识还只是萌芽的时代。那时自然科学和哲学还混淆不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规律只在某些方面(天文、数学、物理等)有着比较初步的认识，还没有能够分门别类地对自然界作精密的系统的观察研究。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图画，只能依靠一般的直接观察进行粗略的臆测，而不能通过多方面的精密的科学知识，来作出准确的概括。因此，它的这个总的看法虽然在大体上是正确的，即在大体上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它对于变化发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却不能提供准确的了解，而常常要依靠主观的臆测来给以说明。它在这一方面的解释是幼稚的，就现代的眼光看来有时甚至于是荒谬可笑的。恩格斯指出，古代人虽然把自然界“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但他们对于“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逐一地加以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乃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二五——二六页)这就是古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弱点。这个弱点使古代的这种

唯物主义形式不能不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让于另一种形式。

在西洋，从古代的奴隶占有制社会灭亡后就进入一个一千多年的长期的封建的中古时代。在中国，还在二千多年前周朝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向着封建社会过渡了（对于这个看法中国历史学界还有不同意见）。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到荀子学派，就形成了由地方割据形式的贵族领主制的社会向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转化（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一个大进步）的思想前提。帮助秦朝建立统一国家的主要人物就是荀子的学生。秦汉以后，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两千多年（中间有过几次的分裂），直到清朝末年为止。在欧洲的中古封建时代，基督教是当时的思想上层建筑的主要形式，哲学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附庸，被称为经院哲学。这时唯心主义始终居于统治地位，但唯物主义的思想并没有灭亡。在经院哲学里的唯名论和实在论的思想斗争中，唯名论一派的思想就表现为近代唯物主义的先驱。实在论主张只有一般的概念是真实存在的，而个别的事物只是容易消逝的幻影。唯名论坚持个别事物的客观真实性，认为概念只是人们用来概括个别事物的名词。在这一点上，它把客观存在的事物放在第一性的地位上，而把人的主观意识——概念看做第二性的东西。

中国的中古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主要是宗教化了的孔子学派（儒家）的思想及其唯心主义的哲学，但在这个长时期内，唯物主义哲学也曾起来进行顽强的斗争，它是那些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横统治采取反对态度，并要求生产力发展和工商业发展的社会势力的世界观。汉朝的王充把老子学派的某些思想发展成系统的唯物主义哲学，反对当时的统治思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唯心主义，反对“天命”，目的论和灵魂不灭的思想。后来的儒

家学派中，在和佛教的唯心主义、宗教观念进行斗争的时候，也曾锻炼出一些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六朝时候的范缜肯定精神是物质的作用，北宋时的张载把“气”的聚散作为一切物质发展变化的根本原理，他们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者。明末清初的颜元和王船山的唯物主义，肯定了认识是感觉与对象的一致，肯定了物质的永恒性和规律性，他们的思想是当时在中国已经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哲学上的反映。

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封建时代生产力是规模极小的个体生产，它的发展很缓慢）和科学知识水平的限制，封建时代——至少它的前期和中期，没有产生离开哲学而完全独立的，以对自然界的分析解剖和精密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这使得中古封建时代的唯物主义基本上并没有超出古代的素朴的辩证唯物主义形式。唯物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形式——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形式，作为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阶段的出现，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即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有力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已经起来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时期，同时也是自然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形成为离开哲学而完全独立的，以对自然界的分析解剖和精密实验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的时期。据恩格斯说：“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二章）。

近代唯物主义的最初的祖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早（十七世纪下半期）获得全国胜利的英国，它的第一个代表人是十七世纪初的培根，在十七世纪中叶和末叶是霍布斯和洛克。培根的主要功绩是第一次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给予唯物主义的概括，肯定人类知识的真正来源是感觉经验。肯定物质的客观存在和物质具有

自己运动的能力。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进一步加以系统化，严格指明人的思想、概念仅仅是客观事物的一般的反映——“影子”。洛克是处在英国资产阶级开始获得统治权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但同时具备着二元论的因素，他在认识论上把经验派的唯物主义观点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但也表现了二元论的——向唯心主义让步的倾向。他肯定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源泉，但没有完全彻底地坚持感觉是外界事物的反映这个原理。他把人的感觉机械地分为第一性的感觉(如触觉)和第二性的感觉(如声色嗅味)两种，认为前者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后者则仅仅只是人的纯主观的表象，不含有客观的内容。这一点就是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的缺陷，这里包含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洛克的世界观反映了这个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它的进步方面和它的向着反动方向发展以及对宗教观念、唯心主义表示妥协的倾向。

上面说的三个英国哲学家，开创了所谓经验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学派，他们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因为第一，他们用机械力学的观点来理解物质的本质，以为物质是具有着某些永远固定不变的基本特性(如质量，广延性，不可入性等)的实体。十七、十八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初步走向胜利的时期，它的主要成就还只限于力学(机械力学，水力学等)、数学、天文学的方面，一般来说，它还是处在搜集材料的阶段，当时的唯物主义者，也就只能主要地依据力学等方面的成就，来建立自己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所以，十七、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物质观，始终都带有这种机械论的性质，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同时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即，第二，它不能真正理解物质的自己本身的变化发展，一般都把发展仅仅归结

为数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把发展的根源常常归结为外部力量的推动；第三，英国经验派唯物主义者认识论上肯定感觉经验是认识的真正来源，这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这个思想有些片面化，不能理解理性认识的实在性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辩证运动。

英国的经验派哲学到十八世纪就完全转到了唯心主义方面。十八世纪初期出现的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不但根本不承认人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的反映，相反地却把一切事物都看做是人的感觉的幻影。“存在就是被知觉”——这就是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公式。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世界观，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的许多反动腐朽的唯心主义的主要学派——奥国的俄国的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英国的逻辑实证论，美国的实用主义等等，都是以大同小异的各种变相形式继承了贝克莱思想的衣钵。

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到了法国，最初在英国产生，而后来又取得胜利的英国资产阶级所抛弃了的近代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哲学，再由法国唯物主义者继承下来并获得了更高的发展。但是，在我们讲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前，还得先提一提十七世纪欧洲大陆出现的唯物主义思想。

还在十八世纪以前，除英国的经验派唯物主义之外，在欧洲大陆又出现了所谓理性派的或“唯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培根、霍布斯差不多同时，法国的笛卡儿第一个在大陆上使哲学离开了经院的牢笼，创立了近代的哲学。他的哲学是把物质和精神看做两种平行的世界本质的二元论哲学。在认识论上，他认为要认

识真理，不必一定要依靠感觉，只需要直接诉诸人们自己的理性，只要人们依据自己的理性觉得完全“清晰明了”的那种思想，就一定具有真理的性质。笛卡儿主张人们要凭自己的理性来寻找真理，这对于把基督教圣经当做真理标准的经院哲学来说，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但他——以及后来在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唯理论”的学派——在认识论上“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不了解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根源，不了解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在认识论方面的表现。唯理论的认识论，在否认经验的实在性这一点来说是唯心主义的。笛卡儿第一次提出了物质永恒存在，即物质不灭的原理，这是他的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但他对于物质的看法，也是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他不能理解物质运动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他想用机械力学的原理来解释高级物质运动。在他的著作中，把动物当做机械看待，这是表明他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思想的最显著的例子。

比笛卡儿稍后一些，还有荷兰（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展的欧洲国家）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斯宾诺莎认为物质和精神是同一自然界的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就象凸面和凹面是同一曲线的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一样，他用这个比方来说明精神是物质的反映，肯定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他明确地指出自然界的变化是由于“自己原因”，并且依循着一定的必然规律。斯宾诺莎是十七世纪欧洲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唯物主义著作中，有时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辩证法思想因素，如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他的观点已接近了“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的辩证法思想，但从总的方面说，他的唯物主义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

的。在认识论上他仍然是属于“唯理论”派，和所有唯理论派的哲学一样，以为人的理性可以直接认识事物的真理，不必依赖感觉经验。在这一方面，又表现了它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性质。

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学派中也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站在唯心主义方面的主要代表人是德国的莱布尼兹，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是无数的，各自独立的，具有理性特征的精神“单子”的自我发展。莱布尼兹的关于“单子”思想和发展的思想虽然带有资本主义的、在当时说来是进步的思想因素，但他的唯心主义也反映了当时德国的落后——封建贵族和基督教势力的顽强统治。

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在思想方面是英国经验派和欧洲大陆理性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集大成。它包括一整批的杰出的哲学家，其中有拉美特里、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他们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公开地提出了无神论的主张，反对灵魂不灭的迷信，向宗教世界观和封建专制主义举行了最坚决的思想斗争。法国唯物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经验派的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唯理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肯定感性的知觉是一切认识的来源，而感性知觉是由外界自然作用于我们的器官而引起的（爱尔维修、狄德罗）。狄德罗的观点已开始超出了经验派的狭隘性，初步理解到理性认识的实在性，他认为不仅感觉，而且复杂的推论、推理，都反映着自然现象的客观的实在的相互联系。

在对物质世界的理解方面，法国唯物主义者基本上保持着和十七世纪英国的以及大陆上的唯物主义者同样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观点，并且有所发展。拉美特里的机械论观点比笛卡儿更进一

步，他写了一本《人是机器》的著作。他们公开主张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人的肉体结构决定人的精神生活（爱尔维修），他们主张物质和自然界的永恒存在，谁也不能加以创造和消灭，物质运动的原因是在物质自己本身，运动是物质所固有的运动。物质的运动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人和一切自然物一样，受着自然规律的支配（狄德罗、霍尔巴赫）。狄德罗的观点已具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他认识到自然界各现象之间的相互的联系，认为有生命物质和无生命物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初步考虑到了生物进化的问题及物种变化与其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的问題。狄德罗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中最杰出代表，他对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所进行的尖锐批判，得到列宁很高的评价。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各国革命中间最彻底、最深刻、震动最大的一次，它根本消灭了法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使法国变成完全资本主义的国家。法国唯物主义的高度战斗性，反映了这次大革命前夜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法国革命胜利以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就转到了德国。随着法国唯物主义之后出现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就是一八四八年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前夜的思想准备。

德国的革命思想因素不在唯物主义形式下面，而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下面准备起来，这是和德国的特殊条件密切联系着的。第一，这反映着德国经济落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展，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和封建势力的相对的巩固，使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勇气象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对封建统治者举行坚决的革命斗

争，并把国家政权完全夺取在自己手里。德国资产阶级是趋向于向封建贵族妥协，并希望通过君主贵族的统治来间接地实现自己的有限的要求。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九页）。他们幻想政治自由，但是不敢企图在现实社会关系上实现彻底的政治变革。第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法国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法国大革命掀起了劳动人民的无比强烈的斗争风暴，把德国资产阶级吓呆了，他们害怕劳动人民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力量，因此宁可投靠宗教信仰和唯心主义，以便在思想上找到一些防卫自己的力量。就由于这些原因，德国古典哲学就发展了唯心主义，并且对法国唯物主义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康德是以二元论者的面目出现的。他曾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他承认物质世界即所谓“物自体”的永恒存在，并且认为我们的感性知觉是“物自体”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是唯物主义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我们的感性知觉的内容，仅仅是我们的感官本身所形成的一些主观的影象，它和“物自体”并不一致；因此“物自体”或物质本身是不能被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只是我们主观领域之内的感觉表象。这样一来，康德又走到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方面去了。康德一方面认为感性认识是认识的来源，而知觉是我们的感官接触到“物自体”而产生的。在这一点上他本来也可以趋向于唯物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感性知觉只是一堆混乱的主观表象，它本身没有任何秩序，要从这些混乱的感觉世界中找出秩序，只有依靠人们天然生就的一种理

智力，这种理智能力包含着许多不依赖任何经验而先天存在的主观“范畴”（如质量、时间、空间、因果性等），人们把这些“范畴”运用到自己的感性知觉中，就使这感觉世界获得一定的严整的秩序。这样一来，康德又走到完全唯心主义的方面去了。照他的看法，人的理性认识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身的本质和规律性的反映，相反地，我们周围的一切实际事物的秩序和规律性，反而是理性作用于感觉表象的结果。不是客观事物产生我们的主观认识，反而是我们的主观认识能力产生我们所认识的客观事物。他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在这一点上康德就陷入了极端荒谬的主观唯心主义里去了。

康德的继承者费希特为了克服康德的二元论的矛盾，根本抛弃了他的“物自体”的思想，走到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的极端：整个世界就是“我”的“实践”活动，“我”在活动过程中不断地为自己造出“非我”的表象，成为与“我”相对立的方面，一切实践活动就是为着克服这个“我”和“非我”的矛盾。康德的另一个继承者谢林，用客观唯心论的观点来否定二元论，认为整个世界——自然界的本质就是精神，这同一个精神到处表现着互相对立的两极性的特点，如磁石的南北极，电的阴阳性，我和非我等等。这样费希特和谢林就在唯心主义体系的神秘形式下初步展开了辩证法思想，接触到对立统一法则，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因素就在它的辩证法方面。黑格尔是它的最后一个最大的代表者。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把所谓“世界精神”赋予以理性的特征，同时又认为理性的本质是辩证法的。他给我们描画了这样一个颠倒的世界图景：不是客

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反映到人的头脑里而成为人的理性知识，相反的，整个世界倒反而是理性的辩证运动的表现：世界最初只存在着一种“纯粹理性”，这种纯粹理性依照辩证法的逻辑程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方面，也就是“外化”为自然界，这是世界理性自己的否定。自然界的盲目状态和理性的本质是对立的，所以世界理性的发展还需要使自然界再被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这样就有人类的历史。人类在自己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克服了盲目的自然状态，在自己的思想中认识到理性本身，也就是说，人类的思想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理性的自我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相信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就是世界精神的这个自我意识过程达到完成的阶段的表现，而能够产生这样的哲学的国家——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国家，也应该是与世界精神自我意识的完成相适应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顶点。就这样，黑格尔从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里直接引出了反动的向贵族统治阶级妥协的政治结论。

但是，在唯心主义体系下面，黑格尔的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次自觉地企图系统地阐述辩证法。他把辩证法提到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的地位上，对形而上学举起了鲜明的战斗的旗帜。按照辩证法原理，世界是一个普遍的联系和发展的过程，任何事物都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存在。事物由于内在矛盾而在发展过程中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人对真理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过程。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里就包含着这些辩证法的合理的核心。黑格尔在他的哲学里企图系统地阐述辩证法的思想，这是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巨大功绩。这些辩证法的思想和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以及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所引出的反动的结论，是显然矛盾的。根据上述辩证法的原理来看，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认识是永远变更发展的过

程，不可能设想有一个尽头，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本质上就是革命的，它与任何保守的观点都不能相容。然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却作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最保守的结论：历史发展的最高点是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人类认识的顶点是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是在唯心主义的体系之内被窒息了的。这说明辩证法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完全正确的表现。

德国古典哲学否定了十七、十八世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时期，为唯物主义发展的新时期——辩证唯物主义时期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时期是产生在十九世纪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这时自然科学已不仅只是在机械力学方面获得成就，在化学生物学方面也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恩格斯指出的三大发现——能量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等——使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规律可以从科学上找到多方面的确凿的证明。自然科学已不再是搜集材料，分类排列的科学，而是整理材料，把握自然界的运动联系的科学了。综合这些科学的成果，人们可以看到，辩证法的规律并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理性的运动，而是物质自然界自己本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只要我们依赖各部门的自然科学成就加以综合和概括，找出其中最普遍的东西，就可以得到辩证法的规律。自然科学的发展说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必须受到批判，辩证法必须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正确的、科学的形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条件在科学发展方面已经准备好了，它在哲学史上的出现，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

但是，仅仅只有自然科学的发展，还不能决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能够完全形成。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仅是科学的高度发展

的成果，而且它本身是一种彻底革命的世界观，它不仅是与一切唯心主义和宗教观念不能相容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且它又是与一切形而上学的留恋旧事物的保守思想或反动思想根本不能相容的辩证法的世界观。要完全掌握这个世界观，必须有最彻底的革命的阶级立场。这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就是说，只有当无产阶级作为政治上的一个独立的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完全形成的决定条件。十九世纪以后，一些国家的进步思想的发展情形，可以作为证明。

首先可以举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情形来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从赫尔岑起，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在黑格尔以后出现的杰出的革命思想家，他们都曾以批判的态度从黑格尔哲学中采取了辩证法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观已经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赫尔岑把辩证法看做革命的代数学，并且坚持思想是从自然界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康德、黑格尔、贝克莱、休谟以至于实证论和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哲学做了深刻的批判。但是，由于十九世纪旧俄国是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封建农奴制的国家，由于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斗争只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他们的世界观就受到这个历史的、阶级的限制。所以，他们虽然从黑格尔那里取得了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并且也曾力图依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改造黑格尔辩证法，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却不能进一步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社会历史的领域中，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他们就停止了脚步。因此他们就没有能掌握完全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的哲学世界观只是向后者发展的过渡

形式。

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情形,也可作为说明。

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是特别长的。十七世纪初开始的清朝统治,延缓了已经具有萌芽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各国的侵入,又使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这样中国的中古时代就一直延长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中国是迟到这里才开始到来。由戊戌政变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一八九八年)到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中间,产生了许多代表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的先进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等。这些思想家的世界观中都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他们在说明世界的时候,极力概括了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的各种科学知识。这时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已介绍到中国来了,特别是进化论的思想,由于严复的翻译,在中国知识界中很长时候都有着强烈的影响。但是,这些科学知识的介绍,并没有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中间产生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即使只是一些因素),并没有完全超出古代素朴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如康有为、谭嗣同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孙中山)的阶段。例如:孙中山的世界观,明确承认世界发展是由物质开始,物质是“体”,精神是“用”,承认人的认识必须随事物的增长而增长,甚至有时也肯定认识是来源于实践(行),但他的发展观始终带有庸俗进化论的性质,不知道作为事物发展的内在原因的矛盾规律,不了解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规律,因此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终究是形而上学的。这种形而上学的特点特别表现在他对于生物的理解方面。他把生物的细胞叫做“生元”,认为“生元”是具有“知觉灵明”的东西。这就是

说一个细胞已具有着复杂的高级生物有机体的那种“知觉灵明”的特性，后者和前者似乎没有本质的差异。他的社会观点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他说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互助”这个道德原则上的，说“心为万事之源”，说人类中有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区别等等。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最革命的代表者，由于阶级的限制，他虽然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所谓“科学昌明”时代，也没有能够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并且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才开始为中国的先进人物所认识的。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的变革。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它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产生出来的。它比过去任何一种唯物主义哲学都更为彻底，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它贯彻到人们所考察的知识领域的一切方面，首先是把它贯彻到社会历史研究方面，第一次创立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资本主义以前的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依据政治经济

学中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而出现，指出社会主义的出现不是由于人的主观空想，而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具备着使它必然要产生的客观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这就是大机器工业和无产阶级。由于发现了这些能使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客观物质条件和阶级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就使社会主义思想由先进人物的空想变为科学学说，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能够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知识有步骤地争取它的实现。所以，全部马克思主义包括着三个组成部分：（一）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政治经济学；（三）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它提供马克思主义者用以观察一切问题的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诞生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它的故乡是德国。德国在当时，经济上比英法等国都落后，为什么竟能够成为这种最先进的革命思想的故乡呢？这是因为，当时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已获得了政权，它们都退出革命的政治舞台，只有德国成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为什么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而只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才会产生呢？这是因为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都是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代，还没有发展起大的机器工业，因此那时也还没有出现高度集中的和有组织的近代工业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还不能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它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是作为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势力而行动的。但在十九世纪初期，情形就有了根

本变化，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大机器工业在各国发展起来，而无产阶级也就随着成长起来。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在政治上表现了独立的行动，其中主要的有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里昂暴动，德国西里西亚织工的罢工运动等等。恩格斯说：“自一八三〇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指英国和法国——艾注），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都被认为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关系已经如此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们才会看不见，这三个巨大阶级（指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艾注）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才是整个近代史的……动力”（《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五七——五八页）。所以，在当时，德国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起以前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来，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虽然在当时是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比起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来说，在资本主义关系上是更为成熟的国家。在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已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德国革命的实际斗争迫切要求无产阶级解决有关自己的历史作用的一系列的理论和斗争策略的问题。这些历史条件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的故乡是在德国，而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地直接地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自发地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形成，固然首先是由于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积极地参加了当时的革命的政治斗争。但作为一套完整的科学，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必须综合以前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思想成就并加以发展之后，才能建

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学术上都有着它的继承的来源，这就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些思想来源都经过详细的批判，把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加以改造和发展，这样来创立自己的完整的科学。就世界观方面来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对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批判改造的结果。

代表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发展的黑格尔哲学，包含着唯心主义的体系和辩证法的方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着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重性：一方面有着进步和革命的趋向，另一方面，又有着向封建贵族势力妥协的趋向。黑格尔死后，德国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起来，这在社会思想上的反映，就是黑格尔学派的瓦解。它分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前者继续坚持着黑格尔哲学的保守的方面，后者着重利用了它的辩证法的因素，对德国的封建社会关系展开了思想批判。这种批判最初是集中在宗教方面的。在宗教批判的斗争中，青年黑格尔派的最激进的分子逐渐走到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道路上来，最后就出现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著作，公开宣布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费尔巴哈的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它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进步作用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费尔巴哈的思想立场，还没有克服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个人没有认真注意、也没有机会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由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当时德国的反动社会势力不能相容，他被迫到乡间去过隐居的

生活。这使得他既不能理解一八四八年革命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也没有注意到当时自然科学的新的成就。因此他的唯物主义基本上仍然是法国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形式。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时候，连带后者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他并没有使唯物主义发展到更高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也是属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但他们的活动不是象青年黑格尔学派中的其他人那样，仅仅局限于宗教思想批判方面，而是更进一步地对普鲁士君主专制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政治斗争。例如马克思刚离开大学，就担任《新莱茵报》的主编，写了许多政治法律批判文章，参加了当时进步政治运动。政治斗争的体验使马克思恩格斯终于离开了一般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资产阶级立场，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个新生的最先进的革命力量，并为无产阶级创造了革命的思想武器，创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创造了它的革命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时候，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以及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都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把握了它们中间的有价值的东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部分，加以改造和利用。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简单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照原来的样子凑合起来，而是依据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经验，依据自然科学的新的成就，利用和改造了那些合理部分，独立地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使唯物主义达到了它的最高的历史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过去唯物主义哲学的不彻底性，把唯物主义贯彻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使唯物主义成为系统完整的真正科学研究的工具。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产生，在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仅仅在发展程度上比过去一切哲学更高，而且在性质上和过去的哲学有根本的不同。这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并自觉地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武器。过去的哲学，总是把自己解释做“超阶级”的东西，而在实际上却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是为这个阶级服务的。过去的哲学之所以要掩盖自己的阶级面目，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那些哲学，除了个别的例外，都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在一切言论行动上掩盖自己的阶级面目，是剥削阶级利益所需要的。同时，过去一切哲学都是在少数人的范围内钻研的，从形式上看，好象只是一些追求“纯粹”真理的学者们所从事的专门学问，和社会各阶级的利害斗争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一切哲学是脱离广大人民的，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总是在人民面前保持着一种高深莫测的面貌。这种表面现象一直到现在对于我们还有着很深的影响，使我们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工农群众觉得好象哲学是一种神秘的、非常难于理解的学问，好象连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也不是他们自己所能了解的，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这当然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广大人民为着消灭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的目的服务的哲学，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不需要掩盖自己的这个伟大的目的，因此也不需要掩盖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的阶级性和人民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但要公开承认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的阶级性、人民性，而且要努力使它逐渐普及到工人阶级和人民中去，成为工人农民自己直接掌握的思想武器。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是能够领会而且必须领会的，是它们的战斗的思想武器。广泛地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革命工作干部，逐步地普遍领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逐步地学会应用这些观点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提高我们的各方面的工作质量和保证更加迅速地实现革命任务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重要条件。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它以前的任何一种哲学不同的地方，除了革命阶级性人民性之外，还在于它是为我们改造世界的目的服务的一种科学研究工具。过去的哲学只是用种种方法说明世界。每一种哲学，都企图使自己成为说明世界一切事物的包罗万象的绝对体系。它们产生在科学比较不发展的时期，那时许多科学上的发现还未出现，自然界的许多方面（特别是生物学方面）的客观联系和规律性还没有被自然科学所认识。那时哲学就把自己看做“科学之上的科学”，它依靠了哲学家的主观的构想，来填补科学还没有认识到的事物的许多方面的联系和规律性的知识，这样来构成一套说明世界的包罗万象的体系。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都把主要的力量用在这种包罗万象的体系的构成方面。由于他们对于世界的许多方面的说明，都不能够依靠科学的成就，所以就在很大成分上带有主观随意的性质，每个哲学家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凭着自己的许多主观的猜想，来建立自己的体系。如果说当时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对世界的看法，还能尽量概括当前有限的科学的成就，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还给与了基本

上正确的回答，那么，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的回答就是根本错误的，对于世界所做的说明就完全是颠倒了。不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主要考虑到的只是如何从逻辑上来构成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说明世界的思想体系，而并不认真考虑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来检验这个体系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的哲学不同，它不仅仅要说明世界，而且把主要的任务放在变革世界方面，也就是要把哲学世界观作为变革世界的科学工具，并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中来加以考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的特性，是由于它不妄自把自己当做“科学之上的科学”，不用主观的构想来代替应该由科学研究去加以揭发的各种事物的客观联系和规律性的知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自然科学已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自然界的许多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发展规律性已被科学所认识。因此就对哲学提供这样的可能条件：不必象过去的哲学那样，一定要由哲学家应用自己的主观的构想，把科学所不曾认识到的许多部门的事物联系人工地填补起来，来组织成一个仅仅说明世界的体系。科学的发展已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即只要把现有的科学成就加以概括，从已经揭发的事物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发展规律性的知识中找出它们中间的最普遍的东西，找出它们的普遍的规律，就可以把握到正确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在科学发展的这个高度水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全部科学知识的成就中总结出来的，与过去一切哲学都不同的完全新型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所谓“科学之上的科学”，它否定那些单凭主观的幻想联系所构成的思

想体系。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门研究客观规律的科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物质本质，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性的科学。旧哲学只是说明世界，并且不能完全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如实地说明世界。其中旧唯物主义虽然在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上是正确的，虽然力图依据科学成就来了解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但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至于唯心主义哲学，就根本歪曲了、颠倒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只有严格地以各种科学成就作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彻底排除了说明世界的一切主观的幻想的联系，才把握到世界发展的最普遍的客观规律，才对于自然界的本来面目给与我们一个完全正确的根本的了解。辩证唯物主义既然把握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的客观规律，它就不仅仅能够说明世界，而且能够成为我们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工具，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工具的作用表现在哪里？主要在于它可以成为正确的科学方法论。它本身既然是总结一切科学成就所获得的关于世界一切事物的物质本质和最普遍的客观规律知识，因此它就可以替一切科学的研究方法规定出一个总的正确方向。如果我们领会了辩证唯物主义，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善于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就能够保证我们对问题的观察和解决在基本方向上不致于犯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并且获得胜利，就是由于先进人物学会了用无产阶级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

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为着要掌握这个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就是要领会其中所阐明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物质本质，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知识，利用这些知识来作为我们观察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向导，使我们有可能保证在各种工作中都能获得胜利。例如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指明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这个原则，在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就必须贯彻这个原则。而贯彻的方法，就是观察任何问题的時候，都必须尽最大力量努力使我们的主观的思想意识能够确切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发展情况，避免主观的认识和客观存在的事物不一致。当我们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原理当做自己认识问题的总的方法，当做自己解决问题的总的向导，就有可能避免主观主义，避免重大的错误。

再说一遍，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为着要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并把它作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运用它来指导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帮助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观察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在这个目的之下，我们的总的要求，就是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使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能够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使我们的主观认识能够正确地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使我们在进行研究和做实际工作的时候，保证我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的实际发展情况能够求得一致。学习唯物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学会在观察事物的时候避免认识上的主观性，力求认识和客观的一致。而要避免认识的主观性，使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的实际发展情况求得一致，就必须努力做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事物，就必须力求避免观察的片面性和表面性。认识如果有了片面性表面性，也就免不了要发生主观性的毛病。学习辩

证法的目的,正是要学会避免认识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使我们能够全面地深刻地观察周围事物的发展过程,从而也就能够克服主观性的毛病。所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可分的,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把握正确认识的基本原理,即主观和客观一致这个反映论原理,辩证法提供我们贯彻这个原理的正确方法,即全面地和深刻地分析事物、研究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又说:“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矛盾论》)。观察的客观性、全面性和深刻性是分不开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是统一的。辩证法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正确的完全的表现,唯物主义也只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贯彻。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要注意到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这个不可分性。

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变革世界,而不是象旧哲学那样仅仅要说明世界。依据这个原理,我们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就必须注意使所学到的哲学观点成为我们在改造世界的实际行动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也就是要力求在学习过程中使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避免教条主义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的学习方法。

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把理论原理看做一个现成的死的公式,随便拉一些实际例子来证明这个公式。这个方法对不对呢?如果在学习某些理论原理的时候能选择适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对于我们的理论上的了解,自然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这个方法在学习的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应用的,但如果认为这样的学习方法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主要的学习方法,那就错误了。正确的学习方

法,主要的是要做到能够应用所学的理论原理,来分析我们周围存在的实际事物,来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包括革命问题、生产问题、思想斗争的问题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有的放矢”的方法,把所学到的理论原理作为“矢”,应用它去射中实际问题的“的”。这就不是简单地用例子来证明原理,而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原理作为认识方法去分析实际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应用这样的方法,就必须对所要分析的实际事物和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收集充分的有关材料,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丰富的材料中去找出它们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并依据这样揭露出来的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的知识来决定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学习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基本的方法。不应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就会使理论成为抽象的理论,就不可能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我们的理论是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行动的指南,要学会掌握武器,必须经常加以使用,把武器挂在墙上天天加以欣赏,而不把它拿下来使用,永远也不可能学会掌握武器。不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来学辩证唯物主义,不把它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就不可能学会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就不可能使它真正成为行动的指南,也不能使我们理解它为什么是行动的指南。例如我们学习了辩证法的矛盾规律,我们的方法就不应该是仅仅引用一些实例来证明一切事物都有矛盾这个原理,而是应该应用这个原理来分析我们思想中的矛盾问题或实际工作中的矛盾问题。或者应用它来研究我们的党的政策和决议是如何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了我们的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各方面的事物矛盾。我们党的政策、决议是严格地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革命斗争和生产

建设的一切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的结果，研究党的政策决议是如何应用矛盾规律来解决各方面的工作问题，对于我们的辩证法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只有依循着这样一些方法来学习，才能使我们了解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是我们的思想和工作的指南，才使我们有可能学会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武器。

学习理论和联系实际不能机械地分为两个绝对隔离的阶段。必须领会理论，才有可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在学习理论的时候，根本不要联系任何实际问题，而只能在把全部理论完全学好了以后再联系。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学习理论的时候，主要的任务自然是要深思熟虑，力求领会理论的精神实质，但如果完全不联系实际，就不可能进行有内容的真正的深思熟虑，也就不可能真正领会理论的精神实质。所以，在一开始学习理论的时候，就应该适当地进行初步的联系。经验证明，学习哲学，凡是学得较好的，在学习方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学习过程中，努力把自己学到的哲学原理用来分析和解决生产中和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结果是，既了解了原理，又推动了生产和改进了工作。自然，正如初学使用武器的人不可能一下子就使用得很熟练一样，在初学哲学的时候，是不可能联系得很好的，是可能有片面性的毛病的，特别是要想一开始就能很好地解决思想中工作中生产中的较复杂的具体问题是很困难的。但我们不妨采取边学习边联系，逐步深入逐步提高的办法，因为联系实际的方法的掌握，和一切其他事情一样，都要经过一定时期的训练才能搞好的。

“实际”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包括个人的思想和工作经验，包括党的政策路线、党的历史经验以及国内和国际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但在我们学习过程中，首先应该联系自己所经历的工

作和思想中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自己亲身的体验, 应用我们所学到的理论原理首先来解决这些问题, 最便于使我们亲切地领会理论的内容实质, 最便于锻炼自己应用哲学武器的能力, 使哲学理论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所谓联系自己的思想和生活, 就是要在所学到的理论原理指导下来把自己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的工作中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 把自己思想中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方面, 加以全面的分析, 从哲学上, 也就是从我们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寻求成功和失败的根源, 来检查正确和错误的思想上的根本原因。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 就能够从我们的工作经验和思想中作出最高的总结, 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提到世界观的高度, 使我们从思想方法上找到避免失败和错误、保证胜利和正确的最根本的关键。

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 区别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问题, 即物质(客观、存在)和精神(主观、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也是检查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上的正确与错误的最根本的问题。工作上犯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 要作具体分析。但从思想上来检查, 归根结底是由于主观的认识和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未能求得一致, 或者简单地说, 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分裂。所以,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克服主观主义, 克服这个唯心主义在实际生活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要判断我们学习哲学是否学得很好, 是否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就要看是否能够在一定实际问题上真正克服了主观主义, 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主观主义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别。反对主观主义, 应该着重在反对教条主义方面, 还是经验主义方面? 这就要看具体情形来决定。凡是曾经做过长时期的实际工作, 有相当丰富的工作经

验,但缺乏读书和钻研理论的机会的老干部,他们中间的主观主义主要地就会是经验主义性质的,对于他们来说,就要着重反对经验主义,同时要附带地防备在学习过程中陷于教条主义。凡是工作经验很少,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曾读过许多书籍的人,他们中间的主观主义总常常是教条主义性质的,对于他们来说,学习哲学的主要目的就应该是克服教条主义。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时候区别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很重要的。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在方式上不是完全一样的。对于有经验主义毛病的人,主要的方式是要他们认真读书,掌握理论原理,并引导他们利用理论原理来总结自己的经验,从自己的经验中找出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有条理性和综合性的知识。对于有教条主义毛病的人,就要教他们首先注意研究人民的实际生活,研究实际材料,学习做实际工作,学习从事劳动生产,体验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力求避免离开实际生活单纯从事书本上的原理的抽象研究。学习哲学的时候,必须针对不同的对象,从不同的方面来反对主观主义。

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斗争,是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用以教育全党,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纠正党员干部的错误,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的根本方法——整风方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应用了这个方法,就能保证党内工作顺利发展,保证党在革命斗争中避免重大错误,使党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最少的牺牲获得最大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改造世界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反对主观主义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了辉煌的明证。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同

志曾总结了党在这一方面的历史经验。刘少奇同志指出：“我们党在三十五年的历史中，曾经犯过四次严重的路线错误，这就是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后七年间先后发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的遵义会议以来的二十一年中，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下，却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个历史的变化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刘少奇同志回答说：“党在一九三五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在这以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重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由于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有了重大的改进，党的事业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了帮助全党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认真地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学会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求减少在工作中的错误，党中央曾经在遵义会议的七年以后，在全党发动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著名的‘整风运动’。全党干部在这个运动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详细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展开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就真正地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于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大批干部认识了同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同理论脱节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养成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党内外所进行的工作，就变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工作中的重大错误

就减少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说明党的广大干部如果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掌握了理论和实际联系、人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如果广大干部都认识到主观主义的危害性，都学会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会起着多么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历史经验说明整风的方法需要继续加以贯彻和发展，说明我们需要应用整风运动的基本经验，不断地在党员、干部、知识界中和工人农民中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教育，推广理论联系实际、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教育，反对主观主义的教育，使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改造世界的哲学思想，日益普及到更广泛的人民中间，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日益成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手中所直接掌握的科学武器，这对于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对今后的更为艰巨和复杂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章 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存在形式及其规律性

一 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

和一切其他唯物主义一样，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世界具有物质的性质。世界上存在着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现象，任何现象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表现形态。精神、意识现象只是物质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没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或意识现象，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如果要问：世界的统一性在哪里，首先我们就要回答：世界的统一性，就在它的物质性上，就在一切事物归根结底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表现这一点上。

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唯物主义完全相反。唯心主义否认世界的物质性，把世界一切事物的本质看做是某种精神的东西。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主观唯心主义，它把世界说成好象是仅仅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幻影。如说：“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宇宙便是吾心”（陆象山），“天地万物皆在吾心中”（王阳明），“存在即被知觉”（贝克莱），“物质是感觉的复合”（马赫），“世界是我的观念，我的活动，我的经验”（杜威）。另一种是客观唯心主义，它把世界说成是某种客观存在的“世界精神”的表现。这里所谓“世界精神”，不同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名字，如“天命”、“天理”、“世界理性”、“意欲”、“生命力”等等。不管哪一种唯心主义，它对世界的看法，都是把世界的本来面目根本颠倒了。世界发展的本来秩序是先有物质，后在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精神现象。首先是物质决定精神，而精神、意识，只是物质的反映。精神、意识对于物质世界的发展能给与一定的积极的影响，或者叫做能发挥一定的能动作用，例如人类能够利用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各种知识来改造世界，推动世界的发展。但在这里，首先还是需要人的认识正确反映世界，才能反过来改造世界。唯心主义却硬说是精神产生一切事物，精神力量是物质世界的创造主。这是把精神、意识对于物质世界的积极影响或能动作用这一方面孤立起来看待，把它绝对化了，抹煞了它本身还是要以物质世界作为它的最后来源。精神、意识对于物质世界的作用，只是一种反作用，只

是第二性的作用，而不是第一性的、最后根源的作用，而唯心主义正是把这种第二性的作用或反作用误认为第一性的、最后根源的作用。把这种颠倒的世界观作为思想方法来看时，它对于人们的认识就会起着这样的危害作用：（一）它把人的认识引到错误的路线上去：主观唯心主义既然断定世界是人们主观意识中的幻影，因此就会在理论上肯定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决定于人的主观意识；人要怎样事情便会怎样。客观唯心主义既然把世界说成是某种“世界精神”的表现，因此它就会使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是决定于某种现成的、永远不变的、绝对的精神思想公式；只要抓着了这些公式，任何问题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了。总之，不论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都会从哲学的根本理论上把我们的认识引上主观主义的道路。（二）归根结底它要和神道主义、宗教迷信的观念——上帝创造世界或神灵支配世界的观念合流到一起，历史上大多数唯心主义哲学派别都公开地主张神的存在，灵魂的不灭，“天命”的存在，只有其中的少数在表面上表示自己与一般的宗教迷信有区别，而实际上它们仍是一种精巧的神道思想，因为精神产生世界一切事物的唯心主义观点，就是变相的上帝创造世界的观点，精神支配世界和神灵支配世界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错误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正确性，在人类变革世界的长期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和阶级斗争——和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日益有力的证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就会亲身体会到，世界上的事物的发展变化并不是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也不是决定于任何一种绝对不变的现成的思想公式，而是决定于事物本身的性质和规律。因此，人们如果想要在社会实

践中得到成就，想要在改造自然的生产斗争和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中获得胜利，首先就应该认识清楚自己的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就应该了解有关的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并且善于在斗争中利用这些规律性。要想推动我们国家生产的发展，如果不研究当前生产过程的具体情况和它的规律性，只凭我们的主观愿望或某些现成的公式来进行工作，那是一定要失败的。要想在农业上使粮食达到高产的目的，不认真研究和在耕作中利用“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规律，是不可能的。至于说到科学，那么，科学的任务本来就是要研究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和规律性的，它在本质上和主观主义就完全不能相容。所以，只要依据人类的长期的社会实践经验，依据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并加以哲学上的正确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就可以找到充分的根据来肯定：世界并不是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中，也不是某种“世界精神”的表现；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它是无始无终地永远存在着，它既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识或任何一种精神力量所创造出来的，也不能被这些力量所消灭，它依循着它自己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在发展着，它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于世界的物质性的看法，和它以前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有所不同。它既不象古代唯物主义那样幼稚地把某种个别的具体物质形态（如水、火、气等等）作为一切千变万化的物质现象中的最根本的物质，也不象十七、十八世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那样，片面地把某些机械力学方面的特殊的物质属性（质量、不可入性、广延性等）当作物质的永久不变的普遍本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在自然科学中间一直到二十世纪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它的片面性使它不能说明自然科学上日益增多的新发现，因

此当自然科学中现代的许多新发现(如电子的发现)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物质观念发生了矛盾时,这些自然科学家就陷于莫知所措的状态,结果有的人竟走到唯心主义的泥坑里,作出了“物质消灭”的结论。这并不是因为作为客观实在的物质真正会消灭了,而只是因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认为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些物质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是会发生变化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曾批判了上述关于“物质消灭”的论点的错误,并指出自然科学家必须抛弃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对于自然科学上新发现的物质变化规律给与正确的理解,才能够避免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辩证唯物主义对于物质的看法是这样的:物质具有无限的多样性。物质的形态、构造和属性,是千变万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把任何一种个别的物质的形态、或它的某些特殊的构造和属性当做最普遍的东西,并把它规定为物质概念的绝对不变的内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正确的物质概念只能有一个,即:物质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通过感觉、理性的形式反映在人们的主观意识里。这就是物质的普遍的本质,一切物质都有这个共同的最根本的特点。世界一切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表现,所以,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但是,物质的形态、构造和属性又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世界的物质性的统一,又是多样性的统一。自然界的物质具有无限多样性,人类社会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世界是物质的多样性的统一这个观点,为我们指出了科学的方法论原理,即:当我们考察任何一种事物的时候,如果要想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要想使我们考察所得的认识符合于该事物的客观实际情况,那就必须用主要力量实事求是地

去研究该事物自己本身所固有的具体特性，决不可死死地抱定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一般公式来限制自己的思想。

二 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的根本属性

物质为什么会有无限多样的性质？物质的无限多样的性质，不是偶然出现的，这是由于物质自己本身不断运动、变化的结果。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的根本属性，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辩证唯物主义指明一切物质运动的根本原因都在物质本身的内部，而不在物质之外。因此，运动是物质自己的运动。在物质的自己运动过程中，物质的形态、构造、属性等等方面发生实质上的种种变化，这就产生了物质运动形态的多样性。所以，物质的多样的性质，就是它本身的运动形态的多样性的表现，就是物质的各种运动形态的互相转化的表现。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于物质和运动的关系的基本看法。

唯心主义的观点否认运动是物质的属性，把运动设想为存在于物质之外的，某种精神力量的活动。中国的宋明理学中的程朱陆王学派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说成是“理”或“心”的“变化流行”的表现，黑格尔认为世界的发展在本质上只是所谓“绝对精神”的活动。而如果按照贝克莱一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法，那末，世界的一切事物变化好象只是存在于人的主观的感觉幻想之中，用中国的成语来说，就叫做“人生如梦”。所有唯心主义者都否认物质是客观存在着的世界的本质，因此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变化，好象竟是一种无物质的运动。这样的观点，不论唯心主义用多少精巧的遁辞来加以辩护，总不能掩盖它的荒谬的性质。如

果我们把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和科学的全部成就加以认真的检验和正确地给与哲学的总结，就更容易证明它的错误。人类的实践——生产和阶级斗争使我们亲切地体验到自然界和社会自己本身的物质的运动，体验到这些运动都依循着事物自己所固有的客观规律，而不是来源于物质以外任何神秘的精神力量。原子能的解放产生巨大无比的热能发电等等，这是由于铀原子核受到中子的冲击而发生裂变的连锁反应的结果，或者是由于重氢超重氢的原子核在几十亿度高温条件下发生聚变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原子里面有什么“世界理性”在起作用。封建社会的矛盾发展必然要发生民主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必然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自己本身的运动规律的表现，并不是任何人的主观幻想所造成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正是各种各样的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科学的全部成就告诉我们应该从每一种事物自己本身内部去找它的运动发展的根源，而不必求助于物质之外的神秘的精神力量；因为在实际上，任何与物质脱离的独立的精神力量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

辩证唯物主义明确地肯定一切运动都是物质的运动，指出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思议的。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其不可思议的程度，在实质上就等于设想神话变成了事实：某个神仙只要心里一动，口中念念有词，就可以凭空地引起飞沙走石；或者设想只要闭着眼睛空想一阵或单凭嘴上空谈一阵，而用不着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就会使社会发生变革一样。

不但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运动的物质也是不能设想的。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就要反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那种错误看法，即认为物质在本质上是永远不变的东西。这种看

法的实质就是不承认运动是物质自己本身的属性。如果形而上学者也承认物质世界有运动的话,那么他们只承认一种运动形态,即只承认位置的移动和数量的增减(即机械的运动形态),而不承认在运动过程中物质自己本身会发生任何实质的变化,不承认物质运动的多样性和各种运动形式的互相转化,把物质的运动简单地看做走马灯式的机械的循环运动。因此,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世界在根本上说来是不会有有什么变化发展的,物质在本质上是运动的物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这种看法的错误就在于:(一)它不能说明世界物质的多样性从何而来,并且索性就否认了物质的多样性,把一切复杂的物质形态都归结为某些简单的(如象机械力学的)属性的表现,结果就不能不把物质的许多复杂的、比机械力学的属性更高级的属性,看作仅仅是表面现象,甚至于看作是人的主观感觉的产物,而否认了它们的客观存在的性质。(二)由于不承认运动是物质自己本身的属性,因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就不能从物质自己本身内部去找事物运动的根源,而把事物运动的根源看做是从物质之外来的。归根结底,就终于不能不把事物运动的最后原因归结到上帝、神灵、精神或人的主观意识等等方面上。这就是说,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以上两个弱点,使它把某些重要的阵地无形中让给了唯心主义,使它不能彻底地在一切问题上贯彻唯物主义。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一切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都在这个领域里完全陷入唯心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性和物质运动形态的多样性,现代自然科学的每一个新的发现——从恩格斯指出的十九世纪的细胞学,能量转化定律和进化论等三大发现直到二十世纪的原子物理学的发现,都证明了自然界的运动形态的多样性及

其互相转化的事实，而这种多样性及其互相转化正是物质自己运动的表现。近代社会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历史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地显示：社会本身的物质生活的发展使社会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更高级形态。所以在物质的运动这个概念中，应包括物质自己本身的实质的变化，包括各种物质运动形态的变化，特别是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不能把物质的运动简单地归结为机械的位置移动和数量的增减。形而上学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了解作走马灯式的机械的循环运动，这是片面的、错误的。物质运动的多种多样的形态及其互相转化的事实是客观的实在的；物质的多种多样的属性决不能看做是人的主观认识方面的幻觉。

机械运动只是一种低级的基本的物质运动形式。在机械运动之上，如果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排列起来，那就还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等四种基本的运动形式。每种基本的运动形式中包含许多更具体的运动形式。各种科学就是以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科学的不同部门的分类，就是按照它所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来作规定。每一部门的科学任务，就是要具体地考察它所要研究的那种物质运动形式和不同运动形式的互相转化，揭露它们自己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世界上只存在着各种各样具体的物质运动形态，没有“物质一般”或“运动一般”。物质和运动的一般性质只是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质运动形态的共同点的抽象的概括。不对具体的物质运动形式作具体分析研究，就不可能对事物获得科学的认识，就要在认识上犯错误。所以科学方法论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客观存在的具体的事物中，各种物质运动形态常常是互相

交错地存在着,特别是在高级的运动形态里,必然包含着低级的运动形态。所以高级的东西总是比低级的东西更为复杂的。这里要注意的是,高级的东西的存在,虽然要以包含某些低级形态作为不可少的条件,但是,高级的物质运动形态有它自己所特有的本质和规律性,决不可用低级的运动形态简单地来概括高级的运动形态。简单地用低级运动形态的规律来说明高级运动形态,而否认或忽视了高级运动形态自己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的存在,这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一般的错误观点。十七、十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企图用机械力学的规律来说明动物和人类的有机体,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人类社会生活简单的当做一般的生物现象来研究,有些心理学者把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简单地归结为大脑组织的生理活动的规律,忽视了社会实践、阶级斗争对于人的心理活动的重大影响。有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者企图简单地用人口增长条件或地理条件(即自然环境条件)来说明社会的变化发展,都是形而上学的。在研究任何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的时候,虽然必须注意到其他运动形态对于它的影响和联系,但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抓着这种运动形态本身的特点。

三 时间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物质的运动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中,所以时间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不能设想有离开时间空间而运动的物质,也不能设想和物质的运动无关的时间和空间。时间就是物质发展过程的前后连续性,空间就是物质本身的伸张性。时间空间和物质是不可分的,因此也和物质同样是客观实在的。

唯心主义不承认时间空间是客观实在的物质存在形式，而把它们看做是人的认识主观的产物。（一）康德主义者把时间空间看做人类的感性认识中的直观形式。（二）黑格尔把时间空间看做是绝对理性发展的一个因素，并且否认自然界中有时间性的发展。（三）马赫主义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感觉系列的调整了的或协调了的体系”。这些唯心主义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都把时间空间看做是人的意识从外部附加到事物上面的主观形式，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存在形式。唯心主义的这些观点和它的否认世界的物质性的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因此也是同样荒谬的。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时空观也是不正确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存在，但它不能理解时间空间和物质运动的不可分性，以为世界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另外还有着一个与物质脱离的时间空间的空框子，而物质是被安放在这个空框子中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实际上只是纯抽象的主观的假想，并不是客观世界里实际存在着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在客观世界里，除了与运动着的物质联系着而作为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的时间空间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列宁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三章第五节）不论从各方面的实际生活中以及科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要把握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离开了运动着的物质是不可能的。同样，要设想一种事物的运动不是在一定的具体的时间空间中的运动，也是不可能的。

时间空间和物质的不可分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来：（1）时间和空间的计量，必须依赖一定的具体的物质运动的属性作为

计量的尺度, 否则计量便不可能; 例如计量年月日是依赖地球自转和公转的速度, 计算宇宙的空间依赖光速一年的长度作为单位; (2) 空间的三度性, 就是物质伸张的三度性; 时间的一去不能复返, 只能用物质发展过程不会倒退这一点来说明; (3) 时间空间的无限性只是物质的无限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4) 最重要的一点是, 要把握任何一件具体事物的发展的时间性(即它的发展速度)和它的空间性(即它的发展规模), 必须依据这一事物本身的发展内容和它所联系的具体条件来确定, 而不能由人的主观意志来任意确定。例如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速度和规模, 就是曾经出乎我们许多工作干部的主观意料之外的。毛主席党中央之所以能正确地掌握了这项工作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并且能够对运动给与正确的指导, 这是由于依靠了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 认真研究了这些运动的具体内容和条件, 并依靠这样的研究, 批判了不正确的保守主义的主观看法的结果。这一件事情, 就足以证明时间空间是和物质运动本身分不开的, 是物质自己的存在形式。它决不是从人的主观意识里产生的东西, 也不是物质之外的空框子。总之, 事物的现实的空间性和时间性, 它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决定于该事物的性质、内容和它所联系的具体条件。认识这一点, 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为工作中的“左”右倾错误的思想原因之一, 就是由于不能够依据事物发展的具体内容来掌握它本身所固有的具体的空间形式, 特别是时间形式, 而是主观地把它们的空间规模估计得过大或过小, 把它们的时间速度估计得过早或过迟的缘故。

四 物质的运动有它自己本身的规律性

人类的社会实践和一切科学的成就证明：物质不只是和运动不可分，而且物质的运动是依循着它本身所固有的一定的客观规律性的。当我们说到物质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也包括在自己的理解之内的。这就是说，物质之所以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其理由之一，就在于它的运动、发展不是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只是依循它自己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性。物质的运动规律，是和物质本身一样，不能为任何人所创造，也不能被任意地消灭。事物的规律性决定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内容及其所依赖的具体条件，规律性只能随着事物本身的性质、内容及其周围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不能由人的主观意志任意加以改变。

唯心主义对于事物规律性的看法是完全颠倒的。唯心主义不承认客观事物有它自己本身的规律性，硬说规律性是“上帝”、“天命”或什么“世界精神”、“无穷的意欲”之类的神秘力量赋予自然界和社会的。主观唯心主义如实用主义之类，索性否认了事物的规律性，认为世界是由盲目的偶然性所支配，把科学规律硬说成仅仅是人们为着暂时的主观的利益而作出的有用的假设。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虽然承认规律性的概念，但把规律看做是人的理性能力的主观的产物，否认规律性为客观事物自己本身所固有。康德主义把我们周围的现象世界看成是毫无秩序的一团混乱的东西，认为仅仅由于人的理性能力的作用，才使这混乱的现象获得一

定的秩序,因此他们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这一切唯心主义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颠倒的。一切科学研究的成果都能证明,事物的规律性完全可以依据事物本身的性质、内容及其周围的客观条件得到说明,规律在实际上就是各种事物现象之间的辩证的相互联系,只要我们能够具体地分析每一事物的具体的性质、内容以及它的各种条件,就可以准确地把握到这一事物的具体的规律性。事物的规律性决不是什么莫须有的“上帝”、“天命”或“世界理性”之类的神秘力量所赋予的。它既然是各种事物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所以决不是人们的暂时的有用的假设,也不是由人的理性能力主观地引伸出来的东西。相反地,人们关于事物规律性的知识,只是客观事物规律性在人们的理性头脑中的反映。为着要正确地去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为着要避免主观主义,我们就必须要具体地去分析所要认识的事物的性质、内容及其所依赖的周围条件,使我们的思想能够如实地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就要用一切力量避免轻率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或自己的“理性”里“假设”出或引导出一些主观的臆测,来代替真正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

辩证唯物主义也要反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对于规律性的错误看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的观点,肯定事物的规律性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性,这是正确的,但它常常把某种低级的物质运动规律性知识当做解释一切事物的普遍公式——例如机械唯物主义把机械力学的规律简单地用来说明动物和人类的有机体的构造,这是片面的、错误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特别不能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他们中间有些人曾企图简单地用自然界的规律来说明人类社会生活,例如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人口论”就是其中的一种),

而不知道社会这一种最高级的物质运动形态具有着它自己固有的特殊规律性。由于他们不能把握到社会历史发展本身所固有的特殊规律，因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解释人类社会历史问题的时候，不能认识到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最后决定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因此就不能贯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原则，不能不在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时采取各种主观臆造的根据，并因此终归陷入到唯心主义的圈子里去。

第五章 物质和意识

一 物质是意识的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质，自然也就要肯定物质对于意识居于根源的地位。既然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那么意识、精神就只能是物质本质的某一种表现形式，就只能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的问题，就作出了它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所应有的回答：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上是先有物质，后有精神；意识只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高级物质，人脑的一种属性，一种反映作用。这个原理，在今天来说，是已经得到科学的充分证明的了。

唯心主义者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完全弄颠倒了。客观唯心主义者凭着自己主观的臆断，硬说宇宙中先有某种纯粹精神的本体，

然后由这种精神的本体产生出自然界的物质现象，它把人们的主观意识现象看做是这种宇宙精神的“自我意识”，不承认它是人们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作用。唯心主义的这些观点，和宗教里面的上帝创造世界的观点，以及人的知识是来源于神的启示等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唯心主义是采取了更精巧的诡辩形式罢了。主观唯心主义者——如马赫主义者，更是荒谬到了极点：他们干脆否认了周围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它不过是人的“感觉的复合”。他们中间有的人竟公开地做出反科学的极端结论，硬说在没有人类以前，自然界并不曾独立存在过。仅仅在人们“设想”自己是当时自然界的目击者时，它才有存在的意义。唯心主义的这些观点在实践上就是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它会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这样一种危险的方向上去，即在我们不论解决什么重大问题时，都以为只要等待神的启示；或等待某些能够代表“天命”、代表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天才人物的出现；或索性凭着自己的主观的感觉、意识来任意决定一切，而不必对于周围事物努力去做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必考虑如何使我们的意识去正确地反映周围的物质世界。

二元论对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理解也是不正确的。二元论想回避物质和精神那一方面是第一性的东西的问题，把两者看做宇宙间没有相互联系的两平行的本质。这样的观点既然否认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因此也就无法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但物质和意识的相互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在实际上，二元论者仍不能不说明这个关系，而当他们一接触到这个问题时，就无法坚持二元论的原则，就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倾向于唯心主义，或在另一些问题上倾向于唯物主义。二元论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之间的折衷主义的错误倾向,只有克服二元论,完全站在唯物主义方面,才是正确的。

前面已说过: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意识是第一性的?这个问题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最基本的问题。要辨别一种哲学派别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就是要按照它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来确定,而不能按照其他任何别的标准来确定。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只能有两个回答,而不能有第三种回答。即或者是唯心主义的回答,或者是唯物主义的回答,二元论的回答只是这两种回答的折衷主义的结合,而不是第三种回答。

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坚持物质先于精神的原理,这个原理正确地概括了科学和人类实践的成就,而科学的发展也日益有力地更加证明唯物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但是,过去的唯物主义观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有所不同的。在十九世纪以前,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够,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成熟的阶级,因此当时的唯物主义对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认识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总不能够完全正确地说明意识怎样从物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一些唯物主义者(古代的)以为意识是一种最精微的从来就存在于宇宙中的特殊物质的作用,如德谟克利特认为是最精微的原子的作用,中国唯物主义者认为是一种“精气”的作用。又一些唯物主义者虽然肯定意识只是物质的一种属性,但不知道这只是高级物质特有的属性,认为似乎一切物质都有意识,连最低级的物质也有意识,动物和人类的意识和无生物比起来只不过是量的差别罢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以及中国的孙中山(他认为细胞就是有意识的)的思想,一般都有这样的观点。十九世纪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则索性把意识和物质同等看待,也就是

抹煞了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和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的这个原则的区别,把意识也看做是存在于我的主观之外的一种物质,说人的脑髓分泌出思想,就和肝脏分泌出胆汁一样。我们知道,辩证唯物主义是把意识看做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看作是脑神经这一种物质的作用,看做是由物质所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庸俗唯物主义把意识简单看做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这就把第一性的东西和第二性的东西混淆不分,也就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混淆不分了。

辩证唯物主义依据近代科学的一切成就,指出意识是物质发展到高度完善阶段的产物。意识并不是存在于某种“特殊”的“精气”或精微的原子之中,它也不是任何低级的物质能够具有的属性,它只是人脑的一种作用。低级物质对于周围事物也有一定的反应的作用,但这些作用,和人脑的意识作用是有质的区别的。物质的发展是由无机物到有机物,由无感觉的物质到有感觉的物质,由没有意识的物质到有意识的物质的辩证发展过程。意识的作用是在于能够以主观的形式反映周围客观事物的存在。人脑是物质发展的最高阶段,人脑的意识作用的主要特点是在于具有思维的能力,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首先是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并且受着社会实践的制约的。总之,人的思想意识是人的大脑的作用,这种作用不外就是一种反映的作用。或者说,人的意识的内容,就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在人的头脑里的反映。正确的意识,就是自然界或社会的真实的客观情况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正确反映。所以,要获得正确的意识,必须努力使我们的主观意识能够正确反映周围的客观存在。

二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辩证唯物主义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首先肯定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即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它先于意识而存在，而意识则只是物质发展的产物，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所产生的一种属性。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还要肯定这种高级物质的属性的特点是在于能够反映周围事物的客观情况，也就是肯定物质对于人的意识具有着可知的性质。辩证唯物主义不但一般地肯定我们的主观意识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而且指出人的意识有能力对于周围的物质世界获得近似的正确的反映，有能力做到使我们的主观意识的内容和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情况达到一致的地步。正确的认识就是这种正确的反映，就是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达到一致的表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反映论的观点。

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观点采取正相反对的看法。一部分唯心主义者，肯定人们的思想能够认识世界，但照他们的观点看来，人们之所以能认识世界，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精神的、思想性的东西，而人的意识和世界精神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所以，认识不是由于人的意识反映物质世界，而是精神、思想认识自己。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一般地都是这样的。黑格尔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者。这些唯心主义者既然把世界的本质当做和他们的精神、思想完全同一的东西，因此他们就不把认识看做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把认识看做世界精神在个人的意识里的体现，也就是看做类似神的启示一样的活

动。这样，唯心主义就在实质上和宗教迷信观念合流起来了。黑格尔所谓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中国旧时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谓的“天人合一”，柏格森一派的所谓“直觉”，都是同类性质的看法。由于他们把自己的思想看做世界精神的体现，因此也就把这个思想当成绝对不变的公式，妄想用它来安排和支配世界的一切事物。他们不知道，人们的思想对于世界的变化、发展虽然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条件的，只有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思想，才能对事物的变化发展发生积极的改造作用，而唯心主义者自己的颠倒的、错误的思想却决不能起这样的作用。所以，人们首先只能用自己的思想去反映变化着的客观世界，并随着世界的变化发展使自己的思想也跟着发展，然后这样的思想才能对世界发生积极的改造作用。任何一个最聪明的哲学家的思想，也不能成为支配世界的一切事物的绝对不变的公式。

另一种反对反映论的观点是不可知论。有些不可知论者在认识论上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流派，他们一方面肯定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存在（例如康德），或者肯定我们所认识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如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的休谟主义者赫胥黎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的感觉的内容是纯主观的印象，或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或者叫做“物自体”）；认为我们所认识的事物的规律性是否来源于客观物质世界，我们没有能力加以肯定。这种不可知论的观点很容易引导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理由是：肯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原理和不可知论的认识观点是根本矛盾的。不可知论既然已经否定了我们的主观认识有反映外界世界的的能力，也就没有理由再来断定这一个外界世界是否客观地存在着，因为

我们没有权利肯定我们不能认识的东西。这样一来，不可知论者最后就走到了主观唯心主义方面，把我们周围所看到的世界都当做只是存在于我们的主观意识中的东西了。依照这样的看法，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就只是“原则同格”（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章第三节），不能设想它可以离开主观世界而存在。不是客观存在反映于人的主观意识，相反地倒是人的主观意识产生客观存在。唯物主义者说，人的主观意识反映客观世界，不可知论者——主观唯心主义者却说，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只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唯物主义者说，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可知论者——主观唯心主义者（例如实用主义者胡适）却说，实在好象是很服从的女子，她千依百顺地任随你怎样去打扮它。这种不可知论——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是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反动哲学的主流。美国的实用主义，奥国的马赫主义，等等，都是以这一类观点作为基本思想的。

庸俗唯物主义也离开了反映论的原则，不把人的认识看做外界世界的反映，而把它看做和外界世界的事物同样的某种特殊的物质，把意识也看做是一种存在于主观之外的事物。前面曾经说过，这样的观点是违背了物质的第一性和精神的第二性的原则，把唯物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界限混淆不清了。

辩证唯物主义者坚决反对不可知论，指出现实世界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我们的实践活动能够证明我们的一切正确认识都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真实情况在我们的主观意识里的正确反映。实践使我们能够认识客观世界，也使我们能够肯定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实在性，肯定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决不是仅只存在于我们的主观之中，如主观唯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钢铁工人依据

熔炼钢铁的规律的正确知识从矿石里确实确实地获得了钢铁，农民依据农作物生长规律的正确知识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了丰收，这些生产实践使工人农民完全可以肯定钢铁和农作物等物质的客观存在。如果人们在生产实践中采用了主观的错误的计划，他们的生产一定失败，这又证明物质决不是存在于人的主观之中，决不是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同时，人们之所以能认识世界，并不是如唯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好象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和人的思想是同一的东西，人只要幸运地抓着了这样一个世界思想，就可以永远把它当做支配一切事物的绝对的公式了。事实上这样的思想是永远找不到的，因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人的认识只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反映。客观实在怎样，我们的认识就应该怎样。客观实在的事物发生了变化了，我们的思想也必须跟着变化。人们如果预先为自己的行动定出一个死的现成公式，不管事物的情况如何变化，都硬要按照这个死的公式去工作，那就一定要使工作遭受失败或受到很大损失。所以不能说世界本来和人的思想是同一的东西，而应该说人的主观思想必须力求与客观事物一致。只有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而错误的思想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因为这种思想的内容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任务就在于启发人们去自觉地努力使自己的主观意识尽可能如实地反映客观存在，避免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的分裂，避免主观主义的倾向，以保证认识的正确性。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自然辩证法》一七七页）又说唯物主义是“从事实本身的联系上而不是从什么幻想的联系

上把握的事实。”(《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章)这些话的意思告诉我们:反映论的观点正是唯物主义的核心。恩格斯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是在于“首次真正严肃地对待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基本点上——运用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同上)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研究一切问题的总的指导方向。例如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都不曾把唯物主义世界观真正运用到里面去,他们一涉及这个领域里的问题,一般都给与唯心主义的解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贯彻到历史研究的领域去,指出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人的社会意识只是他们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在一切学术研究的领域里应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即从客观事物本身的联系上去把握事实的原理,而且也要把这原理贯彻到一切实际工作中,在实际工作中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努力使主观的思想正确反映或符合于客观的现实。我们有一些党的干部,在理论上、口头上是承认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研究或者没有认真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不知道明确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线,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不能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是不能自觉地运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能按照事实本身的联系来把握事实,不能使主观的认识和客观事物求得一致,而是使自己主观的思想和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相分裂。这种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必须努力加以克服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在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

义，也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唯心主义，而对于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来说，主要的就是要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必须认真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来学习如何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观点和依据反映论的观点来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即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反对当时有些同志用“想当然”的方法和“以感想代政策”的方法来观察问题的错误倾向。以后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的演讲中，又进一步指出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不知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为只要凭着书本上的一些现成词句或现成公式就可以直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不去认真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况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不去注意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具体实践经验。经验主义是把个人的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简单地到处搬用，而不顾这些经验是否符合于所用到的地方的客观实际情况。不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使人的主观和客观分裂，使人的认识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使人在实际工作中陷于错误和失败。

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以及许多关于指导实际工作的文章，曾反复地用各种通俗的方式指出如何在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应用反映论的原理。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作为我们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的范例。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毛泽东同志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

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毛泽东选集》一五五页)这篇文章里又指出要怎样才能主观上不犯错误,说:“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同上,一六三页)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这样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毛泽东选集》二六一页)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号召对于周围的事物进行调查研究,指出“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一切问题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符合于反映论原理的态度。在这篇文章里,他批判了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说“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毛泽东选集》七五七、七五九、七五八页)

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里,毛泽东同志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毛泽东选集》九一六页)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里,他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一二〇三页)这里说的“工作方针”就是我们的主观的思想,“实际情况”就是客观事物。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就是要使主观的思想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

既然主观思想应该反映客观事物,那么,如果客观事物有了变

化,主观思想也就必须跟着有所改变。在《实践论》里,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毛泽东选集》二七一页)所以,人的思想必须反映事物的发展,这个原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二》里,又加以申述,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二四页)毛泽东同志批评右倾保守主义,主要地就是指出这种错误思想在方法上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反映论原理。

以上只是毛泽东同志著作中论到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反对主观主义和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的一小部分例子。在我们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必须把这些论点结合实际工作的经验充分地加以说明,使得我们的干部由此懂得,我们学习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要在理论上、口头上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上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把反映论原理作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武器,以克服主观主义的毛病。

三 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

许多唯心主义者在攻击唯物主义的时候,常常是先对唯物主义加以种种曲解。经过曲解之后,唯物主义就被他们形容成好象

是很容易被攻破的非常脆弱的东西，于是唯心主义者就向着他们自己所幻想的这个对象进行攻击，并且也就自以为获得胜利了。唯心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的曲解有两种：一种是把唯物主义硬说成是专门追求物质享受，没有任何高尚的理想的庸俗行为，另一种是把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曲解为单纯的机械决定论，好象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是不承认意识有任何能动作用似的。

第一种曲解是俗流的见解，同时也是哲学史上很古老的一种曲解。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已驳斥过了：“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这只是资产阶级的庸人们自己“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齷齪行为”的自画像，并不是唯物主义的真正的本来意义。历史上的唯物主义的代表者，恰恰是最能够为一定时代的高尚的理想，为反对腐朽的旧思想旧制度而进行忘我的斗争的伟大人物。“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二二页）恩格斯指出，上面那种说法实际上是对唯物主义的荒谬的曲解，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真正的区别抹煞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来意义，主要地只是在于，在回答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时候，前者把物质、存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而后者则相反地把精神、意识看做第一性的东西。离开这个根本标准来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要达到荒谬的结论。

第二种曲解是在许多唯心主义者中比较流行的。他们认为，唯物主义既然肯定事物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并且肯定一切客观实在的事物都有着它们自己本身所固有的，也即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规律性，那么，好象唯物主义

者是把意识看做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纯粹消极的反映，而对于客观事物是丝毫无能为力了。他们把唯物主义曲解为一种机械决定论，曲解为类似宿命论的观点，曲解为对于客观规律的偶像崇拜论。

其实，真正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如唯心主义者所曲解的那种片面的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这只是就意识的来源和根源说的。人的主观意识只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因此它的内容决定于客观存在，以客观存在作为自己的来源，它决不是凭空地由主观自生的，也不是上帝的启示或什么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人的认识的正确与否，只决定于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现实事物，而不是决定于它是否符合于黑格尔式的主观设想的“世界理性”，或是否符合于旧中国唯心主义者所谓的“天经地义”。但是，坚持这个原理，并不等于否认了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人们的意识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方面对于客观存在又能够反过来发挥重要的能动作用。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意识如果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情况、本质和规律性，它就能够帮助人们去胜利地从事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斗争，就能够加快客观世界的前进运动的速度，就能够使人们的社会生活顺利地向着自己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意识不能正确地而是错误地反映了客观存在，它就会把人们的行动引导到盲目的、迷乱的境地，就会使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行动中陷于失败，就会使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受到障碍，就会使自己所预期的目的不能得到实现。

自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是不能够正确地解释意

识的能动作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不知道认识和社会实践的辩证的联系，他们不知道人们的意识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历史地发生发展，又历史地作用于客观存在的。他们对于人的认识作用，是抽象地离开历史和实践来加以解释的。他们不知道，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能动地获得的，这就是说，他们把认识看做是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消极反映，不了解认识是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了解认识发展的规律。在他们看来，似乎正确的认识不是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结果，而是偶然地由一些特别杰出特别聪明的人们的头脑中产生，而它一旦产生之后，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这样的观点在实质上已离开了唯物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里面去了。另外也确有一些唯物主义者陷入了机械决定论的片面错误之中。他们不能理解意识对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不能理解正确的认识能够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的积极作用，有时甚至于陷入类似宿命论的观点。例如对于客观规律的偶像崇拜观点，就是在一些不高明的唯物主义者中间产生的。

辩证唯物主义充分估计到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客观存在的能动作用，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那种近似宿命论的错误观点。辩证唯物主义明确地指出：并不是任何人的任何一种意识都能够起积极的能动作用，只有多少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才能对社会的前进运动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能正确反映或者完全歪曲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的认识，就不能起这种作用，或者只能起相反的消极的作用，因为它会使我们的行动发生错误，把我们引到盲目乱撞以至于失败的境地。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人的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反对有些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在这方面的错误看法。人的意

识是在历史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反映客观存在的。意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意识的正确与否,决定于人的实践地位。人在自己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实践行动中能动地去认识世界,依据自己的实践的要求能动地去开辟自己的认识的领域,而不是静静地坐着让外界的任何事物随便映到自己的头脑里来,因此随着人的实践地位不同,认识也有所不同。实践首先是指生产实践,在不同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们的意识发展程度就有所不同。另外,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处于不同的实践地位,因此就有不同的意识。人类对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受到生产发展的规模和阶级的实践地位的限制的。阶级的矛盾使社会分裂为前进的势力和腐朽的势力,腐朽的势力是脱离生产的实践并和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处在相反的地位上的。他们的地位使他们的意识趋向于保守旧的社会制度的方面,因此在一般的方向上就不可能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特别是不能反映社会的前进运动规律或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这就使得他们的意识只能起消极的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只有进步的革命势力是积极努力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斗争的,他们的地位使他们的意识能够更正确地——正确的程度依据他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有所不同——反映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并能够利用这些规律来推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发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变革世界的伟大作用,就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最进步的意识形态,是最全面最正确地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具有最高度的科学性的意识形态。所以,在研究意识的能动作用时,必须注意到不同阶级的不同意识的根本区别,必须注意到新的进步的意识 and 旧的社会意识的

根本区别。应该指出,反动阶级的意识,在总的方面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是最后一定要走向失败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任何具体实践问题上都不能认识一点客观事物的规律。不是的,即使是反动阶级的人,在一定的实践问题上也可能认识一定限度的客观事物的规律,并且利用这种认识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在战争中他们也能利用某些战术的规律来为自己的战斗服务。革命的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在和反动派斗争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也就是必须注意到,反动派的行动虽然在总的方面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必然要失败的,因而我们在战略上有充分的理由藐视它,肯定它一定要灭亡。但同时又要注意在具体的战斗中它不一定是完全不能利用某些客观规律的知识来为自己服务的,如果我们不谨慎小心,也可能会暂时吃它的亏,因此在战术上就必须重视敌人,在每一个具体的战斗中必须谨慎地坚决地进行斗争,才有可能打败敌人。还应该注意,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掌握革命的、能够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包括生产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规律)的知识,才能使自己在斗争中和工作中处于自由的主动的地位,才能避免失败。反动阶级的思想意识有时也会影响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这种影响就会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在实际斗争中陷于盲目性,就会走向错误的道路。所以,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过程中,必须和各种反动思想的影响(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必须努力使日益广大的群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

马克思很早就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就是说的正确的思想

对于客观世界的积极的改造的能动作用。正确的思想之所以能发挥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首先是由于这种思想正确反映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然后我们应用这些思想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通过群众的斗争，就能发挥强大的改造世界的作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固然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任意创造或消灭任何一个客观规律，但我们一旦认识了这些规律之后，就能利用这些规律来进行改变世界的巨大活动，就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作用。

磨擦生火的实践在原始人类中早已在进行了，这个实践经验被近代科学加以概括，在人的思想中作为能量转化和能量守恒的规律反映出来，人们把这个认识应用到近代工业生产中，就使生产力在各方面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毛泽东选集》四四六页）这就是对于人的意识的主观方面的积极能动性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马克思所说的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就是说人的意识，哪怕是最正确的意识，它本身并不能直接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要使理论成为改造世界的力量，必须首先使它掌握群众，使它成为群众所掌握的武器。任何正确的科学的理论，如果它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或领导干部中间，它就是脱离实践的理论，就不可能发挥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主力。不通过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论改造自然——发展生产——或改造社会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进步的、正确的意识，对于客观世界所能发

挥作用的程度的大小，决定于它影响群众和发动群众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我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得到辉煌的胜利，自然是由于我们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正确思想的指导，但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之下发动了最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不论是生产方面的发展，也不论是三大改造的迅速实现，都是掌握了正确意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没有科学思想指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的高度的发挥，决不可能有这些成就。

第六章 认识过程的辩证规律性

一 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

一切唯物主义者都肯定人的认识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反映。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都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他们不了解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事物的区别，不了解人的认识是在社会的、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他们把认识看做是离开了社会实践，离开了历史发展过程的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外界事物的纯消极的反映。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世界上偶然出现了一个“先知先觉”的人物，就可以正确地洞察到一切事物的真理；真理的认识好象不是通过历史的实践过程有规律地发展起来的，而是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一下子发现的。因此他们仅仅在基本上正确地肯定了认识的来源是客观事

物，却不能理解认识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或者说，他们只能说明什么是错误的认识和什么是正确的认识，却不能理解人的认识为什么会发生错误以及正确的认识是怎样获得的；他们能肯定人应该使自己的主观意识正确地去反映客观事物，肯定人们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但却不能理解人的认识要怎样——要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由于他们不能理解人的认识是在人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个规律性，因此他们虽然知道应该避免错误，避免主观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应该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但却不能完全解决如何避免错误、避免主观主义，如何克服唯心主义和如何保证使我们的思想能够经常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也就是保证我们的认识能够经常地具有客观真理性的问题。

应该注意，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关于实践或“行”的问题倒常常被唯心主义哲学所提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批判了以前唯物主义者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接着就说：“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他的这段话就是指的上述的情形。马克思又指出，唯心论虽然常常提起实践的问题，但它们当然是不能正确地解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因为，第一，唯心主义者根本不知道实践这个概念的真正的内容。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唯心论那里，“能动的方面”“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例如当中国的唯心主义者使用“践履笃行”这一类字眼的时候，是把它抽象地解释成各个个人为了实现某种思想或道德原则而进行的自由活动，这种解释和真正的现实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是毫不相干的。第二，唯心主

义者的上述观点使他们在解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时候，也陷于完全颠倒的看法。对于唯心主义者来说，人们似乎并不是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而仅仅是为了实现某种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才来进行实践活动。从康德直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都是这样的。中国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的说法，反对朱子的知先行后的明显的唯心主义观点。但他的所谓“合一”，是这样安排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很明白，这是把“知”放在更根本的地位上来和“行”加以“合一”，这仍然是把“行”仅仅看作“知”的体现，和辩证唯物主义者的理解——人在实践行动中认识客观世界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现代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如实用主义之类，也标榜着好象是重视实践的，但是它们是把实践曲解作各个人的盲目冒险活动，特别重要的是，他们不承认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可以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正确知识，他们把任何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都硬说成仅仅是对于人的主观的要求有用的方便工具。

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唯物主义者也不是绝对没有人注意到实践的问题的。有一些个别的唯物主义者，例如中国的孙中山，在他们的思想中曾接触到知对行的依赖关系，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他说：“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这比起中国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对于知行关系的看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孙中山基本上是一位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唯物主义只局限于对自然界的理解范围之内，他对于人类历史的理解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他仍然不能真正了解人类社会实践的现实内容是什么东西。他所论到的“行”，只是指的抽象的个人活动，有时也看成是个人的冒险行动。

特别是他把广大劳动人民的行动都看做是“不知而行”的盲目行动,把人民看做“不知不觉”的“阿斗”,在哲学观点上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历史的作用,忽视了人民群众在他们的创造历史的实际行动中能够提供极丰富的感性认识即经验知识,对于人类认识的发展起着首创和推动的作用。这些观点就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因素,这个方面曾被国民党反动集团利用和夸大起来,作为他们的法西斯思想的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方面克服了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即把认识看做是不需要通过实践的、主观对客观是直接反映——,把人的认识和人类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到社会生活的研究方面,因此也就克服了唯心主义对于人的活动的抽象的了解,指出了什么是作为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社会实践的具体内容。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生产是最基本的实践,它本身包含着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对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来人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以及对于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认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获得,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除生产活动之外,人类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实践的形式,如阶级斗争、政治生活和科学艺术活动等等。其中,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对于人们的认识尤其有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显著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毛泽东同志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

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论》)

人类的社会实践又可以归结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和改造社会的实践,在这两种实践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人类知识,也可以归结为自然的知识和社会的知识,而哲学知识则是这两种知识的综合。毛泽东同志说:“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行动(实践)在先还是理性原则(思想、知识、科学原理等)在先?唯物主义的观点是,行动在先,实践在先,人民群众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的创造活动在先,理性原则,科学原理,思想,知识,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实践产生理论,因此,如果人民群众的实践中间出现了现有的科学原理和知识等所不能说明的事物,那就必须依据新的实践来重新检查和修改或发展这些科学原理和知识。但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却和这相反,它认为不是行动在先,而是理性原则在先,实践只是现成的理性原理的体现,而现成的原理、知识,是一切实践行动不可逾越的根据。因此,如果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出现了现有的科学原理所不能说明的事物,那末唯心主义者就要根据现有的原理知识,对这些实践行动提出指摘,说这是不应该有的。

和唯心主义相反,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颠倒地把某种精神原理看做人的行动的基础,而是反过来把人的实践行动看做人的认识

的基础，它指出人的认识是随着他们社会实践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而一步步地向前发展的过程，即由不知到知，由知的较低级阶段到较高级阶段的反映客观实在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把认识过程看做是一种辩证的运动过程。列宁说：辩证法“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不了解这个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的认识运动过程，因此他们只是肯定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即物质是第一性的和精神是第二性的这个原理，或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这个原理，但不能理解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因此也就不能解决如何保证使主观经常正确地反映客观的问题，如何避免错误和获得正确认识的方法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研究认识的辩证法运动的规律。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的理论。”（《实践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论到如何认识战争规律时，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又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里，毛泽东同志驳斥那种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的思想时，说：“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这一切都不外是说，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就一定不要离开实践，才有可能达到目的。认识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又为实践的目的服务，并且在实践中受到检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判定认识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这就是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的基本原理。

和唯心主义相反，辩证唯物主义不把实践看做各个个人的孤立的行动，而是看做人们的社会行动，首先是看做人民群众的行动，特别是劳动人民群众的行动。劳动人民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生产——的主体，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行动的主体，因此他们的斗争行动对于人类的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起着首创的作用和根本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实践经验是人们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最初的源泉。自然，他们的经验是分散的，没有系统的，是在基本上属于感性阶段的认识，需要有人进一步加以综合、提炼，才能成为有系统的知识。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经验是一切认识，包括各种科学知识的最根本的来源。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和社会斗争经验，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不可能产生。因此，从最后根源上来说，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只是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经验的总结。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决不能把人民看做“不知不觉”的“阿斗”，而应该把他们看做我们寻找新的知识的第一个先生。一切做科学研究工作和革命领导工作的人都必须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有可能反过来再做群众的先生。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认识方法，正是基于这一个认识依赖于实践的根本原理的。

二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人的认识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发生和发展呢？在实践过程中，

人们首先获得对于周围事物的感性认识,然后认识再进一步发展,上升为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即感觉印象阶段。感性认识包含着感觉、知觉、表象等等的形式,感觉是外界事物直接刺激感觉器官所引起的印象。知觉,这是指当前的某种感觉印象和过去的感觉的记忆结合起来,构成对于某一具体事物的特点的认识,如听见某人的声音即同时想起他的面貌形状等。表象,这是指我们综合过去的各种感觉印象来在自己的头脑中构成对于某些事物及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一切生物都有不同程度的感觉能力,最低级的生物的感觉能力,即是对外界直接刺激的有利有害加以区别的能力。知觉和表象,只是在具有中枢神经并能形成条件反射的动物中才能够获得的能力。人的感性认识比一般动物的感性认识复杂,并且也有质的不同,但总的来说,感性认识是人用感觉印象的形式来反映外界事物的一种认识作用。

感性认识既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因此这种认识形式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的感性认识,只是对于事物外部联系的感觉印象,即只能反映事物的表面的局部的现象,而不能更深入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和内部联系。不可知论者夸大了感性认识的这个局限性,把感性认识看做人们意识中的纯主观的感觉形式,硬说这种主观形式和外界事物之间存在着不可超越的鸿沟,丝毫不能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客观特性。唯物主义者对于这种谬论曾从各方面加以驳斥。费尔巴哈曾很机智地论证人的表象虽然与所表象的对象有所区别,但在实际上终归是后者的反映,他说:“盐味是盐的客观特性的主观表现”。唯物主义者狄慈根,反驳了那种把感觉现象和物质本身的差别看做不可超越的差别的谬论,说:“自在

世界’和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即世界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差别,不过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而已。”(以上转引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三节)这就是说,感性认识虽然不能把握事物的全体,但仍能反映事物的局部的客观特性。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把不可知论的谬论驳斥得最彻底的,“乃是实践,即实验与工业。既然我们能够用亲自制造出自然界某一现象、依这现象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事实,来证明我们对于这现象理解的正确,那么,康德所说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序言里,恩格斯还引用了一句成语说:“布丁的证明就是吃。”

唯物主义肯定感性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感性认识所反映的事物内容和事物本身并不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在感性认识的形式里,人们“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而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实践论》)。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必须在认识继续前进的过程中,事物的内容在人的感觉印象的形式里反复多次地反映之后,由认识的量的积累进到质的突变,即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更重要的阶段,它已不是用感觉印象的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而是用概念或思维的形式。概念的作用就在于它能使我们在认识上把握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概括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全部现状和它的历史的基本内容)。概念和感觉印象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把事物的具体的、生动的、同时又只是表面的现象反映到我们的意识里,

而概念的认识则能够撇开现象的表面的复杂内容，抽出其中最基本的东西或贯串全体的本质的东西。比起感性认识来，它带有抽象的然而同时又是在认识上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性质。例如我们从感性认识上对于人类可以获得一些普通的感觉印象，如具有五官四肢、能言语、能思想等等。但不能从这些感觉印象直接把握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的阶级的，或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这只能依靠理性认识来加以理解，而这种理解是要从多量的丰富的关于人的感性认识中加以抽象、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的研究中加以抽象，才能获得的。又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前，有许多人到农村去，对农民的情况得到了许多感性认识，他们的感觉印象是生动的、复杂的，但这并没有使他们认识到农村情况的本质。农村情况的本质是：农民一定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下迅速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的“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这个本质方面的认识，是不能直接在片面的感觉印象中把握到的（因为三户贫农在农村中最初好象只是少数，只从表面印象上来看，似乎并不是很重要的），而只能从复杂的感覺印象中，通过我们的理性的思索，分析这些现象的原因，把握到某些重要现象之所以一定要出现和一定要发展起来的必然性（如三户贫农的方向一定要得到贯彻的必然性），这样，进一步地深入地去抽出它的最根本的东西，造成理性的概念，才能把握得到。通过一系列的概念来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就是思维活动。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认识过程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人们必须首先在实践中获得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必须积累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然后才有可能使感性认识

上升到理性认识。人们可以利用别人的间接经验来帮助自己认识事物,但一切知识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在感性认识中从来没有为人认识过的东西,在理性认识中也不可能认识到。没有任何革命经验或革命经验很少的人,要想真正完全了解或充分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不可能的。即使有革命经验的人,在学理论的时候如果不联系自己的经验以及党的政策实践,也不可能很好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指出认识必须开始于感性的经验,认为理性认识可以不经过感性认识就能直接被人所把握的观点,这是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的倾向。十七世纪欧洲大陆的“唯理派”哲学家,否认感性认识的实在性,主张人们可以依靠思维的活动直接认识事物的真理,这些“唯理派”哲学中虽然也有斯宾诺莎那样的唯物主义者,但在割断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联系这一点上是离开了唯物主义的。中国的王阳明否认认识应该从周围事物的观察中获得,主张人们可以凭着所谓生来的内心的“良知”直接把握真理,这是最明显的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的典型。教条主义之所以成为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倾向,就是由于它轻视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感性经验,妄想单单凭着一些从书本上片断地摘取出来的抽象的普遍原理就来直接解决实际问题的缘故。教条主义者由于迷信现成的书本知识,常常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的事物熟视无睹,甚至对于明明已摆在眼前的事物现象,也会悍然以书本上找不到根据为理由,而采取怀疑、否定的态度。

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应该坚决相信,感性认识是外界事物的反映,并且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感性认识是可靠的,认识只要停止于感性认识的阶段就够了。感性认

识是表面的、片面的，它不能更深刻地反映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概括事物的全体，不能使我们获得通观全局的能力和预见事物的发展远景的能力。要使我们的认识能够深刻地反映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概括事物的全体，要获得通观事物全体和预见事物发展远景的能力，必须依靠理性认识，依靠思维活动，依靠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来的各种概念，和运用概念所进行的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过程。列宁论到人的思维中的抽象概念的重要作用时，曾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哲学笔记》一九五六年版一五五页）毛泽东同志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这一切都说明，人的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而不应该停顿在感性认识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同上）十七世纪英国“经验派”的唯物主义者，只承认感觉经验在认识上的可靠性，而对于理性认识，却以为概念仅只是纯粹的名词，不了解概念的内容是贯串事物全体的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反映。经验派这一个弱点，后来就被哲学上的反动派所利用，他们一方面把感性经验看做人的纯主观的形式，否认它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把理性概念当做纯粹的空名词，于是就把经验派的认识论发展成为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十八世纪的贝克莱、休谟、康德，都是把哲学引向这一条路线的代表人，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出现了所谓“实证论”和“新实证论”的哲学派别，其中有法国

的孔德主义，奥国的马赫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英国的逻辑实证论等等，都是走的这一条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路线。并且，这些哲学派别还以“尊重经验”、“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等等的好听的话作为标榜，狡猾地给自己装上了科学的假面具，在知识界起了很大的蒙混欺骗的作用。

理性认识是人类的头脑所特有的认识能力，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所产生的主要的意识现象。人类的思维活动必须借助于语言，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或思维的直接现实。大脑神经组织中的第二信号系统就是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专司语言和思维活动的生理器官。理性概念就是通过许多的语言单位——词汇表现出来的，所以从形式上说，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名词。经验派的错误，就在于仅仅只注意到概念的形式，因此就以为概念只是名词。它们没有注意到更重要的是这形式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概念的内容是对于事物的更深的本质和贯串事物全体的事物内部联系的概括的反映。人们把这些内容用语言的词汇、名词作为标帜（或作为“信号”）而表现出来，这就是概念的形式。当我们谈到某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主要的是要领会它的内容，领会在它的名词标帜之下所反映的比感性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的客观实在的内容，而不能把名词看做主要地只是名词。我们常说我们和反动派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意思主要地并不是说我们和他们在说话的时候不使用同样的名词，这意思是说我们和他们即使在使用同一名词的时候，我们和他们之间对于这名词所赋予的内容、意义常有根本的不同。例如同样使用“自由”这个名词，资产阶级指的是他们少数人的自由，而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则强调广大人民的自由，特别是工人农民的自由。所以，概念，科学的抽象，决不仅

仅是名词，而是比感性认识更高级的认识作用。只有把认识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只有对事物把握住正确的概念，并且依据这些概念正确地进行判断和推理的思维活动，才可以在认识上避免观察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才能通观事物的全体，了解事物的内部规律性，预见事物的发展趋势，才能为我们的实践活动指出明确的方向，才可能正确地规定行动的目的和计划。经验主义者之所以成为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就是由于他们满足于一些直接的经验知识，甚至于仅仅满足于个人的狭隘经验知识，不能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阶段，只看见事物的表面现象，看不到事物的内部联系，把片面看做全体，把现象当成本质，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因此在处理实际工作的时候就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存在发生分裂，在实际上也就是把主观放在第一的地位，而忽视了客观事物的存在，这样就不能不使行动走到错误的方向去。毛泽东同志批评经验主义者说：“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实践论》）

这样，认识的过程，由物质到意识的反映过程，由不知到知的过程，是通过人的社会实践，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过程。没有感性经验就没有任何认识来源，不使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不能深刻地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统一而不可分的，这个统一的过程是以实践为基础，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加以分裂，只注意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或者使认识和实践脱离，都有走到主观主义的错误道路上的危险。

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上的质的飞跃，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这样说明这个质的飞跃过程：“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里指出要达到理性认识，必须使感性认识（感觉印象）由量的积累——反复多次，进到质的飞跃。这就是说，首先要有丰富的感觉印象，然后才有可能上升到概念、判断、推理等一系列的理性思维。同时理性认识又不是感性认识的简单的积累，要达到理性认识，除了首先要积累一定的丰富的感觉印象材料之外，还必须把这些材料在头脑里经过一番思想上的加工，这就是《实践论》里所说的“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如果不善于应用这一个改造制作的工夫，那末即使有了一大堆的感觉印象，仍然不能获得反映事物全体，反映事物本质，反映事物内部规律性的理性认识。有些人做调查工作，只会记录大堆的材料，不能从材料中作出主要的结论。有些人一生经历很多，谈起话来能够讲很多具体的故事，但却说不出任何能够贯串自己的全部经历的中心问题。这都是由于不能够对感性认识进行上述改造制作工夫使之上升为概念的表现。有了调查的材料，有了实践的经历，如果不能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改造的工夫，就不能不使认识停顿在感觉经验的阶段，不能够把握到事实材料中的本质的东西和主流的东西，不能够把握到事情的正确概

念，就不可避免地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所以，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但又必须把感性认识加以改造才能获得。理性认识之所以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是因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通过现象，通过人的感觉印象才会暴露在外部，才会暴露到人的认识过程中。理性认识之所以必须要对感性认识进行改造制作工夫才能获得，是因为事物的外部现象，事物给与我们的感觉印象是十分复杂的，它不是直接地暴露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而只是间接地与各种复杂的外部现象混杂地暴露着事物的内部联系，它不会把本质的东西纯粹地暴露出来，而是混杂着各种非本质的东西暴露出来。所以要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本质的东西，要使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必须把感性认识的丰富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必须把其中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加以区别，把其中重要的、典型的東西和次要的、非典型的東西加以区别，必须研究各方面现象彼此的联系，把表面的联系和更

境和生产的条件——如中国人口众多,时有天灾,等等;农民和共产党的关系、农民各阶层的关系,等等),研究农民中为什么又有人对于合作化运动要有动摇甚至于反对的倾向(如富裕中农就是这样),以及研究农民各阶层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研究各方面的联系,这样就能从理论上确定农民群众是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的,这样就把握着了事物中的本质的东西,就把握了正确的概念,由此也才能够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推理,才能建立起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正确的理论。经验主义之所以产生错误,就是由于这种思想方法只就局部的经验简单概括起来,就要作出全面的结论,而不把各方面的经验现象综合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例如只抓着富裕中农对合作化动摇的倾向,就归纳出合作化不可能的结论。只根据过去农民种麦的经验,就简单归结出小麦不能高产的结论等等。

感性认识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直接的感觉经验。要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的材料,必须对于所要考察研究的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工作。但感性认识的最丰富的源泉,是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千百万人民的眼睛所观察到的现象,比任何聪明杰出的个人孤立地观察到的东西总是更丰富得不可比拟的。所以,任何人要想对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要想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材料,作为把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的基础,就必须联系群众,通过群众的眼睛,来扩大个人的眼睛的狭小的视野。一切革命的实际工作的领导者以及科学研究工作者要想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做好,必须善于倾听广大人民的实践的声音,尤其要注意在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时期他们的实践斗争中所作出的新的创造发明。就历史发展的总的情形来说,自然科学无非是广大人民的生产经验

(对自然界斗争的经验)的总结(即使常常是间接地,但归根到底它是反映了人民生产的实践),社会科学知识无非就是人民的社会斗争经验的总结。毛主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普遍真理,总结了我国工人阶级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长期经验,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和革命领导工作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指出一切正确的领导在认识方法上都必须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原则。这个原则的基本内容,就是:“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群众路线的这些原则,是一切实际工作中为了保持正确领导,也就是为了保证领导方面能够经常把握正确的思想,避免错误的思想指导所必须遵守的根本的认识原则。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一切科学的研究也必须遵守这个原则。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一方面,正确的领导思想必须是群众的意见的集中,领导者如果犯了官僚主义毛病,在认识上脱离群众,只凭自己的主观独断一切,一定不能把握正确的指导思想,相反地一定要发生错误的指导。另一方面,集中群众意见,并不等于完全消极地听从任何一部分群众意见,而是要把群众的分散无系统的意见“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在这里,群众路线和尾巴主义是有原则的区别的。在过去革命工作中,曾有过这样的人,他们以为群众路线就是“群众

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这自然是错误的，这是把尾巴主义误认为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里这样说：“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我们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用哲学的认识论的术语来说，那么，多数的无系统的群众的意见，基本上是属于感性认识的范畴（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群众的意见中，也有经过研究思考的、多少有综合性的，较成熟的，也就是具有理性认识的因素的见解）；领导者正确地总结和集中起来的系统的意见，是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要把群众意见集中为领导者的指导意见，也必须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群众意见是群众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群众由于它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主要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不同），而分为各种各样的阶级和阶层（如农民中包含着贫农和下中农、一般中农、富裕中农等阶层），他们的意见，反映着他们的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地位，也可能会反映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影响——如农民群众的意见会反映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在群众中必然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并且必然要有各种相反的意见。群众的意见终究是第二性的东西，他们的意见所反映的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才是第一性的东西。他们的意见只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而不是最后的根源。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才是人的认识（包括群众意见和领导的思想）的最后根源。因此，领导者一方面必须集中群众意见，但这决不是说要消极

地简单地反映群众意见，而是，另一方面，必须善于把大量的群众意见加以“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研究各种群众意见所反映的不同的社会物质条件，依据他们的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地位来辨别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哪些意见是错误的（如在土改、合作化运动中，贫农下中农的意见常常是比富裕中农的意见更正确些），哪些意见是成熟的，哪些意见是不成熟的（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来研究群众的意见），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对错误的意见加以批判，把不成熟的意见加以整理，使之成为成熟的，这样才能把分散无系统的群众意见变为集中的有系统的正确的领导意见。只有对群众的意见经过这样一番改造制作工夫，把基本上属于感性认识范畴的意见提高到理性认识的范畴，才能把它再拿“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

这些就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的要点。

三 理论和实践

前面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由感觉到达于思维，这意思决不是说，认识的运动到了理性认识阶段就完结了。认识的任务之所以在于要达到理性的认识，只是由于理性认识能够给我们以通观事物全体和为实践行动指出正确方向的力量。人们决不是仅仅为认识而认识，而是为了实践才要认识的。因此，人们通过实践而对于事物获得了理性认识之后，就必须把这些认识运用来指导实践，否则认识就是毫无意义的。人的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两个步

骤：首先是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然后又由理性认识再一次能动地飞跃到实践。实践不是认识过程的终止，而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实践论》），是使理性认识受到检验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论到执行军事计划的问题时，说：“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把作为认识过程之继续的实践放在比理论更高的地位上来看待的。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而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哲学笔记》二〇一页）

实践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感性认识，也必须通过实践才能使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才能获得理论知识。当理性认识再向实践飞跃时，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发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用理论指导实践；第二，在实践中检查理论；第三，在实践中使理论继续向前发展。现在就这三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第一，不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行动中的盲目性和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什么叫做行动中的盲目性？盲目性就是不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不能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定出正确的行动方针、方案、办法和计划，就是主观方面的方针、方案、办法、计划等不适合于客观的情况，就是主观和客观分裂。实践是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斗争和各种社会的斗争，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指导行动的主观方面的方针、方案、办法、计划等不适合于

客观情况，不是依据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不随着客观事物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我们的行动就要发生错误，我们的斗争就有陷于失败的危险。要避免行动的 error 和失败的危险，就必须努力克服行动中的主观盲目性，也就是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

为什么有了理论的指导就能避免实践行动中的盲目性？因为只有理论，只有正确的科学的理论，而不是错误的理论，才能够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才能使我们认清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预见事变发展的趋势。只有依据正确的科学理论，才能够为我们的行动定出符合于事物发展方向和事变发展趋势的正确的方针、方案、办法、计划等。这种在正确理论指导之下的行动就是有了清醒的头脑指导的行动，就不是盲目的行动，就是具有自觉性的行动。只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使我们的行动从领导方面到群众方面都具有高度自觉性，才能保证我们在实践中克服一切困难，使我们不论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其他各种斗争中都能获得胜利。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自发论”的思想，因为“自发论”的错误就在于否认工人阶级运动中的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就在于不了解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要陷于盲目状态，并因此就有走向失败的危险。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就说明了理论对于实践是如何的重要。我们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彻底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农村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就是由于我们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遵循的政策路线，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正确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缘故。经验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了解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妄以为单凭个人的局部经验就可能解决一切问题,结果就使行动陷于盲目性并把它引到“碰壁”的地步。

第二,并不是任何一种“理论”都能够对于实践起应有的指导的作用。能够起这种指导作用的,只有与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着的正确的科学的理论。理论也有错误的,也有部分错误的,依据这样的一些理论来制定的行动的方针、方案、办法、计划就可能也是完全错误的,部分错误的。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我们的行动虽然好象有了理论的指导,在实际上仍然是全然处在或部分地处在主观盲目性的状态中,仍然没有解决或在某些方面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互相分裂的问题,仍然是主观主义的,或在某些问题上主观主义的。要避免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主观盲目性,就必须进一步注意到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首先在运用理论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要注意依据实践的经验来检查理论的正确性。即“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实践论》)如果实践的经验证明理论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就应该把理论原理连带依据它所规定出来的一切方针、方案、办法、计划等毫不可惜的全部加以改正;如果理论是部分错误的,就应该部分地加以改正;如果理论原理只适合于一般的情况而不能概括当前客观事物的某些特点,就应该根据情况作出某些必要的具体的补充;总之,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使我们的理论、思想、方针、方案、办法、计划等等尽可能完全地适合于客观事物的具体情况。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理论原则的正确与否，不能完全由理论本身来证明，而必须由实践来作最后的证实。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烦琐哲学的问题。”即使是科学的原理，在没有得到实践的最后证明之前，也只能暂时称为假设，科学的假设是人的思维走向客观真理的必要的步骤，但假设还不能被最后确定为客观真理，只有经过实践的证明，在实践中经过多次反复的检验、修正或补充之后，才能使假设成为确定不移的公理。另一方面，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是具体多样的。一般的理论原理，即使已由实践证明了它的客观的真理性，但也只能反映事物的一般的规律性。这些基本的规律知识在我们的实践的指导上具有一般的正确性，也就是可以为实践指出一般的方向，但并不就能够解决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具体问题。要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只能在一般的理论的指导之下，密切地注意实践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事物的特殊的规律性，依据不同的特殊的规律性采取不同的具体解决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我们善于把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这个道理，以为只要抓着几条一般的理论原理，就可以直接解决一切具体实践问题，而不注意实践过程中事物的特殊的规律性。这样他们就使自己的主观思想仍然和客观事物处于分裂状态，因而就陷入主观主义的泥坑。

第三，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要暴露出许多的新的方面和新的规律性。人们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实践来不断地

揭露这些新的方面和新的规律性。这就是说，理性的认识不应该长久停顿在一点上，而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全部科学的发展史，说明科学的理论知识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更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列宁依据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造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性，并总结了这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在这时候，列宁不怕抛弃某些过时的个别的原理原则，用一些新的原理原则来代替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认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首先是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实践斗争，就一定要犯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但是，任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个国家、各个革命发展时期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它的普遍真理在表现形式上以及各个方面的原理原则上得到具体的发挥和发展。不注意依据具体实践来发挥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死抱着书上的某些现成的词句或个别原理原则，任何情况下也不肯加以改变，这是教条主义者走向错误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结果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贡献了许多新的原理。例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理论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逐步走向全国胜利的原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逐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原理等等。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

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上述原理的很好的说明。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这是人们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一具体过程时所必须通过的全部认识过程。但是，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之后，认识运动虽告一段落，却并不由此就最后终结。在实践继续前进的过程中，人们又获得新的感性认识，也就是说，又开始新的认识运动过程。事物的新的方面，新的规律性，又通过由感性认识的积累到上升为理性认识，而反映为某些新的原理原则，这些原理原则又再通过实践的检验而被确定为具有客观真理性的知识。科学的理论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反复的认识运动而不断向前发展的。毛泽东同志对于人类认识的全部辩证运动过程作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总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

四 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上面我们已几次提到人的认识的真理性问题。革命实践和科学研究在认识上的任务就是要我们正确地把握客观真理和避免错误，所以真理的问题是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些专门的研究。哲学史上关于真理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两

个问题：第一，真理是否具有客观性，即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第二，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给与肯定的回答：肯定真理是具有客观性的，肯定我们的认识能够把握客观真理。我们说真理具有客观性，就是说它包含着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内容。辩证唯物主义既然指出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那么，它所反映的内容，自然是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它之前，早就作为不依赖于主体或人类意识的客观实在而存在了。真理就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正确的反映。要辨别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它的内容是否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相符合；能够符合的就是真理，不能符合的就是错误。所以真理只能是客观真理，没有什么主观真理。

但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也就是否认是非的客观标准，把是非的标准完全看做主观的。古代希腊哲学史中的普洛太哥拉斯曾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明朝的王阳明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的关于认识论的言论中，就有着把是非的标准归结到主观方面的思想。例如他说：“夫学贵及之于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在中国封建时代，对孔子的言论也敢于说到要依据自己的内心来衡量衡量，这里自然包含着一些积极的因素，但重要的是，他把衡量真理的标准归结为人的内心，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荒谬的真理观。在实际生活中（主要是在剥削阶级的人们中）我们往往遇到这样一种狂妄地固执己见的人，他常常说：“我认为怎样就是怎样！”他们就是在

实际生活中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现代资产阶级的腐朽的唯心主义哲学，硬把真理说成是纯主观的东西。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说真理是人的“经验的组织形态”。实用主义者说真理只是对于人有用的假设，“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胡适）。现代的主观唯心主义所以要伪造这样的真理观，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着要把真理与虚构，知识与信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界限加以搅乱，以便把人们的思想引向迷途，为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主观唯心主义者的真理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其错误就在于把人的主观或“心”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过分夸大了。要学会善于辨别真理和错误，或善于辨别是非，必须通过主观的思维活动或内心的活动，必须善于独立思考，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叫做“求之于心”。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人的主观或“心”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并不是直接就能作为辨别是非的标准。我们重视独立思考，重视求之于心，即重视思维的作用，只是为着要能够认真地应用自己的心思去考察某种认识是否符合于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主观、思考、思维、“内心”的作用只是一个媒介，一个工具，人们通过这个媒介和工具来求得客观真理；真理的是非标准最后是客观实践。唯心主义者把人们用以考察真理标准的思想工具误认为真理标准的本身。这就是它的错误的根源。

主观唯心主义者所虚构的这种真理观，同时也就是纯粹相对主义的真理观。既然不承认是非有任何客观标准，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承认有任何绝对真理的存在。因为在他们看来，真伪、是非的标准既然是主观的，那就无异是说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真理；不同的人在同一时候对于同一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每一个人的意见对于

他自己来说都是真理。真理竟好象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是完全相对的，没有任何绝对性的。中国明朝李卓吾是一个反对传统儒学、反对封建腐朽制度的思想家，但他在真理问题上有着这种纯粹相对主义的真理观的很明显的思想因素，他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悖矣。……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胡适的相对主义的真理观更为露骨，他认为真理只是对于人“有用的假设”，认为它“有用”到什么程度，就真到什么程度。如果真象实用主义者胡适所说的那样，所谓“有用的假设”就是真理，那么，各人都可以对同一件事按照自己不同的利益作出不同的假设，并各自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真理”了。照这样说，那末，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关于世界上只有雅利安人是唯一优秀人种的胡说，也算是“真理”了。帝国主义者把自己的侵略行为硬说成是自卫行为的澜调，也算是“真理”了，因为这些对于他们都是“有用”的。所以，在他们这些唯心主义者的眼里，真理也是根本没有任何绝对性，而是完全相对的。现代的主观唯心主义主张所谓“多元”的真理观，就是指的这一种纯粹相对主义观点。意思就是说真理不只是一个，真理因人而异，因此即使是在同一时间、地点、条件之下，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也可以有许多个“真理”。这种所谓真理观的反动性质，它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性质，是很明显的。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否认有所谓的主观真理，因此也否认纯粹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即主张同一条件下的同一事物因人因时不同而可以有不同的真理的观点。凡是具有真理性的知识，它之作为某种客观事物的某些过程或某些方面情况的多少

正确的反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必须加以承认，不能因人因时而有不同的。就这一点来说，凡是真理，都具有它的绝对性。真理只有一个，真理不是“多元”的。自然，世界的反动派人物对于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是不肯承认的，他们硬要说他们的一套违反世界发展规律的谬论才是真理，但这只是说他们在主观上自以为那是真理，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谬论真的就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只是他们的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事实上，人们把自己的认识主观地当做真理是一回事，他的认识是否真的具有客观真理性又是一回事。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真理观把这两回事混淆成一回事，把那些人们自以为是真理而实际上是谬误的认识也硬说成是真理，这就是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真理观的错误来源。

自然，我们也应该承认，人的认识，有着因人因时而变化的情形，但那只是由于以下的原因，即或者是由于：这些知识虽然有客观真理性，但原来是不够的，而另外的人在另外的时候加以补充、发展了；或者是由于：某些知识只能反映事物发展的某一过程，某一阶段或某些方面，等到过程发生了变化，或过程在阶段上发生了变化，或者过程又暴露了某些新的方面，这时人们就要用新的认识去代替旧的认识，而放弃与变化了的情况不相适应的知识；或者是由于：这种知识有一部分或甚至于全部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另外的人在另外的时候出来纠正了这些谬误。但是，尽管有这些情形，某一项认识如果具有客观真理性，那么它之作为客观事物的一定过程、一定阶段或一定方面的客观情况的反映这一点，就有着绝对性。物质的客观存在的绝对性就是真理的绝对性的根据。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所指的这种真理的绝对性，决不能作这样

的解释,即好象人的认识能够一下子就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把握到全部客观真理,而不是近似地、相对地、在认识发展过程中日益接近地去把握它。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就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世界的发展过程是无限的,客观事物的多种多样性也是无限的,人们又只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把握这样一个无限的绝对世界,因此决不可能一下就完全地达到把握全部客观真理的目的,而只能通过不断向前发展的实践活动,日益接近完全地去加以把握。这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我们对于客观的绝对世界的认识,都要受到这个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到客观事物本身发展条件和我们的实践条件的限制,都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消灭和共产主义必然出现的普遍真理,但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也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更具体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灭亡前夜——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殊规律性。只有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的列宁,才把握了这些规律。这样,一方面由于真理具有客观性,因此也就具有绝对性,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总是要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真理又是相对的。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或者说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对立的统一,反对片面地把一个方面过分夸张而抹煞另一方面。但是,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首先注意到,辩证唯物主义在使用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这两个名词的时候,所指的意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解并不是一样的。这里还要再进一步加以解释。

辩证唯物主义说到相对真理或真理的相对性时，不是如主观唯心主义那样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标准和是非之间的任何界限，而只是说人对于客观事物的真理的认识能力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只能在自己的实践发展过程中来认识不断发展的客观的绝对世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客观世界发展过程的内容在人们面前所能够暴露的程度有一定限制，同时人们的实践的地位——生产发展的规模，阶级立场等——对于人们把握客观事物过程的能力，也给与一定的限制。这些就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说明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世界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能一次地完全地绝对地把握客观真理，也就是不能一次就把握全部绝对真理。但是，人们在每一时期虽然只能把握相对的真理，这个相对真理在此时此地却一定具有它的客观正确性，它和错误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有着明白的界限，这一点仍然是确定不移的。如果说是非的界限也可以改变，那只是说当历史条件变化了的时候，客观事物本身的情况也有了变化，因此人们的认识也得要有所改变。至于说到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认识一定事物时，那么，这个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就有着一定的客观的绝对标准，是与非就有着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绝对标准，决不能说真理可以是因人而异的。例如说中国人民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不能因人而异的。因此我们说的相对真理的本身，就包含着绝对真理的因素。

辩证唯物主义说到绝对真理或真理的绝对性时，并不是如形而上学者所谓的一次就能完全地、绝对地把握到客观世界的真理

的全部。这样的绝对真理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客观世界是永远不断地变化发展的无尽的长河，所以人对客观世界认识也只能是处在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说到绝对真理时，就是指人们对于这个无限地发展着的绝对世界的无限地发展着的认识过程。这样的绝对真理是存在的，因为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使自己的认识日益全面、日益深入、日益接近完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是绝对无可怀疑的。人们通过实践所获得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的每一次新的认识，都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某些新的方面的反映，都使自己在把握世界客观真理方面更前进一步，这也是绝对的。

根据以上所说，就可以知道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两个东西，而是人们认识客观真理的发展过程的统一两个方面。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每一次获得的真理的认识，都是有历史条件限制的。从这一方面说，真理只能是相对的。但是每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正确的反映，所以每一个相对真理都使我们把握到绝对真理的一粒，都是向完全的绝对真理的进一步接近。这就是说，相对真理中包含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不能够一次地完全地把握到的，而只能在认识的无限发展过程中无限地去加以接近，只能通过一个个的相对真理的无限积累的过程加以接近，所以，绝对真理又可以看做是相对真理的无限数量积累的总和，绝对真理中又包括着相对真理。这就是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统一。

绝对的客观世界的一切本质和规律的。另一方面，这种真理观又告诉我们应该摒弃一切形而上学的那种妄想一次就穷尽世界绝对真理的空想，摒弃那种把某些现成的有限知识夸大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的谬想，要正视我们在实践中认识真理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任何时候也不要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不要把自己现有的有限知识误认做全部的绝对真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由于不了解这一点而造成错误的。教条主义把某些有限的书本上的原理原则误认做绝对真理，经验主义把人们的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都是由于用形而上学观点来看真理问题的结果。我们应该在任何时候也要不断地努力通过改变世界的实践，来不断地增长和提高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真理的认识的总的规律。

变革世界的实践过程首先是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在不断变革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就不断地一重一重地打破着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使我们的主观世界也不断地得到改造。认识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每打破一重，人类的主观认识能力和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关系就受到一次的改造，就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经过改造的主观世界反过来对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斗争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量。由原始公社到阶级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人们对于自然界获得了科学的认识，但由于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偏见以及生产规模的狭小等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很长时期中人类对于社会的认识始终是片面的，没有能够达到科学的水平，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的发展也还受到一定的阻碍。自从

出现了与大工业生产结合的，以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天生的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以后，障碍人类对于社会进行科学认识的阶级偏见这个历史条件限制在这个阶级身上才开始被打破了，对自然认识的历史条件限制也进一步更彻底地打破了。工人阶级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斗争过程中，同时对于人类的主观世界也进行巨大的改造工作，使人类在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认识都获得了空前巨大的进步。社会的腐旧势力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是要用他们的反动行动来进行抵抗的，例如地主阶级要反对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资产阶级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为着要配合和帮助他们的行动上的抵抗，他们还要用腐旧的思想影响来抵抗工人阶级对于人们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所以，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同时是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双重斗争，他们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要改造人的主观世界，通过这双重的改造斗争来实现工人阶级自己和全人类的解放。反动阶级在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过程中终归要被消灭，他们中间有些人被迫地接受对自己改造——从阶级地位到思想观点的根本改造。也有些阶级中的人们——如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上自觉地改造自己的道路。工人阶级是自觉地改造世界的力量，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知识的指导下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斗争来不断地改造自然界，通过社会斗争把阶级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自觉地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工人阶级自己的改造和其他阶级的改造有原则的不同，其他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逐步要被消灭的，所以他们的改造是阶级立场的根本改造。工人阶级则本身

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他们的改造是为着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克服其他阶级的思想影响，使自己的认识跟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前进，又不断地推动实践获得进一步的胜利。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和逐步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随着其他阶级的消灭，工人阶级也自然而然地要逐步失去其作为阶级的性质，它自己的主观世界也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一 唯物辩证法的总的特征及其研究对象

辩证唯物主义指明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无数的多种多样的事物相互有机地联系着、变化着和发展着。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地观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时，那么，在我们面前首先出现的是种种联系及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的图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一切都运动着，变化着，产生着和消失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的观点，是和辩证法的观点，即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分不开的。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同时也是辩证的统一性。世界的一切事物不是统一在固定不变的状态中，而是统一在一切事物的普遍的联系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可分割地密切联系着的同一个世界观的两方面。

辩证法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是相反的。形而上学把世界看做是无数固定不变的和各自孤立的事物堆积和凑合起来的总体，在这里，一切事物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并列，没有内在的有机的联系，事物在实质上是沒有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指出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这样来了解，即世界上的每一事物、现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和其他的事物、现象有着交互作用，它们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事物、现象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就构成每一事物、现象的具体的、历史的条件，规定着每一事物的具体的历史的特点。同样的事物、现象，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就会发生不同的特点。在我们观察任何事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它与其他事物的辩证的联系，如果我们采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孤立地来看它，那就不可能对这一事物获得正确的理解，就不能真正认识这一事物的意义。

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发展的观点，和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也是分不开的。当我们把事物之间的联系作深入一步的观察时，就会发现事物的联系决不是存在于静止状态中，而是存在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事物相互联系的一种状态，不断地推移到另一种状态，没有任何停顿不变的时候。在这中间，任何一事物都不是以固定不变的特性来和其他事物发生交互作用的；在和其他事物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自己本身就不断地在运动着、变化着和发展着，就由一种状态推移到另一种状态。为什么事物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特点，会表现不同的意义呢？首先就是因为历史条件变化的情形下，事物自身也变化着的缘故。事物

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新的东西的产生和旧的东西的消灭的过程；任何事物都要经历发生、发展和消灭的道路，并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要为新的事物所代替。如果我们观察事物的时候没有这种发展的观点，不注意事物在互相联系中的这种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如果我们按照形而上学的观点把任何一事物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那在认识上就一定要犯错误。

形而上学在形式上也不是完全否认发展的。不过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和辩证法的发展观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把发展归结为数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按照这种发展观来看，那末，事物在本质上是不会变化发展的，变化发展的只是事物的数量和位置，也就是说，只是一种外表的形式，只是一种走马灯式的循环运动，而没有事物本身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没有旧事物转化为新事物的质变过程。同时按照这样的发展观来说，既然运动只是外表形式上的循环运动，因此它的产生也就不可能是由于事物自身内部的原因引起的，发展的原因只能是在事物之外，归根结底只能是在物质之外——精神、主观等等。辩证法的发展观和这相反，把发展看做是事物的对立的统一，看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发展是事物和自己的对立方面互相联系互相斗争的过程，是事物自己本身转化为另外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方面，是由旧的事物转化为新的事物，这一事物转化为另一事物的过程。发展不只是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不是许多一成不变的事物之间的简单的循环运动，发展是事物本身的实质上的变化，而这变化的原因，就在事物本身的内部矛盾。这就是说，事物在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在自己内部产生出自己的对立方面或自己的否定因素，产生出新的因素，新的因素是具有着一定要生长起来的优越条件的，

它在发展过程中归根结底一定要形成为代替旧的事物而出现的新事物。

发展过程就是新的事物的产生和旧的事物的消灭过程。辩证法要求我们从发展的方面来观察问题,这样的观察方法,从根本上说来,就是要在各种事物和现象中间来辨别哪些东西在本质上是新生的东西,哪些是旧的、衰亡的东西,就是要培养我们对于新事物的敏锐的感觉,就是在观察某一事物的时候,要依据它所处的各种历史条件,来确定它在发展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是正在生长的呢?还是将要消灭的?我们所以要辨别什么是新生的东西和什么是将要消灭的东西,目的就是为着要把这种观察的结果应用到我们的实际行动中来,就是要使我们的实际行动和新生事物的发展方向求得一致,就是要在实践行动中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的东西的生长和促进旧的东西的消灭。

辩证法是关于事物(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联系和发展的最全面最深刻的学说。从相互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来观察事物,这就是辩证法的总的特点。但是,仅仅承认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还不一定就是辩证法的观点,因为形而上学也有它的发展观。必须把辩证法的发展观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严格地加以区别。在这里,要紧的是要进一步了解事物是如何联系和发展的,也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规律性。要学会正确地运用辩证法观点来观察问题,不是仅仅一般地承认一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就够了,要紧的是必须了解联系和发展的本质,它的普遍的规律,必须了解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一些什么样的秩序进行的。辩证法必须研究这样的规律。所以,辩证法又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反杜林论》人

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一四五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研究由自然、社会直到人类的思维的最基本的发展过程和最普遍的规律的学说, 唯物辩证法则着重在一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方面的研究。我们研究辩证法, 不仅要肯定它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说,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所包括的各项辩证的规律, 这些规律有三条, 即: 一, 矛盾规律——对立的统一规律; 二, 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 三,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辩证法的发展观是对立统一,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是辩证法的核心。除了这些规律之外, 辩证法还要研究客观事物中间存在着的某些最普遍的矛盾问题或对立问题, 即各种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哲学范畴的问题。

二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

要了解唯物辩证法这门科学的特点, 还必须要研究列宁所指出的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同一性的原理。列宁在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时, 这样说: “在《资本论》中, 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哲学笔记》二三三——二三四页)。这应该怎样了解呢?

前面说过, 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普遍的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正确的世界观, 又是正确的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它之所以能成为最正确的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正是因为它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当我们应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问题时, 这就是说, 我们把客观事物本身的普遍规律的认识作为方法来研究问题,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是从客观事物本

身的联系上而不是从主观的幻想的联系上来把握事物，这就能保证我们获得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的认识，保证我们的认识符合于唯物主义的，使主观意识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要求。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是：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精神、意识只是物质、存在的反映。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指出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正确的反映。但是，单单承认这些基本原理，还不能解决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正确的反映，用什么方法才能获得这样的正确的认识而避免错误。要解决这个如何反映和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正确反映的问题，必须研究和学会应用辩证法，而辩证法就是能够保证我们的主观认识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最正确的根本方法。学会了辩证法，我们就能够做到不是仅仅一般地承认主观意识应该反映客观存在这个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而且能够把这个原则变为具体行动，能够在解决各种具体的实际问题和科学问题的时候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经常符合于这个原则。所以，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可分的，要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要在一切研究领域上都能够贯彻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必须学会掌握辩证法，必须善于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运用辩证法的方法。

要学会掌握辩证法，第一就要了解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或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致性。怎样了解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一致性？这首先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考察人类的认识的时候，也依据辩证法的方法，注意到它的各方面的有机联系，把它看做是一个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象形而上学者那样，或者根本否认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

的联系，作出了不可知论的荒谬的结论，或者否认认识是发展过程，以为人们一次就能够完全地、绝对地把握一切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指出人的认识就和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一样，是历史的发展的东西，它以人类的社会实践为基础，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矛盾运动，由不认识到认识，由初级的认识发展到高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指出人的认识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认识的辩证运动的总的概括。在我们运用辩证方法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人的认识本身的辩证的规律性，必须注意在研究过程方面不要违背认识的运动规律。例如，首先必须不要违背通过实践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规律，也就是首先必须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去搜集大量的感性认识的材料，然后用辩证方法对这些材料加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改制工夫，使之变为有条理的有综合性的理论知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论到研究方法时，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这里说的研究方法，便是依据着上述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的方法。中国共产党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到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指出观察问题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凡事首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才能决定行动的方针、办法、计划等。中国共产党所提出来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也是完全依据了认识运动的辩证规律的。

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致性，还在于这样一点：即辩证

法本身也就是认识的方法或认识的规律，是我们观察问题和分析事实材料的根本方法。列宁就是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规律当作认识的方法看待的。他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曾批评普列汉诺夫不善于理解辩证法，他的批评主要地就是指这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的。认识必须从感性阶段进到理性阶段，必须在大量的感性材料之上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改制工夫，使之成为有条理性和综合性的、能够反映事物的全体、事物的本质或内部联系的理论知识。怎样才能正确地进行这种加工改制？这就需要有正确的分析方法或认识方法，而辩证法就是这样的认识方法。辩证法的核心，就在于掌握对立统一的规律，就在于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辨别事实材料的精与粗、伪和真、此与彼、表和里的关系，正是矛盾分析方法的运用。研究辩证法，主要地不在于仅仅记住一些基本规律和原理，而在于把它的一些基本规律当作认识的方法来加以掌握，把它应用于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这才是研究辩证法的主要目的。应该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就是非常明确地把辩证法作为认识的方法来加以阐述的，《矛盾论》主要地就在于教导我们在一切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如何正确地应用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并且根据分析的结果来找出解决矛盾的斗争方法。这是我们学习《矛盾论》时应该注意的着眼点。

怎样了解辩证法和逻辑学的一致性呢？这里讲的逻辑，不是指的那主要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初步规律的形式逻辑，而是指的辩证逻辑，也就是指客观事物的联系和规律性在人的理性认识中

的反映，这种反映是采取思维的、逻辑的形态，采取理论系统或概念、判断、推理的系统的形态的。辩证逻辑指出人类认识的理论系统是客观事物的联系和规律性的反映形态，因此它和客观事物本身一样，也是要遵循着辩证法的规律的。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不仅只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的思维活动或理论认识活动的规律。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充满矛盾的运动过程，反映这种过程的人的思维活动就其形式来说就是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畴的矛盾运动过程。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转化为另外的事物，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反映这个运动过程的辩证逻辑在理论的形式方面也是由一个概念推移到另一概念，——推移到自己的反面的概念，由一个判断推移到另一个判断。例如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使失败的概念推移到自己的反面概念，这样来反映由失败到成功这个客观的矛盾运动。早上起来时我们说：“今天要加紧工作”，到了晚上我们又说：“今天不能再继续工作了”，这是由一个肯定判断推移到自己的反面——否定判断，这样就能反映我们一天生活的变化。辩证法要求人的思维活动的形式也要依据辩证法的规律来反映客观世界，要求应用矛盾分析方法来考察人的思维活动形式，要求我们考察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矛盾运动，就这一方面来说，辩证法又是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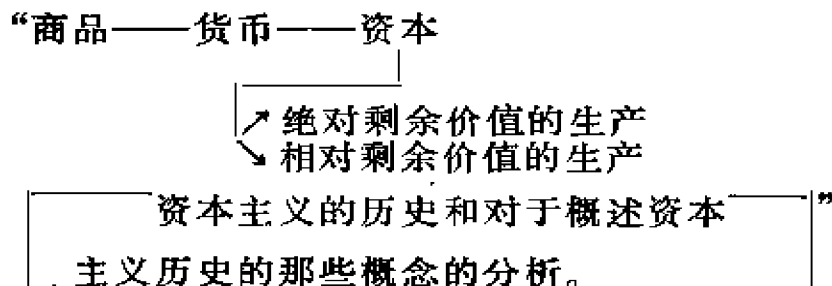
人的思维要怎样来反映客观世界，才符合于辩证逻辑的规律呢？唯物辩证法的总的答复是：思维的任务就是要用理论的形式把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有规律的过程概括地表现出来。理论的系统必须是和客观事物的历史发展和互相联系的基本过程相适应，必须把握着历史的基本发展线索。也就是要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的本质的东西和主流的东西。更具体

地说：辩证逻辑要求我们善于应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来把握一定客观事物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发生，它的内部包含着哪些矛盾，这些矛盾的诸对立方面如何互相联系和斗争，矛盾如何激化，如何通过一定的斗争而得到解决，并因此使事物发生质的变化，使新事物起来代替旧事物。恩格斯在《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说道：“黑格尔的思维方法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思维方法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广大的历史知觉为依据。虽然它的形式是极端抽象和唯心的，但是它的思想发展进程却总是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平行不背，而后者本来应该只是前者的证实。”又说：“历史的行程往往是通过飞跃和迂回曲折的，如果一定处处都跟着它走，那就势必不仅要去注意许多不大重要的材料，并且要常常打断思路。……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乃是唯一适当的方式。但是这一方式本质上也还是历史的方式，只是摆脱了它的历史形式和对它起着破坏作用的偶然现象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三五〇、三五一页）

恩格斯在这里说得很明白，辩证逻辑的任务，就是要在逻辑的形态上，也就是在理论系统上把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反映出来。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逻辑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来说是具有的一性的，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两者当然也有区别，具体的历史过程包含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的因素往往掩盖了那过程中的本质的主要的东西，使得我们从表面上常常看不出在它中间起支配作用的必然的规律性。辩证逻辑的过程却舍去了那些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使我们在思想上比较纯粹地把握着历史发展中的有规律的过程，把握着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把握着运动过程中的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所以逻辑思

维对于我们的认识就有重大的作用。

列宁论到《资本论》的时候，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按照这种逻辑的也是历史的方法把握资本的发展过程的。例如他在《哲学笔记》里（三三四页）作了这样的概括：



可以说，全部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资本主义历史在逻辑形式上、在概念、判断和推理系统上的概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引用了彼得堡《欧洲通报》上对于《资本论》的评价的话，里面说到《资本论》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一篇文章，在理论上总结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这些基本经验至少有五点：“（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我们仔细研究这五条经验的总结，可以知道这个总结正是在理论上概括地反映了一切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的必须经过的基本发展过程和基本联系，这里的每一条都反映了全部发展过程和客观联系中的一个基本环节，五条合起来，就在理论上综合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的基本步骤，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联系的基本原则：首先建立共产党，然后进入无产阶级革命，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对世界上不同的国家的国际联系采取相应的不同的政策。这就是辩证逻辑如何反映客观事物的历史过程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所以，依据辩证逻辑的要求，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来认识任何事物时，必须注意应用我们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系统把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联系反映出来。例如我们总结工作经验，就是要使我们对于工作的认识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就是要求我们在逻辑形式上，理论形式上把工作的基本过程以及有关联的重要问题反映出来。正确的工作经验的总结，必须是要把工作中的问题（也就是矛盾）的发生、发展和采用什么斗争方法得到解决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在论理上加以正确的把握。辩证逻辑的要求，就是要我们的思维活动能够这样地符合于辩证法的规律。这就是辩证法和逻辑的同一性。

三 辩证法要求对于具体问题 给予具体分析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正相反对的两种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研究辩证法的任务，就是要正确掌握辩证法的方法，反对形而上学；因为辩证法是保证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形而上学的方法却相反，它妨碍着我们的认识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形而上学在长久时间内都是和唯心主义相结合的世界观，十七、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也有着很大的缺点。

形而上学的主要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形而上学把世界上的事物以及人的思想看做各自孤独的，没有变化发展的东西，它把发展仅仅看做是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不能够从事物的内部去揭发运动发展的根源，这些错误都使它不能帮助我们的主观认识去正确的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相，或者说，即使有所反映，也只能反映事物的片面的、表面的、静止的现象。认识的片面性、表面性、凝固性，就是受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所支配的人的认识的根本缺点。

客观世界本来是无限多种多样的事物在相互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发展中的统一体，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因此也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任何事物的时候，都要注意到它和周围事物的复杂的联系，注意到它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而不要把它看做孤立的和固定不变的东西。辩证法把运动发展归结为对立的统一，指明事物发展的根源是在于事物自身的内部矛盾，指明我们研究事物运动发展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要揭露事物的矛盾，分析它们所包含的各对立面。这样的方法，就能帮

助我们的主观认识去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它的各方面的真面目，就能认识事物的发展根源和这个运动过程。和形而上学方法的片面性和表面性相反，辩证法这个思想方法要求我们的主观认识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能具有着全面性和深刻性，并反映它的发展过程。研究辩证法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为着要学会对于所观察的事物的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深刻的认识，避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表面性。

辩证法把发展归结为对立的统一这个原理，在方法上的意义就在于：观察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要把握事物的矛盾，事物的对立的统一性。所谓全面的、深刻的分析，这意思就是说要分析事物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包含着哪些重要的矛盾方面，这些矛盾方面之间有着怎样的一些相互斗争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些矛盾的发展怎样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使事物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怎样引起事物的实质上的变化。这样的分析本来就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思维的任何片面性和表面性都妨碍我们完成这种分析的任务；因为这样的分析要求我们既要研究事物本身的一面，又要研究与该事物有联系的各方面，而就事物本身来说，又要研究它的内部矛盾的各方面，——既要注意它的正面，又要注意它的反面，既要研究衰亡的方面，又要研究新生的方面，既要着重注意主要的方面，也不能忽视次要的方面。马克思讲到辩证法的根本特点时说：“它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资本论》第二版跋）这就是要求我们既注意事物的正面，也要注意它们的反面。恩格斯把辩证法规定为“是——否，否——是”的公式，以区别于形而上学的“是——是，否——否”的片面的公式。这就是要求我们要把握事

物的矛盾。列宁说：“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哲学笔记》三六一页）这也包含上述的同样的意思。

为着进行这样的分析，人的思维对于所考察的对象就必须由这面到那面又由那面到这面地反复多方面地进行思考，这样就使人的思维活动过程表现为一种循环往复式的类似螺旋的前进运动，而不是片面的直线的运动。列宁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的（也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又说：“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谈谈辩证法问题》）

辩证法的逻辑就是要求我们由事物的各个侧面的认识一步步向前推进而发展成为对于事物的全体的认识。形而上学的方法的缺陷，就在于它使认识停顿在某些侧面上，而不继续向其他的方面推移，因此，就不免要把片面的认识夸大起来，以至于把片面误认为全体，这样一来，就会使人的认识不是接近于客观现实，而是与客观现实相分裂，也就是要把认识引到主观主义。例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方面既要认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必要，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必须同时抓紧轻工业和农业；一方面要认识到工业的发展可以供给农业和农民以生产资料和日用必需品，可以帮助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农业的迅速发展也可以反过来促进工业向前发展。这就是全面的、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辩证

法的认识。形而上学的认识和这不同，形而上学者在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必要的时候，就会忘记轻工业农业同时发展的必要，或者在注意农业发展的时候，就忘了抓紧工业的工作，这就是片面的、直线性的认识。由于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直线性使人的主观认识脱离客观现实，所以，在它里面就有着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源。因此，形而上学就是经常和唯心主义结合着的世界观，唯心主义就是在形而上学认识方法的直线性和片面夸大（主要是把意识的相对独立作用的认识加以绝对化和片面夸大的结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列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狄慈根）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又说：人的认识的“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谈谈辩证法问题》）

举例来说，如象经验派的唯心主义，就是把人的感觉经验的主观形式方面的意义加以绝对化和片面夸大，因而抹煞了它的客观的内容和来源。理性派的唯心主义把理性认识的普遍性方面加以绝对化和片面夸大，因而抹煞了理性认识和感觉经验的联系，抹煞了认识必须开始于经验这个必然的认识过程。在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是由于片面地夸大了个人的经验的意义（经验主义），或者片面地夸大了理论上的某些普遍原则的作用，而不知道这些原则必须与具体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缘故（教条主义）。

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里说：“为着真正地认识对象，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不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全面性的要求，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力求认识的全面性，这就是辩证逻辑的原则之一。在这里必须注意到一点，即是辩证逻辑所要求的这种全面性的认识，并不等于把事物的各方面的分析观察的结果形式地加以凑合，而是要把各方面的有机联系加以综合的了解，要在总的联系中间区别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要从其中揭露出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趋向。在这里，就应该把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加以区别。折衷主义在事实上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列宁在批判折衷主义时指出，“辩证法要求在具体的发展中全面地去估计相互关系，而不是从这边摘取一点，从那边摘取一点”，不是“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同上）辩证法要观察这一边也观察那一边，同时又要依据具体的历史联系，来确定事情是向哪一边发展，确定事情的重点是在哪一边，我们在实践中间应该站在哪一边和反对哪一边。关于这一点，列宁的上述文章里也有详细的阐明，在论到辩证逻辑的全面性要求时，列宁又指出：“辩证法逻辑要求在对象的发展上，在它的‘自己运动’（如黑格尔有时所说的）上，在它的变化上去把握它。”并且，“必须把全部的人的实践——不管作为真理的标准也好，作为对象与人所使用的东西之联系的实际决定者也好——加进对象的完全的‘定义’里去。”最后，列宁还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明辩证逻辑的认识的这个特点，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远是具体的。”

因此，唯物辩证法总的要求是：应该对具体事物给予具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

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一卷“共产主义”)我们学习辩证法的时候,必须经常注意到这一个总的原则。

第八章 辩证法的普遍规律

(甲) 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

一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辩证法把发展理解为对立的统一,从同一事物的内部对立性中,从事物的内在矛盾中,去揭发发展的根源。懂得了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就能够了解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真正原因,就能够正确把握运动、变化、发展的本质。所以,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对立统一规律首先指明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所以又叫作事物的矛盾规律。矛盾就是同一事物内部包含着相互对立的東西的意思,依据这个规律,我们观察和研究任何事物的时候,必须在肯定这一事物的同一性(或统一性,一致性)的时候,同时注意到它的内部各个方面的对立性。反过来说,在研究事物中所包含的相互对立的各个方面的时候,同时又要注意到它们之间所具有着的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在这里,辩证法要求我们的认识要具有这样的全面性:即不仅仅是一般地把事物所包含的各个方面加以分析和指明出来,而且要认识到这些方面之间是如何地互相对立着,同时又互相统一着。既要认识它们的对立性的一面,又要认识它们的同一性的一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证我们

对于事物获得全面的认识。这样的看法和形而上学的看法当然是相反的。形而上学的缺点之一就是，它对事物的看法不是把对立性和同一性联系起来的全面的看法，而是把两者完全分离的看法，即或者把同一性当做没有任何内在矛盾的绝对的同一性看待，或者把对立性当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有同一性的、片面的、绝对的对立性。既是同一，就不能有内部的对立，既是对立，就怎样也不能成为同一性。或者同一，或者对立，没有对立的同一性，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公式。例如曾经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动力之一是全国人民在政治上与道义上的一致，因此就否认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否认人民内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种动力，否认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通过矛盾的克服而获得的。这就是把同一性看做绝对的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观点。又例如有人认为根本对立的東西是不能具有同一性的，如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他们不承认这些对立的東西正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同一性的，这就是把对立看做绝对的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这个形而上学公式在政治上有着它的典型的具体表现，那就是在对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见联合的方面，而不知道联合中应该有斗争，“左”的机会主义者却相反地只看见斗争的方面，而忽视了联合的方面。

要明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为什么是正确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为什么是片面的，需要顺便提一下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区别问题。

形式逻辑是研究正确思维的形式及其初步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地是思维形式本身所应该遵守的初步规律。这些初

步规律是人们为着要进行合理的思维时在思维形式上必须遵守的普遍规律,但如果单单依靠这些规律,并不一定能保证人的思维可以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容。这当然不是说形式逻辑完全不研究思维的内容。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思维形式及其初步规律也是客观事物的某些简单关系的反映,所以在研究和应用形式逻辑的时候也要适当注意到它的内容。形式逻辑的任务是在于考察:为着要构成正确的思想,即明确的、没有矛盾的、循序而进的、首尾一贯的、有充分根据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本身(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起码应该遵守一些什么样的规律。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甲是甲),矛盾律(甲不是非甲),排中律(甲是乙或非乙)和充足理由律。这些规律的总的意义,就在于指明凡是合理的思想,自身必须是首尾一贯的、没有矛盾的、有充分根据的。而自相矛盾的、没有根据的思想,必然是不合理的。这样的规律,主要地是思维形式本身所要遵守的初步规律,而不是思想内容,即在思想里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规律。这些规律说:当我们用自己的思想来反映客观事物的时候,我们思想本身在论断上必须注意保持同一性和避免自相矛盾,否则就要陷于思想混乱,就不能明确地反映任何客观事物。可以知道,形式逻辑和以前我们说到的辩证逻辑或辩证法是有区别的。辩证逻辑的任务是在于要考察如何应用逻辑系统,如何在思想上、理论上概括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辩证逻辑也研究正确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但它是把思维的形式当做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在人的理性认识过程中的反映形态来加以研究的,因此它的研究比形式逻辑更着重于和更密切地联系着人的思想所反映的客观内容。列宁论到辩证逻辑时,说:“概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

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哲学笔记》一八一——一八二页)列宁指出,辩证逻辑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同上,六十七页)。因此,辩证逻辑就是客观事物的辩证法运动在人的思维领域中,在逻辑形式中的反映,这样,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也就是人的思维所要反映的一切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规律。作为主观辩证法的辩证逻辑和作为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规律指示我们,要在思想上正确地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必须首先考察它的内部矛盾性,它的各个对立方面,必须应用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来反映这些矛盾和它们的各个对立方面。所以,就形式逻辑的要求来说,合理的思想首先必须避免对于事物的论断上的矛盾。就辩证逻辑的要求(把握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的要求)来说,合理的思想必须肯定和必须在理论系统上来反映事物的矛盾(只在日常生活及范围狭小的过程的认识上,由于可以把过程中的事物暂时当做不变的东西来看待,才不必一定需要去考察它的矛盾,虽然在实际上,日常生活范围内的事物,也是辩证的,也是包含矛盾的)。这就是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之间的基本的区别和联系。由此可见,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是正确的思维所需要的东西,不能用形式逻辑代替辩证逻辑,也不能对形式逻辑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应该再说一遍:我们说形式逻辑的规律,例如同一律(甲是甲),主要地是思维形式本身的规律,但这决不是说它仅仅只有纯

粹形式的因素而丝毫也不反映客观事物的任何一点内容。上面说过，就是形式逻辑的规律也是反映了事物之间的某些简单的关系的，但它所反映的主要地只是客观事物的相对静止的方面，而不是反映事物的绝对的、运动发展的方面的规律。形式逻辑的规律之所以具有普遍的意义，就是由于事物的相对静止方面也是普遍地客观存在的。同时，形式逻辑之所以有局限性，它之所以不能成为客观事物及人类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而主要地只是思维初步规律的科学，它之所以只能作为初级的思想方法的科学，而不能象辩证逻辑那样成为一种世界观和高级思想方法的科学，就是由于它所反映的客观内容的局限性。如果我们运用形式逻辑的规律的时候注意到它这个局限性，那它就不至于与辩证法相矛盾，就不至于陷于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错误，这样它就是一门具有一定实践意义的思维科学。所以，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并不是一件东西，形式逻辑是一门思维科学，而形而上学则是一种片面的、不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错误，就在于把相对静止的东西夸大为绝对的东西，把事物的相对同一性夸大为绝对的同一性，因此在同一性中看不见任何对立，在对立事物中间也看不见任何同一性。形而上学把主要只应用于思维形式本身的规律夸大为一切客观事物的共同规律。依形而上学者看来，思想本身的论断形式所要遵守的规律，和我们在理论上去概括各种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所要注意的规律，好象应该完全是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不但在思想的论断上必须避免自相矛盾，而且在观察事物的时候也不容许揭露矛盾。这当然是错误的。

形而上学不能够依据事物的内在矛盾来揭发运动发展的根源，把发展的原因归结到事物的外部。和这相反，辩证法从事物内

部矛盾中找到了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源，这样就证明了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事物自己的运动。这就是说，要理解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只要在事物自己本身内部就可以找到说明的原因，用不着请上帝或其他精神的、主观的力量来帮忙。由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形而上学的方法不能保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彻底性，只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唯物主义才可能成为最彻底的唯物主义。但是，辩证法虽然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的外因观点，或外因论，它并不因此就完全排除事物发展的外因的研究，以至于陷入到把内因看作发展的唯一原因的另一片面观点。辩证法要求我们在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和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来把握事物，也就是同时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不过内因和外因不是居于同等的地位，事物的内在矛盾（如果广义地使用联系这个名词时，也可以叫作内部联系），是事物发展的第一性的原因，而事物的外部联系，只能算第二性的原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最后地经常地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外因对于事物的发展有或大或小的影响，有时可以起很重大的影响，甚至于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情况下可以说也能起决定的作用，但外因的任何影响都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归根结底来说，事物发展的最后决定作用是在于内因，而不是在于外因。

上面说过，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真正了解对立统一的规律，就在基本上理解了辩证法，也就是在基本上了解了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科学。所谓真正了解辩证法的规律，主要不是在于能够举例来证明这个规律，而是在于——如列宁所说的——要把这个规律当做认识的规律，当做指导认识和行动的方法来加以掌握。这就是说要学会在实际工作中

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分析的结果，找出解决矛盾的适当的斗争方法。

怎样叫做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主要地就是要把握住上面说过的“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这个原则。每一事物都有它的具体特点，而这具体特点归根结底是由它的矛盾的特点决定的，所以在观察和分析的时候就要把主要的注意力用来找出矛盾的特点，只有掌握了矛盾的特点，才能避免观察的表面性，才能找到适当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同时，每一事物的矛盾都是复杂的，所以在观察分析的时候，必须对矛盾的各方面都要加以考察，也就是必须注意分析的全面性原则。具体的分析和全面的分析是分不开的，没有全面的分析就没有具体的分析。

为着要在观察和分析矛盾运动的时候能够掌握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原则，要保证分析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必须依照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所指出的，要弄清以下的一些问题：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对立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斗争的对抗与非对抗的形式问题。

二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矛盾的普遍性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二）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矛盾，或一切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表现为对立的统一。

矛盾的普遍性原理（矛盾的其他原理也是一样），并不是人的思想主观地凭空想出来的原理，而是全部人类的认识历史、特别是

全部科学的发展历史证明了的事物客观本质，这个原理本身就是一切科学成就的最普遍的概括或总结。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每一种科学，都是研究世界的某一方面的过程的矛盾运动的学问，科学的进步和事物的新的矛盾方面的揭露是分不开的。科学家一旦只要离开了矛盾的分析研究，把它的研究对象看做没有矛盾的东西，就要使科学的进步遇到障碍。列宁曾简单地概括过各种科学所研究的一些基本矛盾。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离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哲学笔记》三六二页）

现代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证明科学是要研究事物矛盾运动的。在生物学中研究遗传及变异的矛盾（同时把生物看做是与自然环境有机地联系的统一体）；大脑生理学研究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的矛盾，兴奋及抑制的矛盾；现代物理学中的许多新发现，如不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就根本无法理解，如光的两重性质——波动性和粒子性，电子和光子的互相转化，原子中包含电子和质子的对立，电子和质子又各有阴电子、阳电子，质子和反质子的对立；此外还有中子和反中子的对立；质子和中子又有内核和外壳的对立等等。

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就是充满了矛盾运动的过程，而首先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的矛盾运动过程和阶级斗争过程。不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阶级矛盾，就不能把对社会的研究提高到科学的地位。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反对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力求掩盖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特别是阶级斗争。而一切否认阶级矛盾的社会学说归根结底都被历史的发展事实所粉碎。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有许多政治错误的思想原因，就是由于忽视阶级矛盾（如右倾机会主义）或不能够认真地具体地分析阶级矛盾，因而使主观的认识离开了客观实际，产生了主观主义的缘故。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根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表现。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就不可能科学地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

不但一切事物都有矛盾，每一事物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贯串着矛盾。德波林派、孟什维克唯心主义者曾认为事物的发展开始时候只有差异而无矛盾，早已受到批判。差异就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差异已包含矛盾的因素，不能说差异不是矛盾。例如中农的各阶层的差异，就包含着资本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矛盾的因素，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速度上的差异，实际上已经是矛盾。矛盾可以表现为种种形式，差异、对立、冲突等等。事物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矛盾的运动，不过矛盾的表现开始的阶段到最后的阶段，可能有种种不同的形式而已。

研究矛盾的普遍性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为着要使我们在考察一切问题的时候能够在方法上把握到一个正确的总的方向。这个总的方向指明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正视事物的矛盾，要肯定矛盾的存在，并认真地加以揭露；不要害怕矛盾，回避矛盾，否认矛盾，或掩盖矛盾。既然矛盾的规律对于一切客观事物是普遍存在的，那末，在考察任何事物的时候，都必须从分析矛盾着手，都必须从统一物中去揭露它的内部各方面的差异和对立性。能够这样做，在

研究方法的总的方向上就符合于从事物本身的联系上去把握事物这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因此也就是正确的。如果忽视矛盾的分析研究，就要在根本方向上发生错误，就有陷于主观主义的危险。例如，既然知道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在人类社会里普遍存在的，因此，对社会任何一部门的科学研究或对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的研究，都必须相应地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分析着手，否则一出马就会和科学的要求背驰。又例如，既然知道了阶级矛盾在一切阶级社会都普遍地存在，因此在研究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形态的时候，都必须首先注意到阶级的分析。忽视阶级分析就一定要犯错误。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农村调查》的序言）。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就解决了这个革命全时期的基本的战略策略问题，原因就在于此。矛盾的普遍性原理指示我们，矛盾不只存在于互相敌对的阶级之间，存在于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人民自己内部。虽然必须注意到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之间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忽视这两种矛盾的性质区别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人民内部也有矛盾，否认或掩盖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承认人民内部根本利益的一致，不去积极研究和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这就是违背了矛盾的普遍性原则，这当然是不对的。

还应该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我们经常自觉地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唯物辩证法，首先就是应用矛盾规律。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规律，首先自然是要在思想上不害怕矛盾，不回避或掩盖矛盾，而要勇于去揭露任何工作中所存在的矛盾。而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行动上采取各种必要

的措施来及时地揭露矛盾,使某些隐蔽的,或萌芽状态的矛盾,成为人人容易看清楚显著的矛盾。就象自然科学上用显微镜来揭露不易看见的物质世界的秘密一样,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也要在必要时采用政治的显微镜的方法来揭露事物矛盾的秘密。只有在群众面前及时揭露一切必须揭露的矛盾,才能动员群众共同来想办法为解决矛盾而进行斗争,才能迅速地推动工作前进。中国人民过去在三十几年的短短时期中,能够在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之后又获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能够及时地在人民群众面前揭露每一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并动员他们起来进行斗争以解决矛盾。

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一般的方法向导,但有了一般的方法向导,只是说走路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并不等于已经具体地解决了如何走法的问题。一般原理并不能直接地解决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问题,还必须在一一般原理的指导之下,对于所要研究的事物对象本身特点和复杂的内容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的全面的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在把握矛盾的普遍性这个总的方向之下进一步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分析具体事物的矛盾的复杂内容。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矛盾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它们之间互相有所区别。至于矛盾的普遍性,则是指各种矛盾的共同点。矛盾的特殊性又叫做矛盾的个性,矛盾的普遍性又叫做矛盾的共性。任何事物的矛盾都是既有其特殊性或个性,又有其普遍性或共性的。各种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本身都各有自己的特殊性或个性,但这些矛盾同样都是阶级矛盾,这就是它们的普遍性或共性。自然界的矛盾和社会的矛盾是大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特殊性的分歧是极大的,这是它们各自特殊性或个性,但

不管它们分歧怎样大，我们都同样地可以把它们叫做客观事物的矛盾，这又是它们的普遍性和共性。各个国家为了解决社会主义革命问题，都有它们各自的特殊的道路，各自的特殊的问题或各自的特殊的矛盾，所以，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都有一定的个性。但一切国家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都必须走一条共同的基本道路，也就是十月革命所开辟出来的基本道路。在这条基本道路中一切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或矛盾都有共同的性质，如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必须在工人阶级政权的领导下推动广大人民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必须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等等。这些就是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矛盾的普遍性或共性。由于客观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所以矛盾分析方法可以作为研究事物的普遍的方法，由于事物矛盾同时又具有特殊性，所以我们的研究方法同时必须从实际事物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样才可以抓着事物矛盾的具体特点。

什么是科学？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揭发自然界或社会的一定过程、一定方面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的学问。科学研究必须以矛盾的普遍原理作指导，但科学分类中的每一部门的研究，都必须揭发这一部门本身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当然这是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一般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种科学，不过它和一般的科学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是世界一切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矛盾运动规律，而一般科学所研究的，是各种事物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人们研究任何一种具体事物的时候，如果不注意把握它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这样的研

究就失去科学的意义。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企图把一个科学部门的特殊矛盾规律，简单地移用到其他部门，而不注意其他部门所要研究的矛盾的特殊性。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有所谓“生物社会学”，它之不能成为科学，就是由于把生物的矛盾和人类社会的矛盾混淆不分。单纯用地理、人口等自然条件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社会学说之所以错误，原因也和这相同。

所以，科学的研究要求认真地区别不同事物的不同矛盾。如：不同的运动形式有不同的矛盾（如自然和社会），同一运动形式中所包含着的不同发展过程里也包含着不同的矛盾（如社会运动形式中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矛盾（如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阶段和垂死阶段）。如果我们观察问题的时候不能把握所要研究的问题或矛盾的特点，我们的思想就不能保持科学的正确性。不论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都是由于忽视矛盾的特殊性而陷于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把矛盾的普遍原理当做直接解决一切具体矛盾问题的死公式，不知道在应用矛盾的普遍性原理来作为观察问题的向导的同时还应该全面地深刻地分析具体实践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经验主义把局部地区的矛盾问题的特殊解决方法误认为普遍真理而到处搬用，不管被搬用到的另外地区的矛盾的特殊性。所以，不注意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必然要走向主观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在政治上可以找到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种矛盾各自的特殊性混淆不分的情形。这种主观主义者首先是不了解人民内部的矛盾，或不肯承认人民内部存在着矛盾，因此一旦发现人民内部的矛盾时，就把它当做敌我矛盾来看待，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来处理。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左”倾冒

险主义错误领导时期中就有过这种主观主义的典型。另一方面，也有人忽视敌我矛盾，或把敌我矛盾看成人民内部矛盾。中国革命历史上历次的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路线和抗战初期的王明路线），就是这种错误的典型。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在一定的情形下可以看做是相对的。在事物运动的一定的范围内可以看做矛盾的特殊性，在另一范围内又可以看做是有普遍意义的。如阶级矛盾的规律对于全部人类社会历史来说，只是一个很短的历史过程中的特殊的矛盾，但对于各个阶级社会来说，一般的阶级矛盾规律又具有普遍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把较大范围内的某些特殊矛盾的规律，作为我们研究较小的运动范围内的特殊矛盾的一般的方法向导。例如我们可以把“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五五页）这一个阶级社会的普遍的矛盾规律，用来作为研究每一个具体的阶级社会的方法向导。

普遍的东西是不能离开具体的东西凭空存在的，它是包含在具体的具有特殊性的各个事物中，作为后者的一个方面——作为后者的共性或共同点而存在着。矛盾的普遍性的知识，是许多具体的具有特殊性的矛盾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它们之间的共性或共同点的概括和总结。科学的研究总是从具体的典型开始，然后从其中找出、概括或总结出一些带普遍意义的规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之所以能作为指导具体问题的研究的工具，正是由于它本身是从大量具体历史事物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要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必须不要忘记认识的这一个正常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虽然必须以前人已经获得的许多矛

盾规律的普遍知识作向导,但任何时候,都必须从具体实际事物的研究出发来求得对于普遍真理的具体化和真正的领会;同时还必须学会善于从自己周围的特殊事物的分析研究中,独立找出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知识,作为在进一步的实践过程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导。例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依据阶级斗争的普遍矛盾规律来研究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揭发了当时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特殊性,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是敌人,其余的阶级是不同程度的朋友。这一个在当时阶级斗争中分清敌友的特殊规律,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具体发展时期来说,就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方向性的原理。所以,认识矛盾的过程,是从实践中的具体的特殊矛盾的分析开始,概括出普遍的矛盾规律,又用这个普遍的矛盾规律进一步去研究具体的特殊的矛盾,然后又从其中找出较为普遍的规律,作为更进一步的具体研究的指导。如此不断反复下去。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认识发展过程。依循着这个认识的不前进运动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也要善于不断地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循环往复地不断充实和发展我们的知识,使我们的认识能够经常跟上和有能力指导不断发展着的实践行动。这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必须遵守的认识运动规律。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只知道死守着一些现成的普遍原理,既不能够从有特殊性的具体事物中独立地概括出普遍原理,也不懂得应用普遍原理到实际生活中时必须使它和实际生活的具体特点相结合。

如何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首先必须仔细分析事物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然后把各方面的分析综合起来,才能把握矛盾的

整体,即矛盾各方面在总的联系上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这样说:“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就是指的上述意思。

以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例:这篇文章首先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在革命运动中起着作用的各个阶级(买办、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本身的特点,然后综合起来对各阶级之间的总的关系,即矛盾的总体的特点作出结论,肯定地主、买办阶级是和帝国主义勾结的革命的敌人,而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中产阶级的左派可能成为朋友,右派可能成为敌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从而规定了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这就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最好的范例。这个范例告诉我们,首先要有精细的正确的分析,然后才能够作出正确的综合。反过来说,不分析或不能认真地分析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也就不能了解矛盾的总的联系上的特殊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这首先是就矛盾各方面的分析而言,同时也是就分析之后总的综合而言的。主观性是由片面性、表面性产生的。“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就是不懂得要把矛盾的各对立方面都加以分析研究,只注意矛盾的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

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矛盾论》)这些都是观察的片面性的表现。目前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也可以找到这种片面性的例子,例如只了解发展重工业是重点,而不了解发展轻工业的重要性;农业生产中只注意到发展粮食作物的重要,不知道发展经济作物和副业的重要,或者是相反;有些人在文艺上重视提高,不注意普及,有些人注意普及,又忘记了提高;强调民主的时候不注意集中,强调集中的时候就忽视了发扬民主;等等。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的过程中,有的人只注意到他的错误的一面,而不注意到更重要的他的伟大功绩的一面。《人民日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就是为了反对观察问题的片面性。在各国人民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普遍真理,不知道自己国家的革命的具体实践,看不见自己国家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面,以重视自己国家人民革命的具体实践和民族特点为借口,来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在革命运动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的机会主义,也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因为不论“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都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只注意到对立面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都不了解对立的同一性,都是思想的片面性在政治上的表现。反对片面性同时也要反对表

面性。“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矛盾论》）所以，要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客观的矛盾运动，必须对事物的矛盾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深刻的分析。

如何分析矛盾的各方面？分析必须把事物放在相互联系中来分析。要“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同上）所以，矛盾各方面的分析决不是离开综合孤立进行的。分析是综合的前提，又在综合的基础上进行，并且是以综合为目的的。所谓分析必须以综合为前提，就是说在分析各方面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所分析的是对立统一体的各方面，要注意到每一个方面都是在矛盾总体中间有机地和其他方面联系着的部分，而不要把任何一个方面当作孤立的部分来加以考察。例如研究生产力时必须注意到它只是整个生产方式的统一体中和生产关系对立的一个方面，研究一个阶级时必须注意到它是全社会阶级关系中与其他阶级对立的一个方面。因此，分析就必须在综合的基础上来进行。分析在综合的基础上进行，就是说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某一方面的特点的时候，不外就是要研究它在矛盾的总体中的地位，研究它和矛盾的其他方面的关系的特点。例如要了解生产力的特点，无非就是要指出它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是对于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要了解无产阶级的特点，就是要指出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被剥削的阶级，是

担负着领导其他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阶级，等等。所谓分析以综合为目的，就是说我们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点，正是为着要通过这个分析来了解矛盾的总体的特点。

三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一个包含着许多矛盾的复杂的过程中，不仅仅要一般地研究其中各个矛盾的特点，而且要研究许多矛盾中哪一个是主要的。主要矛盾问题的研究，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一个不可少的方面。因为在许多矛盾同时存在的情形之下，其中必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的。“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论》）。找着了主要矛盾，就能掌握解决复杂的事物的矛盾运动的中心环节或主要关键。所以遇到包含着许多矛盾的复杂事物时，必须用全力找出主要矛盾。一般地说，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生产和阶级斗争中所遇到的矛盾，没有不是多少带有复杂性的。因此，寻找主要矛盾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们的一切工作、实践中到处都要遇到的普遍而重要的问题。找着了主要矛盾，就抓着了工作实践的中心关键，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而工作就可以迅速地向前进步。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曾指出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有着三种情形：（一）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形；（二）人民大众和反动统治者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形；（三）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形。这三种主要矛盾的情形在中国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过程中，都曾出现过。

如何把握主要矛盾？研究主要矛盾的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各点：

首先，说每一复杂的过程中主要矛盾只有一种，这并不等于说这种主要矛盾只是由一个矛盾所构成。主要矛盾只有一种，一种主要矛盾，通常自然是互相对立的两个矛盾方面所构成，但就中国革命的上述例子来说，在复杂的情形下面，这种矛盾的每一个方面也不是单纯的，它也可以由几个矛盾方面所构成，如人民大众包含工人和农民，人民大众敌人方面包含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及其他反动派等等。

其次，要注意到主要矛盾的变化。主要矛盾是随着事物的发展条件的不同而会发生变化的，它可以因时因地而有不同。要善于注意到这个变化，尤其要学会尽可能早地预见到这个变化，以便对我们的行动给予及时的指导，使我们在工作中能够有准备地从容地由一个中心环节转移到另一个中心环节。否则我们在行动中就找不到中心任务，就要在工作中犯错误。例如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我们曾经历过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的不同，就是由于主要矛盾有了变化，就是由于各个时期革命斗争的具体的中心环节有了变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矛盾是国内广大人民的革命势力与英日等帝国主义者所支配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矛盾，革命斗争的中心环节是代表人民的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矛盾转变为工农革命势力及其他革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的矛盾，革命斗争的中心环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武装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多次“围剿”的反“围剿”的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矛盾又转变为全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革

命斗争的中心环节是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联合的反动势力的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革命战争的中心环节是人民解放战争。这四个时期各有其特殊的主要矛盾，但四个时期都是同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不同时期，所以它们中间又有着一个共同的主要矛盾，即全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都贯串着的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某些时期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者不善于把握主要矛盾的转化，曾经在革命斗争中犯过重大的路线错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是由于看不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主要矛盾的转化而发生的。“九一八”以后，主要矛盾已开始由国内的阶级斗争转为对国外帝国主义的斗争，王明等人看不见这个转化，这是他们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产生的原因之一。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获得胜利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这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就转变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最初一个时期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解决矛盾的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改变生产关系，是要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总的目标之下把个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改造成集体的生产，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工商业。一九五六年，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获得了基本胜利，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经济上获得了基本的胜利，国内主要矛盾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斗争已得到基本解决。一九五六年，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获得了基本胜利,国内的主要矛盾又转化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集中全国力量来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就成为当前我国的主要任务。

再次,在特别复杂的矛盾问题中,要区别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所谓基本矛盾,就是在过程发展长久时期中对于全过程的特点起决定作用的一些主要矛盾。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形成了全时期的基本矛盾,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部过程的主要矛盾。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阶段,主要矛盾却各不相同,在这里所说的主要矛盾,只是全过程的各个阶段或各个时期中起主要决定作用的矛盾,这里的主要矛盾只是基本矛盾的一部分,或者有时是非基本的矛盾,而不是长时期全过程的基本矛盾的全部。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两个基本矛盾:(一)在国外,是帝国主义和我国人民的矛盾;(二)在国内,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这些基本矛盾在新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未被打倒和国内资产阶级未被消灭以前,也是全过程的主要矛盾,但如果说的是这全过程的各个时候,那末它们是基本的矛盾,而不是在各个时候都是主要的矛盾。在全过程的各个时候,有时国内矛盾是主要的,有时国外矛盾是主要的。国外矛盾是主要的时候,也不是对一切帝国主义者而言,而常常只是对一个或两个帝国主义者而言,如在抗美援朝时候主要是对美国。就国际问题来说,在我们当前国际斗争中间,应该在任何时候都注意

到：“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是，在这个根本矛盾的基础上，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国家里，“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也可以成为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问题，但这样的矛盾问题不带有根本性质，它只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同上）

在分析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或主导方面的问题。矛盾的各对立方面是拥有着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的性质的，因此它们在统一体中通常都不会处于平衡发展的状态，在一定的时期或一定条件之下，其中必有一方面居于支配或主导的地位，这就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或主要的矛盾方面。认识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重要性是在于：（一）它决定着事物的性质，依据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我们就可以认识事物的性质的变化。（二）它是我们决定解决矛盾的斗争方法的根据之一。

依据对立统一规律来研究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我们可以看到，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在实质上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化的过程，在旧事物的内部发生矛盾，出现新的东西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一定时期之内是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在量变过程中它的地位逐步发生变化，由于新事物具有一定要发展起来的优越性，因此它终于会改变自己的被支配地位而进

到支配的地位，这样事物就发生质变。例如过去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后者在国家的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居于统治地位，那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成了国家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国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变为独立自由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社会。自然界也有相同的情形，铁元素混合着较多的炭元素，就是生铁，用熔炼方法把炭元素的成分适当减少，生铁就变成钢。生物的品种在繁殖过程常发现新的变异，出现新的特征，这些新的特征如果发展起来，成为显著的优势的特征，生物就由一个品种变为另一个品种。

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研究，有着很重要的实践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矛盾论》）。关于主要矛盾的研究的意义，上面已经说过了。就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研究来说，这个意义可以从以下两点看出来：第一，为要保证我们的革命运动的一定的质，必须力求使矛盾的一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中，必须极力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各方面的工作向着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方向发展，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保持贫农的优势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使运动真正得到胜利。在农学上的定向培育方法，就是要通过人的努力，使生物的某些新的特征发展为固定的优势的特征，以保证人所希望的好的新品种的出现。炼钢的人要善于

掌握火候,使得炉内的氧化作用主要地只限制在生铁内炭素方面,而不至于对铁的本身也发生显著的氧化作用,等等。第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是我们规定战略战术或斗争方法的根据之一,例如在敌人统治强固的时候采取防御的战略,在相反的情形下采取进攻的战略等等。

根据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来决定战略战术时,必须注意到矛盾主要方面因时因地的变化。及时看到矛盾主要方面在时间上的变化,可以保证我们战略战术上及时地采取相应的适当布置。全面地注意到矛盾主要方面因地点条件不同而不同的情形,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能够掌握照顾各方面的周密的指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在战略上它是经常能采取进攻、“围剿”的行动,这时革命人民在战略上就采取防御、反“围剿”、内线作战的战略。但在这个时期,在一定的战役或战斗上,由于敌人兵力的分散和革命军队集中了优势兵力,又可以采取进攻和外线作战的行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互相结合的巧妙的指导(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种巧妙的指导的掌握就需要善于观察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时因地变化的情形。

四 对立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所谓事物的矛盾,就是同一事物内部分裂为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又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各对方面。所以,我们研究事物矛盾的运动,主要地就是在于要研究矛盾诸方面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的情形,也就是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现在我们

就要专门考察一下对立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要着重掌握一个普遍原理，即对立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对立的斗争性是绝对的。

对立的同一性（或统一性、一致性），有两方面的意义：（1）对立的两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同处在统一体中；这样，对立乃是同一事物内的对立，所以互相对立的方面具有同一性。（2）矛盾着的双方依靠着一定的条件，而向其对立的方面转化。研究对立的同一性的主要意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这样的：“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哲学笔记》——一页）事物之所以能够向对立面转变，正是由于事物内部原来就包含着矛盾。事物内部包含着矛盾，包含着互相依赖和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对立面，并通过斗争、能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就是对立的同一性的基本意义。恩格斯说：“辩证的思维，不过是整个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以其最后的互相转变或转变到较高形态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自然辩证法》一七四页）这也是对立的同一性规律的概括的说明。

形而上学把对立看做绝对的对立，在对立中间看不到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又把同一性看做绝对的同一，而看不见统一体中包含着矛盾。辩证法的看法是：“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矛盾论》）否认对立面的同一性和否认同一

性中包含着对立性都是片面的，错误的。这在前面我们已批评过了。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体。没有矛盾的事物，不是作为对立面的统一体的事物，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最简单的事物，譬如一张白纸，也起码有它的正面和反面，复杂的事物就更不用说了。事物之所以能成为对立面的统一体，就是由于它所包含的各对立方面是在一定条件下有机地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彼此互为存在的条件的。首先它们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着，但由于它们在一定条件之下彼此互相依赖，由于在这样的条件下对立的一方离了对方，自己也不能存在，因此，它们就不能不共同处在统一体中，不能不作为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而存在着。没有上就没有下，没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没有恶不能显出善，没有丑不能显出美，反过来也是如此。生与死，战争与和平，也有着这种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力学上的作用和反作用，电学上的正电和负电，化学上的酸和硷，生物学上的遗传和变异，微观世界的波动性和粒子性，原子内的电子和质子等，这些都是自然界中间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的对立方面的显著的例子。在人类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矛盾而又互为存在的条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互相对抗的阶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就有着一定的相互依赖关系（首先是资产阶级依赖剥削无产阶级为生），在新中国条件下又有着另一种的一定时期一定方面的相互依赖性。马克思主义有它的普遍真理，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带有普遍真理的性质，但各国人民的革命有它自己的具体实践过程，这些过程又有它自己的民族特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

在各国人民中必须通过各国民族的特点来实现，这也是对立面的同一性的表现。专政和民主是互相对立的，但工人阶级专政同时又是广大人民的民主，没有广大人民的民主，就不能真正建立强有力的工人阶级专政，反过来说，不坚持工人阶级专政，广大人民的民主也不可能，因为如果没有坚强的工人阶级专政，民主会要被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少数剥削者所利用。与专政和民主相联系的是权威和自治的对立的同一性。工人和农民联盟，中国的工人阶级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都是社会生活中在一定条件下（首先是在工人阶级居于领导地位的条件下）对立方面具有同一性的重要的例子。对立的同一性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普遍原理，任何事物都是一定条件之下的某些对立方面的统一体。事物内部的对立方面既然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同一性的，都是彼此互为存在的前提，互相依赖的，因此，这种同一性，在一定条件之下也是事物发展的不可少的要素。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相反相成”，这就是说的对立的同一性。所谓相反相成（严格地说，相反的东西只在一定条件下才能相成），就是说对立的双方在发展过程的一定条件下面，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相互激荡的作用，一个方面的发展，往往有赖于另一方面的存在，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求得事物的顺利发展，就必须保持这个条件之下对立双方的一定的联系，如果在发展过程中，破坏了这个条件下所需要的适当的联系，那末，发展的进程就要受阻碍。所以，对立方面的互相依赖，在发展过程中也表现为一定的互相制约的作用；这一方面的发展，依赖另一方面的存在和发展作为条件。对立方面的斗争固然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对立方面的同一性，在一定情形下也是事物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力量。这个原理，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是说，要在实际工作中

准确地完成任务,较顺利地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不但首先要注意到对立方面的斗争,要通过斗争来推动发展——这是根本的——而且要善于掌握和利用对立方面的一定条件下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要善于巧妙地应用对立的同一性的原理,也就是要善于依据一定条件的需要来掌握对立面的正确的适当的联系,使事物矛盾的各个方面都能充分发挥它可能发挥的积极力量,甚至于使矛盾的消极方面也在一定可能条件下(首先是必须通过斗争)和一定的程度上供积极的力量所利用。这样就可以使事物的发展获得最大的推动力,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作中的阻碍和获得最多的成就。

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为例来说,例如轻工业和重工业是工业本身内部互相矛盾着的对立方面,工业和农业也是国民经济中的互相矛盾着的对立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但是,轻重工业以及工农业之间,不但有着互相对立的关系,而且又有着彼此互相依赖的关系。如果过分地强调发展重工业,以至于对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完全忽视了,结果还是要妨碍重工业的发展。因为,轻工业和农业都需要从重工业获得生产资料,农村需要从工业获得各种工业品,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使这种需要增大,这就能反过来促进重工业和一般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投资获利较快,能使国家迅速积累起大批资金作为建设之用,农业是城市和工业的粮食和原料的来源,这些都说明重工业的发展,又有赖于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国家的计划必须正确掌握轻重工业、工农业的相互依赖关系,既要保证重工业发展的优先地位,又不轻视轻工业和农业的重要作用,并依此原则在两者之间建立正确的发展比例或平衡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过程中, 还有其他许多矛盾, 如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之间, 工业与农业之间, 工农业与商业、运输业之间的矛盾, 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的矛盾,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矛盾, 发展经济和发展文化教育之间的矛盾, 国家、集体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 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 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各方面中间都具有着对立的同一性。在我们制定国家计划, 规定各种政策的时候, 都必须依据上述对立的同一性的原则, 来在这些矛盾的各方面之间建立在一定条件之下的某种正确的联系, 保证充分发挥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作用, 使它们中间的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出来。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提出解决十大关系问题的指示以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报告、决议, 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巧妙地应用了对立面的同一性的原理。按照这个方针去从事工作, 一定能够把全国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 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强有力的推动力量, 使我国顺利地由落后的农业国走上先进的工业国的道路, 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事物的矛盾存在着两种情形: 第一是新生的和衰亡的东西之间的矛盾, 前进的积极势力和阻碍前进的消极势力之间的矛盾; 第二是同一新生的、前进的势力或衰亡的、消极的势力内部各方面也存在着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 工农业建设的矛盾, 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的矛盾, 就是前进势力内部的矛盾, 在这些矛盾的内部各对立方面之间, 相互依赖关系的存在, 我们在工作中之必须掌握这方面的关系, 是很显明的。但我们还必须注意到, 就是在新生的事物和衰亡着的事物之间, 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的。事物的衰亡着的方面, 在它未消灭之前, 在一定条件之下和一定的

程度上,在新生事物对它进行坚强斗争的情形下,也能出现某些因素可以为新生的方面所利用。我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是衰亡着的方面,但在我们过渡时期就在反对它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各种丑恶方面的同时,又利用了它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因素。民族资产阶级的某种程度的爱国思想,在改造资产阶级的全部过程中一直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积极因素之一。就是完全反革命的阶级,当我们和它们斗争的时候,它们内部的矛盾也可以成为我们战略策略方面争取胜利的因素。斗争失败使我们遭受损失,但在失败中可以取得教训,在这样的条件下,失败中就有着积极的因素,所以说“失败为成功之母”。犯错误是不好的,但犯了错误就有可能学会避免错误,错误成为我们的先生,在这样的条件下,错误里又有了积极因素。毒草是有害的,但把它锄了之后,又可以把它转为肥料,这就有了一定的益处;丑的东西是不好的,但它的存在,在一定情形下可以通过对比而使美的东西更为出色;坏事在一定情形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反动派对于革命人民的进攻,自然是坏事,但它的进攻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凶恶面目,给人民做了很好的反面教员,推动人民提高觉悟,加强组织,昂扬斗争意志,这就恰恰又帮助人民来推翻它自己,所以,蒋介石集团的穷凶极恶是它自己垮台的一个原因。美帝国主义者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横行霸道,它的种种张牙舞爪的侵略行为,结果是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所以,对立的同一性是辩证法的普遍原理,是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应该而且可以广泛应用的方法原则。有的人否认对立的同一性这个普遍原理,认为根本对立的東西之間不存在同一性,这是完全违背辩证法的。其实一切矛盾着的对立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相互间都

可以说是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而它们之间都是具有着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革命工作者首先应该有坚决反对敌人的斗争性，但同时也应该有善于利用和发挥一切矛盾方面的任何可以利用和发挥的积极因素这一种灵活性。不注意对立面的斗争性固然会陷于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应用对立面的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也有走向“左”的冒险主义的危险。中国革命史上的“左”的冒险主义领导，在方法论上就是陷入了忽视对立的同一性的错误。必须善于掌握和应用对立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作用，不能认识和掌握一定条件下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赖作用，或只看得见正面事物的积极作用而完全看不见反面事物的任何可以利用的因素（当然也要注意，这种因素，并不是反面事物本身的主要的东西，而只是它的次要的方面，并且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的因素。例如毒草的主要作用是它的有害的方面，仅仅在把它铲除了的条件下它才可以发生肥料的作用），这是思想的一种片面性、表面性，也就是主观性的错误来源之一。

对立面的同一性，对立面的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也表现在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上。或者说，由于相互排斥的对立面有着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的作用，所以，发展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出现事物向对立面的转化。最明显的例子，如休息和工作，是相互排斥的对立面：工作时就不能休息，休息时就不能工作，但两者又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不休息就不能工作，不工作也没有休息的必要，就由于这个互相依赖的作用，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在一定时候由工作转为休息，或休息又转为工作。人的左右两脚互为对立面，在走路的时候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这种互相依赖作用的表现，就是人们在走路过程中，两脚必须交替向前，而不是两

脚同时向前。白天转化为黑夜,鸡蛋转化为鸡,失败转化为成功,合作化运动由量的发展转化为质的整顿巩固,战争转化为和平,被压迫的人民转化为国家的统治者,毒草被铲除后可以变为肥料,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反动派的阴谋活动被揭露后可以成为对人民有益的反面教员。在肃反运动中,首先着重指出要提高警惕(也要附带注意到防止偏差),在运动开展后紧接着又要着重注意到防止偏差(但仍然不能忘记提高警惕)。这是严肃和谨慎两方面的态度的对立同一性的表现。对立面的互相转化的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它说明一切发展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要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如果不转化为对立方面就不能继续前进。因此,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必须遵守这个规律和善于应用这个规律,才不至于犯错误。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必须注意以下的原则:一方面,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联系着的,由于这样的情形,在观察各对立面时就不要只看见其中一个方面事物在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完全忽视了另一个方面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挥的某些积极因素,同时,又要注意到对立的双方面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它们就不可能是同时平衡地起作用的,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这一个方面成为发展的重点,在另一个时期另一个条件下又必须比较着重于另一个方面,这样就出现了对立面互相转化的现象。我们必须自觉地把这个规律应用在工作中,主动地在工作中安排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的过程。譬如战争,在出击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主动地安排可能的和必要的转移或休整。又譬如生产运动,在苦战到一定的时候,就要考虑组织休息。应用这样的规律来安排工作,就能使工作有节奏地、同时又很顺利地向前发展。

以上所说的就是关于对立面的同一性的基本内容。但是，为着要能够正确地了解和应用对立面的同一性的原理，必须认真注意到已经指出过的这个原则：对立面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对立面共处于统一体中和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的情形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之下才能出现，对立面不是在任何条件之下都能够互相以对方为自己的存在条件而共处统一体中和互相发生转化。列宁说：辩证法是要“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就是指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这个原则。

对立方面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以对方为自己的存在条件而共同处在统一体中。事物的发展有着相对静止或量变的状态和显著的变化或质的飞跃状态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在事物的相对静止的状态和量变的状态下面，对立面一般地是具有这种同一性的，而在显著的质变的状态下，对立面的原有的同一性常常就不能继续存在。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这样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毛泽东选集》三〇七页）在事物的相对静止的状态下存在的同一性，也不能成为绝对没有矛盾的完全的同一性，而只能有一定方面、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同一性。例如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的，但又具有同一性，思维任何时候也不能充分完全地反映存在（反映总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只能近似地反映存在，不可能达到两

者毫无一点矛盾的地步，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把思维和存在看做完全同一的东西（唯心主义者常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这个命题来表现他们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就是把思维和存在简单地、形而上学地看做完全同一的东西，而在实质上就是把存在归结为思维，把存在看做思维的表现，而否认了物质的客观存在）。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思维和存在之间有着辩证法同一性即矛盾的同一，对立的同一。生产关系是能够并且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但这种适合性的具体情形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过程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即使在有了最为适合的情形下，生产关系的发展速度还是落后于生产力的，因此也还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取得平衡，而且也可能取得这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发展过程中的平衡，绝没有任何静止的平衡。这个平衡是每年、每月、每日地不断地被突破，又不断地重新建立起来。由平衡到不平衡，再重新建立平衡，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平衡的真实过程。在这里，不平衡和发展是绝对的，平衡只是相对的，只是一个时候、一定方面的基本上的平衡。这样的平衡，要经常被破坏，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破坏后可以及时地由人们自觉地加以重新建立罢了。所以，上面我们说要善于依据一定的条件的需要来掌握事物对立面的正确的、适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这里说的“正确”和“适当”，并没有一个死的公式，而是要依据事情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联系的具体的内容和方法。要注意到对立面的同一性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些条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具体情况，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间的地位。同一矛盾的对立面，在不同的条件下，或者是在这一

点上具有同一性，或者是在那一点上具有同一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同一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是在于资产阶级依靠它的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来剥削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为了生活不能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这种情况的主要条件就在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在我国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首先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从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这种情况的主要条件就在于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资产阶级强大，工人阶级是国家的统治者并应用自己的统治权力对资产阶级的某些非法活动不断进行斗争。又如轻重工业的相互依赖，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条件下是首先着重发展轻工业，然后进一步发展重工业；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条件下是必须掌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同时又对轻工业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例子，说明即使在相对静止状态下面对立面的相互依赖也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具体的。至于说到在显著变动的状态和质的飞跃状态下面，上述对立面的同一性就不可能继续下去，而要发生破裂。例如在革命阶级对反动阶级举行革命的决战的情形下，前者对于后者既然要经过决战使之归于消灭，这就在实质上失去了依赖关系了。自然，事物发生质的飞跃之后，又会在新的基础上出现新的对立面的同一性。质的飞跃就是由一种形式的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对立面的同一性。但在质的飞跃的关节点上，旧质内部所包含的那种具体的对立的同一性在实质上就可以说是归于消失了。

再说对立方面的互相转化，这也只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而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同样是对立面的互相斗争的具体情

况。《矛盾论》指出了石头不能转化为鸡，只有鸡蛋才能转化为鸡的例子，用以说明这个原理。革命势力在反动统治下只有把力量积蓄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由防御转化为进攻，而不是象冒险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任何时候都可以举行进攻。失败可以转化为成功，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失败者要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否则决不能转化为成功。一般地说，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只能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也就是说转化的因素或条件必须是预先在事物自己内部包含着和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准备起来的，因此对立面决不可能无条件地任意转化，例如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在新中国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劳动者（通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决不是在任何国家都可以这样。在党所领导的“百花齐放”的政策之下，可以把“放”出来的“毒草”转化为“香花”生长的肥料，但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发生这种转化，而只是在有党的正确领导并与毒草作斗争的情形下才能如此。阶级社会可以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决不会再转化为阶级社会。唯物辩证法决不会使希特勒和杜勒斯转化为工人阶级战士，不会使太阳明天要从西方升起，月亮明天要落到地球上来，因为在事物本身内部不存在着这样一种转化的客观条件。离开了一定的客观的具体条件来谈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也就是离开了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讲辩证法，就会把辩证法曲解成颠倒黑白、荒谬绝伦的诡辩论。修正主义者就常常要玩弄这种诡辩论，例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那种国家资本主义，硬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就是毫无根据的诡辩，因为这种企业仍是十足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根本没有转化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条件。只有通过工人阶级革命的斗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它才有转化为社

会主义企业的条件,在资产阶级仍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说国家企业已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是诡辩论。这就和我们中国古代关于“卵有毛”的诡辩一样,在卵还没有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有毛的东西(鸡等)时,就说它已经有毛了,这完全是脱离客观事实主观地玩弄对立面转化的概念的错误的。列宁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灵活性,如果加以客观的应用,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哲学笔记》八七页)在研究对立面的同一性——对立面的互相转化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列宁的这一段话。

对立的斗争性,即指对立面之间的互相排斥的性质。说对立面具有同一性,说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互为条件又互相转化,这意思决不等于说对立面互相间是完全处在折衷、调和的地位上,可以没有任何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情形。相反地,对立的同一性中同时就存在着对立的斗争。“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矛盾论》)。不但如此,对立的同一性只在一定条件一定运动状态之下和一定范围之内(在某一方面或某些点上)才能存在,而对立的斗争性则是在任何条件之下和任何运动状态之下贯彻始终和贯彻各方面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对立的斗争性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停止斗争,即是发展的停顿,不与错误斗争,真理就不能发展,不与恶斗争,善就不能发展,不与丑斗争,美即不能发展,不与“毒草”斗争,“香花”就不能发展。对立的同一性之所以能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在于这同一性具有在一定情形

下推动斗争、推动解决矛盾的作用。前面说过的反动派的进攻能刺激革命人民起来打倒反动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此外美和丑的对比,一方面使美得到丑的对照而益显其美,这是同一性,同时又使两者互相排斥,是斗争性。工作中的评比方法,使先进工作和落后工作通过比较而益更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这是相反相成的同一性,而这样的比较同时又是推动工作人员互相竞赛的方法,这又是斗争性。实际上,没有斗争的情形和发展停顿情形在客观事物中是任何时候也不会真正存在的。“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矛盾论》)。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谈谈辩证法问题》)。

前面早已说过,所谓矛盾,就是事物自己内部分裂为对立的方面,其中包含着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方面和阻碍事物发展的方面。如果不通过斗争,使积极的方面克服消极方面,矛盾就不能解决,事物就不能前进。所以,发展的过程,主要地就是通过对立方面的斗争不断克服事物的消极方面的过程,是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矛盾不断地产生、不断地揭露和不断地解决的过程。这就是对立的斗争性为什么具有绝对意义的一般的理由。资本主义制度里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是消极的反动的方面,不消灭资产阶级就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就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并且在它的生产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共产主义的因素,这些都是它的积极的方面,但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某些资本主义势力和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于人们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灭,这就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方面,必须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中间不断地进行思

想教育和思想斗争,逐步地克服这些消极方面,才有可能保证将来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事物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具有互相转化的同一性。资产阶级在封建末期是革命的阶级,当它推翻封建制度自己成为统治者的时候,就逐渐转化为反动阶级了。再举民主集中制的矛盾来说,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积极的因素,但如果把民主过分强调,以至于脱离集中的指导,就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就变成消极的东西,这时就要强调集中,对极端民主进行斗争,以克服它的消极破坏性。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积极的指导力量,但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以至于脱离民主的基础,这样集中又会转化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消极的东西,这时就要开展民主,和官僚主义作斗争,以克服它的消极性。这里有两种解决矛盾的情形,一种是新生事物与衰亡的事物,前进的事物与阻碍前进的事物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情形,例如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矛盾的情况来说,当资产阶级转化为消极方面的时候,就必须通过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把这个方面消灭,才能克服矛盾。另一种是同一新生事物内部矛盾的解决情形,例如就民主和集中的情形来说,它们任何一方面之所以成为消极因素,是因为和另一方面失去了必要的、适当的、正确的联系,这时就要通过斗争,使它们之间的正确联系重新建立起来,使它们通过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作用而充分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就能克服矛盾。世界上一切事物矛盾的克服情形,不属于前一类,就属于后一类,如真理和谬误的矛盾,必须消灭谬误,才能得到克服,这是属于前一类。轻重工业或工业农业之间的矛盾,必须使它们之间建立适当的联系、适当的发展比例和平衡关系,才能克服,这是属于后一类。不管哪一类的矛盾,都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得到克服,这也

是斗争的绝对性。

在对立的同一性破裂的情况下固然有着斗争，在对立的同一性还存在着的情形之下，仍少不了斗争。并且，对立的同一性还是在一定的斗争基础上的同一性。“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矛盾论》）。没有斗争，对立方面就不能在一定条件下共同存在于一定的统一体中。因为对立方面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的，它们的共同存在经常并不是在平衡状态下的存在，即使说有平衡状态，一般地也总是以一方面为主导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不通过斗争是不能建立起来的，即使建立起来了，又由于对立面的互相排斥而趋向动摇和遭受破坏，因此又要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在一定条件下再建立起来。因此同一性、平衡，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斗争性则是绝对的。例如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历史证明这个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就是通过多次的斗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轻重工业之间的平衡状态，是在重工业的优先地位之上的平衡状态。没有一定形式的，随着矛盾性质的不同而不同的斗争，即不能实现以一方面为主导的平衡状态。由于斗争发展的情况不同，矛盾的主导方面会发生互相转化。只有在斗争的一定情形下，才能保持某一方面的主导。所以也可以说同一性是对立面斗争的一定情形之下的产物，同一性以斗争性为基础。例如在统一战线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必须经过斗争，才能保证自己的领导权。如果不进行斗争，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就有可能失去领导权的危险。至于说到对立面的互相转化问题，那末，没有斗争，就不能实现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这是很容易明白，不需要多加说明的。

关于对立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以上原理，告诉了我们在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基本原则，这就是：在实践中一方面要学会善于观察一定条件之下对立的方面的相互联系，善于掌握这种联系，以便充分利用和发挥它们的相互制约相互依赖作用来推动工作的前进。（在掌握事物的相互联系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到它是有条件的，同一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系更不一样。前者的例子，如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相互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就有所不同，后者的例子，如轻重工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敌我之间的相互联系就根本不同。轻重工业之间有着经常的相互依赖的作用，相互推动向前发展，敌我之间就不会有这样的经常相互依赖的作用。敌我之间可以有一定条件之下的暂时的妥协，敌人的进攻可以激起我们的反抗情绪，提高群众的斗争觉悟，这虽然也是一种可以注意并且可以利用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作用，但和轻重工业的相互依赖作用是显然不同的。）另一方面在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坚持斗争，要反对调和主义，要特别重视斗争的绝对性。在一定条件下掌握对立方面的具体的相互联系和坚持斗争这两者不但是不能分开的，并且也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也就是说，对立面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之间，也有着一定的同一性。前面说过，对立的同一性在一定情形下也有推动斗争的作用，这是由于对立面的相互依赖的作用使双方的斗争力量互相促进，使斗争向前发展，使解决矛盾的斗争过程趋于成熟。同时，对立方面的一定条件下面的联系，其目的有时正是为了进行斗争。例如为了解决一个主要矛盾，打击一个主要斗争对象如帝国主义，就要联合次要矛盾方面（如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

争的战略策略上规定了要争取“中间势力”这个原则，这个原则的哲学解释，就是指为了解决主要矛盾而联合次要矛盾的各对立方面的意思。同时，要使我们实际斗争中需要联合的对立方面能够正确地联合起来，在这些对立方面之间就必须进行一定的必要的斗争，没有适当的斗争，就不能达到联合的目的。联合中间势力就包含着斗争，这也是“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敌我之间固然要有斗争，人民内部的矛盾，也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解决，才能保证人民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的团结。问题只在于，敌我之间的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斗争，在方法上应该有根本的区别。敌我之间的斗争是采取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方法，外部力量冲突的方法，势不两立、谁战胜谁、你死我活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或者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是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求得进一步团结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善于及时地揭露矛盾，并及时地想出办法展开斗争来解决矛盾。为什么要及时地揭露矛盾？因为只有及时地揭露矛盾，才有可能及时地动员人民来努力斗争，争取解决矛盾，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事物的客观发展过程通过人的努力而得到极大的促进力量，使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可能迅速地、顺利地得到最大的胜利。客观事物自己本来是会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的。但是，如果它的发展过程不经过人的自觉的努力来加以促进，那末，这个过程就必然发展得很缓慢，就可能发生很多曲折，就可能遭受许多破坏和损失，这叫做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过程。因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很复杂的，要经过人的自觉努力才能克服某些消极因素的阻碍，才能

使事物的发展顺利前进。并且,由于对立面的同一性的作用,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各对立方面都会有所发展,不但积极的方面会强有力地向前发展,消极的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如果不及时揭露这些对立面的发展趋向,及时地通过斗争来克服消极的方面,那末,等到消极的方面发展到更有力量的时候,事物的前进就要受到更大的阻力,那时要来解决矛盾,就要费更大的力量和受到更大的破坏,这样事物的前进发展就会要被延缓、就要遭遇更大的困难。例如我们中国在土地改革以后,如果不及时地揭露农村中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动员大多数人口的贫农下中农来进行合作化的运动,那末,等到富农的经济力量生长起来,那时合作化运动就要受到更大的阻力,两条道路的斗争就要花更大的代价,而合作化就要推迟了。所以,当我们研究矛盾的对立面的斗争性问题的時候,还要把握到及时揭露和开展斗争的原则。一个矛盾解决之后,立即着手揭露第二个矛盾,并及时展开新的斗争。这样就可以尽量减少我们工作中的一切可以避免的曲折和损失,就可以尽量迅速地、顺利地实现我们的任务,实现我们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要把握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互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以事物发展的矛盾法则做基础的。这就是要在斗争中、工作中不断地、及时地去揭露事物的矛盾,并及时展开斗争来解决矛盾,而在用主要力量解决当前阶段的矛盾的同时,又适当地注意到为下一阶段的矛盾的揭露和解决准备适当的条件。

五 斗争的对抗与非对抗的形式

对立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个原理并不排斥斗争形式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多样性。相反地，斗争的形式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应该是依据矛盾的性质和各种条件的不同而有多种多样的表现的。形式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某一种斗争形式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片面地看做绝对不能改变的东西，因而就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自然界事物的对立面斗争形式和解决矛盾的方法与社会现象中的对立面斗争形式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社会现象中的矛盾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解决方法和对立面斗争形式也依地方、时间和条件的不同而有多种多样的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必须善于依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工作中所遇到的矛盾，而不能用一种固定的形式和死的方法来束缚自己，这样才有可能把革命较顺利地引向胜利。例如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我们中国的方法就不是用强力一次剥夺生产资料的形式，而是主要采取和平改造即赎买的形式。

在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中，特别应该研究的是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对抗的与非对抗的。对抗的斗争形式，即是表现为物质力量的外部冲突的形式。“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矛盾论》），都是矛盾的对抗性的表现。至于非对抗的形式，则是指一切不表现为外部冲突的斗争形式。所以，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把一切斗争都看成对抗，这是“左”的冒险主义者的

幼稚观点。对抗和非对抗这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是由不同的矛盾的性质以及矛盾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条件所规定的，矛盾的性质有对抗性的，也有非对抗性的。对抗性的矛盾是指这种矛盾的对立面之间所处的相互地位具有可能爆发为外部冲突的性质，因此这种矛盾的解决主要地是要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非对抗性的矛盾的对立面之间则不包含着必须爆发为外部冲突的因素，因此矛盾的解决也不必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对抗性的矛盾，例如阶级社会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矛盾，由于两者之间在经济地位上相互处在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地位，所以这种矛盾是具有对抗性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属于对抗性质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例如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两者之间的经济地位不是处在利害根本冲突的地位，相反地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这种矛盾是没有对抗性的。一般地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具有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是没有对抗性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除了有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个矛盾原是具有对抗性的，由于工人阶级采取了适当的政策和斗争方法，又由于在工人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下面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地已不坚决抵抗，这个对抗性的矛盾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依据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不同的矛盾发展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来解决矛盾，这是保证实践行动的正确指导的一个必要条件。

研究斗争的对抗与非对抗的形式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两者的联系和互相转化。对抗性的矛盾在解决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某种对抗的斗争形式（对抗形式也有各种各样，如炸弹爆发的对抗形式，军事对抗，政治冲突等等），但在一定的发展条件之下也可以和非对抗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如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议会斗争和某些合法的公开的斗争。自然，即使是这一类斗争中也常常会包括外部冲突的形式），新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中所包含的阶级矛盾，对于这个矛盾的解决，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采用批评教育的方法。但是这个矛盾本来是具有对抗性的，所以，为着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斗争形式仍免不了要包含着对抗的方面。例如“三反”、“五反”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基本完成以前时期的一次重要的斗争。这次斗争是开始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领导举行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猖狂进攻，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为打退这个进攻才起来加以对抗。这次斗争就其重点方面说来就具有对抗的形式。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是经济力量极软弱的中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也有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要求，并且长期地和工人阶级有着联盟的关系，由于他们在新中国是被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因此，即使是在“三反”“五反”这样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也有可能重点的斗争——对于严重违法户的斗争——采取对抗的形式之外，又大量地把非对抗的斗争形式——说服教育的形式——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是说，这里又有非对抗性的方面。“三反”“五反”以后，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主要是采取了说服教育这一种非对抗的形式。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

过和平的道路实现的。但是，这种和平道路并不是没有斗争的道路，而是自始至终贯串着种种斗争的道路。所以叫做和平的道路，只是因为矛盾的斗争不表现为军事的对抗，并且在一切斗争中都力求加强广大人民的革命统一战线，而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这里说的和平道路，也决不等于说斗争形式仅仅是非对抗的形式，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是既有对抗形式也有非对抗形式，并且在决定性的斗争中，对抗的形式在一定条件下还是起着重点的作用。这里必须注意到对抗性矛盾向非对抗性矛盾的转化。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我们党的政策是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也就是说对他们是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的。由于我们的政策的正确，对矛盾处理的正确，所以矛盾的对抗性的表现，终归是小量的，而大量的情形则是非对抗性的。

对于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而且应该避免以对抗的形式来解决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在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时由于主观上的错误——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等——敌对阶级的影响之类），也往往会发生对抗的情形，甚至于矛盾的性质也由非对抗的变为对抗的。但这决不能成为主要的情形。

所以,矛盾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是能互相转化的,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反过来也是如此。在矛盾的对抗性或非对抗性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形下,斗争的对抗形式和非对抗形式就当然要互相转化。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已经指出过这个原理,那里面所提到的党内斗争变化为党外斗争的情形,就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例子;城乡矛盾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形,就是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的例子。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毛泽东同志更进一步地总结了几十年来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国内和国际经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斗争的经验,把上述原理更加具体化和更加发展了。这个原理的发展,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它将会指导今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较顺利、迅速地走向胜利。

毛泽东同志说:“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矛盾论》)。这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解决矛盾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要善于依据矛盾的不同性质和它的具体发展条件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一方面不能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敌我矛盾,同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中错误地采用对抗的斗争形式,而在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时候,除必须采取一定的对抗的斗争形式之外,还要善于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利用非对抗的斗争形式。这就是我们研究对立面的斗争性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个基本原则。

(乙)量和质的互相转化的规律

一 事物的质和量，质和量的统一

在前面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章中我们说过：事物由于自己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结果在发展过程中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正如列宁所说：“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哲学笔记》二〇九页）对立统一规律的这一个方面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最普遍的表现形态之一，就是由量变转化为质变，又由质变转化为量变的规律。或者简单地称做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量变和质变的规律等。这是辩证法关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第二个规律。

要了解这个规律，首先要研究一下什么是事物的质和量。

质是事物自己的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使事物具有它本身固有的特性，并在实质上与其他事物有所区别。所以，质又是事物之间的实质上的区别性。观察事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它的质的规定性和它对其他事物的区别性。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了错误，就要犯一系列其他的错误。例如在革命工作中不认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质的区别，就会犯一系列的政策错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的意义，就在于要认清不同阶段的革命的质的区别，并根据这个区别来规定不同阶段的不同的政策。事物的质的区别往往在表面上是不容易认识清楚的。要认识清楚，常常需要一定的实践经验和正确的思想方

法。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或虽然多少经过革命斗争但没有认真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法锻炼的人，在一定的实际斗争中有时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的质的区别，错误地或者认敌为友，或者认友为敌，以至于造成斗争中的巨大的错误和损失。这种例子是不少的，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间，就有这种情形。质和性质、本质等是基本上同一意义的概念（参看本书第九章“本质和现象”一段）。质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表现为种种基本的属性或特征。把握了事物在运动中所表现的基本属性或特征，也就把握了它的质。所以，要认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首先就在于确定它的某些基本属性或特征。例如说食物和毒物在质上有根本的不同，这是由于食物在被人吃下去时有供给营养的属性，而毒物则有破坏人体组织的属性。液体的水和蒸汽有质的不同，因为水有如象能溶解盐糖等物之类的许多物理属性，蒸汽则不能。钢和铁有质的不同，这表现在两者用来制造机械时有不同的属性，这种属性的不同，钢铁工人和机械工人是很熟悉的。又如个体农民是站在十字路口的阶级，因为它同时具有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征等等。

质的规定性的来源首先是在于事物自己内部的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各方面以及主要方面的特点和由此形成的矛盾的总体的特点），这在我们讲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时，已经讲过了。事物与其周围的其他事物的联系，对于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的具体表现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中国是大国，这个地理条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这个具体特征就具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如果中国不是大国，而是很小的国，在反抗强大的侵略者时要使战争具有持久的性质就会有更多的困难。河水在水利工作不好的情形下，对于人

民生活具有有害的性质,在水利工作很好的情形下,水害就会变为水利。这也是周围事物的联系对于质的影响的一个例子。因此必须研究事物的矛盾,然后再注意到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才能够对事物的质获得正确的理解。这里还必须注意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原理,即外部联系的变化之所以能对事物的质产生影响,只是由于这种变化影响了内部对立面的相互关系的缘故。河水本来具有着有利和有害的两个对立面,水利工作的影响只是在于使这两个对立面的一方居于主导地位。

事物除了质的规定性以外,还有它的量的规定性。不具有任何质的规定性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同样,只要有某种事物存在,就必定是具有一定的量的存在。质和量是一切现实存在的事物所不可少的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但质和量是不同的,质规定着事物自己本身固有的特性,因此质的区别,就是事物之间的实质上的区别。量的规定性只是指示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规模,量的不同不一定就意味着事物的实质上有所不同。同一类的事物可以具有不同的量,但仍然是性质相同的事物。量的变化,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不影响质的规定性。在这种情形下,事物的量的规定性和它的质——它本身固有的特性——似乎是不相干的,因此量的规定性有时又被称做外部的规定性,意思是说它与事物的本身实质在一定范围内似乎没有什么内部的必然联系。

但是,如果把量和质看做是完全没有相互联系的东西,那就错误了。首先,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的量,都是在一定的质的基础上的量,或者是与一定的事物的属性和特征相结合的具体的量。例如,物体的大小,温度的高低,运动的快慢,电力的强弱,波的长短,原子价的多少,生物发育生长期的长短,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

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产主义因素的大小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量，都是与事物的一定的属性相结合，并且是依靠着这些属性才有可能加以衡量和计算的，如量布要利用它的长短的属性，量温度依赖物体遇热膨胀的属性等，不与任何事物的属性相联系的量，只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主观中的量的抽象形态，在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没有这样的东西。抽象的一、二、三……不能作为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而存在，实际存在的只是一个、二个、三个……具体的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的思维中关于量的抽象没有任何意义。合理的抽象使人们能够把握到事物的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性，科学的思维不能缺少这样的抽象。数学这一门科学正是通过思维上的抽象方法撇开事物的质的方面来研究它们的量的规律的。数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科学。

不但实际存在的具体的量必须依据一定事物的质才能存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就可以知道，质对于量也不是完全没有依赖关系的。在量变的一定范围内，质的规定性可以不受影响或基本上不受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事物具有着质的安定性。但量的变化达到某种程度时，它就要显著地影响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这时我们就会看到它的质的安定要遭到破坏。水的液体的质的安定性在一个标准气压之下，它的温度的增减只能在摄氏表零度到百度之间，否则就要变为固体或气体。使用手工工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一定的最高限度，要想超过这个最高限度，就只有使工具的质加以改变，即把手工工具改为机器。

这些情形告诉我们：一方面是在一定的质的基础上，量的变化有它一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这说明事物的质规定着它的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一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又以一定的量的活动

限度作为必要的条件,量变在这样的限度内保证着质的安定性。量变突破了这个限度,事物的质的安定性就要被破坏,就要转变为另外的质。在这里,质和量是互相依赖的,是拥有着统一性的。事物的质和量的这种相互依赖的性质或质和量的这种统一性,在哲学上就叫做度。把握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性,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凡事要做到“适度”,这是说要正确地掌握事情的量的限度以保证事情能具有某种所希望的质。人们常常用“大师傅拿火色”作为比方来说明度的掌握的重要性。炼钢的工人要善于适当地掌握炉子里的温度和风力的强度,否则就不能保证一定的钢的质量。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已能够把这样的原理作出哲学上的概括,如孔子说的“过犹不及”、荀子说的“物忌过盈”,就是很好的例子。

研究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的原理,要求我们在实际行动中也把它作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指针。这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一)在解决有关量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它是一定的质的基础上的量,否则量的掌握也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当我们在生产中要求完成一定的量的指标时,决不要忘记一定的质的保证。如果不能保证质的规格,仅只片面的完成数量任务,那结果是在实际上也并没有真正完成量的任务,因为这里的量是空洞的形式上的量,是脱离了质的基础的量,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是要重新返工,就是要使消费者受到很大的损失。这是一方面。(二)在担负某种有关于质的变革的任务时,又必须要注意到量的适当的掌握,因为如果不能掌握适当的量的范围,也就不能保证工作的质的稳定。这就是要注意到上面说的“适度”的原则。在掌握上过了一定的“度”时,就要犯“左”的冒险主义错误,反过来说,如果“不及”一定的“度”,就有右

倾的危险。例如在土地改革的斗争中，斗争的打击面必须控制在人口的百分之十以内，否则就不能保证斗争的反封建性质。又如国家对一切生产事业要求利润上缴的数量，必须依据企业生产发展的情形，保持适当的度。过少了国家不够开支的需要，过多了可能影响企业的积累和分配，从而影响它的发展，等等。这里要注意的是，事物的数量发展的可能限度，也是可以随情况不同而有变化的。

二 由量到质和由质到量的互相转化

如前所说，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它一定的度，即它的量和质的相互依赖关系或量和质的对立的同一性。依据量和质的这种的相互依赖关系，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在事物的运动发展过程中，量变和质变会不断地互相转化。首先，量变是在一定的质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一定限度内，量变不影响质的安定性。但这也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情形，量的变化一超过这个限度时，质的安定性就受到破坏，于是就引起质的变化，旧质就归于消灭，而出现了新的质。这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或简单地叫做量变为质。由质变而产生了新的质后，又开始表现了它的安定性，于是在新质的基础上，量变的过程又再度进行下去。这就是由质变又转化为量变，或简单地叫做由质变量。由量变质，又由质变量，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构成事物的无限的多样的变化发展过程，这就是事物的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就是量和质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立统一规律。

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量的

逐渐进化和质的根本变革交错进行的过程，而不是如形而上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只有单纯量的增减的过程，量变采取渐进线的形式，进化的形式，是缓慢的不显著的变化形式。在量变的过程中，事物不发生实质上的根本变化，从事物的质的方面来说，可以看做事物是相对地不变的。形而上学否认事物的质变，把仅仅存在于量变过程中的事物实质的相对不变性夸大为绝对的不变性，这种片面夸大的观点是错误的。质变的形式和量变相反，它采取突变即飞跃的形式，也就是迅速地使事物发生显著的变化形式（即使是逐渐过渡式的质变也仍然是一种比较迅速的显著的变化形式）。质变说明事物在根本上实质上发生了变化，它使量变的渐进线发生中断，形成发展的渐进线中间的关节点，在无限延长的渐进线中反复出现使渐进线中断的关节点，这就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最简略的图画。

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说明，量变的过程在一定范围内虽然似乎与质无关，但它在实际上就是质变的准备，在量的进化中不断地发生着许多细微的变化，这些细微的变化中就生长着质变的或新质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大机器工业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逐渐生长了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的人民公社中，出现了共产主义的萌芽。所以事物的质变在形式上虽是突变，但突变决不是毫无根据地突然出现的意思。质变是通过量的渐变过程有规律地准备起来的，这个规律性是可以被人认识并且加以利用的。形而上学者中间有一种所谓“突创论”或“倏忽进化论”（Emergence）的思想，把新事物的产生看作是突如其来的，不承认其中存在着可以为人所认识的客观规律性。这种谬论当然是完全反科学

的。恩格斯说：“自然界的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自然辩证法》四七页）

另一方面，质变虽是在量变过程中有规律地准备起来，但它本身是事物的根本的迅速的变化。这说明事物的渐进的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时，就必须经过革命式的或根本的变革，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质变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旧质对于量变的活动规模有一定的限制，如果不通过质的根本变革，量的变化就不能超出这样的限制。例如旧社会制度——阶级剥削制度及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等，对于社会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有一定的限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须使社会发生根本的变革，消灭剥削制度及小私有制度，也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则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就要受到阻碍。因此，事物的量的发展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必须发生质的突变，然后在新质的基础上，才能开始进一步的量的发展。这样就使事物的发展过程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阶段式的上升形态。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采取一种庸俗进化论的形式，认为一切事物的变化的正常秩序都是渐进性的，否认根本的变革的必要，硬说革命式的突变是不正常的现象。这种观点在实际上和以前形而上学只承认量的增减，否认质的变化的观点是一样的错误。

要深刻地理解量和质的互相转化的规律，要揭发量的发展为什么会有规律地引起质变，质变为什么又使量的变化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基础，这就需要涉及到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要

在发展的内部矛盾中去找它的根源。前面说过，由量到质又由质到量的变化，是事物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的具体表现，而事物之所以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原因就在于内部的矛盾运动。不能把量变的过程看做仅仅是表面现象上所显示的数量增减的过程，在量的积累过程中，事物的矛盾，事物内部的各对立方面的相互关系就在逐渐发生着变化，虽然一般的说，这只是不显著的，非根本的变化。在《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到一个社会有了适合需要的制度（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适合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时，就不需要对于制度进行根本的变革，但在这时，仍然有着许多日常性质的、非根本性质的矛盾需要调整。并且指出，这种日常性质的经常需要调整的矛盾，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这就说明在量的变化过程中，事物的内部矛盾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量变过程中的矛盾的变化，是比较不显著的、非根本性质的，但这变化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即形成新质的条件、因素或方面逐渐在生长起来，而原有的质的因素或方面则愈接近消灭。所以，所谓不显著的变化，也就是矛盾关系的潜在的变化。起初代表原有的质的因素、方面是居于支配地位，居于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新质因素、方面则不是主要方面，随着量的增减过程的发展，新质因素的作用愈加增大起来，最后矛盾的主要方面终于发生了根本改变，于是原有的质的因素、方面由主要的地位退为非主要地位，而新质的因素、方面却起来代替了它的主要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这种根本变化，就是事物的质变的内在原因。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液体的水的分子之间，具有着凝集力和扩散力这两个矛盾方面，在一个大气压压力下面，水的温度由摄氏零度增长到百度的过程中，扩散力的方面

逐渐增长,但凝集力始终是居于支配地位,这时液体只显现为量的渐变过程,但达到了摄氏一百度的界限时,扩散力就变为主导的力量,水的变化过程中就出现了叫做沸腾这一种突变的现象。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质变,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社会化的范围日益扩大起来,把资本家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冲破的结果,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日益生长起来,把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打倒,自己掌握了统治权的结果。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掌握统治权,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质变关节点的内在内容。

量和质互相转变的规律的基本实质大体上就是这样。认识这个规律对于我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们如何利用这个规律来作为我们实际生活中观察问题和指导行动的科学方法呢?这主要地应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既然发展是由旧质到新质、由低级到高级的阶段式的上升过程,而每一阶段的转变都必须通过革命式的根本的突变,必须经过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地位的根本改变。因此我们首先就必须用革命的眼光和革命的精神来观察和对待一切问题。这就是说,要敢于在我们的工作中对事物进行根本的变革,要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注意准备着这样的变革,要善于及时地揭露在量变过程中生长起来的矛盾,及时地展开斗争来推动事物的质变,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在一个质变的任务完成的时候,接着就准备另一个质变的任务。要勇于在工作中提出并坚决贯彻那只要经过艰苦努力就可以实现飞跃的任务,为此就要反对庸俗进化论和爬行思想,庸俗进化论和爬行思想害怕飞跃,不承认飞跃,不承认对事物进行根本变革的必要,更不承认我们在工作中有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的必要。

它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世界观。右倾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在实际上是具有着庸俗进化论观点的性质的。

第二，既然质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地偶然出现的，而是在量变过程中逐步地有规律地准备起来的，因此我们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必须认真地注意事物由量的积累进到质的飞跃的具体规律。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有勇于对事物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精神，而且也要有实事求是地对于事物的发展从事精确的量的计算和细致的准备工作的精神。这就是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没有足够的在日常具体工作中所进行的艰苦的量的准备，不要轻易对旧事物举行革命的决战，虽然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在精神上准备决战；一切工作要注意到量的方面的精确的计算和恰当的掌握，凡事要做到真正“肚里有数”，反对粗枝大叶地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反对把革命事业变成盲目冒险行动，反对工作中的急躁冒进或“左”的机会主义的态度，虽然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只要有了一定的可能，我们就要不怕困难地、毫不迟疑地采取革命的步骤；反对那种不愿作日常的具体的、细致的准备工作，只希望革命变革在一个偶然机会下面侥幸降临的机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虽然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积极地主动地进行争取实现革命的变革的准备。

第三，把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就是要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善于把量的发展工作和质的变革工作适当地结合起来并交替地加以应用。正确的工作发展过程，必须是符合于由量到质又由质到量这个渐进线中包含许多关节点的规律的。如在群众运动中，紧张的劳动之后，必须继之以适当的休息，以便准备精力进行下一次的紧张劳动；军队经过一个战役之后，必须争取休整的时间，以便组

织再一次的战斗。领导各种群众运动，在组织上的一定程度的量的发展之后，必须转入质的巩固工作，然后再作进一步量的发展的措施。必须把革命发展的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结合起来。善于掌握这样的规律，就能够指导工作健康地强有力地同时有节奏地不断向着胜利的方向一步步前进。

三 量变和质变过程的具体分析

实际生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当我们把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当做科学方法，用它来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要避免简单化、公式化，对于所要研究的事物的量变和质变的具体情况，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

首先就量变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观察事物的量变的时候，多半只是依据它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特征的量的增减，来作为它的总体方面的量变的标帜。如说水的温度升高了，生产力提高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了，某人在思想上工作上有进步了之类。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包含着对立的各个方面的，事物的量变不仅仅只是表现在代表总体方面的量的发展某些量变标帜上，还表现在它的各个对立方面的不同情况的量的变化上。如果只看到一个代表总体方面的量的变化，我们的认识仍不能脱离表面性和片面性。要深刻地了解事物的量变过程，必须进一步具体研究它的各对立方面的量变的不同情况。在量变的总的过程中间，事物的各对立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不但是极不相同的，而且是互相矛盾的。例如前面说过，当水的温度增加（这是代表总体方面的量的增加）的时候，它的分子之间的扩散力量是逐步增强了，然而凝集力却相对地

减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力量在经济上政治上增强起来,但无产阶级力量也在增长,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还会更大的增长。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关于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的分析,是具体地深入地分析事物内部各对立方面的量变的范例。例如他指出,在抗战的第一阶段里,我方是处于劣势的,但在这个阶段我方的这种劣势就有两种不同的变化:一种是向下的,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但“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另一种是向上的,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而“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样的具体分析,就使我们能够深刻地把握事物的量变过程的内在内容,即量变过程中事物内部矛盾的变化,并且把握到量变和质变的密切联系,也就是把握到事物的新质在量变过程的矛盾运动中如何准备起来。这个方法我们应该普遍用于我们的工作中,在从事革命的斗争过程中,要经常注意各阶级和各种社会集团的不同的变化情况,在生产工作中,要经常注意对生产发展的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对比的变化,等等。形而上学把量变看做好象是与事物的实质没有任何关系的单纯外表的量的增减,其原因之一就是在于不能够把量变的观察和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的研究结合起来,不知道研究在量变过程中事物内部各对立方面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就是在于对量的观察的片面性和表面性。

其次,单就理论上来说,就人的思维里所反映的纯粹形态的规律来说,量变和质变有着根本的区别,量变不是质变,也不包含质变。但在实际生活中,量变的过程和质变的过程是交错地存在

着的。在总的方面来说只是量变的过程中，就其局部或某些方面来说也存在着质变过程。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从开始萌芽，一直到帝国主义时代，总的来说，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的质是不变的，在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可以说始终是量变的过程，是资本主义日益增长和生产日益集中的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前期，自由竞争占居支配地位，在帝国主义时期，支配地位却被垄断所代替。由自由竞争到垄断，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方面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还未最后完成社会改造以前，可以说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但在这个时期中，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在中国就有几个阶段：互助组织、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一定方面的质的不同。就这样的情形来说，在实际生活中，量变的总的过程是包含着某些方面的质变过程的。同一事物在它发展的各阶段之间有着某些重要方面的质变，不注意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同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各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就不能具体地认识和利用各阶段的特

会,不需要准备革命的斗争;现代修正主义者甚至于硬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了。这些都是由于忽视了这个原则,即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虽然和自由竞争时期有某些方面的不同,但总的来说它终究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根本有区别的,不经过革命的质变,它决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

再就质变来说:一切事物的质变都具有着飞跃或突变的共同点,也就是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发生根本的变化,就其内在的内容来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根本易位。但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情形不同以及周围的条件不同,飞跃过程所采取的形式也会是多种多样的,飞跃过程所采取的形式是因事因物而有不同的,必须就具体情况来作具体分析。有经过新旧事物的激烈冲突的形式,即新事物通过暴力来代替旧事物的形式,也有新事物和平地代替旧事物的形式;有不需要任何过渡,只要量的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立即实现飞跃的形式,也有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仅仅开始进入飞跃过程,但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过渡或中间阶段才能使飞跃完成的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只是就最主要的、基本的类别来说的,其中自然还包括着无数更具体的不同的形式,也有以上各种形式错综结合着的形式。

恩格斯论到新事物如何代替旧事物时,这样说:“如果旧的东西充分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便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便暴力地代替。”(《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七页)这说明社会的质的变革由于内部矛盾的性质和所处的情况不同,就有不同的飞跃形式。在矛盾不具有对抗性的社会生活过程里,例如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质变和革命一般地不需

要采取暴力的形式。通过暴力形式的飞跃通常是对抗性的社会生活（如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的质变形式。但是，就在具有对抗性矛盾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暴力的飞跃形式之成为必要，也是由于旧的势力不肯自动地不加抵抗地归于灭亡，只要能够用暴力来抵抗时，它总免不了要用暴力来抵抗这个“必然性”的缘故。如果在特殊的条件下，旧势力对于变革已不能采取暴力抵抗的态度，而采取“充分理智”的态度，飞跃的和平形式仍然是可能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然，在这里也不能忘记，这种情形之能够出现，终归还是斗争的结果。不过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新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采取了适当的处理方法，这个斗争不是或主要不是采取暴力对抗的形式，而是采取了和平的形式，采取了批评教育的形式罢了。

自然界事物的质变，就存在着有无过渡状态的两种情形。水结为冰是在温度降到摄氏零度的时候立即实现的；元素周期表的变化，也是在量变的一定关节上立即实现质变。这是没有过渡状态的飞跃的情形。另外，如象玻璃由液体变固体或相反的转变，铁块变为铁水或相反的转变，中间就有着一个粘质的过渡阶段。就社会现象来说，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质变，是在资产阶级从封建地主阶级手里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实现了，这中间就不再需要一个过渡的时期，但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并不是在无产阶级经过革命斗争取得政权的时候就立即完成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开始，要完成这个飞跃，需要相当长的一整个过渡时期。在这里，质的飞跃是采取逐渐过渡的形式来完成的。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

渡,也可以肯定是通过逐渐过渡的形式。语言的变化,也是采取逐渐过渡的形式实现质变的很好的例子。

逐渐过渡也有种种情形。首先是过渡时期如何开始的情形,就有种种不同。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是在经过十月革命的爆发式的暴力斗争,从下而上的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时候开始的。中国的情形却有不同。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用暴力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权,当这个爆发式的革命任务完成时,工人阶级已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在事实上已建立起工人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专政),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代表参加国家机关,但并没有居于掌握政权的主要地位。因此,在民主革命获得胜利后,不必再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其次,逐渐过渡的本身也有种种形式。逐渐过渡的共同特征是新质的逐渐积累和旧质的逐渐消灭。但新质的积累和旧质的消灭规律在不同的事物里有不同的表现。在语言的变化过程里,新质的积累和量的变化几乎是不能分开的,与量的增加同时就有着新质因素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出由旧质到新质之间的过渡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什么时候终结的明显的界限。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开始和终末,却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从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开始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的时期。这一整个时期,就是由有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向消灭阶级剥削制度消灭贫穷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这个总的质的飞跃,是通过逐渐过渡的形式而实现。这里的逐渐过渡的形式,和语言变化的情形就大有不同。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

社会的过渡，每一点量的增加都有着新质的增长的过程，在这里，整个过渡时期的总的飞跃过程，是通过若干个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步骤而完成的。在苏联，工人阶级经过十月革命取得政权后，立即在一切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部门把生产资料从资产阶级手里剥夺过来，以后又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其他工商业部门战胜了资本主义，至于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进入集体化运动的高潮的。中国的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在农业方面的总的飞跃，是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等这些步骤来完成的，在这里，每一个步骤都是一次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经历着统购包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步骤而完成的，每一步骤同样也是一次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过程。所以中国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是由几次由量变到质变的步骤汇合而成的一个总的逐渐过渡的过程。因此，逐渐过渡的飞跃形式，也有种种不同的特殊情形，要求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对具体事物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

此外，事物的质变，是在质变实现以前通过一定的量的发展过程准备起来的。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结果。量变和质变，在原则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就是说，质变决不是量变，质变这个范畴的本身决不含量变的意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要注意到这样的情形，正如量变的过程中包含着某些方面的质变一样，质变的本身，虽然在原则上决不是量变，但却也随伴着一种量的扩张的过程。什么叫突变或飞跃呢？这意思就是说，新的质或新的事物在较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地出现，迅速地占领广泛

的地盘，并代替了旧的质或旧的事物的支配地位。不论是在量变的一定关节上立即实现质变也好，或是采取逐渐过渡形式实现质变也好，都有着新质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占领广泛的地盘的共同特征。不随伴着这种量的扩张的质变是没有的，这种扩张并不是质变以前的量的积累，而只是质变时候表现飞跃特征的一个不可少的量的标帜。

随伴着质变而出现的量的扩张过程，也具有着一定的规律，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且这样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这个规律就是，新质的出现，是由个别到特殊再成为普遍的。新事物或新质因素的出现，最初只是在旧事物的广泛地盘中某一些点上突破出来的，这时候，新的事物在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一种偶然产生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就说是个别地出现了质变的情形。这时新质只是作为新事物的萌芽因素而存在，还远没有取得支配地位，也就是还没有造成事物的全部质变。个别出现的新质因素，多半是极不稳固的，甚至于出现之后，又归于消灭的情形也是有的，因此它在形式上看起来好象是偶然的。但新事物终究具有着不可战胜的性质。个别出现的新质，经过与旧质一定时期的斗争，迟早要进一步扩展起来，由个别的点，形成为特殊的面，这就是新质已作为一个比较显著的特殊力量表现出来。通常在这样的情形下，新质就能明显地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和稳固性，因此就会很快地由特殊向普遍推移，这一推移的结果，新质就迅速地占领广泛的地盘，在全部事物中取得支配地位，这就是质的飞跃过程的主要阶段。就社会革命来说，这就是革命的高潮。

由个别到特殊又成为普遍的，这是伴随着新事物或新质出现时的量的扩张过程的重要基本规律。虽然复杂的实际生活中也往

往有不一定按着这样的发展程序的特殊情形，但一般地说来，新事物的出现总是采取这样的程序的。这个规律对于我们实际工作有很大的意义。第一，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决不要忽视任何初生的新事物，那怕它是微弱的，个别的点的存在，也要加以极大的重视，要经常注意什么地方发生了这一类似乎只是出于偶然的新事物，一旦发见了这样的事物，就要认真努力去培养它，创造一切条件来帮助它的发展，使它由个别变为特殊以至于获得普遍的胜利。换一句话说，我们要经常保持对于新事物的高度敏锐感觉，尽可能早地在旧事物中看出新的积极因素的出现，从个别中看出它的普遍意义，从偶然性中看出它的必然的前途。这样我们就能够对行动的前途作出科学的预见，并给予正确的指导。列宁在一九一九年革命极困难的时候，看见莫斯科附近少数工人们在星期六休假的时间自动地从事义务劳动，立即就写了一篇叫做《伟大的创举》的文章，指出这是工人阶级做了国家主人以后新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开始出现。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最初的一两年间，把当时出现的很微弱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看做是非常重要的新生力量，指出它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同志考察了新中国的农村情况，看见了有三户贫农坚持合作社的例子，指出“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上这些，就是关于如何重视个别出现的新事物的一些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范例。一般地说，社会中的这类个别的新生事物，通常都是人民群众自发地在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及时地发现这些创造，指出它的普遍意义，并加以培育推广，是领导者贯彻群众路线、使领导与群众密切结合的

不可少的环节。第二，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曾创造了一套培养新事物使之由个别向普遍方向发展的方法。这就是“个别突破”、“典型试验”、“普遍推广”的方法。例如先进生产方法首先常常是个别的劳动者或技术人员创造的，领导者发现了这种创造以后，把它拿到一定的特殊的范围内加以试验，经过这个试验过程，把试验的结果加以总结，把握了这个先进生产方法的一些基本原理，然后按照这些原理加以推广。这个方法就是完全符合于上述新事物的量的扩张规律的方法，也是我们在各种工作中到处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个方法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这个方法的胜利，也证明了我们对于这个规律的认识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这个规律的重大实际意义。最后，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调查研究方法，一般地说，也应该是首先抓着一些个别的典型事物来加以研究（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从典型研究中找出一般的规律，来作为工作的指导，这样的方法也是和新事物发展的上述规律相适应的。

（丙）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 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唯物辩证法的第三个规律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个规律的根本内容归根到底仍然是对立的统一规律，它是对立统一的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又一个普遍的形态。事物由于自己内部的矛盾，使它的某些特征、特性、方面在发展过程中向着自

己的对立方面转化，这种转化过程的反复出现，就使过程采取了否定之否定的形态。这个发展形态的特点就在于：向对立方面的转化，在形式上就是对于原来事物的否定，而第二次再向对立方面的转化，在形式上就成为前一次的否定的再否定，也就是被前一个否定所排除了的最初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方面在外表上又好象得到了恢复。恩格斯论到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时，这样地指明了它的特点：“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自然辩证法》三页）否定之否定既是“矛盾引起的发展”，所以必须以对立统一的规律为依据，才能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概括了事物发展的这样一种普遍的情形，即发展不仅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进到质变的前进上升过程，而且是采取曲折道路或螺旋式的道路的前进上升过程，从某些方面看来仿佛是不不断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的过程。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这样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特点，说：“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哲学笔记》二一〇页）。这就是说，向旧东西的回复，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的外表形式上的情形，而不是实质上回到了旧的事物；是在发展的更高阶段的基础上重现了旧事物的某些外表特征、特性等等，而不是简单的循环。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黑格尔哲学里被看做是制造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主要杠杆。他把否定之否定规律理解为理性构造的三段公式，并且力图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纳入“三段式”的现成的理性结构中，因此也就免不了常常要用“削足适履”的方式牵强地这样做。黑格尔虽然是第一个猜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人，并且利

用了他当时所能掌握到的丰富的知识来证明这个辩证规律，但他使这个规律受到了唯心主义的——公式主义的严重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在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硬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是仅仅照样援用了黑格尔的三段法公式（德国的杜林，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等——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和诬蔑。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这条规律时，只是援用了黑格尔的术语，而所阐明的内容，则具有完全相反的性质。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当做由思维所产生的强加在事物上的现成的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只是客观事物自己本身所固有的普遍的发展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在不同的事物中有不同的具体表现；人的思维只应该依据客观事物本身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来揭发这个规律，而不应该预先设想一套死的三段公式，用来硬套到一切事物上。正如一切普遍真理一样，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知识对于我们只可以作为研究的指南，而不能作为硬性的“证明的工具”（参阅《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三章）。

二 辩证法的否定和形而上学的否定

要了解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先要研究什么是否定——辩证法的否定。辩证法所理解的否定和形而上学所理解的否定不同。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否定只是简单地否认某一事物的存在或简单的指示某一事物已经消失，是单纯的片面的否定，是不包含任何肯定因素，不与任何肯定因素有任何相互联系的否定。在辩证法上使用否定的名辞时所包含的意义则不是这样片面的，它是反

映事物发展的这样一种客观内容：在发展过程中，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依一定的规律要转化为它的反面。所以否定并不是简单的否认或失去一事物，而是指事物的发展和转化。转化的原因是由于事物内在矛盾的发展，由于某些内部条件的变化，使得原有的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失去了在发展过程上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而成为阻碍发展的应该被否定的消极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只在一定的发展条件之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才是应该肯定的东西，超出了这个发展条件之外，它的这种积极意义都会丧失而转化为消极的东西，转化为应该被否定的东西），因此必须转化到它的反面，必须取得另外的，与它自己相对立的特征、特性或另外的形式，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否则发展就要受到障碍，就要成为错误或偏向。鸡蛋的蛋壳有保护蛋黄蛋白发展为小鸡的积极作用，等到小鸡孵成了，蛋壳就变成阻碍进一步发展的消极的东西，它就要被小鸡所否定，而转化为独立生活的小鸡。一种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時候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生产关系就不能适应，就要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的东西，它就要被否定，并转化为另外的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生产关系。否定是指发展中的新事物、新阶段或新的环节对于旧事物、旧阶段或旧环节的否定，一方面是否定了旧事物，旧阶段或旧环节中的某些消极的、过时的、不中用的东西——在发展过程上失去了积极意义的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等东西，另一方面却又是旧事物、旧阶段或旧环节内部生长起来的一切积极因素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于这些因素的肯定。否定和肯定在这里是互相联系着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同时又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和一切文化发展

的成果。辩证法的否定指明发展中新旧事物（新旧阶段、环节）的辩证的联系，新的东西既否定了旧的东西，又继承了和发展了因此也肯定了旧东西中发展起来的一切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所以，否定是向前发展的一个环节，否定是由过去的肯定转化而来的，否定又包含着新的东西的肯定。

区别形而上学的否定和辩证法的否定，在方法上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意义就在于我们对于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的认识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对旧事物的批判不要采取割断历史过程的否定一切的态度，要了解新的东西总是在旧的东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级的东西总是低级的东西的发展的成果。应该坚决否定的是旧东西中的一切消极的因素，一切已经腐朽的、必须要归于消灭的方面；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丝毫动摇调和的态度的。同时，又应该注意保护和继承过去的一切仍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因为新的东西本来就是继承了并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积极的东西才能建立起来的。在这里，否定之中又包含着肯定，对于一切积极的东西的肯定。当然，应该着重的是要把这些积极的因素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要原封原样地象古董家一样地把它保存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否定了过去一切企图创造包罗万象的体系的哲学形式，但如果没有过去全部哲学史的发展中所提供的积极内容（例如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的辩证法的合理核心），也不会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正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核心加以改造发展的结果，正是过去哲学史上一切辩证法因素的最高发展的成果。不但哲学是如此，一切事物的发展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来的大工业生产力，也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

社会则把这些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但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文化、技术以及经营管理经验被我们当做民族遗产批判地接受下来，自然，这种遗产在社会主义的更高级更丰富的人民文化中只能算是很为微小的一个因素。旧文化的糟粕是应该坚决否定的，但其中有许多精华，许多具有人民性的和可以纳入科学的成就，是必须加以肯定、继承和发展的。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下我国民族艺术的蓬勃发展，中医的无限丰富的宝贵经验得到发扬，就是很好的例子。批判任何旧事物，都要注意到这辩证法的否定原则，注意这否定中包含肯定的原则，否定和肯定的对立同一性原则。正如列宁所说的：“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任意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哲学笔记》二一四页）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反对了“五四”运动后所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把斯大林领导工作中更为主要的那些伟大的功绩一笔抹煞了，甚至连带把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抹煞了。这些都是违背了辩证法的否定原理的形而上学方法的表现。

三 否定之否定

了解了辩证法的否定的意义，也就可以了解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事物的发展由于内部的矛盾运动而有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并因此向着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向对立方面转化，是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的消失，同时又是在它自己的反面的特征、特性或形式之下的发展过程的继续。然而，这个另外的特征、特性或形式在发展的进一步继续前进过程中，又由于过程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再失去积极的意义，于是又会再一次引导到向对立方面的转化。在事物的一定的有规律发展的条件下，事物向对立方面再一次的转化，会使发展的最初阶段或最初的环节上已被否定了的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在外表上再一次重复出现，因此就有了“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的情况。我们把最初的发展阶段或环节称为肯定的阶段或肯定的环节，把第一次向对立方面的转化叫做否定的阶段或否定的环节，把再一次的向对立方面的转化叫做否定之否定，这些转化过程总合起来就叫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中普遍地存在着：在自然界，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麦粒——植物——麦粒的例子；在人类社会，如原始公社——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人类认识方面，如感性的生动的直观——抽象的思维——实践（参阅列宁：《哲学笔记》一五五页）；在哲学史上，如古代辩证法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普遍存在着；

如工作——休息——工作，发展——整顿——发展，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如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团结。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特别指明了这个规律的意义，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揭示了防御——进攻——防御和反“围剿”——“围剿”——反“围剿”的有规律的过程，就是很好的例子。

前面说过，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的表现形态。它在发展过程上清楚地表现了列宁所指出的“发展是对立的统一”这个根本原理。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互相联系的对立面。这些对立面之间，一方面有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有着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互相依赖的关系。所以，工作和休息必须联系，但工作和休息只能在生活过程中轮换进行，革命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必须联系起来，但不能同时同地用主要力量来兼顾发展和巩固的工作，而必须轮流地以一方面为工作的重点。在肃反工作中必须把“提高警惕”和“防止偏差”两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但在工作过程中必须在一个时候比较着重号召提高警惕，另一个时候比较着重注意防止偏差。这样，由于发展是对立的统一，是事物通过自己内部的矛盾斗争而不断地向自己的对立方面的转化，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上就必然出现向对立方面转化和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即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在发展过程中被否定之后又在更进一步的发展过程、阶段或环节中仿佛重复出现的形式；这也就是发展的曲折上升的形式或螺旋的形式。

这里有一个问题：向对立方面的转化是不断出现的，也就是否定是不断出现的，为什么不把这规律叫做连续否定的规律而叫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呢？自然，把发展过程看做连续不断的否定过程，

看做肯定和否定的互相联系和不断转化过程，这个规律也可以表述为肯定否定规律。但在一般正常的条件下，通过两个否定，在一定意义上即可以看做完成了发展的一个段落，也就是可以看做由发展的一个出发点进到另一个更高的出发点。就如走路，左右脚各前进一次，即可作为一步，再向前进，就成为新的一步了。经过一个白天的工作再加上一个夜里的休息之后，一日的的生活即告一段落，第二天就从一个新的出发点开始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指出了实践基础上的人类认识过程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恩格斯指出阶级社会否定了原始公社，阶级社会再被共产主义社会否定时，就结束了人类史的序幕，而开始出现完全成熟的人类的历史。因为这时“人才第一次——在某种意义上最后地——脱离了动物界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转到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一切环绕着人并且至今统治着人的生活条件，现在处在人的支配及统治之下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章）这些例子都是符合于上述所解释的意义的。

事物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形式，被形而上学曲解为一种简单的循环过程。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反驳了这种循环论，指出旧的东西在否定之否定阶段上的回复只是表面的局部的现象，只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在实质上，否定之否定是向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出发点的上升，是螺旋形式或曲折形式的前进上升运动，而不是简单的循环。毛泽东同志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进攻与防御的不断的反复的规律时，曾说到这是“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指出反复的现象只是就形式而

言,“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一八七页)这就是对于否定之否定的曲折上升运动内容的肯定的论证,也是对于循环论的很好的反驳。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的第二个阶段或环节否定了第一个阶段或环节的某些特征、特性和形式,并继承和发展了第一个阶段或环节的积极内容。第三个阶段或环节对于第二个阶段或环节也是如此。第三个阶段或环节并不是仅仅在外表上重复了第一个阶段或环节的某些特征、特性和形式,这种外表形式决不是主要的东西,主要的是它继承和发展了以前两阶段或两环节的一切积极成果,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第三个阶段或环节又可以算是综合了前两个发展阶段或发展环节的一切积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论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次战略上的变化时说:“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全面应用的范例。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原理,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两方面意义:一方面它表现了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另一方面又说明它是通过对对立面的斗争的前进过程;每一次否定都是经过对立面的斗争克服了前一发展阶段或者前一发展环节的消极的东西并肯定、继承和发展了其中的积极的因素。因此,发展的第三阶段或第三环节,决不是简单地综合了或调和了前两阶段的内容,而是克服了前两阶段的一切消

极的东西并把一切积极的因素提升到更高的阶段，使之成为更高级的新事物的内容的组成因素。

否定之否定规律和由量到质由质到量的互相转化规律是辩证法的两个不同的普遍规律。它们是对立的统一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上的两个不同方面的普遍表现形式。不能把这两个规律简单地混同起来，但两个规律既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同一事物发展过程的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因此它们又是密切地联系着和交错着的。它们的联系有着以下几种基本的情形。（一）由量到质，又由质到量的互相转化规律本身也可以看做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种特殊形式，即量变和质变在发展过程上的对立的统一：量变——质变——量变。不过，由量到质又由质到量的互相转化规律主要地只是表现了事物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特别是由渐进的量变到根本的质的飞跃的过程，而主要地不是表现事物发展的曲折上升或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所以由量到质又由质到量互相转化的规律虽然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但并不能包括否定之否定的一切形式，所以也不能代替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可以表现在连续出现的不同的质的阶段之间，如原始公社——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三）由于发展始终是通过对立面的斗争的，所以即使是在量的积累过程中，在没有出现质变之前，也常常要通过多次的否定之否定的反复过程，也就是要通过对立面的波浪式的交替起伏过程。如地球上无数次寒来暑往的反复过程积累成地质上的一次大变化；种子——植物——种子的反复过程要经过千百次才可能发生植物的比较显著的种的变化；革命战争中处于劣势的革命人民方面须经过长期的“围剿”与反“围剿”，防御与反攻的不断反复过程，才有可能把

革命力量积蓄到足够的程度，使革命由战略防御阶段上升到战略反攻的阶段，即引起战略上的由量到质的变化；（四）同样地，由于发展始终是要通过对立面的斗争的，所以在事物的质变的关节点上，也常常要出现新旧事物之间的波浪式的起伏现象，也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具体的否定之否定形式的变化过程，才能实现根本性的质变。《人民日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说到：“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年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经过几次的起伏，如“三反”“五反”等，然后社会主义制度才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得到重大胜利。这就是上述情形的具体例证。

事物向对立面的转化是有条件的，只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之下才能实现某种转化过程。因此，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每一具体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需要在这一事物发展的一定的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在一定方面表现出来，不能主观地任意把连续出现的三件事物都装进否定之否定的公式里。蛋变鸡，鸡又生蛋，就是否定之否定，这是在蛋的生命发展的正常客观条件之下才实现的。如果人把蛋吃了或打碎了，鸡的生命发展的正常过程就被中断，下一变化过程即不可能重复出现蛋的特征。革命人民的力量在战争中可以不断地反复表现为进攻与防御的过程，并且这反复性的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可能转入战略反攻。反革命的势力由进攻转入防御和退却之后，到最后就不可能再恢复进攻的力量。又，在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原始民族，不必经过阶级压迫阶级的社会即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等等。这里应该指出：我们说要在一定条件下来揭发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具体作用，这并不是说否定之否定已不是普遍的规

律,它在特殊条件下就不起作用。应该肯定,否定之否定是发展的普遍规律,正因为它是普遍规律,所以它在事物发展的特殊条件下也会特殊地起作用,例如生物的进化由鱼类变为两栖类再变为爬虫类、兽类等,在这个过程中要把连续出现的三阶段任意地安排在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公式里,当然是很牵强的,不可能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仍然特殊地起着作用。首先,由鱼类变两栖类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前面已说过的了。此外,生物由水中的鱼类进化为陆地上的爬虫、兽类之后,在进化的长久过程中又屡次出现再变为水中生物的发展过程,如爬虫类中的鱼龙,兽类中的鲸鱼就是,这也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些特殊表现形式都要通过事物发展过程的具体研究去具体地加以揭示。又有人举例说,人类历史上生产工具的发展——由石器到金属工具,由铁器到机器,这中间不能说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不论由石器变为金属工具或由铁器变为机器,都是量和质的互相转化规律的表现,因此也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特殊表现。其次,更重要的是:石器是一种集体劳动的工具,由石器进入金属工具或手工的铁器,就转化为个体劳动的工具,由铁器转化为机器,就再一次转化为集体劳动的工具,在这里,不但有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而且是这个规律的典型表现之一。

所以,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和一切其他普遍规律一样,都可以作为——也应作为我们研究具体事物的一般的方法向导,但又由于它在具体事物中的作用是具体的,因此,我们决不能把它当做从外部公式主义地强加到事物发展过程上的硬性的“证明工具”。这

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依据客观存在的实际条件对某一事物进行了各方面研究之后，来揭示这个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在什么条件下和在哪些方面表现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作用，而不能在未曾做具体研究之前，就拿出否定之否定的公式来，主观随意地说某些连续出现的三件事物在任何方面都可以装进现成的三段公式里。

研究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实践意义，就在于要我们认识到一切发展过程（不论自然界、人类社会或人类思维）的曲折性，反复性或非直线性，并根据这种认识，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实际行动。既然事物发展过程要常常在一定条件之下，一定时期之内和在某些方面采取否定的——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或曲折的甚至于似乎是倒退的形式，才有可能继续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前进，那末我们在研究问题指导行动的时候，就应该努力依据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具体分析研究，来争取预见到这个发展的曲折过程，并主动地及时地循着这样的曲折道路有节奏、有起伏地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而不要把事物的发展看做片面的直线式的发展，不要主观地片面地只顾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如果我们看不见事物发展的这条曲折规律，并一定要违反着这条规律去行动，那末就可能最后在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前面走到绝路上，那时仍然要被迫地再绕更大的弯路。在这里，就有着两种相反的对待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态度：前一种是努力使主观的思想和客观规律求得一致的态度，即唯物主义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指导就象最高明的舵手一样，能够带领实践的航船正确地通过各种复杂曲折的航道，能够主动地绕过一切应该绕过的暗礁，能够避免应该避免的一切困难和损失，顺利地实现工作和斗争的任务。后一种是主观思想与客观规律相分裂的态度，即主观主义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是

要使人们的实践行动盲目地直线前进，不能预见到事件发展的必要的曲折性，等到困难临头，就不得被迫转向，因此也就一定要使我们碰很多本来可以不必去碰的钉子，要多绕许多不必要的更大的弯路，甚至于遭受失败。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不肯采取暂时主动退却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结果招来了一个大的退却——长征。“曲则全，枉则直”，中国《老子》书中的这句话在发展的一定情形下是正确的。为着更有力地向前跳跃，就得稍稍向后退一下；为着达到更好的团结，就必须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为着使领导工作更能集中人民的意志，更正确和更有力，就应该开展广泛的民主，而不能片面地只顾强调集中；为着使工业的生产更强有力地进一步发展，就要在一定时期着重推动农业的发展，以农业的大发展来促进工业的发展，而不能一味地只去注意工业，而忽视农业的发展。这些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上常常需要注意的事物发展的辩证曲折过程的比较明显的例子。

毛泽东同志指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善于在反攻敌人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主动地转入防御，因此就有可能找到足够的时机来准备力量，打破敌人再一次的“围剿”。紧张的生产战斗之后，必须继之以一个休整的间隙，然后才能进入进一步的紧张战斗。研究问题在进行调查掌握材料之后，必须转入应用思考和分析的工夫，由具体生动的直观转入抽象的思维，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性，才有可能回过来把现实材料的全体贯串起来，更好地来具体解决问题。

只有肯定，不懂得否定，只知道向一条直线前进，不知道在一定条件之下必要的曲折或后退，这是“左”的冒险主义。冒险主义

者由于违背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主观地不肯走曲折的道路，结果却被迫走更大的弯路。党史上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失败结局就是证明。只讲团结，没有批评，团结就不能真正巩固；只注意工业，不注意农业，工业的发展也就要延缓。只有战斗，不注意休整，战斗就不能持久。只知收集事实材料，不知道运用思考和分析工夫，被大堆的材料压得不能透气，只有感性的直观，没有理性的抽象思维，知识就不能真正前进，就要走到“碰壁”的地方。

另一方面，片面地了解否定，把客观事物辩证法的否定，误认为形而上学的“否定一切”，或纯粹消极的否定，不懂得否定是发展的环节，不懂得在否定中要着重发展积极的因素并准备再进一步的否定，即再进一步的发展，这又会走到另一方面的错误。在“左”的冒险主义者遭到碰壁之后往往又会走到一个右的极端。如过去反对国民党五次“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失败之后又走向单纯防御以至于退却逃跑主义的方面，这也是“否定一切”的片面观点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和这相反的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了长征，长征在“左”倾冒险主义失败之后，使革命力量转移阵地，这也是否定，但不是退却逃跑的消极否定，而是通过转移阵地这个否定过程，积极创造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终于在陕北找到了再一次对敌前进的阵地。农村合作社一度大发展之后，需要作一番整顿，整顿是发展的否定，同时也是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的肯定，并且是更进一步发展的准备。对旧事物的批判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是一种“左”的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对革命工作的成就和经验是采取肯定一切的态度，不承认其中有应该被否定的某些缺点或消极的东西，虽然这些消极的东西只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

只等于十个指头中的一个。不论片面地肯定一切或片面地否定一切，都是违反辩证法的。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要求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善于具体应用对立方面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排斥的原理：在行动过程中要掌握两只脚交替走路的原则，不要只顾用一只脚走路，不要把重点永远只放在一只脚上（虽然也要看到，两只脚中间，终归有一只脚——如右脚——是始终比较有力的），只放在对立的一个方面，而不善于两脚并用；要善于在必要时主动地由一只脚转到另一只脚上，由相互依赖的对立方面中的一个方面转到另一个方面。这里必须再一次指出，辩证法的这种曲折过程，只能看做是前进发展中的曲折过程，或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因此决不能把我们行动中的必要的转向，看做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前进的立场的放弃。相反地，在行动中的任何曲折、转向，以至于形式上的必要的倒退，从总的方面来说，正是为着前进。党的组织任务之一是要加强团结，展开批评自我批评是团结的“否定”，但这个否定正是进一步加强团结的动力。所以，走曲折的以至于暂时倒退的道路，是为着前进得更顺利，不是任意转向，不是单纯的倒退。这是在指导实践的时候必须遵守的原则，违背这个原则的曲折道路，就要坚决反对。这些例子说明我们应该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就是要善于在实际行动中通过辩证法的否定过程把工作推向前进，要善于依据客观事物的具体情况（而不是任凭主观随意地），把两次否定正确地结合起来，使一定条件之下联系着的对立面双方正确地建立起互相依赖的关系，使一切可能发挥的积极力量都充分发挥出来，并及时克服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因素，使各种工作迅速向前发展。

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作为研究问题和指导行动的向导，依据

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具体条件, 预见到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曲折道路, 在前进运动的适当时机主动地把斗争过程引到必要的曲折方向, 引到某些特征、特点和形式的“否定”方面, 使事物的积极因素能够顺利地继续向前发展, 防止一味走直线所必然要产生的消极作用。在“否定”的进程中又进行再一次否定的斗争准备, 以便到了适当的时机; 及时地把运动提高到更高的出发点。在肯定和前进的时候注意防止无止境地盲目前进的主观主义倾向, 在否定和转折的时候防止否定一切和完全消极倒退的主观主义倾向。这就是研究否定之否定规律时在实际应用方面所必须掌握的根本要点。

第九章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

一 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反映

唯物辩证法不仅要研究事物发展和人类认识的辩证法的根本规律, 即对立统一规律, 以及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或肯定否定规律), 而且要研究一些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范畴, 这些范畴反映客观世界一切事物中存在着的某些最普遍的矛盾性, 或对立统一规律的某些普遍的表现形态。必须研究这些范畴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 我们才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事物的矛盾运动, 才能够善于运用辩证逻辑, 在理论上概括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 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联系和运动的客观过程, 使我们的实践获得正确认识的指导。

范畴,就是各门科学的一些最高的概念,也就是人的思维用来反映和概括客观事物的某些最普遍的本质(最普遍的性质和最普遍的联系)的概念。列宁说:“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界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现。”(《哲学笔记》六五页)科学的各部门都有着该部门所特有的一系列的基本范畴,如经济学上的价值范畴之类。哲学上的范畴,则是反映整个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些最普遍的本质的概念。从思维的逻辑形式方面来说,全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范畴的研究,来反映客观世界的物质本质及其矛盾发展的普遍规律性的。物质和精神,就是我们首先研究过的两个最根本的哲学范畴,通过这些范畴的研究,我们认识了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的第一性的地位和精神的第二性的地位。此外,我们还通过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等范畴的研究,来指明人的认识是主观意识对于客观世界的辩证的反映过程。我们又研究了对立性和同一性,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等等的范畴,这些研究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所要研究的是这样一些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的范畴: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和自由、因果性和目的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如前面所说,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反映着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统一规律的某些最普遍的表现形态,也就是反映着事物的运动过程本身所固有的某些最普遍的矛盾,即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和自由、因果性和目的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等等。

必须再一次强调,范畴是人们用来反映客观事物的某些普遍的性质和联系的思维形式,范畴所反映的内容,是客观事物本身所

固有的东西，这些内容决不是由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主观自生的东西。离开了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来讲范畴或使用范畴，就要陷于主观主义的错误。例如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本质这个范畴，无非是指明客观事物本身包含着与现象相对立而又有联系的本质方面，因此也就指示我们应该注意在事物自己内部去揭发它们所固有的本质的东西，而不要满足于事物的某些非本质的表面现象的认识，更不要只凭自己主观的空想去设想事物的本质。只凭一些非本质的表面现象来对事物下结论（例如凭着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不居于主要地位的缺点，在十个指头中只能算一个指头的缺点，就要抹煞社会主义的全部成绩，或者把缺点当做主要的东西），是会犯错误的。不具体研究客观事物本身的过程，就要设想什么是事物的本质（例如不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就要妄自断定中国革命的本质是什么，不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要妄自断定人的本质是什么等等），也是一定要犯错误的。

因此我们必须反对唯心主义对于范畴的错误看法。唯心主义把范畴看做是在客观事物之外的某种精神力量的产物。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范畴是在自然界之前存在着的绝对精神的属性，是创造世界的原动力。中国宋朝主张“理”在物质之先就存在着的朱子思想，是属于这一类的。黑格尔的哲学则是这种思想的最典型的代表。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如何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时，这样说：“蒲鲁东先生……把抽象和范畴看成最初的根源。照他的意思，创造历史的就是它们，而不是人类。抽象、范畴，只就它自身来看时，也就是，把它从人类和人类的物质活动分离开来看时……只是一种纯粹理性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十六页）除了这种唯心主义者关于

范畴的看法之外,还有主观唯心主义者的看法,他们把范畴看做只是存在于人的主观里而不是存在于客观世界里的东西。康德认为范畴是人的思维中先天存在的认识形式,自然界的秩序,规律是由于人们把这些范畴应用到现象世界中才产生的。例如事物的因果性,在康德主义者看来,并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着的内部关系,而只是由于人的理智中有着因果范畴,它要求把各种现象看做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因此各种现象看起来才好象有了因果性。马赫主义者把范畴看做感觉的种类,而物质则只是感觉的复合,根本否认物质世界和范畴的客观实在性。不论客观唯心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都把范畴看做变相的造物主,而不看做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和联系。这种观点如果作为方法来看,那就是认为人们只要纯粹凭着某些“理性”的现成公式,或者凭着自己纯主观的思考,而不必先去研究客观事物的具体状况,就可以把握各种各样的范畴的内容,并且依据这样的主观的范畴来安排客观事物的秩序,来创造客观世界。有着这样观点的人,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常是从概念和范畴出发,先给这些概念、范畴下一个主观的定义,然后根据这个主观的定义,再去解释具体的事物,而不是首先研究具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然后根据研究的结果来实事求是地理解有关的概念和范畴。很容易明白,这样的方法论,只能是为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树立理论的基础,只能使我们的思想走向反科学的方向。

列宁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哲学笔记》六八页)所谓和自然分离出来的“自觉的人”,即是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

界的运动发展规律或自然界的复杂联系的“网”的人。而人们认识自然界的运动发展规律或自然界联系的“网”，是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思维上的概念、范畴的形式来进行的。每一概念、范畴概括事物的某一个部类、方面、特征、性质、联系和关系，多种多样的概念、范畴的系统的结合——采取判断推理的形式的、正确的、以客观事物所提供的充分的感性材料为依据的、经过实践的检验的实事求是的结合，就能够反映“自然现象之网”。所以，列宁又说：“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念”）的各个环节，就是逻辑的范畴。”（同上，一八四页）唯心主义颠倒了这个认识的秩序，把本来是自然界客观事物在人的理性头脑中的反映的范畴，误认为是离开自然界而独立存在的并且创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这就是唯心主义对于范畴的错误看法的根源。

再说一遍，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某些普遍本质，即普遍的性质和内部联系的思维上的反映形式。相互对立的哲学范畴之间的关系，反映着客观事物的某些普遍的矛盾运动。研究这些范畴必须依据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既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对立，又要把握它们之间的联系。形而上学把各个范畴孤立地理解，不把它们看做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事物矛盾的各方面的反映，这是应该反对的。唯物辩证法就是在这样的观点基础上来研究范畴问题的。这一点必须要时时记住。

二 本质和现象

人的认识必须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够通过各种现象的观察研究，进入到认识事物的本质。感

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的、片面的现象，只有理性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什么是事物的本质，它对于我们的认识有什么重要性，它和现象有什么关系？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

什么是本质？本质和质在某一方面具有同一的意义，但本质又是较为广泛而深刻的范畴。事物的性质，对于它的量来说叫做质，对现象来说叫做本质。同时，本质的范畴是指“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实践论》），所以本质的范畴包含着质的意义，比质的范畴意义较为广泛而深刻。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具有对抗性的性质，这种经济上的对抗性质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文化上的对抗性的斗争，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集团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对抗的斗争，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国际之间的内部联系，这些综合起来，就是它的本质。为什么事物的性质以及这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能综合到一个本质的范畴里面呢？因为事物的性质及这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是不能分开的，事物的性质规定着它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各方面的表现。不认识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也不可能充分认识事物的性质。

这里还要附带谈到规律性的范畴。规律性是和本质同列的范畴，并且也是包括在本质的认识之内的。列宁说：“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哲学笔记》一三三页）又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同上，一三五页）实际上规律性也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事物

的本质的联系，是事物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所表现的各种基本联系。所以我们说认识事物的本质，也就包含着认识它的规律性的意思。个体农民是站在十字路口的阶级，这就是说它可以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也可以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这是个体农民（解脱了封建奴役的）的性质。在工人阶级的坚决领导这个条件下面，农民就能够克服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而向着合作化方向发展，这是个体农民发展的规律性，这也就是个体农民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联系。我们说认识工人阶级领导下面个体农民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意思也就是说认识农民能够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规律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些农民对于合作化的动摇现象，并不是必然的规律，所以这是非本质的东西。帝国主义必然要没落，这是它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正是把握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那些害怕帝国主义的人，都是被帝国主义表面强大的现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的本质的东西。

什么是现象？现象就是事物的本质在外部的表现。所谓外部表现，就是暴露在事物的表面而能直接反映到我们的感觉器官来的意思。我们的感觉器官所能够加以认识的一切客观事物，都叫做现象。决不能够把现象看做纯主观的东西。只有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才把现象看做是纯粹主观的感觉，而没有任何客观内容。我们对于事物现象的认识，当然只能通过感觉这种主观的形式，但这种主观形式所反映的内容，又只能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外部的各方面的表现，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本质一定要作为现象表现出来，本质并不是现象之外的另外一种特殊的存在，它就存在于现象的内部，它是贯串着各方面现象的、现象总

体的根本性质和各方面现象的内部联系。所以，本质虽然不能够直接由感觉器官所把握，但却可以而且必须通过现象的分析研究，通过思维的工夫而加以理解。哲学上的唯理派的错误，就是把本质和现象形而上学地加以割裂，以为本质是现象之外的孤立存在的东西，并认为不需要通过感性认识所提供的现象材料的研究，仅仅只要依靠理性认识，就可以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这就在认识论上陷于唯心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者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大量的感性事实材料中去进行刻苦的分析研究，仅凭书本上引来的片言只字，加上自己的一些主观的猜想，就要对事情作出原则性的论断，这种错误和唯理论的观点实质上是一样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注意，现象是本质在事物运动过程中的各方面的表现，它并不直接就是本质。现象和本质是有差异的，因而也是有矛盾的，本质是贯串着现象各方面的现象总体的性质及其各方面的内部联系，而每一现象只是本质的某一方面的表现。所以，本质和个别现象之间，首先就有着贯串事物全体的东西和局部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也就是矛盾；局部的东西只能片面地表现贯串事物全体的东西，而不能以自己的片面把后者完全表现出来。因此，如果我们仅仅看见局部现象及其个别的某些外部联系，我们就不可能认识本质，如果我们使自己的认识局限于个别现象之内，以为这就是认识了事情的全部及其本质，那我们的认识就一定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真面目，就一定要发生错误，一定要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相分裂，一定要走向主观主义。经验派的哲学认识论以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现象材料就是唯一真实的知识，形而上学地割裂了本质和现象的联系，否认进一步通过理性认识把握事物本质的必要性。这一派的认识论思想最初

虽然是唯物主义的(如英国的培根、霍布斯),后来却出现了唯心主义的经验派认识论,把现象看做不具有任何客观本质的纯主观的现象。这一派唯心主义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成为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潮流,如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只相信个人的经验,把个人经验中所看到的局部的现象误认为事物的全体,误认为普遍真理,这样就使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陷于主观主义的错误,这也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现象中到处包含着许多假象,这种假象虽也是本质的表现,但却是歪曲地反映着本质,因此就给我们一种与事物的本质完全相反的印象,掩盖了本质的真相。把一根直棒的半截放水里,外表上看起来它好象是弯曲的。地球自转,给我们日常所看到的是太阳每天从东方出来的假象。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从日常的现象上看好象决定于供给与需要的关系。新生的革命势力看起来是很弱小的,但它在本质上却包含着不可战胜的伟大的发展力量。没落的帝国主义者,在作临死前的拚命挣扎过程中,也会给人一种似乎很强大很稳固的假象,如象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也能吓唬认识不清的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但在历史现象中却有一种“英雄造时势”的假象。所以,如果我们观察事物的时候只凭局部现象来论断,我们就常常要为假象所迷惑,而看不到事物的真正本质。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地夸大了感觉、经验的意义,以所谓“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等等的好听名词作为标榜,装出好象是要认真掌握科学方法的样子,而在实际上则是要想引导人们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片面的现象的认识,是要使人们的思想容易受到假象的迷惑,不能在行

动、斗争中正确地辨别敌友、辨别是非，使反动派所散布的谎言的网罗容易收效，这就是这些经验派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实际危险性。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就思想方法的实质来说，也是属于唯心主义性质的。

人的认识必须由现象进到本质。列宁在讲辩证法的特征时指出辩证法的要素之一是：“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哲学笔记》二一〇页）。所以，仅仅从现象上来观察问题，而不进一步去揭发事物的本质，这也是反辩证法的，即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特征之一。由于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并不是直接一致的，并且现象中常常包含着许多假象，所以就需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才能揭发事物的本质。而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也就在这一点。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话，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卷，一〇六九页）

怎样才能够使我们的认识透过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呢？为要解答这问题，首先还要再把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作一个简要的概括。

事物的本质，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表现为多方面的现象，假象也是事物的本质在运动中的表现，假象是事物的本质在其运动发展的一定条件、一定范围内必不可免的表现，是本质的歪曲和颠倒的表现，但是，假象的东西，在事物的运动中虽然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但却不是稳固的东西，不能成为事物运动的主流。只有本质的东西，才能成为事物发展的主流。列宁说：“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哲学笔记》一一一页）又

说：“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同上，一〇八页）列宁的这些话，就包含了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些意思。

根据上面所说，我们可以知道，由于本质就是在现象中表现出来的，所以首先必须通过现象的观察，才有可能认识本质。但是要能够在认识上通过现象的观察把握事物的本质，不被假象所迷惑，首先就必须注意到不要使我们的观察局限于片面的现象，而要把大量的，各方面的有关现象纳入我们的考察之内。假象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都是存在于片面的现象之中，如果能够把各方面的现象加以观察研究，把事物的过去现在以及它和周围事物的联系中所表现的各方面的现象加以观察研究，通过分析、比较，就有可能区别什么是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什么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流的东西和非主流的东西。

应该指出，我们说要观察大量现象，这并不等于说要对一切现象，不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都同样地平均用力加以观察研究。这样做是不成功的，也是人的精力所不允许的。在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必须以“去粗取精”的精神从大量的事物中找出其中的几种典型的现象来加以考察。因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所说的：“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典型的事物是包含着所有同类现象中的普遍的本质的。能够依据适当的典型来加以考察，弄清楚它的性质以及它和周围事物的各方面的联系，就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马克思写《资本论》，就是以英国作为典型，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毛泽东同志研究合作化问题，以三户贫农的一个合作社为典型，就指出这是五亿农民的方向。

但是,观察大量现象和选择适当的典型来进行深入研究,固然是揭发本质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仍然不一定能辨别什么是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这是因为,第一,科学的研究常常要求在事物还处于新生的以至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应该去揭发它的本质,而在这时候,本质的东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流的东西是很不容易辨认的,其次,即使在事物已相当发展的情形下,它的本质仍不一定是直接暴露在现象表面的,仍是常常出现迷惑人们的假象的。所以,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依靠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对典型事物加以分析,而主要的,就是要依靠辩证的矛盾分析法。因为事物的本质,首先是由它的内在矛盾规定的。如果我们善于从感性材料所提供的现象中,从典型的事物中去观察和分析它所包含的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研究它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再研究它和周围事物的各方面的联系,我们就有可能正确地把握到事物的本质,把握到事物发展的主流,而把它和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区别开来了。

三 形式和内容

研究了事物运动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之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它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

事物的矛盾运动,采取无限地多种多样的形式。形式是区别客观世界形形色色的现象的外部标帜之一。通常我们说这一类现象和那一类现象不同,常常就是指它的运动形式的不同。自然,我们决不能说形式是事物运动的纯粹外部的东西。形式是事物的矛盾运动自己本身所需要和所产生的形式,而事物的矛盾运动,就是

它的内容。没有任何形式的纯粹的内容，不采取任何形式的矛盾运动，是不可能设想的。不能用瓶子和酒的关系来作为形式和内容的确切比喻，形式不是外部的容器，作为液体的酒在物理上有它自己的液体的形式，它的形式是自己的内部分子的矛盾运动（扩散力和凝集力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例如一定温度条件）所自然产生的形式，不是外部容器所赋予的。

所以，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中间，首先是内容居于决定的地位。内容决定形式，也就是说，事物的矛盾运动的特点，决定它所采取的形式。事物的矛盾运动有它的现象方面和本质方面，内容就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这个统一体在运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采取与它自身在一定条件下相适合的形式。但如果从根本方面来说，内容决定形式，首先就是事物的本质决定它的形式。因为不同的矛盾运动，具有着不同的特殊性，规定着事物的特殊本质，也就是规定着事物的特殊性质以及这事物和其他事物的特殊的内部联系，而它的形式就必须适合于事物矛盾运动的这个特殊本质，适合于事物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生产关系作为形式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使用一定工具的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性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在不同的民族存在的条件下面，必须采取民族的形式，这也是它的本质（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尊重各民族自己的特点的，社会主义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后，才能完全消灭民族的区别）决定的。革命斗争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这是决定于革命工作在各种条件下的特殊的本质。不同的矛盾，固然有不同的本质，需要不同的解决矛盾的斗争形式，同一种矛盾，在不同的条件之下，也会有着不同的特殊本质，这个特殊的矛盾本质就规定着解决矛盾的斗争形式。解决剥削阶级和被剥

削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依据不同的条件，可以采取暴力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和平的形式。列宁说：“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有形式的。不论怎样也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哲学笔记》一二五页）。

内容决定形式，并产生自己的形式，这决不是说形式只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相反地，形式对于内容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着形式与内容的本质相适合的时候，它就能够对内容的发展起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就为内容的活动开辟广阔的地盘，当着形式与内容不相适合的时候，它对于内容的发展、内容的活动就发生阻碍的作用。内容之所以要求与自己相适合的形式，正是由于要使形式来为自己服务，使形式帮助推动自己的活动和发展。一定的形式，是为一定的内容的发展所需要的，而决不是毫无意义地纯粹消极地由内容产生出来的。形式和内容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虽然首先是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辩证法要求我们不要片面地只看到内容的决定作用。

形式对于内容的反作用，有两种基本情形：或者是形式与内容的发展情况（它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事物的联系）相适合，并能积极帮助内容的活动和发展的情形，或者是形式与内容不相适合，因而消极地阻碍着内容的活动与发展的情形。为什么形式对于内容的作用会有这两种相反的情形呢？这是由于形式和内容互相矛盾的结果。也就是说，两者不只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而且又是互相对立的。在形式和内容关系中间，内容虽然是居于决定的地位，但一种形式一经产生之后，就成为相对固定的东西，它对于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容，对于不断地活动着的事物矛盾来说，是比较地不活动的、比较地落后的东西。形式在发展过程中落后于内容，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发展中的速度的差异就成为矛盾。这个矛

盾就会产生如下的情形：内容已经向前发展，并且在本质上已经发生变化了，而形式仍然基本上没有改变，内容已经具有了新的性质，而形式仍然处于旧的状态。新的内容最初只能在旧的形式内部发展，结果终于形成新内容和旧形式的尖锐的对立。矛盾是这样发展的：起初仅只是形式落后于内容，后来却成为形式和内容的对立；起初形式虽然落后于内容，但还是在本质上与内容相适合的，后来由于内容的变化，形式就不适合于内容了。由适合于内容并能帮助内容发展的形式变为不适合于内容并阻碍内容发展的形式，不适合于内容并阻碍内容发展的形式，经过根本的变革，又变为适合于内容并能帮助内容发展的形式，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运动，这个矛盾运动的过程足以说明内容和形式两者之间为什么会有上述两种相反的关系。

形式和内容虽然具有着适合与不适合的上述两种情形，但是，由于内容对于形式居于决定的地位，它是不容许与自己不相适合的形式长久存在的。例如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容许生产关系长久处于与自己的性质不相适合的状态的。所以，当形式已经与内容成为不相适合的东西了的时候，这个形式迟早就要被抛弃，并产生与内容相适合的新的形式。由于形式在发展上落后于内容，因此，内容的改造，新的内容的产生，一般地说，不可能与新的形式的形成同时，更不可能先产生新形式，然后才在它内部出现新内容。除了某些特殊情形之外，新的内容总是在旧的形式之内开始产生，并且最初总是暂时在旧形式之内生长起来的。这是一般的规律。但是，当新的内容在旧形式内生长到足够的程度时，就不可能在旧形式内继续向前发展，就在这样的情形下，由于内容发展的需要，就不能不破坏旧形式，创立新形式。列宁说：“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

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哲学笔记》二二九页），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运动的辩证法。

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给我们的实践提出这样方向，就是：（一）观察问题不要偏重形式，而要首先注意到事物的内容。要依据内容来确定事物的性质，而不要只依据形式来确定它的性质；（二）要善于应用各种适合于内容需要的形式，在行动上决不要拘泥于一定的呆板的形式而不顾内容的需要。总之，要反对形式主义。

由于内容居于决定的地位，同一内容在不同的发展情况下可以采取种种形式，这些形式虽然是内容在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本质决定的，但它并不就是内容和本质。如果只凭形式来观察问题，就常常会把形式误认为事物的本质，而发生认识上的错误。例如资产阶级国家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但在形式上它有时采取议会民主制，有时采取君主立宪制，有时采取法西斯制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某些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形式——议会民主制误认为这些国家的实质，因而看不见这些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我们今天的艺术上所采用的民族形式，有些是从封建时代的民间艺术中继承下来的，只从形式上看问题的人，误认为我们采用民族形式的艺术也是封建的东西，忘记了它的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的内容。有人曾故意夸大这种片面的错误观点，来反对我们在艺术上采用民族形式的正确方针。

所以要正确地认识一件事物的真面目，必须首先研究它的内容，研究它的内部矛盾运动，研究这矛盾运动所规定的事物的性质及其与别的事物的内部联系，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来考察它的形式的意义，即它的形式是否与内容相适合，这样才能避免认识的片面性、认识的错误。

观察问题偏重形式的片面观点，在实践行动上就表现为拘泥于一定的呆板的形式，而不能灵活地依据矛盾运动的具体情况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形式。这种观点把事物的矛盾运动形式看做死板的公式，即一定的内容在任何情形下只应该有一定的形式，如果没有这唯一的形式，似乎内容也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反之，只要有了这个形式，好象也就有了一切了。这里就产生了我们常说的形式主义的错误思想。这种思想根本违反了内容决定形式这一个最根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它硬造成一个完全颠倒了的原则，即好象是形式决定着内容，好象在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中，不是内容占决定地位，而是形式占决定地位。这是在形式和内容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这一篇著作，就对实际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给与了深刻的批判。

唯物辩证法首先肯定内容对于形式的决定地位，同时又充分重视形式对于内容的服务作用。依据这个相互的辩证关系，指出内容在不同的发展情形下必须和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来为自己服务。同一内容，同一矛盾运动在不同的发展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征服和利用各样的形式。例如新内容不但要求新形式来为自己服务，而且在一定情形下，例如在新事物处于萌芽状态的情形下，也可以在旧形式中发展，并利用旧形式来为自己服务。马克思主义者和书呆子的不同，就在于在斗争中决不用任何一种形式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列宁对于在过渡时期消灭资本主义的方法的有名的言论，就是很好的例子。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论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时，曾对于形式主义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他一方面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者把“和平”时期工人

运动的形式奉为神圣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批评“左派”拘泥形式的另一方面的偏向，他说，“从国际共产主义底发展方面看来，我们现在业已有了这样巩固、这样强大有力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足以使这一内容无论在或新或旧的形式中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来，都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与征服一切的形式，不仅是新的形式，而且是旧的形式，——但并不是要与旧形式调和，而是要善于把所有一切新旧形式变为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坚决的和彻底的胜利所运用的武器。”（见该书第十章“几个结论”）

四 必然性和偶然性

当我们深思地观察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时，可以看到其中具有两种相反的趋向。一种趋向是：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依着某种一定不移的秩序稳定地在全过程中贯彻下去；两个物体磨擦一定生热；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最后一定要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个体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一定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结果一定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些联系和发展过程的秩序都是一定不移的，我们如果认识了这个秩序，那末我们就有可能在某些事情还没有出现以前就准确地预见到它的出现。例如我们现在能够预见到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这些一定不移的性质普遍地存在于世界一切过程中，我们的思维的认识通过多次实践检验之后，用一个范畴来把它概括起来，这就是必然性的范畴。这种必然性是由事物的根本矛盾以及和它相联系的某些重要条件所决定的。但另

外一方面，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还要受其他多种多样的周围事物的大大小小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又看到，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又存在着这样的情形：事情的出现并没有什么一定不移的秩序，它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我们不能确定它一定会怎样。我们既然无法从这些事物中找出一定不移的秩序，因此我们的思维对于这些事物仅只能够在它的出现之后作事后的记述，而不能对它的将来变化趋势作出事前的预见。例如某人对于自己在最近一年内是否会遇到一次传染病，某一块田地上今年夏天是否会遇到冰雹的灾害，这就是不能预料的。事物的这样一种联系和发展的情况，我们在客观世界也到处可以看见，我们的思维用一个范畴把这种情况概括起来，这就是偶然性的范畴。

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同时具备着的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的普遍属性，这就是说，一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既包含着必然性的方面，也包含着偶然性的方面。过程的这种矛盾性质，是由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复杂性和具体性使然的。事物的根本矛盾以及和它相联系的某些重要的条件，规定着它的发展规律性，并使这种规律性作为一定不移的秩序，作为一种发展中的统治的趋势贯彻在全过程中，这就使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具有了必然性的方面。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的矛盾斗争，这些斗争在敌小我大，敌强我弱（抗战初期），敌孤立而我有世界人民同情等等重要条件影响之下，就规定了这次战争一定有持久性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胜利的规律，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的一个例子。但是，另外一方面，事物的发展过程决不仅仅只是受到它的根本矛盾及某些重要条件所规定，还要受到此外的其他多种多样的周围事物

的大大小小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受这样的影响的事物发展过程是不能设想的。这些影响不会大到使得发展的一定不移的秩序发生根本的改变，但对于全部过程却不断地引起各种程度的摇摆和偏差（不是指带根本性的偏差），这些摇摆和偏差是无限地复杂、多样，它们的存在使得事物发展的一定不移的秩序不能够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结合着无数的可有可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因素表现出来的。抗日战争是一定持久的，一定可以胜利的，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某一个战场上有某一个时候由于个别的条件的影响而完全失败或得到意外的特别大的胜利，这就不是一定不移的。这里说的个别条件所引起的结果就具有偶然性。所以，在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同时存在的。

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做两个绝对对立而没有任何联系的范畴，并因此对于事物的联系提出两个极端相反的看法：或者是把世界一切事物都看做必然的，否认有任何偶然性的作用，把偶然性看做是由于人们对于事情发生的原因的无知而产生的纯主观的范畴。机械论的关于必然性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这种观点把世界的发展看成了一种神秘的，近似宿命论的性质。一切既然都是必然的，那末，人对于世界的发展就无能为力，只有坐着等待必然性的支配了。形而上学的另一个极端是把偶然性看做支配一切的范畴，否认客观世界里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存在。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就流行着这种错误观点。在中国贩卖实用主义的胡适就公开主张“偶然论”，把任何细小的偶然事件都看做对于历史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原因，借此来抹煞历史发展的真正决定原因。“偶然论”把历史的一切事件都看做出自偶然，因此就否认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任何可以为人所认识和

利用的客观的必然规律。这就是说，归根结底人们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前途都只能凭盲目的偶然性去支配，人们不可能希望对于事物的发展前途有任何确定的预见，并依照这些预见来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行动，人们的生活只能是依靠盲目冒险，而冒险的结果如何又只能依靠偶然的命运来决定。这是从偶然性这一个形而上学的极端又引导到宿命论。这种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资产阶级在市场竞争中的盲目投机冒险行为的哲学上的反映。

唯物辩证法反对上述两种形而上学观点，提出事物的联系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的统一。必然性是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一种趋势，是在过程中一定要使自己贯彻下去的倾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趋势，它是暂时的，易逝的，它在过程中没有一定要贯彻下去的坚强的倾向。偶然性决不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原因而产生的主观范畴，它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原因也可以为我们所知道的，即使知道了它的原因，它仍然是偶然的，因为这些原因只是偶然的原因，是不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居于统治地位的趋势的原因。机械论的观点把这种偶然性也看做必然性，这在实际上是把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使两者混淆不分，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不能够从偶然性影响中把必然性揭发出来，使我们的行动陷于宿命论或盲目冒险的泥坑。但是，我们把偶然性和必然性加以区别，指出偶然性不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统治的趋势，这并不是说偶然的東西在发展过程中不起作用，偶然性对于事物的发展虽然不能形成统治的趋势，但对于事物发展的过程能引起种种的偏差，能使发展过程加速或延缓。由于事物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过程中时时刻刻都

有偶然因素的存在，必然性是在无数的偶然性之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七八页）。在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没有纯粹的必然性。现实事物中的必然性是由偶然性作为补充的。偶然性经常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就个别的事物或初生的事物来看，其存在的形式常常好象是偶然的，然而这偶然性的背后总隐藏着必然的联系，隐藏着铁一般的规律性。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能够从初生的、个别的、形式上似乎是出于偶然的事物中揭发出它的背后隐藏着的必然性。这个任务，和科学的研究需要从现象中去揭发事物的本质的任务是相适应的。实际上必然性也可以说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的趋势。

所以，科学是盲目的偶然性的劲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从看起来是偶然性的东西中间，揭露出它内部隐藏着的必然的规律性。科学不能向表面现象屈服，不能向偶然性屈服。否认必然性，认为一切由偶然决定的实用主义及其他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不管它们在外表上挂着怎样好看的科学的招牌，在实际上它们的观点是完全违反科学的。科学的研究任务不仅只在于要从偶然性中揭露出必然的规律，而且还在于帮助我们善于利用必然性的知识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里包含着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要善于从形式上是偶然出现的个别事物中发现它的某些必然要发展起来的因素。例如毛泽东同志从三户贫农坚持办合作社这一件表面上似乎有点偶然性的事实中，看出了全国五亿农民都一定要依循的前进发展的必然方向。要善于从偶然出现的事物中看出必然性，除了首先要对于新生的个别事物的出现要经常保持着高度的注意之外，就是要分析事物的矛盾，事物的内部联系。例如研究了农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和生产发展的矛盾，研究了中国

农村人口众多,常有天灾等等重要的条件,并且考虑到新中国有着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政权,就可以看出三户贫农坚持办合作社的个别典型事例中所包含着的合作化发展的必然性。第二,要善于利用必然规律知识来正确地规定我们的行动的目的和计划,使我们的行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避免盲目的冒险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在进步势力的力量处于劣势的时候,胜利在当前不会是必然的,这时如果对反动势力采取最后决战性的进攻的行动,就是冒险主义。在进步势力已取得优势,只要加劲努力一下,胜利就是必然的,这时如果不敢于对旧势力发动进攻,不勇于向前,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此外,还要善于在行动中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性因素来加速事情的发展,加速斗争的胜利,同时尽可能地避免有害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使事情的发展,斗争的胜利尽可能地顺利,尽可能地少受阻碍。这就是我们研究必然性和偶然性范畴的主要的实践意义。

五 必然和自由

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范畴的矛盾关系密切相联系的,是关于必然和自由的范畴的矛盾关系问题。必然性的范畴说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具有客观的决定性质,它所规定的发展的客观趋向是一定不移的,不容许人们的主观意识有任意地自由选择的余地,因此必然和自由这两个范畴是包含着明显的对立意义的。形而上学把这对立看做绝对的对立,认为如果把事物发展看做必然的,那就是说人们的任何自由也不可能存在,人的行动只能受宿命的支配。反过来说,如果人的自由能够成立的话,那就是说事物发展的必然

性是不存在的。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依据后一种看法，把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说成是完全受人的“自由意志”支配而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客观规律性，这是现代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社会学的流行论调之一。

其实，形而上学所了解的那种与必然性绝对绝缘的自由，那种纯主观的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自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属性。人类社会生活中也常常有象自然界一样地受到盲目的必然性的支配的情形，人们在这种情形下不能主动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例如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这样的。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却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即人们能够认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的规律，因此就能够为着社会的福利，来创造条件，为某些必然规律性的活动开辟广阔的地盘，或限制另外一些必然规律的活动地盘。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的行动就解脱了盲目被动的状态，能够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有着自由的意义。自由这个范畴的真正的客观的内容也就在这一点。自由不是形而上学者所说的那种与必然性完全隔绝的纯主观的意志自由，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然性在没有被认识到的时候是完全盲目的，当它被人们认识到了以后，它就成为人类手中用来为社会谋福利的武器，人们认识了必然性，就能够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就能在革命斗争中，建设工作中取得自觉的、能动的地位，就能够为自己的行动规定正确的计划、步骤，使自己的行动能够顺利地达到预期的目的。这种在行动中的自觉性能动性，就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

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一一页)所以,必然性和自由不是没有联系的,必然性能够转化为自由,这个转化的决定条件是在于必然性要被人们所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对客观事物进行改造。研究必然性和自由这两个范畴的主要的实践意义,就是要我们注意到:我们如果要在行动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首先认识必然性。主观主义者不注意首先去认识客观的必然性,只想凭着自己的主观的“自由意志”任意行动,以为这才是自由,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自由”,这恰恰是一种主观盲目性,这种主观盲目性只能把人的行动引导到最不自由的结果,引导到一败涂地。资产阶级社会学里的那种与必然性完全绝缘的绝对“意志自由”的观点,正是这种主观盲目性的行为的理论上的表现。

这里有必须注意的一点,不是一切唯心主义者都否认必然性这个范畴而仅只侈谈主观的意志自由的。有些唯心主义者也谈论到必然性的范畴。问题是在于唯心主义不把必然性了解为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自己本身的规律所固有的必然性,而把事物的必然性看做是某种精神的、思维的力量所赋予的属性。例如说社会的发展是必然地依循着某种永恒的道德原则之类。黑格尔虽然在哲学上明确地提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辩证法的命题,但他也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把必然性了解为世界理性发展的属性,而不承认必然性是物质世界自己发展的属性。唯物主义从客观事物本身引出它自己的发展所固有的必然性,唯心主义从主观、精神、思维中引出必然性,这就是在必然性问题上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根本区别。(参看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如果把黑格尔颠倒了再颠倒过来,加以

唯物主义的理解，那还是不完全的，因为自由不仅仅只是认识，更重要的，自由还在于驾驭必然，对客观世界进行成功的改造。

人类之所以能离开自然界和动物状态，就是由于人类能够从自然界的必然性的盲目状态之下解脱出来，一步步地取得改造世界的自由。人类最初制造了石头工具和发明了火的使用，就是对自然界的必然性能够加以认识并由此取得支配自然界的自由的第一步。随着生产的向前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自由地盘日益扩大，同时对社会生活的必然性也开始片断地有所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由于（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是剥削阶级，剥削的偏见妨碍着人们对于社会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人类在社会生活方面，总的来说是受到自发的盲目的必然性支配的，只在革命转变的关头，革命的领导阶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并依据此种认识来给行动以自觉的指导，这就使人们对于自己的社会生活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当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提出“自由、平等”的口号来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在反对封建制度束缚的意义上，这个“自由”的口号是有一些积极性的。但他们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只是资产者的自由，即资产阶级利用自己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来经营买卖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所以，这种“自由”的口号实际上包含着不自由的一面，即包含着人被物质财富支配和劳动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的消极面，这个消极面使资产阶级的自由口号很容易就变成空洞的而在实际上是反动的口号。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种反动的口号是要坚决反对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所谓“自由意志”，也是空洞的反动的术语，其实质是指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疯狂反对人民的自由，法西斯兽行的自由。这种所谓“自

由”，只是垂死者对于必然规律的绝望挣扎，并非真正的自由。所以，一般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们对于社会本身的必然规律，是基本上处于盲目的不自由的状态中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无产阶级。这是与大机器生产相结合的，以消灭剥削及私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为自己的历史任务的阶级，因此也是彻底革命的，没有任何保守的偏见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无产阶级进行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和动员广大劳动人民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党和国家依据客观必然规律知识来对全社会劳动人民的行动给予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的指导。在这里，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活方面才脱离盲目的必然性的支配，并反过来能够自由地利用自己对于自然和社会的必然性的知识，以为全社会谋福利。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必然王国”进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章）

六 因果性和目的性

与必然和自由的矛盾有连带关系的，是因果性与目的性的范畴。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对立关系，在哲学史上曾长期地引起过争论：世界上的事物是依据它们自己本身所固有的一定的因果的必然联系而发展的呢？还是按照某种预先安排了的的目的而发展的呢？唯物主义坚持前一种观点，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思想则以后一种看

法作为自己的基本信条。唯心主义中间也有在形式上肯定因果性的存在的,但不是把因果性看做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因果性,而是把它曲解为某种主观的产物。如,休谟以为因果性是由感觉经验反复继起的习惯形成的,康德把因果性看做是人的理知的范畴之一,宗教迷信把“因果”和“善恶报应”联系起来,这里所谓的因果关系被曲解为神灵的意志的作用。因果性与目的性的对立和争论,和必然与自由的对立和争论,有着类似的情形,它们也是同列的范畴。

唯物辩证法肯定因果性的范畴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联系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而决不是人的意识里引出来的纯主观的范畴。因果规律是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事物在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永远都可以看到两种情形:有的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动的方面,另外的事物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我们的思维把前一种情形概括到“因”的概念里来,把后一种情形概括到“果”的概念里来,这就有了因果性的范畴。

世界是无限复杂的事物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着的总体,而“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的、(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列宁:《哲学笔记》一四二页)因果性的规律只是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一种因素,甚至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因果性只是片面地、断续地、不完全地表现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同上)因此只能在联系和发展的全过程中来看事物的因果关系,而不能离开这个过程来孤立地研究因果关系。从这个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事物的因果关系,就要避免对于因果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片面的理解。这里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实际生活中,一个结果决不会仅只是由一种原因所引起的,而常常是多种原因的综合所引起的。研究事物的发生必须全面地揭露它各方面的原因,并且还要在各方面的原因中区别主要的原因与次要的原因,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一般都是起最后决定作用的第一性的原因)。形而上学常常片面地认为只有一种原因引起一种结果,并且往往把次要的原因误认为引起一定结果的主要原因,这就不能不使认识发生偏差。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常常把历史变化的原因归结为某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把偶然的一件小事,看做世界大事的原因,这就是形而上学因果观点的一种典型。又例如,如果把个人崇拜、个人独裁的形成仅仅归结为某一个人的责任(个人无疑是有责任的),而不注意到个人崇拜、个人独裁的形成还有它的一定的客观的社会原因,结果就会走到用个人崇拜的观点来批评个人崇拜这个偏向上去了。这也是一种片面的因果观点。

第二,也由于上述理由,同一个原因,在实际生活中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那怕这个原因是根本的,但是,这个根本原因引起一定结果的过程中,除了根本的原因本身的作用之外,还不可避免地有其他条件的参预。由于所参预的条件不同,结果也就会有所不同。忽视了这些条件(那怕只是构成次要原因的条件)的不同,对结果就不能作出正确的估计。经济条件是社会精神生活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同一经济原因由于其他条件的影响可以发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不估计到经济以外的因素,仍不能正确理解社会精神生活发展的真实的具体的情况。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存在一天,由此,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一天,我们要时时警惕战争狂人“狗急跳墙”的危险。但是,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警惕,紧密团结

起来,做好了准备,进行坚决的斗争,那么就有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三,唯物辩证法指出因果之间有着互相转化的关系。一种原因产生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在另外的关系之下又可以成为原因。在这一种关系上可以看做原因的,在另一种关系上又可以看做结果。还有,一种原因产生一定结果,结果也可以反过来又影响原因。忽视了因果的这种相互转化以至于相互作用,也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联系。这种情形在社会生活上特别重要:如政治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政治反过来又对于经济的发展成为推动的原因。形而上学不能理解这种因果的相互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经济是最后的根本的原因),因此对社会生活的了解不是偏向于机械决定论(由于忽视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就会偏向于唯心主义(由于忽视了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把政治、思想的因素作为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

唯物主义反对目的论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好象都是为着实现某种预先安排好的目的。目的论的世界观和宗教迷信思想是密切地结合着,而和科学的思想是不能相容的。从过去的历史可以看出,科学愈发展,就在愈来愈更广阔的地盘上使目的论世界观遭到破产。自然科学一开始出现就在它所研究的领域里揭发了自然界自己本身所固有的因果联系,因此也就在这个领域里排除了目的论的解释。每一时代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都依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来和宗教迷信以及唯心主义者的目的论世界观进行战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生物界的因果联系没有得到自然科学的证明,宗教迷信的目的论世界观在这个领域里坚持着阵地,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以后,生物界的

目的论观点就破产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曾被认为是依循着某种永恒的正义或理性的目的的。自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后，目的论在社会领域就完全破产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者企图在微观世界的领域里否认因果规律，为目的论开辟地盘，也在自然科学上遭到破产。

唯物辩证法反对目的论的世界观，但这并不是说要否认自然界和社会中有任何目的性现象的存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目的性的现象，这是应该承认的客观事实。但是唯物辩证法指出目的性并不是客观事物的最根本的属性，并不是一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中的最普遍最根本的原因，如象目的论的世界观所夸张的那样。目的性只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生物和社会）时在某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属性。生物的有机体是符合于适应环境的目的的，这是生物界的目的性现象，但这种适合目的的性质是生物的进化规律的产物，是由于不能适应环境的有机体已被淘汰这一种因果关系的产物，所以目的性并不是生物界的最根本的属性，这是很明显的。目的性对于人类社会有很大的意义。人类的生活和行动，就其主观方面来说，不论个人也好，或是一个社会单位如团体或国家也好，都是依一定的目的而行动的，但每个人每个社会单位的主观目的都是他们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是最后决定于他们所依赖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整个社会、首先是它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联系和发展都依循着一定的客观的因果关系，这因果关系是不依赖个人的主观的目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社会生活发展归根到底仍是受着一定的客观因果规律的支配。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目的，这不同的目的，是由不同阶级所

处的不同的物质生活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的目的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目的是要保存资本主义社会，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是由不同的阶级地位的原因所产生的不同的结果，它们本身就是因果关系的产物。这里有两种目的，一种和客观世界发展的道路完全一致的目的，如工人阶级的目的。这个目的是正确的，是一定能实现的。另一种是不符合客观世界发展的道路的目的，如资产阶级的目的，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地位，并不能反映客观世界发展的道路，所以这种目的是错误的，是一定要被粉碎的。研究目的性范畴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握什么是正确的目的。要把握正确的目的，就要根据上述的因果原理，首先站稳正确的阶级立场，工人阶级的立场，努力学会正确认识社会生活的联系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把自己的行动的目的规定得符合于这个客观规律所指示的事物发展趋势，这样人的目的就成为自觉意识的目的，这种自觉意识的目的使人能够在工作中生活中取得能动性，能够按一定的自觉的计划去改造世界，推进世界的发展。归根到底，要想获得这样的自觉意识的目的性，必须依靠两个条件：第一，要依靠科学的研究，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因果规律，然后依据这样的规律知识来规定正确的行动目的和计划；第二，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不同地位的并且依不同目的而行动的人们，因此为着实现正确的目的，必须进行社会斗争，——阶级斗争和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必须准备斗争的足够力量，使得社会的某些腐朽势力对于客观事物的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不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抗，如果有所反抗，就会有更大的社会势力来打破这种反抗。欧洲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时期为了认识和利用自然界的规律，曾经用很大的力量打破过天主教所代表的封建腐朽势力的反抗。新

中国的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进步人民共同打破了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及其他社会腐朽势力的反抗，才能够全面利用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自然界规律，来胜利地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

七 可能性和现实性

当我们在行动中为自己规定某种目的时，我们对于自己的目的总是这样看的：它在目前虽然还不曾实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随着条件的变化，总有一个时候会变为现实存在的事物的。这里，我们就涉及到了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范畴了。

可能性是与现实性对立而又密切联系的范畴。可能性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这样一种情况，即它在发展的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现实，但在目前却还没有成为现实。如果它在发展的一定条件下已成为现实，我们就说可能性已转化为现实性。事物既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它的内部又产生新的事物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这样，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现实性中又产生新的可能性，这就是可能性和现实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的同一性。

要正确理解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辩证的联系，必须对于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两个范畴所反映的客观内容正确地加以把握。首先就可能性来说，对于可能性有一种抽象的看法，即以为只要是我们凭主观的设想认为可能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算是具有可能性，或者以为只要是我们必要的，也就应该是可能的，而不必问这种设想、这种主观上认为必要的东西是否可以成为现实。如说月亮可能落到地球上，明天世界就可能实现为共产主义世界，以及无政府主义

者所主张的立即废除国家政权等等。这种纯粹主观设想而没有足够的客观根据的所谓“可能性”，叫做抽象的可能性或虚假的可能性。抽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是没有任何联系的绝对的对立观念，这样的观念是对于可能性的形而上学的不正确的理解。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的思想必须避免从抽象的或虚假的可能性方面来思考问题，必须避免只考虑有无必要而不考虑有无实现的根据的这种片面观点，我们要把握的可能性必须是实在的可能性或现实的可能性，即与现实性有联系的，具有转化为现实性的客观根据的这种可能性。把握实在的可能性，对于我们的实际行动特别重要。如果我们在行动中不能把握实在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行动是从抽象的或虚假的可能性出发，我们的行动目的就要落空，我们就要遭到失败。怎样才算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把握了实在的可能性？这就是说要把我们行动的目的、计划建立在实在的可能性上，建立在有可能成为现实性的可靠基础上。主观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就是不能把自己的目的和计划建立在有可能成为现实性的可靠基础上，因此就在斗争中工作中招致失败。

但这里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可能性还不就是现实性，要使事物由可能转变为现实，必须经过人的努力，有时要经过严重的斗争，而有些本来只要经过努力和斗争就可以实现的事情，在没有斗争之前，看起来往往好象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事情的本质，往往会把一种本来有实在可能性的事情看成不可能的，这又会出现另一种主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革命初期，革命势力的力量很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努力斗争，革命一定可能胜利，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见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就产生悲观退却的错误思想。

现实性的范畴也需要我们加以正确的把握。现实性并不是指眼前存在的一切而言。现实性是和必然性相联系的。现存事物只有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才是具有现实性的。某些事物虽然是现在存在的（例如某项错误的政策的实施），但在发展过程中不但不表现为必然的东西，而且要被事物的必然规律所摧毁，这样的事件，虽然存在，但却不能说就是具有现实性的。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在垂死挣扎的时候很象一些老虎，但它的实质很虚弱，它已不能挣扎很久，所以就总的发展方向来说，它究竟不是现实的老虎。毛泽东同志把它们形容做“纸老虎”，这是完全正确的。新生事物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软弱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常常易受挫折的，但这种情形，并不能说明新生事物必然要失败，相反地新生事物包含着一种一定要发展起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终归要变为现实性，因此认为新生事物一定要失败的看法就不是现实的。毛泽东同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谈到一九二八年初生的小小的革命根据地时，说它“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就是把握事物的现实性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客观存在的现实事物包含着发展和转化为另外的事物的可能性，这说明现实事物自己本身存在着矛盾，说明事物在肯定的方面之中包含着否定的方面。所以，事物的内部矛盾，是发展的实在可能性的根据。要把握什么是实在的可能性，就要从现实事物的矛盾的分析中去找这个根据，实在的可能性就是事物的否定方面克服它的肯定方面，将来的方面克服它的过去的方面，新的方面克服旧的方面的可能性。“星星之火”，有着“可以燎原”的可能性，这是

由于它是“布满了干柴”的腐朽中国情况之下的新的因素。中国广大人民希望把中国迅速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先进国家，这个要求有着实在的可能性，因为新中国目前已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工人阶级专政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政治法律制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是保证人民在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并从而克服落后农业国状态的最可靠的根据。

可能性之所以还不是现实性，也正因为它是现实事物的矛盾运动中的一个方面的因素。在矛盾没有克服之前，也就是事物的某些旧的方面还没有被新的因素克服以前，特别是在新的因素方才开始出现的时候，这新的因素还没有在发展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它的必然性（虽然它已包含着必然性），相反地，这时它有时还会表现出暂时失败的可能性。这样，可能性在未转变为现实性时，可能性本身也是矛盾的，这里至少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可能性，或者是新的事物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或者是新事物暂时失败和旧事物暂时巩固的可能性。估计事物发展的可能性时，我们必须依据事物内部矛盾的各对立方面的相互联系的研究，把各种相反的可能性都估计在内，而不要片面地只估计一方面的可能性。在实际工作中规定我们的行动方针、办法等等时，不但要估计到比较顺利的可能性，也要估计到最坏的可能性。从最坏的可能性估计出发，向人民群众指出斗争任务的艰巨性，从而推动人们作出最充分的准备，付出最大的主观的努力，作出尽可能周密完善的实际措施，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行动的目的和计划的安排方面取得高度的主

动性,因而也就可能取得最大的斗争成就,这是领导斗争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原则。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就是经常应用这个原则,因此就能够在任何斗争中都使群众保持着充分的战胜敌人的条件,就能够不断地鼓舞群众的革命精力,能够不断地进行轰轰烈烈的斗争,使一个胜利之后,又接着得到另一个更大的胜利。不懂辩证法的人,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常常从自己所希望的最好的可能性方面出发,不考虑任何较坏的可能性,不动员广大群众来为克服这种较坏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准备和采取有效的措施。这样就常常会在困难情形出现的时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就会弄得手足无措,甚至于一败涂地。

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是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依循着它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矛盾运动规律)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事物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三个因素的结合:(一)转化的对象,(二)必要的条件,(三)有规律的运动。天空中包含着足够的水蒸气,就有了下雨的可能性,这就是转化的对象。但这种可能性必须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使水蒸气转为雨滴(如空气中微尘,雷电的刺激等),才能够有规律地转化为现实性。植物的种子有长成为植物的可能性,但必须有适当的土地、湿度、温度等等条件,才能够使这可能性循着植物生长的规律转变为现实性。可能性是矛盾的,现实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包含着各种可能性,因此,一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同时就是表示另外的可能性被消灭,就是可能性的矛盾被克服,在这里就不能不通过对立面之间的斗争。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有规律的运动过程,同时也就是矛盾的斗争过程。就如象种子要转化为植物,必须经过突破种皮的斗争过程。没有这个斗争,种子就不能生长成植物。

在人类社会，主观因素对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过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促进某种可能性使之变为现实性的强有力的条件。——在一定的情形下，在一切客观因素已完全具备的情形下，往往还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里，论到如何可能避免工作中的错误问题，指出我们首先需要建立正确的制度——建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但在“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这里所说的“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就是指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同一篇文章论到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错误的原因时，指出这些错误的成为现实，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国内外的紧张斗争对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这篇文章接着又指出：“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这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这里明确地说到了人们的主观因素的一定的决定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有可能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这种转变的可能性之变为现实，也依赖着主观因素的作用，即一方面是依赖着党处理这个矛盾的适当的政策，另一方面还依赖着资产阶级要明白“大势所趋”，采取恩格斯所说的“充分理智”的态度，愿意接受而不是象右派那样地反抗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

政策。

在我们估计某项任务是否可能成为现实的时候，必须对于实现它的条件作全面的研究。条件是一定需要的，客观的物质条件是必须重视的。问题是不能仅仅只看见客观的条件，物质的条件，而不注意主观的、人的条件，而人的条件恰恰也是不可忽视的。这里主要问题是在于要相信群众的创造力量，凡是经过人的努力确有可靠根据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那就不管当前某些客观条件如何困难，都应该坚决地做下去。革命的事业就是克服了艰巨的客观困难条件才实现的，生产的任务也是如此。在建设工作中，要克服“见物不见人”的片面观点。当然也要防止只见人不见物的某种主观主义倾向。

人们为自己的行动规定某种可能的任务或目的，并为这些任务或目的的实现而努力创设条件和进行斗争，通过斗争就使可能的任务真正变为现实。这就是主观因素的作用的最一般的情形。这种情形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自觉性和目的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曾被唯心主义所夸大，以为人的生活是由所谓“自由意志”决定的。好象任何人只要抱定任何一种目的，坚决地做下去，不管是什么目的或什么情况都一定能够成为现实或能够有一定的现实的作用。唯心主义的这种观点在实际工作中必然表现为主观主义，是很容易明白的。但是，事实上人们为自己所规定的任务或目的，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成为现实的。有些任务或目的具备实在可能的根据，它们是能够实现的，它们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正确的目的，有些任务或目的没有实在可能的可靠根据，它们只能以失败告终，它们就是不正确的目的。在社会生活中，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人的主观因素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斗争的积极性，对于可能性到现

实性的转化起着主要的作用,但主观因素并不能决定一切,事物的实在可能性的根据,归根到底仍是客观事物自己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要使人的主观因素对于事物的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发挥强有力的积极作用,必须具备以下的几点:第一,人们必须首先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必须使自己的主观任务或目的规定得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反映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必然的趋势,也就是客观事物本身内部存在着的实在的可能性。一定要用全力设法避免按照纯主观的、没有客观事实根据的抽象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必要的观点来决定自己的任务或目的,任务或目的必须是事实上必要的也是真正可能的。否则这种任务或目的就一定要落空。例如反动派要想把旧的腐朽制度长久维持下去,这样的目的就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一定要失败的。冒险主义者提出超过客观现实条件所容许的目的、任务和计划,这样的目的、任务和计划只具有抽象的可能性,也不能转化为现实性;右倾保守主义者不能够充分估计和利用客观事物本身的实在可能性,不敢提出经过努力确实可以实现的较高的任务,不能指导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推动和促进事物的发展,这也不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正确的任务和目的。第二,要有计划地创设条件,努力改造对我们不利的客观条件和充分利用有利的各种条件,使事情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能够有利于使我们所规定的可能任务变为现实,有利于阻止和克服其他各种可能性的实现;第三,要用最大的努力对阻碍我们的任务实现的势力和倾向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要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为创设各种有利条件和粉碎阻碍进步的势力而进行斗争。以上几点,就是在变可能性为现实性的运动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缺一不可的条件。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一点上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范例。他首先依据当时的国内革命战争的规律性，规定了我们的任务是战略防御的任务，是反“围剿”的任务。然后又提出要使这个任务胜利实现，一定要在战争中采取主动灵活的行动，在一定情形下要采取退却的行动，以便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但是，单有以上两点，还不能使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最后还需要决战的行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毛泽东选集》一九八页）

中国人民现在担负着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完全依据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提供的实在的可能性的，因此它是一定有完全实现的前途，并且现在正在走向这个前途的。但是，为了完全实现这个前途，不是只有正确的任务就足够的，还必须要依靠已经创设了的和进一步再加创设的种种条件作为保证，这些条件包括着加强我们的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加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调动和组织人民中间的一切积极力量来为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的残余，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为创造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条件和因素而斗争。在创设和保证加强这些条件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和一切企图破坏我们的事业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也要对各种保守的、落后的势力和其他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伟大任务由可能性一步步地转化为现实性。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这

样说：通过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决的努力和斗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将一定会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

去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里曾指出：“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这里讲的虽然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但是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哲学工作者的最根本的任务。我们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无论他们的具体分工是在哪一部门，无论他们是研究辩证唯物论本身还是研究哲学史、逻辑学等等，都应该把“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这个“迫切问题”的解决当作自己一切研究工作的终极目标，把这个目标作为我们向前跃进的灯塔。哲学研究工作要“厚今薄古”。在“厚今”方面，就是特别要“厚”当前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工作这个“今”，“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今”。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里，曾提到哲学应该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提到理论掌握群众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论哲学不是为着任何其他目的，而只是为着正确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各种实际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以来一百多年无产阶

级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无产阶级和它的党，需要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技术革命过程中轰轰烈烈地不断地向前跃进着的广大人民，需要在自己的实际斗争中应用辩证唯物论。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如果不能帮助无产阶级和它的党满足这个迫切需要、不能帮助广大人民满足这个迫切需要，那末他们就会严重地失职，因为他们使自己的研究脱离了实际工作，使自己的研究成为完全没有意义的活动。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双反运动的观点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浪费，包括人在精神上的浪费和出版界在物质上的浪费。

只有把哲学研究经常指向实际工作的需要这一目标，这样的研究工作才有真正的生命，才能使辩证唯物论哲学得到生动的解释和发挥。辩证唯物论哲学本身的发展，从来都是在它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获得的。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到一个新阶段，就因为这部著作解决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反对修正主义（它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一个当时迫切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总结几十年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正确解决了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所产生的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实际问题，这就在哲学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它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得到了新的发挥。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我们中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下，各地从实际工作的干部中，已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但有很多实际工作经验，而且也能够很好地应用辩证唯物论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因此他们就能够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

共同在工作中创造出卓越的成绩来。目前中国工农业以及各方面工作所表现的突飞猛进的形势，不但说明中央领导的正确，也说明我们已经有很多干部能够在工作中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报纸上已发表过的一些地方工作的总结，如湖北省委会关于光化县和均县兴修水利的报告，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天津地委书记赵克同志关于改造洼地的报告，等等，就不难看出，这些报告正是辩证唯物论哲学原理和实际工作互相结合的生动范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许多哲学的“外行”，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力，比起那长期地只是在书房里做研究工作的“专家”、“内行”来，不知要强过多少倍。

这样的情形说明，我们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向前跃进，才能担负起自己的工作任务。哲学研究工作者的总的任务，应该是帮助实际工作中的干部更好地应用辩证唯物论，是在广大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是，在目前，我们许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们，首先还要向那些在实际工作中的干部学习，要在广大人民的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去学习，然后才有可能对上述的任务作出真正有益的贡献。

研究哲学史的人是否也应该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论的问题呢？答复是完全肯定的。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并不是要使我们的思想沉没在过去的时代，而只是为着要从过去的哲学思想斗争中、从过去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长期的历史斗争中吸取某些经验教训，以便帮助我们在今天更好地掌握辩证唯物论和更善于和唯心论进行斗争。不能让过去拖住现在，而应该让过去为现在服务。因此，研究哲学史的人，也仍然要注意和研究在实际工作中

应用辩证唯物论的问题。并且，也只有经常注意和研究这个“今”的问题，对于哲学史的许多“古”的问题才容易获得正确的理解。举例来说，我们有些哲学家不肯承认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敌对党派斗争的历史，他们硬要说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关系是兄弟、朋友和师生的关系。如果他们认真研究一下中国最近几十年来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间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曾进行过如何激烈的斗争，那末他们那一套观点就根本拿不出来了。在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主观主义，曾经在我们革命的历史上造成非常大的损失。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把唯物论的观点应用到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曾经付出了很多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所以，唯心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这是毛泽东同志的结论。马克思有这样的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在下等动物身上所透露的高等动物的征象，反而只有在已经认识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要正确地理解过去哲学史上的斗争经验，就必须认真研究今天的哲学思想斗争，特别是研究实际工作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

关于逻辑研究工作的问題，我以为，逻辑的研究也必须注意到和实际工作的联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曾论到概念、判断和推理在人们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过程。目前，逻辑的研究工作中有一种离开实践过程专门研究纯粹的逻辑形式的倾向，这是必须克服的唯心主义路线。中国人民需要我们的逻辑学家能够帮助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所提出的问题作出明确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我认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是逻辑研究工作跃进的关键。

根据以上的理由，可以肯定，我们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应该毫无例外地把“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我们努力的总的方向。为要能够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向前跃进，我们必须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要向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学习，要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中学习。在这一方面，每天报纸上的许多重要的报告和新闻，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间接的学习材料，值得我们经常地认真研究。除此而外，我们还应该争取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们建立联系，直接从他们中间取得帮助。只有首先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们学习，然后才有可能对于所学到的东西进行理论上的加工，在哲学上提出某些有益的意见，反过来对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们给与帮助。

要学游泳必须下水。哲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在自己规划中，争取安排一定的时间去直接接触实际，并且对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具体的研究，这样才能真正锻炼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论的本领。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要认真地研究党的各方面的政策，认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在这一方面的学习是不是注意得很够了呢？决不能说是已经很够了。并且，在有些人中间甚至有忽视这方面的学习的严重情形。党的政策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辩证唯物论在中国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应用的卓越范例，哲学研究工作者有责任加以深刻的学习研究，并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忽视这个任务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

宇宙是无限的，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却是有限的。无限的宇宙，由一件件有限的事物所构成。无限和有限的相互联系，两者之间对立的统一，这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之一。

人类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过去人们在神话中梦想的月宫旅行，现在竟接近事实了。行星际的飞行既然已离我们不远，太阳系以外的无限太空的遨游也就会有现实的可能性。但是，为着走向这些远大而美妙的目标，人们只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步步地前进。从开始打制石器到火的发现，经过了多少万年，又几十万年才发明铁器。认识地圆，发现美洲，发明蒸汽机、电动机，直到最近人造地球卫星和人造行星的出现，又经过了几千年。人们征服自然的远景是无限的，但是到今天为止的成就终归是有限的。今天有限的成就不断地发展下去，就表现为将来征服自然的无限的能力。

我们常说，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多少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逃到了台湾。抗美援朝一战，迫使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坐下来讲和。中国人民在掌握政权之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消灭了地主阶级，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

思想上战胜了资产阶级，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去年一年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号召下，人民群众发挥了冲天干劲，创造了许多奇迹。的确，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是无限的。

但是，这个无限，仍然和有限联系着。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总有其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用两脚走路，一点钟只能走十里左右，你不能希望他一点钟走一百里。用旧式农具种地，一个农民只能种几亩，不能希望他一个人耕种百亩千亩。组织起来，力量比单干大得多，但在一定技术条件下仍有其最高限度。

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能够这样，就是对辩证法的客观规律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也就掌握了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工作方法，正确地指导斗争、走向胜利的方法。

在战略上深信敌人的有穷有尽和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在战役、战斗上又认真注意到人民力量有穷有尽的方面，并巧于应用这有限的力量，帮助它发挥出可能发挥的最大作用，来一个一个地攻取敌人的堡垒，一次一次地战胜敌人，如此积累下去，一直达到对敌人的全胜。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用以指导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来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战斗的一个基本方法。

对自然界的战斗，也有类似的情形。自然界总的说来是无限的。但是，人们在和自然界斗争的一定过程中，在为实现工农业建设的一定任务而进行的斗争过程中，自然界所能给与人们的障碍和困难，一般来说总是有限的。与此相对说来，不断生长着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无限的。因此人民能克服一切困难，并有理由藐视一

切困难。大地上有数不清的山，但阻碍着愚公的只是王屋山太行山，肯定地认识到山不会加高，愚公就有充分的信心，要利用自己子子孙孙无限生长的力量，来担走这不会生长的山。古代的人民中间，尚且有愚公移山的故事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凌厉无前的气魄，在合作化、公社化以后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的工农群众中间，在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的英雄人民中间，难道还会有什么自然界的困难值得害怕的么？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旦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号召之后，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强烈的响应，并出现了一九五八年轰轰烈烈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从总的方面来说，人民群众在对自然界的斗争中完全应该藐视一切困难，应该充分相信自己能克服一切困难，能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但是还必须注意事情的另一面，即人民力量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的有穷有尽方面。在这里，需要善于估计在一定的生产和建设任务中战斗着的人们所能发挥的最大的力量，善于根据这些估计来规定斗争任务和指标，善于把人民力量充分地组织起来和鼓舞起来，以便尽可能多快好省地完成所规定的任务和指标。

右倾保守主义者的思想方法是片面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只看到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而看不到它的无穷无尽的方面，而且在于他们对于那有穷有尽的方面，也不是从它可能发挥的最大潜力方面来加以估计的。这样的人，只要一遇到比平常较大一些的困难，精神上就被压倒了。因此就不能鼓起最大的干劲，来争取完成可能完成的最大限度的任务。右倾保守主义者的思想方法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是完全相反的。大跃进的思想动力之一，就是深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深信人民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不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必须继续巩固和提高这种信心，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使我们在一九五九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但在这里，又必须同时防止陷入另一个片面的观点：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或缺点：在规定任务时主观地提出超过现实可能性的过高的指标，在使用人民力量的时候不注意精打细算，合理分配，适当安排，改进技术，改善操作，一句话，不会节约劳力，不会使有限的劳动发挥它可能发挥的最大潜力。

必须认真学会掌握辩证法，把有限和无限的对立统一规律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和一切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一方面要有藐视一切困难的冲天干劲，一方面又要有实事求是地根据客观现实可能性来正确地规定工作任务，正确地组织和应用人民力量的科学精神。任何一种片面思想都会使我们的工作陷入少慢差费的泥泞，只有辩证法的全面观点才能指导我们多快好省地向前跃进。

（一九五九年二月《红旗》杂志第四期）

学习列宁, 保卫和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

——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而作

一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使它成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更加锐利的思想武器。

列宁亲自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伟大革命胜利。在他的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和他的学生们的领导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世界无产阶级又在一系列的国家获得了胜利, 在中国, 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帝国主义殖民地体系趋于瓦解, 资本主义世界日益临近了末日。

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 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但这个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而实现的。资本主义世界并不甘心于

自己的灭亡，它用一切方法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举行不断的疯狂进攻；经济的和政治的、武装的和“和平”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资产阶级动员了它的一切力量，不断地来抨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它的哲学基础，力图破坏它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中间日益扩大的影响。

列宁诞生在九十年前。在他出生后的二、三十年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个所谓“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获得了广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逐步取得了胜利，成为它的唯一的指导思想。但是，当工人运动中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公开敌对的学说——巴枯宁、普鲁东、杜林等人的学说一个个都被工人抛到垃圾堆里以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采取了狡猾的、隐蔽的形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于是就出现了伯恩斯坦以及后来考茨基等人所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在表面上伪装拥护马克思主义，借口要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某些“修正”，来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和它的哲学基础，以配合工人运动外部资产阶级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修正主义者散布“阶级调和主义”，“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的谬论，“宣扬‘社会和平’（《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页），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瓦解他们的斗志，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修正主义者用资产阶级教授们的最腐朽的唯心主义来偷换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这就是说，修正主义者企图从世界观的基础上来解除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武装。

列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走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舞台，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入帝国主义时期的开始，他面临着无产阶

级要准备武装起义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任务。为着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组织力量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能够对资产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摧毁资产阶级的各种各样的，首先是暴力的抵抗。在这样的時候，无产阶级就愈是迫切地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指导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装，一切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倾向，都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极大的损害。这时修正主义就成为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就必须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种种进攻，就必须用主要力量揭破修正主义者从内部腐蚀工人阶级意识的阴谋，以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保卫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列宁一开始就面临着这些艰巨的任务，他始终一贯地而且成功地担承了这样的任务。

列宁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进攻面前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根据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的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新成就，使它向前发展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各方面的根本原理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列宁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揭发了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在共产主义学说方面，列宁贡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在哲学方面，列宁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都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发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切贡献，都对当时的修正主义给予了粉碎的打击，也为我们今天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其他反马克思主义思想遗留下一批极其锋利的武器。修正主义者借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变化，硬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他们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之下来实际上取消马克思主义，而列宁则用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事实来粉碎修正主义者的胡言乱行。列宁的工作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产生了一些新的情况，但这些新的情况一点也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显得“过时”或“落后”，而只是推动它继续向前发展。在新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确需要作某些新的阐明，但这决不能导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根本原理的取消，而只是进一步证明这些根本原理（包括它的哲学基础）的“正确”和“万能”，证明它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的普遍真理。

二

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它的意识形态和它的经济制度一样，已经趋于彻底的腐朽。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早期，还在资产阶级哲学领域内出现过费尔巴哈那样的唯物论者；那么，在列宁的时代，那样的唯物论就已经完全绝迹，而极端的唯心主义和神秘论在资产阶级世界日益成为统治一切的思潮。从新康德主义到马赫主义，从实证论到实用主义，都纷纷地窜集到认识论的领域里来向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大肆狂吠。这时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出现了，他们不但不把这些反动的哲学流派当作敌对阶级的思想来加以批判，相反地却如影随形地跟了它们的尾巴走。资产阶级教授们叫嚷着提倡新康德主义，于是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等人就跟着宣传新康德主义，资产阶级哲学界流行马赫主义，于是俄国的一批修正主义者就把马赫主义奉为至宝。列宁曾经揭露过修正主义的这副丑脸，说：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僧侣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哝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哝着），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蔑视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看待，而自己却在宣扬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同时带着蔑视的意思对辩证法耸耸肩；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朴素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辩证法。”（《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页）

列宁在哲学上的时代任务，就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这个世界性的反动哲学思潮，揭露修正主义者在哲学上的背叛行为。为着完成这个任务，列宁曾写了许多论文，并贡献了他在几年时间里写成的巨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巨著以批判马赫主义为中心，从认识论的最根本的问题上把帝国主义时期的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作了深刻的、全面的总清算，挖掘了马赫主义最早的根源，指出它在实质上只不过是十八世纪英国神父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再版。

列宁的著作详细地展开了并进一步证明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提出的著名的原理：在哲学认识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在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客观与主观）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上，一切哲学都在基本上被划归到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里，肯定前者是第一性的东西，而后者则只是前者的反映并由前者所派生出来的，这就属于唯物主义的阵营；反之，

认为后者是第一性的东西，前者只能算是后者的某种外表形式，而不是独立的客观存在，这就属于唯心主义的阵营。列宁根据这个原理，考察了当时哲学斗争上所涉及的一系列的范畴——物质、感觉、经验、真理、因果性、时间与空间、自由与必然等等的范畴，证明围绕着这一切范畴的哲学问题里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的斗争：或者是从物质到意识（感觉、理性等）的唯物主义路线，或者是由意识（感觉、理性等）到物质的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在考察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列宁都提出了确凿不移的丰富论据，证明只有唯物主义的路线是走向正确的认识路线，而循着唯心主义的路线就要使人的思想走上荒谬绝伦的境地，例如：马赫主义把人的主观感觉看做第一性的东西，由“感觉的复合”出发来看世界，就达到了“唯我论”的结论，达到了没有人类以前就不可能有世界存在的胡说八道。

列宁还把恩格斯以后的自然科学新成就作了总结，批判了自然科学界的唯心主义倾向。他指出由于某些自然科学家不懂得认识的辩证法，不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概括这些成就，竟至于堕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泥坑，作出“物质消灭了”的谬论。列宁在这里进一步发挥了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基本思想，即自然科学的每一项新发现都会更加有力地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想要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来否定唯物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是站不住脚的。

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腐朽性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不敢完全公开表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总是在各种各样的掩盖下面来偷运唯心主义和反对唯物主义。他们否认哲学上存在着两个互相敌对的基本营垒，自命为“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新

路线”。这些所谓的“新路线”，在恩格斯的时代已经出现，而在帝国主义时代更普遍地流行起来，名目非常繁多，有“实证论”、“马赫主义”、“新实证论”、“实用主义”等等不同的称呼；色调各有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同样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魔鬼。修正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教授们的随声附和，在这一方面也不肯落后。他们把这些反动哲学流派称作“最新的哲学”、“现代认识论”、“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借着各种好听的名义，来从事于使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互相“调和”的勾当。他们嚷着要用这类“最新的哲学”来代替所谓“过时了”的辩证唯物主义，以便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散布唯心主义。

针对着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卑怯的欺骗手法，列宁提出了哲学的党派性原则，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哲学党派之不可调和性进行了反复的论证，从而揭露了马赫主义之类所谓“最新的哲学”的虚伪性，指出这些哲学的代表们戴着“中间党派”的、“超越”的或“调和”的假面具，而在实际上却是唯物主义的死敌。列宁说：“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末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象一条红线那样贯穿着‘驾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的愚蠢愿望。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0—361页）修正主义者企图“调和”马克思主义与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其实质也仍是一样：考茨基曾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可以和康德主义相“融和”，甚至于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既可以叫做唯物论，也可以叫做“实在论”、“实证论”、“经验论”或“经验批判论”。俄国的一批修正主义者则

率直地表示要完全投靠马赫主义。他们是一律都走上了唯心主义的路线。“他们相信反动的哲学教授，结果就沿着陡坡滚下去了。”（《列宁全集》，第362页）

列宁非常鄙弃那些“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的“中间党派”，把它们叫做“一种讨厌的烂泥”。列宁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应该有最鲜明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党派立场，“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件可鄙的事情。”（《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5页）公开肯定自己的阶级性、党派性，和一切离开唯物主义和投降唯心主义的公开或隐秘的企图作不妥协的斗争，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区别于修正主义者的标帜之一。列宁多次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引为哲学唯物主义的党派性的模范，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8页）“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企图当作垃圾清除掉。”（同上，第355页）“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末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基本论点：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同上，第356页）“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

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同上,第357页)

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新”流派用以迷惑人的东西,主要是从认识论上曲解了一些科学的词句。“一般实证论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在更多地从事对认识论的巧妙的伪造,冒充唯物主义,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同上,第348页)在这些流派的伪造伎俩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经验这个概念的歪曲入手。他们都谈论经验,把自己装得象科学思想家那样地重视经验,接着就对经验这个范畴进行唯心主义的曲解,硬说世界上似乎有什么“纯粹经验”,“没有掺入任何非经验的东西”的经验(同上,第148页)之类,这就是说,把经验绝对化,使它脱离经验以外的事物的联系,把它看做和外界客观事物完全无关的纯粹人们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列宁指出,他们在事实上只是重复了十九世纪初德国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所说的一句话:“人除了经验以外什么也没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9页)这句话的意思不外是:人们除了自己的主观感觉、经验之外,什么也不能认识。感觉、经验就是人类认识的唯一的内容,在感觉、经验和感觉、经验中所呈现的那些表面的局部的现象的总合之外,人类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感觉、现象,就是世界;局部的,枝枝节节的表面事实,就是事物本身。乍一看时,他们在强调要人们尊重经验、“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实用主义——马赫主义者美国的变种——胡适的话),好象是在拥护科学,赞同唯物主义了。进一步仔细分析,却是完全相反,他们是在这些好听的名词下面来反对科学,反对唯物主义,偷贩唯心主义,否认客观物质世界和它的规律性的存在,否认科学知识是事物的客观规律的反映。他们对于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是“以侈谈‘经验’来掩饰它们的反动性。”(同上,第150页)

对于“经验”的这种唯心主义的曲解，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怎样联系着的呢？这种曲解的反动性就在于：它在思想方法方面为资产阶级提供这样的可能，即任意抓着某些局部的事实和生活中的某些表面现象，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来抹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这种手法在修正主义者那里也普遍地被使用着，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调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的谬论时，也就是把某些局部的表面现象，例如把资产阶级对于一小部分工人贵族施行的某些小恩小惠等等，当做立论的根据，而把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本身，资本主义的规律性完全撇弃不管的。

列宁在他的哲学著作里彻底揭破了这些所谓“新”学派的陈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面目，保卫了和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反复地指出人的感觉、经验的来源是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决不能象唯心主义者的解释那样，把感觉、经验说成是人们主观自生的东西，感觉、经验只是人类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的一个环节。认识的过程是以实践为基础，“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这里说的“生动的直观”，就是对于外界世界的感觉、经验，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作了进一步阐明的“感性认识”；“抽象的思维”，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所说的理性认识，也就是对于事物本身、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进一步指出的：感觉、经验只是认识的开始，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而认识的真正任务是要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这

样不断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割断了认识的客观基础和它的辩证过程，把感觉、经验看做一切，把个别的局部的事实看做事物本身，把表面的现象看做世界本质，把局部经验当做普遍真理，这是资产阶级反动的经验派唯心主义的共同特点，资产阶级利用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来抹煞它所不愿承认的科学的客观规律，制造各种欺骗劳动人民的谎言的罗网。修正主义者利用这种唯心论观点进行各种取消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诡辩。正是由于它对劳动人民有着这样大的危害性，所以列宁就不惜用极大的力量来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

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的又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辩证法的极端的仇视。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他们中间已经大肆喧嚷着要把黑格尔当做“死狗”。这些叫嚣的锋芒当然不是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只是针对他的辩证法。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被唯心主义的体系所歪曲了的、不彻底的东西，他们还是要坚决地加以反对，目的是要倒退到十七、八世纪，把生了锈的形而上学旧武器再舞弄起来，用以制造各式各样的“比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要浅薄鄙陋一千倍的唯心主义”。

但是，十九世纪终归不是十七、八世纪，形而上学耀武扬威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自从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科学上三大发现问世以后，十七、八世纪的那样一种机械论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已失去了依据。同时，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总的发展规律

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又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诞生出来，并在工人阶级和进步的知识界中间日益获得广泛的影响。发展的观念已渐渐深入人心，形而上学要采取公开否认发展的露骨形态而出现，已是不可能了。于是在资产阶级哲学界就产生了庸俗的进化论，成为他们中间最流行的形而上学的隐蔽形态。毛泽东同志说：“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正确地概括了走向没落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界的世界性潮流。从新旧实证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到反理性的法国柏格森哲学，都宣扬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把点滴的增长或渐进运动看做事物发展的唯一的形式。这些思潮都力图利用和曲解自然科学上的进化论成就，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出现，一开始就是和庸俗进化论相联系的。自然科学的进化论思想，最初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以后到实用主义者胡适的手里，就被完全曲解成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哲学基础。

修正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哲学家是亦步亦趋的，他们在哲学上也祭起了庸俗进化论的法宝，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们和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一样，采取了一种十分可怜的攻击的手法，他们既不了解黑格尔的唯心论辩证法，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把这两种完全相反的世界观混淆不清，硬说马克思的

辩证法就是黑格尔的“三段法”，于是拚了全身的力量，向着这个自己主观想象的魔鬼乱撞。从伯恩斯坦到杜林，都串演过这样的喜剧（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胡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在《介绍我的思想》文中重演过这样的喜剧）。但是，这些愚笨的攻击手法只是说明他们在辩证法的革命真理面前陷入了仓皇失措的境地。他们感到辩证法包含着在根本上对于资产阶级不利的东西，那就是肯定任何事物毫无例外地都有着内在的矛盾，而事物的发展，则是由于互相矛盾着的内部对立方面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这样的矛盾运动使事物的发展过程不仅仅表现为量变，而且更重要的是由量变不断地引起革命式的质变或飞跃。这些普遍真理启发人们认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之不可调和，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之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之必然胜利，认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革命式的变革，而不可能采取“和平长入”的形式。这样一种革命的方法论自然就不能不成为他们仇视和攻击的中心。他们竭力想使人们相信这些真理似乎已经不再是真理，相信矛盾似乎已经不再存在或者已经被“调和”起来，相信世界的发展似乎只是循着渐进运动而不需要通过革命的飞跃。由此就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也不必再准备革命的斗争了。这就是他们用庸俗进化论的胡说来和唯物辩证法对抗的主旨。伯恩斯坦说：“不断地前进对于永久的成功所给予的保证，必定比突变即将发生所给予的更来得大”。（《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任务》）这类好听的然而空洞的谎言就是修正主义者惯常用来麻痹工人阶级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庸俗进化论是阶级调和主义和改良主义等资产阶级反动政治思想的方法论。很容易了解，如果不粉碎资产阶级和追随他们的

修正主义者对唯物辩证法的进攻，任随他们把庸俗进化论的谬论扩大影响，使工人阶级的意识被阶级调和、和平改良的思想所麻痹，那么，要想正确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使之获得胜利，那是很困难的。这样，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反对庸俗进化思想，就成为列宁时代在哲学战线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了。列宁为着完成这个任务，曾用很大的力量从事于辩证法的专门研究，并写出了有名的《哲学笔记》和其他创造性地阐发辩证法原理的文章。

正象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深刻地揭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党派之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那样，在《哲学笔记》里，列宁又鲜明地指出了辩证法和庸俗进化论是两种根本相反的发展观：——“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见到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在这段话里把辩证法和庸俗进化论作了鲜明的对比，指出了庸俗进化论的根本错误，证明只有辩证法才是唯一正确的发展观。辩证法的发展观：就是把发展看做对立面的

统一，就是要“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同上)而只有承认一切事物内部都存在着这些“倾向”，才能找到发展的泉源，才能把握事物“自己运动”的动力，才能真正理解发展本身。反之，如果按照庸俗进化论的看法，不把发展看做对立面的统一，不承认一切事物内部具有矛盾着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那就等于否认事物内部发展的泉源、否认事物具有着“自己运动”的动力，也就是在实质上否认事物发展的本身。这显然是荒谬而自相矛盾的。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更深刻地指出，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在辩证法里是居于核心的地位。“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着辩证法的核心。”和列宁所指出的这个原理相反，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修正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其主要的特征就是要极力抹煞辩证法的这个核心，极力抹煞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的统一的法则或矛盾法则。特别在接触到社会阶级矛盾的问题的时候，尤其是接触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时候，修正主义者的这个思想特征就特别明显。

列宁在说到辩证法要承认“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的时候，特别在“一切”下面自己加了着重点。这是要强调矛盾对于任何事物都毫无例外，强调在任何过程中都是自始至终贯串着矛盾运动，正象毛泽东同志后来在《矛盾论》里当做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而加以充分发展了的那样。修正主义者有时也谈论事物的矛盾，当阶级矛盾是那样明显，不容人任意加以抹煞的时候，他们也忸忸怩怩地承认阶级矛盾的存在。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就努力使用各种诡辩的手法，把矛盾说成不是

贯串一切和贯彻始终的。他们想使人相信，在事物发展的某种情形下，它的内部就只存在着同一性，而不再有对立面的斗争性了；或者说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矛盾将被他们之间的所谓“共同利益”和一致性所代替了，等等。

列宁分析了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粉碎了修正主义者这一类诡辩论的根据。列宁肯定：事物内部相互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是相互依赖又相互转化的，因此是具有同一性的，但是他们又总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因而是有斗争性的。对立面又同一又斗争，这就是矛盾，这就是推动事物“自己运动”的内部动力。但是，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完全相同，而是有根本差别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只有着相对的意义，而对立面的斗争性，则有着绝对的意义。列宁说：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斗争的绝对性和运动、发展的绝对性，被列宁看做是具有同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说，对立面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是在一切发展过程中贯彻始终的现象，而对立面的同一性，则是随着现实条件的不同而常常变化的现象，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共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两个阶级的绝对的斗争性终归要使这样的同一性归于结束，而由另外的同一性来代替它，并由此把社会的发展推到更高的阶段。因此，象修正主义者那样，企图过分夸对立面的同一性的意义，而抹煞对立面的斗争性，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硬说

成是可以调和的，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斗争，这就根本违背了辩证法的发展观点，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本身的情况的。

列宁的《哲学笔记》还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一致性的思想，指出辩证法不但是自然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也是思维的规律，“认识的规律”（同上，第407页）。作为认识的规律，辩证法的根本要求首先就是要具体地全面地分析和认识事物的矛盾。“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同上）既然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的普遍规律，而一切现象和过程内部都具有矛盾着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那么，要使我们的认识成为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对于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对象、现象和它的全部发展过程都充分地贯彻矛盾分析的方法，不允许在任何情形下模糊矛盾或掩盖矛盾，否则我们的认识就要发生错误。这是逻辑上必然要得出的结论。列宁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应用辩证法的认识规律的一个最好的典范，这样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同上，第409页）

这里说的是分析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分析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其各个部分的总和中自始至终的发展”，而“各个部分的总和”在实质上也就是矛盾的总和，因此也就是分析了这个社会

自始至终的矛盾的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逻辑，正是这样彻底地贯穿着辩证法的。

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普遍地表现着害怕揭露矛盾，用各种方法模糊矛盾或掩盖矛盾的特征。还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就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口号，把他们所要建立和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贴上了这样抽象的无矛盾的标签。这类空洞的道德标签并没有反映客观事实，除了在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封建斗争中它曾有过一定的动员意义之外，它的作用主要是在于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不自由，掩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以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普遍地爱讲抽象的人道主义、人类爱和人性的空谈。他们用自己的高谈阔论的叫嚣来淹没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人待遇下所发出的痛苦呻吟，来模糊现实的人性之被分裂为互相对立的阶级性，来粉饰资产阶级之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本质。资产阶级掩盖矛盾的一切说教，和他们的庸俗进化论是分不开的，这些说教的目的正是为着要制造一些借口来支持庸俗进化论，抹煞革命变革的必然性，抹煞辩证法的客观规律。

修正主义者在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方面是资产阶级的忠实的帮手，从伯恩斯坦开始，就大谈其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抹煞资产阶级国家对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抹煞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必要。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里说：“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要和机会便越是减少。”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是那样同

心同德，他们用“大灾变”这样的字眼，来表述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害怕和仇视的心情。在帮助帝国主义掩盖矛盾的效劳上，考茨基也是一个不比伯恩斯坦更差的典型。列宁曾经揭露过他的投降主义，说：“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进行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平统一的宣传，就是因为这种批评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的根本矛盾”。（《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6页）列宁针对着修正主义的破坏阴谋用彻底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法，坚决保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辩证法。列宁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做的工作继续向前推进：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对这个社会制度在新的阶段上的矛盾运动又作了自始至终贯彻到底的科学分析，并证明这些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导致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的转化，导致革命的飞跃。

列宁在论到人们如何认识事物的矛盾的时候，强调需要对事物的各部分、各方面作尽可能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反对认识的片面性。他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说道：“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又说：“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84页）唯物论的认识论要求我们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都是充满着矛盾的、具体的东西，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就必须力求全面地具体地把握事物的矛盾着

的一切方面，否则认识主观就不能反映客观，相反地却要和客观分裂，甚至于陷于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发展了列宁的上述思想，说：“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人的认识不能够一下子就把握客观事物的充满着矛盾的全部内容，要对于事物的全体获得全面的具体的认识，必须就它的各个矛盾方面，一步一步地进行分析 and 考察，这些考察逐步地综合起来，就成为全面的认识。同时，客观事物又是不断发展的，随着事物的发展，又要不断地出现新的方面和新的矛盾，而人的认识也就必须跟着前进，也就是要跟着不断地来揭露和分析新矛盾。所以，人对于事物的正确的逻辑思考，是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矛盾的这一面转化到矛盾的那一面，由这一个矛盾过渡到另一个矛盾的不断循环往复的、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运动过程。列宁说：“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同上）认识“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同上，第239页）所以，要想对于客观事物经常获得全面的具体的也就是正确的认识，要想避免陷于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人们就必须遵循这个不断反复思考的辩证逻辑规律，而不能违背这个规律。不论在任何时候，人的思考只要一旦停止了这个辩证的运动，使活生生的认识发展的

曲线变成僵死的直线，就可能产生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列宁说：认识运动的“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源。”（同上，第412页）这样，列宁通过对辩证逻辑的研究，就深深地挖掘到了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老根子，就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到各种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是怎样违背了正确认识规律性，使我们找到了克服这些错误认识的明确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者在和资产阶级及修正主义者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中获得了锐利无比的批判武器。

列宁在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不仅彻底揭露了他们向唯心主义投降的倾向，而且不断地揭发了他们的诡辩论。修正主义者要在政治上混淆是非，宣传对资产阶级调和和投降的思想，这在客观事实发展过程的本身是找不到真正根据的。因此就必须一方面散布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以便于抹杀马克思主义科学规律和事物矛盾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另一方面还要极力玩弄逻辑上的诡辩方法，任意拉来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面例证，避开事物的本质和根本矛盾的分析，以便于作出颠倒黑白的结论。例如用少数工人贵族的思想作为“根据”，避开了整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不谈，而做出两个阶级之间利益可以调和的结论；又例如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少数工人代表可以参加议会作为“例证”，避开了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专政机构这个本质，而作出无产阶级不需要通过革命斗争，不需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谬论。列宁说：“一切

诡辩家的手法向来是：引用一些分明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例子来作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6页）又说：“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的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真是创了新纪录。诡辩家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但是黑格尔说得很对，人们完全可以替宇宙万物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同上，第194页）

列宁在他研究辩证法逻辑的《哲学笔记》里，深刻地指出了辩证法和诡辩论的根本区别。唯物辩证法要求人的认识成为活生生的不断地向对立面转化的反复思考的运动，但同时坚持这样的运动必须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和本质，反对认识上的任何一种主观随意性，诡辩论的手法的秘密就在于使主观认识的运动脱离了客观事物的本身，成为主观随意性的活动。列宁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四

列宁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保卫和发展辩证唯物论进行了辉煌的战斗，这些战斗对于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仍然有着巨大的意义，仍然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模范。

帝国主义者并没有放松它垂死的挣扎。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不但始终进行着政治的、经济的进攻，而且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公开的或隐秘的军事的进攻。在思想战线上，它仍然不断地向社会散布着主观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毒素，虽然又出了一些所谓的“新学派”，如“语义学”、“逻辑实证论”之类，但正如列宁所说的，不论蓝鬼、白鬼或红鬼，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鬼，而且旧的颜色鬼也还在继续作祟。例如实用主义，就是现在也还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中间起着不小的作用。因此，列宁在哲学上的贡献，即使在今天来说，也仍然是强有力的打鬼的武器。

帝国主义者为了延缓自己的灭亡，不但继续在工人阶级外部来进行对抗，而且也没有忘记向工人阶级队伍内部去找自己的内应。过去他们曾在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找到了修正主义者作为内应，今天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内应，那就是现代的修正主义者。

现代修正主义者继承了伯恩斯坦等旧修正主义者的衣钵，继续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仿效着旧修正主义者的伎俩，以马克思主义需要新的阐明作为借口，来在根本上取消马克思主义。这就告诉我们现代修正主义者想干些什么：如果说旧修正主义者是要破坏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那么现代修正主义者所特别要努力加以毁坏的，就是列宁的学说，特别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而毁坏列宁的学说，也就是毁坏马克思主义；因为列宁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东西，列宁的学说是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往往在口头上表示拥护列宁，而在实际上却更直接地反对列宁。因此我们在现代修正主义者面前又面临着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列宁的哲学遗产的任务。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哲学上一般都不能再象旧修正主义者那样，完全露骨地表示要用某些资产阶级教授的唯心主义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在当代说来，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性和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已树立起更加巩固的威信，修正主义者已不容易再用什么“新学派”来迷惑他们了。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旧修正主义的偷梁换柱的手法，只是多少做得更为隐蔽一些，这就是在口头上有时也把自己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而在实际上解决各种哲学问题、理论问题、实际问题的时候，却彻头彻尾使用着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思想工具。他们不但仍然继续宣传着“阶级调和”思想，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矛盾，并且进一步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矛盾。修正主义的学者以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论来反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然而他们的政治家却更狡猾些，他们采用了最卑劣的贼喊捉贼的办法：在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时候，硬说后者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实用主义的修正”，而在自己的实际言论和行动中，却到处抹杀客观真理，并把凡是对我有用的都当做真理，这就是说，他们正是全心全意地奉行着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出卖给谁，在哲学上也就不能不向同一个主子做交易。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诡辩论方面，也比旧修正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把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说成是友好的行动等等。他们在这一切问题上，都是玩弄着许多片面的、表面的、似是而非的“论据”，来制造种种颠倒黑白的、极端唯心主义的谬论。在这儿他们所表演的诡辩技巧

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

1957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曾总结了国内国际的政治和思想斗争经验，指出修正主义是当前更大的危险。他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同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指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共产党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这些文件说明，反对修正主义，在目前仍是我们在政治和思想斗争方面的主要任务。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继续在“反对或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因此在哲学上，我们就需要象列宁那样，在对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坚持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的辩证唯物论。在这方面，我们还应该特别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在当代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最辉煌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在与党内各种错误路线斗争的过程中，科学地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而写成的。其中不但包含着

许多专门阐述辩证唯物论的著作，就是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的著作，也具体地贯彻了和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列宁的哲学遗产。在他的著作中，首先保卫和发展了列宁的哲学党派性的原则，把它锻炼成贯串一切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实际工作中以及科学研究工作中，如果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如果“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和错误路线斗争的经验，写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其它哲学著作，继列宁之后，更全面、更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和辩证法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的认识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往复和一次比一次更高的发展的过程，是由个别的特殊事物的认识到一般的事物的认识，再由一般回到特殊，然后再到一般，这样不断向对立方面转化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把这个认识论原理贯彻到党的“群众路线”中来，指出上述的认识过程同时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不断反复的过程，也就是领导者不断地总结群众经验，把群众中创造出来的好的经验和意见不断地“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过程。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充分地显示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作为“行动的指南”这一个重大的特点。它使我们认识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各种错误路线，从认识的根源上来说，就是由于违背了上述认识的对立统一的发展规律，把认识与实践、特殊与一般、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领导思想与群众经验互相割裂的结果。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全面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锐利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在教导人们分析矛盾的时候，强调一方面要注意到矛盾的普遍性，这就是说，要肯定一切过程和每一过程自始至终都是矛盾运动，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善于揭露矛盾，而不要模糊或掩盖矛盾；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到矛盾的特殊性，要认识清楚不同矛盾的不同特殊的本质，然后才能找到适合于这些特殊性的不同的方法来加以正确的解决。毛泽东同志在几十年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许多著作中，自始至终都贯彻了精密的阶级分析方法，并根据革命每一个阶段阶级矛盾的变化特殊情况，提出不同的策略方针。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的正确性。在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也充满着矛盾运动，而且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继续贯彻到底，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澄清了一个时候由于有些人不肯承认或不肯明确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产生的某些思想混乱状态。在贯彻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又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特殊性：和剥削阶级统治的、对抗矛盾占居主导地位的旧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是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小量的矛盾是對抗性的。因此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和旧社会不同，对于仍然存在的小量的敌我之间的对抗矛盾，无产阶级的国家仍

然要用专政的方法或镇压的方法来解决，但对于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则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深刻地概括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和任务，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学说，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仍然是社会本身内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而不断地获得解决的过程，仍然是不断地由量变到质变，由渐进运动到革命的飞跃的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就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更进入人民公社，就是由不断出现的各个方面的质变一步步地形成大的革命的飞跃，而每一次质变都要通过内部矛盾势力的斗争，通过先进势力和右倾保守势力的斗争。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通过反对右倾思想或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者和庸俗进化论者所想象的那种不包含矛盾和对立面的斗争，不包含质变和革命飞跃的纯粹渐进性的发展形式，不但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找不到，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辩证法思想既然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出现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好形势，使帝国主义和世界的反动派不能不大感恐惧。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忙着配合帝国主义者的叫嚣，对我国进行各种各样的造谣诬蔑，妄想

破坏它在世界广大劳动人民中间日益扩大的影响。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年比一年兴旺发达，社会主义制度是迅速地巩固成长起来，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妄想则日益走向彻底的破灭。

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的著作，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强有力的号角，是列宁的事业在当代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些著作问世以来，许多事实证明，坚持和修正主义之类的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起着多么强大的推进作用。我们一定要高举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六〇年四月《哲学研究》
第四、五期）

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旧社会有这样一种迷信：某些人有鬼附在身上，他们使用过的东西，也被认为是“不洁”的。这些东西就成为禁忌之物，如果你接触它们，那么，你的身上也就要染上鬼气了。

哲学界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有时使我联想到上述的迷信。在这次争论中，以于世诚同志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坚决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有任何的同一性。他们中间有些人提出了所谓的理由：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在历史上被唯心主义者所使用的术语，它已经沾上了唯心主义的不洁之气，因此人们就绝对不能在唯心主义的意义之外来应用它；谁要想这样来应用它，谁就是在事实上宣传了唯心主义。因此，唯物主义者就必须坚决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我们不能同意世诚同志等人的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尽管唯心主义者在历史上曾使用过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术语，但并不妨害我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肯定它。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并不就等于直接肯定了唯心主义的原则。因为唯心

主义之为唯心主义，首先在于肯定思维是第一性的东西，存在是第二性的东西。难道说只要一谈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等于直接肯定了思维的第一性和存在的第二性吗？显然这是两件事情。虽然两者可以有联系，但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因此，许多同志反对世诚同志等人的看法，并提出了批评，我认为他们的批评是对的。

关键在于对“同一性”如何理解。这里有两种根本相反的理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理解，恩格斯叫做抽象的同一性，即把同一性理解为事物与自身的绝对的一，这就是说，同一的东西决不包含任何内在的差别、对立或矛盾，反过来说，凡是有差别、对立或矛盾的东西也决不能成为同一。同一就是简单的等同。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时，就可能得到两种荒谬结果：或者是得到恩格斯所批判过的那种庸俗唯物主义，如果把思维简单地等同于某种特殊的物质，例如等同于肝脏分泌出来的胆汁的话；或者是得到唯心主义，如果把存在简单地等同于思维的话。一般的唯心主义者，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在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时，实际上是这样来了解同一性的。按照这样的看法，世界上就没有真正物质的客观存在，一切在我们周围作为物质而存在的东西，都只能归结为人的思维、意识、感觉等精神内部的存在。当然，我们是应该坚决反对这些看法的。如果有人这样来解释同一性，并且把这样的理解应用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那我们就要针锋相对地向他提出反对的意见，说：“你完全错了，思维与存在没有这样的同一性！”

对同一性还有另一种理解，即辩证法的理解。按照这样的理解，同一是差别的同一，对立的同一，或矛盾的同一。或者说，同一

事物内部都包含着差别，对立或矛盾；差别、对立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其同一性。这样的同一性，主要是指的对立面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这一个意义。例如，没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也就不存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互相联系，两者就有了同一性。再例如，战争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和平，和平在一定条件下又转化为战争，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就有了同一性。这里应该指出，根据辩证法的理解，“同一”这个范畴，和“统一”、“一致”等的意义是相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是片面的，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而同一性的辩证法的理解，则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规律性。世界上不存在与自身绝对同一而不包含任何内在的差别和矛盾的事物；任何统一的东西都在自己内部包含着差别和对立，另一方面，一切差别和对立的东西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因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有同一性。对立的同一性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事物内部相互矛盾的对立方面又同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这样的意义上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与差别、对立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同一性，就是辩证法的同一性，或矛盾的同一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彻底辩证论者，相信辩证规律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因此，辩证法意义上的同一性，应该毫无例外地运用于任何事物，包括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内。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思维在一定条件下又能成为人们改造世界，推动客观存在的变化和发展的指导力量，两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关系是很明显地存在着的。因此，如果有人问：思维与存在之间有没有辩证意义上的同一性？一个彻底的辩证法拥护者，一定会毫不迟疑地答复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肯

定地存在着的！

对思维与存在之间的任何同一性一概加以否定的同志们，例如世诚同志，并不是完全没有接触到同一性如何理解的问题。他自己在实际上已经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之所以成为唯心主义的命题，正是由于唯心主义者对这个术语作了存在等同于思维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他在今年《光明日报》3月4、5两日的一篇文章里就说：“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它是说的‘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用贝克莱的话说，是指的‘对象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这些话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不是生来就是有着唯心主义的绝对性质，它之所以带有这样的性质，只是由于唯心主义者用“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的观点，用对象等同于感觉的观点，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缘故。这样的观点正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如果世诚同志从他自己所说的话出发，按照正常的合理的逻辑进一步这样提出问题说，倘若人们不是用形而上学的“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的观点来看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是把两者看做矛盾的统一，对立的统一，并且指明这个矛盾和对立是以物质、存在作为基础的，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在这样的意义上，难道还能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吗？难道还能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有着一定的同一性吗？很明白，在这样的意义上，就不能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还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就不能简单地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

我们在上面从原则上指出了世诚同志等人的错误。世诚同志以及和他有同样看法的人可能认为，他们的看法并不是出自凭空的设想，它还有着强有力的根据；这个根据首先就是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难道列宁在批判波格达诺夫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性的理论”时，不是曾经充满着愤怒的情绪，斥之为“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2—343）吗？难道列宁不是曾经引用过拉法格的这样一段话——“当拉波波特硬说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的时候，他是错误的”（同上，第209页）——吗？难道列宁不曾严格地指出过：在感性表象和我们之外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上使用俄文 *совладать*（一致）这个字时应该解释作“符合”“协调”的意义，而不应该解释作“同一”（《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1页）的意义吗？不错，列宁的著作里的确有着这样一些“根据”，而世诚同志等人正是依靠这些“根据”来论证自己的看法的。因此我们就必须研究一下，列宁书中的这些“根据”，是不是能够证明世诚同志等人的看法的正确性呢？

如果我们对经典著作不作断章取义的引用，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问题的实质，那就可以看到，列宁的思想和世诚同志等人的看法并不是一样的。

关键问题仍然是在于对同一性的概念如何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自始至终批判了“思维与存在的

同一性”呢？原因是列宁在当时面对着一大批主观唯心主义者，其中有些人想用主观唯心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主观唯心主义者普遍地祭起了“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法宝，并对它赋予形而上学的解释：“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列宁为了捍卫辩证唯物论，必须粉碎他们的这个法宝，对他们所理解的“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进行毫不容情的斗争。不难看出，列宁在他的著作里批判“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时，都是针对着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列宁从没有在批判“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时，把它的意义片面地加以夸大，以至对形而上学意义以外的任何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同一性，也一概加以否认。不是的，列宁在批判主观唯心主义者用形而上学同一性的观点来曲解意识和存在的关系时，同时又注意到要防止把思想引到另一个形而上学的极端，即把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关系看做绝对的对立，看做不包含在任何同一性中的绝对的差别。下面这些话就是很好的证据：

“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是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同上，第148页）又说：——

“狄慈根没有正确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是：物质和精神的差别是相对的，不是无限的”。（同上，第257页）

列宁在这里告诉我们，意识和物质仅仅是在什么是第一性和什么是第二性这个问题上，也就是在恩格斯所说的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的范围内，才是没有任何同一性的，在这个问题的范围之外，它们之间只有着相对的对立或差别，这也就是说，它们之

间有着差别的同一性或对立的同一性。

列宁为什么要愤怒地斥责波格达诺夫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性的理论”呢？难道说是因为波格达诺夫主张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有着历史唯物主义所肯定的那种对立的同一性，即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社会意识反过来又能动地推动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当然不是的。问题在于波格达诺夫所说到的“同一性”是十足地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同一性，丝毫也没有半点辩证法的气味。使得列宁不能不愤怒的，是他的这样一套谬论：“所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同上，第340页）试问，面对着这样的胡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轻易加以容忍，而不起来给以严厉的斥责吗？列宁之所以要加以斥责，是因为波格达诺夫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简单地等同起来。列宁在这里决不是要否认意识和存在之间的辩证的同一性。

列宁所引用的拉法格的话是不是帮助了我们的世诚同志呢？也不。如果仔细看一看那一句引话的前后文，就不难发现那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应该注意，拉法格否认“拉波波特硬说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观念与实在的同一性’”的时候，他所提出的理由是“我们从来也不使用这样的形而上学用语。”这就是说，因为拉波波特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本人是把观念和实在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把观念看做虚构，看做没有任何实在性的东西；在他看来，一说到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就等于把观念和实在完全等同起来，并意味着“观念就等于一切实在”，“除观念以外，不再有其他的实在”了。在这样的意义上来了解同一性，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自然

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除了人的主观观念之外,还存在着物质的客体,不能说只有观念才是实在的。物质客体也是实在的,而且是更根本的实在。应该注意,拉法格在说了上面的话以后,紧接着有这样一段下文:“观念象客体一样,也是实在的,它是客体在头脑中的反映”。(《列宁全集》第14卷,第209页)这里说得很清楚,“实在的”的东西不仅仅包括观念,还有观念之外的客体,因此,拉法格的话实际上是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第一,观念和客体,是有差别的两个东西,不能形而上学地把它们等同起来。第二,观念和客体之间有辩证的同一性,差别的同一性,因为它们都是“实在的”,不能形而上学地把它们对立起来。

如果世诚同志认为拉法格的话还不够清楚,那就可以再看一看也是列宁所引用的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另一段话:“……对唯物主义者说来,把 a priori (先天的) 认识和‘自在之物’区别开来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唯物主义者 anywhere 都没有把自然界中的经常联系割断,都没有把物质和精神看作彼此根本不同的东西,而是认为它们不过是同一东西的两个方面。……”(同上,第208页)说这段话的唯物主义者,是费尔巴哈的信徒,还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但他的这段话是列宁所赞同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自然不能在认识论上应用辩证法,但他们的著作中也不是不可能有个别的(也是极不完全的)辩证法因素的。例如这段话就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差别的同一性,肯定它们是“同一”东西的两个方面。

世诚同志在去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坚决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性,否认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否认“思维和存在这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为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硬说这样的看法是“原则同格论”的

“唯心主义理论”。世诚同志自认为是一个拥护辩证唯物主义的人，而其实这种说法比费尔巴哈主义者——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还落后得多！因为列宁所引用的这个费尔巴哈信徒就明确肯定思维与存在的不可分的“经常联系”，肯定“这两个方面”是“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当然，费尔巴哈在他的《未来哲学原理》里曾批判过唯心主义者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提法，但他之所以批判它，是因为它把存在看作“一种与思维没有分别的存在，一种只作为理性的属性的存在”（《未来哲学原理》，第42页），是因为它把同一看做“思维与自身的同一”。费尔巴哈在同一本书里又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同上，第74页），并给与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是消极的反映论，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有根本的区别，它的重大缺点已经有一些同志作了详细的批判，他们的批判很对，我不再重复他们的意见。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由于费尔巴哈不懂辩证法，因此他自己并不知道，当他讲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的时候，他在事实上已经承认了两者之间的差别的同一性。而这就足以说明，即使就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也是在一般的反映论的基础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不可分的联系，肯定它们之间的差别的同一性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唯物主义，就要变成二元论或不可知论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关于俄文 *совладать* 的问题了：列宁为什么要坚持在“符合”“协调”的意义上使用它，而反对在“同一”的意义上使用它呢？要知道列宁的分析是有的放矢地针对着经验批判论者巴札罗夫的诡辩的，巴札罗夫利用这个俄文字的双关意义——“一致”和“同一”两重意义，把“关于物及其特性的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是一致的”这句话，曲解成“感性表

象也就是(着重点是巴札罗夫加的)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0页)。列宁在这里所反对的,是巴札罗夫把“一致”曲解为形而上学的“同一”,而并没有否认“关于物及其特性的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之间的辩证的同一性——辩证的“同一”和“一致”是没有区别的——,这是非常清楚的。

三

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存在任何同一性的同志们,认为他们的观点还可以在恩格斯那里找到根据。他们的理由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里讲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他的话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是把它仅仅当作唯心主义的提法来处理的,也就是说,他是以否定的态度来对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这些同志还说: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引用恩格斯有关的这一段话时,特别把“用哲学的语言说来,这个问题就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一句删掉,好象这就足以证明,列宁也认为恩格斯是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

这些说法都是非常牵强的。

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从黑格尔的著作里借用过来的,这能不能成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仅仅只能有唯心主义的意义呢?马克思主义者从黑格尔的著作里借来的语言不只这一个,例如“否定之否定”,就是黑格尔的术语,这个术语有它的缺点,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借用了,谁也不能说它仅仅

是唯心主义的术语。黑格尔的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唯心主义的，另一方面还有辩证法——被唯心主义体系闷坏了的，极不彻底的，但比起黑格尔以前的哲学来说是最自觉的辩证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而对于它的辩证方面则继承了它的合理的核心，并加以改造和发展。就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来说，也有这样的情形。黑格尔哲学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也有两个方面，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来说，黑格尔把思维看做第一位的东西，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解释成“存在即思维”意义，把存在解释成“与思维没有分别的存在”，因此它就被赋予了唯心主义的意义。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来说，黑格尔和其他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肯定地解答了“思维是否能够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并在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时候，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给与了辩证法的说明，在这一方面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就有其合理的、即辩证法的成分，而不仅仅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

应该注意，恩格斯的著作里不是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来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是在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提出这问题的。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不是要解决划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现实世界对于人的思维是否有可知性的问题。在问题的这个方面，肯定现实世界的可知性，也就是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虽然唯物主义者的肯定和唯心主义者的肯定有根本方向的不同，但就反对不可知论这一点来说，都是肯定了世界的可知性，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则是很清楚的。恩格斯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所要批判的直接对象并

不是唯心主义，而是不可知论。引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时，也是为着批判不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任何同一性的康德主义思想。因此，就斗争的任务来说，恩格斯必须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给与肯定的解决，是一目了然的。而且即使单就语法的顺序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提出“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否在我们的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构成对现实的正确反映？”的问题后，紧接着就指出，“用哲学的语言说来，这个问题就叫做思维与存在之同一性的问题”；并且随即答复说：“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的文字顺序也说明，恩格斯是明明认为唯物主义者（包括在“绝大多数”哲学家之内）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也给与了肯定的答复，而对这一点要作出相反的解释，则是很牵强的。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引用恩格斯的这段话时，也指出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不是直接解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划分问题的。列宁说：“恩格斯根据这个基本问题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接着他又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列宁全集》，第14卷，第94页）这里很明白地说到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所要解决的，是“两大阵营”划分之后的另外的问题，而在这个方面，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肯定或否定的解决，是不会直接涉及到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分界问题的。

世诚同志说，列宁在这一段引文里删掉了“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就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一句话，就足以证明列宁也认为恩格斯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其实，事情的逻辑和世诚同志的主观估计恰恰相反。如果列宁认定恩格斯否定

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那也就不但不会删掉这一句话，而且一定要把它引用出来。因为列宁正在和一大批主观唯心主义者进行战斗，这些反动思想都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作为自己的武器，列宁正在用全力对付他们的这个武器。如果恩格斯的著作早已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那么，列宁正需要把他的话引用出来，作为帮助解除唯心主义武装的强有力的根据。

列宁删掉了这句话，正足以说明恩格斯谈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时，不是为着批判唯心主义，而是为着解决另外的问题，对于列宁的斗争任务来说，没有引用的必要。

人们也许要问：恩格斯和列宁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当然是一致的，他们怎能够在同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态度呢？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是由于不注意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科学，必须依据历史情况来研究问题。恩格斯和列宁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的具体斗争任务也有所不同。他们虽然在形式上好象是接触到同一个问题，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却是不同的问题。在恩格斯生前的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潮的主要口号是“回到康德去”，是要把黑格尔当做“死狗”看待。它的目的是要散布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散布思维与存在之间绝对没有同一性的谬论，散布人的思想、概念不能认识客观现实，而仅仅是主观的虚构之类的谬论，来贬低理性，贬低科学，反对科学。这时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者，如伯恩斯坦、施米特之流，也就跟在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尾巴后面，妄想用康德的不可知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来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面对着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包括修正主义思潮，恩格斯必须着重解决认识的辩证法问

题，解决现实世界的可知与不可知的问题。由于当时的康德主义者（包括修正主义者），对黑格尔的疯狂的攻击，主要是针对着他的辩证法，而不是针对他的唯心主义，因此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在自己的著作里，屡次强调过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虽然他们也同时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他们的辩证法有根本的不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论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就是为着要批判康德的、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有着任何同一性的、不可知论的谬论。为着粉碎这样的论敌，很自然地，他必须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肯定黑格尔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的合理的辩证法的因素，但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的论证。

列宁是处在另一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这时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潮的主流发展成为更加腐朽百倍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修正主义者也就胁肩谄笑地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尾巴后面，用各种色调的主观唯心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散布意识和存在绝对同一的胡说，通过“意识即存在”、“存在即意识”的诡辩，来否认外界世界的客观存在，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的现实性。面对这个到处泛滥的反动哲学思潮，列宁必须着重解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严格分界的问题，解决唯物主义哲学的党派性问题，必须对于唯心主义的主要武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的胡说坚决加以粉碎，不给它留下丝毫存在的余地。但是，如果把列宁对于意识和存在的形而上学同一性谬论的这种坚决斗争精神，解释成列宁否认意识和存在之间的任何同一性，解释成列宁把意识和存在看做绝对对立的東西，那就大错特错了。

恩格斯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肯定态度，还可以从他致施米特的信中得到显著的证明。这也就是世诚同志提到的1895年的那一封信，但世诚同志把那信的意思完全读成它的反面了，他以为恩格斯的信帮了他的忙，其实恰恰相反。恩格斯在那封信里所批评的，是施米特把“价值规律贬低为一种必需的虚构”的错误观点。这正是康德主义的否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人们关于价值规律的思想反映着客观世界的经济规律的谬论。如果设想恩格斯在对康德主义者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时候，自己却又和康德主义者站在一道来反对黑格尔，并“明确地指出了‘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的’”（去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所载世诚同志文章中的话）那不是太奇怪了吗？

让我们把世诚同志所谓“明确地指出了‘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的’”那一段恩格斯的文字再仔细读一读吧！它的意思究竟是不是象他所设想的一样？恩格斯说：“你对价值规律的责难，适用于从实在的观点来看的一切概念。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完全切合于你所举出的圆形和多角形的例子。换句话说，事物的概念和事物的现实是同时运动的，就象两根渐近线一样，不断地互相接近，但永远不会相遇。二者间的这种差异，就正是使得概念不直接成为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成为其本身的概念的那种差异。概念具有概念的本性，因而和现实并不直接吻合，尽管它最初必须从现实中抽象得出；由于这个原因，概念毕竟不是虚构，除非你把思维的一切结果都说成虚构，因为现实之符合思维的结果，只是以非常间接迂回的方式甚至只是渐近线式的接近。”

这里按照世诚同志所引用的一字不少地再抄出来。世诚同志断定这段引文是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但他一点理由也没

说出来。现在让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恩格斯的这段话的内容和世诚同志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先从多角形和圆形的关系的例子开始说起，几何学的规律告诉我们，等边多角形的边无限增大的结果就会接近圆形；这个规律说明多角形可以转化为圆形，两者之间有着辩证的同一性。康德主义者施米特否认这个同一性，并企图以此作为比喻，来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他的理由是：多角形尽管能接近圆形，终究不是圆形，思维、概念尽管能接近存在、现实，但终究不是存在、现实，而只是虚构。恩格斯的这段话正是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施米特把思维和存在，概念和现实形而上学地绝对对立起来的不可知论观点，他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原则不是不适用于施米特的圆形和多角形的例子（如施米特所想的那样），而是“完全切合”于这个例子，圆形和多角形的辩证的同一性，也正好用作比喻来说明思维与存在、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概念和现实的同一性首先在于两者是同时运动的，象渐近线一样不断地互相接近的，并且概念“最初必须从现实中抽象得出”。但这个同一性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等同，两者任何时候都是有差异的；概念决不会“直接”成为现实，思维和存在决不会“直接”吻合。应该指出：说概念、思维不能“直接”成为现实存在，这并没有否定了，而正是肯定了它们能间接地，在一定条件下经过某种媒介转化为现实、转化为存在。马克思说的“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贯彻总路线和政治挂帅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推动起的高速度发展，这些例子活生生地说明概念、思维通过某些环节间接地转化为现实存在，说明“概念毕竟不是虚构”，思维和存在毕竟是有同一性的，因而也就粉碎了把概念看做虚构、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康德主义的形而上学观

点。(附带说一下:恩格斯这段话的原文的重心,是放在肯定“概念毕竟不是虚构”这句话上,译文没有把他的意思充分确切地传达出来)自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辩证的同一性,两者的接近、符合是间接迂回的,甚至只是渐近线式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不懂这个辩证法的过程,他们认为思维应该一次就完全正确地反映现实存在,这也是不正确的。

四

总之,世诚同志等人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忘记了同一性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种不同的理解,而辩证法的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也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

当唯心主义者,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解释同一性,把“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曲解成“存在等同于意识”,把存在曲解成“与思维没有分别的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批判唯心主义,驳斥他们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曲解,就要与他们针锋相对地坚决否认意识和存在的这种同一性,但在批判不可知论的时候,就要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因为不可知论者企图否认它们之间的辩证的同一性。

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有任何同一性,否认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否认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互为条件,共处于统一体中”,象世诚同志那样,就会接近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观点,或者即使没有完全成为不可知论,但由于不承认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联

系和相互转化关系,由于在认识论上不能够应用辩证法,仍然会陷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片面性。

过去,普列哈诺夫就是由于不了解认识的辩证法,不懂得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因而在和康德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陷于自相矛盾和混乱的境地。普列哈诺夫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当伯恩斯坦、施米特之流施用诡辩的手法,把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唯心主义者的理解混淆起来,硬说“纯粹唯物主义终究要归宿于唯心主义”的时候,普列哈诺夫在这个反动思想的进攻前面,不但不敢从正面加以驳斥,并象恩格斯那样明确承认唯物主义在不同于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相反地,却矢口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甚至于说“只有唯心主义才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是不会作出这样片面的论断来的。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从头到尾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意识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谬论,但在他的这部著作里始终也找不到“只有唯心主义者才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样片面绝对的论断。但是,尽管普列哈诺夫的文章里出现了这样片面绝对的论断,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却不能不在逻辑上打了自己的耳光,肯定在“观念的东西”有可能正确符合于“物质的东西”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说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的同一性。”(《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156页)虽然他所说的这个意义,还是片面的,还不是指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个辩证法的意义。

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曾指出普列哈诺夫不懂认识论的辩证

法，因而他的唯物主义常常表现为形而上学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又批判了普列哈诺夫的“象形文字论”观点，揭露了它的不可知论的错误性质。普列哈诺夫的这些错误，都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如果不能在认识论上应用辩证法，不理解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就有可能使人们走上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中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斗争中恩格斯和列宁保卫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保卫了辩证法。今天，我们研究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不仅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正是在思想方法的领域内到处破坏着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正确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有利于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为了正确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必须很好研究这个问题。两年来在中国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形势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是如何正确地反映了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规律，而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又如何通过广大人民的群众运动转化为排山倒海的物质力量，这正是充分体现了思维与存在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规律，充分体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同一性规律的空前辉煌的典型。不了解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就可能在认识上行动上犯错误。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世界观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们在实际上正是形而上学地看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把存在看做和自己的主观意识没有分别的存在；但否认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性的人，看不见两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看不见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看不见反映客观规律的指导思想可以通过群众运动的环节转化为惊天动地的强大物质力量，也同样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进一步学习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笔记

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的四年中间，几亿中国人民突然站立起来，打倒了一百多年来压在自己身上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几千年来压在自己身上的封建势力，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独立的大国。这一个震动世界的历史奇迹，为什么能够出现，而且必然地出现？仔细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能够了如指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这个时期国际和国内的复杂情况，全面地揭露了当时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在每一个发展环节上及时地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来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使中国人民终于能够那样迅速地，势如破竹地和有条不紊地夺得了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

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不能不亲切地感受到一种锐不可当的改造世界的力量。这是什么力量？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力量。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并使它成为掌握在中国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

变成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的物质力量，那怕在当时是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者，那怕是受这个帝国主义者全力支持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这个力量的打击下面，毕竟不能不归于“一败涂地”。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来到中国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先进的人们曾经努力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中寻找救中国的武器，但多次的尝试都失败了。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进的人们就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就是说：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重新加以分析研究；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来揭露中国社会的矛盾运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性，并以此为根据，制订改造中国的革命纲领和政策；在这些纲领和政策的指导下，组织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使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是经过不断的学习、摸索和斗争的过程而日益发展、日益达到更完善的境地的。我们的党有着象毛泽东同志这样杰出的代表，他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面，针对着革命发展的每一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正确的分析，制定了正确的理论、政策、路线，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获得创造性的发展。但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理论、政策、路线，正确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经过了許多曲折而艰苦的斗争,才逐步为广大的党员、干部所领会所掌握。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党在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犯了陈独秀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接着又犯了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使革命遭受暂时的失败和挫折,同时也使广大的党员、干部获得了宝贵的教训。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整风运动,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总结了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清算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学习到如何应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2页)这样就把全党紧密地团结到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面来,并且通过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路线,贯彻到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中间,这样就开辟了中国革命空前地迅速高涨和迅速取得胜利的时期,这就是紧接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又获得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时期,这就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所包括的时期。

如果说,在《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所包括的几个时期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是怎样通过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经验,领导和教育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一步步地粉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学会正确地应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和解决国家命运的问题;那么,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我们又看到,当这个发展过程达到了成熟的境地时,当全党都团结到毛泽东思

想的旗帜之下，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为广大干部和党员所掌握，并从而成为人民群众革命行动的指南时，就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上迅速地开放出非常灿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是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果实，这个果实的结成，同时就是另一个新时期的发展过程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开始。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智慧之光，不但把中国人民引向全胜的境地，而且还把这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基本方向，也为我们明朗地照耀出来。中国人民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向前战斗，又获得了多少辉煌的胜利！将近十一年的短短的时间里，就使社会主义革命任务逐步得到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旧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和党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继续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结果。

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非常远大和非常艰巨的。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照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说法，“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现在的成就，表现我们又走出了几步，但离开我们更高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并且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要不断地向前发展。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沉重负担，还需要我们很大的努力才能完全抛掉，我们还必须再接再厉地进行艰苦奋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严重障碍，包括尚未驯服的自然力量所造成的一切困难，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在这个万里长征的行军中少走弯路，善于在一个革命胜利之后，很

好地把它的成果巩固和发展起来,以此来准备另一个更大的胜利。为要做到这一点,对于广大的干部和党员来说,主要的条件就在于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创造性的发展,简单地说,就是要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如何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也必须紧紧地把握住这个基本方向。

二、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的统一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用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的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世界观和任何其他阶级的世界观的不同,就在于它不但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要求,而且全面地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些规律指明,一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都是通过内部矛盾的不断的斗争,通过由矛盾斗争引起的革命变革,由一个发展阶段进到另一个更高阶段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全部宇宙就是这样一个无穷无尽的革命变革和向上发展的总体,这些普遍的规律以无限多样的具体形式表现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中。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要善于把这些客观规律的认识,变成我们在工作和斗争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指南,就是要敢于正视和敢于揭露客观事物中实际存在着的各

种矛盾运动,并且善于找到适当的方法,适当的政策、路线、战略、策略,来发动、组织和指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来促进矛盾的解决,促进事物的发展和变革。这样的世界观,要求我们永远用发展和变革的观点来对待一切问题,所以是具备着高度的革命精神的,是和任何保守主义思想不相容的;同时它又要求我们对事物发展和变革的每一个时期的具体矛盾规律给与具体的认识和把握,所以它又是具备着严格的科学精神的,是和任何主观臆想、唯心主义与宗教迷信的方法不相容的。任何其他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阶级的世界观,都不能象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样体现着高度的革命性和严格的科学性的完全统一。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总的特征。我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学习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也是一样),应该把握这个特征,应该学习在对待一切问题和一切工作的时候把永不衰竭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密切结合起来。

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我们首先可以学到无产阶级革命者所应有的那种无限坚强的革命意志。这个革命意志在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艰巨的困难前面,都不会表现一丝一毫的动摇。就用抗日战争刚刚得到胜利时候的情形来说吧: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者苦战八年之后,曾经把中国人民投入十年内战浩劫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又张牙舞爪地从峨嵋山上下来,再一次要用武力抢夺人民手中的胜利果实,站在它后面的,是当时最强大、手里拿着原子弹的唯一垄断权的美帝国主义者。全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选择:或者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国内和平,那就要准备再来一次艰苦的战斗;或者是屈服于敌人的压力,那就要再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役地位上去。革命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或者受到资产阶级世

界观影响的人，在这个来势汹汹的敌人前面，就不可能不发生——而且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恐惧和动摇。就在这样的時候，毛泽东同志毫不迟疑地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准备对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及时地使党和人民确定了敢于革命的决心，避免了一九二七年在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下的那种错误和失败。

在人民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还处在很大的劣势地位，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正在目空一切、飞扬拔扈，原子弹正在成为它们到处进行政治讹诈、威胁人民的得意工具。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切毅然决然地投以睥睨的冷眼，指出它们全都是“纸老虎”，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指出了这个历史的真理，大大地增长了人民的志气，灭杀了敌人的威风；不但巩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斗争的决心，而且为他们树立了必胜的信心，这不能不是以后促成全国革命胜利实现的重大的精神因素。

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我们又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革命精神，还表现在敢于坚持革命的彻底胜利，敢于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一定要使胜利果实完全落在人民的手里。资产阶级的革命者，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具备这种彻底革命的坚决性的。举例来说吧：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大战役”，把敌人的主力根本粉碎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定局。这时敌人开始策划“和平”阴谋，妄图利用政治手段，拖延革命的进军，把反革命的残余武装力量保存下来，以便争取恢复的时间，伺机卷土重来，再把全国人民打倒在地下。毛泽东同志立即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革命的领导权是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手里，就完全有可能走向“半途而废”的危险。由于对人民的真正胜利怀有本能的畏惧，资产阶级在把一部分胜利果实夺到自己手中之后，会宁愿就此停止对敌人的革命斗争，而让人民仍然处在黑暗奴役的深渊。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党派中间有些人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口号，就是这种危险潜在的明证。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的坚定态度对上述问题作了积极的回答：“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制止了它的动摇倾向，把当时的民主革命坚持到彻底的胜利。

和革命要求的彻底性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还有革命意志的永不衰退，这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革命意志走向衰退，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规律。这就是说，获得了某些胜利，某些利益，某些斗争果实之后，特别是挤上了统治地位之后，就骄傲自满，不愿再继续战斗，继续前进，甚至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腐化堕落。我们的革命队伍里面有些思想改造不好，没有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受到了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也会表现革命意志的衰退。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则要永远保持革命的战斗精神，不允许它在任何时候走向衰退。毛泽东同志经常用这样的革命精神来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指出共产党员不论有了任何巨大的成就，都不应该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人民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是中国人民的空前伟大的成就，但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说，这样的胜利，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说，“只不过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预见到全国胜利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危险，及时地向全党提出应该警惕后者的“糖衣炮弹”的进攻。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之

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仍然发挥着不断昂扬的革命战斗精神,领导全国人民继续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又取得了重大胜利。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担当着无限远大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世界的使命。与这个远大的任务相比,眼前的任何巨大成就是丝毫也值得自满自足。因此,必须保持那种永不衰竭的革命精神,才能够与自己的历史使命相适应。

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中的无限坚强的斗志,敢于对任何敌人和困难战斗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彻底完成革命任务的坚决要求和永不衰退的革命意志,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的一些重要特征,我们应该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学习这样的革命精神,并在一切工作中加以贯彻。但是,如果我们只注意到这一个方面,而不注意到,这种高度的革命精神,任何时候都是以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基础,并且经常和后者相结合,如果我们不同时注意到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就不可能真正学到无产阶级世界观。

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每一个鼓舞人民革命斗志的指示,同时也是综合了大量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当前情况的正确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经验,也根据当时敌人积极准备内战的动态,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阴险和极端残酷”的面貌,证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决不会改变自己反人民的本性,决不会对人民“感恩”和“发善心”,然后才作出不可动摇的逻辑结论:必须对它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他概括了近代曾经横行一时而又终于纷纷垮台的许多反动统治者活动的史实,

生动地发挥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科学学说，并且具体地阐明了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走向灭亡的规律。毛泽东同志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0—1491页）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的论断，正是用鲜明的艺术形象概括了这个科学的定律。当毛泽东同志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指出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只是象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作出共产党人在全国胜利后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进攻等等的指示时，他是严格地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科学理论，注意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对敌人的阴谋诡计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发展，作了正确的客观分析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对于党和人民的革命指示，这些革命的指示里所体现的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革命精神，都是建立在事物的客观本性的正确认识之上，都是从事物发展的科学定律出发的，因此它能够对革命运动给与正确的指导，就能够真正巩固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就能够把革命事业引导到胜利的地步。

当毛泽东同志说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他指的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从全体上、战略上看问题时所应作出的结论。从这方面看问题，敌人终于是要被我们打倒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同上，第1267页）但是，毛泽东同志同时又告诉我们还应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

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同上）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战略上、在全体上所作出的鼓舞人心的论断本身，就是以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为根据的科学论断，那么，他的关于每个局部问题上和每一个具体斗争中必须重视敌人的指示，又正是告诉我们，在这样的问题上，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更加需要对客观事物掌握正确的认识，更要以正确的科学的认识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丝毫也不能疏忽大意。

当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坚持革命的彻底胜利的时候，他是根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互相结合的原则来提出问题的。这就是说，他首先指的是要争取当前历史阶段所提出的革命任务彻底实现，而决不是在历史条件尚未具备时就要求同时实现更高阶段的革命任务，就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来说，就是要求彻底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曾经坚决批判了所谓“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也就是所谓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观点，指出这是实际上想要取消革命的“左”倾空谈。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是坚持了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科学原理。同时，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实现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为下一阶段的革命发展准备条件，这就是要“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这就是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结合。要掌握这个原则，就要求我们把彻底的革命精神建立在革命发展的每个具体阶段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为着进行革命斗争，必须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推动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积极表现自觉的活动和努力，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40页），也就是有些同志常说的“主观能动性”。许多同志强调在一切工作中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当然是很对的。但当我们谈到主观能动性问题时，必须注意到，什么是我们所要发挥的主观能动性。“自觉的能动性”，是包括人们主观方面的一定的思想活动，和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人们的行动来说的。而人的思想活动则有正确和不正确的区别。并不是任何一种“自觉的能动性”都为我们所需要。我们所需要的，是以正确思想为基础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同上）这里告诉我们，有不同的“自觉的能动性”：有以正确的思想和行动为内容的，也有受到不正确的思想和行动影响的。不能说，只要发扬了人们的“自觉的能动性”，不管是怎样一种“自觉的能动性”，都能够把我们的革命斗争引向胜利。我们必须发扬的，是以正确的思想和行动为内容的“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只有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才能够把我们的斗争引向胜利。为什么？因为要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不仅要依靠人们的自觉的活动和努力，而且更要依靠在斗争中能争取到主动的地位，依靠在斗争中能掌握行动的自由权；也就是说，要力求在敌人和困难的前面避免陷于被动。在敌人和困难的前面陷于被动，就有失败或被消灭的危险。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了自觉的能动性，并不就等于取得了主动地位，要保证我们在斗争中取得主动地位或行动的自由权，其

决定条件，就是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里，曾把“自觉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加以区别，并特别论到在战争中争取主动性的重要。他说：

“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页）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告诉我们，战争的胜利决定于在战争中的行动的自由权，决定于主动地位的取得，而这个主动地位和行动的自由权，又决定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性，决定于能利用敌人认识的错误。这里讲的虽是战争的问题，但它的基本原理是适用于我们的一切工作和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告诉我们，要认识必然才能够得到自由。要在一切工作和斗争中获得自由权，必须正确地认识周围事物的情况、性质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规律，然后根据这个正确的认识，提出正确的政策、路线、战略、战术，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在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政策路线的指导的时候，还需要

对每一个工作和战斗岗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适当地安排这个岗位的具体工作方案、行动计划以及斗争方法等，以便于准确地贯彻总的战略、策略、政策、路线。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正确的主观指导。只有在正确的主观指导之下的人们的自觉的能动性，而不是在错误思想影响下的活动和努力，才能使我们在工作和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并把它引向胜利，才能使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有效的发挥；不如此，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他们的活动和努力就有可能成为无效的劳动。我们要求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正是为着有效地发挥革命人民的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学习到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是怎样把每一种工作和斗争的指导严格地建立在对周围情况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上，因此，不论在军事斗争中或和平谈判中，不论在战争处于自卫阶段或转入进攻敌人的阶段，不论在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上，在对待各个不同阶级的政策掌握上，都能够不失时机地提出科学的预见，作出正确的指示，使党和人民的力量处处取得主动的地位。这是当时的革命能够在短时期里获得伟大胜利的主要条件，也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认真学习的最宝贵的模范。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精神，坚持在我们的工作和斗争中，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认识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同党内领导方面的各种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指出这些错误路线，不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好，后来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好，都有着

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就是在认识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不重视人的主观认识应该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这个唯物主义原理，而是相反地使主观和客观分裂，使思想陷于主观主义或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毛泽东同志把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到了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尖锐地揭露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20页）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同志们，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全党的领导方面打倒了主观主义这个思想的大敌，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所反映的这个短时期内所获得的伟大的革命胜利，正是由于树立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结果，在这样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胜利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精神的胜利，是彻底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胜利。

人的认识过程，是在社会实践中，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要保证主观的认识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必须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对实践经验不断地加以概括和总结。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革命斗争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一贯坚持和一贯向全党同志提倡的作风。与这个正确的科学作风相反的是主观主义的作风，它或者表现为教条主义，或者表现为经验主义，它的总的特点是凭着一知半解——或者是书本、文件上断章取义地得来的一知半解，或者是某些局部的狭隘经验，——凭着自己的“想当然”，就要来决定一切，指挥一切。在人民解放战争以前的革命时期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主观主义的作

风和它的表现形式，作了系统的揭露和尖锐批评，并在整风运动的时期，领导全党同志来克服这种错误作风的影响，这样就在党内普遍树立起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正确作风。由于树立了这样一个正确的作风，不但党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领导机关能够通过调查研究，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和斗争的发展情况获得正确的了解，并采取有力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来贯彻党的政策，而且党的中央指导机关也能够依据各地区各部门所提供的正确的情况报告，及时地对全国的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及时地作出正确的决定和指示。党的作风的这种新的发展，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显示了它的伟大的力量。这个时期的全部经验鲜明地证明了：普遍树立调查研究的科学作风，在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方面，在推动革命斗争胜利的迅速实现方面，是起着多么重大的决定作用。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第一篇文章，就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题。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包括对当时敌人的活动情况的研究和过去历史的研究，在这个时期内，毛泽东同志揭穿了敌人的凶险意图，并针对着它的意图，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从事战斗的准备，使党和革命人民在新的斗争的出发点上就取得了有利的主动地位。以后四年革命斗争发展的全部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依靠了各地的报告，在每一个具体环节上，都精确地概括了全国斗争的情况，仔细地计算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时地对经验作出全面的总结，并以此为根据，对各方面的问题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论断，指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针和办法，对各种错误或偏向随时提起党和人民的注意，并指示了纠正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敌人举行全面的武装进攻之前就指示解放区军民作好自卫的准备，在敌人采用政治阴谋时就通过政治斗争予以彻底的揭露；在敌人强大

而人民的革命力量还处在劣势的时候，指出了胜利的前景，制止了害怕敌人的右倾情绪；在人民的力量转入进攻的时候，反复地申述了各方面必须严格掌握的具体政策，防止了各种违背政策、脱离群众，能够使党和革命队伍陷于孤立危险的“左”的片面性；在战争接近胜利时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在民主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号召全党对下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好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在经济方面，制定了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以巩固新老解放区的基础，在政治上坚持争取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方针，使敌人陷于极端的孤立；在军事上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和十大军事原则，并在每一个战役和战斗中加以具体贯彻，使敌人在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一切正确的理论、思想，正确的战略、策略，正确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都是依靠全党大规模地应用了调查研究这个工具，不断地总结经验，充分地了解了周围事物发展情况的结果。这个科学的思想作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的作风；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以至于在将来无限长远的共产主义事业中，都是唯一正确的思想作风。只有从地方到中央，普遍地提倡和大规模地树立起调查研究的作风，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保证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处处掌握主动权，实现恩格斯所说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才能避免在某些工作中陷于被动地位。严格地遵循这个科学作风，把它和高度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无往而不胜。这是我们应该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

三、分析矛盾,分析阶级

要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即使有大量的调查材料,即使有某些实践的经验,如果不善于分析研究,仍然不可能对问题找到正确的结论。许多有错误思想的人也会抓着某些表面的和片面的“事实”材料作为自己的“论据”,这就是明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方法问题上,首先是要严格地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这就是说,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性来加以分析研究,要力求研究的结果能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作任何主观随意的附加,不给与歪曲的反映。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本性是辩证法的,这就是说,任何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辩证法或分析矛盾的方法作为研究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方法。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辩证法是宇宙观,同时也是科学的方法论。毛泽东同志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所以我们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习把这个世界观作为科学方法来加以掌握,或者说,主要地就是要学会掌握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

在存在着阶级的人类社会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阶级矛盾,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和革命问题的基本方法是阶级矛盾的分析法。革命的领导者为了要在工作中有效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首先必须善于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毛

泽东同志说：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时，应该学习他如何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特别应该注意他如何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革命活动的最早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把这个方法作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最主要的工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题的。这篇文章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动态作了细致、准确而又非常生动的分析，因此它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就已经正确地规定了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战略方针，指出了以后二十多年中国人民的斗争走向胜利的总的方向，为这个时期党的各方面政策确定了根本的原则。党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一切重大的错误，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都是离开了毛泽东同志当时所规定的那个总的方针，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正确贯彻了上述方针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申述的“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也正是体现了这个方针。

为什么阶级分析方法具有这样重要的作用？这自然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各方面矛盾的集中表现，也是解决这些矛盾并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只有应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变革的本质和规律性。同时，我

们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是为着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革命斗争；而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要对革命斗争给与正确的指导，要使人民的革命运动不至于迷失方向，首要的问题，就在于要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的情形中，正确地辨别什么是我们的打击方向，什么是我们团结的方向，也就是要善于分清敌友。如果我们不善于分清敌友，把敌人当做友人看待，就要有一天受到敌人的突然打击，而毫无准备；或者把朋友误认为敌人，就要使我们在斗争中陷于孤立，这一切都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的危险，要避免这个危险，要能够在斗争中善于分清敌友，唯一的正确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们就不难看到，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能够走在完全正确的道路上并迅速取得胜利，其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使党和广大人民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上保持了头脑清醒的认识。就谁是敌人的问题来说，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敌人之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立刻就成了人民的主要敌人，这并不是一开始就为广大的人民所认识到的，因为在抗

日统一战线中间，它们都曾经取得过同盟军的资格，而人民中间还受到一种反动的“正统”观点的影响，把蒋介石国民党误认为代表国家的正统的领导党。没有关于阶级斗争的明确的科学观点的人，就不能理解这个突然的变化。不仅一般的人民是这样，党内有的同志也是这样，一九二七年的教训，就证明这一点。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同志在抗战胜利后及时地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的问题，尖锐地揭露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的反动本性和阴谋活动，就是非常必要的事；它给党和全国人民在形势变化一开始的时候，就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革命的政策路线问题，从根本上说来，也就是分清敌友的问题，是对哪些阶级应该攻击和哪些阶级应该团结的问题。就朋友来说，包括在革命同盟中的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阶级，不同的阶级的朋友有不同的情形，需要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去加以团结。有可靠的朋友，有动摇不定的朋友，有原来是敌人而部分地在—一个时候可以作为间接的同盟军；同一阶级也还有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部分，它们对革命的态度也各有差别。在朋友关系中间又有着谁领导谁的问题，和资产阶级的左派结为盟友时并不能因此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些复杂错综的情况只有通过具体的阶级分析才能够认识清楚，只有具体的阶级分析方法才能解决如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各种各样的朋友去攻击共同敌人的问题，而革命的政策路线就是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原则的规定。毛泽东同志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规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人民大众就

是无产阶级及其所要团结的朋友,其中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些阶级的特点的分析,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这个革命联盟应以无产阶级为领导者,以工农联盟为主体,而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采取在经济上加以保护而对他们的某些错误政治观点加以批判的政策。为着巩固和农民的联盟,开展了土地改革的斗争,而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又规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样一个总路线总政策。在农民这个盟友中,又把贫农和中农加以区别。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各阶级的活动反复不断地进行细致的分析,对各方面的政策三令五申地作了多次的指示。诚如他所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党在当时认真地贯彻了党的政策,在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发挥了强大无比的生命力,把全国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给极端孤立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因此,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以及毛泽东同志其他的著作里,我们都应该认真地注意学习如何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调查,以达到正确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的目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工作的领导者应该学会的本领。这个本领不但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使我们彻底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仍然为我们的一切工作指导所不可缺少。毛泽东同志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除了对富农、中农和贫农的不同情况加以分析外,还把中农区别为下中农和上中农,这些分析对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很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应用细致的阶级分析法的一个范例。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虽然已经进入了社

会主义阶段，但阶级还没有消灭，不但资产阶级没有消灭，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被打倒了的封建阶级残余，也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放弃了复辟的梦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的进展，仍然不能不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方向和资产阶级的方向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斗争，仍然是我们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这里的矛盾又有着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形：同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表现为敌我矛盾，也表现为朋友之间或联盟内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又有互相转化的可能性。和以前不同，人民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在国内矛盾中是大量的现象，敌我矛盾——对抗性的矛盾的存在是比较小量的。然而，后者虽然是比较小量，由于政权在人民手里，它采取着种种隐蔽的形式，敌人的复辟活动，常常穿着革命的伪装，在某些地区——例如一些革命运动进行得不彻底的地区、基层地区，也可能暂时地实现它们欺骗人民的企图。因此，要解决分清敌友的问题，仍然不是简单易举的事情，仍然需要我们应用细致的阶级分析方法，去向社会作调查研究，才有可能很好地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认真地应用阶级分析方法，认识清楚各个阶级以及同一阶级中不同阶层的种种动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根据这个分析，制定各种具体的政策，采用各种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在这里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阶级分析方法，或者把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或者对某些敌对的阶级活动麻木不仁，都会导致政策的错误，都会造成工作的损失。在这样的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以至于全部民主革命时期所使用的科学方法，仍值得我们好好地加以研究的。

四、把握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里，毛泽东同志论到当时革命的根本任务时，说：“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又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里，毛泽东同志又从另一个方面阐明了当时的任务，说：“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上，第1380页）

上面说的这些任务，都是指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这些任务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如果从世界观的角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任务，那么，上面所引的毛泽东同志的话，就包含着以下的意义：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是为着达到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所有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所有制，以便解除生产力的束缚，使它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第二是，改变旧的国家制度、旧的

政治统治关系、旧的社会上层建筑，建立新的人民的国家制度、新的政治统治关系、新的社会上层建筑，以保证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简单地说，革命的目的，阶级斗争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从来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都是依着这样的规律进行的。不过，只有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够明确地认识到这个规律，才能够（也应该）自觉地在自己的行动中应用这个规律。

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这个真理：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社会上的阶级没有消灭以前，这些基本矛盾又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凭空产生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不外就是这些基本矛盾的暴露和解决的过程；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目的，正是为着使这些矛盾得到解决。在这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产生阶级矛盾的经济根源，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生产关系，决定着不同的阶级关系。反动阶级（例如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依赖于旧的腐朽的生产关系（例如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力求保护旧的生产关系，这样就要使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反之，革命的阶级（如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求破坏旧的生产关系，他们代表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形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表现。但是，当反动统治阶级力图利用国家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权力来保护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经济制度的变革，而革命阶级为着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不得不努力起来为破坏这个反动的国家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权力而斗争时，或者是，当被推翻

了的反动阶级利用政治阴谋活动和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来破坏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企图使旧的政治制度以至于经济制度实现复辟，而革命阶级为着保护新的经济制度，保护生产力的发展而与这些政治的、思想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时，在这样的情形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又主要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用阶级分析方法，制定革命工作的战略、策略、政策、路线、方针、计划等等，来指导工作和斗争，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盟友，孤立敌人并给与集中的打击，其根本目的也不外就是要解决当前存在着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时，应该注意到他在指导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时候，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应用这些普遍真理。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是相互联系着的，这个相互关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变革时期，有着不同的情况。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就开始产生了，这就是说，在封建的政治上层建筑未被推翻以前，生产关系的变革已开始出现，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矛盾已经局部地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解决。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主要是在于改变旧的封建的政治上层建筑，使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或者是用革命的方法从封建统治者手里夺取统治地位，或者是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与封建统治者妥协，分享部分统治权——资产阶级利用这个政治统治地位，就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进一步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情形就有所不同，与一切私有制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是不可能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的

国家机构,也不容许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出现。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只能是首先经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根本打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然后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下,创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形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样来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这里没有改良的道路,只有真正革命的道路,而最重要的关键是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或无产阶级的专政。要不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就是要不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就是区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普遍真理,在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把革命的领导权——主要是对于农民的土地斗争的领导权以及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坚决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通过无产阶级坚强领导之下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首先在某些乡村地区,粉碎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政权,在这个政权的推动和保护之下,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消灭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的生产力,使人民的政权获得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坚决支持,使这个政权在强大敌人的前面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就能够在反动势力四面包围之下,在一些农村地区突破反动势力的统治,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以此为据点,逐步

发展革命势力，由小块根据地逐步扩大为大片的解放区，由反动势力包围农村根据地的形势逐步转化为农村革命运动对城市反动势力的包围形势，一直到最后把全国范围的胜利夺取到人民的手里。

这里存在着一种辩证的规律：一方面，上层建筑的根本改变，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从而对生产力的发展给与强有力的推动。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的解放又反过来为人民政权这个上层建筑奠定巩固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并提供可靠的物质保证。如果不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推翻反动势力的统治，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政权这一种上层建筑，即使是想要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经济变革任务，彻底消灭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反过来说，如果不坚决发动群众来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积极发展农村生产力，要使人民的政权获得稳固的基地，要保证真正彻底推翻反动势力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并形成不可动摇的革命根据地，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正确的革命指导必须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既要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又要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这样才能保证革命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和革命势力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原理。过去某些革命领导者之所以走上右倾机会主义或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并招致了革命运动的挫折或失败，其原因之一也就是不能认识和应用这个原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敢发动群众斗争粉碎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左”倾冒险主义者则不知道或不善于把农村武装斗争和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土地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不知道或不善

于在农村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使革命的武装根据地获得巩固的基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则正确地掌握了这个两方面并举的原理，在群众的武装斗争取得了胜利的地区，立即发动群众为实现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保护工商业等的政策而斗争，为正确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基础而斗争，因此不论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反“围剿”斗争中，或在抗日战争中，都能够使革命人民站在不可动摇的阵地上，把敌人一步一步的打败。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是怎样全面地掌握了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和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发动全面进攻的时期，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导着全国人民和解放区军民，对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揭露了敌人的“和平谈判”的阴谋，粉碎了它的武装进攻，同时，又写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这个指示，号召“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除了作直接援助前线的许多工作之外，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的革命热情。同时，在一九四六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9页）毛泽东同志指出，坚决地执行这些正确的经济政策，就能发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造成支持革命政权的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他说：“告诉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同

上,第1170页)

减租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的必要的政策,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发动了全国的内战,这个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革命要求,一九四六年党中央发出了五四指示,肯定了农民群众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愿望,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土地改革政策。毛泽东同志在全部战争过程中,一面对这次规模巨大,曲折复杂的军事斗争,不断地总结经验,从头到尾亲自给予指挥和领导,一步步地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它的主要的国家机器——打得粉碎,另一方面又始终紧紧不放地抓着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经济政策的指导,规定了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既反对了在土地改革初期不能坚决地执行这个总路线总政策的右的偏向,又纠正了在运动高涨起来以后出现的某些“左”的过火的偏向,使生产关系的变革正确地符合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革命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解放区正确贯彻了土地改革,保护工商业和发展生产等等的政策,正确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就巩固了解放区的政权,保证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彻底解决,并使之一步步向全国范围扩大,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结束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时由于胜利而建立起来的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政权,就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新的国家政权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的关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这样,上层建筑的改变推动了新的经济基础的形成,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和初步的经济建设与经济改造的过程,就出现了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使全国的生

产关系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实现全面的革命的飞跃，并强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新的经济基础的形成，要求上层建筑进一步与之相适应，这个矛盾表现为一九五七年政治上与思想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整风运动。上层建筑方面的这个斗争的胜利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大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于是就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都是这些基本矛盾的表现，前者的斗争和发展，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要解决这些基本矛盾。如果有人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特别否认这些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他的看法在实际上就会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就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明确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个科学的论断是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又适应又矛盾的。而这种矛盾，正如一切其他矛盾一样，是在解决了之后又有新的矛盾出现，因此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经过内部的斗争过程，——首先是要在人民

内部经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断反复的过程，也要经过某些敌我斗争的过程——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或某些环节加以调整，使之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正如十一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说明的那样，新中国的发展过程，就是通过这两种基本矛盾的一次又一次的解决而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逐步上升的过程，能够认识这个规律并自觉地应用这个规律，就有可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生产实现高速度的发展。当然，中国的经验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首先是这些矛盾不象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那样要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种敌我性质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也仍有存在——因为还有抗拒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已被打倒而仍然梦想复辟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存在着——但只是比较小量的，而大量的矛盾，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这里面包括劳动人民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上中农和下中农、贫农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等等）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在基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的矛盾。因此，这些基本矛盾的解决，不象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那样，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才能实现，而不能经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因此，这些基本矛盾不断的揭露和解决，不是使社会主义制度受到破坏，而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更加发展，更有利于为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准备条件。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论断，在理论上是维护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新的条件下贯彻了和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而在实践上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发挥出强大的指导作用。它使我们在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工作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中能够找到正确的基本的方向。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仍然应该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不断出现的新的矛盾情况，经常自觉地加以注意，加以揭露，并及时地找到适当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因此，必须把揭露和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作为我们经常应该注意到的根本问题，不论在过去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调查研究，阶级分析，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归根结底都是为着认识 and 解决这些基本矛盾。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在今天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时候，仍然可以获得非常宝贵的教益，虽然它所解决的是属于民主革命阶段的具体实践问题，但在这个具体实践中它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全面地掌握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始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范例。

五、人民观点，群众观点

前面说过，毛泽东同志批评那些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人

们时，曾指出他们的错误，就是在于不了解“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个原理。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这些错误的产生，就是受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而忘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1134页）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阐明了属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人民观点，群众观点，这就是要坚决相信，只有人民群众的斗争，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后的决定力量。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违背了这个无产阶级的根本观点的。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实际上也就是人民的事业，就是要争取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的事业，为什么我们必须努力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答复是：为着解放生产力。然而，无产阶级所要争取的生产力的解放，归根结底，也就是劳动群众的解放，广大人民的解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切工作和努力都必须是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目标。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自己的政策方针和办法。凡是符合于人民群众利益的事，必须坚决努力去做，凡是违背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事，必须坚决起来反对。总之，要对人民负责。能不能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

针》里，论到必须对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就坚持了这个观点，他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上书，第1128页）毛泽东同志指出陈独秀之流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能“针锋相对”地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

人民群众的斗争，需要有正确的领导，没有正确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斗争就会迷失方向，也就得不到胜利。因此就需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需要有共产党，需要有久经考验的，坚定地掌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密切联系起来的党的领导人物，来给人民群众的斗争以正确领导。共产党人对人民负责，首先就是负正确领导之责。但是，另一方面，人民的事业，又必须通过广大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有可能实现。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斗争的真正胜利，都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在一切工作和斗争中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并给与正确的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地倡导和实行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确定为党的路线，这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曾说到那次大会做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25页）这个路线在全党得到贯彻，是后来中国革命迅速获得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已经说过，为着指导工作和斗争，必须掌握阶级分析方法，以便能够分清敌友，能够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朋友，使革命力量尽量壮大起来，并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集中力量给以致命的打击。因此，正确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积极性的政策。不论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冒险主义，都是违背这个原则的。前者的错误在于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后者的错误在于使革命的先鋒队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是自始至终非常认真地按照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原则来指导全国各方面的政策，既反对了某些右的思想倾向，又纠正了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左”的偏向。

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对解放区各地，包括新建立的东北解放区所作的许多指示中，反复不断地阐明了发动群众的必要。这时着重批评了某些同志中不认识和不重视发动群众的倾向，或者是由于害怕群众斗争中出现某些缺点（如过火现象）而对发动群众表示缩步不前的倾向。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一指示里，毛泽东同志说：“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7—1178页）

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文里，毛泽东同志强调了当时通过减租运动发动群众的必要性，说：“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除了作直接援助前线的许多工作之外，一定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同上，第1169页）又说：“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0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关于发动群众的思想，和一九二六年他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有关思想是一贯的。那时他就指出，既然我们要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不能对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某些暂时的缺点过分顾虑，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页）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就始终一贯地坚持着放手发动群众的革命思想。不同的是，在一九二六年，党在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下，没有能够贯彻这些思想，而在一九四六年，党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这些思想已成为党的根本路线。但不论是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或一九四九年革命的胜利，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正确性，证明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对革命事业胜败的决定意义。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中期，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已广泛发动起来，

人民解放军由自卫阶段开始转入反攻阶段，这时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和指示，就着重于对群众斗争给予政策掌握上的具体指导，纠正运动中的某些“左”的偏差。这仍然是为着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着巩固和发展党对广大人民的团结和联系。即使是在群众广泛发动起来而革命事业处在有利形势的情况下，政策掌握的错误，领导上的“左”的或其他原则性的偏差，也有可能使党脱离群众并导致革命的失败。所以，政策的正确掌握问题，在这时候，就具有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4页）又说：“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上，第1296页）

群众观点、人民观点，和阶级观点是分不开的，我们在工作和斗争中要发动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时又要注意到，人民群众中有各种各样的阶级和阶层，其中有的是革命斗争和工作的主要依靠，有的是要坚决加以团结的，有的是要争取使之中立的，对这些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需要不同的政策，因此，为着正确地了解和掌握党的这个联系群众和发动群众的方针，我们还应该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进一步学习一下如何应用精密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个方法在前面已论述过了，但这里只需要做一点补充：在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但仔细区别了各阶级不同的质，区别

了他们对革命的不同的态度，而且同时也仔细地计算了他们的不同的量的分布。应用这样的方法，一方面分清了敌友，解决了应该团结谁和应该打击谁的问题，也就是规定了政策的质的界限，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应该团结多少人和打击多少人的问题，也就是规定了政策的量的界限。前面说过，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曾使我们在革命斗争中经常掌握着这样一个量的比例的原则，即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而打击面则限制在百分之十以下。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量的比例原则，是根据了阶级力量对比的科学计算。例如就土地改革的斗争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2页）根据这样的计算，毛泽东同志作出了科学的论断说：“我们的土地改革所反对的对象，人数甚少，而乡村中能够参加和应当参加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的人数（户数），则有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多。”（同上，第1250页）由此可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和打击百分之十以下人口的原则，是用科学分析方法具体规定的我们的政策和策略的量的界限。坚决在工作和斗争中掌握这个原则，就使我们能够真正团结以一切劳动人民为主力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敌人孤立到最小的范围内，就能够集中人民的优势力量把它打败。

数量分析的方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一切真正科学的分析，都必须把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的分析和量的规定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否则就不能算是精密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同志用一句中国

人民熟习的成语来概括数量分析方法,叫做“胸中有‘数’”,并加以详细的论证,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同上,第1443—1444页)

这个分析数量的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在具体实践中的发挥,它本身又成为解决群众运动问题的一个普遍真理:在任何群众运动中要想精确地掌握政策,都必须应用这个方法。不仅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它是我国人民取得彻底胜利的武器,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战胜一切困难,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并在政策掌握上做到“胸中有‘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和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仍然是坚持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的方针,既反对了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运动高潮起来以后的某些政策上的“左”的或其他的偏差也给与及时的纠正。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整社整风运动中,如果我们全党同志都能够很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里所体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认真地应用毛泽东同志所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那些科学方法,我们将一定能够很快地战胜目前所遇到的那些由于天灾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暂时的困难,一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一年三月《哲学研究》第二期)

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

凡是学过形式逻辑的人，都知道有一种叫做“偷换命题”的谬误。用“偷换命题”的方法来进行论辩，决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混淆是非。诡辩论的方法之一，就是“偷换命题”。

于世诚同志在《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上发表的言论，正是公然使用了这一种错误的逻辑方法：为要反对两年前我们对他的错误观点所给予的批判，他把我们原来所主张的命题“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偷换成了这样一个命题“恩格斯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

如果真象于世诚同志说，“艾思奇等同志”确实是主张“恩格斯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的，那么，两年前对他的批判在这一点上当然错了，而于世诚同志在这一点上就胜利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是于世诚同志把风车当成了妖魔，并全力向着自己制造的这个幻想举行进攻！而现实世界里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妖魔！批评于世诚的许多同志中间，在某些个别问题的提法上虽然各有不同，但并没有于世诚同志所企图强

加于人的那种观点。

我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指1960年7月21日人民日报《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写得很明白:对于“同一性”有两种相反的理解。一种是把同一性看做抽象的、绝对的一,看做简单的等同。一般的唯心主义,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就是把同一性理解为简单的等同,硬说“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在这样的意义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即唯心主义者所理解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应该坚决加以否定的。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给与了最彻底的批判。当然,恩格斯也决不会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但同一性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即辩证法的理解。这里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的一,差别的同一,而不是简单的等同。辩证的一性,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它存在于任何事物中,也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之中。只要不否认辩证法,也就不能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差别的同一性,矛盾的一性。我们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正是指的这种辩证的一性,而不是指的形而上学的简单的等同。在这种意义上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决不是等于肯定了唯心主义的理论,也不等于“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这难道还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吗?

自然,当恩格斯谈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时,是和黑格尔的哲学有一定联系的。恩格斯在引用这命题时,曾说这是“用黑格尔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意思”。(“um mich hegelisch auszudrücken”——见恩格斯1895年3月12日给斯密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5页),这句话一般都译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恩格

斯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来表述自己的意思，这就是说他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可以肯定的积极的、可以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东西。但是，在旧的学说中找到某些可以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东西，并不就等于全盘肯定它的理论，而只是肯定其中可以肯定的某些方面。全盘肯定旧的理论，是说不问它的精华或是糟粕，一概加以肯定。批判地继承，是说要肯定其精华，而抛弃其糟粕，对其精华也加以改造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哲学正是采取了这种正确态度，而不是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这就是继承改造和发展了它的辩证法的方面，而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兼有着这精华和糟粕；如果要肯定“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那就得同时肯定它的辩证法方面，也肯定它的唯心主义方面。我的文章决没有说恩格斯作过这样的“肯定”，而只是说恩格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并附带地肯定了黑格尔的思想中可以肯定的精华，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的论证。批判地肯定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思想中的精华是一回事，全盘肯定“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又是一回事，两者决不能混为一谈，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关于这一点，我在两年前的文章中早已说得很清楚，那时我就说过：“黑格尔的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唯心主义的，另一方面还有辩证法……黑格尔哲学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也有两个方面，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来说，黑格尔把思维看做第一位的东西，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解释成‘存在即思维’的意义；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来说，黑格尔和其他绝大多数哲学

家（包括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肯定地解答了‘思维是否能够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并在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时候，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给与了辩证法的说明，在这一方面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就有其合理的、即辩证的成分，而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命题。”那时我就说过，恩格斯并没有全盘肯定了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他只是“肯定黑格尔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的合理的辩证法因素，但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的论证。”（见1960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因此，我同意撒仁兴和王若水同志的这个意见：在我们和于世诚同志的争论中间，并不存在要不要肯定“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的问题，我们的主要争论是要不要在辩证法的意义上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要不要肯定黑格尔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中的某些合理因素的问题。“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是不应该加以全盘肯定的，肯定了这样的“同一论”，也就肯定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就是背叛唯物主义，当然应该加以坚决反对。我的文章也没有任何一句话表示过应该作这样的肯定。但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从而也批判地肯定黑格尔的这个命题中的合理的方面则是完全应该的，恩格斯也正是这样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而曾经反对这样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于世诚同志，则是错误的。我们正是因为他的这个明显的错误才对他们进行了批判，而他在最近那篇文章里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既然于世诚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么，问题本来用不着再争论下去了，然而，他现在又挑起了争论，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

为他对黑格尔的哲学作了片面的了解，把黑格尔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说成只有形而上学的、神秘的唯心主义的意义，否认其中还包括着辩证法意义。由此出发，他就曲解了恩格斯的有关的论点，否认恩格斯在黑格尔的这个理论中肯定了应该肯定的东西，并断定如果有人指出恩格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等于说他“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就是“把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硬加在恩格斯头上”，就是“诬蔑”恩格斯！我认为于世诚同志的这些论断都是站不住脚的，现在就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澄清。

二

从于世诚同志的文章看来，这两年来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似乎曾用了很多时间，去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中寻求证据。理论研究当然必须寻找证据，这种努力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们不是实用主义者，不能把任何被认为有用的“证据”都看作可靠的根据，我们首先要考察一下，一个人是怎样去找证据？找到了什么样的证据？如果证据是用断章取义、随意曲解的方法去找来的，如果这些证据的本身就是不可靠的，那么，由它所支持的观点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虽然引用它的人满以为是有用的。这在形式逻辑上就叫做违背了“充足根据律”。于世诚同志的致命的毛病，正是在于使用了一系列的不可靠的证据，正是由于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这个根本的规律。

举几个例子来看吧：

于世诚同志说：“黑格尔虽然批判了‘一切是一，一切同一’的同一哲学，但同时又肯定了自己的哲学也是同一哲学”（《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第32页），他提出的证据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上说的一句话：“揭穿了忽视相异的抽象的形式的知性的同一之虚妄不实的学说也恰好是这种同一哲学。”于世诚同志似乎忘了他所引用的《小逻辑》的话是来自中文译本，即使不懂德文的人也很容易查出他的割裂的手法：黑格尔的成段话本来有一个重要的开头，被他活活的斩掉了。全句话本来是这样的：“前面已经说过（第一〇三节附释），近代哲学常被人戏称为同一哲学，殊不知，揭穿了忽视相异的抽象的形式的知性的同一之虚妄不实的学说也恰好是这种同一哲学”（《小逻辑》，中文版，第263页）。这里黑格尔明明说自己的哲学被称为“同一哲学”是别人的“戏称”，他自己对这种“戏称”是采取保留态度的，不，他是采取反对态度的！只要再看一看他所指出的“第一〇三节附释”就很明白，那里他说到：“对于近代哲学的许多攻击中，有一个比较最常听见的斥责，即认为近代哲学将任何事物均归纳为同一，因此近代哲学便得到同一哲学的绰号。但这里所提出的讨论却在于指出，唯有哲学才坚持要将逻辑上和经验上有别的事物加以区别，反之，那号称经验主义者却将抽象的同一性提升为知识之最高原则。所以，只有他们那种狭义经验主义的哲学，才最适当的可称为同一哲学”。（《小逻辑》，中文版，第235—236页）

黑格尔把“同一哲学”这个“戏称”说成是对于自己的哲学（近代哲学）的“攻击”，“斥责”，并且把这个“戏称”回敬给“狭义经验主义的哲学”，这怎么能说他肯定了自己的哲学也是“同一哲学”呢？

我们用不着掩盖黑格尔的错误，因此也不必说他和“同一哲

学”这个名词完全没有联系。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因此它和“同一哲学”有共同的一面。但黑格尔反对把自己的哲学简单的称为同一哲学，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对经验派的唯心主义哲学（如英国贝克莱、休谟的哲学，马赫主义哲学），可以简单地称做同一哲学，因为它们把存在和知觉，感觉和世界简单地看做同一的东西，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费希特、谢林的流派，可以简单地称做同一哲学，因为他们宣传“一切是一，一切同一”。宣传主观和客观，对象及其概念的“直接的同一”。黑格尔哲学和这些唯心主义哲学有共同的一面，它有“思维和存在的思辨的神秘的同一”这一面，有主张“存在是思维”、“思维是事物或事物是思维”的一面，也就是有形而上学的等同论的一面，所以不能说“同一哲学”的错误和黑格尔哲学完全没有关系，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因此就把黑格尔的哲学和上述其他唯心主义的哲学划一个全等号，把它说成是单纯的同一哲学，说他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思想仅仅只是唯心主义的思想，而和认识的辩证法没有关系，如于世诚等同志所想的那样，那就是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非常片面的、浅薄的了解，最好也只是费尔巴哈式的了解。

黑格尔也肯定了“存在是思维”，“事物是思维”这些命题，但他在进一步解释这些命题时，并不是如上面所举的唯心主义者那样把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和思维、概念、观念解释成直接的等同，而是把两者看做有差别的同一性，也就是辩证的同一性。只要是细心地阅读黑格尔的原著，而不是象于世诚同志那样主观随意地把它斩头去尾，并加以曲解，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例如，于世诚同志说：“黑格尔在解释他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时，他明白地宣称：‘存在’不是指的‘具体事物’，而是直接指的

‘概念’。他说，‘当我们说“存在”时，我们并没有说到具体事物，因为“存在”只是一个纯全抽象的概念’”（《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第32页）。看起来，好象黑格尔真是把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和思维、概念完全等同起来了。但是，试查一查于世诚同志的引文，人们就会发现，黑格尔的原来一句完整的话，又被他砍了一个头！全句本是这样的：“一个具体事物总是不同于一个抽象范畴的，当我们说‘存在’时，我们并没有说到具体事物，因为‘存在’只是一个纯全的哲学概念。”（《小逻辑》中译本第290页，注意，这句话里的“存在”一词，贺麟的中译本译作“有”，于世诚改为“存在”，意思没有重大出入）把这完整的一句话引出来，就可以看到，黑格尔说的意思和于世诚的解释是完全两样的。黑格尔这里说的“存在”，不是指的一般具体客观事物的存在，而是指“存在”这个范畴，是指人的思维中关于事物存在的概念。黑格尔在这里说存在“只是一个纯全抽象的概念”，这只是说人的思维中的存在是这样的概念，其意思决不是说我们周围具体存在的客观事物也等同于这样的概念，相反地，黑格尔是明确地指出了，思维中的“存在”这个抽象范畴决不同于作为具体事物的存在，不同于我们通常看作思维的对立物的客观存在。这就是说，黑格尔明明白白地并没有把思维概念和具体存在的客观事物看做直接同一的或完全等同的东西，而是看做有差别的东西。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识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戏法，并对它加以批判。作为范畴的存在，固然是“纯全抽象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决不仅仅是思维活动的产物，而是一切具体事物的某种共同本质的概括。所以，当人们说到“存在”这个范畴时，虽然并不就是直接指的任何一件具体事物，但也决不是与具体事物完全无

关，因为这时人们是在思维的逻辑形式上反映了一切具体事物的共同本质——一切具体事物都有其客观存在这个共同的本质，任何范畴、概念都是某些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的共同本质的反映，说某个范畴是“纯全抽象的概念”，只说到事情的一面，只说到思维的逻辑形式这一面，事情还有另一面，即思维客观内容这一方，就这一方来说，范畴是具体事物的某些共同本质的反映。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抓着了逻辑形式的一面，抹杀了思维的客观内容这一面，他夸大了存在的范畴是“纯全的抽象概念”这一点，否认这个范畴的来源归根结底还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这样，范畴、概念都被看成是纯粹思维活动的产物，并得出了这样的命题：“存在即思维”“纯有即纯思”。由此进一步引申，把作为主观的逻辑形式的范畴、概念加以绝对化，使之变成客观世界的主宰。本来，当人们说到“存在”时，可以是指仅仅在人的思维中才有作为范畴的存在，也可以是指具体事物的客观存在，前者固然是后者的反映，但并不是一回事。这就是说，两者是同一的，但又是有所差别的，并不完全等同，但当黑格尔说到“存在即思维”时，却把两者混淆不分了；“存在”既是思维，那么，不论作为范畴的存在，或具体事物客观的存在，好象都可以被看做思维。或者说，一切具体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好象也是以思维为根源，也是依据了思维。于是，唯心主义的戏法就做出来了。这个戏法力图使人相信在人的主观的概念、思维、观念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在性质上与人的思维、概念、观念没有差别的绝对化的“世界理性”、“绝对观念”，或“总念”，黑格尔把这个神秘的精神实体，这个变相的上帝当做世界一切具体事物存在的根源，用以代替一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所固有的本质，并把客观事物硬说成是它的活动的表现形式。“无论总念也好，判断也好，均不仅仅

在我们脑子里发现，并且不仅是由我们造成的。总念乃是内蕴于事物深处的本质；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即由于总念。因此，把握一个对象意思即是意识着这对象的总念。”（《小逻辑》中文版，第345页，这里的“总念”一词也可以译作“观念”）因此，黑格尔虽然没有把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和思维概念看做直接同一的东西，但还是把人的思维、概念、观念和一切客观事物的本质（或叫做“世界本身”）看做完全同一的东西，并从而作出结论，说人的思维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即是思维认识思维自己，或叫做绝对观念的自我意识。这就是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中的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糟粕，是思维与存在的等同论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的表现，这些糟粕的东西是必须给与坚决的批判的。但是，如果因此就把黑格尔的观点和贝克莱主义，马赫主义，以及费希特、谢林等的唯心主义划上一个全等号，如于世诚同志所做的那样，这也是片面的，错误的。和这些唯心主义不同，黑格尔并没有把思维和存在，概念和它的对象，观念和客观的具体事物看作直接等同的东西，相反地，他明确指出它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黑格尔认为，人的主观的思维，概念，观念只有经过它们的对象，经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经过这个媒介的环节，才能达到在后者的“深处”所“内蕴”着的本质，达到“绝对观念”。由于黑格尔把客观事物的本质看成是与人的主观思维、概念、观念同一的东西，所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有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一面，由于黑格尔又把思维、观念和它们的对象和具体事物看做是不同的东西，因此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终究还不是把两者看作完全的、直接的一物的思想，而是同时注意到两者的差别的，即辩证的同一性的思想。

关于黑格尔的“世界本身即是理念”这个命题也要作同样的了解。这里说的是“世界的本身”(即世界的本质)是理念,并没有说世界的一切具体事物即等于理念。黑格尔的全文是:“那不实的倏忽即逝的东西仅浮泛在表面,而不能构成世界的真实本质。这本质就是自在自为的总念,所以这世界本身即是理念。”(《小逻辑》中文版,第419—420页)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具体存在的事物看做“不实的倏忽即逝的”、“浮在表面的”东西,而把它们本质看做自在自为的总念,这个“自在自为的总念”和人的主观的思维、观念是同一性质的东西,这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等同论的一面,然而他又把具体存在的事物和“自在自为的总念”加以区别,和思维、观念的东西加以区别,这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一面。

恩格斯曾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是“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8页)唯物主义指出人的思维、观念只是物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概念只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的本质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抽象的摹写。果实概念,只是具体的果实如桃、李、杏、梨等等的共同本质在逻辑形式上的概括。唯物主义用反映论观点来肯定思维和存在,观念和它的对象、具体事物的同一性,即肯定思维、观念、概念所反映的内容是符合于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的本质的,这里所说的同一性没有任何绝对等同的意味,因为它指出思维、观念、概念等都是主观的逻辑的形式,具体事物的本质则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的实在,而主观的逻辑形式和客观存在的物质的实在显然不是等同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这个关系倒置过来,硬说客观事物的本质就是一种逻辑的思维过程,就是和人的主观思维过程同一性质的东西,从而把人的主观思维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认识,看成是思维对思维本身的认识,

这就使黑格爾的观点不能不陷于形而上学的等同论。要避免陷入这个形而上学的等同论，就必须把黑格爾哲学强加到客观事物的“内蕴”“深处”去的这个思维的幽灵驱逐出去，把那儿的“本质”这个宝座还原为物质的实在，然而这就要把哲学还原为唯物主义，就必然要抛弃唯心主义。

但是，尽管有这个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方面，仍没有妨碍黑格爾的哲学在相当高的程度上阐发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黑格爾把概念和具体事物、观念和它的对象加以区别，指明它们之间是互相矛盾的。在他看来，人的主观的思维、概念、观念要把握客观的事物、对象的本质——虽然他认为这个本质和思维、概念、观念是同一的东西，而认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思维、概念、观念对自身的认识——必须经过一个克服矛盾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必须对客观的事物、对象进行一系列的抽象、概括、分析、综合的功夫，首先由具体事物中抽出一个个的抽象概念，然后随着观念运动的发展，使许多抽象概念一步步综合起来，形成具体的概念，形成逻辑系统或理论系统，一直达到能够把握住“总念”，而这个“总念”，据黑格爾说来，已不再是人们头脑中的纯主观的东西，而是体现着深藏在客观事物对象内部的本质。黑格爾说：“无论总念也好，判断也好，均不仅仅在我们脑子里发现，并且不仅是由我们造成的”。“当我们进行去判断或批判一个对象时，那并不是根据我们的主观活动去加给对象以这个谓词或那个谓词。反之，我们乃在观察由那对象的总念所自身发挥出来的特殊性格”。（《小逻辑》，中文版，第345页）

这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在黑格爾的哲学里，主观和客观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并不是象于世诚同志所说的那种直接的

同一性，如象在许多别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所有着的那种情形，在黑格尔的哲学里，由主观达到客观，由思维达到存在，由人的观念到对象的本质，是经过一系列的思维的矛盾运动，经过对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进行一系列的抽象、概括、分析、综合的这种媒介运动而实现的。把人们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过程，看做是观念的辩证运动过程，这是黑格尔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辉煌的贡献，这是不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加以肯定和赞赏的。（《哲学笔记》，第189页）

于世诚同志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立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这是片面的说法，他不知道，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立足于他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中的。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地就是认识的辩证法，概念的辩证法，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统一的辩证法。黑格尔当然不知道自然界的辩证法，他只是通过概念的辩证法的研究，而猜到了客观事物本身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这主要是由于他把人的主观认识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辩证运动，说成是观念对自己本身的认识运动。然而黑格尔的这个唯心主义辩证法，又是一切唯心主义中最接近唯物主义的。在黑格尔的观念的辩证法运动中，只要抛弃了那把“总念”、“绝对观念”说成是客观世界的本质的思想，把那些偷换到事物“内蕴”“深”处的思维的东西还原为客观事物的物质实在，就可以找到许多对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极为有用的宝贵的东西。因此，列宁说：“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读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学说是倒立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说，我大抵抛弃神、绝对、纯粹观念等等”。

由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具有着两重性，有着反动的唯心主义

的糟粕和辩证法的精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它,就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必须采取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展的态度,即否定它的唯心主义,而对于它的辩证法的核心则又加以肯定。对于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观点也应如此(因为如于世诚同志所谈的,这是他的哲学体系的立足点),对它的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一面必须坚决予以驳斥,但对于它的辩证法的一面则应该予以肯定的评价。不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这样做的。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里,曾引了黑格尔的这样一句话:“概念在其客观性中,是自在自为的事物自身”,对这种形而上学的提法,他曾给与尖锐的否定的评语,说这是“=客观主义+神秘主义和对发展的背叛”。(《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6页)然而,在《哲学笔记》的另一个地方,列宁又引了黑格尔的这样一些话:“事实上,主观仅仅是从存在和本质而来的一个发展阶段,——然后这个主观性辩证地‘突破自己的范围’并且‘通过推理展开为客观性’”。这些话如果用于世诚同志的眼光看,又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了,然而列宁却在这里看出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的思想,并且加以称赞,说:“极其深刻和聪明!逻辑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同上,第195页)列宁还从黑格尔《逻辑学》的最后一页摘引了这样一段话:“正是因为观念把自己当作纯粹概念与其实实在性的绝对统一,从而把自己列入存在的直接性,所以作为具有这个形式的整个来说的观念就是自然界”。这里谈到了“纯粹概念与其实实在性的绝对统一”,说到观念“把自己列入存在的直接性”,说到“观念就是自然界”,如果用于世诚同志那种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的方法来评论,那还不是十足的唯心主义的等同论吗?然而,列宁对它是怎

样评论呢？列宁却是这样说的：“《逻辑学》最后一页即第三五三页上的这句话，是妙不可言的。逻辑观念向自然界的转化。唯物主义近在咫尺”。接着列宁还对《逻辑学》的这一章做了进一步的赞扬，说：“极妙的是：关于绝对观念的整整一章，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仅仅有一次偶尔露出了“神的”“概念”），此外，——注意这点——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而是把辩证的方法作为自己的主要对象。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后的话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还有一点：在黑格尔这一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事实！”（《哲学笔记》，第223页）

花了很多工夫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黑格尔著作中寻找材料的于世诚同志，为什么竟看不见列宁的这些十分鲜明的评语呢？列宁不是也在“美化黑格尔”（见于世诚同志的文章，《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吗？难道列宁也错了吗？撒仁兴同志说：“翻一翻黑格尔的书是有益的”，我认为这句话并不错，但我还要补充一句：如果不采取列宁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采取轻率的，否定一切的态度，那么，即使翻了黑格尔的书也是无益的。

三

现在再说恩格斯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采取什么态度，还是先从证据的检查开始。

我在两年前写的《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文中，曾经说到，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二日给斯密特的信，是

明确地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加以肯定的，而于世诚同志却错误地把这信的意思读成了它的反面。他这一次的文章不但不承认这个错误，并且还要对自己的原来看法勉强加以辩解。但这个辩解是非常牵强无力，完全站不住脚的，为要充分说明这一点，我想有必要把恩格斯的德文原文研究一下。因为直到现在，许多人似乎还只看到根据俄文转译过来的译文，（我当时引用的也是这个译文）而俄文的转译和德文原文是有出入的，最近在光明日报经济副刊上发表的一篇译文，甚至是有原则错误的。

恩格斯原文中有关我们争论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Die Vorwürfe, die Sie dem Wertgesetz machen, treffen *alle* Begriffe vom Standpunkt der Wirklichkeit aus betrachtet Die Identität von Denken und Sein, um mich hegelsch auszudrücken, deckt sich überall mit Ihrem Beispiel von Kreis und Polygon. Oder die beiden, der Begriff einer Sache und ihre Wirklichkeit, laufen nebeneinander wie zwei Asymptoten, sich stets einander nähernd und doch nie zusammentreffend. Dieser Unterschied beider ist eben der Unterschied, der es macht, dass der Begriff nicht ohne weiteres, unmittelbar, schon die Realität und die Realität nicht unmittelbar ihr eigener Begriff ist. Deswegen, dass ein Begriff die wesentliche Natur des Begriffs hat, dass er also nicht ohne weiteres *prima facie* sich mit der Realität deckt, aus der er erst abstrahiert werden musste, deswegen ist er immer noch mehr als eine Fiktion, es sei denn, Sie erklären alle Denkresultate für Fiktionen, weil die Wirklichkeit ihnen nur auf einem grossen

Umweg, und auch dann nur asymptotisch annähernd, entspricht.”（《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德文本，1953年柏林版，第581页）

这段话译成中文，应该是这样：——

“您对于价值规律的责难，适用于从实在的观点来看的一切概念。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完全切合于你所举出的圆形和多角形的例子。或者说，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这两者是并行地运行着，象两根渐近线一样，不断地互相接近，但却不会合而为一。两者间的这种差异，正是使得概念不直接地就这样成为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成为其本身的概念的那种差异。虽然概念有着概念所固有的特性，因而它不是直接地一目了然地和现实——它首先必须从里面抽象出来的现实——相一致，虽然如此，它毕竟不就是虚构，除非您因为现实与其思维结果之间的符合只是经过很大的迂回方式甚至只是采取渐近线式的接近，而把一切思维的结果都说成是虚构。”

在这一段话里，恩格斯对于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给与肯定的积极的评价，是很清楚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一词，如果充分地加以直译，就是前面说过的：“用黑格尔的方式来表述我的意思。”这里明明指出黑格尔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作了辩证法的理解，即这种同一性是被看作圆形之与多角形那样一种近似的渐近线式的接近，而不是绝对的一。因此，恩格斯接着就在“或者说”这个连续词的下面，进一步加以引申，指出这个命题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是不断地互相接近，却不会合而为一地、并行地运行着的。但两者虽然不能直接合而为一，却并不妨碍概念“毕竟不就是虚构”。很明显，为着反对斯

密特的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恩格斯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的辩证意义的。

于世诚同志对恩格斯的话作了牵强的曲解，说恩格斯好象是特别“强调了思维和存在的‘差异’”，这样来“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同一论”。他的理由是恩格斯引用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之后，就用“换句话说”，来另外阐明自己的否定黑格尔的命题的见解。于世诚同志这样说：“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必须在认识论中既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又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划清界限。针对斯密特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者的谬论，恩格斯回答说，就算是你把我说成是黑格尔一样都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者，然而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完全适合你所举出的圆形和多角形的例子，即承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仅仅在肯定可知论这一点上，这种笔法同《费尔巴哈论》的笔法相似），接着恩格斯立即用‘换句话说’，即换成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换成恩格斯的话说，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第38—39页）“换句话说”，是从俄文的“иначе”转译来的，其实这个字的德文原文是“oder”，应该象上面译作“或者说”，译作“换句话说”并不确切。在“或者说”的下面所说的一段话，决不能看作是对前面的命题的否定，只能看做是对前面的命题的积极的发挥，这是具有起码的语法常识的人都能够了解的。（并且，即使是译作“换句话说”，于世诚同志的那种说法也是不通的。）于世诚同志既然能读德文书，就不应该对这个最普通的德文单字也弄不清楚。

这里必须指出，上面引的于世诚同志的一段话里，还有一个历史知识的错误。他说恩格斯的这封信，是“针对斯密特诬蔑马克思

和恩格斯是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者的谬论”而作的回答。稍微会用头脑思考问题的人，都可以看出，恩格斯的语气，决不象是为着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而写的。恩格斯所回答的，是斯密特“对于价值规律的责难”，是他的那种不可知论的观点，即把价值概念说成仅仅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虚构，否认概念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恩格斯对这种康德主义的谬论给予“尖锐的批驳”，但是对于于世诚同志所讲的那种“诬蔑”，却半个字也没有提到，也根本没有为此而特别“强调了思维和存在的差异”，“批判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绝对同一的理论。”（同上，第39页）于世诚同志对恩格斯的信的这种解释是毫无根据的、凭自己的主观“想当然”的解释。

当然，于世诚同志他所谈到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来由的。斯密特确实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作过这种诬蔑，不过，这并不是在恩格斯活着的时候，而是在恩格斯死后。因此，恩格斯当然就无法在自己的信里回答这个诬蔑，而回答这个诬蔑的人，乃是俄国的普列哈诺夫。于世诚同志也提到普列哈诺夫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同上，第40页）但是，这是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一年之间的事，而不是恩格斯写那封信时——一八九五年——的事。于世诚同志对这次有关的问题似乎是努力做了历史的研究，但他的研究竟得出这样的结果！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校正于世诚同志的历史知识的错误，是为着再一次说明，恩格斯生前的情况，和他死后的情况有所不同，恩格斯活着的晚年，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威信已开始普遍地树立起来，这时伯恩斯坦之流的修正主义思想也露头了，但还没有形成很大的势力，还没有象恩格斯死后那样敢于对马克思主义举行大规模的猖狂的进攻。那时斯密特的修正主义面貌也还没有

显露出来,恩格斯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修正主义者来对待,而是把他当做一个思想上有些错误的青年朋友来对待,对他进行了谆谆的教诲,并非常耐心地向他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恩格斯给他的一些已有中文翻译的信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那时欧洲的哲学界流行着“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反对黑格尔哲学和宣传不可知论成为很大的潮流,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着这个反动潮流,曾在许多文章里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积极意义。恩格斯看到斯密特是受了康德主义哲学的影响,为着想帮助他克服错误,曾劝他好好的学习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给斯密特的许多信中,总是首先指出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形下,恩格斯对斯密特提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时,就着重从它的辩证法方面来给以肯定的解释,这是很自然的。

为着证明这里所说的情形,我想介绍一下恩格斯给斯密特的另一封信。这信写于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一日,现在摘录如下:

“……没有黑格尔,当然不行,而要领会他就必须付出时间。……”

……最重要的部分,是本质论:抽象的对立消溶在它们的不确定性中,当人们想死死地只抓着一个方面时,它却不知不觉地转为另一个方面了,如此等等。这一点你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具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的,例如,你可以作为未婚夫,在你自己和你的未婚妻的身上,找到同一性和差别性之不可分的鲜明的例证(恩格斯写这信时,斯密特刚刚订婚;恩格斯在这封信的开头曾向他表示祝贺,这说明他们当时个人的友谊也并不坏),完全没有可能来

确定，两性之爱的欢乐，是由于同一性中的差别性，还是由于差别性中的同一性。试取消这里的同一性（双方都是人）或差别性（这里是指性别）你还会剩下什么呢？我回忆起，最初，正是这个同一性和差别性之不可分，使我感到多么困惑，而我们不被它绊一绊脚跟，就一步也走不出去。

但是，无论如何，不要象巴尔特那样，只为着发现黑格尔用作体系的杠杆的那些荒唐论点和骗人伎俩，去读黑格尔的著作。这是小学生的事情，……”（译自《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德文本，1953年柏林版，第524—525页）

从这封信的口吻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是把斯密特当作一个青年朋友来给以教诲和帮助，而并没有把他作为政敌来看待。恩格斯一开始就强调学习黑格尔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要着重学习他的辩证法：同一性和差别性之不可分的关系，对立面的互相转化，等等。恩格斯也指斥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荒唐论点和骗人伎俩”，但却认为如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方面，就不但是片面的，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幼稚的行为。恩格斯特别向斯密特介绍黑格尔的同一性和差别性之不可分的关系的观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旁证，说明恩格斯论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时，是着重于肯定它的辩证意义，肯定它的差别的同一性。正是因为恩格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遵教诲的堕落青年斯密特，才会在恩格斯的死后把他的话加以曲解，诬蔑唯物主义者恩格斯肯定了“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恩格斯并没料到这个诬蔑，因此他的文章也就不会特别为这个诬蔑来作回答。

但马克思主义者对黑格尔哲学总是采取批判态度的。恩格斯

并没有单纯地、片面地肯定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对于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的唯心主义方面的理解，他仍然无保留地给与彻底的否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对于杜林的批评，只是其例之一。“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来证明某一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某个黑格尔的最荒唐的、神魂颠倒的幻想之一”。（参看《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2 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指斥的，正是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的唯心主义方面的，也是杜林的片面的了解。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恩格斯也作了类似的批判。这些批判都不能说是对黑格尔关于这个问题的整个思想的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贝克莱的，马赫主义的等——以及谢林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全盘否定的，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把这类理论看成“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343 页）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列宁并没有说这个理论就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如于世诚同志所武断的那样。对于黑格尔的有关思想，列宁是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又否定又肯定，又批判又赞扬的态度，如象在《哲学笔记》里所做的那样。

和列宁一样，恩格斯对黑格尔也是采取又否定又肯定，又批判又赞扬的态度的。而在康德主义，不可知论以及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流行情况下面，恩格斯就比较地更着重肯定黑格尔的辩证法。为着充分证明我们的这个论断，我想再从《自然辩证法》里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都服从于同一的规律，因而两者

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整个理论的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十八世纪的唯物论，由于它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性质，所以只就这个前提的内容去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且还复活了下面这个命题：‘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同时也从形式方面去研究这个前提的，只有现代唯心论的但同时也是辩证法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不管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无数任意虚构和凭空臆造的东西；不管这种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是采取了唯心论的颠倒形式，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个哲学在许多场合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与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即同一的规律支配着这一切的过程。……”（《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3—234页）

看吧？恩格斯是怎样估计黑格尔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也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恩格斯虽然也批判了它所采取的唯一主义的颠倒形式，但又指出它“同时也是辩证法的哲学”，这个哲学证明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还不能加以完全证明的重要真理，即同一的规律支配着思维的过程与自然的和历史的进程。

四

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并不就等于肯定了“德国古典哲

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这道理已经充分地说清楚了。“迷信”应该再一次打破：不能说在任何意义上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加以肯定，都会沾染上唯心主义的鬼气。不错，列宁曾说过：“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性理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但是，普列哈诺夫在《再论唯物主义》（《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5—156页）这一篇文章里也曾肯定了“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之同一性”，这篇文章，列宁是见过的，为什么列宁在批评普列哈诺夫的其他错误时，却没有把他的这些话说成“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呢？为什么列宁对普列哈诺夫的这些文章还作了相当高的估价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前一种同一性和后一种根本不同。前一种是波格达诺夫在主观唯心主义的意义上所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把思维与存在看作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思想，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从头到尾坚决加以反对的，都是这种同一性。当普列哈诺夫说到“只有唯心主义才承认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同上，第55页）时，他所指的也是限于这种等同论。至于后一种普列哈诺夫自己所说的同一性，则是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意义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样的肯定，并没有任何错误。所以，尽管普列哈诺夫的这篇文章是为着回答斯密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而写的，尽管这时斯密特也采取了偷换命题的诡辩法，硬说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肯定了唯心主义，但普列哈诺夫仍然理直气壮地作了他自己的肯定（虽然他的肯定还不够深刻，因为他不了解认识的辩证法），并且说：“斯密特的‘批评’武器，反对这一同一性，是完全无力的。”

历史的发展往往在外表上重复某些旧事物的特征，于世诚等

同志在现在也想来反对这一同一性，他们的“批评”武器也同样是完全无力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依据自己的观点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给与肯定的答复，决不会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更不是要用“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必须有自己严格的专门的术语，当然不能用“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来代替反映论或能动的反映论。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只是说对于“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6页）这个问题给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肯定的解答，也就是从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上来给与解答，这决不等于要改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专门术语。但是，不能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来代替反映论或能动反映论，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列宁曾坚决反对用“实在论”（Realism）这个术语来代替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原因是这个术语曾被唯心主义沾污过，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者在文艺理论的范围内以肯定的意义使用这个术语——“现实主义”（外文也是同一个 Realism）。同样，因为在历史上唯心主义者曾使用过“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就把它看成辩证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条件下也不能涉足的绝对的“禁地”，这完全是书呆子气十足的形而上学！

有的同志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说成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共同的概括”，我认为这话是有语病的。但我们说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者在内——都对思维与存在的

同一性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这并没有什么错误,也不见得因此就会混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界限。因为这里所说的绝大多数哲学家们的共同点只限于对“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这一点,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如何肯定这个问题上也有共同点。在如何肯定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哲学派别当然有不同的方法和观点,这里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唯心主义者,首先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是用形而上学的绝对等同论的观点来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黑格尔的哲学一方面用唯心主义的等同论观点,另一方面又用辩证法的方法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他的辩证法的一面为哲学思想史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人类的思维是一个不断地接近现实世界的发展过程;一切唯物主义者都从反映论的观点上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指出人们思维能够反映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其中,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只能“从内容”上去研究这个问题,即“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辩证唯物主义则不只要从内容方面,而且还要“以从形式方面”去肯定这个辩证的同一性,还要证明思维和存在两者是渐近线式地并行地运行着的发展过程,“两者之间虽有差异,但都为同一的规律支配着”,或者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的,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这里还应该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认识论上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它揭示了人类的社会实践和认识的不可分性,揭示出思维和存在的上述的辩证同一性,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人类的变革世界以实践过程推动人的意识、认识、思维向前发展,意识、认识、思维的发展又指导人们去变革世界或“创造客观世界”。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就把人的思维、意识、认识看做是在实践中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就是能动的反映论。毛泽东同志把能动的反映论概括为这样一个总的公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这样,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就是以实践为基础,通过不断前进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而实现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

以上这些,就是不同党派哲学家们在肯定地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不同的方法和观点,这里的界线不是划得很清楚的吗?是不是因此恩格斯和列宁就成了唯心主义者,而“贝克莱和费尔巴哈也成了辩证论者了呢?”(《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第38页)请放心,于世诚同志们!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混乱现象。你们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

(一九六二年九月《哲学研究》第五期)

曲折前进是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

宇宙发展的总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到质变不断上升的过程。在总的上升趋势中，到处可以看到前进与后退、向上与向下、正向与反向等互相对立的运动倾向、反复交替的现象。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历过蓬蓬勃勃的前进上升时期，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就转入倒退没落的过程。然而接着就出现了辉煌灿烂的新的人类社会的前进运动，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的胜利。在自然现象方面，地球曾经象太阳一样，是一团奔腾涌沸，光芒四射，不断爆发的原子能火焰。后来表面逐渐冷凝僵固，象是要进入休眠死寂的状态了，然而终于又活跃起来，出现了有机物和生命，展开了天体发展史上万紫千红、无比丰富的图景。生物的进化，是各种各类有机体的兴起、灭亡和更高的有机体又再兴起的运动。爬虫类曾是

* 这篇文章，是一九六二年写的。当时，我国正处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周总理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建设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在社会上和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出现了一些怀疑、动摇、悲观的情绪。艾思奇同志试图在哲学理论上阐明我们党的方针，辩证地分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曲折，从而坚定我们前进的信心。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作者在中央党校内部曾讲过多次，但没有公开发表。一九七九年十月在《昆明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上首次发表。

中生代横行世界的霸主，由于冰期的出现而遭到灭绝；接着来到了新生代，陆地上的统治地位就被更高级的哺乳动物所掌握，而人类就是从哺乳动物中发展起来的。不但这些巨大的自然界发展过程表现为方向相反的运动趋势，不断相互转化的形式，最为微小的粒子如电子、中子、质子等等的空间运动，也是采取波浪形式曲折前进的。人类的整个历史经历了一个大的回旋周期：由原始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然后又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人类的日常生活，也是由许许多多小的周期构成的，例如每天的工作、休息，再进入第二天的工作，就成为一个周期。这些周期性的过程，都由反复出现的互相对立的运动趋向所构成。

在总的前进上升过程中包含着正相反对的各种运动趋向不断相互转化的内容，这是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也作用于人类的革命实践斗争中，革命是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前进事业，这个事业中就包含着高潮与低潮，成功与挫折，胜利与失败等等多次循环往复的现象。在革命前进的途中，每一次进攻战役之后都必须继之以暂时的停顿、休整；当周围遇到了特别的困难，或者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逆流，往往要走上曲折的甚至于暂时退却的道路。但是停顿、休整、曲折、退却之后又会继之以新的进攻，在党的领导下，困难会被克服，逆流会被冲破，错误会被改正，革命斗争会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一九二七年右倾机会主义所导致的失败，使革命由城市退入农村，但我们终于建立了工农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的胜利。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工农红军不能不从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转移，但长征的终点又成为革命运动更强有力的大发展的起点，经过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而取得全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革命是前进上升的运动，但

不是直线上升的前进运动，而是有进有退、有起有伏的波浪式地向前推进的运动，革命事业是这样，宇宙间的任何事物也都没有例外。

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谈谈辩证法问题》）又说：“发展不是按直线式而是按所谓螺旋式进行的。”（《卡尔·马克思》）“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一切事物内部都包含着互相对立的倾向和势力，这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的源泉；第二，由于内部互相矛盾的倾向和势力的斗争，使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或者说，使发展过程采取不断地向对立方面转化的形式。所谓螺旋式的行进，就是进与退，向上与向下，正面与反面的运动形式不断地互相转化的发展形式，肯定这种发展形式的普遍意义，是辩证法的宇宙观的基本点之一。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即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是用逻辑的形式概括了上述宇宙万物发展过程的特征，即“螺旋式行进”，也可以叫做波浪式的推进或周期性的前进：起初是具有某种肯定意义的前进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转化为它的否定，表现为与原来前进方向相反的某种发展趋势，包括转折、停顿、变形、向反面的转化等等，然后在一定条件下，这个趋势再被否定，转回到更进一步地正面前进的过程，这不是简单地重复最初的前进运动，而是在更高一级的基础上的前进运动。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的统一，正面的发展与反面发展的对立的统一，不断地循环往复，相互转化，构成宇宙事物发展一级高似一级地无限地向上升长的总进程。列宁说：“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谈谈辩证法问题》）这是发展的每一周期的基本图景。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实际工作中，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都需要善于应用唯物辩证法，也必须认识和掌握否定之否定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统一，虽然不能简单地完全归结为这一点；因此，为着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这个规律，需要对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相互联系作进一步的分析：后退运动是前进运动的否定，但不是单纯地只有消极意义的否定；只有形而上学者才会作这种片面的理解。后退运动本身自然是一种消极的过程，但也能表现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事物发展的总过程中，某一方面的后退运动在一定情况下正是事物继续向前推进所不可少的环节。没有这样的后退，就没有更大的前进。工作后没有休息，就不能更进一步工作；党团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不继之以整顿，就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革命和战争经过一次进攻战役之后不退入休整阶段，就不可能举行更有力的新的进攻。人的理性认识，对于实践中直接获得的感性经验来说，有一种脱离具体生动性而走向抽象性的后退倾向，但只有经过理性认识，人们才能深入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才能使认识进一步来指导实践。错误对于正确的认识是一种明显的倒退，但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常常不可避免地要犯或大或小的一些错误，如果人们善于总结经验，能够由错误中取得教训，就能更深刻地把握正确的认识。批评和斗争对于团结来说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但只有经过这个曲折，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更进一步的团结。在革命和战争中间，是否能够认识前进运动和后退运动的这种辩证联系，对于领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对这一点作

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说：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〇六年、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约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180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首先是前进发展的观点，但只知道向前的运动而看不见某些为前进所需要的后退，还不是真正的辩证法。辩证法是把后退运动作为一定条件下不可少的从属因素而包摄在自己内部的前进发展观点。辩证法发展观不把后退运动单纯地看做前进运动的消极的否定。辩证法的否定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哲学笔记》，第244页）深入地观察后退运动和前进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联系，就不会在后退运动中只看见消极的意义，而且也可以发现一定的积极意义。

后退运动对于前进运动来说，是某些东西的丧失。但如果把事物运动中的各方面加以综合的考察，就可以知道，任何后退运动中所丧失的只能是发展过程中某些必须丧失的部分，而不是它的一切积极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仍然被保留下来。革命转入农村，丧失了某些城市据点，但保住了革命力量的最坚强的部分；军队以退却方式诱敌深入，要打破某些老百姓的坛坛罐罐，但保持着待机反攻的有生力量；整顿组织，在数量上要丧失一部分成员，但却集中了精干的成员；调整工农业生产，要缩小计划上的某些数字指标，但保证了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保证了生产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资本主义的没落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不会随着它的制度而归于消灭。事物的后退运动，通常都是以已往发展的积极成果为基础的某一方面的后退，仅就这个方面来说是丧失了一些东西，但发展过程中已经达到的积极成果则不会根本上有所丧失。当发展过程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逆流、曲折、停顿等等）的时候，发展过程的总体已形成了一个较高的地位，因此，宇宙间不会有整个过程的一切方面的倒退，不会有绝对的倒退。这也就是说，事物的倒退、逆流、曲折、停顿等，在总的向上发展过程中，只会引起部分环节上的某些丧失，绝不会招致发展本身根本的丧失。在发展过程的某些倒退或逆流中应该看到可能丧失东西，但片面地只看到这些可能丧失的东西，而看不见总的过程中已形成起来的较高的基础，这并不是辩证法观点，而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如果把事物的发展过程作更进一步的全面分析，就还要看到，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后退趋向的时候，也不是一切都走向逆转，而没有任何东西在前进了。对立的统一规律不但表现为对立方面的相

互转化,首先还表现为对立方面互为条件地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向对立方面转化,正是共存在统一体中的对立方面互相斗争的结果。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关系也是如此。向前的运动中就包含着某些向后的运动的因素,因此在一定的发展条件下转化为后退运动。在后退运动过程中,同时有着新的前进运动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前进发展,使它能够终于再转化为更高级的前进运动。资本主义在上升的时期,自始就有着使它自己走向没落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这两者的集中表现,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终于使它转向没落的阶段。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没落的过程中,大工业继续向前发展,无产阶级的势力日益壮大起来,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一天天成熟起来,最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终于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地获得胜利。在革命势力开始前进的时候,由于组织成份的复杂,敌对阶级的影响,对斗争缺乏经验以及其他主客观的原因,就潜伏着使革命运动犯错误和遭受挫折的因素,因此,在革命发展过程中,逆流的出现,或大或小的挫折和失败,由进攻向防御、退却的转化,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在犯错误和遭受挫折的时候,革命势力就得到了锻炼,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在组织上变得更纯洁更坚强,数量上可能减少了,质量上却更加强了。这些因素的生长,或迟或早地会使革命运动转入新的更有力的前进和高涨。因此,我们应该这样来看世界一切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不但前进运动占主要地位的过程中,事物是在向上发展,就是在后退运动表现为主要形式的时候,事物的发展往往在本质上、总体上仍然是在前进中。波浪下降的时候,和它上涌的时候一样地多少有所推进,螺旋回折的时

候，和它前进的时候一样地有所升高。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出现对原始公有制来说是一种后退，但人类的历史由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辩证法要求我们在一些事物的后退、向下、没落、衰亡的运动中，同时看到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一些事物的前进、上升、兴起、生长的运动。在革命犯错误和受挫折的过程中，看到革命人民的经验的增长；在数量缩小的过程中，看到质量的提高；在休息和睡眠过程中，看到工作精力的恢复和生长。现时代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包括修正主义者）不断捣乱和走向灭亡的时代，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走向胜利的时代，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时代。两种方向相反的运动，同时在一个时代中进行，并遵循着两条正相对立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了这些规律，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又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1376页）资产阶级思想家常用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来恐吓人民：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了，那就是世界的末日，人类的毁灭！马克思主义者鄙弃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这一类牧师式的谎言。事实上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过程中，革命人民一步步建立起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百倍的社会主义新生活。

必须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辩证法；在实践向前推进的时候，注意到与此相联系的必要的后退，注意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的原理，防止“左”

的片面性和冒险主义，这样就可以避免一旦必须走曲折道路的时候陷于被动，避免被迫走上不必要的更大的弯路；在实践中遇到困难，要求走暂时的曲折、后退的道路时，要看到已获得的各种重要成就，努力巩固并发展这些成就以及其他积极的因素，反对右的消极退却思想，这样来逐步准备条件，以便时机成熟时能够及时地把工作推向新的更大的跃进阶段。

关于哲学教科书的一些问题*

一、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编写哲学教科书的原则,大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我们编写教科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学习哲学的同志讲解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不是要写一本学术讨论的著作。我们力求它的内容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希望能在稍长的时期内,不必作很大的根本性的修改。本书(即艾思奇同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编者)在解释哲学原理和原则时,着重系统说明经典著作中已经有了定论的,或是在理论界经过讨论,大体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尽量避免一些在学术界还有争论或争论还没有完结的问题写进教科书中。例如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生产力内部有没有发展动力,这类问题,我们就没有写;又如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在某些方面虽然已有了结论,但争论还没有完结,这类问题,我们也没有写进教科书中。

在联系实际问题的時候,联系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

* 本文原是艾思奇同志应邀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所作的一次讲话,后摘要发表在一九六二年十月《教学与研究》上。

们着重从哲学上概括一些比较重大的经验。民主革命中许多经验是经过总结了的，我们都联系了。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著作和党的历史，联系了民主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但对许多具体的并且正在试验的措施，我们就避免去论述它，因为它本身是否成熟，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前两年我们喜欢把一些眼前正在试验的措施写进教科书中去，过半年、一年就要作很大的修改。这就不能保证教科书的稳定性。我们这次就没有这样做。讨论学术问题的著作，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写，要写什么就写什么，要联系什么问题也可以比较随便；教科书则不能这样做。

第二，力求比较准确、简练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同时又在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说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把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哲学原理和说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如果我们不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就不可能了解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要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只注重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而忽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贡献。过去这种偏向是有的，我们要反对和防止。另一种是，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还没有搞清楚，就任意用贴标签的方式，空谈毛泽东同志对它的发展。这种偏向前几年也是有的，我们也要反对。强调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强调

研究问题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个方向是要坚持的。但是,如果不注意毛泽东思想本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还没有搞清楚,就想了解毛泽东同志对它的发展,这是不对的。以为只要贴上一个标签,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第三,教科书应该适应它的对象。我们考虑到,教科书既应适应教师的需要,也应适应学生的需要,要根据教师和学生的需要来写。学术著作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作者想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我们这本书,主要是一般高等学校文科学生用的哲学教科书。教学时数有一定的限制,教科书的分量不能太大,哲学的基本原理又都必须讲得全面些,因此,内容的阐述就应力求简明扼要;联系实际力求避免用很多的、繁杂的例子,只要能够说明问题就够了。这样作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教科书的分量适当,使学生有学完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教师在讲授时有发挥的余地,使学生有独立思考的余地。由于原理原则讲得比较扼要,因此一部分学生理解它会有一定的困难。有困难是免不了的。这些困难可以由教师来帮助解决。书中联系实际的例子不多,教师在讲授时可以补充一些。书中没有举目前正在试验的事情作例子,教师讲课时如果认为适当的也可以举。教师可以斟酌情形把问题讲具体一些,解释原理时可以更详细一点,引用例子可以更多一点。

第四,贯彻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原则。为什么教科书尽量避免直接涉及理论界有争论的问题,或争论尚未完结的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反对教师和学生课堂上提出这些问题和讨论这些问题。相反地,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便于教师和学生能在课堂上自由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教科书里不写学术界争论中的问题,

对学术界争论中的问题不作论断，是为了不让教师和学生有先入之见，在课堂上敢于自由讨论，保持活跃的学术空气。有的同志说，教科书里对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不作论断是个缺点。我们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让教师来启发同学的思想，活跃学术空气；根据课堂情况、学术界的情况，适当引导学生提出一些讨论中的问题，研究学术界争论的问题。

教科书尽量避免涉及争论的问题，并不是绝对不涉及这些问题；有些地方，有些问题也不能不涉及，否则，书就没有办法写下去。如绪论中的哲学史部分，谈到老子哲学问题，关于老子哲学的性质，正是目前学术界争论中的问题。由于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必须谈，否则中国哲学史就无法写。我们谈了这个问题，并表示了我们自己的意见。又如对部分质变如何理解的问题，上海和北京有不同的意见。生产力究竟是三要素还是两要素，苏联有不同的意见，他们的哲学教科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提法就不同，各写各的；对这个问题，中国也有不同的意见。这一类问题，虽然理论界的讨论还没有结论，我们仍然写了。要写就要有论断。我们下论断时是采取编写组大多数同志认为妥当的意见。如关于老子哲学性质的问题，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在教科书里就把它说成是唯心主义的；同时在附注上指出，这个问题还有反对意见。这样可以使教师和学生的思想不受限制。教师可以不同意教科书的意见，可以提出他的根据和理由，说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学生也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还在争论的学术问题，不能写出最后的意见限制大家的思想。也有些问题，我们写了自己的意见，但没有加附注，因为觉得没有必要。我想声明一句，只要不是在经典著作中可以找出根据的定论，

不论在教科书里有没有附注，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讨论。在经典著作中有了定论的问题，我们不赞成有反对意见。当然，如果有人不同意经典著作中的定论，要提出讨论，也不能完全禁止。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怕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有反对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会更进一步证明它的正确性，也才能使人更深刻地了解它的正确性。

二、怎样使用哲学教科书

首先，这本书是供一般文科同学使用的，哲学专业使用时会嫌内容少一些，理工农医科专业使用时会嫌多一些。现在还没有写出一本分量较大的、为哲学专业用的教材，因此，哲学专业也有采用这本教科书的，在使用时就需要教员依据情况补充一些内容。理工农医科专业用这本书时又需要教师进行适当的挑选和辅导，有些内容可以少讲一点，如象绪论哲学史部分，可以适当省略。这样，在使用教科书时，就要求教师表现自己的创造性，适应不同的对象，更好地发挥教科书的作用。

其次，在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教学时，要努力做到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联系实际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它的总原则是要用理论原则作为方法指导，来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有一种方法叫做原则加例子的方法，这就是在讲述某一理论原则的时候，挑选一些自然界或社会的现象来作为证明。为了通俗地说明问题，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部分地曾用过这样的方法，但仅仅采用这样的方法，是不够的。严格地说，这

种方法还不能算是真正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真正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需要采用更高的方法。最高的方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对革命工作和科学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作出结论,提出指导工作和斗争的方针、计划、方法,以此来推动工作和斗争取得胜利。这个最高的方法,我们一般哲学教师是不可能马上做到的,但应该把这做为长期努力的方向。还有一种方法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来批评某种错误思想,这是比原则加例子高一些的方法,其所以高一些,是因为在批评一种错误思想的时候,就树立起了思想的对立面,并通过批评斗争来解决一个矛盾。而解决矛盾,就是解决问题,在研究理论的时候解决了一定的问题,就算是达到了联系实际的目的。原则加例子之所以不能算是真正联系实际,就是因为它不解决什么问题。应用这样的方法来讲课,就需要教师们自己善于找到某种违背理论原则的错误思想来作为批判的对象,这种对象可以在学校范围内存在的活的思想中找到。联系活的思想来学习理论,可以收到很大效果。但应用这样的方法时要十分谨慎,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如果不采取谨慎态度,把人们所说的话不加分析地随便戴上错误思想的帽子,那就不但得不到好的教学效果,而且会适得其反。挑选思想批判的对象,不能只限于学校范围,国际上的帝国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国内的革命历史上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现的各种错误思想,都可以联系到哲学上来加以解决。自然科学的某些错误理论观点,也可以作为批判对象。教科书本身也批判了一些这类的错误思想,教师们不妨就这些加以适当的引申,也可以自己独立地另外找一些批判材料。还有一种比较更高一些的方法,这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对我们周围的许多工作和斗争的经验加以概括

和说明。从事哲学教学的人应该努力学会应用这样的方法，前一种方法，也只有在这一种方法应用得好的时候才能做得好。这个方法要应用得好是不容易的，但努力做去是可以逐步学会的。例如这几年人民公社发展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上加以概括和说明，人民公社几年来如何逐步完善起来，这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和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的逐步发展过程密切联系着。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不断地暴露和一步步得到解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主客观的矛盾，我们的认识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的党中央领导，能够不断地及时发现和及时纠正错误，使主客观之间的矛盾逐步得到解决，使我们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日益深刻，日益全面，日益完善起来。象这样，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对人民公社的经验作出一些概括和说明，由此也可以帮助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获得较为深刻的说明。这就是一种联系实际的方法，是比仅仅批评某一种错误思想要高一些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也同时可以包括批评错误思想的方法在内。这个方法之所以比较高，就是因为它要我们应用理论来分析问题，说明问题，来概括和总结实践经验。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时应努力联系实际，要避免太多地纠缠在纯粹概念和原理的争论上面。有许多人喜欢讨论“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之间是否对立统一关系”这类的问题。这些问题谈来谈去最后就陷于纯粹是概念上的纠缠，很难从这样的讨论里来说明和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虽然在学生提出来时可以多少谈一谈，但决不要扯得过多。总之，搞哲学的同志要多注意联系实际问题，要对实际问题提出自己哲学上的说明和看法。如果长久不敢这样做，我们哲学工作就会停滞起来不能

前进。

在联系实际时我们的教师同志可以比教科书中联系的问题更具体些，可对当前国际、国内的一些实际问题作出哲学上的说明，例如今年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有一个公报，公报中提出了并说明了许多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教科书中没有联系到，因为教科书是去年写的。但教师们在教学时就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当前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对这些问题作出哲学上的说明。公报中讲到几年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很多困难，而成绩是主要的。这些问题在讲辩证法时就可以作哲学上的说明：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人的认识却难免有片面性，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而不注意相反的方面。如果对国内问题只看到缺点的一面，就不能理解成绩为什么是主要的这一点。在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既然根据大量事实，充分理由，得出了一致同意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个结论，我们在讲辩证法时就有责任给予哲学上的论证和说明，只有这样，才能使同学们认识更深刻，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有信心。从世界观上来打好认识的基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我们哲学教师们做一些创造性的研究工作。理工农医科专业的哲学教师还可以就自然科学的问题来作些解释。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中也谈了一些自然科学的问题，但我们编写这本书的同志，都不是专门搞自然科学的，因此举的那些例子都很简单。理工农医科专业的哲学教师同志们就可以更多地对自然科学上的理论问题作哲学上的说明。如象在生物学领域中米丘林派和摩尔根派的争论，有一个时期米丘林派曾把自己说成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生物学派，而摩尔根派则是唯心主义的。这样的说法如何不对？我们要从哲学上来加以论证，在理工

农医科专业从事哲学教学的同志,应该努力来解决这类的问题。总之,联系实际可以联系社会政治问题,也可以联系自然科学问题。

联系实际要注意避免对具体问题不加分析,任意抓住一点,贴上标签。有些哲学工作者曾经有过这种缺点,如对实际问题不是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然后作出结论,而是随便贴上个标签,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是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完全与联系实际的正确方法背道而驰。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问题的指南针,而不是标签,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首先要求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要求用辩证法对事物的正面、反面作周密的分析研究,然后才作结论。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计其余,根本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联系思想是联系实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这在上面已提到一下,现在再说一说。初学哲学的人一定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学习才能深入。如我们讲什么是唯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的特点时,就可以联系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我们曾经有过的一种思想,这就是把摩尔根学派的研究成果,不分青红皂白,当作唯心主义来看待。这样的思想就值得在学习唯物主义的时候重新认真地来检查一下,只有在这样的具体问题上联系自己的思想,把正确的观点加以肯定,错误的观点加以修正,才能帮助我们对于什么是唯物主义的问题获得深刻理解。联系思想和联系周围实际是分不开的,要对周围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才能肯定我们的那些思想认识是正确的,那种思想是错误的。这样才能达到联系周围实际、联系思想,解决问题加深认识的目的。

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一定要批判对立面,要和唯心主义、主观主义作斗争。批判主观主义并不是随便乱贴标签,乱戴帽子,而是进

行认真分析,认清了确有主观主义,然后再加以批判。在这里还要区别个别问题认识上一时的主观性、片面性,和坚持主观片面认识一直发展到系统程度的主观主义,两者是不同的。个别问题认识上一时的主观性、片面性是任何人在认识过程中不可免的情形,只要能够在认识过程中比较及时地克服,就不是主观主义。如果把这也当做主观主义来进行批判那是不对的。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批判对象,可以在我们现有的活的思想中找到,也可以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理论中找到,也可以在过去历史中找到。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现状,但联系历史也是一种联系的方法。不管是联系现状还是联系历史,都要作详细的调查研究,然后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总之,学习哲学要在批判错误的斗争中学,因为真理总是在和错误相比较相斗争中发展的,讲真理也只有在和错误斗争中对比中才能讲得深入。讲辩证唯物主义应该树立对立面——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等。

主观主义有两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学生中可能没有经验主义,教科书中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列,不一定恰当,经验主义可以不强调。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学生中是否有经验主义当然可以研究,但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讲原理要全面,主观主义既然有两种,就需要全面讲到。并且,认为大学生中只有教条主义没有经验主义也不见得对,学生很可能没有系统的经验主义,但经验主义性质的思想是否就完全没有呢?他们如果不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那么会不会产生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呢?肯定说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拿大学生下乡劳动来说,有的人得到一点劳动经验,局部地区的经验,就自以为有普遍意义,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在

实验室中做实验,有了一点经验,而看不到这点经验的局限性。这都是经验主义性质的东西。并且,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实用主义的坏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实用主义就是一种经验主义,因此不能说在学生中批判经验主义没有现实意义。我们讲经验主义常常是指工作中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有所不同,但就其实质来说,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马赫主义也有某些基本的共同点。因此,我们在教科书中和在大学中批判经验主义决不是完全无的放矢的。还有一个问题,教科书中论到主观主义时,不是把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列而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列,这是不是不强调反修正主义呢?当然不是,我们的教科书是把反对修正主义思想作为一个主要的批判方面的。但修正主义不只是思想方法的问题,而且是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体系,而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是思想方法问题。第一章绪论中第四节谈到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时就是从方法论上讲的,所以,在这里只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列,并不就等于不强调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可以是经验主义的,也可以是教条主义的。但就主要的情形来说,修正主义的思想方法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我们有时也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并列,这里的教条主义就不单纯是思想方法的问题了。修正主义是根本背叛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该和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也是要反对的。我们在第一章绪论中讲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所以没有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并列。在教科书中我们是把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作为政治上主要的反对方向的。修正主义的方法不仅包含经验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而且也包含诡辩论,诡辩就是主观随意地

歪曲应用辩证法的对立面相互转化原理，如说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不经过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例。辩证法谈转化，总是有条件的，因此辩证法认为，资本主义一定要经过革命才能转化为社会主义。而诡辩论在说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时取消了不可少的一个客观条件，由此做出荒谬的结论，说现代资本主义可以直接转化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议会可以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机关，而把马克思主义讲的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一条件抹煞了。

上面谈的是如何利用这本教科书的主要问题。下面再谈一点零碎问题。

讲授哲学史是否需要划三个时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按恩格斯的说法划分三个时期，另一种意见是不划分三个时期。我们在教科书中没有明确划分三个时期，原因是中国哲学史中第二个时期、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时期很短，只有一、二十年，而古代唯物主义时期很长，有几千年时间，内容丰富，这和西方哲学史不同。因此划分三个时期和西方哲学史并列起来写有点不方便。但恩格斯说的三个时期是应该肯定的，哲学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也是三个时期，只是第二个时期从康有为、梁启超时起才有点萌芽，到孙中山、五四运动时止，只有一、二十年，时间很短，而且没有出现完整的体系。我想教师同志们在讲授时可以肯定恩格斯的三个时期这一规律。当然规律的表现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中国的表现就有它的特殊性。

关于这本书里讲到一些自然科学的问题，文科同学说看不懂，有的教师也说不懂得，怎么办？我看暂时不完全懂得，也不要紧。如关于相对论的问题，文科哲学教师很可能不懂，就是理工农医科的哲学教师如果未钻研过相对论也不会懂，我们教师同志们可以

告诉同学,我们谈这些问题,只是要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结论来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至于为什么得出这些结论,不搞这项科学专业的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因此我们也不必勉强去求完全弄懂,只要这些结论在科学理论上已有了定论,在实践上已经得到了证明,我们应当相信这一结论,我们的任务是只要了解这些结论的内容,并且弄清楚它在哲学上的意义就够了。

最后,在使用教科书的时候,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水平出发来进行讲解,学生所需要解释的问题,和教师、专家所需要解释的问题不一定相同。有些问题,对于教师来说似乎已经明白,不用多解释的,对于学生来说却需要充分解释,例如物质和精神、思维 and 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是哲学上的最根本问题,这个原则在教师和对哲学有专门研究的人是已经清楚了的,但对学生却需要从各方面反复阐明才能理解。同时,不充分了解这样的根本问题,其他哲学问题也就不可能进一步深入理解,因此,教师同志切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问题,在同学中也不会成问题,而不作详细的阐明。教师们在进行教学时,应该首先研究同学的要求,根据他们的要求挑选某些问题重点地详细讲解,而不要对一切问题都平均地使用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九六二年十月《教学与研究》第五期)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今天看来，这话可以作这样引伸：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但社会上不是只有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而是还存在着反映腐朽、落后势力的错误思想，这些思想影响了群众，也会变成阻碍社会进步，破坏世界革命事业的物质力量。

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正确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过去四十多年逐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变成了摧毁帝国主义及一切国内反动统治势力的物质力量，使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但是，也有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如陈独秀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所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潮（在抗

* 本文是艾思奇同志一九六三年八、九月间在青岛疗养时写的，后来曾几次修改，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一九七九年首次发表于江苏《群众》丛刊创刊号上。

战初期它又一变而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曾在革命队伍中泛滥起来,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的失败和挫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百多年来逐步被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所掌握,形成了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力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已经突破了帝国主义世界的链索,创建了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直接间接地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非拉美的许多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但十几年来又涌出了现代修正主义这一股反动思想的逆流,它的影响所及,障碍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对亚非拉美有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起了破坏作用。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日益广泛地被群众所掌握的过程,同时也是它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对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过程。一百多年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过几次大论战,这些思想斗争的物质结果,是赢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发展和胜利,赢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壮大,赢得了亚非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保卫和平运动的空前高涨,赢得了现时代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但是,要使社会主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得到巩固和发展,要使世界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取得全胜,要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还需要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长期的严肃的斗争,还需要通过这样的斗争,使得更广泛的人民群众脱离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错误观念的影响，使它们在实际斗争中掌握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论。这个斗争现在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进行的。

什么是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怎样才能掌握到这种正确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时候必须回答的认识论上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并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这就能帮助他们学会在思想上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从而也就比较容易在实际斗争中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严格按照唯物主义的原理，一致肯定：正确认识不外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革命领导者的正确认识不外是社会发展规律、革命发展规律以及先进阶级的历史要求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那些主观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那些人狂妄地以为自己的头脑里生来就有正确的认识，以为可以凭自己的主观任意制造、改变和消灭事物的规律。他们把客观实在看成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可以“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适文存》第2卷，第106页）他们常常把自己偶然的感想，把各种违背客观现实的荒谬想法硬说成是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反对那种客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他们以为在宇宙的什么隐蔽地方，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绝对精神。只等待世界上出现一个幸运地被上帝选中的杰出人物，那个绝对精神就会突然从天上掉到这个人的脑子里来，使它可以自封为真理的唯一垄断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止一次地驳斥这类荒谬的真理观，指出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只能从社

会实践中，从广大人民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中找到根本来源。正确的认识只有一种，即总结了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经验，又在实践斗争中获得证明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从他领导中国革命的最早时候起，就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错误认识观点，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有些同志的“以感想代替政策”的错误思想方法，提倡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提倡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在对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并且结合着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认识论。抗日战争开始的一年，毛泽东同志把以前领导革命斗争的认识经验和政治思想斗争经验作了哲学的总结，写成了《实践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宝库贡献了一篇辉煌著作。

《实践论》全面地阐明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在思想和工作中掌握这个规律，就有可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克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就能克服那种脱离本国革命的实践、简单搬弄书本词句、或者盲目的拾人唾余、以指挥棒代替真理的教条主义；也能克服那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把个别现象甚至虚构的假象夸张成事物的全体和本质的经验主义。《实践论》以及和《实践论》同时写成的《矛盾论》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整风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家知道，整风运动使中国党的广大干部在当时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这个基本方向，使全党在毛

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从而推动中国的民主革命在短短的四五年中间就获得全国胜利。

由于无产阶级、共产党掌握了坚强的领导，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在中国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十三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新的时期里又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事实证明，取得这些胜利的过程，也是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一次又一次反复斗争的过程；是党中央和广大领导干部在实践斗争中一步比一步更深入更具体地认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把这些正确认识贯彻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思想和行动中去的过 程，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所阐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不但在民主革命斗争中，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仍然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理。结合我们当前的斗争，认真学习《实践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掌握这个科学的认识论，仍然是提高我们工作和斗争的自觉性、有力地向前推进我们的事业的根本方法之一。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认识论问题上不但坚决反对唯心主义，而且也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旧唯物主义承认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承认正确的认识就是人们在思想上恰当地确切地把握了客观事物的

发展规律,这些观点都是对的,这说明旧唯物主义能够正确地回答什么是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它也能完全解决正确认识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不能真正加以解决的。这是因为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没有实践的观点,不知道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在旧唯物主义者看来,人们认识世界的时候,似乎只是处在纯客观的、旁观者的地位接受外界事物的影响。他们的认识似乎可以不受他们的实践活动的任何影响和限制,因此,按照旧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论什么人,不管他们站在什么实践立场上,不管他们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封建主义的立场还是农奴的立场,不管他是革命者也好,反动派也好,是脱离生产的剥削者也好,是生产中的劳动者也好,只要幸运地一旦发现某种巧妙的方法,都可以对周围事物获得同样正确的认识。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是人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他们对周围世界认识发展程度就有所不同,不同阶级的人,对周围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并不是任何立场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同样的认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正是在于不知道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实践论》)就是指的那种情形。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科学总结,它证明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和人类的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密切联系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同上)认识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回

答：第一，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因此，它首先来自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但仅仅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还要看到事情的第二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认识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因此，它又是来自人们的实践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不是象普通的一面镜子那样，固定在一个地方，消极地把外界世界的种种印象反映下来，而是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能动地去接触外界，按照实践的要求去把握周围事物的情况。农民在生产劳动中接触工具、种子、土壤等外界事物，并一步步地了解这些事物的联系，工人在生产劳动中接触机器、原料等物质对象，由此逐步掌握这些物质的性能。工人、农民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接触地主、资产阶级，并且在这些斗争中认识这些剥削阶级的本质。不通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这些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就不可能明确反映到他们的意识里来。旧唯物主义只看到上述事情的第一个方面，而看不到第二个方面，因此，它不能完全回答人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才能全面地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把实践的观点提到认识论中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的地位，而且还在于科学地精确规定了实践这个概念的内容。以前的哲学，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也常常谈到实践的概念，但他们所把握的实践概念都是抽象的，不能真正反映人类社会实践的本质，就西方的德国古典哲学来说，康德的实践理性，费希特的自我和非我的辩证运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的历史活动，都是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用来规定实践概念的种种提法。中国哲学史上有大量的关于知和行的材料，“行”就是指实践。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王阳明提倡

“知行合一”。有人主张知先行后，有人主张行先知后。《书经》上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说法，这就是孙中山所反对的“知易行难”的思想，而孙中山则提出“知难行易”的说法。所有这些关于实践或行的议论，都只是抽象地谈到人们的实践行动，而不能指明实践所包括的具体的现实内容。这是因为过去的一切哲学派别，唯心主义固不用说，就是唯物主义也不能在社会历史研究方面运用唯物主义观点，没有找到决定人类历史行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无法证明人类实践的现实的物质的内容。马克思在谈到唯心主义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实践时，曾说：“从前一切唯物主义——连费尔巴哈的也包括在内——所含有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把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方面或从直观方面加以理解，而不是理解为人的感性的活动，不是理解为实践，不是从主观方面加以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能动的方面竟是跟唯物主义相反地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被它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有真正现实的活动，真正感性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401页）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揭示了决定人类历史活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以这些条件为基础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因此，就能正确地指出实践究竟包括一些什么内容。这些内容就是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人们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人的认识主要是依赖于生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说：“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

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实践论》）毛泽东同志又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同上）因此，生产和阶级斗争是对人的认识发展起主要作用的两种实践，而人们的一切真正知识，也都是从这两种主要实践中发源的。毛泽东同志说：“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774页）

指明了什么是人类认识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实践，这就能回答认识从何而来，特别是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认识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人们正是为了达到实践的目的，才要去努力求得有关事物的认识。人的社会实践包括人类社会生活各种各样的领域，处在不同领域中的人，有着不同的实践活动，要求不同的知识。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在社会实践中处于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对于周围事物的认识，就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立场和要求，这些不同的立场和要求，对于他们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影响和限制作用。在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的实践地位有所不同，他们的认识能力也有所不同，因此，人

们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随着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论》）

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是人类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历史的总结。它告诉我们，第一，人们对周围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的正确认识，和客观规律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正确反映，绝不是由那些偶然发现了某种巧妙方法的聪明人一下子就掌握到手，而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一步一步地完成的。对整个世界的全面认识固然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过程，就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某一方面和某一问题的正确认识也相应地需要经过一定的实践过程。第二，人们正确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还受到他们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特别是对社会的认识是如此，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大工业和无产阶级以前，人们对于自然界虽然已掌握到多少全面的科学知识，但对于社会本身却只能获得某些片面的认识，而不能在这一方面建立科学的知识体系，不能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且当剥削阶级掌握着社会的统治权，从而掌握着知识的垄断权的时候，他们还要

按照他们自己偏狭的阶级目的来歪曲社会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总要把封建制度说成是天经地义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家总要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合理的制度。这就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不但始终停顿在片面的状态，而且还形成许多错误的观念，因此，第三，决不能说只要是一个人，不管他处在什么样的实践地位和阶级立场，都有可能表现同样的明智，都有可能同样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逢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代表人物，硬说他们也能明智到爱好和平，能够放弃战争政策，放弃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略政策和对其他国家的扩张政策，能够放弃对社会主义的颠覆阴谋，甚至愿意接受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这一切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如果不是有意捏造的骗人假话，就是自己欺骗自己的纯粹幻想。在一切有阶级的社会里，人的本质和所谓的人性，都具有阶级的差别，不同阶级的人的认识，都受到他们自己阶级性的限制，只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们，只有敢于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人们，才有可能全面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才有可能对现代世界发展的规律和各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一切真正的知识和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都是从变革现实的实践中、从革命的实践中发源的。生产劳动首先就是改造自然界的斗争，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也要改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即改造社会。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包括社会主义社会，要改造社会制度，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在这里，只有革命的阶级及其革命的同盟者，才是真正愿意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阶级；反动阶级则要用一切办法来抵抗社会的改造，阻碍人类的进步。和生产劳动、革命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还有科学实验，也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

世界的革命实践。科学实验包括两种类型：第一是自然科学的实验，这是在实验室和农事试验场里、在有计划的人为的一定自然条件下，来促进某些自然界事物的变化，以便于自然科学家和农业生产的指导者精确地解决有益这些事物变化的关键性问题；第二是革命工作者有步骤地安排的改造社会的典型试验，例如土改、合作化运动、工商业改造的典型试验，社会主义教育的典型试验等等。这是要在少数选定的据点首先进行这些改造的工作，使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们取得一些基本经验，以便于进一步推广这些工作时不致发生大的偏差和错误。只有这些变革现实的实践，才是取得真正知识的根本源泉，只有依赖这些革命的斗争，才能保证获得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同志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实践论》）

只有变革自然界和社会的实践，才能成为我们正确认识的主要来源。而我们所以要掌握正确的认识，也正是为了服务于革命的实践。正确地认识世界、革命地改造世界，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立场和要求。我们必须反对象唯心主义在那样抽象地谈论实践、抽象地谈论知与行的问题，这样的谈论不能在革命的实践和反动的行为中间划清界线，也就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正确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相反地，还会在实践和认识的问题上把我们引上错误道路。

在唯心主义哲学中，发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就是滥用实践概念，以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来曲解这个概念的最典型的例子。它

的特点，就是把一切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曲解成以追求眼前利益为目的的应付环境的行为，否认改造世界的革命活动。实用主义在中国流传很久，对中国知识分子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它的代表者胡适，对实用主义所做的解释，很足以说明它的本质。胡适说：“现在我们受了生物学的教训，就该老实承认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与环境的交互行为”；“人类的经验全是一种‘应付的行为’”；“经验乃我对付物，物对付我的法子”；“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对付人类周围的环境”；“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胡适文存》第2卷，第118页）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实用主义者把人的实践全部都说成是“应付的行为”。至于这种所谓“应付的行为”是为了什么目的，胡适的答复是：“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胡适文存》第3卷，第99页）“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胡适文存》第4卷，第164页）以上的话综合起来，就说明实用主义者是用资产阶级的市侩观点来曲解人的实践活动，把它说成仅仅是为谋取眼前小利的买卖行为，根本抹杀了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改造世界的革命活动。这又是一种腐朽的庸俗进化论，否认事物的革命的突变，否认量的渐变和革命飞跃的辩证的联系，大家知道，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世界观，曾经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可耻的思想工具。

在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思潮中，当前我们应该着重反对实用主义。这不仅因为它是胡适一流的反动资产阶级代表

者用来反对革命的思想工具，而且也因为它是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为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世界观的基础。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他们把自己伪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有时也会在口头上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甚至好象也在反对实用主义，然而他们的世界观的实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实质恰恰是百分之百的是实用主义，而一点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实际上却在肆无忌惮地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内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用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用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

修正主义者在思想上的反动手法，就在于用实用主义的实践观点来腐蚀工人阶级的意识，力图引诱他们只注意一点一滴的眼前便宜，而忘记根本改造社会的远大任务，这样来出卖和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帮助资产阶级来延长统治寿命。列宁在批判修正主义的时候，曾经指出它的这个特点：“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页）列宁在这里所指出的正是最明显的实用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完全适用于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不过是老修正主义在现代新的条件下的再版，尽管具体形式有许多不同，本质上则是一致的。以实用主义、主观唯心

主义和庸俗进化论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它们共同的本质。

实用主义的反动性，还在于它在认识论上抹杀真理和谬误的客观标准，使人不能分清是非界限，甚至于把谬误当做真理。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人的全部生活都是应付环境的行为，从而人的思想也只是一种应付环境，谋取眼前利益的工具。因此，思想的正确与否，不是决定于它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规律，而是决定于它对于人们应付环境的目的是否有用。有用的就是真理，这就是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和反动性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任何一种思想只要便于实用主义者谋取眼前利益便于他们应付环境，即使是远离事实的谬论、甚至于捏造的谎言，实用主义者都可以把它叫做真理。胡适说：“杜威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和一切主观唯心主义一样，实用主义不承认有客观真理，不承认真理应该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而认为它只是一种“应付实在，适应实在”的工具。胡适又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胡适文存》第2卷，第101页）人们不难看到，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真理观，在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中有着特别突出的表现。为了向资产阶级讨好，取得他们某些点滴的恩赐，为了向帝国主义乞讨“和平”，反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确善于用人造的方法造出了他们认为有用的种种“真理”工具。一切制造谬论的手法，逻辑上的片面夸大、偷换命题、指鹿为马、前后矛盾、以至于蒙蔽真相、捏造谣言等等，都被现代修正主义者使用上来，用以制造他们大有用处的得意“真理”。就这一方面的“制造的智慧”

来说,甚至一般的资产阶级和老修正主义者都是望尘莫及的!

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在认识论上必须严格区别两种相反的实践:一种是斤斤计较个人的眼前利益,没有远大理想,反对改造世界的革命行动,对周围事物的现状采取迁就、迎合态度的庸俗、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实践。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实践,这是以不断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逐步实现共产主义世界为目的的、把目前利益和远大理想结合起来的变革现实的实践,修正主义者就是站在庸俗的资产阶级实践的立场上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就是他们的口号,在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也有的人脱离革命实践,走上资产阶级腐朽的道路,他们误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革命事业就算完成了。而不知道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只是革命的开始,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他们把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胜利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不知道还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不知道还应该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实践证明,我们只有依赖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的革命实践,才有可能和广大人民取得深入广泛的联系,才能了解他们的情况、经验和要求,才能集中他们的智慧,把他们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加以总结,才能正确认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来制定正确的工作方针、计划和办法,有了这样的正确的思想,又把这样的正确思想贯彻到广大群众的实践中去;才有可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世界共产主义事业,一步一步地达到最后胜利。

(三)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里，曾指出人们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52页）这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自然科学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人们比较能够全面地认识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些规律来改造自然界，使它服从人们的需要，但对社会本身人们却做不到这一点，那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作为一种盲目力量支配人们生活，只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人们才有可能对社会发展进程本身予以有计划的自觉的指导，这个可能性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现实，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成为现实。

但这决不是说，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自由的王国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事情决不是这样简单的，这还需要条件：第一，必须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强指导，如果领导这个政权的党不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而是受到修正主义腐蚀的党，如果原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被一些浸透了资产阶级意识的政客所篡夺，那就仍然要使社会向盲目的必然王国倒退，向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向倒退，仍然不会有恩格斯所说的自由王国。第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强指导下，还必须不断地对被打倒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残余势力进行斗争，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和各种旧社会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这样才能保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

程较顺利地进行有计划的自觉地指导，才有可能不断提高这个计划性和自觉性的水平。第三，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要实现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计划的自觉的指导，领导这个事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广大干部必须正确认识有关这个事业的各方面的客观规律，并依据这些规律，正确地制定出能够指导人民群众实现这个事业的路线、政策以及有关的一套计划和办法，但是，要正确地认识这些必然性，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实践、认识的反复过程，不能希望有什么其他巧妙的捷径，更不能希望个别天才的头脑偶然一下子就想出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人们仍然要通过实践和认识的反复过程，对客观事物的必然性一步一步地由不知到知、由片面到全面逐步达到完全的正确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暂时的摸索、部分的偏差、个别问题上的盲目性和错误常常是难免的，只有在实践和认识反复过程中逐步发现、逐步克服这些缺点和错误，人们才能够对客观事物发展的进程，给予有计划的自觉的指导。

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和在人类任何历史时期一样，人们的认识仍然必须遵循认识本身的规律性，仍然必须依赖于实践，不同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指导下，有可能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会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自觉地运用这个原理，从而比较及时地对周围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获得正确的认识，在工作和斗争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人们预期的目的，而不致于犯大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指出，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表现为认识和实践不断转化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地循环往复，一步比一步更高地推动认识向上发

展的规律，这里的每一次循环和反复，都构成一个认识过程，其中包含着两个飞跃的阶段，第一个是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在实践中，人们首先应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和外界事物接触，把外界的种种现象反映到自己的脑子中来，这就有了感性认识，又叫做感性的直观或叫做直接的经验知识，这种感性认识积累多了，这时我们就要运用思考的功夫，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方法，对已经获得的感性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在我们的认识上就会出现一个飞跃，这时我们的脑子里所反映的就不再仅仅是事物的外部现象，而能进一步把握到事物的内部联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这就是理性认识，又叫做理性思维或理论知识，也就是真正的思想，这一个认识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是由客观物质变为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变为思想的阶段。这时人们就有可能以思想的形式（包括理论、政策、办法、计划）把握外界事物的必然性。然而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究竟我们的思想是否正确地充分反映了事物的必然性，是否已经确切地把握了客观真理，这时还没有得到证明。人们的思想是否有真理性，是不能完全依靠思想本身来证明的，只有实践才能给予这样的证明。这样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变为物质、思想变为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阶段获得的认识拿到实践中去，看这些思想等等的认识能否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方的力量，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的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实践的考验，是认识的又一次飞跃。这

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这里说的也正是包含两个飞跃阶段的人类走向正确认识的基本过程。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把列宁的这个思想作了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认识世界,又在这个实践中来检验这个认识的真理性,一切真正的知识都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取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认识这个途径,自觉地遵循这个途径,遵循由物质变到精神、又由精神变到物质的这条认识路线,来掌握客观事物的必然性,为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导。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物质变到精神、由精神变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就中国的民主革命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是由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二十四年的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过程,逐步丰富、发展而完成起来的。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仍然是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关于如何高速度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全国解放十多年的认识和实践的多次反复过程,才逐步地明确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还在继续,认识和实践还会多次反复,才能使我们的认识符比较合于客观实际。因

此，无产阶级的党，必须掌握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并自觉地遵循这个认识真理的路线，以便在我们的工作和斗争中获得正确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要阐明人类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认识真理的这条正确路线。同时，也要揭露和批判与此相反的错误路线，那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我们有些处在领导地位和一般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他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是遵循正确的认识路线，而是走了错误的认识路线，他们并不懂得或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这样他们对问题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做好，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要在工作和斗争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的认识路线，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错误认识路线，就必须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使之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时期里，正是这样做的。

什么是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如果说掌握客观真理的正确的认识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以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的密切结合和互相转化为特征，那末，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的特征，就是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的互相分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分裂的路线？答复是：人的认识的某些因素脱离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这个不断循环往复向上发展的轨道，片面地孤立地发展起来，就会出现那种分裂的情况，就会走上主观

主义、唯心主义。列宁说：“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过分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又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412页）

毛泽东同志曾批判过两种主观主义的形式：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一、经验主义就是感性认识的片面膨胀，把局部经验的意义过分夸大，满足于有限的感性知识，不注意大量积累感性材料，不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由量到质的真正飞跃，从个别现象、个别感性材料轻率地简单地对问题作出一般的论断，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不问情况任意机械搬用，这就是经验主义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的路线。二、教条主义就是理性认识的片面的直线发展、死板和僵化。不做调查研究，不联系广大群众，不重视本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实事求是地找出周围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来对当前的工作和斗争做出切合实际的正确指导，相反地，简单搬用某些书本文件的个别词句，或者盲目听从国外指挥棒的号令，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把一些违反本国实际情况和危害革命利益的措施，施加到本国人民身上，这就是教条主义使主观和

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的认识路线。

前面说过,在今天我们与唯心主义斗争的时候,特别要反对实用主义。因为实用主义是修正主义者和一般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的世界观,又是一种极端反科学的唯心主义。不但如此,实用主义还为自己制作了一套精巧的貌似科学的伪装,没有彻底唯物主义观点的人,很容易受骗,而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受到它的欺骗。要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必须揭露和批判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反科学面貌。

实用主义也是一种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它以“注重事实,尊崇证验”(《胡适文存》第3卷,第100页)为标榜,夸大经验的意义,夸大局部的感性认识的意义,贬低思想的作用。在实用主义者的眼中,一切人的认识都应归结为经验,归结为“应付环境的行为”,而“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他们“把经验和思想看作一件事”,(《胡适文存》第2卷,第113页)否认思想是经验的总结,是比感性经验更高级的理性认识,否认人类通过抽象思维能够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归根结底,不论经验和思想,都被实用主义者看作为了应付环境的主观活动的产物,和客观存在的物质实际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把主观和客观的分裂在理论上推到了顶点,完全堕进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深渊。

但是,“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口号,却使实用主义取得了貌似科学方法的伪装,在这个口号下,它也规定了一条认识路线,人们如不加以分析,也很容易把它误认为科学的路线。按照杜威的提法,这个路线分为五个步骤:一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在何处;三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四决

定那一种假设是实用的解决，五证明。胡适介绍实用主义时，又把这五步简化为三句话：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第一句大致概括上面五步中的一二两步，第二句相当于三四两步，第三句相当于第五步。据实用主义者自己说：似乎人们的认识只要按照他们指出的这条路线进行，就符合于科学的要求了。

许多人被实用主义所迷惑，就因为它所标榜的这一套，在外表上很象科学的认识路线，好象也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根据调查研究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但如果把真正的科学认识路线拿来和它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这是似是而非的。

科学认识的出发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是变革现实的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不是任何一种抽象的“疑难的境地”。科学认识首先要在实践中通过感觉器官（有时要通过科学仪器）去观察周围种种有关的事实现象，并由此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疑难。这些问题和疑难是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疑难，它在实际上就应该是客观事物本身存在着的某些根本矛盾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初步反映。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自然界的矛盾，社会科学要研究的问题就是社会生活的矛盾和阶级矛盾。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所要提出的各方面问题自然是很多的，但归纳起来，不外就是属于以下范围的问题，即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如何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把落后的农业中国改造成为用最新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国防的先进国家，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在一个长时期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在革命

实践中要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是当前我们周围世界内部存在着的客观矛盾的揭露。揭露矛盾，以便引导人民在科学研究中去进一步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认识路线所要求的提出问题的原则。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实用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这个原则相反，它也需要从“搜求事实”，提出问题，提出疑难开始，但它在进行这些步骤时，不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革命的阶级斗争为依据，不是以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为依据，而是从应付环境、敷衍现状、追逐眼前利益的主观愿望出发，从一时的感想，从主观的公式等等出发，从这样的立场上搜求的“事实”，只能是被主观的偏狭目的所限制的某些局部现象。以这样的立场和事实为基础提出的问题，就不可能帮助人们揭露客观事物本身存在着的内部矛盾，相反地，却只能是把事情的一些表面的、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夸张起来，而掩盖了真正的矛盾，掩盖了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中真正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掩盖了事物的矛盾，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就不可能引导人们打开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门径，就不能真正开辟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维的科学认识路线。

科学的认识在取得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以后，就要运用思想的工夫对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使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使表面的、片面的经验知识飞跃到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是否完全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当然还要拿到实践中检验，在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以前，它在某种程度上就带有假设的性质。但科学的假设，必须是经过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的结果，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必须力求保证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而要避免主观的随

意性，这就要对事实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想上加工改造的工夫。“去粗取精”，就是要在大量的事实材料中对主要的事实材料和非主要的事实材料加以区别，而在对问题提出解决意见，进行论断的时候，要着重依靠主要的事实材料，例如研究社会的问题要着重依靠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有决定意义的材料，在社会生活中有普遍决定意义的典型材料，而不要着重枝节的事件，表面的现象，个别人物的脾性、嗜好，等等非主要的材料。“去伪存真”，就是在各种现象中把那些表现事物本质的现象和违反本质的假象加以区别，并主要依靠前者来对问题进行论断，而不要受到后者的迷惑，例如要了解帝国主义的本性，要看它是否会放弃战争和侵略政策，就要根据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实际行动和措施来下判断，要根据他空前膨胀的军事预算，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武装干涉等重大事实来判断，而不要被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冠冕堂皇的口头宣言所欺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要根据上述经过认真考核检验过的主要事实和真实现象来加以分析和综合，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由表面的联系进到内部的更深刻的联系，正确地把握到这些联系，就可以说是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这就是在科学的假设时所要求的基本原则，要做出这样的科学假设，常常也需要有大胆创造的勇气，但是，首先必须以谨严的研究作为基础，而不是把大胆摆在第一的地位。实用主义者所谓大胆的假设却和这相反，实用主义者对问题所要求的假设，实际上是把大胆作为唯一原则，这只能有主观主义的大胆假设，而不能有真正科学的假设。实用主义者虽然谈到要“细心搜求事实”，但是，这个“细心”，并不是要把主要材料和非主要材料加以区别，把真实的现

象和虚伪的假象加以区别，相反地是常常把两种相反的事实材料和现象混淆起来，把两者的意义同等看待，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着要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便于为了“应付环境”，“人造”出“有用的真理”，而“细心”利用非主要的事实来做出论断，来抹煞主要的事实，“细心”利用虚伪的假象来提出意见，来掩盖事物的本质。胡适曾在—篇关于人类历史的文章里说到一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636页）在另一篇谈研究学术的文章里，他又说道，他认为考据学者考证一个字义的成绩可以和天文学家发现一个星球的意义相等。胡适又在—篇论到旧中国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的文章里，硬把混乱的原因归之于中国自己本身的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同上，第441—442页），抹杀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存在的这些根本原因。胡适还根据帝国主义国家的某些政治宣言硬说帝国主义者再也不希望旧中国出现军阀内战，而希望中国的国内和平。这些就是实用主义者的主观主义的大胆假设的典型例子，它说明实用主义者为了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反对人民革命，怎样把自己的思想作为应付环境的工具来使用，怎样为了他们的私利，捏造出一套对他们有用的违背客观事实的人造的真理，他们的基本方法就是根据眼前一点一滴利益的需要，“细心搜求”枝枝节节的非主要的事实材料和虚构的假象，来对问题作出虚构的大胆的假设（与其说“大胆的假设”，不如说“大胆的武断”还更正确些！）。修正主义者在思想方法方面正是接受了实用主义的这个衣钵，甚至还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假民主现象，说成是无产阶级可以用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靠桥梁；抓住艾森豪威尔、

肯尼迪之流的几句假话,就把他们崇奉成爱好和平的天使;和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一个欺骗性的条约,就把它吹嘘成救世的福音。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正确观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他们却采取捏造谎言、掩盖事实真相的无耻手法,尽情地加以诽谤和诬蔑。有的时候,实用主义的“大胆假设”,在修正主义者手里已经发展成最荒谬最可鄙的法西斯式的欺骗宣传手段,而不仅仅是一般反科学的主观主义的武断了。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要求我们的认识在实现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第一个飞跃之后,接着再进行第二个飞跃:由理论到实践,即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真理性的真理性,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把握了客观的必然性,是否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经过实践的检验,坚持正确的部分、修正错误的部分,补充新的东西,使认识进一步发展。这样进行实践的检验,就是科学的求证方法。但这和实用主义的“小心的求证”并不是一回事。小心的求证也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小心的求证;一种是主观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小心的求证”。科学的求证,是要把思想拿到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去,拿到变革现实的一系列的实践中去检验;主观主义的求证,是离开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凭着主观的应付环境的需要,小心地搜求一些枝节的事实、表面的现象,来为主观主义的“大胆的假设”或“大胆的武断”找强辩的口实。主观主义的武断是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但主观主义者离开了实践、离开了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真实情况,任意拉扯一些似是而非的局部事实和表面现象,来为自己的谬论找“论据”,把错误说得仿佛成了真理,把谎言说得仿佛成了事

实,这却是他们能够做到的,而且在他们的言论中是到处可以看见的这种所谓的“求证”,实际上只是一种诡辩术,而不是什么科学的证明方法。列宁在批判修正主义的诡辩术时说:“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的这一崇高事件中,普列汉诺夫真是创了新纪录。诡辩家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但是黑格尔说得很对,人们完全可以替宇宙万物找出‘论据’”。(《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4页)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人,他们总是喜欢对问题作出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大胆武断,尽管实践早已驳倒了他们的谬论,他们还是要找某些理由、“论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这些理由和“论据”有时是掩盖了事物本质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和假象,有时甚至是完全人造的骗局;议会选票的暂时的多数、资产阶级政客的暂时漂亮的诺言,就是这种现象和假象,也是一种人为的骗局,而修正主义者就是非常欣赏这一类“事实”、“论据”并利用它来为自己的反对革命的谬论进行“小心的求证”的。现代修正主义就是这种“小心求证”的尖端的典型,是这种诡辩术的尖端的典型。我们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把实用主义的这种诡辩术作为自己经常警惕自己的反面教材!

(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人们的世界观上、在认识论上,有着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斗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

路线是认识科学真理的路线,人们的正确的认识、真正的知识都来自这条路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斗争,需要在认识上遵循这条路线;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路线是反科学的错误认识路线,实用主义是这一路线在现代世界上最流行的形式,人们思想和行动中的重大错误都是来自这条错误的认识路线。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制造反动的谎言,也利用了这条反科学的认识路线,因此,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大敌,必须坚决加以反对。毛泽东同志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永远对于我们有用的。

前面说过,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走向科学真理,取得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由物质和精神,认识和实践的多次反复过程。在未完成这个过程之前,人们的认识也可以表现某些片面性,甚至出现部分的错误,在科学认识的道路上,这种暂时的部分的偏差和错误,常常是不可免的。这种偏差的错误和那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之下所犯的错误,情形有所不同,它不是出自世界观的错误,只要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经过物质和精神,认识和实践互相转化的许多次反复,就能在认识过程中逐步发现这些片面性和错误的所在,并及时地加以克服,属于完全实现正确的认识。列宁说:“不犯错误的人并不是聪明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但错误不很重大,同时又能迅速

而容易地纠正错误的人才是聪明人。”(《列宁全集》第31卷,第17页)我们不可能做到绝对不犯任何错误的人,但一定可以做到列宁所说的这种聪明人。学会并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能做到这一点。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要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向自由的王国的飞跃”,要使我们的各方面工作都能实现有计划的自觉的正确指导,需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使他们学会善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成为列宁所说的聪明人。这就是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认识依赖于实践,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本身的认识,也要依靠实践。正确认识是发源于变革现实的实践的道理,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又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的道理,对于从来不离开课堂的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不容易真正领会的,对于具有很多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的经验的人来说,只要经过适当的学习和讲解,即使文化不高也是可以获得深刻的具体的了解的。几年以来,在我们的广大基层干部中,有脱离生产劳动的经验,也有参加生产劳动的经验,两相对比,他们就得到了一个认识论上的总结。“不参加劳动,工作就象浮萍一样,摸不到底。”“干部参加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做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象这样,依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自己亲身参加的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具体实践经验,帮助他们从中引出理论性的论断,就可能使他们逐步深入地学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路线进行工作和思考问题这个学习本身,也需要一个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

的反复过程。

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造性的发展,就是把物质和精神、实践和认识的互相转化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不是在群众运动中自发地产生,而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辛勤的科学研究工作产生和发展的。但这个科学研究的成果,归根结底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经验作基础,并且是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归根结底,仍是从群众中科学地“集中起来”,又要拿到群众的实践中“坚持下去”,使之变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伟大物质力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认识论,也是这样。它是全部人类科学发展史和认识发展史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的总结,也是能够拿到群众的实践中“坚持下去”作为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的。要达到这个目的,要使这个科学的认识论群众化,从事哲学工作和有志于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交给广大群众的人,就要在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

学实验中和群众结合。首先和群众一起学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的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经验,然后把这些亲切的经验,用生动、简明、准确的语言加以概括,或帮助群众自己加以概括,通过这样的方法,作出能够使群众喜闻乐见的哲学的讲解或文章,再拿到群众中去宣传,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交给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逐渐学会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有效方法之一。这个方法的运用,在一九五八年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中已经有过一些好的开端,目前又在一些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体会的日记和文章中有着动人的好例。这个方法值得以后继续加以坚持和发展。

一九六三年九月于青岛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 和他的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家，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自由的事业，他生前虽然没有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但他的斗争，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一切伟大的革命家都抱有某种进步的哲学世界观。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他的革命活动，也是有他的哲学世界观作为指导思想的。但是，要了解孙中山先生的哲学世界观，又必须研究他的革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坚决、勇敢的革命家。为了中国民族的解放，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他经历了四十年的奋斗，遭受过许多次失败，在一条曲折、复杂、困难的道路上摸索前进，表现了百折不挠的坚定性。

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这时，旧中国在美、英、法、日、德、俄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侵略下，逐渐沦陷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腐朽封建势力狼狈为奸，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旧中国广大人

* 这是艾思奇同志一九六四年为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非科学讨论会所写的报告稿。没有公开发表过。

民，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国家的危亡，使中国人民不断地起来反抗，先进的人士，鉴于旧制度的衰败，就向西方学习新的思想武器，来指导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他们最初都是向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学习的，其中最著名的有领导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洪秀全，提倡通过上层统治阶级实行民主改良的康有为，然后是领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目睹中国日益灾难深重，早在青年时代，即在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失败之后，他就立志要改变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开始，他也曾想走通过上层统治阶级实行民主改良的道路。他于一八九四年上书李鸿章，希望利用清政府的大官僚的力量来实行改良，挽救中国，但是，这个尝试完全碰壁了。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失败，孙中山看到了中国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意识到要依靠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无法把中国从垂危中挽救出来，决心抛弃了改良的道路，选择了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政府的方向。

于是他在一八九五年离开中国到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希望在海外华侨中找一个基地，来进行救国的工作。兴中会发表了一个宣言，斥责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危机，宣言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邻，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在会员的誓词中，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国政府”的革命口号。

兴中会成立之后，孙中山先生依靠一部分有民主思想的知识

分子,又利用民间旧有的反对清朝政府的会党组织,采取武装起义和军事政变的方式,来谋求推翻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的封建统治。一八九五年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到一九一一年三月的再一次广州起义,中间经过十六年,先后举行了武装斗争共十次之多,这十次起义都失败了。但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又爆发了武昌起义(又称辛亥革命),这一次终于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君主专制政体。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仅只是推翻了清封建皇朝,并没有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消灭。清皇朝推翻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加上革命队伍中软弱的资产阶级代表的妥协,使清皇朝的遗孽、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重新树起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辛亥革命终于又失败了。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民主革命的活动。他曾经希望取得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利用某些地方军阀力量的支持,来组织南方政府反对北洋军阀,试图以此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和反动的封建军阀怎么能够容许民主革命得到真正胜利呢?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里,这些反动势力几次组织了阴谋叛变,使孙中山先生遭受失败。这样,孙中山先生想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法挽救中国危亡的一切尝试,都完全落空了。

一九一七年俄国发生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坚持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在绝望的境地上,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看见了新的光明。他开始努力向俄国革命学习,并终于决心“以俄

为师”，放弃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走上了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人民的力量来进行民主革命的新道路。为了实现这些新政策，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他以前提出过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按照这个新解释，民族主义就是要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权主义就是要建立为平民所共有而不是少数资产阶级所得而私的民主制度，民生主义就是要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由于依靠了工人农民的力量和共产党的合作，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的生气勃勃的发展，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在世时，革命在广东就显示了很大的威力，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出现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从广东出发的北伐的革命军队取得了势如破竹的胜利，很快就打垮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当北伐军进到南京上海的时候，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举行了反革命叛变，使中国大革命遭到了暂时的挫折，但是，中国广大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经过了一个艰苦的、曲折的斗争过程，特别是经过了长时期的农村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沉重的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使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完成并发展了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孙中山先生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功劳是不能磨灭的。研究和总结他的思想和经验在我们今天也是很有意义的。

孙中山先生一生，是在艰苦、曲折、复杂的中国革命的前一段时期中渡过的。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为着求得中国人民的解放，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表现了百折不挠、斗

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孙中山的伟大还在于，在和反动势力斗争中，不仅没有被多次的失败所压倒，而且还能够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努力学习新的革命方法，继续前进。这在一切民主革命家中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活动的特点也反映了中国革命本身的特点。中国革命，由于它的特殊条件，经过了一个特别复杂的、长期的、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算起，共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获得了民主革命阶段的彻底胜利。这种客观过程，反映在人的认识上，反映在中国革命者对于革命规律知识的掌握上，也就表现为长期的摸索和试验的过程。为着这种摸索和试验，中国各民族人民曾付出了它的千百万优秀儿女的头颅和鲜血。毛泽东同志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页）这些话生动地概括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的情景。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开始，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找革命真理，经过千百重苦难，不断地在斗争中摸索，从太平天国采用西方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起，到“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止，中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漫长历程，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这一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选集》1951年版，第3卷，第795页）这个千辛万苦的思想上的长期摸索过程，和艰苦卓绝的革命的发展过程是互相照应的。

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特点，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和曲折的特点，反映了这个进步的革命家在这个复杂、曲折的革命道路上艰苦摸索的特点。孙中山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的思想有唯物主义方面，也有唯心主义方面，他的革命政治生涯中的一切积极的、宝贵的东西，都表现在他的唯物主义方面。

孙中山先生学过自然科学，原来是一位医生，他相信自然科学的成果，他特别推崇进化论。他说：“自达尔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于进化矣。”（《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1页）孙中山先生有着许多自然科学家们所共有的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相信整个自然界是物质的，人类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

进化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的先进人士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把进化思想作为旧社会必须改革的主要论据。孙中山先生也是如此，进化论思想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部分，他把这个思想应用来观察社会，相信世界是不断进步的，中国是必须进步的。这种关于社会的进化思想，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辩证法的发展观点，甚至于不能成为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它还没有指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指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但这个思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来说，也启发了他们的一种要求进步的精神，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活动也曾是受到这样的启发的。

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主要地表现在他的“知难行易”的学说里。“知难行易”学说是孙中山先生对自己的前期革命活动所作

出的哲学上的总结。

孙中山先生亲身经历了摸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而痛苦的过程，他意识到认识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困难，这使他提出了“知难”的思想。正因为自觉到认识的困难，他也就能够不断地努力向前进步，探求新的革命方法，抛弃旧的方法而不固步自封、停滞不动。从他一生的革命斗争来看，他在革命道路上通过了两次大的转变和发展：第一次转变和发展，就是从改良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即从企图依靠满清政府某些大官僚来实行民主改良，进到采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第二次转变和发展，就是从依靠少数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秘密会党及军队士官举行武装起义和政变，进到依靠最广大的工农群众进行武装的人民革命斗争，也即是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到新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在这些转变的过程中，曾经和旧资产阶级队伍中代表妥协、保守倾向的人们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辛亥以前，反对立宪派、保皇党，辛亥以后反对同袁世凯北洋军阀妥协，和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时又反对西山会议派）。就这样，孙中山先生在每一次革命失败之后，就毅然抛弃实践中已证明无效的旧的革命公式，进一步探求新的革命方法，这使他能够不断前进，逐步接近完全正确的革命道路。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哲学思想，就有着极其可贵的、进步的唯物论的因素，有着符合科学的、能够反映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的因素。这个因素使孙中山先生对于新事物、新知识始终保持不断追求向往的精神，而在革命斗争中始终保持着不向敌人妥协，不在失败面前灰心丧气的坚毅精神。这是在他以前和与他同时的许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远远不能比拟的高尚而伟大的品德。

孙中山先生说：“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则渐即于老朽颓唐，灵明日铄，是以智之反面则为蠢，为愚。”（《军人精神教育》）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思想，这个思想说明人的“知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不是什么聪明人的头脑里生来就具备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思想，说明人类的认识要跟着事物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能停止在任何一个旧的立脚点。这个思想在孙中山先生的世界观的基本的积极的方面，是他思想中的精华。正是由于有着这个可贵的思想，才使他能够由一个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走上和广大人民联合的道路，使他在中国革命和对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某些重要问题上，得出了同中国共产党基本一致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说过：中国共产党“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论人民民主专政》）“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是孙中山先生对自己一生革命经验的最高的总结。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这个经验得到了大大的丰富和发展：说要“唤起民众”，这就是要在国内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经过武装斗争的道路，摧毁和打碎反动的国家政权，达到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说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就是要联合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

上面就是“知难行易”学说中的进步精神和积极因素。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个学说还带有某些消极的因素。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是十月革命前写的,他是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立场和观点,来总结自己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因此,这个学说基本上没有超出旧的资产阶级启蒙哲学的范围。它具备着启蒙哲学的进步方面,那就是对于世界的一般的唯物论的理解,对于科学的客观的合理的知识的重视。但它同时也有启蒙哲学的弱点,那就是对于社会和革命的认识,不能贯彻唯物论的观点,而终归是唯心论的观点。

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不能从物质的经济基础上去看社会的变化,不能依据社会阶级的科学分析方法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因此,他对于自己的革命经验所摸索到的结论,既有着正确的肯定的东西,也包含某些错误的消极的方面。他对于辛亥革命的估计是:在破坏方面已经成功,只差建设方面还需要努力,却不知道,辛亥革命仅只推翻了满清皇朝的君主政体,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根本没有被动摇,既没有把封建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也没有剥夺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和经济企业。辛亥革命既然没有动摇旧的经济基础,因此对于旧社会的破坏,从根本上说也并没有成功。经济上的破坏既没有成功,那么,政治上的破坏也不会真正成功: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统治,实质上仍然是建立在旧经济基础上的、披着共和国外衣的变相的君主专制政权。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孙中山先生把它的原因单纯地归结到人的“心”的问题,单纯地归结为人们对于革命的道理“‘知’与‘不知’之故”。事实是,辛亥前后革命所以不成功的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坚强的革命阶级作为基本的动力,是由于革命所依

靠的只是一些软弱、动摇的资产阶级分子，是由于他的革命营垒中混入了许多反动阶级的军人政客和这些家伙的破坏行为（这些反动分子之所以要破坏革命，并不是由于不知道革命，而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使他们一定要反对革命）。总之，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旧民主主义的道路不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工人农民群众）共同起来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法与纲领已经过时，已经无力，并不是由于人们“不知”这一套旧方法、旧纲领的缘故。

“知难”思想的消极一面，就是过分夸大“知”的困难，以至于认为广大群众与知识无缘，只有少数贵族、某些高级知识分子才能掌握正确的知识。孙中山先生把人们分为三类，第一是“先知先觉”的人，这是极少数的人，其次是“后知后觉”的人，这也是比较少数的人，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则被看做是第三类“不知不觉”的人。这个片面的观点，使孙中山先生在他四十年的革命活动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始终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相脱离，相隔绝，误认为只有少数的政治上层人物才能作为革命的依靠。直到他的革命生涯的最后两三年，由于和中国共产党联合、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才逐渐认识到“唤起民众”的必要。其实，把人民群众看做“不知不觉”者，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的广大人民，通过他们在旧中国所亲身遭受的苦难，完全能够知道革命的必要，知道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必要。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他们对这种必要性的认识，比许多上层人物还了解得更深刻，感受得更真切。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广大工农人民不仅仅能够一般地知道革命的必要，而且当他们一旦被发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时，他们也能学会各

种各样的具体的斗争方法，他们不但懂得劳动生产，而且也能学会武装斗争、管理政权，能够根据他们所熟悉的周围条件，创造各种新的工作和斗争经验。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必须常常向群众学习这些新的经验，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集中，再用之来指导群众的斗争，这样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事实是和孙中山先生的观点相反，人民群众才是先知先觉者，向群众集中他们的经验的领导者，则是一定意义上的后知后觉者；而脱离人民群众、用主观主义的方法来指导工作的所谓领导人，恰恰是不折不扣的“不知不觉”者。

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不知道有这样的唯物辩证法：革命指导者应该既是群众的学生，又是他们的先生。领导者只有向人民学习，才能体会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才能吸取他们的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是给人民当学生；领导者将人民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思想、感情、要求总合起来，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化为集中的有系统的理论、纲领、方针、政策、办法，再拿了去向人民作宣传，并使之见于行动，这就是向人民当先生。只有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孙中山先生强调当先生的一面，不知道当学生的一面，所以陷入了历史唯心论的观点。

“知难行易”学说对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也是解决得不正确的。

所谓“知”“行”，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解释，“知”就是认识，“行”就是实践。认识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而这种反映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所以认识首先是实践的产物，其次是实践的指导，同时又须受实践的考验，并在实践中发展。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或“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是在实践或“行”中产生的，即在广大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形成的。人们在实践中，通过眼、鼻、耳、舌、身和客观事物接触，于是产生了感性认识或经验，感性认识只能反映事物的表面的、片面的现象，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人们的思考能力把感性认识作为基础，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使自己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样就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规律性，这就是认识过程或“知”的过程的第一个飞跃，也即从实践到认识，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认识过程还有第二个飞跃，即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就是把在实践中取得的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

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里没有这种完备的知行统一观，没有明确肯定“行”是“知”的基础，特别是没有看到“行”即实践的主要内容，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而一切认识或“知”的根本的来源，乃是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变革世界的实践。那怕是领袖人物、英雄豪杰，科学专家，他们的“知”他们的对事物的认识、思想、观点，他们对于工作和斗争的意见、办法等等，都是直接、间接从这三项变革的实践中，归根结底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中发源的，他们的功绩，只在于把这些经验材料作了进一步的思想的加工，使它由比较分散、片面、缺乏条理性、综合性的、只能反映事物的局部现象的认识，集中成

为有条理性、综合性的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真正革命的领导者，只有善于通过这样的道路，不断地把人民群众斗争中的经验加以集中和总结，才能保证经常把握正确的领导思想，才能把领导工作做得很好。“知难行易”学说看不到领导和群众的这种有机的联系，片面地把领导人说成是“先知先觉”，把群众说成是“后知后觉”，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的观点。这是“知难行易”学说的消极方面，这个消极方面后来曾被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集团加以利用、歪曲和夸大，用来制造出他们的一套法西斯主义哲学，即所谓的“力行哲学”。这个法西斯哲学的基本思想，就是硬要人民承认自己是完全愚昧无知的蠢材，他们决不应该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行动，而只应该诚心诚意地、也就是盲目地追随那些自封为“先知先觉”的法西斯统治者，如蒋介石之流的人物。这个法西斯主义的“力行哲学”，实际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相勾结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人民、反对革命和反对领导人民革命的共产党的愚民哲学。

我们指出了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的这些弱点。这丝毫也不是要贬低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作出过的辉煌贡献。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已做了在他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业绩。他的学说的这些弱点，只是反映了他的一生革命活动所受到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认识了这一个限制，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新的革命时期学会超出这些限制，正视和研究这些弱点，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思想和工作中善于避免重复同样的弱点。所以，孙中山先生的学说的消极方面，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可供我们学习的一部分历史财产。

还应该再强调的是，“知难行易”学说是在俄国革命以前形成

的，它的弱点，主要表现为旧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弱点。因此，这些弱点，当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并且联系了革命行动的新方法之后，就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所克服了。例如在改组国民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检讨过去的失败经验，已不再认为主要是革命党人“不知”的缘故，而肯定是由于国民党内有反革命分子“能乘隙以入”“卒至破坏革命事业”的缘故。又如在他的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的政策，他的临终遗嘱里提出了“唤起民众”的主张，则是在实际上把他的脱离群众的关于“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唯心主义公式基本否定了。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和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一切进步和积极的因素，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才能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而其消极的方面和唯心主义的弱点，也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和思想中才完全克服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中国来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指出辛亥革命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和帝国主义相结合的封建制度的仍然存在，因此，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推翻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接受了这个纲领，使他的三民主义充实了新的内容。根据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一部分是大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他们已成为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反动势力，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要求，但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很软弱，不能成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强的力量，要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主要地必须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尤其是依靠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这一个思想的某些要点，在改组

国民党后规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走上一个新的阶段，获得了真正坚强有力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个结合过程，也就是跟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和工农群众、广大人民的斗争经验的结合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和广大的人民在一起，发动人民积极斗争的精神，并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从群众中学取领导革命的知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者，决不以唯心论的“先知先觉”自居，坚决反对把人民群众看做“不知不觉”的愚氓，共产党人相信广大人民群众有着伟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肯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1951年版第3卷，第1053页），才是一切真正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力量主体。同时，共产党人又知道，人民由于长期处于反动统治下面，造成了文化落后，而人民的意见与力量又是分散的不集中的，所以，人民迫切需要有自己的政党，自己的领袖，自己的先锋队。这种政党、领袖、先锋队，不是高居于人民之上，而是处在人民之中，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向人民学习，又教育人民。这样的政党、领袖、先锋队，在中国的革命中就是中国共产党。

今天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伟大成就已充分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的结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中国人民的命运的结果，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和思想中的积极的东西，已经在更高的阶段上和千万倍光芒的情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道路上，领导中国人民克服了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重重困难，打倒

了北洋军阀，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在这个政权领导下又完成了土地改革，打败了侵略朝鲜的美帝国主义，在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的基础上，又继续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并且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个贫穷落后的、受人欺凌的旧中国，已经造成为一个前途灿烂的无限美好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伟大事业，都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到了今天，事实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才是唯一能够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不断引向胜利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一九六四年四月）

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 秘密的理论武器

我对自然科学没有专门研究，但很愿意向自然科学界的同志们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必须密切结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也要重视自然科学的成就。自然科学家们把自己的专业方面的新发现、新理论介绍出来，可以帮助各方面工作的干部和群众增长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对研究哲学的同志也有很多益处，使他们有可能依据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来加深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解。

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的文章，从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粒子”理论方面，阐发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很有价值的思想。

唯物辩证法不但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也是探索自然界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自然科学的每一次新的发现和新的进展，都使唯物辩证法获得新的证明或发展。形而上学思维总是力图把科学上的现有成就解释成最后的东西，而科学上的每一新的进步都使这种企图宣告破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的可分性是无限的，宇宙的发展和人的认识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由原子理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历史，一次比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真理，粉

碎了与此相反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

坂田等理论物理学家的成就向我们证明，自然科学家们如果能够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将有可能加快他们工作的进展。日本的理论物理学家研究基本粒子的历史本来是比较短的，但他们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成就。坂田等几位科学家能够把唯物辩证法用到自己的工作中来，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事实，有说服力地驳倒了那种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科学研究的观点。

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但是，正确的思想指导，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曾经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到了现代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的腐朽，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表现出畸形化的状态。资本主义的国家的自然科学的这种发展过程，还常常受到主观方面的思想条件的障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界，也象在其他领域一样，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总是居于统治的地位。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广泛地影响着自然科学的研究，特别是理论自然科学的研究。主张哲学无用论的人们，不承认自然科学家的思维活动不可避免地总要受到一定哲学世界观的影响，或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实际上，不受任何一种世界观的影响的人是没有的。主张哲学无用论的人，他们自己的观点，往往就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特别是同“实证论”的观点密切联系着的。“实证论”的观点实质上是披着“科学”外衣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广泛流行的一种反动的哲学观点，它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严重的思想障碍。

象坂田昌一这样的自然科学家，能够打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传统的束缚，和流行欧美的“实证论”断然决裂，和资产阶级哲学断然决裂，自觉地拿起唯物辩证法这个真正科学的武器，这是十分可贵的。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比资本主义社会远为优越的社会条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其他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一样，都应该出现资本主义社会所不能比拟的巨大的跃进速度。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提出多快好省的要求，是有充分的根据的。中国十几年来来的历史证明，一个原来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一旦有了无产阶级专政，认真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就会以惊人的步伐迅速走向先进的地位，就会给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极为广阔的天地。

但是，有了优越的社会条件，还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技术工作才能更加顺利地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科学工作者如果不能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也完全有可能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各种反辩证法思潮的影响，从而阻碍科学工作的进步。

我们的党和毛泽东同志曾经不断地号召各方面的工作干部，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要把哲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广大革命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这个号召在国内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深入人心。近几年来，我国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在各个科学领域包括一些尖端的科学领域中，取得了很多成就。这些成就，都是同他们日益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分不开的。尤其值得高兴的是，近几年来，越

来越多的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技术人员和普通工农群众，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启发了自己的智慧，能够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各种矛盾，突破生产技术方面的许多旧框框，不断地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自力更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也就变成越来越强大的改造世界的力量。毫无疑问，只要循着这个方向前进，不要很长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攀登上科学的高峰，把我国科学技术提高到现代化的先进水平。

（一九六五年八月《红旗》杂志第九期）

人类认识的总规律*

在《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两篇文章中,关于认识的总规律,是从两方面来表达的。毛主席在《实践论》的最后一段话中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认识的基本过程,是两个飞跃;但是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就不只是两个飞跃,总的说,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地循环往复,没有止境,每一次往复,都使人的认识更提高一步,每一次循环,都更丰富、更深刻。有没有尽头?有没有一个最后的认识?没有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有一个最后的认识。任何时候,人的认识总是可以发展的,人的认识不能停顿。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认识已到顶,那就是形而上学,有了这种认识的人,就没有出息,就不能前进,就没有前途了。

这个总规律,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里又加了一个

-
- *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艾思奇同志先后在中央高级党校内部和校外许多单位,作过多次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这里发表的是他的《学习〈实践论〉辅导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前面三部分的题目是:一、两条认识路线;二、认识依赖于实践;三、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这个稿子是根据他在中国文联讲课的速记稿,并且吸收他在高等军事学院、总参等单位讲演中的一些内容整理而成的。为力求保持原来面目,除删去一些明显不合适或重复的段落,作一些文字加工外,未增加任何观点。

内容,就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也是认识的总规律。这是对《实践论》提出的总规律的一个补充。《实践论》只是讲,一般人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任何时候没有尽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里又补充了一段,就是对一个正确的认识来说,也可以相对地有一点尽头,就是经过多次实践,可以得到完成。

认识的总规律,也表现在毛主席最近讲的一段话中,这段话,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过:“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世界上任何时候都是有矛盾的,阶级社会中有矛盾,阶级消灭了,还有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有矛盾,就要解决,解决了矛盾,就前进一步;矛盾解决了,还会有新的矛盾产生,还要再解决,再前进。有矛盾,就有问题,有问题,就要解决,解决了问题,就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我们党中央在1963年底提出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自己的认识到头了,生产到顶了,不能发挥潜力了。这些观点都是形而上学,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规律的。

人的认识是不断前进的,要相信这一点。但是,问题是在你能不能经常参加革命实践,经常参加革命实践,你就可以经常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每一次实践,来一次认识和实践,思维和存在的互相转化,你就可以前进,每次反复,都可以有所前进。毛主席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大家看看他的著作,从《毛泽东选集》第一篇

到最后一篇,思想不断地发展,《毛泽东选集》是按历史实践的年限来编的,在历史的反复中间,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的著作还没有全部出版,但是毛主席的思想发展,我们是很清楚的。

我们对民主革命的认识是经过几十年才完成的。党由1921年成立,最早到1935年遵义会议,全党开始承认毛主席领导、毛主席思想的指导,经过十几年在全党主要干部思想上基本上完成了这个认识;到1945年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全党在毛主席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全党从1921年到1945年,经过二十多年才完成了对民主革命的认识。完成了这个认识,对全党起了极重大的作用。1945年开了七大,1949年全国就解放了。对民主革命的正确认识完成了。正确的认识为全党掌握,为人民掌握,就形成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已经有了许多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农村、工厂在发展。原子弹爆炸这样快!世界上有些尖端的产品,我们也做出来了;其它各方面也将赶上世界水平。现在是个别的,将来会变成普遍的。艺术上也是这种情况。艺术上也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不断总结。一个认识、一个创作都是要不断在实践中反复。我们现在的戏,就是要反复的修改,这也是符合认识的总规律的。

由前面讲认识过程的问题,自然就提出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问题,这跟总规律有关系。所以,也很容易解释。有的时候觉得很难,实际上不太难。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所认识到的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

对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这样。

所谓相对真理，就是讲人的认识受历史的限制，人在一定的世界发展阶段，只能认识这个阶段所能够认识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天才，但是他们没有接触到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对抗非对抗的问题，列宁只说过一句话。这说明他们即便是这样的天才，认识的东西也是相对的，只能认识到历史条件允许他们认识的东西。他们认识的东西不少，《列宁全集》那么多卷，可是是相对的，因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所认识的真理，在那个历史时代又是最正确的、最全面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的发展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最正确的。所以是绝对的。什么叫绝对真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情况的真理就是绝对真理。承认客观真理就是承认绝对真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都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斯大林就差一点，有一部分著作有错误，那就不是真理。但是，斯大林主要的东西还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

马、恩、列、斯的认识，毛主席的认识，只能是又绝对又相对，不能纯粹是绝对真理，因为它是客观真理，所以是绝对真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不断发展的，没有一个时候停顿，所以又是相对的。这两方面实际上是一件事，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是永远发展的。从客观真理这方面来说，人总是可以用科学的办法把握客观真理。从客观真理永远是发展的来说，个人永远没有办法把握全部客观真理。即便是最高的天才，也只能把握绝对真理的一个发展阶段。所谓相对真理，就是指个人所把握的真理是绝对真理的一个阶段。所以，相对真理是绝对真理的一个部分，不能完全分开成两个东西。从一方面讲，它是绝对真理；另一方面，它只是一部分，是无限发展

的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又是相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都是有阶段性的,每个阶段都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纯粹的、最完全的绝对真理,人有没有可能把握?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不可能靠一个人或一代人来实现,要靠整个人类无数代人不断继承下去。因为每一代人所了解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因为是它的一部分,所以也是绝对真理。

客观真理的本身,人的认识内容(只是内容),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在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许多自然科学的例子,有的举社会科学的例子。比如声波的频率,每秒钟130次就能听见,是不是绝对真理?又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是绝对真理,还是相对真理。这两个例子还是可以说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为什么是相对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当然是正确的规律。但是,它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只能适用于人类社会,所以是相对的。你不能讲自然界,比如蜜蜂,没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蚂蚁也没有这个问题。它只能应用于人类社会,所以是相对的。为什么是相对的?它是宇宙物质发展到人类阶段才会出现的规律。没有这个阶段以前,就没有这个规律。将来会不会取消这个规律,这就不能下判断了,这是几万万年以后的事情。只要人类存在,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矛盾还会有。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几万万年以后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没有出现以前没有这个规律。这个规律对整个宇宙来说,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规律,所以是相对的。但是这个规律又是绝对的。为什么?只要宇宙中存在人类,就一定有这个规律。如果地球以外的某个星球上,也有人类社会的这种

组织,就一定也会有这个规律,所以这个真理是普遍的、绝对的。任何一种规律都是这样,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拿一个最平常的例子讲,水到摄氏一百度就要沸腾。这是个规律,是不是绝对的,有没有一点相对性?你要到珠穆朗玛峰,就不是这样。在西藏高原上,水到六七十度就沸腾了。所以是相对的。可是,这个规律又有绝对性,不管宇宙哪个地方,只要那里有一个大气压,水一定要到一百度才沸腾。不管是在火星、地球,也不管几十万万年以前,或者几十万万年以后,只要有一个大气压的条件,永远都是这样。不能把这只说成是绝对的,也不能只说成是相对的。一种规律总是一定条件下的规律,这是它的相对性;有了这个条件,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就可以出现,这就是它的绝对性。一般的社会规律、自然规律都是这样。

有的同志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绝对的。因为在现在的条件下只能绕太阳转。但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在宇宙中只是几十万万年以内的事,所以又是相对的。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宇宙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规律,不到这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都不行。凡是规律都是有条件的,所以是相对的;有这种条件,一定出现这个规律,所以是绝对的。因此,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

还有一些最普遍的规律,比如对立的统一,一切事物都会发展变化,这些算不算纯粹的绝对真理?也还不能这样说。就它们是最普遍性的规律这一点来说,是绝对真理,是无条件的。到处都是一分为二,所以,它的绝对性大一点。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世界上的矛盾(一分为二),都不是抽象的,没有纯粹普遍性的东西存在,任何一个事物里的矛盾都是具体的。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固然是矛盾,可是它是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不是人民之间非阶级的矛

盾，和动物的生存竞争矛盾也不同。对立统一规律总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存在一个纯粹的、抽象的对立统一规律。普遍的东西不会独立存在。比如人的概念，有老人、小人，男人、女人。能不能找到一个既不是男、女人，也不是老、小人？这是找不到的。当然，也有个别的是不男不女的，但是也有老小的区别。这是人的自然特征。如果讲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人，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人，二者必居其一。所以，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找到纯粹的对立统一。这些规律显然是最普遍的，但是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一定的特殊的形式。毛主席说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就是这个道理。找普遍性总是在一个一个的特殊性中去找，把它们共同点概括起来就是普遍性。普遍性包含在一个一个具体的特殊性里。对立统一规律的绝对性很大，是最普遍的，但是实际出现在世界上还是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的对立统一规律又是具体的。以前，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研究矛盾，是人民和封建地主、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现在我们研究国内矛盾主要不是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主要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还有人民内部矛盾。所以，矛盾规律的表现也是有条件的。凡是真理，本身既是有条件的，又是绝对的。真理本身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人的认识也只能按照它的特点去认识，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普遍性固然是绝对性的一个表现，但是普遍性不能独立存在，一定要寄托在一定条件下的特殊性里。所以，任何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实际表现出来，都是有条件的，都是相对的。相对真理是整个宇宙绝对真理的一个部分。

人类能不能把绝对真理完全认识得一千二净，能不能穷尽绝

对真理？我们的答复是不能穷尽的。人类世代传下去，知识会不断增长，但是要穷尽世界，从此不用思考，这一天是不会有。为什么？因为客观世界的发展不会穷尽，宇宙不会穷尽，因此人的认识不可能穷尽。客观世界不能穷尽，主观认识怎么能够穷尽？有人问：绝对真理人能不能认识？绝对真理可以认识，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认识，如此无限发展下去，就能越来越多地认识绝对真理。但是，要把绝对真理认识得一干二净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绝对真理在现在的世界上根本没有出现。比如人类没有出现以前，就没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规律。即便是“神仙”，也不会发现这个规律，因为世界上没有。世界上有了，而后才能认识。共产主义社会有些什么规律？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只知道一个方向。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知道这个方向。这只是一个大体上的估计。人对将来的认识只能对大体的趋势作一个估计。马克思研究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知道矛盾斗争的结果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将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有些什么具体规律，马克思搞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比马、恩、列、斯的认识多了一点，确实弄清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过渡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斗争等等。但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究竟还有些什么规律，我们认识不清楚，只能把现在能够认识的规律最大限度的摸清楚。我们能够估计到将来大体的发展方向，因为客观事物有这样一个趋向。抗战的头两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就把抗战八年的大体过程估计到了。这是因为抗战八年的过程和抗战头两年的矛盾有联系。现在没有出现的矛盾，我们就不能估计。所以，要完全穷尽绝对真理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天比一天认识得更多，要接近绝对真理，这是可能做到的。

有同志问，战争规律有没有阶级性？这个问题跟真理有没有阶级性差不多是一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的。我的了解是这样：真理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即客观存在的物质规律，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客观规律本身没有什么阶级不阶级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事实。阶级性的问题是在这个规律反映到人脑里的情形下才提出来的，是讲对立规律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这就要涉及到阶级的问题。因为这不只是客观事实问题，而是客观事实被人掌握的问题，所以就要谈到阶级性问题了。

真理，从内容来讲，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的主观意识不能任意改变它，你要想它不那样不可能。帝国主义一定要垮台，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世界一定要发展，妇女一定要生小孩，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从真理的客观内容来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不为阶级意志所左右的。另一方面，真理又有阶级性。真理也可以一分为二。从真理的认识和运用来说，是有阶级性的。人们对真理能掌握多少，是受阶级影响的。运用也是如此。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所不同。可以说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的人都可以掌握。例如物理学、化学，资产阶级可以掌握，无产阶级也可以掌握，可以做为是一门学问、一门理论来全套地掌握。自然科学是自然界规律的系统反映，是自然科学的真理，人认识了才叫真理，人不认识就叫客观规律。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因为各阶级都可以系统地掌握它。所谓掌握，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能够认识它，一方面又能利用它为自己的阶级服务。掌握不是认识就完了，要掌握它就是要拿到手里能够用它为什么目的应用，为自己的阶级服务。比如原子弹，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可以认识，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也可以认识。区别

在于愿意不愿意认识,这些是受阶级利益影响的。自然科学知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需要,但是也可以分析。有些自然科学,资产阶级不愿意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自然科学要求的程度是不同的。资产阶级考虑它的利润,有些发明创造妨碍它赚钱,他就收买发明权,放置不用。但是,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基本上是没有阶级性的,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科学才有阶级性。自然科学的运用是完全有阶级性的。原子弹,我们是用于防御,资产阶级用于讹诈侵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在认识上就有阶级性。所以,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有一点有阶级性,就是各阶级掌握自然规律应用的方向可以不同,各阶级是按照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来应用的。这一点要讲清楚。如何掌握自然科学,并应用在什么方向上去,就这一点来说,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社会科学就是社会科学真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社会规律作为客观事实来说,其本身也是无所谓阶级性的,但是,这个事实反映成人的思想,就有阶级性了。所以,社会科学真理本身是有阶级性的,它和自然科学不同。因为社会科学不是每个阶级都能同样系统的掌握的。譬如《资本论》关于经济学的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不能掌握。他可以掌握资本主义社会某一部分、某一个方面的规律,在不妨碍它的阶级利益方面,还可以发展它的科学。但是,象资本主义的总规律,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对于资本主义这样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就不能掌握。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利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材料,肯定了他们一些对的东西,但是他那个体系跟资产阶级的根本不同。所以,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各种反动阶级,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不能完整地加以掌握。部分地他觉得对他有利的还可以掌握。例

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演变这方面的规律，美国的杜勒斯就认识到了。现在美国对苏联、东欧国家的政策是杜勒斯制订出来的。杜勒斯是资产阶级很厉害的政治家，他看出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用和平演变的方法来把它搞垮。有这一方面的规律，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规律，只是一个方面的规律。这方面对他有利，他就会掌握。至于和平演变虽然会出现，但是一定会被克服，这一点他不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他不承认这个规律。他总是往他那一方面想，认为资本主义总可以保存下去。

战争规律也是这样。客观事实本身无所谓阶级性不阶级性，但是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变成学问、变成理论，就有阶级性了。我们有我们的毛泽东军事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资产阶级不能掌握。我们掌握的军事科学有些东西资产阶级军事学里也有，例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封建时代就有人懂得。这是军事规律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部分的东西有时资产阶级也是能掌握的，不过掌握的深度有不同（我们的知己知彼用得很彻底，因为我们有人民，特别是知彼这一点，任何阶级都赶不上我们）。但是，一个战争规律体系，成为军事理论、军事科学，这就有阶级性了。毛主席的军事科学只能由无产阶级掌握；十大军事原则只有我们能够掌握，资产阶级知道了也不能掌握。

关于认识的总规律就讲这一些。

《实践论》的部分，讲完了。让我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主要是这几个问题，其它问题不是主要的，不必着重去研究。学习了这两篇文章，只要抓住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认识的总规律这三个主要问题应用到工作中就行了。其它问题，如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

就是认识无止境的问题。这是包括“认识总规律”中，了解了认识的总规律，就了解了这一点。

(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共中央党校《探讨》
杂志第二期)

艾思奇年谱

1910年3月2日(生辰)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

1912年(2岁)

随母从腾冲迁居昆明。

1914年(4岁)

入幼稚园。

1917年(7岁)

入私塾。

1919年(9岁)

因祖父去世,跟父母回和顺乡半年多,年底回昆明仍读私塾。

1921年(11岁)

入国民小学插班读四年级。

1924年(14岁)

到父亲政治流亡所在地香港。进广州岭南大学香港分校(教会学校),读小学高年级。艾思奇父亲李子杨,原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攻读经济特科,系孙中山同盟会会员,曾是蔡锷的护国军秘书长。后因反对新军阀唐继尧被迫流亡香港。艾思奇从小受到其父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哲学知识的熏陶。

1925年(15岁)

在香港读书一年后,因经济困难,偕同弟妹返昆明。随后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

1926年(16岁)

在学校受进步教员楚图南、陈小航和共产党员李国柱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的学生运动,曾与进步同学张克诚办工人夜校为军火工厂与造币厂的工人补习文化,时间约两年,校址设在天君殿,后因参加纪念“五卅惨案”支援

“三一八惨案”的游行等，险遭军阀逮捕。

1927年(17岁)

年初，乔装出走到南京大哥处。他大哥李生彦在东南大学专修西洋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学生会负责人。其时，正是北伐战争期间，军阀孙传芳到处抓人，李生彦闻讯逃沪，艾思奇被捕。经宗伯李根源（曾任黎元洪政府内阁总理兼农商总长）交涉，保释出狱。不久，即赴日本东京求学。从1927年春至1928年春，在日本学习日语，补习功课，并自修德文，参加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钻研了黑格尔的《逻辑学》等。后因国内发生济南惨案，中共东京支部发起留学生归国运动以示抗议，也因当时生活艰苦和用功过度，得了胃病，于是返昆明。

1928年(18岁)

春季回到昆明，这时军阀唐继尧已垮台身死，龙云夺得政权。艾思奇的父亲出任云南“殖边督办”。大哥李生彦也回昆明，在一所中学任教，并兼云南《民众日报》副刊主编。艾思奇从日本秘密运回许多日、德、英等文的马列主义经典原著，利用养病时间，抓紧阅读，并为《民众日报》、《市政日报》副刊投稿，还将一些革命歌曲带回昆明，并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交给聂耳在昆明教唱。

1930年(20岁)

病愈。再度赴日。在日本预备了半年，秋季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岗高等工业学校。经过刻苦自学，掌握了日文和德文，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反复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以及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等许多著作。经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终于使自己的世界观有了根本变化。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宇宙人生的科学道理，但古代哲学很玄妙，都说不清楚，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和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他还用这些认识批判了他曾相信过的父亲的“工业救国”主张，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作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

1931年(21岁)

在福岗学习一年半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和许多同学一样，激于

爱国义愤，毅然弃学回国，于年底返回昆明。

1932年(22岁)

到达上海，本想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留学，因无法获得经费而作罢。他拒绝了父亲让他回云南当“殖边督办”的秘书的要求。8月，经留日同学郑思群等介绍，到上海福建华侨办的泉漳中学教书。

1933年(23岁)

泉漳中学在党的领导下再度闹学潮，遭国民党查封。艾思奇失去生活来源，在极端困难中，写成了第一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和辩证法》，发表在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办的《正路》创刊号上。后经杜国岸同志介绍，加入“社联”。从此走上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此后，写了不少文章，如《二十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等，批判了剥削阶级所奉行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1934年(24岁)

经“社联”安排，由共产党员柳湜介绍，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他写了许多“读书问答”在《申报》读书问答栏发表。由于这个阵地能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应了广大群众的需要，影响迅速扩大。

11月，为满足群众的要求，《读书问答》从《申报》中分出，创办了半月刊《读书生活》杂志。由民主人士李公朴主编，柳湜、艾思奇、夏征农任编辑。他在这时撰写《大众哲学》，原题《哲学讲话》，在《读书生活》上连载二十四期，1935年底结集出版，初版书名为《哲学讲话》，第四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在解放前印行了三十二版。

1934年下半年起至1935年，还在陶行知办的山海工学团讲哲学课，听众是工人和失业、失学青年等。

1935年(25岁)

10月，由周扬、周立波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全国救国会和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他除担任《读书生活》编辑外，还积极参加了这些团体的工作。

1936年(26岁)

夏季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参加的有章汉夫、于光远等二十多人。这个时期除撰写一些关于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文章外，还写了一些科学小品，如

《孔子也莫明其妙的事》、《由爬虫类说到人类》、《谈死光》等。他热情帮助高士其走上科普写作的道路。

是年，艾思奇出版了《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等著作还和郑易里合作翻译出版了《新哲学大纲》。

年底，《读书生活》杂志主编李公朴和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沈君儒、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被国民党逮捕，原在这个杂志工作的柳湜、夏征农先后调往他处，艾思奇负责杂志全部编辑工作。在杂志屡遭国民党查封的情况下，他一再易名坚持出版。后又遇读书生活出版社资金困难，他多方奔走，邀约进步人士郑易里为股东，又聘请了黄洛峰为经理，使出版社得以长期坚持和发展。

1937年(27岁)

出版了《哲学与生活》一书。5月，又创办综合性学术杂志《认识月刊》，刊物出了两期，于抗战开始后停刊。当时郭沫若、邹韬奋、胡愈之等发起组织上海编辑人协会，将一些进步刊物合并，出了《文化战线》旬刊、《战线》五日刊、《抗敌周刊》等。艾思奇参加了前两个刊物的编辑工作。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9月被调往革命圣地延安。同行的有周扬、李初梨、何干之等十人。十月间到达延安。

1938年(28岁)

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9月，毛泽东同志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9月30日，艾思奇、何思敬、周扬、吴黎平、王学文、成仿吾、郭化若等十八人，联名在《解放》周刊第五十三期上，公布了《新哲学会缘起》。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

年底，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他被调到该院任教，后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

1939年(29岁)

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他到延安后，兼任文化工作多种职务，如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常务理事、青年艺术剧院理事、延安诗会理事、鲁迅研究会理事等。他在上海时就写过不少关于文艺方面的文章，担任文委秘书长后，继续撰写这方面的文章。艾思奇爱好文艺，他还特别喜欢海涅的诗，他利用业余时间，从1931年开始翻译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于1945年方出版。

这一年，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参加的有艾思奇、何思敬、杨超、和培元等。每周集会一次，着重讨论《实践论》、《矛盾论》的问题。尔后，中央宣传部也成立了一个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指导员是艾思奇，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柯柏年、肖劲光、莫文骅等等。每周开讨论会一次，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按提纲学习讨论。为适应哲学学习需要，艾思奇编选了《哲学选辑》一书，还和吴黎平同志合作，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一书的任务。

1940年(30岁)

年初，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艾思奇代表文协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运动》的报告。

2月，延安出版《中国文化》，艾思奇任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如《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还写了“哲学讲座”。《中国文化》共出了三卷（每卷六期，其中第三卷只出了三期），1941年8月停刊。

6月21日，延安举行新哲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艾思奇作会务工作报告。毛泽东同志出席并讲了话，还设宴招待了哲学界。

1941年(31岁)

5月，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随后又改为中央研究院。艾思奇任该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经三个月研究，写成了《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文章叙述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情况，批判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阎锡山的“‘中’的哲学”等。

1942年(32岁)

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同志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之后，随即召集艾思奇等十多位同志提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主编。在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许多同志共同努力下，如期完成了任务。在中央研究院参加整风运动，写了几篇文章，如：《不要误解了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总结了整风学习中的体会。

5月间，在延安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年底，他

又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党的代表大会。

1943年(33岁)

年初调《解放日报》社任副刊部主任。8月间反击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8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

1944年(34岁)

除编辑《解放日报》副刊之外还写了不少文艺和哲学方面的文章。(全国解放后选编《有的放矢及其他》一书)

1945年(35岁)

4月,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任《解放日报》副总编。

1946年(36岁)

被任命为《解放日报》总编。这一年5月《大众书店》编辑出版了艾思奇的一本文集,书名为《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

1947年(37岁)

春季,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解放日报》于3月20日停刊,报社全体人员向晋察冀撤退。艾思奇于行军途中患副伤寒,在晋西北的岢岚县伤兵医院治疗。5月,病愈后,即到晋察冀的建屏县党中央所在地,参加了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土地会议。

年底,受中宣部委托,去解决北方大学的一些问题。随薄一波同志到达晋冀鲁豫边区的长治。并拟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因革命形势变化未成。不久,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大合并为华北大学。艾思奇随北方大学从山西长治到河北正定,在华北大学担任四部(即研究部)的副主任。10月,中央决定在河北建屏重新开办马克思列宁学院。艾思奇调该院任教,开始讲授社会发展史。

1949年(39岁)

年初,北京解放,马列学院迁入北京。中央决定在全国解放了的的城市,普遍组织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艾思奇除在马列学院担任这门课的主讲外,还培养了一批学员,分派到各地去教学,以满足当时学习的需要。他还编写了系统的讲稿。1950年2月,工人出版社汇集这些讲稿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1951年3月,又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在社会科学讲座节目中系统地讲授了同一题目,后经详细修改,由“三联书店”出版,并有

日译本在日本出版。在全国学习社会发展史的过程中,艾思奇针对当时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和倾向,写了《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等等,1950年7月,《学习》杂志社以《从头学起》为书名,结集出版。

7月北平召开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艾思奇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新哲学研究会常召开一些座谈会,北京哲学界的许多教授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任继愈等,经常在一起座谈哲学问题。艾思奇也常去参加活动。

这一年,艾思奇还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并在北大为全校师生讲授政治课。

1950年(40岁)

教育部邀请艾思奇为高等院校政治教师作广播讲座,系统讲授政治理论课,并负责问题解答。

1951年(41岁)

参加中央组织的土改工作团,冬季到安徽宿县工作了四个月。

1952年(42岁)

春季,回北京,又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在这期间,写了一篇《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他以后对文中的一些片面性错误作过自我批评。

1953年(43岁)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马列学院领导干部在学习总路线的过程中,在如何理解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上,艾思奇和杨献珍同志发生了争论,后来,杨献珍同志把他的意见写成《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送到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向一些理论工作者征求对杨献珍同志文章的意见。艾思奇于1955年8月写成《对杨献珍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的意见》。此文当时未公开发表。

8月当选为一届人大代表。年底,马列学院成立教研室,艾思奇被任命为哲学教研室主任。

1954年(44岁)

开始在校内系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初步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作为教材,在马列学院内部印发。1957年初,这本书经修订后,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

1955年(45岁)

党中央号召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艾思奇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写成了《胡适实用主义批判》和《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两本小册子。

是年秋，马列学院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艾思奇仍是市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并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年底，艾思奇写了《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哲学武器》一文。

是年冬天应邀赴波兰参加哲学学术讨论会。

1956年(46岁)

被选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上半年，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邀请，以《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劳动人民创造人类世界》为总题目，给文艺界作了多次报告。这一年又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此信早在1938年延安时期，就节译过其中的九封，发表于《解放》周刊，1951年出单行本，1956年又增译了另外十二封，共二十一封。他还根据自己的译本，给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作了讲解。

1957年(47岁)

年初，参加了一次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就“研究中国哲学史总的方向”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对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遗产“抽象继承”观点，提出了批评。秋，因病去青岛疗养。

1958年(48岁)

上半年，中央高级党校开展“反右派”运动。艾思奇正在青岛养病，奉命返校参加运动。运动结束后，被下放。

7月，下放前，曾到天津参观学习，应天津市委邀请，给全市干部和工人作了几次学哲学的报告。9月，原中央高级党校有十多位同志，随他下放河南登封县。艾思奇任开封地委副书记和登封县委副书记。在登封，他曾到当时学哲学的先进点——三官庙，总结群众学哲学的经验，写了《学哲学的群众运动》一文。1959年3、4月间，登封县委根据艾思奇的提议，在中岳嵩山脚下古代讲授程朱理学的嵩阳书院，办了几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辅导员训练班，

艾思奇亲自讲课。

下半年至1959年初,下放期间,在初期也赞扬过大跃进中的群众的干劲,写过《那里找根据》等文章,后在河南基层看到了“五风”问题逐渐泛滥,曾直接写信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指出:“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吴芝圃同志回信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1959年(49岁)

1月在《中州评论》上发表《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一文说,“作为科学的共产主义者,是不应该仅仅凭着空想和热情来指导行动的。”“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

4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文章针对当时实际存在的问题,指出“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指出具体工作中忽视“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错误。

在总结下放工作时,在哲学教研室一次经验交流会上,艾思奇一面赞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同时又严肃地指出:“下面刮‘五风’,问题很严重,如果不认真纠正,农民就要打扁担。”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秋,下放结束回京时,带领十多位下放干部,先后到洛阳、开封、三门峡、西安、太原、大同等地参观学习,顺路看了龙门石窟、半坡遗址、黄河大坝、云岗石窟等名胜古迹,并曾登上中岳嵩山和西岳华山的最高峰。

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准备出国讲学,写成了《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中国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文章从1919年“五四”运动,写到1945年“七大”,尚有两题未写,因故中断,也未出国。

年底,党中央任命艾思奇为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

1960年(50岁)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艾思奇写了《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文。从延安时代起,尤其是五十年代,艾思奇就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讲过许多课,写过不少文章。如1951年发表了《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1952年又发表了《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方法》等等。六十年代初,党中央号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四篇哲

学著作,艾思奇作了多次辅导报告。

中央高级党校于1959年第一次开办自然辩证法班。艾思奇下放回来后直接抓这个班的教学,亲自布置计划,并常讲课,在他指导下,还编写了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这个班培养了一批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干部。艾思奇十分重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写过不少文章。同时,高级党校还开办了逻辑班,他也亲自抓教学,并讲了多次“辩证逻辑”等课。

1961年(51岁)

中央宣传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和领导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艾思奇被委任为哲学专业教材编写组组长。年初,接受主编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1961年11月此书正式出版。

1962年(52岁)

5月,艾思奇继1960年7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文之后,在《哲学研究》上又发表了《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文。

1963年(53岁)

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王从吾同志离任后,暂由艾思奇主持全校工作。

夏季,在青岛疗养时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一文。秋季,中宣部要艾思奇组织一个写作班子,研究和写作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艾思奇写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等,后又写了《两皮下的赫鲁晓夫的世界观——实用主义》,曾在校内刊物发表。

这一年中,在校内讲了大量的课,如给五九班、六〇班哲学专业连续讲了七次“历史唯物主义引言”,给五九班党史专业作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辅导报告”,给六一班讲了“哲学基础课”等,此外,还应西北局的邀请,到西安给干部作了哲学报告。

1964年(54岁)

并挤时间通读《资治通鉴》,坚持自修俄文。艾思奇在高级党校内担负了大量的教学工作,讲了《世界观问题》,辅导了《反杜林论》辩证法部分,辅导《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了《马列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几个时期》等。还在中国科学院讲了《毛泽东同志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在中国文联、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作了毛主席四篇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等。

夏季,在北京召开亚非地区科学讨论会,中国科学院邀艾思奇为代表作

了《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和他的哲学思想》的报告。

1965年(55岁)

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评“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不容许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的辩证法》一文，指出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的思想所提出的“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意思，不需要用“合二而一”来补充和代替。

该年春、冬，中央高级党校组织大批干部参加“四清”运动。艾思奇到通县和海淀东北旺公社两次参加“四清”。在“四清”中，为准备出国讲学，写成了《毛泽东同志四篇哲学著作辅导提纲》。

年初和年底，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和杭州，两次找艾思奇谈话，讲了许多哲学问题。其中一次是谈关于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

6月1日，《红旗》刊登坂田昌一的文章。艾思奇应邀参加《红旗》编辑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关于坂田昌一文章的座谈会，并发了言，题为：《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后刊登在《红旗》1965年第九期上。

1966年(56岁)

从杭州回校，在校内传达毛泽东同志的讲话。3月初，去阜外医院作身体检查，医生发现他的心脏病已较严重，让立即住院治疗。在住院期间，他仍不倦地学习，医生和同志们一再劝阻，他不以为然，总觉得自己还可以为党工作十年、二十年，打算退休后写长篇专著。不幸，病情日重，于3月22日晚九时，与世长辞，终年56岁。

王丹一 卢国英 叶佐英

1982年5月8日

编 后 记

《艾思奇文集》的编辑工作，是1979年初着手进行的。三年来，在许多同志的热情关怀、帮助下，终于完成了编辑任务。

艾思奇同志自三十年代起，即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生活在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时代，他同党和人民的事业休戚与共；他的哲学著作有着强烈的时代感，而他后期的著作，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曲折前进的历史反映。

这部文集选入的艾思奇著作，分两卷出版。这里虽未包括艾思奇的全部哲学著作，但是读过这些文章，也可见其哲学思想的概貌。

我们衷心感谢支持本书编辑工作的同志；感谢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艾思奇文集》编辑组

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